

郭双林
总策划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历史地理学读本

Readings in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 唐晓峰 黄义军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READINGS IN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ISBN 7-301-09420-5



9 787301 094204 >

ISBN 7-301-09420-5/K · 0390

定价：35.00 元

K901.9
T261

-71
历史地理学读本

Readings in History:
Historical Geography

| 唐晓峰 黄义军 编 |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地理学读本/唐晓峰,黄义军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
ISBN 7-301-09420-5

I. 历… II. ①唐…②黄… III. 历史地理学—高等学校—教学参考资料 IV. K90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2683 号

书 名: 历史地理学读本

著作责任者: 唐晓峰 黄义军 编

责任编辑: 岳秀坤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420-5/K·039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27.5 印张 437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总 序

编辑出版这套《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系列》，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愿望：配合高校历史学专业的教学，在教材和原始文献资料之外，为广大学生提供一个研究性学术论文的选本。

教学改革是个常讲常新的话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教学改革措施。就历史学专业而言，在课程设置方面，为促进学科间的渗透，在学科主干课之外，一些院校先后开设了文学、哲学甚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课程；在课时安排上，压缩课堂授课时间，增加课外阅读量；在教学方法上，满堂灌的教学方法逐渐被淘汰，研究型、启发式教学得到提倡；在教学手段上，多媒体得到推广。随着这些改革措施的推行，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但是毋庸讳言，随着近年的扩招，教育资源严重不足，一些院校的教学质量呈下滑趋势。其中在大学本科（甚至包括部分研究生）中存在着两个比较明显的问题：一是阅读量严重不足，二是写作能力亟待提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受教学条件的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受旧有教育观念束缚。为了增加广大学生的阅读量，教育部高等学校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于2002年向全国高校历史系主任联席会议推荐了《普通高等学校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基本阅读书目》。为了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我们今天又编辑出版了这套历史学专业学术论文读本。

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为自近代新史学产生以来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按照学科分类，编为《中国古代史读本》（上下册）、《中国近代史读本》（上下册）、《外国史读本》（上下册）、《史学理论读本》、《史学史读本》、《历史地理学读本》和《考古学读本》等7种10册，每册40余万字，共计400余万字，涵盖了历史学专业除历史文献学、专门史以外的6个二级学科。参编人员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历史专业的部分中年教师。

我们选文的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四点：（1）知识性。即选文适当考虑覆盖面，尽可能顾及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知识领域。（2）典型性。即所选文章

在研究思路上应该具有比较突出的创新性,或者说范式意义,可供读者反复品味揣摩。(3)规范性。即论文题目的选择、切入的角度、思维逻辑的展开、资料的运用和文字表述必须符合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4)可读性。即入选文章在行文上应该明白晓畅,或独具一格。

除此之外,我们还特别作了如下规定:第一,编选者的文章概不入选。第二,重文不重人。第三,除个别卷帙外,原则上全书每卷每人最多只限选一篇。第四,海外作者要占到一定比例。等等。

由于全书跨度太大,受既有知识储备的制约,目前的中年学者很少有人能贯通各卷。为名实相符,本丛书只设总策划而不设总主编。总策划负责全书的策划和组织工作,质量则由各卷编选人员自己负责。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编委会对编选方针和原则进行过多次讨论,但真正操作起来,颇难完全一致;加之入选文章涉及众多领域,出自多人之手,时间跨度比较大,因此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水平和风格上的差异。

编选这样一套学术论文读本,可能是一项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因为可以入选的文章太多,受全书规模的限制,不可能使所有高质量的文章都能入选。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特别在每篇之后增加了参考篇目,一则可使读者加深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再则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以便进一步扩大阅读范围。即便这样,对哪些文章应该入选,哪些文章应该列入参考篇目,拿捏起来亦颇感困难。见仁见智,尽力而为。聊以自慰,亦堪自嘲。

记得白寿彝先生在一封与人论读书的短笺中说过:“读书之‘读’,似应理解为书法家读帖读碑之读,画家读画之读,而不是一般的阅览或诵读。”先生还以《诗经·邶风·墙有茨》中将“不可读”排在“不可道”、“不可详”后面来说明,认为“读”有“抽绎”的古义。(《与人谈读书》,《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作为编者,我们也希望读者在阅读这套丛书时,能像书法家读帖读碑,画家读画那样,细细品味,反复揣摩,真正从中学到一些东西。

最后,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丛书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张凤珠女士的大力支持,责任编辑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劳动,在此谨致谢意。诚望海内外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郭双林

2005年10月

目 录

- 总序 郭双林/I
-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 顾颉刚/1
-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7
- 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侯仁之/41
- 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
变迁 侯仁之 俞伟超/57
-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
局面 谭其骧/82
-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 谭其骧/113
- 三门峡与古代漕运 史念海/128
- 周原的变迁 史念海/147
- 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 石泉/164
- 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陈桥驿/176
- 先秦两汉时期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开发与地域
特征 邹逸麟/191
- 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张修桂/218
- 秦汉象郡新考 周振鹤/242
- 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其文化
意义 葛剑雄/261
- 古代居延道路 王北辰/274
- 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城市形态的
研究 李孝聪/295
- 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地理研究 韩光辉/340
- 农业人口的迁入与辽塞外本土农耕区的
形成 韩茂莉/360
- 巨鹿之战地理新解 辛德勇/373
- 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 卢云/401
- 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 斯波义信/413
- 编后记 唐晓峰 黄义军/433

顾颉刚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

本文对夏商周至秦帝国建立后的中国疆域变迁进行了梳理。作者认为,尽管三代疆域均较前代有所增加,但只有到了秦代,疆域的扩张才达到空前的程度。作者对《尧典》等书中关于秦以前古代国家疆域与政治制度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是学者为贬低秦始皇、美化古代帝王的杜撰之作。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曾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古史辨派代表人物。20世纪30年代创办《禹贡》半月刊,并组织“禹贡学会”,在学术界推动了对中国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注重对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考察研究。

夏代的历史,我们固然得不到实物作证据,但即就书本上的材料看来,那时的国都有说阳翟的,有说阳城的,又有说帝丘的,晋阳的,安邑的,反正离不了现在河南省的北部和山西省的南部,带着一点儿河北省的南端。因此,《史记·吴起列传》里说:

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

这个疆域不过占有了黄河下游一段地方。他们的敌国和“与国”,如穷,寒,鬲,仍,斟灌,斟寻等等都在山东省,又可知那时与夏朝交通的只有济水流域为繁密。

商民族大约起自东北(说见傅斯年先生《东北史纲》),灭夏而占有中原;比较夏代的疆域,惟有东北方是添出来的,所以相土会得“海外有截”,王亥会得游牧到有易,箕子会得退保朝鲜,而殷虚中掘出来的东西有咸水贝和鲸鱼骨。其它方面,并没有进步。因此,商颂虽夸言武功,然而说到“邦畿”,仍只有“千里”。至于“与国”,西边多出了氐,羌。但商是被西方的周民族所灭的,周民族与姜姓民族是累世的婚姻,而姜与羌实为一字,所以与其说商的势力西展至羌,毋宁说羌的势力东展至商。

到了周人入主中原之后,疆域又宽广了些。《左传》昭九年,记周景王之言曰:

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这里所说的,东土是夏商时的中原,北土是商增于夏的境域,西土是周人的老家,惟有南土是新开辟的。我们看《左传》上说的“昭王南征而不复”,《大雅》里说的“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江汉》),及“整我六师,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国”(《常武》),可知当时对于开辟南疆是怎样的努力。然而巴,濮,楚,邓,周亦不能有,这句话只表示其声威所及之远而已。实际上,周的南境不过到申,吕,许,就是今河南省的南部。因为这样,所以孟子提到三代,只说: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

这句话固然说得笼统些,三代的疆域是不相等的,周比了夏恐要大上两三倍,但孟子时的古史地域没有扩张,即此可以作证。

到了战国,各强国竭力的“辟土地,充府库”,中原的小国家既尽为所吞并,向日没有来往的蛮夷之地亦莫不为所侵略,“方千里”就算不了一回事。七国之中,尤以秦楚为大。《荀子·强国篇》云:

秦……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曷谓“广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诸侯也,未有过封内千里者也。今秦南乃有沙羡与俱,是乃江南也;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东在楚者乃界于齐,在韩者逾常山乃有临虑,在魏者乃据围津,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其在赵者剡然有苓而据松柏之塞,负西海而固常山:是地遍天下也。……此所谓“广大乎舜禹”也。

他所说的是秦未灭六国时的疆域。拿现在的地方说来,是他们有了陕西和四川两省(“北与胡貉为邻,西有巴戎”,又那时秦已灭蜀了),又湖北省的南部(《汉书·地理志》,沙羡县属江夏郡),河南省的北部(《汉志》,河内郡有隆虑县,临与隆同纽通假),山东省的西部(围津,杨倞注,“围,当为圉,《汉书》‘曹参渡围津’,颜师古曰,‘在东郡’”),河北省的南部(苓,杨倞注。“未详所在。或曰,苓与灵同;《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有灵寿县,今属真定”)。地方固然不小,但除了陕西和四川外,都是些零星小块。荀子于此已谥为“广大乎舜禹”,然则舜禹之地将狭小到怎样程度呢?即此可见到了战国末年,还不曾把古代的地域放大。

其后始皇二十六年,成了统一的功业,丞相王绾等上帝号议云: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

讲到五帝的国土,还不过“方千里”,远不及始皇疆域之广;始皇的疆域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仆射周青臣进颂道:

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

这又是说的“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之地至于“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他是何等地可以骄傲!

因为他有了这样的骄傲,所以他巡行所及,常常令群臣刻石颂秦功德。当二十八年,他登琅邪时,刻石道:

……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

这更清清楚楚地把他的疆域四至表示出来。在举出了这四至之后再来说一句“功盖五帝”,见得他所有确已超过了他们。

读者应当记着:中国的疆域由夏到秦,是这样一次一次放大的,在秦始皇之前不曾有过这样广大的版图。

然而一班学者不愿意始皇专美于后,于是他们装饰始皇以前的帝王,使他们的疆域各各和始皇同样地广大,或者还超过了他。

我们先看《淮南子》。《主术训》云:

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东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

又云:

纣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

《汜论训》云:

夏桀殷纣之盛也,人迹所至,舟车所通,莫不为郡县。

《泰族训》云:

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

再看《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它说颡项是:

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日月所照,莫不砥砺。

说到帝喾,是:

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

说到帝尧,是:

四海之内，舟輿所至，莫不说夷。

说到帝舜，是：

南抚交趾，大，教；（西）鲜支，渠庚，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羽民。

说到禹，是：

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

再看《禹贡》，它举出的东西二至是：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

再看《尧典》，是：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申命羲叔，宅南交。……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中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再看郑玄《礼记·王制》注，是：

禹承尧舜，……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夏末既衰，夷狄内侵，诸侯相并，土地减，国数少。殷汤承之，更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为九州。……周公复唐虞之旧域，……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

再看贾公彦《周礼·职方》疏，是：

自神农已上有大九州，柱州，迎州，神州之等。至黄帝以来，德不及远，惟于神州之内分为九州，故《括地象》云“昆仑东南万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

我们不必再引什么了！现在就把他们两方面的说话比较一下罢。

本来夏桀之国不过从河济到华山的，现在则“人迹所至莫不为郡县”了。本来商人自己说“邦畿千里”的，现在则“殷汤制中国方三千里之界”了。本来周的声威所及不过今河南，河北，陕西，山西，山东，湖北几省，现在则要服之内已方七千里，连要服外算来就方万里了。孟子所说的“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荀子对于未统一时的秦已诧叹为“广大乎舜禹”，这不是全未读书吗？儒家的两位大师，为什么他们的眼孔会这等小？

本来“以海内为郡县”是秦始皇的创举，现在则夏桀殷纣时“舟车所通

莫不为郡县”了。本来“西涉流沙，东有东海”是秦始皇的疆域，现在则不但禹的地方如此，就是纣的地方也如此了。本来“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是秦始皇时的情形，现在则不但颛顼，帝喾，尧，禹都已如此，就是纣时也如此了。本来“五帝地方千里”，秦始皇的功业是“五帝所不及”，现在则“神农以上有大九州”，自黄帝以来虽因德衰而只有大九州中的一州，然而也已有“万五千里”了。于是就证明了秦始皇的无聊的骄傲！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去读一读《尧典》和《五帝德》？

不但在地域方面他完全抄了五帝三王的老文章，就是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器械一量”，不是他在琅邪刻石上自己称赞的吗？然而《尧典》上早有“同律度量衡”之语了！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烧书，要把“偶语诗书”的弃市，要把“以古非今”的族诛？我们拿了《尧典》和《秦始皇本纪》合读，除了焚书坑儒之外，他封禅也照做了，巡狩也照做了，分州（郡）也照做了，各种的统一的政令也照做了，他真是复生的尧舜，而他的一班辅佐也尽是些“法先王”的人了。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生怕别人引了古书来议论他！

古史中地域的扩张是这样来的。我们不必攻击传说，我们且去寻出它的背景。

廿三，三，二。

（原载《禹贡》1934年第1卷第2期）

参 考 论 著

1. 邹衡：《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载氏著《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2.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分区体系》，载氏著：《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
3. 顾颉刚：《周室的封建及其属邦》，载氏著《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4. 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20世纪初,西欧气象学界权威奥地利J. Hann认为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本文作者通过列举有关中国古代气候的文献与考古资料,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文章根据古代气候资料的来源将近五千年的时间分为4个时期,即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前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1400年)、方志时期(1400—1900年)、仪器观察时期,主要采用物候学的方法,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气候变动的指标,论述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

竺可桢(1890—1974),浙江上虞人。生前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曾任浙江大学校长、教授,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和教育家,我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他在台风、中国季风及大气环流、气候区划、物候、气候变迁等方面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前 言

中国古代哲学家和文学家如沈括(1030—1094)、刘献廷(1648—1695)对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无常,早有怀疑,由于他们拿不出很多实质性的事实以资佐证,所以后人未曾多加注意。直到现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即反帝反封建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革命精神:一部分先进分子引入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的革命斗争;在这种新形势下,近代科学也受到推动和扩展,例如应用科学方法进行考古发掘,并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对古代历史、地理、气象等进行研究。殷墟甲骨文首先引起一些学者的注意。有人据此推断在三千年前,黄河流域同今日长江流域一样温暖潮湿。^[1]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成绩毕竟是有限的;或因材料不足而作了错误的判断。例如,近三千年来,中国气候经历了许多变动,但它同人类历史社会的变化相比毕竟缓慢得多,有人不了解这一点,仅仅根据零星片断的材料而夸大气候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2],这是不对的。当时我也曾根据雨量的变化去研究中国的气候变化,由于雨量的变化往往受地域的影响,因此很难得出正确的结果。^[3]

只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许多工厂、人民公社和研究机关,为科学研究创造了广阔的境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指导,解除了对西洋资产阶级科学家和权威主义的思想束缚,我国科学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20世纪初期,西欧的气象学界权威奥地利的J. Hann教授以为在人类历史时期,世界气候并无变动。这种唯心主义的论断已被我国历史纪录所否定,从下面的论述就可以知道。

在世界上,古气候学这门科学好像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才吸引着地球物理学家的注意。在 60 年代,曾举行过三次古气候学的世界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提出的文章,多半是关于地质时代的气候,只有少数讨论到历史时代的气候。无疑,这是由于在西方和东方国家中,在历史时期缺乏天文学、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现象的可靠记载。在这方面,只有我国的材料最丰富。在我国的许多古文献中有着台风、洪水、旱灾、冰冻等一系列自然灾害的记载,以及日中黑子、极光和彗星等不平常的现象的记录。1955 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了《古新星新表》一文,文中包括 18 世纪以前的 90 个新星。这篇文章出版以后,极为世界上的天文学家所重视。^[4]1956 年,中国科学院出版两卷《中国古代地震目录》,包括公元前 12 世纪到 1955 年之间的 1180 次大地震。这一工作除了为我国的新建设提供不可缺少的参考而外,中外地震学家都非常欢迎这两卷书。^[5]

在中国的历史文件中,有丰富的过去的气象学和物候学的记载。除历代官方史书记载外,很多地区的地理志(方志),以及个人日记和旅行报告都有记载,可惜都非常分散。本篇论文,只能就手边的材料作出初步的分析,希望能够把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主要趋势写出一个简单扼要的轮廓。

根据手边材料的性质,近五千年的时间可分为四个时期:即一、考古时期,大约公元前 3000 至 1100 年,当时没有文字记载(刻在甲骨上的例外);二、物候时期,公元前 1100 年到公元 1400 年,当时有对于物候的文字记载,但无详细的区域报告;三、方志时期,从公元 1400 年到 1900 年,在我国大半地区有当地写的而时加修改的方志;四、仪器观测时期。我国自 1900 年以来开始有仪器观测气象记载,但局限于东部沿海区域。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必须选定一个因素作为指标。如雨量为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于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原因是在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极端,非旱即涝;再则邻近两地雨量可以大不相同。相反地,温度的变迁微小,虽摄氏一度之差,亦可精密量出,在冬春季节即能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冬季温度因受北面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温度升降比较统一,所以本文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惟一指标。

一 考古时期,约公元前 3000—1100 年

解放后二十多年来,我国考古学家在我国的不同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发掘。西安附近的半坡村是一个最熟知的遗址。根据 1963 年出版的报告,在 1954 年秋到 1957 年夏之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个遗址上,进行了五个季度的发掘,大约发掘了 10000 平方米的面积,发现了 40 多个房屋遗址,200 多个贮藏窖,250 个左右的墓葬,近 10000 件的各种人工制造物。^[6]根据研究,农业在半坡的人民生活中显然起着主要作用。种植的作物中有小米,可能有些蔬菜;虽然也养猪狗,但打猎捕鱼仍然是重要的。由动物骨骼遗迹表明,在猎获的野兽中有麀(又名河麀, *Hydropotes inermis*)和竹鼠(*Rhizomys sinensis*)……。书中认为,这个遗址是属于仰韶文化(用 C¹⁴同位素定为约 5600—6080 年前);并假定说,因为水麀和竹鼠是亚热带动物,而现在在西安地区已经不存在这类动物,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在温暖潮湿。^[7]

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安阳,另有一个熟知的古代遗址——殷墟。它是殷代(约公元前 1400—1100 年)故都。这个遗址在 19 世纪末被发现,1928 年以后开始系统发掘。那里有丰富的亚化石动物。杨钟健和德日进(P. Teilhard Chardin)曾加以研究,其结果发表于前北京地质调查所报告之中。^[8]这里除了如同半坡遗址发现多量的水麀和竹鼠外,还有獾(*Tapirus indicus Cuvier*)、水牛和野猪。这就使德日进虽然对于历史时代气候变化问题自称为保守的作者,也承认有些微小的气候变化了。因为许多动物现在只见于热带和亚热带。^[9]

然而对于气候变化更直接的证据是来自殷代具有很多求雨刻文的甲骨文上。在二十多年以前胡厚宣曾经研究过这些甲骨文,发现了下列事实:在殷代时期,中国人虽然使用阴历,但已知道加上一个闰月(称为第十三个月)来保持正确的季节;因而一年的第一个月是现在的阳历的一月或二月的上半月。在殷墟发现十万多件甲骨,其中有数千件是与求雨或求雪有关的。在能确定日期的甲骨中,有 137 件是求雨雪的,有 14 件是记载降雨的。这些记载分散于全年,但最频繁的是在一年的非常需要雨雪的前五个月。在这段时间内落雪很少见。^[10]当时安阳人种稻,在第二个月或第三个月,即阳历三月份开始下种;现在安阳种地下种要到四月

中^[11],大约要早一个月。论文又指出,在武丁时代(公元前 1324?—1365 年?)的一个甲骨上的刻文说,打猎时获得一象。表明在殷墟发现的亚化石象必定是土产的,不是像德日进所主张的,认为都是从南方引进来的。河南省原来称为豫州,这个“豫”字就是一个人牵了大象的标志,这是有意义的。^[12]

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一定要影响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只是植物结构比较脆弱,所以较难保存;但另一方面,植物不像动物能够移动,因而作气候变化的标志或比动物化石更为有效。对于半坡地层进行过孢子花粉分析,因花粉和孢子并不很多,故对于当时的温冷情况,不能有正面的结果,只能推断当时同现在无大区别,气候是半干燥的。^[13]1930—1931 年,在山东历城县两城镇(北纬 35°25′、东经 119°25′)发掘龙山文化遗址。在一个灰坑中找到一块炭化的竹节,有些陶器器形的外表也似竹节。^[14]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竹类的分布在黄河流域是直到东部沿海地区的。

从上述事实,我们可以假设,自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以来,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从 1°—3°。如果检查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各地的月平均温度及年平均温度,可以看出正月份的平均温度减低 3°—5℃,年平均温度大约减低 2℃。某些历史学家认为,黄河流域当时近于热带气候,虽未免言之过甚,但在安阳这样的地方,正月平均温度减低 3°—5℃,一定使冬季的冰雪总量有很大的不同,并使人们很容易觉察。那些相信冰川时期之后气候不变的人,实际上是违反辩证法原则的;实际上,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同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是一样的,只是幅度较小而已。现代的温度和最近的冰川时期,即大约一二万年以前时代相比,年平均温度要温暖到摄氏七八度之多,而历史时期年平均温度的变化至多也不过二三度而已。气候过去在变,现在也在变,将来也要变。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不过气候变化的详细情形,尚待更多的发现来证实。

二 物候时期,公元前 1100—公元 1400 年

谈物候时期以前,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物候,什么是物候学(Phenology)?简单说来,物候学就是没有观测仪器时代的气象学和气候学。

在温度表(发明于 1593 年)和气压表(发明于 1643 年)发明以前,人们不知道如何量气温和气压。在那以前,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就要人目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叫物候。研究这类现象关系的就是物候学。我国劳动人民,因为农业上的需要,早在周初,即公元前 11 世纪时便开创了这种观测。如《夏小正》、《礼记·月令》均载有从前物候观察的结果。积三千年来的经验,材料极为丰富,为世界任何国家所不能企及。

随着周朝建立(公元前 1066—249 年),国都设在西安附近的镐京,就来到物候时期。当时官方文件先铭于青铜,后写于竹简。中国的许多方块字,用会意象形来表示,在那时已形成。由这些形成的字,可以想象到当时竹类在人民日常生活中曾起了如何的显著作用。方块字中如衣服、帽子、器皿、书籍、家俱、运动资料、建筑部分以及乐器等名称,都以“竹”为头,表示这些东西最初都是用竹子做成的。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在周朝初期气候温暖,可使竹类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不行了。

气候温和由中国最早的物候观测也可以证实。新石器时期以来,当时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各民族都从事农业和畜牧业。对于他们,季节的运行是头等重要的事。当时的劳动人民已经认识到一年的两个“分”点(春分和秋分)和两个“至”点(夏至和冬至),但不知道一个太阳年的年里确有多少天。所以,急欲求得办法,能把春分固定下来,作为农业操作的开始日期。商周人民观察春初薄暮出现的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即红色的大火星来固定春分。^[15]别的小国也有用别的办法来定春分的。如在山东省近海地方的郟国人民,每年观测家燕(*Hirundo rustica gutturalis*)的最初来到以测定春分的到来。这种鸟类在农家住宅的顶棚上筑巢,它们的来去很容易观察。《左传》提到郟国国君到鲁国时对鲁昭公说,他的祖先少皞在夏、殷时代,以鸟类的名称给官员定名,称玄鸟为“分”点之主,以示尊重家燕。^[16]这种说法表明,在三四千年前,家燕正规地在春分时节来到郟国,郟国以此作为农业开始的先兆。我们现在有物候观察网,除作其他观察外,也注意家燕的来去。根据近年来的物候观测,家燕近春分时节正到上海,十天至十二天之后到山东省泰安等地。郟居于上海与泰安之间。据威尔根生(E. S. Wilkinson)在他的《上海鸟类》一书中写道:“家燕在 3 月 22 日来到长江下游、上海一带,每年如此。”^[17]显然三四千年前家燕于春分已到郟国,而现在春分那天家燕还只能到上海了。把这两个地点的同

一时期(1932—1937年)温度比较一下(见表1),看一看它们有多少差别,那是有意义的。

表1 郑城、上海平均温度比较表(摄氏)

地点	纬度(北)	经度(东)	海拔(米)	正月	二月	三月	年平均
郑城	34°38'	118°26'	20.0	-1.4°	1.0°	6.6°	14.1°
上海	31°32'	121°26'	7.0	3.2°	4.2°	8.1°	15.6°
差数	3°6'			4.6°	3.2°	1.5°	1.5°

上表列出的结果,正好同上面考古时期用竹子分布区域变化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

周朝的气候,虽然最初温暖,但不久就恶化了。《竹书纪年》上记载周孝王时,长江一个大支流汉江,有两次结冰,发生于公元前903和前897年。《纪年》又提到结冰之后,紧接着就是大旱。这就表示公元前第10世纪时期的寒冷。《诗经》也可证实这点。相传《诗经·豳风》是周初成王时代(公元前1063—前1027年)的作品,可能在成王后不久写成。豳(邠)的地点据说是一个离西安不远,海拔500米高的地区。当时一年中的重要物候事件,我们可以从《豳风》中的下列诗句中看出来:

八月剥枣,
十月获稻,
为此春酒,
以介眉寿。

接着又说:

二之曰凿冰冲冲,
三之曰纳于陵阴,
四之曰其蚤,
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

这些诗句,可以做为周朝早期,即公元前10世纪和11世纪时代邠地的物候日历。如果我们把《豳风》里的物候和《诗经》其他国风的物候如《召南》或《卫风》里的物候比较一下,就会觉得邠地的严寒。《国风·召南》诗云:

“擗有梅，顷筐墜之。”《卫风》诗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梅和竹均是亚热带植物，足征当时气候之和暖，与《豳风》物候大不相同。这个冷暖差别一部分是由于邠地海拔高的缘故，另一方面是由于周初时期，如《竹书纪年》所记载过有一个时期的寒冷，而《豳风》所记正值这寒冷时期的物候。在此连带说一下，周初的阴历是以现今阳历的12月为岁首的，所以《豳风》的8月等于阳历9月，其余类推。^[18]

周朝早期的寒冷情况没有延长多久，大约只一二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81年）又和暖了。《左传》往往提到，山东鲁国过冬，冰房得不到冰；在公元前698、590和545年时尤其如此。^[19]此外，像竹子、梅树这样的亚热带植物，在《左传》和《诗经》中，常常提到。

宋朝（960—1279年）以来，梅树为全国人民所珍视，称梅为花中之魁，中国诗人普遍吟咏。事实上，唐朝以后，华北地区梅就看不见了。可是，在周朝中期，黄河流域下游是无处不有的，单在《诗经》中就有五次提过梅。在《秦风》中有“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的诗句。终南山位于西安之南，现在无论野生的或栽培的，都无梅树。^[20]下文要指出，宋代以来，华北梅树就不存在了。在商周时期，梅树果实“梅子”是日用必需品，像盐一样重要，用它来调和饮食，使之适口（因当时不知有醋）。《书经·说命篇下》说：“若作酒醴，尔惟麴蘖；若作和羹，尔唯盐梅。”这说明商周时期梅树不但普遍存在，而且大量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到了战国时代（公元前480—前222年）温暖气候依然继续。从《诗经》中所提粮食作物的情况，可以断定西周到春秋时代，黄河流域人民种黍和稷，作为主要食物之用。^[21]但在战国时代，他们代之以小米和豆类为生。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提到只北方部族种黍。这种变化大约主要由于农业生产资料改进之故，例如铁农具的发明与使用。孟子又说，当时齐鲁地区农业种植可以一年两熟。^[22]比孟子稍后的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证实此事。荀子说，在他那时候，好的栽培家，一年可产生两季作物。^[23]荀子生于现在河北省的南部，但大半时间在山东省工作，山东之南江苏之北，近年来直到解放，在淮河北部习惯于两年轮种三季作物，季节太短，不能一年种两季。^[24]二十四节气是战国时代所观测到的黄河流域的气候而定下的。^[25]那时把霜降定在阳历10月24日。现在开封、洛阳（周都）秋天初霜在11月3日至5日^[26]左右。雨水节战国时定在2月21。现在开封和洛阳一带终霜期在3月22日左右。^[27]这样看来，

现在生长季节要比战国时代长三四十天。这一切表明,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

到了秦朝和前汉(公元前 221—23 年)气候继续温和。相传秦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书中的《任地篇》里有不少物候资料。清初(1660 年)张标所著《农丹》书中曾说道《吕氏春秋》云:“冬至后五旬七日菘始生。菘者,百草之先者也。于是始耕。今北方地寒,有冬至后六七旬而苍蒲未发者矣。”^[28]照张标的说法,秦时春初物候要比清初早三个星期。

汉武帝刘彻时(公元前 140—87 年),司马迁作《史记》,其中《货殖传》描写了当时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蜀汉江陵千树橘;……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按橘、漆、竹皆为副热带植物,当时繁殖的地方如橘之在江陵,桑之在齐鲁,竹之在渭川,漆之在陈夏,均已在这类植物现时分布限度的北界或超出北界,一阅今日我国植物分布图^[29],便可知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公元前 110 年,黄河在瓠子决口,为了封堵口子,斩伐了河南淇园的竹子编成为容器以盛石子,来堵塞黄河的决口。^[30]可见那时河南淇园这一带竹子是很繁茂的。

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几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了不少穷苦人民。但东汉的冷期时间不长。当时的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78—139 年)曾著《南都赋》,赋中有“穰橙邓橘”之句,表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直到三国时代曹操(155—220 年)在铜雀台种橘,只开花而不结果^[31],气候已比前述汉武帝时代寒冷。曹操儿子曹丕,在公元 225 年到淮河广陵(今之淮阴)视察十多万士兵演习,由于严寒,淮河忽然冻结,演习不得不停止。^[32]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有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了。这种寒冷气候继续下来,直到第三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公元 280—289 年的十年间达到顶点,当时每年阴历四月(等于阳历五月份)降霜。^[33]徐中舒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34],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 1°—2℃。

南北朝(420—589 年)期间,中国分为南北,以秦岭和淮河为界。因南北战争和北部各族之间的战争不断发生,历史记载比较贫乏。南朝在南京覆舟山建立冰房是一个有气候意义的有趣之事。冰房是周代以来各王朝备有的建筑,用以保存食物新鲜使其不致腐烂之用的。南朝以前,国都位于华北黄河流域,冬季建立冰房以储冰是不成问题的,但南朝都城在建业(今南京),要把南京覆舟山的冰房每年装起冰来,情形就不同了。问题

是冰从何处来？当时黄淮以北是敌人地区，不可能供给冰块；人工造冰的方法，当时还不可能；如果南京冬季温度像今天一样，南京附近的河湖结冰时间就不会长，冰块不会够厚，不能储藏。在1906—1961年期间，南京正月份平均温度为+2.3℃，只有1930、1933和1955年三年降低到0℃以下。因此，如果南朝时代南京的覆舟山冰房是一个事实，那么南京在那时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到大约摄氏2°，平均年温1°。

大约在公元533—544年，北朝的贾思勰写了一本第6世纪时代的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很注意当时他那地区的物候性质。他说：“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35]这本书代表了六朝以前中国农业最全面的知识。近来的中国农业家和日本学者都很重视这本书。贾思勰生于山东，他的书是记载华北——黄河以北的农业实践。根据这本书，阴历三月（阳历4月中旬）杏花盛开；阴历四月初旬（约阳历5月初旬）枣树开始生叶，桑花凋谢。如果我们把这种物候记载同黄河流域近来的观察作一比较，就可认清第6世纪的杏花盛开和枣树出叶迟了四周至两周，与现今北京的物候大致相似。关于石榴树的栽培，这本书说：“十月中以蒲葭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36]现在在河南或山东，石榴树可在室外生长，冬天无需盖埋，这就表明6世纪上半叶河南、山东一带的气候比现在冷。

第6世纪末至第10世纪初，是隋唐（589—907年）统一时代。中国气候在第7世纪的中期变得和暖，公元650、669和678年的冬季，国都长安无雪无冰。第8世纪初期，梅树生长于皇宫。唐玄宗李隆基时（712—756年），妃子江采苹因其所居满种梅花，所以称为梅妃。^[37]第9世纪初期，西安南郊的曲江池还种有梅花。诗人元稹（779—831年）《和乐天秋题曲江》诗，就谈到曲江的梅。^[38]与此同时，柑橘也种植于长安。唐大诗人杜甫（712—770年）《病橘》诗，提到李隆基种橘于蓬莱殿。^[39]段成式（？—863年）《酉阳杂俎》（卷十八）说，天宝十年（751年）秋，宫内有几株橘树结实一百五十颗，味道同江南蜀道所进贡的柑橘一样。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说的更具体。他说，开元末年江陵进柑橘，李隆基种于蓬莱宫。天宝十年九月结实，宣赐宰臣一百五十多颗。^[40]武宗李瀍在位时（841—847年），宫中还种植柑橘，有一次橘树结果，武宗叫太监赏赐大臣每人三个橘子。^[41]可见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中期，长安可种柑橘并能结果实。应该注意到，

柑橘只能抵抗 -8°C 的最低温度^[42],梅树只能抵抗 -14°C 的最低温度。在1931—1950年期间,西安的年绝对最低温度每年降到 -8°C 以下,二十年之中有三年(1936,1947和1948年)降到 -14°C 以下。梅树在西安生长不好,就是这个原因,用不着说橘和柑了。

唐朝时代,生长季节也似乎比现在长。大约在公元862年,樊绰写的《蛮书》中说,曲靖以南(北纬 $24^{\circ}45'$;东经 $103^{\circ}50'$),滇池以西,人民一年收获两季作物,九月收稻,四月收小麦或大麦。^[43]现在曲靖一带的农民很难照样耕种,因为他们发现生长季节太短,不得不种豌豆和胡豆来代替小麦和大麦。^[44]

唐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代(907—960年)。在此动乱时代没有什么物候材料可以做为依据。直到宋朝(960—1276年)才统一起来,国都建于河南省开封。宋初诗人林逋(967—1028年)隐居杭州以咏梅诗而得名。梅花因其一年中开花最早,被推为花中之魁首,但在11世纪初期,华北已不知有梅树,其情况与现代相似。梅树只能在西安和洛阳皇家花园中及富家的私人培养园中生存。著名诗人苏轼(1037—1101年)在他的诗中,哀叹梅在关中消失。苏轼咏杏花诗有“关中幸无梅,赖汝充鼎和”^[45]之句。同时代的王安石(1021—1086年)嘲笑北方人常误认梅为杏,他的咏红梅诗有“北人初不识,浑作杏花看”^[46]之句。从这种物候常识,就可见唐宋两朝温寒的不同。

12世纪初期,中国气候加剧转寒。这时,金人由东北侵入华北代替了辽人,占据淮河和秦岭以北地方,以现在的北京为国都。宋朝(南宋)国都迁于杭州。公元1111年第一次记载江苏、浙江之间拥有2250平方公里面积的太湖,不但全部结冰,而且冰的坚实足可以通车。^[47]寒冷的天气把太湖洞庭山出了名的柑橘全部冻死。在国都杭州落雪不仅比平常频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据南宋时代的历史记载,从公元1131到1260年,杭州春节降雪,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是四月九日,比12世纪以前十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迟一个月。^[48]公元1153—1155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州时,靠近苏州的运河,冬天常常结冰,船夫不得不经常备铁锤破冰开路。^[49]公元1170年南宋诗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阴历九月九日即重阳节(阳历10月20日)到北京,当时西山遍地皆雪,他赋诗纪念^[50]。苏州附近的南运河冬天结冰,和北京附近的西山阳历10月遍地皆雪,这种情况现在极为罕见,但在12世纪时,似为寻常之事。

第12世纪时,寒冷气候也流行于华南和中国西南部。荔枝是广东、广西、福建南部和四川南部等地广泛栽培的果树,具有很大经济意义的典型热带果实之一。^[51]荔枝来源于热带,比柑橘更易为寒冷气候所冻死,它只能抵抗 -4°C 左右的最低温度。^[52]1955年正月上旬华东沿海发生一次剧烈寒潮,使浙江柑橘和福建荔枝遭受到很大灾害。根据李来荣写的《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一书,福州(北纬 $26^{\circ}42'$,东经 $119^{\circ}20'$)是中国东海岸生长荔枝的北限。那里的人民至少从唐朝以来就大规模地种植荔枝。一千多年以来,那里的荔枝曾遭到两次全部死亡:一次在公元1110年,另一次在公元1178年,均在12世纪。^[53]

唐朝诗人张籍(765—约830年)作《成都曲》一诗,诗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54]说明当时成都有荔枝。宋苏轼时候,荔枝只能生于其家乡眉山(成都以南60公里)和更南60公里的乐山。在其诗中及其弟苏辙的诗中,有所说明。南宋时代,陆游(1125—1210年)和范成大(1126—1193年)均在四川居住一些时间,对于荔枝的分布极为注意。从陆游的诗中和范成大所著《吴船录》书中所言^[55],第12世纪,四川眉山已不生荔枝。作为经济作物,只乐山尚有大木轮围的老树。荔枝到四川南部沿长江一带如宜宾、泸州才大量种植。现在眉山还能生长荔枝,然非作为经济作物。苏东坡公园里有一株荔枝树,据说约一百年了。现在眉山市场上的荔枝果,是来自眉山之南的乐山以及更为东南方的泸州。由此证明,今天的气候条件更像北宋时代,而比南宋时代温暖。从杭州春节最后降雪的日期来判断,杭州在南宋时候(12世纪),四月份的平均温度比现在要冷 $1^{\circ}\text{—}2^{\circ}\text{C}$ 。

日本虽与我国隔有辽阔达四百公里的日本海,但日本所纪的物候仍能与我国物候相对比。日本保存有很可宝贵的物候观察纪录。第9世纪以后,日本的皇帝和封建主,历年在西京花园设宴庆祝日本的樱花盛开,庆祝日期均有记载,直到19世纪为止。这些记载可与现在的物候记载相比较。表2是从1958年出版的和达清夫(K. Wadache)编辑的《日本之气候》一书中抄录来的。^[56]

这个表表明,在大约一千年的记载中,京都樱花开花的平均日期,以第9世纪最早,以第12世纪最迟。在这段时间,中国气候和日本气候的变化是一致的。但到17世纪,在我国正值明末清初,气候非常寒冷,而日本的樱花如表2所示,反而比现在开得早,原因何在,迄今尚不能解释。

表 2 日本樱树开花日期的百分比的频数与平均日期

日期 世纪	3月31日 以前	4月 1—10	4月 11—20	4月 21—30	5月1日 以后	观察次数	平均日期
第 9	—	4.3%	57%	—	—	7	4月11日
第 10	7%	36	50	7%	—	14	4月12日
第 11	—	20	40	—	—	5	4月18日
第 12	—	25	25	25	25%	4	4月24—25日
第 13	13	13	38	38	—	8	4月15日
第 14	—	8	58	25	8	12	4月18日
第 15	—	43	37	17	3	30	4月13日
第 16	—	3	77	13	6	31	4月18日
第 17	10	20	70	—	—	10	4月12日
第 18						0	—
第 19		20	80	—	—	5	4月12日
第 20 花盛开	—	31	61	9	—	36	4月14日

第 12 世纪刚结束,杭州的冬天气温又开始回暖。在公元 1200、1213、1216 和 1220 年,杭州无任何的冰和雪。在这时期著名道士邱处机(1148—1227 年)曾住在北京长春宫数年之久。于 1224 年寒食节作《春游》诗云:“清明时节杏花开,万户千门日往来。”^[57]可知那时北京物候正与北京今日相同。这种温暖气候好像继续到 13 世纪的后半叶,这点可从华北竹子的分布得到证明。隋唐时代,河内(今河南省博爱)、西安和凤翔(陕西省)设有管理竹园的特别官府衙门,称为竹监司,南宋初期,只凤翔府竹监司依然保留,河内和西安的竹监因无生产取消了。^[58]元朝初期(1268—1292 年),西安和河内又重新设立“竹监司”的官府衙门,就是气候转暖的结果。但经历了一个短时间又被停止^[59],只有凤翔的竹类种植继续到明代初期才停。^[60]这一段竹的种植史,表明 14 世纪以后即明初以后,竹子在黄河以北不再作为经济林木而培植了。

这个比较温暖的期间是短暂的,不久,冬季又严寒了。根据江苏丹阳人郭天锡的日记,公元 1309 年的正月初,他由无锡沿运河乘船回家途中运河结冰,不得不离船上岸。^[61]公元 1329 年和 1353 年,太湖结冰,厚达数尺,人可在冰上走,橘尽冻死。这是太湖结冰记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62]蒙古族诗人迺贤(1309—1352 年)的诗集中,有一首诗,描述 1351 年山东

省白茅黄河堤岸的修补和同年阳历 11 月冰块顺着黄河漂流而下,以致干扰修补工作。^[63]黄河流域水利站近年记载表明,河南或山东到 12 月时,河中才出现冰块(见表 3)。可见酒贤时黄河初冬冰块出现要比现在早一个月。

表 3 近年来黄河结冰的日期

地 名	河南省花园口	山东省洛口
观 测 年 份	1951, 1955, 1956	1922—1929, 1933—1936, 1943, 1951—1958
冰块最初出现的平均日期	阳历 12 月 9 日	阳历 12 月 21 日
冰块最后出现的平均日期	2 月 16 日	2 月 21 日
河水结冰的平均日期	1 月 14 日	1 月 5 日
河水开冻的平均日期	1 月 26 日	2 月 1 日

酒贤居住北京数年,在他的关于家燕的一首诗中^[64],慨叹家燕不过是一个暂时的过客,“三月尽(阳历 4 月末)方至,甫立秋(阳历 8 月 6、7 日)即去”,停留那样短的时间,同现在的物候记载相比来去各短一周。从上述的物候看来,14 世纪又比 13 世纪和现时为冷。第 13、14 世纪时期,我国物候的变迁和表 2 的日本樱花物候又是相符合的。

气候的寒温也可以从高山顶上的雪线高低来断定。气候冷,雪线就要降低。在 12、13 世纪时,我国西北天山的雪线似乎比现在低些。《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述邱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由山东经蒙古、新疆到撒马尔罕,于 1221 年 10 月 8 日(阳历)路过三台村附近的赛里木湖。邱处机在一首诗中,把这个地方称为“天湖”。且说,“大池方圆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名之曰天池”^[65]。这个湖的海拔高度是 2073 米,而围绕湖的最高峰大约再高出 1500 米。作者于 1958 年 9 月 14 日和 16 日两次途经赛里木湖时,直至山顶并无积雪。当前,天山这部分的雪线位于 3700—4200 之间。^[66]考虑到邱过这个地方时的季节,如山顶已被终年雪线所盖,则当时雪线大约比现在较低 200 到 300 米。中国地貌工作者,近年来在天山东段海拔 3650 米高处,发现完全没有被侵蚀,看来好像是最近新留下来的终堆石。^[67]这可能是第 12 世纪到 18 世纪的寒冷时代所遗留,即西欧人所谓的现代“小冰期”。中国 12、13 世纪(南宋时代)的这个寒冷期,似乎预见欧洲将要在下一二个世纪出现寒冷。依据苏联人 Y.

Е. Бучинский^[68]的研究,在欧洲部分的俄罗斯平原,寒冷期约在1350年开始;在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奥地利地区, H. Flohn^[69]以为1429年到1465年是气候显然恶化的开始;在英格兰, H. H. Lamb^[70]以为1430、1550和1590年英国饥荒,都因天气寒冷所致。由此可见,中国的寒冷时期,虽未必与欧洲一致,同始同终,但仍然休戚相关。可能寒冷的潮流开始于东亚,而逐渐向西移往西欧。

三 方志时期,公元1400—1900年

到了明朝(1368—1644年),即14世纪以后,由于各种诗文、史书、日记、游记的大量出版,物候的材料散见各处,即使搜集很少一部分已非一人精力所能及。幸而此种材料大多收集在各省各县编修的地方志中。我国地方志有五千多种。这些地方志,除仪器测定的气候记录外,对于一个地区的气候提供了很可靠的历史资料。上节所述的物候材料只限于生物方面的证据,如气候对于植物生长和动物分布的关系,以及对于当地人民农业操作的影响,只能作为提示,很少直接证实气候确与现在不同。天气灾害直接与气候有关,当我们有以往的气候资料与现在的气候资料作比较时,我们就更有证据了。

各种气候天灾中,我们以异常的严冬作为判断一个时期的气候标准。如平常年里不结冰的河湖结了冰,这是异常的事情。全世界在热带的平原上是看不到冰和雪的,一旦热带平原冬天下雪结冰,这也是异常的事情。本节所讨论的就是这两种异常气候的出现。中国三个最大的淡水湖是鄱阳湖,面积5100平方公里;洞庭湖4300平方公里;太湖3200平方公里。这三个湖均与长江相连。鄱阳湖和洞庭湖位于北纬29°左右,太湖位于北纬31°—30°30′之间。对于河流冰冻,我们以江苏省盱眙的淮河和湖北省襄阳汉江为标准。南京地理研究所徐近之曾经根据这些河湖周围地区的方志作了长江流域河湖结冰年代的统计(表4)和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年数的统计(表5),两种统计一共用了665种方志。对于热带地区的降雪只参考了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方志。云南热带地区因海拔太高不包括在内。

在表4,13世纪以前的资料很少,残缺很多,所以只列为一行。20世纪以来气候比较温和,直到1970年只一次江湖结冰所以只列为一行。第

14 世纪以后,按一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把资料列于表中,(热带地区的降雪从 16 世纪开始)。同时把日本諏访湖(北纬 36°,东经 138°)每个世纪的四分之一的年代中温和冬季次数和结冰日数列于表 6^[71]以资比较。表 6 的最末一栏,諏访湖的结冰日期,采自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地理期刊。^[72]

表 4 长江流域河湖结冰的年代

年 代 (一世纪的四分之一)	太 湖	鄱 阳 湖	洞 庭 湖	汉 江	淮 河
1901—1970 年			1955	1955	1955
1900 年					
第 四	1877, 1893			1877, 1886, 1899	
第 三	1861	1861, 1865	1877	1865, 1871	1845
第 二		1840		1830	
第 一					
1800 年					
第 四			1790		
第 三	1761				
第 二					1715, 1720
第 一					
1700 年					
第 四	1683, 1700		1690	1690, 1691	1690
第 三	1654, 1665		1653, 1660	1653, 1660, 1670	1653, 1670, 1671
第 二		1670			1640
第 一			1621	1620, 1621	1619
1600 年					
第 四	1578				
第 三	1568				1564
第 二				1529	1550
第 一	1503, 1513	1513	1510, 1513	1519	
1500 年					
第 四	1476			1493	
第 三	1454				1454
第 二				1449	
第 一				1416	
1400 年					
第 四					
第 三	1353				
第 二	1329				
第 一					
1300 年					1219
1200 年以前	1111			- 879, - 901	225, 515, 1186

表 5 中国近海平面的热带地区降雪落霜的年数

一世纪的四分之一	年 数					
1900						
第 四	1878	1882	1893			
第 三	1854	1856	1862		1864	1871 1872
第 二	1831	1832	1835	1840	1846	
第 一	1824					
1800						
第 四	1781					
第 三	1757	1758	1763	1768		
第 二	1729	1737	1742			
第 一	1711	1713	1721			
1700						
第 四	1681	1682	1683	1684		
第 三	1654	1655	1656			
第 二	1635	1636				
第 一	1602	1606		1621		
1600						
第 四	1578					
第 三						
第 二	1532	1536	1537	1547	1549	
第 一	1506	1512	1522			
1500 以前	1245	1415	1449			

从表 4 和表 5 可以看出在这五百年中,我国的寒冷年数不是均等分布的,而是分组排列的。温暖冬季是在 1550—1600 年和 1720—1830 年间。寒冷冬季是在 1470—1520, 1620—1720 和 1840—1890 年间。以世纪来分,则以 17 世纪为最冷,共有 14 个严寒冬天,19 世纪次之,共有 10 个严寒冬天。虽然所列中国的江湖均位于北纬 29° — 32° 之间的亚热带纬度,降雪日期限于热带地区,但表 4 和表 5 所示的寒温程序也互相吻合。这是因为三个湖和淮汉二河的结冰,和广东、广西的降雪,都来源于西伯利亚或蒙古的特别的严冷寒流之故。根据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叶笃正的调查,这种寒潮主要是欧洲阻塞高压的分裂而向东移动的结果。^[73]

同日本諏访湖的记载作一比较,中日两地的气候是近于一致的。两系列都表明,17 世纪的严冬较多,只是在日本严冬开始和结束的年代比中国提早四分之一世纪左右。例如諏访湖在 17 世纪公元 1626—1650 年已开始寒冷,而在中国则要到公元 1651—1675 年才寒冷。諏访湖在 15 世纪末叶已很寒冷,而中国要到 16 世纪初才寒冷,但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

表 6 日本諏访湖结冰的日数

年 代 (世纪的四分之一)	湖不结冰的年数	迟于(+)或早于(-) 平均日数的结冰日数
1900年		
第四	2	-4.9
第三	5	+21.3
第二	2	+7.0
第一	3	+1.4
1800年		
第四	2	+3.5
第三	2	+2.0
第二	3	+8.2
第一	3	+10.1
1700年		
第四	0	-4.7
第三	1	-4.7
第二	0	-6.3
第一	0	+10.2
1600年		
第四	0	-4.9
第三	1	-3.2
第二	1	-3.3
第一	9	+12.0
1500年		
第四	0	-6.8
第三	1	-11.7
第二		
第一		

出现不调和的现象：当时中国甚严寒，諏访湖则异常温暖。这种不协调的情况，我认为和达清夫《日本之气候》一书中所提到的下列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他说，在諏访湖记载期间，有一温泉喷出大量温水灌入諏访湖^[74]，这或许是使諏访湖温暖，影响到以后期间的冬季都不结冰。諏访湖面积只有 14.6 平方公里，所以易受一些地方因素的影响。

以中国冬季温度的趋势同欧洲的冬季温度的趋势作比较，其一致性比同日本的一致性更小。在欧洲，公元 1150 和 1300 年之间的温和冬季是最显著的，而中国 12 世纪却是严冬最常见的世纪。中国在 17 世纪的寒冷冬季与欧洲的俄罗斯、德国和英国却相同，但不是发生于同一个 10 年之中。两地寒冷冬季与温和冬季均维持 50 年的光景，且互相转换，这

倒是一致的。半个世纪寒温更迭出现,中国如此,欧洲也如此。^[75]这与总的大气交流变化着的形势有关系,尤其与上面提到的阻塞高压的多少和强弱有关。

上面我们只谈到 15 世纪到 19 世纪期间冬季的相对寒冷,下面准备说一下这段期间的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和动植物的影响。在这个期间,有一件事似乎是很清楚的,即这个 500 年(1400—1900 年)的最温暖期间内,气候也没有达到汉唐期间的温暖。汉唐时期梅树生长遍布于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的很多方志中,有若干地方的名称是为了纪念以前那里曾有梅树而命名的。例如,陕西郿县(北纬 36°,东经 109°20′)西北三十余里有梅柯岭,因唐时有梅树故名。^[76]山东平度(北纬 36°55′,东经 120°45′)的州北七里有一小山,称为荆坡,据说曾种了满山梅树。^[77]目前郿州、平度均无梅。河南郑州(北纬 34°50′,东经 113°40′)西南 30 里有梅山,高数十仞,周数里,闻往时多梅花故名。^[78]现已无梅。解放后,郑州市人民政府在郑州人民公园栽种梅树已获得成功。郑州在 1951—1959 年期间,每年绝对最低温度在 -14° 以上,可以说是目前梅树的最北极限。

作为参考,这里提一下欧洲种葡萄的历史。公元 1100—1300 年之间,英格兰南部和德国的部分地区,葡萄园广泛分布。由于以后的严冬,特别是公元 1430 年的严冬最低温度降到 -20° 至 -25° C,葡萄种植就完全停止了。这寒冷期间直延到 20 世纪初才开始回暖。公元 1920—1950 年期间,年平均温度上升半度至一度,生长季节同 18 世纪相比延长了二、三周;葡萄、杏、桃这类果品作物,在英格兰南部又种植起来了。^[79]英国物候的最长纪录是 Norfolk 地方 Marshall 家中五代子孙继续观测的纪录,从公元 1736 年开始直至公元 1925 年,计 190 年之久。^[80]初春银莲花(Woodanemone)开花,在公元 1891—1925 年期间要比公元 1751—1785 年早开 21 天之多。可知英国 20 世纪初比 18 世纪温暖得多。

在这 500 年间,我国最寒冷的期间是在 17 世纪,特别以公元 1650—1700 年为最冷。例如唐朝以来每年向政府进贡的江西省的橘园和柑园,在公元 1654 和 1676 年的两次寒潮中,完全毁灭了。^[81]在这 50 年期间,太湖、汉江和淮河均结冰四次,洞庭湖也结冰三次。鄱阳湖面积广大,位置靠南,也曾经结了冰。我国的热带地区,在这半世纪中,雪冰也极为频繁。

在这 500 年间,我国物候材料浩繁,非本文所能总结。为了与 14 世纪以前的物候材料作比较,这里只选择最冷的 17 世纪的两种笔记中所见

的物候材料加以论述。一种是《袁小修日记》^[82],是明万历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1608—1617年)间袁小修留居湖北沙市附近的日记。另一种是清杭州人谈迁著的《北游录》^[83],叙述公元1653—1655三年间本人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这两本书,详细记载了桃、杏、丁香、海棠等春初开花的日期。从这两个人的记载,我们可以算出袁小修时的春初物候与今日武昌物候相比要迟七天到十天;谈迁所记的北京物候与今日北京物候相比,也要差迟一二星期。更可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天津运河冰冻时期远较今日为长。1653年,谈迁从杭州来北京,于阳历11月18日到达天津时,运河已冰冻;到11月20日,河冰更坚,只得乘车到北京。公元1655年,阳历3月5日,谈迁由京启程返杭时,北京运河开始解冻。根据谈迁的记述,可知当时运河封冻期一年中共有107天之久。1930—1949年,水电部水文研究所在天津附近的杨柳青站所做的记录,这二十年间,运河冰冻平均每年只有56天,即封冻平均日期为12月26日,开河平均日期为2月20日。而据谈迁《北游录》所说,那时北京运河开河日期是在惊蛰节,即阳历3月6日,比现在要迟12天。从物候的迟早,可以算出两个时间温度的差别,据物候学上“生物气候学定律”^[84]:在春初,在温带大陆东部,纬度差一度或高度差100米则物候差四天。这样就可从等温线图中标出北京在17世纪中叶冬季要比现在冷2℃之谱。

四 仪器观测时期

风向仪和雨量计在明朝以前就应用了,到1911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才建立正规气象站。新中国成立后,气象事业空前发展,一个完好的气象预报站网已遍及全国各地。1900年以前,中国只有极少数地方有气象记录。明朝初期,量雨器分布于全国不同地区,1424年,朱棣(明成祖)下令地方长官每年向朝廷报告雨量,借以估量各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但此事不久即流于形式,以后也就停止了。

清代(1644—1910年),北京、南京、杭州和苏州有雨日的记载。北京从公元1724到1903年的记载,现在仍保存于故宫。这些记载只记录降雨时间的始末,没提数量;只凭肉眼观察,而非仪器测量。1932年,曾对这些记载作过一次分析,并写成报告发表。^[85]根据这个报告,由秋季初次降雪到春节末次降雪的平均日期,得出结论是,1801到1850年期间比其

前 1751—1800 年期间和其后 1851—1900 年期间为温暖。这种情况,与表 4 和表 5 所列的资料相符合。

1593 年,意大利伽利略(Galileo)发明气温表。其后不久,耶苏会教士就把气温表引进中国。18 世纪中叶,耶苏会教士钱德明(Jesuit Amiot)测量了 1757—1762 年的北京每日最低温度和最高温度,其结果发表于法国杂志 *Mémoires de mathématique et de physique* 第六卷中。大约 100 年后,在 1867 年,圣彼得堡(现在列宁格勒)俄罗斯科学院派遣 H. Fritsche 到北京建立气象与地磁站。^[86]他在北京工作 16 年,著有《东亚气候》一文^[87]。这些论文使我们知道北京 18 世纪和 19 世纪期间的年平均温度和月平均温度,现列表如下(见表 7)。严格来讲,这些旧资料不能与现代的气象记载相比较,因为观测时间和仪器安置方法等同现在均不相同(如钱德明所用的温度计尚是列氏刻度的寒暑表)。由于这些资料是我们仅有的 18、19 世纪的气温记载,所以只能依照其原有数值。

表 7 1757—1762, 1875—1880 和 1954—1964 年期间
北京的年平均和月平均温度(°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年
1757—1762	-5.0	-4.1	3.5	13.0	20.4	25.6	26.0	25.6	19.6	12.2	3.0	-3.4	11.4
1875—1880	-5.8	-1.9	5.5	14.2	20.0	25.6	26.9	25.5	19.5	12.0	3.2	-3.4	11.8
1954—1964	-4.2	-1.8	4.6	13.9	20.1	24.1	26.0	24.7	19.6	12.1	4.3	-2.4	11.8

从表 7 看,以冬季三个月来讲,20 世纪中期的温度有显著的暖和。12 月、1 月和 2 月的平均温度是 -2.8°C ,较 1875—1880 年期间的高 0.9°C ,比 18 世纪中期高 1.4°C 。但 1954—1964 年期间的夏季三个月的平均温度却比前两个期间的温度显著降低。这可能由于近年中国东部大陆性气候减低,而海洋性气候增强,因为沿东亚海岸海洋上风速加大,增加海洋的影响之故。在北美洲东北部沿海近年也有这种趋势;大西洋沿岸洋流因南北温度差别加大而增加活力,使南北向的风速增大,遂使加拿大东北部冬季增温而夏季减暖。^[88]

在我国,北京是最早有温度表测定空气温度的,但记载不完全,中间有很大的空隙。除北京外,上海、香港和天津也有长时间的空气温度记载。为了与其他国家的古代温度相比较,做了十年的滑度平均值(图 1)。其中香港因缺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温度,所以只能用各年实际温度,

他的缺点在于使曲线参差不齐,忽上忽下,看不出这个时代温度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十年滑动平均可以改正这个缺点,看图1即可清楚。曲线表明,上海在19世纪最后25年间,气候十分寒冷,大约比整个期间的冬季(指12月、1月、2月,下同)平均温度 4.6°C 降低 0.5°C 。1897年左右,冬季温度达到平均数,随后超过了平均数。在平均数之上停留约14年。约在1910年左右到1928年,温度又逐渐下降到低于平均数。接着,冬季温度又趋向增高,直到1945—1950年,超出平均数达 0.6°C 。此后,温度逐渐减低,直到1960年回到平均数为止。在这期间,天津的冬季温度趋势,也是波浪式地摆动与上海的平行。但顶峰和底点比上海早几年到来,幅度也较大,而香港的曲线波动顶峰和底点则比上海迟滞,而且滑动平均温度的幅度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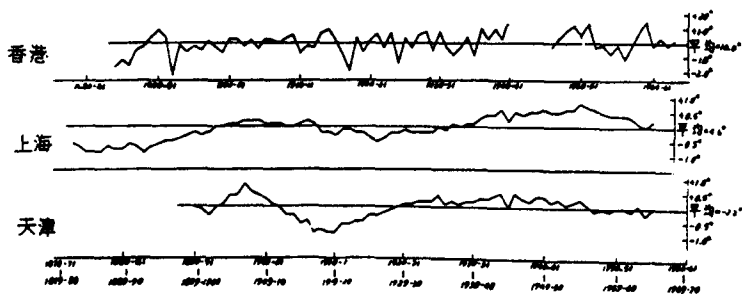


图1 香港历年冬季平均温度和上海、天津冬季温度的十年滑动平均值

从上海90年左右的气温记录中,可以看出,19世纪最后25年期间的温度为最低,1940年为最高。以上海和同纬度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亚历山大和开罗两地,在同一期间滑动的10年平均温度(1900年最低,1930年最高^[89])相比,可以发现在下降或衰退期间,上海比开罗早,气候有向西移动的趋势;在上升期间,上海比开罗迟,气候出现向东移的趋势。

上海80多年左右期间的气候趋势,有些上下摆动的幅度达 0.5°C 至 1°C ,这是有很大的经济意义的。它直接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间接控制虫害病害的发生,以及农业操作、农业生产都可能受到影响。所以,重温一下过去的气候史,掌握气候的变化规律,预见将来气候的变化趋势,这对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在英格兰,G. Manley曾对英格兰中部、1680年到1960年的温度记载,按季和年的10年滑动平均作过研究^[90],发现从1680—1690年低温期

间开始,气温有上升的趋势。1880年到1950年期间,温度上升趋势尤其明显。此后,温度有点下降。与上海、天津相比,英格兰的冬季温度在1930年以后,当天津、上海冬季温度尚在继续上升的阶段,而英格兰的气温则表现下降的趋势。从1260年到1814年,伦敦泰晤士河完全结冰共23次。其中最坚厚而可乘车马通行的是在1309—1310年和1688—1689年的冬天。从1814年以后,泰晤士河没有完全冰冻过。^[91]苏联列宁格勒有1765年以来两百多年的气候记录。列宁格勒地球物理总台 E. C. Рубинштейн 把这纪录做了年滑动平均温度的研究,证明在此期间,列宁格勒年平均是 3.9℃,最冷的10年是1780—1789年,平均年温是 2.8℃;而最热的十年是1927—1936年,平均年温是 5.4℃。以世纪而论,则以19世纪上半期为最冷,从1890年以后温度一直在总平均以上。^[92]由此可知,从仪器纪录所得出气候变迁,在欧洲各国比较一致,而与我国则在时间上有先后。

中国近80年左右期间,温度变迁已使天山雪线和冰川的进退受到影响。根据1960—1963年中国科学院冰川雪线测量队的调查,证明在1910—1960年的50年期间,天山雪线上升40—50米,西部天山的冰川舌后退500—1000米。东部天山的冰川舌后退200—400米。同时森林线的上限也升高一些。调查结果认为,现在覆盖在天山高峰的冰川是历史时代寒冷期间的产物,大约是1100—1900年的寒冷期所成,而不是第四纪冰川期的残余。^[93]

10年滑动的平均曲线,使我们看出了一个地方的气候变化趋势。其缺点是它掩盖了个别的严冬。下面我们就天津、上海和香港三地,最近七八十年中的五个最寒冷冬季的平均温度作比较分析,列表8。

表8 天津、上海和香港近七八十年中的五个最寒冷冬季的平均温度(摄氏)

	冬 季	1	2	3	4	5
天 津	1890—1965年 平均温度 -2.2	1956—1957 -5.5	1935—1936 -5.2	1910—1911 -4.8	1896—1897 -4.6	1894—1895 -4.4
上 海	1873—1965 平均温度 4.6	1892—1893 1.9	1944—1945 2.2	1918—1919 2.6	1877—1878 2.8	1935—1936 3.0
香 港	1884—1941 1946—1964 平均温度 16.0	1892—1893 13.7	1917—1918 14.1	1884—1885 14.3	1886—1887 14.5	1924—1925 14.6

最低的平均冬季温度,虽然通常作为整个季节寒冷的最有代表性的标准,但同植物和人类遇着的最大天灾不总是符合的。在这段期间内,最严酷的天气,在中华和华东发生于 1955 年正月;但是没有列入表 8 中。因为在 1955 年,严酷的正月,接着就是温暖的二月,因此整个冬季,温度不是最低。

1955 年正月期间,有连续由西伯利亚来的寒潮,华中、华南许多地方的绝对最低温度的纪录被打破了,如表 9 所示:

表 9 1955 年正月中华南若干地方的绝对最低温度

华 中		华 南 热 带	
安徽正阳关	-24.1℃	汕 头	0.4℃
江苏徐州	-16.7℃	南 宁	-2.1℃
汉 口	-14.6℃	海南定安	-0.3℃
南 京	-14.0℃	海南阳江	-1.4℃

这一年,正阳关淮河,从 1 月 1 日至 2 月 15 日结冰。汉江从 1 月 1 日至 2 月 20 日也结冰 20 天。洞庭湖从 1 月 3 日至 6 日完全结冰三天。这是 20 世纪洞庭湖、汉江和淮河结冰唯独一次有记载的事情。这个月的寒潮沿着京汉铁路走,因此,在这条道路上,温度降低是最大的。太湖在华东只是部分结冰。中国热带很多地方,甚至海南岛的南部都下了霜。数十万亩的热带树木被冻死,广东的冬红薯今年完全毁灭了。

在这个期间,另一次严重寒潮入侵是在 1936 年 2 月,受寒潮影响最严重的是天津。当时天津港口和海河出口处,从 2 月初到 3 月初都结了冰。这是当地老年人毕生的记忆中所没有过的,而且在此以后未再发生过。天津港封冻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由于 1936 年 1 月和 2 月的极端低温,平均温度,1 月为 -6.7°C ,2 月为 -4.4°C ,比历年平均温度低 2.5°C 和 2.7°C ;第二,是由于东风的频数,达 28.3%,阻挡浮冰入海;第三,是由于 1936 年 2 月,天津有过量的雪(1891—1949 年期间 2 月最大的雪)。在经济上,天津港口封冰,估计损失四百万银元。

为什么有些冬季气候温和和寒潮很少,而有些冬季寒潮过多而成灾害?如果严重寒潮季节在一定期间再次发生,那么,这种周期性是什么原因呢?有些气象学家相信,日中黑子的周期与气候的周期有关系。日本和达清夫认为,19 世纪日本稻类作物,由于夏季低温而生长不好的几年,似

与日中黑子最大的几年一致。⁽⁹⁴⁾波兰的 A. Kosiba 认为,“北半球的极端严冬,是同太阳最活动的亦即日中黑子最高年有严格的相关”⁽⁹⁵⁾。但是,这种相关,只是在短期内一个地区有效。如中欧的极端严寒冬季,在很多情况下,与北极地区的极端温暖冬季是同时发生的。

看一下本文的表 8,就可以看出天津、上海和香港的最寒冷冬季,均正好发生于 1957 年和 1893 年,正是日中黑子最大的年中,这似乎支持和达清夫和 Kosiba 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顺着线索,追溯到 19 世纪和 18 世纪最寒冷的冬季和最寒冷的年代,把它们同日中黑子最大的年相比,我们就可看出它们并非总是一致的。在表 8 中,如以上海而论,像 1945 年和 1878 年这样寒冷的年份,实际见于日中黑子最小的年中。总之,太阳的活动,如日中黑子的多少,虽影响到地面上的气候,但其关系相当复杂,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探索出一个很好的规律出来。

结 论

40 或 50 年前,欧美大多数正统气候学家相信,气候在历史时代是稳定的。根据当时的主要权威奥地利的 Julius Hann 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地方做了 30 年的温度记载或 40 年的降雨记载,我们就能给那个地方建立起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能够代表历史上过去和将来若干世纪的温度和雨量。这种见解,已为世界近数十年来收集的气象资料所否定。在我国,古代作家如《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农丹》的作者张标和《广阳杂记》的作者刘献廷,均怀疑历史时代气候的恒定性;且提出各朝代气候变异的事例,记载于上述书籍中。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说道:“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⁹⁶⁾对于中国气候的发展史,中国的文献是一个宝库,我们应当好好地加以研究。

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小学生的试探,试图窥探中国的悠久气候史。在中国这样辽阔的面积上和五千年这样悠久的岁月里,人们易于在浩如烟海的二十四史和五千多部方志中找不出头绪而有所迷失。因此,误解和矛盾是难免的,特别在考古时代和物候时代所提的事实,尤其如此。

本文对我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史的初步研究,可导致下列初步性的结论:(1)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 2000 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 2°C 左右。1 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 3°C — 5°C 。其间上下波动,目前以限于材料,无法探讨。(2)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 1000 年、公元 400 年、1200 年和 1700 年;摆动范围为 1° — 2°C 。(3)在每一个 400 至 800 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 50 至 100 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 1° — 0.5°C 。(4)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趋势,如上第一图所示。

我国气候在历史时代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区域比较,可以明显看出,气候的波动是全世界性的,虽然最冷年和最暖年可以在不同的年代,但彼此是先后呼应的。关于欧洲历史上的气候变迁,英国 C. E. P. Brooks 是 20 世纪前半期最有成绩的作者。我们把他所制的公元 3 世纪以来欧洲温度升降图^[97]与中国同期温度变迁图作一对照就可以看出,两地温度波澜起伏是有联系的。在同一波澜起伏中,欧洲的波动往往落在中国之后。如 12 世纪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但是在欧洲,12 世纪却是一个温暖时期;到 13 世纪才寒冷下来。如 17 世纪的寒冷,中国也比欧洲早了 50 年。欧洲和中国气候息息相关是有理由的。因为这两个区域的寒冷冬天,都受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如西伯利亚的高气压向东扩展,中国北部西北风强,则中国严寒而欧洲温暖。相反,如西伯利亚高气压倾向欧洲,欧洲东北风强,则北欧受灾而中国温和。只有当西伯利亚高压足以控制全部欧亚时,两方就要同时出现严寒。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根据地面升降的结果,做出近一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雪线的升降与一地的温度有密切关系。一时代气温暖则雪线上升,时代转寒,雪线下降。以我国五千年来的气温升降与挪威的雪线高低相比(图 2),大体是一致的,但有先后参差之别。图中温度线是现今的温度水平,在殷、周、汉、唐时代,温度高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低于现代。挪威雪线也有这种趋势。但在战国时期,公元前 400 年,出现一个寒期为中国所无。尚有一点须指出,即雪线高低虽与温度有密切关系,但还要看雨量的多少和雨量季节的分配,所以不能把雪线上线下的曲线完全来代表温度的升降。^[98]

最近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大学物理研究所 W. Dansgaard 教授,在格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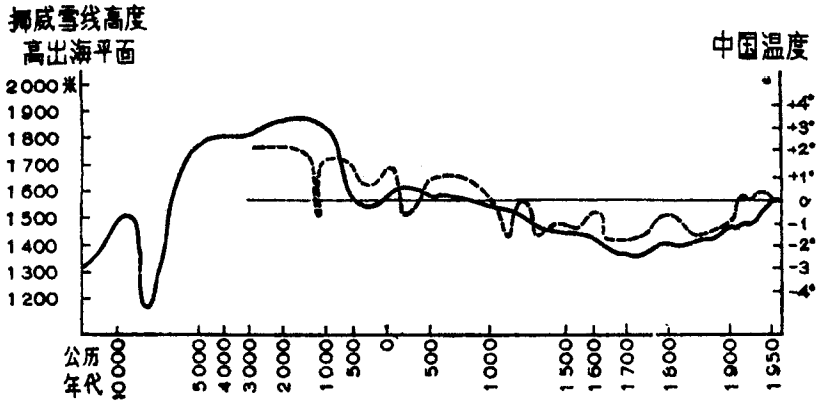


图2 五年来挪威雪线高度(实线)与五年来中国温度(虚线)变迁图

雪线高度以米计,目前挪威雪线高度在1600米左右。

温度以摄氏计,以0线作为目前温度水平。

横线时间的缩尺是虚数的,越至左边缩尺越小。

兰岛上 Camp Century 地方的冰川块中,以氧 18 的放射性同位素方法,研究结冰时的气温,结果是:结冰时气温高时, O^{18} 同位素就增加,气温增加 $1^{\circ}C$, $\delta(O^{18})\%$ 就增加 0.69% 。^[99]兹将 W. Dansgaard 所制近 1700 年来格陵兰气温升降图^[100]与本文中用物候所测得的同时间中国气温图作一比较,如图 3 所示。A 表示从 3 世纪到现时的中国气温的波动,B 表示同时期用氧 18 同位素所测得的格陵兰岛的温度。图中两条线可说几乎是平行的。从三国到六朝时期的低温,唐代的高温到南宋清初的两次骤寒,两地都是一致的。只是时间上稍有参差,如 12 世纪初期格陵兰尚有高温,而中国南宋严寒时期已开始。但相差也不过三四十一年,格陵兰温度就迅速下降至平均以下。若以欧洲相比,则欧洲在 12、13 世纪天气非常温暖,与中国和格陵兰均不相同。若追溯到 3000 年以前,中国《竹书纪年》中所记载的寒冷,在欧洲没有发现,到战国时期,欧洲才冷了下来。但在 S. G. Johnsen 和 W. Dansgaard 1972 年 2 月 25 日 Nature 周刊上所发表的图表中^[101]就可以看出,距今 3000 年前格陵兰曾经一次两三百年的寒冷时期,与《竹书纪年》的记录相呼应。到距今 2500 年到 2000 年间、即在我国战国秦汉间,格陵兰却与中国一样有温和的气候。凡此均说明格陵兰古代气候变迁与中国是一致的,而与西欧则不相同。格陵兰与中国相去二万

余公里,而古代气候变动如出一辙,足知这种变动是全球性的。我认为这是由于格陵兰和我国纬度高低不同,但统处在大陆的东缘,虽面临海洋,仍然是大陆性气候,与西欧的海洋性气候所受大气环流影响不相同。加拿大地质调查所在东部安大略省(北纬 50° , 西经 90°)地方用古代土壤中所遗留的孢子花粉研究,得出的结果,也是距今 3000 年至 2500 年前有一次寒冷时期;但嗣后又转暖的情况,与中国和格陵兰相似。^[102]我国涂长望曾研究“中国气温与同时世界浪动之相关系数”^[103],得出结论:中国冬季(12月至2月)温度与北大西洋浪动的相关系数是正的,虽是指数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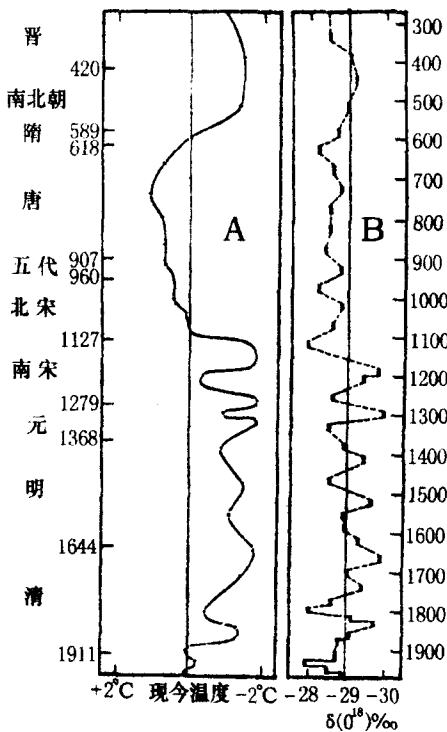


图3 一千七百年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

A. 从中国物候所得结果

B. 从格陵兰冰块所得结果

$\delta(O^{18})$ 增加 0.69‰则气温增加 $1^{\circ}C$

大,换言之,即中国冬季温度与北美洲大西洋岸冬季温度有类似的变化。总之,地球上气候大的变动是受太阳辐射所控制的,所以,如冰川时期的寒冷是全世界一律的。但气候上小的变动,如年温 1° — $2^{\circ}C$ 的变动,则受大气环流所左右的,大陆气候与海洋气候作用不同,在此即可发生影响。

本文主要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物候是最古老的一种气候标志;用氧 18 和 16 的比例来测定古代冰和水的古气温是 1947 年 W. D. Urry 的新发现^[104],而两种方法得出的结果竟能大体符合,也证明了用古史书所载物候材料来做古气候研究是一个有效的方法。我们若能掌握过去气候变动的规律,则对于将来气候的长期预报必能有所补益。本文只是初步探讨,对于后气候说明的问题无几,而所引起的问题却不少。我

们若能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指导,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古代物候、考古资料,从古代气候研究中作出周期性的长期预报,只要努力去做,是可以得出结果的。

(原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注 释

- [1]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四卷上册,1944年。
- [2] 蒙文通:《中国古代北方气候考略》,《史学杂志》二卷三期,1920年南京出版。
- [3] 竺可桢:《中国历史上气候的变迁》,《中国科学社论文集》第三卷,1—12页,1926年,上海中国科学社出版。
- [4] 席泽宗:《古新星新表》,《天文学报》第三卷,183页。美国人编译在 *Smithsonian Contributions to Astrophysics*, Vol. 2 No. 6, 1958年。
- [5] 参阅 K. E. Bulle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Seismology*, Chap 5, 英国剑桥1963年出版。
- [6]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 [7] 同注[1],第261—264页。
- [8] 《安阳殷墟的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北京地质调查所,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
- [9] 同注[3],第56页。
- [10] 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四卷上册35页,1944年。
- [11] 根据《农业气候服务手册》第53图,1959年。
- [12] 同注[5],第47、48页。
- [13] 同注[1],第270—272页。
- [14] 龙山灰坑中发现一块炭化竹节,系根据当时参加遗址发掘的尹达同志的转达。龙山文化出土的一部分陶器器形似竹节,系夏鼐同志面告。
- [15] 《左传》襄公九年“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为鹵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阙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见《春秋左传正义》。
- [16] 《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郟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

故也？郑子曰，吾祖也。……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见《春秋左传正义》。

- [17] E. S. Wilkinson, *The Shanghai Bird Year*, 上海字林西报出版, 1935年, 第30页。
- [18] 有人以为周正建子应与今日阳历相差两个月。但“周建子”不过是传统的说法。据《鹖风》“七月流火”, 大火星的位置加以岁差计算, 和春秋时日蚀的推算, 可以决定周初到春秋初期的历是建丑, 而不是建子。参看宋王应麟:《困学纪闻》下册, 世界书局, 1937年, 第533—534页。
- [19] 见《左传》鲁桓公十四年、鲁成公元年、鲁襄公廿八年均载“冬无冰”。
- [20] 根据陕西武功西北农学院辛树帜等同志的调查。关于本文中西安武功一带物候材料, 全系西北农学院同志所供给, 特此志谢。
- [21] 刘毓琮:《诗经时代稷粟辨》,《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 科学出版社, 1960年, 第38页。
- [22] 《孟子·告子上》:“今夫辨麦……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虽有不同, 则地有肥硗, 雨露之养, 人事之不齐也。”并参阅潘鸿声、杨超伯:《战国时代的六国农业生产》,《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 科学出版社, 1960年, 第60页。
- [23] 《荀子·富国篇》:“今是土之生五谷也, 人善治之, 则亩数益, 一岁而再获之。”见王先谦:《荀子集解》, 商务印书馆, 1936年。
- [24] 《江苏气象文集》1964年, 第79页。
- [25] 根据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三。
- [26] 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图集》第22图“平均终霜日期图”, 科学出版社, 1962年。
- [27] 中央气象科学研究所编:《中国气候图》下集第48图“终雪日期图”, 1955年。按战国时代原来所定二十四节气, 雨水在惊蛰之后, 到前汉才把雨水移到惊蛰之前。但无论如何, 目前终雪总在战国时代雨水节之后。汉改雨水惊蛰先后见宋王应麟:《困学纪闻》, 第284页。
- [28] 胡锡文编:《中国农业遗产选集》上编甲类第二种“麦”, 农业出版社, 1958年, 第149页。
- [29] 侯学煜编:《中国之植被·中国植被图》,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0年, 第146—152页。
- [30] 《史记·河渠书》。
- [31] 唐李德裕(787—849):《瑞橘赋·序》:“昔汉武致石榴于异国, 灵根遍布, ……魏武植朱橘于铜雀, 华实莫就”云云。见《李文饶文集》卷二十。
- [32]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黄初六年(公元225年)“冬十月, 行幸广陵故城, 临江观兵, 戎卒十余万, 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 水道冰, 舟不得入江, 乃引还。”

- [33] 《晋书·五行志》下,并参看《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卷一〇三一—一〇六。
- [34] 徐中舒说:“《上林赋》以‘卢橘夏熟,黄橘橙穠,并称,橙穠均橘属,盖皆其地所产,此与《史记·货殖传》所称‘渭川千亩竹,’皆西汉时关中气候和暖雨量丰沛之故”。见《四川古代之文化》,《史学季刊》一期,1940年。
- [35] 《齐民要术·种谷》,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6页。
- [36] 《齐民要术·种安石榴》,第57页。
- [37] 唐曹邕:《梅妃传》,见《说郛》卷三十八。
- [38] 《元微之长庆集》卷六《和乐天秋题曲江》诗云:“十载定交契,七年镇相随。长安最多处,正是曲江池。梅杏春尚小,菱荷秋亦衰……”。并见《全唐诗》卷四〇一。
- [39] 见清仇士璠:《杜少陵集评注》卷十。
- [40] 宋乐史:《杨太真外传》,见《说郛》卷三十八。
- [41] 唐李德裕:《瑞橘赋·序》,见《李文饶文集》卷二十。
- [42] 沈德绪、吴光林编:《浙江柑橘冻害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 [43] 樊绰:《蛮书》卷七。见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页。
- [44] 《云南省农业气候区划》,云南省气象局出版,1966年,第14页。
- [45] 《苏东坡集》第四册86页《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
- [46] 《王荆文公诗》卷四十《红梅》。并参阅宋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华书局,1958年。
- [47] 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见《宝颜堂秘笈》普集第八。
- [48] 竺可桢:《南宋时代气候之揣测》,《科学》第十卷二期,1924年,第151—161页。
- [49] 金蔡珪《撞冰行》:“船头傅铁横长锥,十五五张黄旗。百夫袖手略无用,舟过理棹徐徐归。吴侬笑向吾曹说:‘昔岁江行苦风雪,杨槌启路夜撞冰,手皮半逐冰皮裂。’今年穷腊波溶溶,安流东下闲篙工。江东贾客借余润,贞元使者如春风。”见金元好问编:《中州集》卷一,中华书局,1962年。
- [50] 《范石湖集》卷十二《燕宾馆》诗自注:“至是适以重阳,……西望诸山皆缟,云初六日大雪。”
- [51] 农业科学院编:《中国果树栽培学》,1960年,第963—979页。
- [52] 李来荣、周祖英、洪东生:《霜害对福建山地和洲地热带果树影响》,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94页。
- [53] 李来荣:《关于荔枝龙眼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56年。
- [54] 见《全唐诗》卷三八二。按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云:“张文昌《成都曲》云:‘锦江近西烟水绿,新雨山头荔枝熟。万里桥边多酒家,游人爱向谁家宿。’此未尝至成都者也。成都无山亦无荔枝。苏黄门诗云:‘蜀中荔枝出嘉州,其余及眉半有不’。”陆游只知道宋时成都无荔枝,但并不能证明唐代成都也无荔枝。

- [55] 参看陆游《老学菴笔记》和范成大《吴船录》。
- [56] 和达清夫编：《日本之气候》，东京东京堂，1958年，第20页。
- [57] 元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一，38页。见《榕园丛书》本。
- [58]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十“凤翔府”司竹监条：“又按汉官有司竹长丞，魏晋河内园竹各置司字之官。江左省。后魏有司竹都尉。北齐后周俱阙。隋有司竹监及丞，唐因之，在京北、鄂、盖屋、怀州、河内。皇朝唯有鄂、盖屋一监，属凤翔。”
- [59] 《元史·食货志》：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怀（庆）、孟（津）竹课，频年斫伐已损，课无所出”云云。
- [60] 见陕西《盖屋县志·古迹》，清乾隆时修。
- [61] 元《郭天锡日记》。杭州浙江省图书馆有手录稿，仅存1309年冬天两个月的日记。见《知不足斋丛书》第一集。
- [62] 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上。
- [63] 元迺贤：《金台集》（见《诵芬室所刊书》）集二《新隄谣》记述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河决白茅，泛滥千余里，人民流离失所惨况，乃作此歌。中有“大臣杂议拜都水，设官开府临青徐，分监来时当十月，河冰塞川天雨雪，调夫十万筑新隄，手足血流肌肉裂，监官号令如雷风，天寒日短难为功”云云。
- [64] 元迺贤《京城燕》诗，自注云：“京城燕子，三月尽方至，甫立秋即去。”并见陈衍辑《元诗纪事》卷十八。
- [65] 元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一，第38页。见《榕园丛书》本。
- [66] 施雅风：《五年来的中国冰川学、冻土学干旱区水文研究》，《科学通报》1964年3月号，第218—225页。
- [67] 杨怀仁、邱淑章：《乌鲁木齐河上游第四纪冰川后期气候变动》，《地理学报》31卷3期，1965年，第194—211页。
- [68] У. Е. Бучинский, “Очерки климата русской равнины в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эпоху” Ленинград, 1954. p. 83.
- [69] H. Flohn, “Klimaschnitte in Mittel Europa seit 1000”, 1959; J. Blüthgen, “Allgemeine Geographie”, p. 447, Berlin, 1964.
- [70] H. H. Lamb, “Britain's Changing Climate”,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limate Changes in Britain*, pp. 3-33, Academia Press, 1965.
- [71] 荒川俊秀：《从日本諏访湖的冬天冰冻日期推测古代气候的变迁》。H. Arakawa, “Climatic Change as Revealed from Freezing Dates of Suwa in Central Japan”, *Scientific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teorology*, Rome, September, pp. 145-146, 1954.
- [72] Proceedings of Conference on “Solar Variation, Climatic Change and Related Geophysi-

- cal Problems", pp. 153-155, *Annals of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95, Article 1, N. Y., 1961.
- [73] 叶笃正:《北半球冬季阻塞形势的研究》,科学出版社,1962年。
- [74] 和达清夫编:《日本之气候》。
- [75] C. P. E. Brooks, *Climate Through the Ages*, 第310页,1950年伦敦出版。
- [76] 《鄆州志·山川》,清道光时修。
- [77] 《莱州府志·山川》,清乾隆时修。并见《平度州志·山川》,清道光时修。
- [78] 《郑州志·輿地志》“山川”条。
- [79] H. H. Lamb, "Britain's Changing Climate", *B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Climate Changes in Britain*, pp. 17-21, Academia Press, 1965.
- [80] Ivan Margary, "The Marshall Phenological Records 1736-1925", *Quarterly Journal of Meteorological Society*, Jan. 1926, Vol. 52, pp. 27-54.
- [81] 叶梦珠编:《阅世编》,载叶静渊:《中国农学遗产选集》上编45页,四类第十四种“柑橘”。
- [82] 袁中道:《袁小修日记》,上海杂志公司重印,1935年。
- [83] 谈迁:《北游录》,中华书局,1960年。天津运河始冰日期见42页,北京开河日期见第134页。
- [84] A. D. Hopkins, "Notes on Bioclimatic Law", *Nature*, Oct. 25, 1924年。
- [85] 南京《中央研究院年报》第254—255页,1932年。
- [86] 参看竺可桢《前清北京之气象纪录》,《气象杂志》十二卷二期,第65—68页,1936年2月。
- [87] H. Fritsche, "The Climate of Eastern Asia", *Journal of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卷,第127—335页。上海亚洲学会出版,1878年。
- [88] 参看"Recent Climatic change in E. Canadian Arctic", *Nature*, June 16, 1972.
- [89] N. Rosenan, "Climatic Fluctu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during the period of Instrumental Record", *Proceedings of the Rome Symposium on Changes of Climate*, pp. 67-73, 1961.
- [90] Gordon Manley, "Temperature Trends in England", *Archiv für Meteorologie, Geophysik und Bioklimatologie*, Band 9, Heft 3-4, 413-433, Wien. 1959.
- [91] *Nature*, August 31, 1968, P886.
- [92] "Климат Ленинград", Т. В. Покровская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проф. Е. С. Рубинштейн, 第67页,列宁格勒,1957年。
- [93] 许世远:《中国天山现代冰川的研究》,《地理学报》第二十九卷第四期,第310—328页。
- [94] 和达清夫编:《日本之气候》,第21—22页。
- [95] Alekzander Kosiba, "Last Climatic Oscillations in Some Arctic Regions and in Central

- Europe", *Report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Quaternary*, Warsaw, 1961, pp. 285-289.
- [9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499 页, 人民出版社, 1966 年 7 月。
- [97] C. E. P. Brooks, *Climate Through the Ages*, 第 311 页, 第 32 图下。
- [98] 挪威雪线高度图是依照西德 Martin Schwarzbach, *Das Klima der Vorzeit* 第二版, 第 275 页, 1961 年。
- [99] 见 *Nature*, May 16, 1970, P632.
- [100] W. Dansgaard et al, "One thousand centuries of Climate Record from Camp Century on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Science*, Oct. 17, 1969. p.378, Fig. 2.
- [101] S. G. Johnsen, W. Dansgaard et al, "Oxygen Isotope Profiles through the Antarctic and Greenland Ice Sheits", *Nature*, Feb. 25, 1972, 第 434 页第 6 图。
- [102] G. Terramac, "Notes on Late Quaternary Climatic Changes in Canada", 见 *Solar Variatirn, Climatic change and Related Geophysical prablems*, 第 665—666 页。
- [103] 涂长望:《中国天气与世界大气浪动及其预告中国夏季旱潦的应用》, 载《中国科学近代论丛·气象学 1919—1949》, 科学出版社, 1955 年, 第 373 页。
- [104] Arthur Holmes,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 p.695, 1965.

参 考 论 著

1. 于希贤:《苍山雪与云南历史时期气候变迁》,《昆明师院学报》1978 年第 4 期。
2. 张丕远、龚高法:《十六世纪以来中国气候变化的若干特征》,《地理学报》1979 年第 3 期。
3. 满志敏:《唐代气候冷暖分期及各期气候冷暖特征的研究》,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八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年。

侯仁之

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

本文用野外考察结合文献考证的方法,对北京城的起源及城址沿革等历史地理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文章认为,北京地区的原始聚落在周初以前已开始发展,并存一个自然成长的小国,它通过太行山东麓的交通线与殷商交往。蓟城是北京迄今发现最早的城址,在春秋战国时期是燕国的国都所在,其位置约在北京外城的西北部。从春秋战国到辽金时期,北京城址几无改变。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蓟城既是中原政权经营东北、开拓疆土的军事重镇,也是东北边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跳板,堪称华北平原的门户。五代以后,伴随长安城的衰落和东北边患日益深重,北京一跃而成封建社会后半期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

侯仁之,1911年生于河北枣强县(祖籍山东恩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在我国率先从理论上论证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理论方法,开创沙漠历史地理、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领域,主编中国第一部城市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倡导历史地理研究为当前生产建设、环境治理服务。在国际地理学界有广泛影响。

一 起源试探

北京是世界闻名的古城,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的名称,最初见于记载的叫做蓟,以蓟为中心而最早兴起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就是燕。

根据古代传说,蓟或燕国,乃是周武王所始封。但是始封的事实,古籍所载,很有出入。有的说受封的是黄帝之后,封地在蓟。⁽¹⁾有的说受封的是召公,所封为燕,或称北燕。⁽²⁾后来又有人说,召公也就是黄帝之后。⁽³⁾但是也有人认为黄帝之后始封于蓟的已经绝了,到成王时,才又封召公于蓟,是为燕国。⁽⁴⁾更有的说召公始封,乃在北平无终县,叫做燕国,因燕山而得名。后来燕国势力逐渐强大,终于并吞了蓟,并且迁都到蓟城。⁽⁵⁾以上各种说法,很难肯定谁是谁非。

实际上,北京原始聚落的发展,早在周初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这是和北京地方势力的兴起分不开的。按照郭沫若先生的意见,燕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国家,它和周朝只是或通婚姻或通盟会而已,并不是周所始封。⁽⁶⁾还在周武王伐纣灭商以前,燕这个自然生长的国家已经存在。卜辞所见有叫做旻的一个国家,是殷商北方的属国。⁽⁷⁾旻金文作匱,亦作毳或郾,这就是后来人所熟知的燕国。⁽⁸⁾如果认为燕是始于周初所封,那是错误的。古代有此传说,正是因为先已有个燕国的缘故。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同治六年(1867年),北京城郊发现了商周时代的几件彝器,其中有“尺亚父乙爵”和有“匱侯”铭文的鼎、盃、爵、觚、卣各一件。⁽⁹⁾或以为尺亚父乙爵为殷商时代的遗物,而匱侯鼎、匱侯盃等物,则属于周代。⁽¹⁰⁾但无论如何,这些彝器的出土,都可以作为北京的原始聚落很早就已经得到发展的证明,而卜辞中的旻国,也因此得以确定其地域。因此,这一发现,在北京古代史的研究中是值得重视的。可惜出土的详细地点和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了。

卜辞中有旻国的记载,说明殷商和旻已有了交涉。根据古代自然地理的情况来推测,只有沿着今太行山东麓一带,这种交涉才有可能。因为山麓地带以西,尽是深山大谷,南北来往和文化交流,在那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山麓地带以东,虽然是一片大平原,但每当雨季,山西高原上千山万壑的水,汇为一条条的巨流,自西而东,穿过太行山峡,倾注于大平原,因为河床坡度顿减,洪流漫溢,也必然常常改道,形成泛区,甚至有些

地方终年积水难退,造成大面积的沼泽,这对平原上的交通,更加是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只有沿着山麓地带,南来北往,才有可能。因为这里地形既较平坦,河床又切入地中,不像下游那样易于泛滥和改道,是形成渡口的良好条件。根据已经发现的殷商彝器的地理分布,恰好说明自殷墟而北,殷商的政治文化,正是沿着这一地带逐步向北发展的。在此以东的大平原和以西的山地区,都很少甚至没有什么发现,所有的发现都集中在这一山麓地带,而且是愈北愈少。北至保定涑水和易县,也都有一些发现,如果北京城郊出土的尺亚父乙爵确属殷商时代,那么这就是到现在为止所已知的殷商彝器分布的北限了。关于在易县出土的三句兵,王国维有如下的跋语:

商句兵三:凡纪祖名八、父名六、兄名六,三器之文,蝉嫣相承,盖一时所铸……其器出易州,当为殷时北方侯国之器,而其先君,皆以日为名,又三世兄弟之名,先后骈列,皆用殷制,盖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11]

这一论断,可以认为是合理的。此外,他又在《北伯鼎跋文》中写道:

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涑水县张家洼,又出北伯器数件,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斝作宝尊彝”。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12]

如果此说可信,则燕国之出现早在殷世,又可得一证明,但无论如何,殷商时代其政治文化势力沿着太行山东麓地带向北扩展,却是没有疑问的。

二 燕都薊城

到了战国时代,燕国逐渐强盛,崛起北方,争霸中原,号称七雄之一。这时已有明文记载说燕的国都就是薊。例如《韩非子·有度》篇就曾经写道: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薊为国。

意思是说襄王时燕国向南以黄河为界，它的国都就是蓟城。

燕国的地理位置，偏在东北，司马迁描写它说：

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13]

还在春秋时代，来自今河北省东北部的东胡部族，也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太戎”，尝侵掠燕国，燕告急于齐，齐遂出兵北伐，这是燕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到了战国时代，随着燕国势力的增长，锐意开拓北边。燕将秦开，大破东胡，燕国的势力一直达到今建昌朝阳以北，向东且渡过了鸭绿江。大约就在这时，燕人和朝鲜南部以及日本也发生了交换关系。因此朝鲜全罗南道和日本都有燕国明刀货币的出土。

与此同时，燕国也亟力南向，和中原诸国互争雄长，其中最重要的是齐。公元前 284 年，燕将乐毅伐齐，六月之间，攻下齐都临淄等七十余城，取得了空前未有的胜利。在乐毅报燕王书中曾有如下的一段话：

臣……奉令击齐，大胜之，轻卒锐兵，长驱至国，齐王逃遁走莒，仅以身免。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14]

按元英、历室（《史记》作磨室）是燕国二宫的名称，相传都建于宁台。^[15]但宁台在蓟城何处，已不可考。^[16]至于“蓟丘之植，植于汶皇”这两句话，释者以为就是把汶水上的竹子，移植到蓟丘来的意思，这大约也是作为胜利品的标志的。值得注意的是蓟丘与蓟城的关系。

首先是蓟的名称的探讨。

蓟的得名，其说不一。^[17]比较可信的是酈道元的解释，他说：

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18]

所言蓟之始封，固不足信，但以蓟城之得名，始于蓟丘，却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按照这一说法，蓟丘应该就是蓟城城址的一个地理特征，蓟城的名字，正是由于这一地理特征而得来。

其次是蓟城位置的推测。

乐毅报燕王书提到了蓟丘的名称，却未记述其位置。酈道元是把蓟丘与蓟城的相对位置记载下来的第一人。有理由相信，酈道元本人是曾经到过蓟城的，他所说“今城内西北隅有蓟丘”，也很像是目睹者的口

吻。道元的时代上去战国,已经六七百年,他作如此肯定的记述,必然有所根据。如果道元之说可靠,那么重要的问题,就在于确定蓟城之所在了。

细读《水经注》并参考有关的文献记录,可以肯定酈道元所记的蓟城,约当今北京外城之西北部。现在白云观所在,差不多正处于蓟城的西北隅附近(详见下文),根据这一线索,可以推想:现在白云观以西的高丘,有可能即是古代蓟丘的遗址。在有关白云观的记载里,这一高丘曾被称为“琴台”,显然是一种附会。解放之初,在高丘周围的土壤里,曾拣起一些战国时代的陶片,可以说明这一高丘的历史是很久的。不过到现在为止,这里还没有发现更多的战国或战国以前的遗址或遗物,因此它究竟是否为蓟丘遗址,一时还难作最后的肯定。

必须提到,关于假定的蓟丘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足以论定,但是自此以南不到四里的地方,也就是广安门外以南700米处,却发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址。按这里本是辽金宫城所在,夯土台基十分显明。1957年5月在这一带夯土台基的下层,发现有明显的古代文化层,厚一米以上,尚未见底。在此文化层中,夹有粗细绳纹陶片、碎绳纹砖、瓦砾、陶鬲腿、陶豆把和饕餮纹的残半瓦当等。发现者的记载说:“饕餮文半瓦当,久被公认为燕宫常用的瓦屋构件,其为战国遗物,似无可疑。”至于出土的古陶等,经专家鉴定,其年代最早的接近于西周,因此被认为这就是战国燕都的遗址。⁽¹⁹⁾这一发现,和从《水经注》复原的蓟城位置,恰相符合,认为燕都所在,是可以相信的,同时酈道元以其所见蓟城即是燕国之旧,也是完全有根据的。

三 平原门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六国之中最后为秦所灭的就是燕和齐。

燕国的故都蓟,在秦朝版图的东北方,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用有如华北平原北部的一个门户。简单地说,从秦时起一直到唐朝末年,每当汉族统治者势力强大,内足以镇压农民的起义,外足以扩张势力、开拓疆土的时候,就一定要以蓟城为经略东北的基地。反之,每当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微,农民起义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而日趋激烈的时候,东北的

游牧部族,也常常乘机内侵,于是蓟城又成为汉族统治者一个军事防守的重镇。最后到了防守无效,东北边方游牧部族的统治者,一旦侵入之后,蓟城又成为必争必夺之地,并以之作为继续南进的跳板。自然,这期间也经常出现一些比较安定的局面,于是蓟城又会很快地发展起来,成为中国北部的一个经济中心,并促进了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物资文化的交流。

由于篇幅所限,以上这一概括的论述,只能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秦始皇统一之后,尝修驰道,北至蓟城,加强了远在东北的蓟城和当时首都咸阳的联系。这驰道的最后一段,也必然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前进的。汉武帝时经营东北,又把燕国已有的疆土,向外开拓,设立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而蓟城则是由长安到达东北边方的必经之地。因此,它在经略东北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可以推想而知的。更明显的是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利用蓟城作为基地,向东北进行征讨。

先是隋炀帝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当时涿郡治蓟城^[20],其位置即在古代蓟城。这条运河的修治,第一次开辟了自南而北直达蓟城的运道,也就是后日南北大运河的前身,不过它通达蓟城的最后一段,并不是经由后日所谓北运河(即潮白河下游),而是沿着当时永定河(时称桑乾河)的故道(即今凉水河),直抵蓟城南郊。其后三年(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炀帝自将伐高丽,从江都船行而北,直到蓟城,所经正是这条水道。当时兵马辎重,都集中到蓟。《资治通鉴》大业七年秋七月有记载说:

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涿郡所指即是蓟城,已如上述。^[21]八年春正月又有记载说:

四方兵皆集涿郡,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宜社于南桑乾水上,类上帝于临朔官南,祭马祖于蓟城北。

所谓“宜社于南桑乾水上”,当即指蓟城南桑乾河畔,这里应是当时运河码头所在,临朔宫是蓟城行宫。^[22]这次出师,不利而返。到了大业九、十年间,再度征兵,集中到蓟,《炀帝本纪》记道:

九年春正月,征天下兵,募民为骁勇,集于涿郡。

这次炀帝又曾亲到蓟城,督师前进,但是由于黎阳兵起,东都(洛阳)被围,

遂引退。

隋炀帝两次亲到蓟城大举出征,说明蓟城在经略东北方面的重要性;而蓟城本身,由于军需集中的结果,也形成了一时的富饶,《通鉴》记道:

帝谋伐高丽,器械资储,皆积于涿郡;涿郡人物殷阜,屯兵数万。^[23]

到了唐太宗时,由于国力日渐强盛,又一次助长了封建统治者对外侵略的野心。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冬,太宗决心亲攻高丽。次年四月,除分兵莱州(山东掖县)泛海趋平壤外,太宗率主力,仍从陆路过蓟城趋辽东,并在蓟城南郊誓师,大飨六军。^[24]但是由于高丽人民顽强抵抗,又加上天寒粮尽,被迫而退。是年十一月,太宗兵退蓟城,为了安抚军心,于是在城内东南隅建寺,以志悼念,命名为悯忠,这就是现在法源寺的前身。^[25]

以上史实,都可说明蓟城在汉族统治者经略东北时所起的作用。反之,当汉族统治者势力衰微或政局分裂的时候,蓟城又常常成为军事防守的重镇。三国时代,魏征北将军刘靖在蓟城屯兵驻守,因而大兴水利,实边御外,便是一例。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国事已是外强中干的局面,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危机四伏。北部的许多游牧部族,这时也都伺机反抗。为此,唐朝的统治者,曾在沿边一带的重镇,设置节度使,可以代表皇帝的权威,率兵驻守。玄宗时,沿北边一带,从今河北一直到新疆,共计设有八个节度使,蓟城便是其驻地之一,号称范阳节度使,这足以说明它的防御地位了。

但是,当汉族的统治权濒于崩溃以致边防不守的时候,游牧部族便会进据蓟城,并由此打开侵入平原腹地的门户。最好的例子,便是东晋末年鲜卑慕容氏之建都蓟城,这就是史称五胡十六国的前燕。

还在前燕都蓟以前,羯族石勒先有其地。石勒初陷蓟城是西晋末年的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到了东晋之初(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石勒自称赵王,建都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再破蓟城,这就是五胡十六国的后赵。石勒从其国都北至蓟城,沿着太行山东麓的古道,种植了成行的榆树,并于滹沱河上架造浮桥。^[26]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这时鲜卑慕容廆自称大单于,取得了辽东。其后廆卒,子皝嗣立。到了东晋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皝自称燕王,是为前燕,仍称藩于赵。其后四年,筑龙城(和龙,今辽宁朝阳县)都之。东晋穆帝永和四年(公元

348年)斃死,子俊嗣立,势力日强,并于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春进兵卢龙,西拔赵蓟城,并即迁都于此。^[27]到了升平元年(公元357年),才又沿着太行山东麓南下,徙都于鄆(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四十里)。总之,前燕之建都,由龙城而蓟,由蓟而鄆,十分典型地说明了东北游牧部族入侵的道路,后来的契丹、女真,也差不多是沿着同一道路下来的。

最后应该提到,蓟城作为华北平原北方的门户,在部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固然是汉族和东北游牧部族必攻必守之地,但在和平相处的日子里,它又成为部族融合、文化交流以及贸易来往的中心。上文已经提到在战国时代燕国明刀出土于朝鲜和日本的事实,其后到了汉朝,司马迁又明确地写道:

夫燕〔按指蓟城〕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结秽貉朝鲜真番之利。^[28]

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蓟城在汉族和游牧部族间交换关系的优越地位阐述无遗了。后来的史文中虽然缺乏如此概括而明了的叙述,只要社会条件许可,内外贸易的来往必然会更加频繁。因此,蓟城从古代一直到唐,作为华北平原北部的一个经济中心,也是不可忽略的。

四 城址沿革

在本文第二节里,曾涉及到燕都蓟城城址的推测,并以《水经注》所记北魏蓟城,上推燕都故址,那么北魏蓟城的位置,究竟是如何断定的呢?诚然,关于蓟城位置,酈道元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但从相关的地理记述中,可以看到一些线索,现在择要摘录并作解释如下:

瀑水自南出山,谓之清泉河……又东南……历梁山南,高粱水出焉……又东径广阳县故城北……又东北……径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又东与洗马沟水合。^[29]

瀑水即今永定河。永定河自今三家店出山南流,当时别称清泉河。梁山即今石景山,曹魏时曾由此引水入高粱河,故称“高粱水出焉”^[30]。此下瀑水故道,始与今永定河有别,大体是从今芦沟桥附近,转而东北,流经蓟城南七里,又东与洗马沟水合。由此可以知道,当时蓟城以南七里,即是永定河故道。此后一直到隋唐,其道未改,隋炀帝开运河,便是由这一水

道直抵蓟城南郊(见上文)。

洗马沟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源,流注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铎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灤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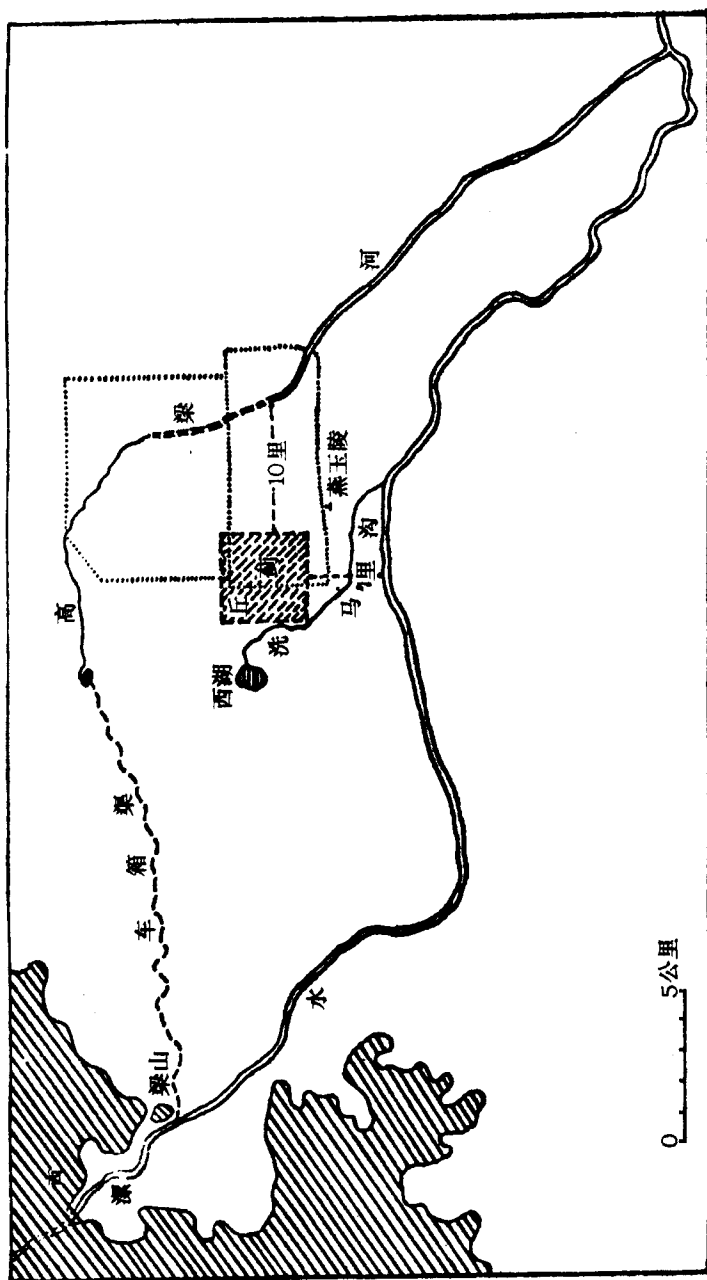
西湖即今广安门外莲花池之前身,为蓟城西北平地泉水所注。自此东流之洗马沟,也就是现在自莲花池向东转而南流的小河。这条小河原本南流再东转入灤水,而现在则中途被导入外城西护城河,自此以下故道遂湮。《水经注》称其“侧城南门东注”,则蓟城南界可以大致推求。又所谓“铎期奋戟处”,盖指新莽末年,刘秀北巡蓟城,铎期随行,适蓟中乱起,期骑马持戟为刘秀夺蓟城南门而出。^[31]道元确指其地,亦必有据,同时也说明自东汉以来,蓟城城址未有改变。

灤水又东南,高粱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流东注……又东径蓟城东,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灤水。

这里叙述的高粱水,和在梁山以南由灤水分出的高粱水有别。梁山以南分出的高粱水,实际上是经由人工渠道(车箱渠),把所分灤水导入了天然高粱水的上源。这一段所写的,正是天然的高粱水。水出蓟城西北平地,即是现在西直门外紫竹院公园湖泊的前身,这里现有人工渠道西北直通昆明湖,名为长河,不过这是金以后才开凿的,原所未有。原来的高粱水,从此发源、东流经蓟城北,又转而东南,经蓟城之东十里,又东南流入灤水。这就是现在从紫竹院东流的小河,经白石桥入北护城河,至今仍保留着高粱河的名称。只是在入今护城河后,又自何处起转而东南,难以确指,不过到了外城东南隅左安门之外,才见其故道遗迹,下游经十里河村,东南入凉水河。应该注意的是当时高粱水所经,自蓟城之北,转而城东,西去蓟城,约有十里。

根据以上的解释,可以恢复《水经注》所记蓟城与附近水道的相对位置,略如插图。这一复原图,对研究北魏以后,特别是唐代蓟城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太平寰宇记》所引唐朝或稍早于唐的一部地理书《郡国志》的记载^[32],蓟城城址南北九里,东西七里,略作长方形。其次,上文已经提到唐太宗曾于蓟城东南隅修筑悯忠寺,以追悼出征辽东的阵亡将士。悯忠



蓟城与附近水道相对位置图

寺即今法源寺的前身,其位置迄无变更。依此两点大致可以求得唐时蓟城位置,这与从《水经注》所复原的蓟城位置,大致相同,只是城周的形状,更加可以确定了。

十分可贵的是,解放以来由于首都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进行,陆续发现了一些唐朝的墓志,亟可作为研究蓟城位置的参考。这些墓志,一般都称蓟城为幽州,因为自晋以来,幽州治所都在蓟城。^[33]特别是开元十八年(公元370年)以后,由于割渔阳、玉田、三河三县另置蓟州(今蓟县)^[34],蓟之一名,由是转嫁,于是幽州遂为古代蓟城的通称。

1951年发现于东长安街御河桥工地的唐任紫宸墓志记道:

以元和三年……十月十九日宅兆于幽州城东北原七里余。

由此可以知道现在御河桥附近之地,正当蓟城东北七里有余,和《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蓟东十里有高粱之水”的说法,可以互相印证。因为根据高粱水上下游的流向来推测,其故道应该从今御河桥以东东单附近流过。1956年,又有唐姚子昂墓志,在永定门外以东安乐林(大公报社宿舍工地)出土。志称于宝应二年(公元763年)^[35],“葬于幽州城东南六里燕台乡之原”。这一里数和上一墓志所记,在不同的方向上,也是符合的。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一墓志中,还有如下的两句话:

左带梁河,近瞩东流之水;右临城廓,西接燕王之陵。

所指梁河,即是高粱河,由于文字对偶的关系,略去了一个“高”字,高粱河的故道,由今左安门外向东南流去,正是基地的左方,所以说是“左带梁河,近瞩东流之水”,这是第一次从实物发现中所知有关高粱河下游位置的记载,至可宝贵。按自金、元以来,由于开凿东至今通县的运河(元始称通惠河),高粱河的故道在今外城东部的一段,早已断流,只是凭了《水经注》所引《魏土地记》的记载,才知道蓟城之东十里,便是高粱河的故道。其后由于北京外城的兴建和市区的开辟,河道故迹,已不可见,只是左安门外迤东至十里河村以下,因地处郊野,尚见河形,作为夏季排洪之用。根据《水经注》所记,原已认为这就是高粱河下游的故道,现在经与这一墓志对证,更加肯定无疑了。

其次志文所谓“右临城廓”,即指蓟城,至于“燕王之陵”,也有可考。《水经注》在讲到瀑水于蓟城之南会洗马沟水以后,又有如下的一段记载说:

瀑水又东径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

由此可知蓟城东南，确有燕王之陵，其陵址去城不远，所以到了金朝开拓城垣兴建中都时，此陵竟入城中，于是又不得不进行迁葬，事见《金史·蔡珪传》，此不具论。所以志文称“西接燕王之陵”，也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还有在今外城陶然亭湖迤西姚家井，曾于1952年发现较大之唐墓一处，墓已被盗，墓室壁画残迹，依稀可见，并有残存的雕刻精美之殉葬石俑。墓志铭刻石已失，只余墓志盖，还颇完整，有篆书“大唐故信州刺史河东薛府君墓志之铭”。据推断这大约是唐武则天时代的墓葬，有一定规模，在当时必然处于蓟城南郊，这也是肯定无疑的。

综上所述，可以知道自春秋战国以来，历东汉、北魏至唐，蓟城城址，并无变化。其后辽朝，虽以蓟之故城置为南京，但是并无迁移或改筑。只是到了金朝建为中都之后，才于东西南三面扩大了城址。元朝另选新址，改筑大都，遂为今日北京内城的前身。辽金以前，所知蓟城城址的沿革，大略如此。

五 巨变之始

到了五代，在北京城的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了想作皇帝，竟以今北京和大同附近一带边防重地，拱手而让之契丹，史称为“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公元936年契丹入蓟城建为陪都，号称南京，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辽。从此以后，北京就从一个华北平原的北方门户，逐步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数百年间代替了前期长安城的地位，形成了全国最大的一个行政中心。

从长安的衰落到北京的兴起，是具有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历史原因的。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前半，长安城毫无疑问是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其余如洛阳、金陵（南京）虽然也号称名都，却很难与长安相比拟。远自周初，文王作丰，武王治镐，都在泾渭盆地，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经营咸阳直到渭南，从地理上来看，这都可以认为是长安城的先驱。汉唐长安，虽然不在一地，也只能看作是前后城址的转移。长安城的兴起，一如其他城市一样，首先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悠久的历史因素也是值得考虑的。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出现，长安城在全国的位置更加重要起来。同时由于地方农田水利的开发，贸易的发达，长安城所在的关

中地区,到了汉朝时候,可以称得上是全国首富之区。关于这一点,司马迁在历述了关中地区的物理条件、历史发展、地方资源和贸易情况之后,总结写道:

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36]

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前半的后期,情况却不同了。唐都长安之后,表面上看来,其城市规模和繁荣情况以及国际交往的频繁、文化艺术的昌盛,似乎都在汉代长安之上。不过它的经济基础,从全国各地比较来看,却已远不像汉代长安在全国中所占有的那种优越地位了。简单说来,自东晋而后,长江中下游已经全部开发起来,其面积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富饶,是关中地区所不能比拟的。因此,在汉时富冠天下的关中,到了唐朝竟不得不依靠江南的供应。甚至皇帝在歉收之年,还不得不迁居洛阳,就食江南之漕。相对的关中水利之废弛,自然也是事实。总之,除开一切政治原因不说,唐代长安城的繁荣,可以说是已经缺乏了应有的物质基础。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来说,它已经失去了过去所具有的绝对优势,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北京城在封建社会时期的后半之日趋重要。这主要是因为唐代中叶以后,东北边外的游牧部族,随着唐朝内部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之日趋激化,也加强了对中原的劫掠和入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契丹。事实证明,来自这一方面的游牧部族,前后相继,势如潮涌。自有史以来,中国的东北方,从未遭遇过如此连续不断的进攻力量,而北京所在,作为华北平原北方的门户,也正是游牧部族入侵所首先要占领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汉族与游牧部族之间的矛盾,在东北边方急剧发展的形势下,北京城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意义,才日益增加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北宋之开封、南宋之临安(杭州),作为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曾先后和北京形成了相互争夺的局面,但却未能取得胜利。结果,北京终于代替了长安,而成为封建社会时期后半全国最重要的政治中心。

长安与北京作为封建社会时期的两大政治中心,其盛衰相继的转变过程,概括说来,就是这样。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安禄山之起兵蓟城,打破长安。

唐玄宗时候,蓟城为范阳节度使的驻地,已如上述。其东有平卢节度使,驻今辽宁朝阳,西有河东节度使,驻今山西太原。安禄山以胡人而被重用,身兼以上三个节度使,手握重兵,骄恣日甚,终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起兵范阳,发所部及契丹、同罗、奚、室韦、突厥兵,共十五万,大举南侵,自称大燕皇帝,连陷洛阳、潼关,终于天宝十五年攻入长安,大事搜掠。当时长安城原是歌舞升平的一派繁华景象,但是经此一番涂炭,竟然一蹶不振,历代名都,从此走上了衰落的道路。严格讲来,是到解放之后,古代的长安,才恢复了它的青春。

这一事件,标志着封建社会时期长安城的日趋没落,和北京城的日益重要。在北京城的历史上,算得是一个即将到来的巨大变化的征兆了。

现在,在北京法源寺里,还有唐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碑一块,高二尺余,宽损三之一,嵌于寺壁,碑称唐肃宗至德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史思明建。但是碑文之中又记载到肃宗在至德三年所受尊号,且有文字颠倒之处。^[37]因此引起了清初许多考据家如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洪颐煊等人的疑问。综合诸家意见,这块宝塔颂,原是为歌颂安禄山而作。但是碑文刊就不过一月,史思明又于至德二年十二月降唐,因此,才又把此碑之颂安禄山者,凿改之以颂肃宗,磨补重刻之迹,显然可见,所记肃宗尊号的错误,当是长安道远,传闻失真的原故。^[38]这是法源寺中现存最古的石碑,又因为有关北京历史掌故,故附记于此。

(原载《文物》1959年第9期;收入氏著
《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注 释

- [1]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
- [2] 《史记·燕召公世家》：“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 [3]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三、《礼记》“音义”之三、“乐记”十九：“黄帝姓姬，君奭盖其后也。”君奭即是召公。朱彝尊：《日下旧闻》亦主其说：“召公所出，众说纷纭，当以陆德明为是，盖《乐记》所云封黄帝之后于蓟者，即召公也。”
- [4]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四，“历代都邑考”：“《舆地广记》：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又封召公于北燕，其后燕国都蓟。《诗补传》曰：蓟后改为燕。……或曰黄帝之后封于蓟者已绝，成王更封召公奭于蓟为燕。”
- [5] 《日下旧闻考》卷二，页七下引《史记正义》：“召公始封盖在北平无终县，以燕山

为名,后渐强盛,乃并蓟徙居之。”

- [6]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页 293—294。
- [7] 吴泽:《中国历史大系·古代史》,棠棣出版社 1951 年版,页 35—36。
- [8] 匱、燕古相通用,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匱侯鼎释文:“潘伯寅尚书曰:此匱当为燕之假借字,据《左传》高邠世本作匱,董遇注亦作匱,《正义》谓一人,声相近而为二字耳。张孝达尚书曰:按潘说是也。曼燕古相通借者多矣:如高宴作煇燕,喂温作喂温之类。潘益按潘尚书又有毳侯饗,陈编修有毳王戈,字又作毳,其器皆出燕齐之交,是匱即燕之通用字无疑也。”
- [9] 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第一册,页 15。又方濬益:《缀遗斋彝器考释》卷二二,页二下。
- [10] 柯昌济:《金文分域编》卷八,页 16 上;又续编卷七,页 21 下。
- [11] 《观堂集林》卷一八,页 112。
- [12] 同上书,页 213。
- [13] 《史记·燕召公世家》。
- [14] 《战国策》卷三〇,“燕”二。
- [15] 《括地志》卷四,“幽州”:“元英、历室二宫名,在幽州蓟县西四里,宁台之下。”
- [16] 《日下旧闻考》卷二,页 11 上引《史记正义》:谓宁台在蓟县西三十里,而《括地志》则以为在蓟县西四里,不知孰是。
- [17] 例如宋博物家沈括谓:契丹“大蓟茭如车盖,中国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见《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二。
- [18] 《水经注》卷一三,“四部备要”本,页 21 上。
- [19] 赵正之、舒文思:《北京广安门外发现战国和战国以前的遗迹》,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7 期,页 74—75。
- [20] 《通鉴释文辨误》卷八“九月诏征天下兵,集涿郡”,注“大业初并燕范阳置涿郡,治蓟。”
- [21] 《通鉴释文辨误》卷八。
- [22] 《资治通鉴》大业七年四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又《新唐书·方技》:“炀帝幸涿郡,召王远知,见于临朔宫,执弟子礼,资质仙事。”
- [23] 《资治通鉴》大业十二年十二月。
- [24] 《旧唐书》卷三,“本纪”第三。
- [25] 朱彝尊:《日下旧闻》卷一七,页 12 上引《塞北事实》。
- [26] 《日下旧闻考》卷二,页 19 上引《赵书》:“石勒从蓟州大道、滹沱河造浮桥植行榆,五十里置行宫。”
- [27] 前燕都蓟,《水经注》记有如下一段故事:“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俊立铜马象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俊光寿元年,齿四十

九矣，而骏逸不亏，俊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象，亲为铭赞，铸颂其旁，象成而马死矣。”

- [28] 《史记·货殖列传》。
- [29] 《水经注》卷一三，“漂水”注。下二段引文同。
- [30] 同上书卷一四，“鲍丘水”注。
- [31] 《后汉书》卷五〇，“姚期传”。
- [32] 论证见侯仁之：《水经注漂水注选释》注一七，载《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
- [33] 《旧唐书·地理志》：“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
- [34] 《太平寰宇记》卷七〇，“河北道蓟州”。
- [35] 按宝应元年四月肃宗逝，代宗即位，次年改元为广德，此称宝应二年，亦即代宗广德元年。
- [36] 《史记·货殖列传》。
- [37] 至德三年正月所册肃宗尊号曰“大唐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而碑文移“大圣”二字于“文武”之上。这里碑文有磨补重刻的痕迹。
- [38] 又这一石碑，自左至右，共二十二行，行无定字，顾炎武以为此碑书丹于石，故以左为前。朱彝尊则以为系从安禄山俗，见《日下旧闻考》卷一七，页15。

参 考 论 著

1. 侯仁之：《北京都市发展过程中的水源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
2. 侯仁之：《北京旧城平面的设计改造》，《文物》1973年第5期。
3. 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的分布特点及其成因的初步研究》，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4. 李孝聪：《记英国伦敦所见四幅清代绘本北京城市地图》，载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5. 唐晓峰：《燕蓟分封与北京地区早期城市历史地理问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1期。
6. 岳升阳：《清代宣南的士人文化》，载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侯仁之 俞伟超

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 地理环境的变迁^[1]

乌兰布和沙漠位于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其范围在黄河河套以西，从阴山南麓延伸到贺兰山下。本文公布了1963年实地调查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部分古墓、古城、村落和烽燧废墟，通过文献、实物与田野考察资料的对比，探讨了乌兰布和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变化。本文认为这一地区发现的三个古城应是汉朔方郡最西部的三个县城，即临戎、三封和窳浑，在哈隆格乃山谷发现的I号石城应为汉鸡鹿塞废墟。推测在汉代移民屯田开垦以前，这一带是水源充足、一望无际的大草原。由于垦区的变迁，田野荒芜，风蚀加强，导致流沙的形成。根据考古发现研究沙漠地区人类活动和地理变迁是本文的特点。

侯仁之，1911年生，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俞伟超(1933—2003)，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

一 从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地理环境的变迁

在我国内蒙古和宁夏两自治区之间,黄河河套以西,从阴山南麓直到贺兰山下,有一片茫茫的流沙,这就是乌兰布和沙漠。

按蒙语“乌兰”为红色,“布和”为公牛,“乌兰布和”就是红色公牛的意思,极言这片沙漠为害的严重程度。乌兰布和沙漠至今还埋藏着大量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特别是在它的北部,从黄河两岸,斜向西北,直到阴山脚下,在大约两千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数以百计、成群分布的古墓以及若干古城和村落的废墟,散布其间。这些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对于研究乌兰布和沙漠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

根据初步调查可以知道,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在两千多年前,原是汉朝朔方郡的辖地。朔方郡是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建立的。现在这里所发现的三座古城废墟,已经查明就是朔方郡最西部的三个县城:临戎、三封和麻浑。^[2]临戎在今磴口(巴彦高勒)以北约20公里,自此以西约50公里就是三封,麻浑又在三封东北约30公里。三城废墟都已半被沙湮,彼此之间又有大沙阻绝,难以通行(图1)。

以汉代朔方郡的设置为线索,结合有关的历史文献^[3],加以考察,不难断定朔方郡西部临戎三城初建的时候,现在的乌兰布和北部一带地方,非但不见沙漠踪影,而且还成为汉族移民屯垦的重要地区。特别是到了西汉王朝最后的半个多世纪,“朔方无复兵马之踪六十余年”^[4],促进了这一地区人口的繁盛和农牧业的发展。关于这一点,东汉史学家班固曾说:“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5]如所描写,真是一派繁荣富庶的景象。这里所指,虽然不限于临戎三城,而临戎三城肯定是包括在这一繁荣富庶的农垦区之内的。现在广泛分布在三城废墟附近一带的汉墓群,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除去临戎三城之外,还应该讲到鸡鹿塞的发现。鸡鹿塞是汉代有名的关塞,地处阴山北部,是贯通阴山南北的交通要冲。它的名称虽屡见于《汉书》和《后汉书》,但是它的确切所在,久已失考。只有《汉书·地理志》在朔方郡麻浑城下的注文里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有道西北出鸡鹿塞。”现在麻浑城的遗址既已确定,根据这一线索向西北一带阴山脚下进行探寻,在相去大约20公里的哈隆格乃峡谷的入口处,果然发现有一系列汉代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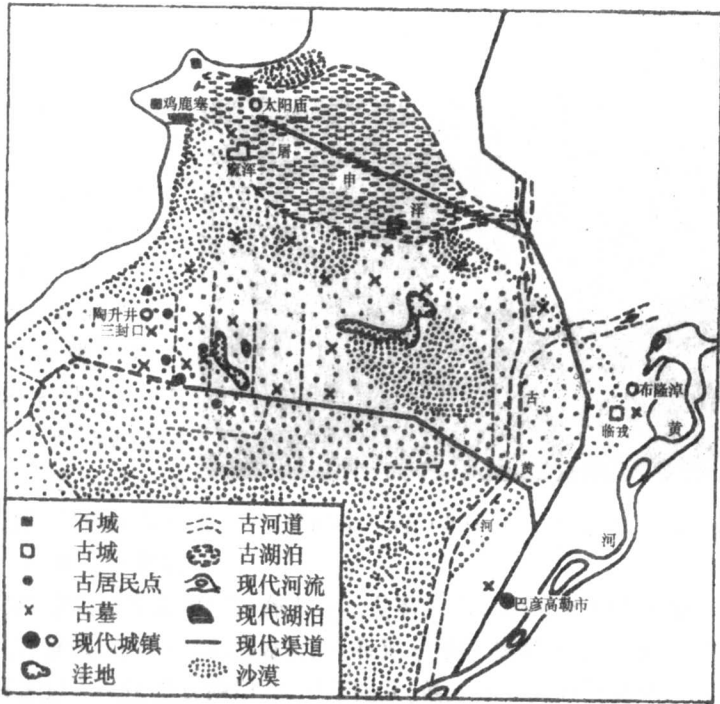


图1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汉代遗迹分布图

筑烽燧,其中最重要的一处,是控制峡谷入口处两侧的石城遗址,可以断定这就是汉代的鸡鹿塞。塞口以内,两山夹峙,中间是一条宽阔平坦的天然通道,并有一泓溪水顺流而下,在出峡谷后没入沙砾层中(图2)。按《汉书·匈奴传》有明文记载说,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到长安与汉王朝修好,汉王朝也以礼相待,厚加赏赐。及归,汉遣官兵护行,并送单于出朔方鸡鹿塞,又送给他当地出产的粮食前后共34000斛。这些粮食应该就是麻浑、临戎与三封一带的出产,这也足以说明当时这一带地方农业生产发展的一般。

如果以上的论断不错,那么两千多年以前如此繁荣富庶的一大农垦区,怎么竟然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猖狂肆虐的大沙漠?这些滚滚流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是像过去传说的那样完全从外部吹袭而来的呢?^[6]还是在本地区内另有来源?弄清这个沙源问题,对全面征服这个大沙漠是具有战略意义的。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埋藏在沙漠里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图2 哈隆格乃山谷南口(自山口内南望)

首先是古城废墟的发现,对于研究这一地区自然情况的变化,特别是关于古今河湖水道的变迁,关系至为密切。而研究这些河湖水道的变迁,又是探索这里流沙起源时所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例如临戎废墟的发现,就直接揭示了黄河河道在

附近一带自西而东不断迁移的事实。关于临戎城的建置以及它和黄河河道的相对位置,在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的《水经注》一书中,是有明文记载的:“河水又北径临戎县故城西,元朔五年立,旧朔方郡治。”^[7]过去在临戎废墟未被发现之前,地理学家或历史学家根据《水经注》的这段记载,总是在今黄河以东的鄂尔多斯高原求其遗址。^[8]现在这个遗址已被发现,但是其位置并不在黄河之东,而在黄河之西,其间相去大约5公里。这就说明两千年来,临戎故址虽然依旧,而黄河河道则已向东迁移。根据这一线索,曾试图向废墟以西的沙丘地带进行探索,在大约30公里的距离内,果然发现有已废的河道三条,相距最近的一条,南北向的河形还相当完整,尽管有部分流沙湮盖,但宽阔的河床依然明显可见。这应该就是黄河东移以前最后的一条河道,应该继续追踪,以求核实。其他的黄河故道,也应一一查清。至于黄河的不断迁移对于这一地区流沙起源的关系,更是当前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这一地区内,除去黄河河道的迁移,还有古代湖泊的湮废。紧接《水经注》的上述引文,又有如下的一段记载说:“……河水又北屈而为南河出焉。^[9]河水又北迤西溢于麻浑县故城东,……其水积而为屠申泽。泽东西百二十里,故《地理志》曰:‘屠申泽在县东’,即是泽也,阡駟谓之麻浑泽矣。”当麻浑故城还不能确知所在的时候,屠申泽的旧址在茫茫沙漠中

也同样是无觅处,因为现在乌兰布和沙漠的北部,已经没有大湖存在。现在麻浑废墟既已发现,这也就为追踪古代屠申泽提供了一个线索。今所见麻浑废墟东北一带的地形,明显下降,有如釜底。按照《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所记方位,这里应该就是古代屠申泽的西部边缘部分。又自麻浑废墟以东数十里内,在连绵不断的沙丘中,也有几处古墓群散布其间(估计还有些古墓群已被流沙湮埋)。如果能够进一步查明这些古墓分布的北界,结合对于当地流沙下覆地形和地层剖面物质变化的勘察,那么屠申泽的旧址就可大体复原。复原这一湖泊的旧址,并进而研究它消失的原因及其产生的后果,也同样是有助于探讨这一地区流沙的来源的(图1)。

其次,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古墓群,埋藏有大量的古代文物,值得进行发掘研究。这对于了解这一地区古代生产情况和人民生活,都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有关这一地区的文字记载,非常缺乏,因此这些大批保存的遗迹、遗物,更具有十分可贵的史料价值。例如在三封废墟附近的一座古墓(即麻弥图庙 M1)中,出土西汉后期的五铢钱,标志着墓葬的年代。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中出土随葬品多件,其中陶器有鼎、壶、瓶、盘、盆、灯、博山炉、灶、囷、仓以及附有辘轳和汲瓶的井等,所有这些陶器的形制,和同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发现,极相近似。在另一墓的墓棺及采集的陶仓、陶囷中还发现了大体尚可辨识的农作物,品种如高粱、荞麦、糜子(或谷子)、小麦等。这都是小型的汉墓,像这种类型的古墓,成群分布在三封废墟的周围,如果进行有计划的发掘,必将获得大量有价值的资料,对于研究这一地区的开发史,将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这些古墓群的分布,对于研究这一地区古今自然情况的变化和流沙的来源,也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这里只举一事为例。

由于这一地区风蚀强烈,所见古墓保留有封土成堆的已是少数,绝大部分都是墓室券顶暴露地表,修砌成排的墓砖,有的已被吹蚀成蜂窝状。还有些地方的古墓甚至连周围的表土也吹蚀殆尽,只余砖筑墓穴,兀立地表以上,状如孤岛。上述三封废墟附近的汉墓,基底仅低于现在地面1.09米,而在废墟东北尔登囷附近所见一个汉墓,其基底竟高出周围地表1.15米。这样,两千年前所埋下的每一个坟墓,就等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记录地面剥蚀程度的标尺。借助于这些“标尺”,就可以计算出两千年来在不同地点地面剥蚀的不同程度,从而为研究这一地区的风蚀现

象及其后果,提供了一项极其难得的数据。强烈的风蚀在这一地区的破坏作用,如果不是身临其境,是很难想像的。

除去汉代墓群的分布之外,还有若干汉代村落的遗址,至今仍可辨识(当然有些村落遗址已被流沙湮埋),例如在三封废墟附近,就有好几处这样的遗址被发现。遗址上虽然不见任何残存的建筑物,但有大量汉代陶片的散布,可为证明。在陶升井东南约4公里的一处汉代村落遗址上,偶然发现古井一口,已被流沙湮塞,但井口仍然明显可见(图3)。像这样的汉井必然是大量存在的,如果掏挖井中的积沙,就可以判断两千多年前这一带地方地下水位的深度,这又是和现在地下水位相比较以研究这一地区古今自然条件变化的一项极为难得的资料。



图3 汉代村落遗址所见井口

总之,根据这一极其初步的野外观察,现在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很可能就是古黄河的一个冲积平原,平原上有些地方还有成片的沙碛分布,后来在上面又覆盖了厚度不等的一层类似湖相沉积的粘土,这一覆盖的粘土层,厚的地方可能有数米、浅的地方就观察所得,只有数十厘米。这表面上的粘土层一旦被强烈的风蚀剥开之后,下覆沙碛,随风吹扬,很快就被搬运到地表上来。例如在麻浑废墟以北太阳庙附近曾看到近期形成的一大“风蚀坑”,在坑边的天然断壁上可以清楚看到表土为一水平沉积的粘土层,厚约70厘米,其下部都是粉砂。在此以南的下风处,就是堆积如山的沙丘。这恰好说明这一地区表面流沙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一作

用在没有植被保护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发生的。可以设想,在汉代开垦以前,这一带地方原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根据在三封废墟附近采集到的大约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斧、石核各一件来推测,远在汉代以前,这里就已有人类居住过。在历史的进程中,整个地区的气候可能逐渐变得干燥起来,即使如此,其变化程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到了汉代移民在这里着手垦荒的时候,水源也还相当丰沛,因此在比较安定的社会条件下,汉代垦区也就稳定地发展起来。后来可能是由于垦区的变迁,广大地区之内,田野荒芜,这种情况一再重演,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因为这时地表已无任何作物的覆盖,从而大大助长了强烈的风蚀作用,终于使大面积的表土破坏,覆沙飞扬,逐渐导致了这一地区流沙的形成。这一设想,是否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还需要从地质地理各方面来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同时也亟需从这一地区极为丰富的古代人类活动的遗存中继续寻求线索。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专业人员去做,更需要投身在生产斗争最前线的同志们,随时注意在开渠引水、移沙造田过程中,对所遇到的古迹古物,及时加以研究,遇有重要发现或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就主动与文物保管部门取得联系,或写成文字报导,为这项研究积累资料。尤其希望有关领导部门,重视这项工作,最好是在可能条件下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力量,进行考察,把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整理,和当前的生产斗争,更密切地结合起来。既要充分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更要掌握自然变化的规律,力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杜绝流沙的来源,为全面治理沙漠与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提供必要的参考资料。这样就一定可以有助于在历史的废墟上建立起繁荣富庶的新垦区。

二 考古发现纪要

乌兰布和沙漠北部地区的古代遗迹,主要是汉代的遗存。这些遗迹的分布密度,超过了今天的居民点。1963年,我们在为时一个多月的野外调查中,曾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和当地机关、群众提供的线索,选择重点,进行考察。^[10]在这次初步工作中,总共收集到一件细石器和一件磨石器,勘察了三座汉代古城及其附近的墓群,发掘了一座汉墓,发现了一系列的汉代烽燧遗址。

(一) 收集的石器

石核 一件。传出陶升井保尔陶勒盖农场总部以南 3 公里左右的沙丘旁。燧石质。长 4.2 厘米(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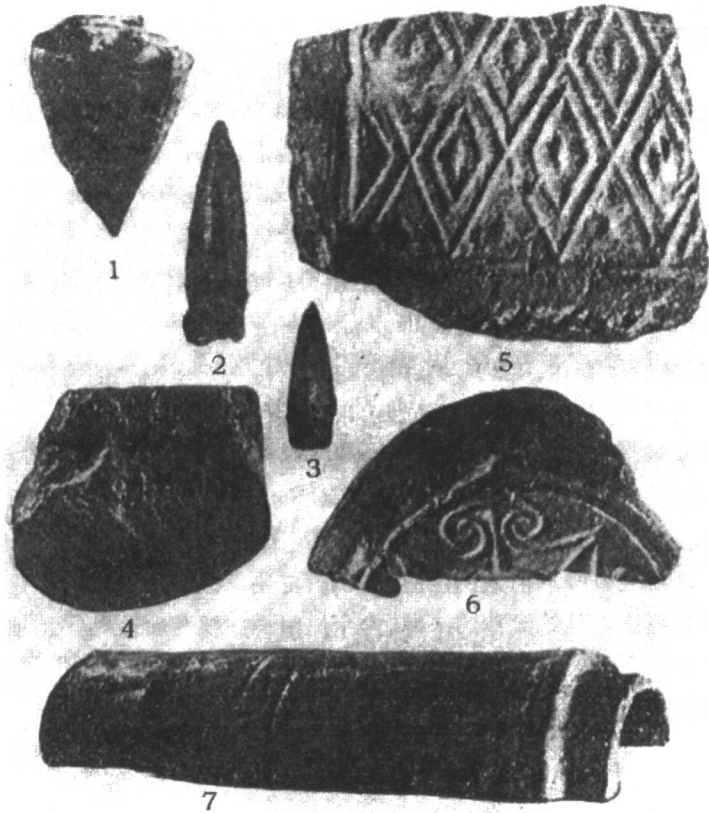


图 4 保尔浩特和陶升井附近采集遗物

1. 石核 2、3. 棱铜镞 4. 残斧 5. 几何纹砖 6. 云纹瓦当 7. 筒瓦
(1—4)约 2/3, 5、6 约 1/3, 7 约 1/6

磨光石斧 一件。传出地点同上器。矽质岩质。刃部一端经多次修磨而内偏。横截面略呈椭圆形,已断,残长 4.8 厘米、刃宽 5.4 厘米(图 4)。

(二) 汉城遗址

1. 布隆淖古城——汉临戎废墟。

古城位于布隆淖村的西南,东边紧靠一个名为河拐子的小村庄。全城作长方形,北端方向为 2° (磁北,下同;各遗迹的平面图皆用罗盘仪及皮尺测出,当有不确之处,下文不一一注明)。城垣黄土筑成,南、北两垣均长约450米,东垣长约637.5米,西垣长约620米,城垣宽约10米。古城的北部,地面上还保留着高约0.5—2米的残垣;南北部则除少量段落外,已被流沙所湮(参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一文)。

城内未被流沙湮盖的地面上,散布着汉代的绳纹砖、瓦。还有很多罐、壶、瓮、盆、甑等灰色陶片,上面往往带绳纹和波浪、方格、斜方格等纹饰,汉代的特征是很明显的(图5,3、5、7、8)。原生灰层,在古城东南隅露头较多,包含物略同上述地面遗物。调查时,还见到石础、残石磨和圈状石权各一。石础是一块略成圆角的扁方形石块,柱穴部分仅略作圆形凹下。石磨的磨齿是不相连接的三角窝形。石权外径为14.5—17厘米、厚8厘米、穿径为3.5—5厘米,已有残缺(图5,4)。凡此,从它们的形式看,也都应是汉代遗物。

在古城的中心地区,有一处东西狭长的地带,地面稍稍隆起,上面堆积的砖瓦特多,可能是一处重要建筑物遗址。

城中央稍偏西北方有一处制铁遗址很值得注意。那里,在一块东西约50余米、南北约20余米的地段上,布满了铁器残片、炼渣以及炭烬;偶然还可见到铜器残块。铁器残块中,以铁甲片为多,调查时匆匆一过,所见即达数十片。

古城之中,汉代以后的遗物很少,仅仅拣到几处带长方条状压印花纹带的灰陶罐片(图5,6)、周身带轮痕的灰陶长腹罐片(图5,1)、红褐陶的外卷圆唇的盆片(图5,2)。它们大概都是辽至西夏前后的遗物。

从古城内的遗存情况看来,古城系汉代遗迹无疑;它在汉代以后,大概长期荒废,只是到了辽至西夏前后,又有少量的居民,曾经在此附近居住过一定时期。

2. 保尔浩特(土城子)古城——汉麻浑废墟。

古城遗址,现为沙金套海公社辖地,其位置在公社所在地的西南3公里处。保尔浩特为蒙语,汉语称它为土城子。在本世纪初,这座古城曾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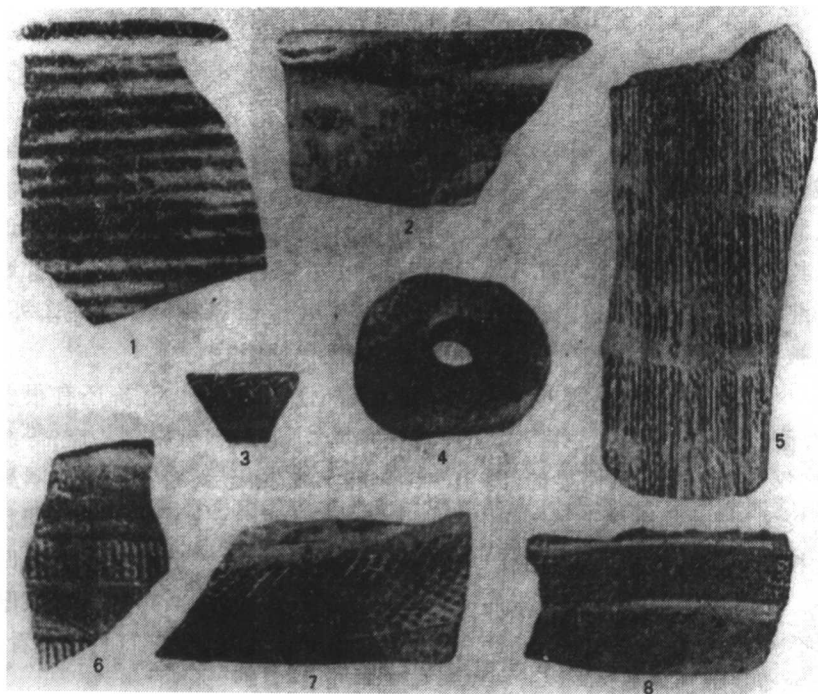


图5 布隆淖古城采集遗物

1、2、6. 辽至西夏前后的陶片 3、5、7、8. 汉代瓦片和陶片 4. 汉代石权
(4约1/6,余为1/3)

到破坏性的盗掘。^[11]

这是一座很小的、形状不规则的土城，东西最长还不过 250 米，南北最宽处亦仅 200 米。西垣有些弯曲，其西北隅有一些流沙覆盖，据初步辨认，好像作成两度曲折（参看《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一文）。

全城城垣保存较好，绝大部分地方清晰可辨，宽约 9—13 米。有的地方，夯层还很清楚，据北垣中的一处测量，夯土每层厚约 10—12 厘米（图 6、图 7）。

南垣的中部，有一缺口，宽 20 米左右，约为城门遗迹。全城似仅此一门。从古城周围的地形来说，城外的东边和北边，是一干涸的河床，大概是汉代屠申泽的边缘；向西则可直到阴山，走向山后的漠北地区。在城门缺口的两侧，土垣突然向外凸出，缺口的正前方，地面并有一堆积土。调查时当刚看到这种现象时，便曾经怀疑它是类似后代那种瓮城结构的残

存。后来在阴山哈隆格乃山谷南口的汉代石城上,果然见到了保存较完整的这种城门结构。参考两地所见,把它的平面进行了大体的复原(图8)。

古城之内,地面积存的砂丘不多。暴露在地面上的砖、瓦、陶片,也不算太多。这些

砖、瓦、陶片,所见皆汉代遗物(图9),汉代以后的,几乎无法找到,古城的使用时间是相当清楚的。此外,还能拣到少量的汉代五铢钱。

和布隆淖古城一样,城内也有一处值得重视的遗址。此处遗址偏处城内西南部,东西约30米、南北约15米,在此范围内,满是箭镞的铁铤。箭镞的镞部都是铜质三棱的(图4,2,3),发现较少。看来,这里应当是当时贮存箭镞之处。

保尔浩特古城从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垣设计乃至城内的遗存等方面,都显示出这是一处重要的城址。

3. 陶升井古城(亦称麻弥图土城)——汉三封废墟。

陶升井是保尔陶勒盖农场总部的所在地。从总部向西南行走4公里,即达古城遗址。遗址之南,有土筑破屋两所,为麻弥图庙废墟。

陶升井古城遗址地面上汉代陶片堆积的情况是相当引人注目的,在东西约740米、南北约560米的范围内,一眼望去,满是陶片,它在沙漠中强烈的阳光照射下,反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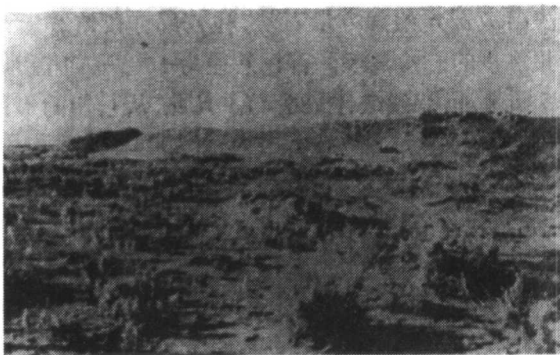


图6 保尔浩特(土城子)古城西南隅及西城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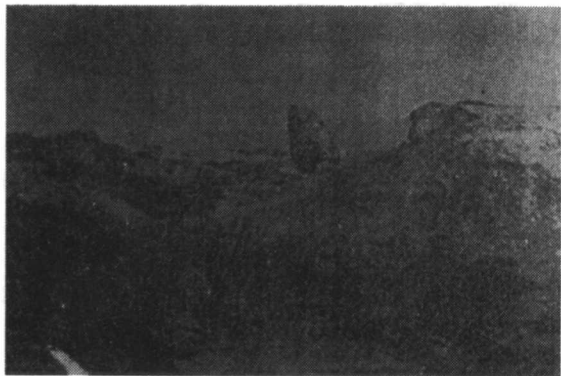


图7 保尔浩特(土城子)古城北墙残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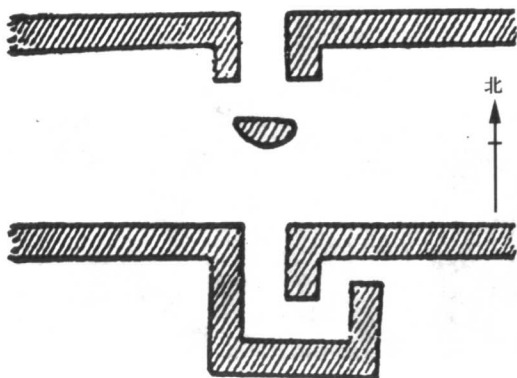


图8 保尔浩特(土城子)古城南垣城门平面示意图
(上为现状,下为复原)

一片银灰色的光泽,远远即可望见。此处堆积的陶片所以如此密集,当是大风对土层剥蚀所造成。在乌兰布和沙漠中,除炎热的夏季外,经常有大风,它对地面土层所起的强烈剥蚀作用,在上述两处古城废墟中,都已见到过,而在此处,影响尤烈。估计城内的堆积土层,已经大部被风刮走,只剩下较重的

砖、瓦、陶片,留在当地,从而以前是埋藏于地下不同深度的遗物,现在却密集地在地面上连成一片。古城的土垣,亦几乎被刮完。仅仅是一个长、宽均约118米的方形内城,还可在沙丘之中依稀找出范围。在内城外的东北方及西南方,也还分别找到各长约100余米的土垣痕迹,可能是外城的残留。看来,从前这是一座有大、小两重城垣相套的土城。这种形式的汉城,在内蒙、特别是内蒙西部地区,已发现多处,大概是汉代西北部的一种流行形制。^[12]

所见砖、瓦、陶片,纯粹是汉代的,它们和上述两处城址中的汉代遗存,没有多大区别。在这里,曾拣到一块几何纹残方砖和两块云纹瓦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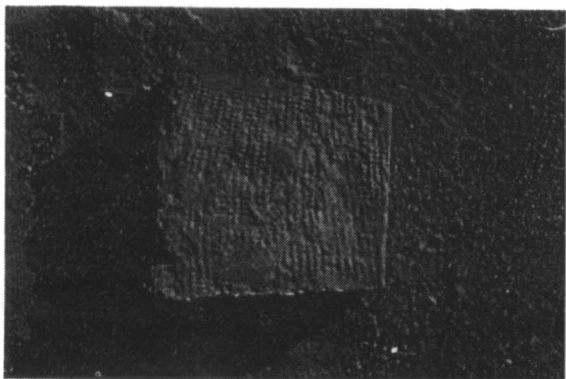


图9 汉代扇形砖

残块(图4,5,6)。这种瓦当,由于极富时代特征,一进乌兰布和地区就注意寻觅,但除此之外,终未遇到。好像汉代在这个地区,瓦当的使用远不像中原那样发达。在内城之处,有两节泄水陶管露在地面上。它是用两重绳纹筒瓦扣合而成。我

们采集了一块完整的筒瓦,作为标本携回。筒瓦长 45 厘米、径 16.5 厘米(图 4,7)。

在遗址范围内,三棱的铁铤铜镞和汉代钱币,也较易遇到。这两种东西,过往的人们常常拾起玩赏。经访问,过目的标本不下数十件。可注意的是所见钱币皆武帝至宣、平前后的五铢及王莽时期的大泉五十,不见一枚东汉钱,这正暗示出了古城的繁荣时间。

(三) 麻弥图庙 1 号墓

乌兰布和北部沙漠中汉代砖墓的现存情况,堪称考古学上的罕见现象。千年以来,狂风已经刮走了它们的封土,甚至严重削低了地面,这些砖墓,已经把它们墓顶乃至墓壁都暴露在地面上。许多野外工作者走进一处这样的墓地,都感到这种景象是奇异难遇!

了解这种墓地的分布,当然比较容易。通过踏查和当地群众的提示,墓地的分布位置,大体有如图 1 所示。可以说,三座古城周围的近郊,都有当时的墓地。其中,麻弥图庙附近的墓地,可推居首位。

为了多寻找一点从汉代以来地面削低的材料和初步了解当地的汉墓,在靠近陶升井古城遗址东部边缘的地方,发掘了一座墓顶已大部损毁的小型砖墓,即麻弥图庙 1 号墓。

此墓方向为 98° 。墓底低于现在地面 1.09 米,墓壁残高与现在地面平。墓的顶部,已随同地面的削低,一齐被毁。墓道为长方斜坡形,长 1.32 米、宽 1.44 米。如此短促的尺寸,不可能是斜坡墓道的原来尺寸,这就使人相信埋葬时的地面,要远远高于现在的地面,也就是说,当初的墓道还要长得多。

墓道尽端,有一很短的砖砌甬道,长 0.41 米、宽 1.43 米、残高 1.09 米,顶部亦已毁坏。封门砖是砌在甬道与墓室之间,不在甬道口,很明显,修墓时是把甬道作为墓门外的一种结构来处理。

封门砖是单层的素条砖。发掘时,在墓门以内墓室的前方,遇到很多零乱的条砖,当是二次瘞人时打开封门砖后所遗。现存的封门砖,下部各砖顺置平铺,上部则杂立竖砖,也表明是前后两次所封。

墓室长方形。内长 3.45 米、外长 3.44 米、内宽 1.64 米、外宽 2.19 米。残高同甬道。四壁用素条砖错缝平砌。下面的五层(包括底砖),砖较薄,每砖厚 4 厘米;上面各层,每砖厚 8 厘米。砖长均为 23 厘米余,宽



图 10 五铢钱

约为 17 厘米余。铺地砖北半部系人字形，南半部系平行横置。

墓顶已残。在南壁的上端还保留着 15 块扇形素砖，它们是券顶最下面的一排。各砖下端宽 24 厘米、上端宽 30 厘米、厚 8 厘米。既然用扇形砖筑顶，墓顶必为横券，从残存的 15 块砖来看，券顶的砖缝是对正的。

墓室后部并置两具外髹朱漆的木棺，朽木及漆痕可辨。北棺内长 2.02 米、外长 2.10 米，内宽东 0.65 米、西 0.61 米，外宽东 0.85 米、西 0.81 米，残高 0.35 米，朽木厚 0.04 米，内置 35 岁左右的女性骨殖，仰身直肢。南棺内长 1.95 米、外长 2.15 米，内宽东 0.62 米、西 0.60 米，外宽东 0.82 米、西 0.80 米，残高 0.35 米，朽木厚 0.10 米，内置 40 岁左右的男性骨殖，亦为仰身直肢。^[13] 这个死者左手握有宣、平五铢 2 枚，颈椎骨的右下侧也置宣、平五铢 1 枚(图 10)。放置男性尸体的木棺，显然厚重得多。从放置位置看，男棺当是后来瘞入的(图 11)。

成套的随葬陶器，置于双棺之前。它们的种类、器形(图 12)、数目、尺寸、制法，可见表 1。

此外，在北棺前方、鸛瓶的北侧，发掘时还见到一件漆碗和两件漆耳杯。因只见印痕，未录入墓葬平面图。

此墓时代，据中原地区的资料比较，可定为西汉晚期。主要根据为三点：第一，墓内出土的三枚五铢，都是宣、平时期的；第二，随葬陶器中，东汉墓中常见的长方榼、酒尊、勺、耳杯、案、猪圈、鸡、狗等物，一件也未出现；第三，这种没有棺床的长方形砖券墓，按其平面形别，正是西汉晚期流行的形式。唯一可引起疑惑的是其墓顶。用扇形砖砌成横券顶墓，过去所知，流行于东汉。但此墓的扇形砖，远比中原地区东汉时期的扇形砖为短窄，形状有别，而且，东汉横券顶墓的墓室平面大都作横长方形，即使是竖长方形的，一般也比此墓高大。综合上述诸点，可以看出，仅就扇形砖和横券顶而言，可以把它在这一地区的出现时间，提早到西汉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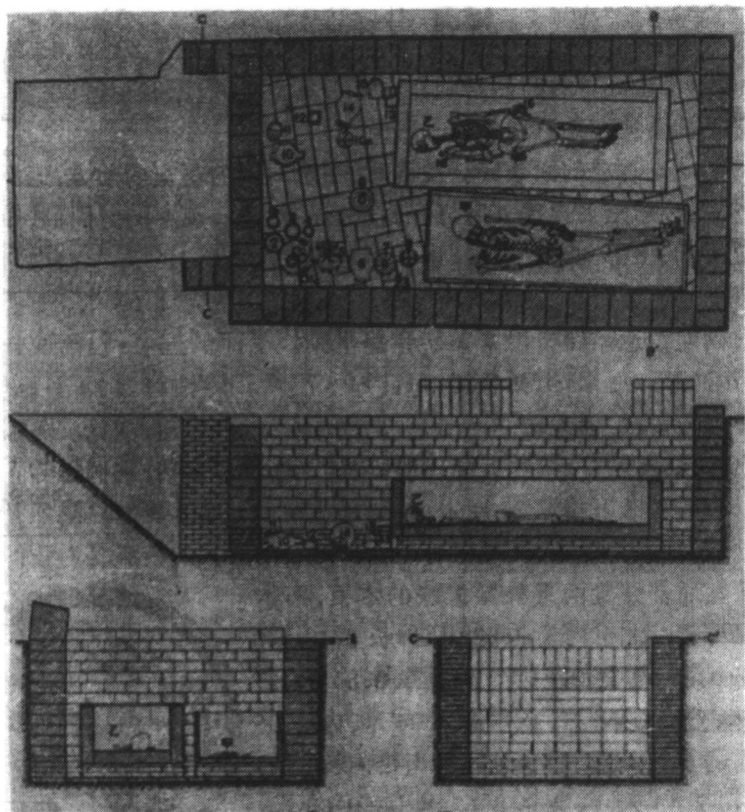


图 11 麻弥图庙 1 号墓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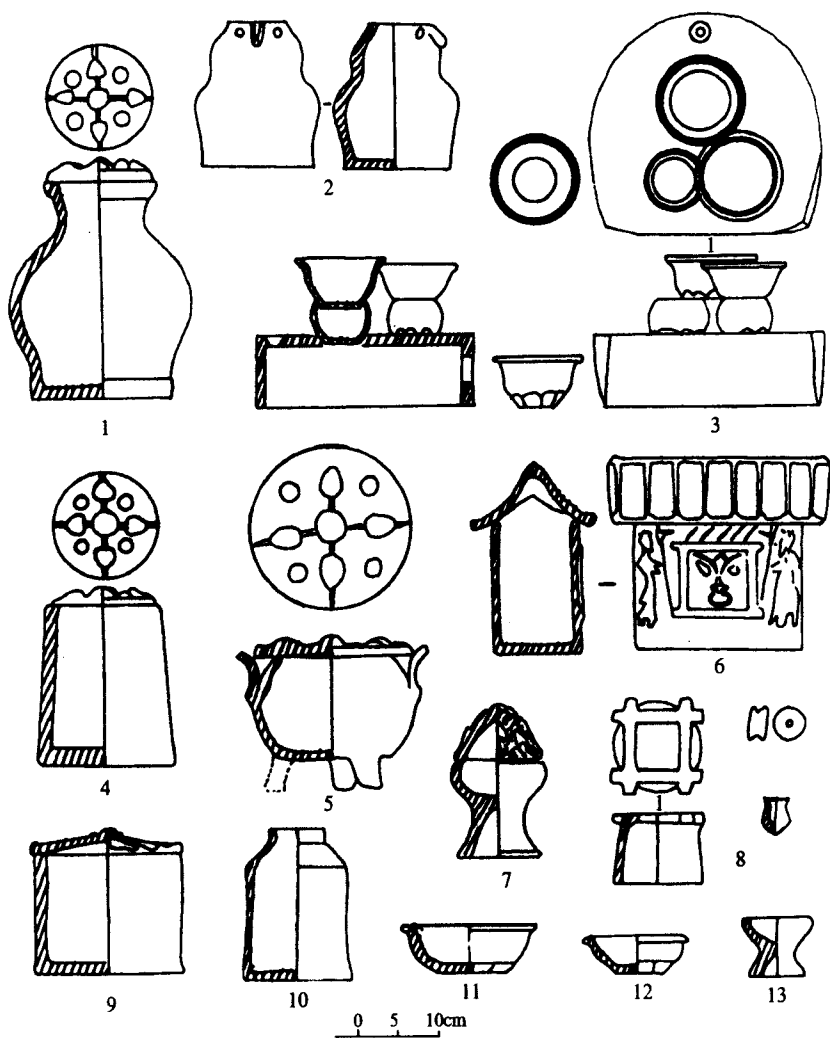


图 12 麻弥图庙 1 号墓出陶器

1. 壶 2. 鸚瓶 3. 灶 4. 桶形器 5. 鼎 6. 仓房 7. 熏炉
8. 井、掩护及汲瓶 9. 囿 10. 瓶 11. 盆 12. 盘 13. 灯

表 1

器名	器号	尺寸(单位:厘米)	制法	图号
鼎	5	通盖高 16.1, 通耳高 14.7, 口高 14, 口外径 12, 口内径 10.2, 腹径 17.6, 腹径高 9.6, 底径 10.5, 足高 3.2, 盖径 16.2	鼎身轮制, 耳、足模制后接。盖模制	93, 5
壶	6	通盖高 25.1, 高 23.1, 口外径 11.8, 口内径 10, 底径 15, 腹径 19.8, 腹径高 9.4, 盖径 11	轮制。底后接。盖模制	
壶	10	通盖高 26.8, 高 24.8, 口外径 12, 口内径 10.2, 底径 14.5, 腹径 19.2, 腹径高 15.4, 盖径 11.2	同上	
壶	14	通盖高 27.5, 高 25.7, 口外径 11.8, 口内径 10.1, 底径 14.3, 腹径 19.2, 腹径高 15.4, 盖径 11.2	同上	93, 1
鬲	7	通盖高 14.8, 口高 12.5, 口外径 15.7, 口内径 14, 底径 16, 盖径 16.8	同上	93, 9
器名	器号	尺寸(单位:厘米)	制法	图号
仓房	13	通盖高 20, 盖长 23, 身长 17.4, 身宽 9	模制	93, 6
灶	1	通釜甑高 15.3, 灶身高 8.2, 长 23, 宽 24	模制。釜、甑轮制, 底后接	93, 3
井	12	高 7.4, 井口 4.7×5.2, 井栏 10×10, 底外径 9.7, 底内径 7.8, 汲瓶高 4, 辘轳径 3.5, 孔径 0.7, 厚 0.9	模制, 井口与井甃分别做出后拼接。汲瓶与辘轳手制	93, 8
桶形器	8	通盖高 18.6, 高 16.8, 口外径 12.1, 口内径 10.2, 底径 13.8, 盖径 11.2	轮制, 底后接, 盖模制	93, 4
鸭瓶	9	高 15.4, 口外径 5.9, 口内径 5, 底径 12	轮制, 底后接	93, 2
瓶	15	高 15.5, 口外径 6, 口内径 5.2, 肩径 10.2, 底径 12.3	同上	93, 10
熏炉	11	通盖高 15.9, 身高 9.9, 盖高 5.3, 口径 8, 座径 9.3	炉身轮制, 盖模制	93, 7
灯	4	高 6, 口外径 7.4, 口内径 6.4, 足径 7.2	轮制	93, 13
盘	3	高 3.2, 口外径 11.9, 口内径 10, 底径 5	轮制, 底后接	93, 12
盆	2	高 4.8, 口外径 14.9, 口内径 13, 底径 6.2	同上	93, 11

(四) 汉代烽燧遗迹

我们发现的一系列的汉代烽燧遗迹,是在阴山山谷区域。

形势险峻的阴山山脉,使活动在漠北的匈奴人,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內,只能通过若干山谷,才可进入河套地区。从而,汉代政府往往在这些通道之处设置许多重要的城塞。西汉元帝时,郎中侯应曾说到,在阴山一带汉武帝时建立城塞的情况。^[14]侯应又具体地说道:“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15]侯应所说的“以土垣”而起的城塞,自本世纪初以来,在居延至敦煌一带的河西走廊中,已有不少的发现;所谓“因山岩石”所筑的城塞,大约便是我们这次所见到的。

从乌兰布和北部越过阴山走向漠北的通路,比较捷近易行的,首推保尔浩特古城西北约 20 公里处的哈隆格乃山谷。在它东边约 17 公里处,还有另外一个山谷,名大坝沟,在十万分之一的航空照片上,可见到它在人口 20 公里左右后,即与哈隆格乃山谷会合,乃是前者的一个最大的支沟。

遗迹是沿着这两条山谷以及两谷之间的阴山南麓阶地上分布的,正好处在汉代屠申泽的外缘(屠申泽的复原位置见图 2)。它们的大概布局是:在山谷之口修筑石城,约即障尉所守的“障”;在山谷之中,又据地形的高低曲折,相当密集地修筑了一系列的石筑烽台,也就是汉代所谓的亭隧。在两谷之间,于阴山的南麓阶地上,也设有同样形式的烽台。

哈隆格乃山谷,据传长达 50 余公里。哈隆格乃与大坝沟两谷之间的距离为 17 公里左右。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内进行全面调查并作较准确的记录,不是这次工作所能担负的。我们前后仅仅能用不足三天的时间,大致观察了部分遗迹。总计所见遗迹共 13 处,大体可分为两组,统一编号为 I—Ⅺ号遗迹(图 13)。其间遗漏未见或记录有误之处,恐在所难免。

第一组:哈隆格乃山谷的烽燧遗迹

调查时在哈隆格乃山谷中走过了 10 公里左右。在这段路程内,总共见到遗迹 11 处,包括石城 1、烽台 9、石墙 1。

(1) I 号石城——汉鸡鹿塞废墟^[16] 这是一座方形小石城,位于山谷入口处西侧的一级阶地上。阶地高出谷底约 18 米。石城紧挨河谷的陡壁修起。在其南、北两垣外,都有一段东西向的被山水冲蚀出的小斜沟,它们

正好成为从谷底登上石城的天然梯道。很明显,当初选择石城所在地的位置时,充分注意到了瞭望、防守、传递信息和出入方便等条件(图 14)。

石城正方形。正南北向。每边长 68.5 米。墙上端厚约 3.7 米,下端基部厚约 5.3 米。残高一般在 7 米左右,最高处为 8 米。它的修筑法,是在两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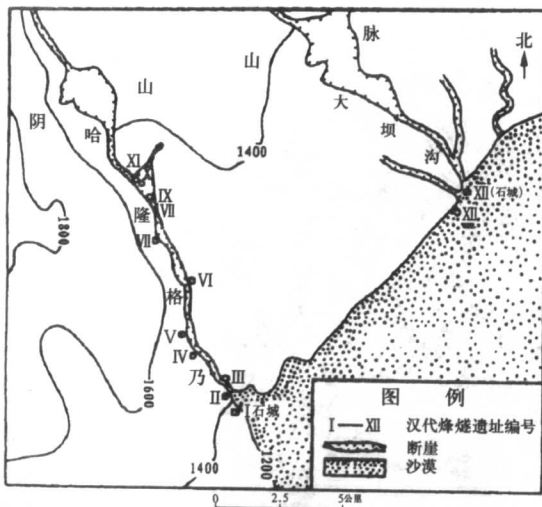


图 13 阴山哈隆格乃山谷与大坝沟一带汉代烽燧遗址分布示意图

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等天然大石块砌起,中间填以较小的石块和砂子。整个墙垣的外表,垒砌整齐,保存尚好(图 15)。

城门只一个,位于南垣的中部,宽约 3 米。引起我们很大兴趣的是城门缺口外面的另一道长方形小围墙。这道小围墙南北长 14 米、东西长 20.5 米,东墙北端有一宽约 2.5 米的缺口,可供出入。在城的四角,还都筑有向外突出的类似后代的“马面”。

进入城门以后,还见到一道紧贴南垣东半部内壁砌起的斜坡形磴道,从地面通到城垣顶部。磴道已部分坍塌,但原来的形状,还大体可辨(图 16)。

城圈内外,见到少量的汉代绳纹砖、绳纹瓦和灰色陶片。后代物品,只有很少



图 14 I 号石城全景



图 15 I号石城南垣内侧的西半部

的牧民所遗的现代酱釉瓷片。在这一地点,周围 20 公里之内,除掉同类性质的烽燧遗址以外,再无其它汉代遗址,又少现代人烟,这些汉代的砖、瓦、陶片,显然不会是后人从它处移入的。所以这些极其残破的碎片,虽然是地面遗存,却足以成为推断石城修筑时代的重要依据。

(2) II—X号烽台 石城以北山谷的两侧,在长约 10 公里的范围内,总共见到 9 座方形或长方形的烽台,也都是用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的石块砌成。各烽台之间的距离不一,大体言之,每逢山谷有曲折处,一定设有烽台,而在有支出的歧道处,所设烽台较密。

II号烽台是在上述石城以北的第二个山峰顶上。III—VII号烽台是在山谷两侧较低的阶地上。VIII—X号烽台则又是位于山峰之巅。这些山峰,山高路险,登临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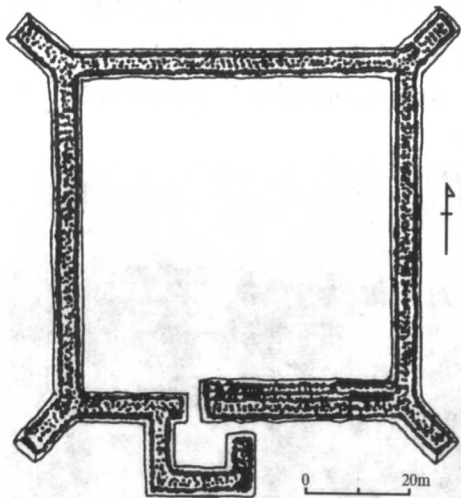


图 16 哈隆格乃山谷南口石城(汉鸡鹿塞故址)平面略图

在这 9 座烽台中,调查时登上过的只有 IV、V、X 号三处。IV 号仅剩石砾一堆,已全部坍塌,连范围都很难分清。V 号南北长约 18 米、东西宽约 12 米,亦已大部倒圮。X 号及其他未登上的烽台,则石壁犹存,从遥望所见,保存较好,尺寸相近。

X 号烽台位于山谷东侧的峰顶,高出谷底约 100 余米,山道峻险。烽台顺山谷的走向而设,四周有石墙,略似一小型堡垒。西墙长约 6.3 米,走向为 290° ;北墙长约 7 米,走向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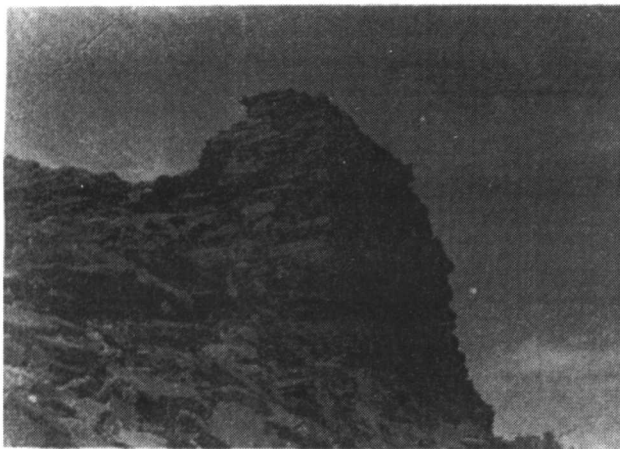


图 17 X号烽台(自东向西摄)

20°。在南端外(斜向东方),还延伸出一段长约 10 米的石砌走道(图 17, 18)。

X号烽台以南的相邻的两个山峰上,还设有另外两座烽台,即Ⅷ与Ⅸ号。在这一地段,前后左右有 3 道支出的歧谷,控制这样复杂的地形,一

处烽台显然是不够的,这 3 座烽台恐怕是同时并存的(图 19)。

(3) XI号石墙 位于X号烽台以北 200—300 米处,它横贯在山谷东侧的阶地上,长约 25 米、宽约 3 米。未见其他建筑物遗迹,但却拣到过汉代的陶片。

第二组:大坝沟区域的烽燧遗迹

大坝沟山谷的形势,与哈隆格乃极其相似。调查时仅仅到达了它的入口处,勘察了谷口西侧的一座石城,即Ⅻ号遗迹。估计在山谷之内,也会有一系列的烽台。此外,在石城以西约 2—3 公里处的山麓阶地上,还遥遥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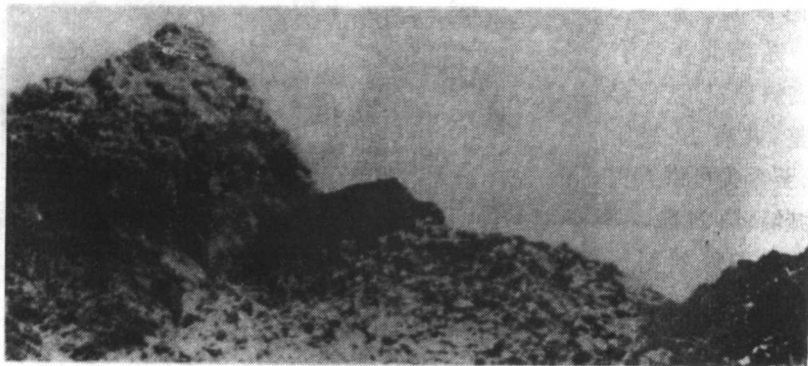


图 18 X号烽台(自南向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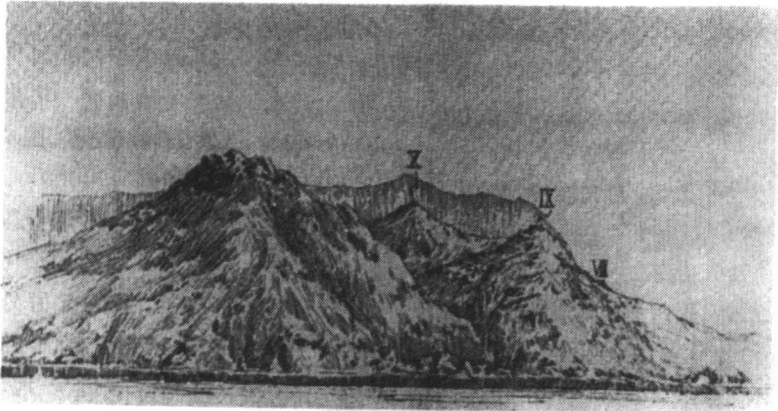


图 19 哈隆格乃山谷Ⅶ—Ⅹ号汉代烽台形势图

到一座烽台，即Ⅷ号遗迹，形状略同前述烽台。在这两谷之间的阴山南麓地区，由于未曾沿线观察，是否也有一系列的烽燧遗址，自成一组，尚不可知，故现在暂将这两处遗迹，并在同一组内来叙述。

Ⅹ号石城是在二级阶地上。北边即为高耸的高峰。它所处的地形情况，与哈隆格乃Ⅰ号石城，几乎一样。

石城正方形。方向为 339° 。每边长 22.5 米。石墙内外都是用 20—40 厘米的花岗岩和花岗片麻岩石块砌起，上宽 3.9 米、基宽 4.4 米、残高最高处为 5.6 米(图

20)。南墙中部有一城门缺口，宽约 3 米。东墙北半部有石砌斜破磴道，保存完整，共有 18 级阶梯，至今犹可供人直上城墙(图 21)。

城内采集到的汉代陶、瓦片，是其修筑年代的标志。这座石城，不像哈隆格乃石城那样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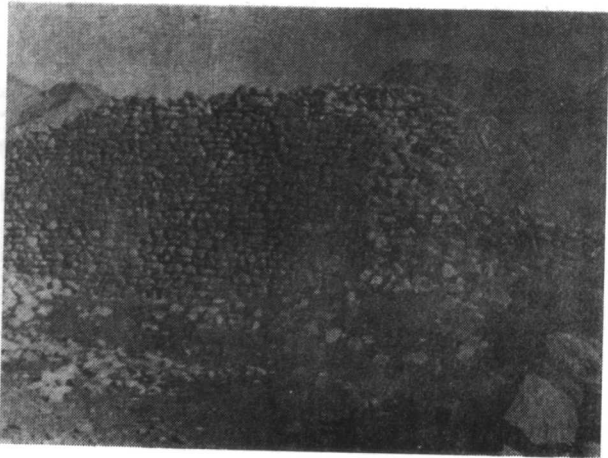


图 20 Ⅹ号石城北垣(自东北向西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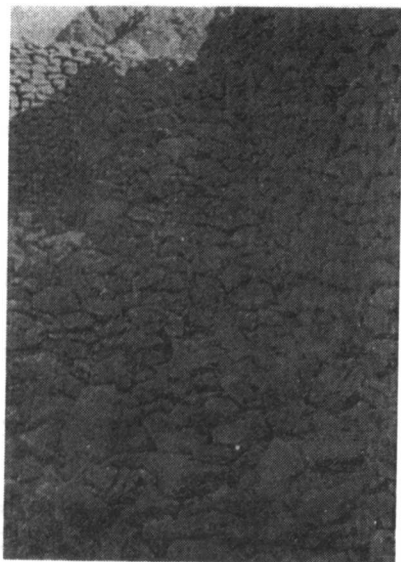


图 21 Ⅱ石城东垣的石砌磴道(自南向北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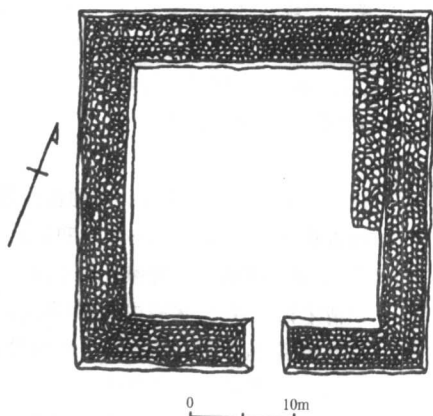


图 22 哈隆格乃山谷大坝沟南口小石城平面略图

角设有“马面”，但是在它的南墙外，却多出一道围绕成平面呈横长方形的薄石墙。这道外围石墙，东段长约 38.5 米、南北长约 25.5 米、厚约 1.3 米，在其南垣中部和东垣南部，各有一宽约 1.6 米的缺口。它很像过去居延地区发现的障外的坞墙。但据调查时所见，这道外圈石墙，石块色泽略新，有可能是后代牧民加筑^[17]，故测绘此城平面图时，没有把它测入(图 22)。

综观上述烽燧遗迹，可以估计，汉代在这地区所设的城塞，只在一些山谷通道及其附近，设置一系列的石城和石筑烽台。这是因为高峻的阴山和面积广大的屠申泽本来就是一道自然的屏障。

绵亘在乌兰布和沙漠西北部的阴山山脉，还有通道多处。在那些地区，很可能也有同样性质的烽燧遗迹。我们深切地希望将来能有人对这一地区的汉代城塞遗迹，进行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

(原载《考古》1973 年第 2 期；收入氏著《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

注 释

- [1] 此文系与北京大学考古系俞伟超合写。
- [2] 关于三城名称的考定,见作者等所写《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
- [3] 如《史记》中的《河渠书》、《平准书》;《汉书》中的《地理志》、《沟洫志》、《匈奴传》;《后汉书》中的《南匈奴传》等。
- [4] 见《后汉书·南匈奴传》。
- [5] 见《汉书·匈奴传》。
- [6] 过去一般认为乌兰布和北部的流沙是从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吹来的,故俗称巴丹吉林沙漠为“母亲”,乌兰布和沙漠为“儿子”。
- [7] 卷三,思贤讲舍刊王先谦合校本,页四。
- [8] 如清末杨守敬作《水经注图》即如此。
- [9] 按此所谓“南河”,即今后套以南的黄河主流。当时黄河主流,则沿今后套以北的五加河,傍阴山南麓东去。
- [10]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在1957年以后,曾先后来此调查汉城与汉墓群。其中,布隆淖古城的调查,曾经在《1957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古代文化遗址及墓葬的发现情况简报》一文中提及,载《文物》,1961年,第9期。
- [11] 法国奥伦子爵(d'ollone)所写的《三道河游历记》中,有下列的记述:“(1908年10月)我决定从定远营子到了三道河天主堂,……早在1905年,公爵莱斯坦(Lasdain)和步明世(De Boeck)神甫,在离三道河有三天路程的旷野里,发现了一个被沙漠湮没的古城痕迹,……当时另一个传教士,叫冯学渊(Van Havere),……他很慷慨地领我到这个地方,……我们挖掘古城保尔浩特即土城子的工作,由一小队人,进行了十五天,结果令我失望的是没有得到一点文字记录,但是我见到一大堆杂物、家具、钱币、箭头等地下埋葬的东西。可是埋葬死人的方式是使人感兴趣的,就是把尸体放在瓮中,然后把瓮埋在坟墓里。”原载 *Les Derniers Barbares*, 349—351号,1911年,巴黎。
- [12] 参阅吴荣曾:《内蒙古呼和浩特塔布秃村汉城遗址调查补记》,载《考古》,1961年,第6期。
- [13] 人骨架的性别、年龄是吕遵涛同志帮助鉴定的。
- [14][15] 《汉书》,卷九四下,百衲本,《匈奴传》。
- [16] 《汉书·地理志》“朔方郡麻浑城”条下注:“有道西北出鸡鹿塞。”石城位置与此记载方位正合。详见《乌兰布和沙漠的汉代垦区》“五、鸡鹿塞石城的发现”。
- [17] 调查时,石城内外积存了很厚的羊粪,故知已多年被牧民作为羊圈使用。

参 考 论 著

1. 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文物》1973年第1期。
2. 赵永复:《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 朱士光:《内蒙城川地区湖泊的古今变迁及其与农垦之关系》,《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4. 马正林:《人类活动与中国沙漠地区的扩大》,《陕西师大学报》1984年第3期。
5.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谭其骧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 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
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

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原因,一般认为要归功于王景高超的治黄技术。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消弭黄河下游水害的决定因素是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黄河下游决溢改道的原因在于中游的来水与泥沙量,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对下游水患起决定作用的是,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河上游两个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及由此带来的水土流失程度。文章梳理了先秦两汉及以后各个时期这两个区域的生产方式及相应的生产人口构成,指出,黄河水患是随着这两个地区由牧转农带来的原始植被的破坏和水土流失而开始的,并随着农业生产和农业人口的所占比重的变化而变化。黄河在东汉以后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原因在于上述两个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农业为主转变为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

谭其骧(1911—1992),浙江嘉兴人。生前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长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中国历史研究和历史地图的绘编,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对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许多重要问题,尤其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上,做出重大贡献。

—

提起黄河,人人都知道它在解放以前是一条灾害性很严重的河流,经常闹漫溢、决口、改道。这是历史事实。但从整个历史时期看来,黄河水灾的频率与严重性并不是前后一律的。我在1955年5月为中国地理学会所作的一次题为《黄河与运河的变迁》的讲演词⁽¹⁾里,已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在那篇讲演词里,我把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直到解放为止全部黄河历史,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前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并且越到后来闹得越严重。同是这条黄河,为什么前后情况大不相同?我把原因归之于整个流域内森林、草原的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湖泊的逐渐被淤废。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这种看法基本上不错。可是尽管不错,却解决不了黄河史上一个很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几千年内,黄河的灾害并不是一贯直线发展,而是中间有过一个大曲折的;森林与草原既然在逐渐被破坏,沟渠、支津与湖泊既然逐渐在被淤废,那么黄河的灾害按理应该是一贯直线发展的,何以会中间出现大曲折呢?在那篇讲词里,我只是含糊笼统地说河患前期少而后期多,所以乍听起来,似乎并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只要我们把前后二期黄河的决溢改道稍稍具体排比一下,马上就可以发现:前期的灾害诚然比后期少,但在前期本身范围内,显然并不是越到后来闹得越凶。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呢?说老实话,当时我并不能解答这一问题。

现在让我们先把唐以前即前期黄河决溢改道的具体情况叙述一下。在这一期中,又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从有历史记载即殷商时代起,到秦以前。在这一千几百年的长时期内,关于黄河决溢改道的记载很少。商代屡次迁都,过去有人认为与黄河决溢有关;实际上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无充分论据。西周时代,也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春秋时代有一次改道,就是周定王五年那一次⁽²⁾,通常称为黄河第一次大改道。战国时代溢了一次⁽³⁾,决了三次⁽⁴⁾;而三次决口都不是黄河自动决,都是在战争中为了对付敌人用人工开挖的。这时期河患记载之所以如此之少,一方面应该是由于上古记载遗漏,一方面也是由于那时地广人稀,人民的耕地居处一般都选择高地,虽有决溢不成

灾害之故。再有一方面也不容否认,那就是其时森林、草原、支津、湖泊还很多,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也确乎不会轻易决口改道,除非是遇到特大洪水。

第二期,西汉时期。从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到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止180年中,黄河决溢了十次之多,其中五次都导致了改道,并且决后往往听其漫流,历久不塞。要是决后即塞,从当时情况看来,决溢次数势必更多。决溢所造成的灾害很大,泛滥所及往往达好几个郡,好几十个县,坏官亭民居以数万计,浸灌良田至十余万顷。当时下游濒河十郡,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数千人,岁费至数千万。^[5]可见西汉一代的河患是很严重的。因而也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司马迁就写了《河渠书》,班固就写了《沟洫志》。这两篇书的内容虽不是完全讲黄河,但主要是讲黄河;从篇后的“太史公曰”和“赞”看来,作者载笔的动机也显然是有感于河患的严重。

若是单把第一和第二两期比较起来看,虽然中间的变化太大,未免觉得有点突然,毕竟还是合乎原来所假定的河患日趋严重的规律的,还不容易看出问题。问题显示在:到了第三期,河患却又大大地减轻了。

第三期,东汉以后。黄河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决后不塞,隔了将近六十年之久,到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才发动了数十万劳动人民,在我国历史上著名水利工程师王景的主持之下,大致按着始建国以来的决河经流,从荥阳(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到千乘(故城在今山东旧高苑县北)海口千有余里,大规模地予以修治。到第二年夏天,全部工程告竣。^[6](西汉以前黄河在今河北境内入海,此后即改由山东入海)从此以后,黄河出现了一个与西汉时期迥不相同的局面,即长期安流的局面。从这一年起一直到隋代,五百几十年中,见于记载的河溢只有四次^[7]:东汉一次^[8],曹魏二次^[9],西晋一次^[10];河水冲毁城垣一次,晋末^[11]。到了唐代比较多起来了,将近300年中,河水冲毁城池一次,决溢十六次,改道一次。^[12]论次数不比西汉少,但从决溢的情况看来,其严重程度显然远不及西汉。就是景福二年(893年)那次改道,也只是在海口地段首尾不过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总之,在这第三期800多年中,前500多年黄河安稳得很,后300年不很安稳,但比第二期要安稳得多。

在河患很严重的第二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上安流无事的第三期,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历史记载有所脱略吗?东汉以后不

比先秦,流传至今的文献极为丰富,有些小范围内的决溢可能没有被记录下来,较大规模的决徙不可能不见于记载。从《后汉书》到两《唐书》所有各种正史都没有河渠或沟洫志,这当然是由于自东汉至唐黄河基本上安流无事,无需专辟一篇之故;否则《史记》、《汉书》既然已开创了这一体制,后代正史皆以其为圭臬,决不至于阙而不载。再者,成书于东汉三国时的《水经》和北魏的《水经注》、唐代的《元和郡县志》中所载的黄河经流,几乎可以说完全相同,并无差别,更可以证实在这一时期内的黄河确乎是长期安流的。

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既然是事实,所有讲黄河史的人,谁也没有否认过,那么,我们要讲通黄河史,当然就有必要把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原因找出来。我个人过去一直没有找出来,因此在1955年那次讲演里只得避而不谈。前代学者和当代的历史学家与水利学家谈到这一问题的倒很多,可是他们的解答看来很难令人信服。诸家的具体说法虽不完全相同,着眼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着眼于王景的治导之法,都认为东汉以后黄河之所以“千年无患”^[13],应归功于王景的工程技术措施“深合乎治导之原理”。清人如魏源^[14]、刘鹗^[15],近人如李仪祉^[16],以及今人如岑仲勉^[17],都是如此看法。《后汉书·王景传》里所载关于王景治河之法,只有“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洫,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33个字。诸家为这33个字所作的解释,估计至少在万言以上。直到最近,1957年出版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的《人民黄河》,也还是如此看法。只是加上了这么一句:“当然,黄河在王景后数百年间“决溢次数少的原因可能还另有一些”。只说“可能”,并未肯定。到底另有一些什么原因,也未交代。

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于历史真实情况的。即令王景的治导之法确乎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治河工作者都远为高明(其实未必),他的工程成果顶多也只能收效于一时。要说是一次“合乎治导之理”的工程竟能使黄河长期安流,“功垂千载”,这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首先,这次工程的施工范围只限于“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即只限于下游;工程措施只限于上引33个字,这33个字用现代语概括起来,无非是整治河床,修固堤防,兴建水门。稍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都知道,黄河的水灾虽然集中于下游,要彻底解除下游的灾害,却非在整个流域范围内采取全面措施不可,并且重点应在中上游而不在下游;单靠下游的修防工程,只能治标,谈不上治

本。王景的工程正是一种治标工作,怎么可能收长治久安之效呢?其次,就是下游的防治工程,也必须经常不断地予以养护、培补、加固,并随时适应河床水文的变化予以改筑调整,才有可能维持久长。试问,在封建统治时代,有这个可能吗?何况,王景以后的东汉后期,不正是封建政权最腐朽无能的时代吗?东汉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不正是长期的割据混乱时代吗?在这样的时代里,难道有可能始终维持着一套严密而有效的河防制度吗?

工程技术因素说讲不通,那么,能不能用社会政治的因素来解释呢?我们不否认社会政治因素有时会对黄河的安危发生巨大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解放以前经常决口,甚至一年决几次,解放以后,就没有决过。过去还有许多人把五代、北宋的河患归罪于五代的兵祸,把金、元、明的决徙频仍推咎于宋金、金元间的战争,听起来似乎也还能言之成理。可是,我们能拿西汉来比之于解放以前,拿东汉来比之于解放以后吗?即使勉强可以说唐代的政治社会情况比西汉强,总不能说东汉、魏、晋、南北朝比汉、唐强吧?魏晋南北朝跟五代、宋金之际同样是乱世,为什么黄河的情况又截然不同呢?可见社会政治因素说同样讲不通。

前人并没有解决得了这个问题,而这又是一个黄河流域史里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对整个儿中国史而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二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从黄河下游决溢改道的根本因素讲起。稍有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降水量集中在夏秋之季特别是夏季,河水挟带大量泥沙,是黄河善淤善决的两个根本原因。近几十年来的水文实测资料又证明:决溢改道虽然主要发生在下游,其洪水泥沙则主要来自中游。因此,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中游,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中游去,看看中游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理条件是否有所不同,特别是东汉以后数百年间,比之前一时期和后一时期是否有所不同?

黄河中游上起内蒙古河口镇大黑河口,下迄河南秦厂沁河口。就河道而言,可分为三段:第一段,自河口至山西禹门口;第二段,自禹门口至河南陕县;第三段,自陕县至秦厂。就流域而言,相应可分为三区:第一区,包括内蒙古河套东北角的大黑河、沧头河流域,和晋西北、陕北东北

部、伊盟东南部的山陕峡谷流域；第二区，包括山西的汾水、涑水流域，陕甘二省的渭水、泾水、北洛水流域，和河南弘农河流域一角；第三区，包括豫西伊洛河流域，和晋东南沁丹河流域。

根据黄河沿岸各水文站近几十年来的实测记录，这中游三区跟下游水灾之间的关系大致是这样的：

一、洪水 下游发生洪水时的流量来自上游的向不超过 10%，90% 以上都来自中游。中游三区夏秋之际经常有暴雨，由于地面蓄水能力差，雨后立即在河床中出现洪峰。三区的暴雨都经常能使本段黄河河床里产生一万秒立方米以上的洪水。如两区或三区暴雨后所形成的洪峰在黄河里碰在一起，那就会使下游河床容纳不了，发生危险。而这种洪峰相遇的机会是很多的，尤以产生于第一、第二两区的洪峰相遇的机会为最多。

二、泥沙 情况与洪水有同有不同。同的是中下游河床中来自上游的泥沙很少。在流经陕县的巨量泥沙中，来自河口镇以上的只占 11%。在河口上游不远处的包头市，每立方米河水中的多年平均含沙量只有六公斤。不同的是中游三段河流的输沙量极不平衡。第一段由于该区地面侵蚀剧烈，干支流的河床比降又很大，泥沙有冲刷无停淤，故输沙量多至占陕县总量的 49%，河水的含沙量则自包头的 6 公斤到禹门口骤增至 28 公斤。第二段由于泾、渭、北洛的含沙量虽很高，但各河下游都流经平原地区，禹门口至陕县的黄河河谷也相当宽阔，有所停淤，故流域面积虽远较第一段为大，而输沙量反而较少，占陕县总量的 40%，河水含沙量到陕县增为 34 公斤。陕县是全河沙量最多的地点。此下的第三段，伊洛、沁丹各河的含沙量本来就比第一第二段各支流少，并且各河下游有淤积，黄河自孟津以下也有淤积，故输沙总量即不再增加。

如上所述，可见中游三区中，第三区对下游的关系比较不重要；它只是有时会增加下游一部分洪水，而并不增加泥沙。对下游水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第二两区；因为淤塞下游河道的泥沙，十之九来自这两区，形成下游暴涨的洪水也多半来自这两区。

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两区的水土流失情况，在于在整个历史时期内，这两区的水土流失是直线发展，一贯日渐严重化的呢，还是并不如此？

一地区的水土流失严重与否，决定于该地区的地形、土壤和植被。黄

河中游除少数山区外,极大部分面积都在黄土覆盖之下。黄土疏松,只有在良好植被保护之下,才能吸蓄较多的降水量,阻止地面经流的冲刷。植被若一经破坏,一雨之后,土随水去,水土流失就很严重。加以本区的黄土覆盖极为深厚,面蚀很容易发展成为沟蚀,原来平坦的高原,很快就会被切割成崎岖破碎的丘陵,水土流失也就愈益严重。所以历史上各个时期的水土流失严重与否,又主要决定于植被的良好与否。

历史时期一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又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生产活动,即土地利用的方式。如果人们以狩猎为生,天然植被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只要放牧不过度,草原即可经久保持,而要从事农耕,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原始草原予以斫伐或清除不可。

但同样从事农耕,其所引起的水土流失程度,却又因各地区的地形、土壤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就黄河中游第一、第二两区而论:第一区的河套东北角地区和第二区的关中盆地和汾、涑水流域,大部分面积是冲积平原和土石山区。冲积平原由于地势平坦,土石山区由于石厚土薄,不易形成沟壑,故开垦后所引起的水土流失一般比较轻微。第一区的山陕峡谷流域和第二区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地区,几乎全部是黄土高原或黄土丘陵;黄土深厚,地形起伏不平,故一经开垦,面蚀与沟蚀同时并进,水土流失就很严重。

由此可见,在这对黄河下游水患起决定性作用的中游第一、第二两区之中,最关紧要的又在于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地区;这两个地区在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情况的改变,是决定黄河下游安危的关键因素。

三

在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早期,即战国以前,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这二地区基本上应为畜牧区;射猎还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农业想必不会没有,但很不重要。这二地区与其南邻关中盆地、汾涑水流域在地理上的分界线,大致上就是当时的农牧分界线。在此线以南,早自西周以来,即已进入农耕时代;在春秋战国时代是以农为主的秦人和晋人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此线以北,迟至春秋,还是以牧为主的戎狄族活动地区;自春

秋中叶以至战国,秦与三晋逐渐并吞了这些地区,但畜牧仍然是当地的主要生产事业。产于晋西北今吉县石楼一带的“屈产之乘”^[18],在春秋时是有名的骏马。战国末至秦始皇时,乌氏倮在泾水上游的乌氏地方(今甘肃平凉县西北),以畜牧致富,其马牛多至用山谷来计量。^[19]

《史记·货殖列传》虽作于汉武帝时,其中关于经济区域的叙述则大致系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它把全国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四个区域,山西的特点是“饶材、竹、穀、鲈^[20]、旄、玉、石”,龙门碣石北的特点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当时所谓山西本泛指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上游西至黄河皆在其内。但篇中下文既明确指出其时“自汧、雍以东至河、华”的关中盆地是一个“好稼穡,殖五谷”的农业区域,可见此处所提到的“材、竹、穀、鲈、旄”等林牧业特产,应该是泾渭北洛上游及其迤西一带的产物,这一带在当时林牧业很发达。龙门碣石北的特产全是畜产品。碣石指今河北昌黎县北碣石山。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的龙门山,正在关中盆地与汾涑水流域的北边分界线上。可见自龙门以北的山陕峡谷流域,在当时是一个以畜牧为主要生产活动的区域。同传下文又云:“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天水陇西二郡位于渭水上游,北地郡位于泾水上游,上郡位于北洛水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下文又云:杨与平阳“西贾秦翟,北贾种、代。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慎伎,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故杨、平阳陈掾(犹言经营驰逐)其间得所欲”。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平阳在今临汾县西南;秦指关中盆地,翟指陕北高原故翟地;种、代在石北,“石”指今山西古县北石门山,“石北”约相当于现在的晋西北。这条记载生动地说明了当时晋西北人民的经济生活与风俗习惯。试和它的近邻晋西南汾涑水流域即当时所谓“河东”的“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一对比,很显然前者是畜牧射猎区的情况,后者是农业商业高度发展地区的情况。正由于石北跟河东是两个迥然不同的经济区域,因而通贾于这二区之间的杨与平阳二地的商人,能得其所欲,杨与平阳也就发展成了当时有名的商业城市。

《汉书·地理志》篇末朱赣论各地风俗,也提到了渭水上游的天水、陇西二郡“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泾洛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四郡“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

猎为先”，用以印证作于西周末至春秋初的《国风》秦诗中所描述的当地人民经常以“牛马田狩”为事的风气。这种风气并且还一直维持到“汉兴”以后，西汉一代的名将即多数出身于这六郡的“良家子”。

战国以前黄河下游的决徙很少，我以为根本原因就在这里。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年代，所以原始植被还未经大量破坏，水土流失还很轻微。

四

到了秦与西汉时代，这二区的土地利用情况就发生了很大变化。

秦与西汉两代都积极地推行了“实关中”和“戍边郡”这两种移民政策。“实关中”的目的是为了“强本弱末”。所谓“本”就是王朝的畿内，即关中地区；把距离较远地区的一部分人口财富移置到关中，相对地加强关中，削弱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借以巩固封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就叫做“强本弱末”。“实关中”当然主要把移民安顿在关中盆地，但有时也把盆地的边缘地带作为移殖目的地。例如秦始皇三十五年徙五万家于云阳^[21]，汉武帝太始元年、昭帝始元三年、四年三次徙民于云陵^[22]，云阳和云陵，都在今淳化县北，即已在泾水上游黄土高原范围之内。“戍边郡”就是移民实边，目的在巩固边防。当时的外患主要来自西北方的匈奴，所以移民实边的主要目的地也在西北边郡；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至为广泛，黄河中游全区除关中盆地、汾涑水流域以外都包括在内，黄河上游、鄂尔多斯草原和河西走廊地带也都包括在内，而其中接受移民最多的是中游各边郡和上游的后套地区。

秦汉两代“戍边郡”的次数很多，每次规模都很大。秦代是两次：

第一次，始皇三十三年，蒙恬“西北斥逐匈奴”，“取河南地”，“筑四十四县”，“徙适戍以充之”。^[23]这次移民历史记载上虽没有提到人数，既然一下子就置了几十个县，想来至少也得有几十万。所谓“河南地”应该不仅指河套地区即当时的九原郡，迤南的陕甘北部即当时的上郡和北地二郡，也应包括在内。其时蒙恬统兵 30 万，负责镇守北边，即经常驻扎在上郡。

第二次，始皇三十六年，“迁北河榆中三万家”^[24]。“北河”指今河套地区的黄河，榆中指河套东北阴山迤南一带。

这两次移民实边规模虽大，对边地的影响并不太大。因为始皇一死，蒙恬即被杀，接着就爆发了农民大起义，“诸秦所徙适戍远者皆复去”，匈奴“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25]但也不会毫无影响。因为“复去”的只限于“远者”，可见适戍在较近处的即未必复去。

此后约四十年，汉文帝听从了晁错的计议，又“募民徙塞下”。这次是用免罪、拜爵、复除等办法来劝募人民自动迁徙的，所收效果可能相当大，因而“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26]其时汉与匈奴以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西北）、肤施（今陕西榆林南）为塞，此线之南，正是泾洛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

此后又四十年，汉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复取河南地，恢复了秦代故土。就在这一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27]此所谓“朔方”，亦当泛指关中盆地以北地区即后来朔方刺史部所部上郡、西河、北地、朔方、五原等郡，而不仅限于朔方一郡。

此后元狩三年又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28]元鼎六年，又于“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29]陇西郡辖境相当渭水上游西至洮水流域，北地郡相当泾水上游北至银川平原，西河、上郡相当北洛水上游及山陕峡谷流域。“新秦中”含义与“河南地”略同。

此外，元狩五年又曾“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30]，很可能有一部分被迁到黄河中游一带。天汉元年“发谪戍屯五原”^[31]，五原郡辖境相当今河口镇上游包头市附近的黄河两岸。

这么多内地人民移居到边郡以后，以何为生？可以肯定，极大多数是以务农为本的。汉族是一个农业民族，凡汉族所到之处，除非是其地根本不可能或极不利于开展农耕，不然就不会不以务农为本。反过来说，若不是可能开展农耕的区域，也就不可能使大量的习惯于农业生产的汉族人民移殖进去。山陕峡谷流域、泾渭北洛上游及其迤北的河套地区，除鄂尔多斯草原西部外，就其地形、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而言，本是一个可农可牧的区域。而当时的统治者，也正是采用了“先为室屋，具田器”^[32]的措施来强迫或招募人民前往的。城郭的建立与人民的定居生活是密切联系着的，有了以务农为本的定居的人民，才有可能建立城郭，从而设置郡县。秦汉时代在这一带设置了好几个郡，数以百计

的县（西汉西河、上郡、北地、安定、陇西、天水六郡领县一百二十六，云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领县四十九。秦县确数无考，从始皇三十三年在河南地一次置县四十四推算起来，总数当不少于一百），也可以充分证明当地的人民主要是定居的农民（汉武帝后凡归附游牧族居于塞内者，别置属国都尉以统之，这一带共置有五个。一个属国的人口数估计不会比一个县多）。

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在初开垦时是很肥沃的，产量很高，因而当时的“河南地”又被称为“新秦中”。“新秦中”的得名不仅由于这一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接近秦中（渭水流域），主要还是由于它“地肥饶”、“地好”，在农业收成上也不下于秦中。苍茫广漠的森林草原一经开垦，骤然就呈现了一片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繁荣景象，这一事件显然引起了当时社会上普遍的注意，“新秦”一词因而又被引申作“新富贵者”——即暴发户的同义语，一直沿用到东汉时代。^[33]

正因为在这一带从事农业开垦的收益很好，所以垦区扩展得很快。汉武帝复取河南地初次募民徙朔方事在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到了20年后的元封年间，竟已“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34]。眩雷塞在西河郡的西北边，约在今伊克昭盟杭锦旗的东部。杭锦旗东部在今天已属农牧过渡地带，自此以西，即不可能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汉代的自然条件可能跟今天稍有不同，但差别不会很大，可见当时的垦区事实上已扩展到了自然条件所容许的极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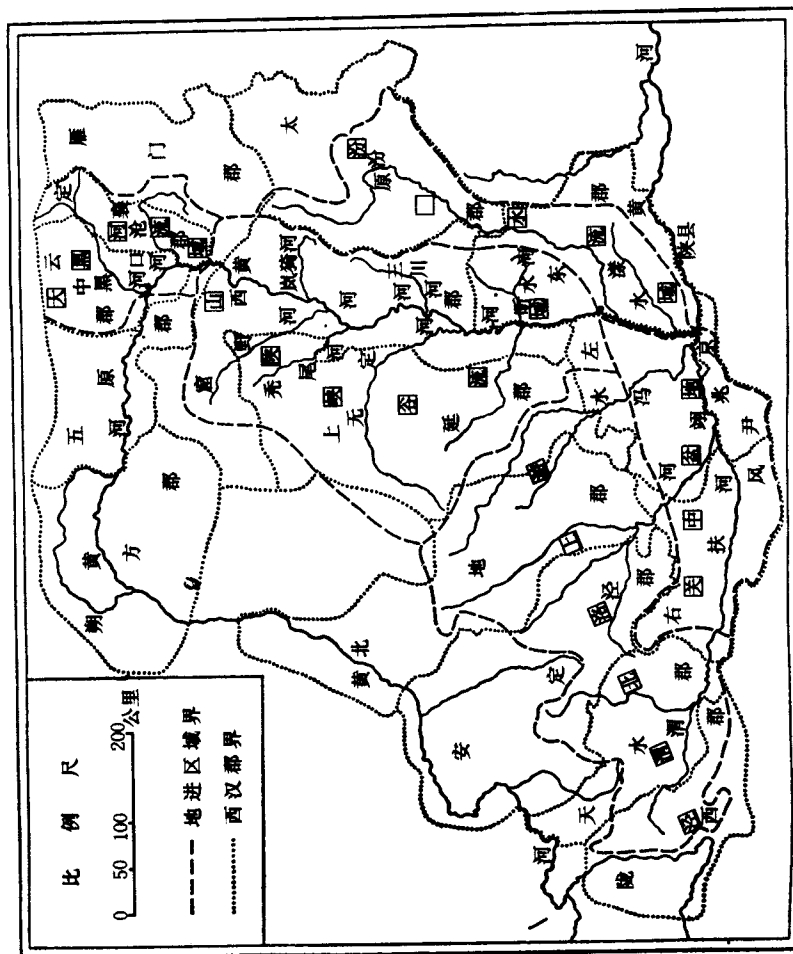
汉武帝以后至西汉末百年之间，这一带的人口日益增殖，田亩日益垦辟；尤其是在宣帝以后约70年内，匈奴既降，北边无事，发展得当然更快。兹将《汉书·地理志》所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时这一带各郡的户口数，分区表列如下页。

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户数各达二十余万，合计五十余万，口数各达百万以上，合计二百四十万，这在二千年前的生产技术条件之下，是很了不得的数字！试看自周秦以来农业即已高度发展，在当时又为建都所在，并在郑、白等渠灌溉之下，被誉为“膏壤沃野千里”的关中盆地亦不过五十余万户，二百多万口，就可以知道这两个户口数字对这两个新开发地区而言，是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了。

这二区从此以畜牧射猎为主变为以农耕为主，户口数字大大增加，

地 区		郡	户	口
黄 河 中 游	大黑河沧头河流域	云中、定襄	76862	336414
		雁门 1/4 ⁽³⁵⁾	18286	73363
	总数		95148	409777
	山陕峡谷流域	西河	136390	698886
		上郡 2/3	69122	404439
		河东 1/3	39482	160485
	总数		244994	1263760
	泾渭北洛上游	上郡 1/3	34561	202219
		冯翊、扶风 1/5	90295	350778
		北地、安定 3/4	80390	265484
天水、陇西 2/3		76223	332115	
总数			281469	1150596
关中盆地	京兆尹	195702	682468	
	冯翊、扶风 4/5	361183	1403114	
	总数		556885	2085582
汾涑水流域	太原 3/4	127398	510366	
	河东 5/6	194414	802427	
	总数		321812	1312793
黄河上游	河套地区	朔方、五原	73660	367956

乍看起来,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们若从整个黄河流域来看问题,就可以发现这是件得不偿失的事。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之下,开垦只能是无计划的、盲目的乱垦滥垦,不可能采用什么有计划的水土保持措施,所以这一带地区的大量开垦,结果必然会给下游带来无穷的祸患。历史事实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西汉一代,尤其是武帝以后,黄河下游的决徙之患越闹越凶,正好与这一带的垦田迅速开辟,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应;也就是说,这一带的变牧为农,其代价是下游数以千万计的人民,遭受了百数十年之久的严重的水灾。



两汉时期黄河中上游地区图

五

王莽时边衅重开，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的边郡，从此遭遇了兵连祸结的厄运。不久，内地又爆发了农民大起义和继之而起的割据战争。东汉初年统治者忙于对付内部问题，无力外顾，只得放弃缘边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徙人民于内地。匈奴遂“转居塞内”，“入寇尤深”，以致整个“北边无复宁岁”。一直到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上距王莽开边衅已四十年，才由于匈奴南单于的降附，恢复了缘边八郡，发遣边民“归于本土”。^[36]但自此以后，边郡的建制虽是恢复了，西汉时代的边区旧面目却再也没有恢复过来。终东汉一代，这一带的风物景象，跟西汉迥不相同。

就在恢复缘边诸郡这一年，匈奴南单于率领了他的部众四五万人入居塞内；单于建庭于西河的美稷县（今伊克昭盟准噶尔旗），部众散居在西河、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等郡。到了章帝、和帝时代，又有大批北匈奴来降，分处北边诸郡。永元初年南单于所领户至三万四千，口至二十三万七千，胜兵五万；新降胡亦多至二十余万。已而新降胡叛走出塞，但不久还居塞内者仍以万计。^[37]除匈奴外，东汉时杂居在这一带的又有羌、胡、休屠、乌桓等族，其中羌人为数最多。西汉时羌人杂居塞内的只限于湟水流域。王莽末年和隗嚣割据陇右时内徙者日多，散居地区日广。东汉建武、永平中又屡次把边塞的降羌安插在渭水上游的陇西、天水 and 关中盆地的三辅。此后日渐滋息，中叶以后，除陇西、汉阳（即天水）、三辅外，泾洛上游和山陕峡谷流域的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亦所在有之。当时在黄河中上游的羌人共有八九十种之多，每种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顺帝时单是“胜兵”即“合可二十万人”，可见总人数至少也得有五六十万人，比匈奴还要多些。胡、休屠、乌桓等人数较少，但他们有时也能聚众起事，攻略城池，那么每一股总也得有那么几千或万把人。把所有这一带的边疆部族合计起来，总数当在百万左右。

这么多人居塞内的边疆部族以何为生？当然因部族与所处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无疑是以畜牧为主。匈奴恐怕根本没有什么农业生产可言。《后汉书》里记载那时汉与匈奴之间或匈奴内部的战争，经常提到的战果除斩首或首虏若干人外，只是说获马、牛、羊若干头，

从未提到有什么其他财物。说到匈奴的居处也都是用的庐落或庐帐,而不用室屋或庐舍等字样。正因为他们入居塞内后仍然保持着在塞外时的原有生活方式,所以才有可能在一旦被迫举起反抗汉朝统治的旗帜后,往往就举部出塞,甚或欲远度漠北。可以设想,要是农业对他们的经济生活已经占有一定比重的话,那么他们在反汉后就不可能再想到走上回老家这条路了。羌人部落中是存在着农业生产的,《后汉书·西羌传》里曾四次提到羌人的禾谷。但同传提到马、牛、羊、驴、骡、骆驼或畜产的却多至数十次,每一次的数字少者数千或万余头,多者至十余万头或二十余万头;《段熲传》末总结他对镇压羌人起义的武功是凡百八十战,斩三万八千六百余级,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余头。可见畜产是羌人的主要财富,牧业在他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远过于农业。历次羌人起义之所以使东汉朝廷无法应付,重要原因之一是“虏皆马骑”而汉兵“以步追之”,所以汉羌之战和汉匈之战一样,基本上也是农业族与游牧族之间的战争。

以畜牧为主的边疆部族有这么许多,现在再让我们来看看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有多少?

西汉边郡汉族人口之所以能够繁殖,原因有二:(一)移入了大量的内地人口;(二)边境长期安宁无事。这两个条件东汉都不存在。首先,东汉从没有推行过移民实边政策,就是在建武年间恢复边郡之初,也只是发遣原有的边民归于本土而已。而原来的边民在经历了40年之久的流离死亡之余,能够归于本土的当然是不多的。其次,通东汉一代,尤其是安帝永初以后,大规模的“羌乱”和较小规模的匈奴的“反叛”,鲜卑、乌桓的“寇扰”,几乎一直没有停止过。因此,东汉边郡的汉族人口,不仅不可能日益繁息,相反,倒很可能在逐渐减少。《续汉书·郡国志》所载的是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的户口数,其时还不过经历了第一次大羌乱(107年至118年),第二次大羌乱(140年至145年)才刚刚发生,已经少得很可惊了。兹将黄河中游及河套诸郡户口表列于下,并用括号附列西汉户口以资比较。

据表,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至少在边区十郡范围之内,汉人已变成了少数族,因为十郡的总口数不过32万,而这一带正是总数在百万左右的羌胡等族的主要分布区。(二)比之西汉的编户,各郡全都减少了好几倍,甚至一二十倍,而减少得最厉害的,正是与黄河下游河道安危关系

郡名	领县	户	口	
朔方、五原	16 (26)	6654 (73660)	30800 (367956)	边区
云中、定襄	16 (23)	8504 (76862)	40001 (336414)	
西河、上郡	23 (59)	10867 (240073)	49437 (1305494)	
北地、安定	14 (40)	9216 (107186)	47697 (353982)	
汉阳、陇西	24 (27)	33051 (114334)	159775 (498172)	内地
京兆、冯翊、扶风	38 (57)	107741 (647180)	523860 (2436360)	
河东、太原	36 (45)	124445 (406759)	770927 (1643400)	

最为密切的西河、上郡、北地、安定等郡。

第一次大羌乱时，汉廷曾内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寄治于汉阳、三辅，至延光、永建时乱定复归本土。第二次大羌乱爆发后，又徙上郡、北地、安定寄治三辅，朔方寄治五原，并将西河郡治自平定（今伊克昭盟东胜县附近）南徙离石（今山西离山县）。此后战乱日亟，除安定外，其他四郡就一直未能迁还旧治。可见自永和五年以后，这一带的户口不会有所增加，只会更加减少。

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以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

六

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变农为牧，在东汉末年以前，还不过是开始阶段；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才是这一变局的成熟阶段。

自永和以来，东汉政权对这一带边郡的统治，本已摇摇欲坠。勉强维持了四十多年，等到灵帝中平中内地的黄巾大起义一爆发，终于便不得不

把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七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干脆予以放弃（同时又放弃了桑乾河上游代郡、雁门二郡各一部分）。汉政权一撤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在汉廷与羌胡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从而制造了尖锐的民族矛盾情况之下，汉民是无法再在这些地区留住下去的。于是“百姓南奔”，出现了“城邑皆空”、“塞下皆空”^[38]的局面。其实“城邑皆空”应该是事实，整个儿“塞下”是不会空的，只是由原来的胡多民少的王朝边郡，进一步变成了清一色的羌胡世界的“域外”而已。所以在此后不满十年的献帝初平中，蔡文姬被虏入胡，竟在她的《悲愤诗》里，把她途经上郡故地说成是“历险阻兮之羌蛮”，把西河故地匈奴单于庭一带的景象说成是“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

自此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这一局面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极少变动。晋西北虽在曹魏时即已恢复了今离山县以南地区的郡县建置，但其地迟至南北朝晚期，仍系以畜牧为生的“山胡”根据地，汉人想必只占少数（详下文）。陕北则直至十六国的前、后秦时代，才在北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其时上距汉末撤废边郡已二百余年。实际二秦的版图所届远在洛川、中部之北，其所以不在那里建置郡县，正反映了生活在那里的极大多数人民，还是居无常所的牧民，没有什么村落邑聚，因而也就不够条件设置郡县。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就在这一带建立了夏国，还是立郡县，只有城堡；直到后来取得了关中盆地，夏国境内才算有了郡县。

当然在这条线以东、以南，那时并不是就没有牧业。事实上自东汉末年以来，此线以东的今山西中部南部，也变成了匈奴的杂居地；此线以南的关中盆地的氏羌人口，只有比东汉末年以前更多。牧业的比重，想必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毕竟更适宜于农耕，汉族人口毕竟还占着多数，因此，羌胡等族人居到这里以后，往往很快就会弃牧就农。匈奴以黄巾起义时人居太原一带，后五六十年，在曹魏末年，当地的世家豪族即“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39]，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晋末五胡起事首领之一上党羯人石勒，出身于“为人力耕”的雇农，也是一个例子。^[40]（石勒又善于相马，可见仍不脱游牧族本色）所以这些地区尽管在民族成分上杂有不少羌胡，但在经济上则始终是以农耕为主的区域。

同样,在这条线以西、以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农业。一方面是汉人有时会被逼徙到这里。例如赫连勃勃破关中,就曾虏其人筑城以居之,号吴儿城,在今陕北绥德县西北。^[41]另一方面是羌胡等族当然也有一部分会渐渐转业农耕。例如赫连勃勃的父亲卫辰在苻秦时代曾经遣使“求田内地”^[42],可见农业在卫辰统治下的部族经济中已占有一定的重要性。但迁来的汉人为数既不多,又由于这里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跟汾水流域关中盆地大不相同,羌胡等族的转业农耕极其缓慢,所以在北魏道武帝初年击破卫辰时,见于历史记载的俘获品仍然是“马牛羊四百余万头”^[43],而没有提到粮食。后四十余年,太武帝灭夏,将陕北陇东等地收入版图,仍然是“以河西(指山陕间的黄河以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44]可见这一区域直到入魏之初,上去汉末已二百四十余年,畜牧还是当地的主要生产事业。

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是一个政治最混乱、战争最频繁的时代,而在黄河史上的魏晋十六国时代,却偏偏是一个最平静的时代。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来,原因就在这里。

七

全面突破汉末以来所形成的那条农牧分界线,使农耕区域比较迅速地向北扩展,那是北魏以后的事。北魏在灭夏以后百年之间,就把郡县的北界推到了今银川平原、无定河、窟野河、蔚汾河一带。此后,又历七八十年经西魏、北周到了隋代,一方面在北魏原来的范围内增建了许多郡县,一方面又向北扩展,在河套地区设立了丰、胜等州。东汉中叶以前在这一带的政区建置规模,至此便基本上得到了恢复。据《隋书·地理志》所载,大业五年(609年)设置在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十八个郡^[45]的总户数共有五十五万,也几乎赶上了西汉末年的六十余万户。

郡县的增建,户口的繁殖,当然反映了农耕区域的扩展。但我们不能根据隋代在这一带郡县的辖境和户口的数字已接近于西汉,就说这一带的土地利用情况大致上也恢复了西汉之旧呢?不能。事实上自北魏至隋,这一带的牧业经济比重始终应在西汉之上。

原来这一带在秦与西汉时的由牧变农,是一下子把牧人——戎狄赶走了,迁来了大批农民——汉人,所以变得很快,并且比较彻底(当然牧业

还是有的)。北魏至隋这一时期内的农牧变化可跟秦汉不一样。这时原住本区的稽胡——一种以匈奴后裔为主体,杂有东汉魏晋以来曾经活动于本区的其他部族血统的混合族——绝无向邻区或塞外迁出的迹象,相反,在本区内的稽胡族一直很繁衍,遍布于全区。“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种落繁炽。”^[46]所以本区在这一时期内的由牧变农,主要不是由于民族迁移——汉族的迁入,而是由于民族同化——稽胡的汉化。而这一转化过程是极其缓慢的。并且在这方七八百里的广大地区之内,各部分的进展速度也极不平衡。

汉族迁入本区,在十六国时代即已有之,已见上述。约至北魏晚期,稽胡的大部分由于“与华民错居”,已转入定居生活,“其俗土著”,“分统郡县,列于编户”。但毕竟仍“有异齐民”,故不得不“轻其徭赋”。一部分居于“山谷阻深者”,则犹“未尽役属”。土著列于编户的,“亦知种田”^[47],也就是说,会种田,不过种田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生产活动。至于“山谷阻深者”,大致仍依畜牧为生,所以北齐初年高洋平石楼(今山西石楼县)山胡(即稽胡),所虏获的还是杂畜十余万。^[48]到了隋代,据《隋书·地理志》所载各地风俗,自今郿县、合水、泾川以南一带,才算是“勤于稼穡,多畜牧”,到达了农牧兼重阶段;自今宜川、甘泉、庆阳以北,则还是由于“连接山胡,性多木强”,显然其农业比重又不及郿县、合水、泾川以南。以语言与生活习惯而言,北周时“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妇人则多贯蜃贝以为耳及颈饰”,“然语类夷狄,因译乃通”。^[49]到了隋代,丹州(今宜川县)的白室(即稽胡)因使用了汉语,“其状是胡,其言习中夏”,被称为“胡头汉舌”。^[50]自丹州以北的稽胡族中,想必还保留着不少的“胡头胡舌”。一直到唐初,历史上还出现拥有部落数万的稽胡大帅,可见其汉化过程还没有彻底完成。^[51]

正由于稽胡的汉化过程——在经济生活上就是由牧变农的过程——极其缓慢,到唐初还没有完成,所以自北魏至隋,这一带的郡县虽续有增建,户口虽日渐繁殖,但黄河下游安流无事的局面仍能继续维持。

当然,尽管这一过程极其缓慢,对下游河道不会不发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到了隋代,户口数字既已接近于西汉,尽管是半农半牧,水土流失的程度必然已远远超过魏晋南北朝时代。隋祚若不是那么短促,再能延长几十年,那么西汉或五代以后的河患,很可能在隋代也会出现。

八

有唐一代 290 年,这一带的土地利用情况及其对下游河患的关系,应分为安史乱前、乱后两个时期来讲。

安史之乱以前土地利用的基本情况是:

1. 设置郡县的地区有超出隋代原有范围之外的,如在窟野河流域设立了麟州一州三县。郡县数字也有所增加,从隋大业的十八郡九十四县,到天宝元年增为二十六郡^[52]一〇八县。这反映了农垦区域的分布较前稍有推广。

2. 公私牧场占用了大量土地。

自贞观以后,唐朝在这一带设置了许多牧监、牧坊,由公家经营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西汉时代的牧苑。西汉牧苑养马总数不过二三十万匹。唐代单是陇右群牧使所辖四十八监,以原州为中心,跨秦、渭、会、兰四州之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麟德中马至 706000 匹;天宝中稍衰,十三载,总马、牛、羊凡 605600 匹、头、口。自陇以东,岐、邠、泾、宁间设有八坊,“地广千里”,开元十九年有马 44 万匹。夏州亦有群牧使,永隆中“牧马死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总数当不止此。又盐州设有八监,岚州设有三监。^[53]

牧监、牧坊以外,据《新唐书·兵志》说:“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这几句话说得当然有些夸大,但当时军队和贵族都畜养着相当数量的牛、驼、羊、马应该是事实。这些牧场虽然遍布于诸道,本区由于自然条件适宜于畜牧,地理位置外接边防军驻地,内近王侯将相外戚麇集地的京畿,所占比例也应该比之于其他地区为多。

3. 人民的耕地初期远比隋代少,极盛时也不比隋代多。

唐初承隋末农民大起义与割据战争之后,户口锐减,贞观初全国户不满三百万^[54],不及隋大业时的三分之一。本区一方面在梁师都、刘武周、郭子和、薛举割据之下,统一最晚,一方面又遭受了突厥的侵扰,当然不会比其他地区情况好,只会减少得更多。经百余年到了天宝极盛之世,本区二十六郡在天宝元年的总户数仍不过三十三万。^[55]安史乱起前夕天宝十三四年全国总户数比天宝元年约增百分之六七^[56],则本区约有一户三十五

万左右,较之隋大业有户五十五万,相差很远。其时人民为逃避赋役而隐匿户口的很多,据杜佑估计,实际数字要比入籍数字多二分之一强^[57],依此推算,仍不过略与大业户数相当。郡县编户基本上就是农业人口,所以贞观天宝间本区的编户始终不比隋代多,可以反映其时的耕地面积大致上也并未扩展。

总上三点,正好用以解释同时期黄河下游的情况:一、由于这一带基本上是农业区,跟东汉以后北朝中叶以前基本上是牧区不同,北朝中叶以来的变牧为农,对下游河道已发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唐承其后,因而下游也就不可能完全免于决溢之患,先后出现了九次。二、初年编户锐减,故自武周以前,有溢无决;其后生齿日繁,就出现了开元年间的两次决口。三、由于编户始终没有超过隋代,又有大片土地被用作公私牧场未经开垦,因而虽有决溢,并未改道,河患的严重性远不及西汉。

安史以后,各方面的情况都有变动,最明显的是:一、郡县建置有所减缩。广德初陇右为吐蕃所占,历八十余年,至大中初始收复。唐末又放弃了河套地区的丰胜等州。二、编户锐减。建中初全国户数仅三百万^[58],开成、会昌间仍不足五百万。^[59]《元和志》中本区只有十州载有户数,较之天宝,有的只剩下了几分之一,最多亦不过三分之一左右。^[60]

既如此,那么安史以后的下游河患何以非但不见减少,仍有九次之多,并且还出现了改道?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懂得编户数字并不等于实际户口数字。一般说来,编户数字总比实际数字少,而历史上各个时期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赋役制度不同,编户数字与实际数字的距离又有所不同。安史前后均田制的彻底崩溃,租庸调之变为两税法,使唐代后期民户的隐匿逃亡,有过于开元天宝时。因此,安史乱后编户大减,在肃代之际应该是实际情况,到了开成、会昌时代,全国编户数已接近五百万,从当时各处逃户往往达三分之二^[61]推算起来,实际户数恐怕已不会比天宝年间的千三四百万^[62]少。本区地处边陲,比较难于恢复,但也不会少得太多。

其次,得看看耕地到底是增是减?农牧比重有何改变?

安史乱后被日益剧烈的土地兼并和苛政暴敛赶出自己原来的田地的农民,除了一部分变成了庄园主的佃户,一部分潜窜山泽,“聚为寇盗”外,又有一部分逃往他州外县,依靠垦辟“荒闲陂泽山原”为生。对于这种垦荒的农民,政府为安集逃散,增辟税源计,明令五年之内不收税,五年后再

收税。农民在这一法令之下的对付办法很妙：免税限期之内，努力垦辟，一到满期，又复逃弃，另辟新荒。^[63]就是这样一逃再逃，以致这一时期的农业尽管是较前衰退了，而耕地却在不断地扩展。

再者，安史乱后陇右陷于吐蕃，至大中初收复，听百姓垦辟^[64]，即不再恢复原来的牧监。岐、邠、泾、宁间的牧坊，乱后“皆废，故地存者，一归闲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间又赐佛寺道观几千顷”。元和中一度收原来的岐阳坊地入闲厩，“民失业者甚众”，长庆初复“悉予民”。其时本区著名的牧监只有银州的银川监和岚州的楼烦监，养马仅数千匹。^[65]可见本区（不包括河套地区与鄂尔多斯草原）原来的牧监、牧坊，至是极大部分都变成了耕地，存者无几；耕地不是减缩了，而是增加了。就农牧比重而言，已自乱前的以农为主农牧兼营，变而为几乎是单纯的农业区。

末了，还得让我们想一想，其时扩展的耕地可能在什么地方？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之下，平原地带富于灌溉之利的好田地当然是属于各级地主的，逃户和一般小农所得而垦辟的，当然只能是原来的牧场和弃地，包括坡地、丘陵地和山地。而这些地区一经垦辟，正是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

至于郡县的减缩，由于陇右陷于吐蕃时汉民并未撤退，唐末放弃的丰、胜二州又在河套地区，所以对下游河道不会发生多大影响。又，武周时内徙党项于庆州夏州一带，至唐末形成割据势力，但党项本“土著有栋宇”，农牧兼营，所据区域大部分在黄河上游与鄂尔多斯草原，汉民亦未迁出，对下游的影响也不大。

明白了上述这一番道理，不仅唐代后期郡县缩、编户减而河患不减这一问题得到了解答，并且还可以用以解释五代以后出现的类似情况，例如元代。

九

唐代后期黄河中游边区土地利用的发展趋向，已为下游伏下了祸根。五代以后，又继续向着这一趋势变本加厉地发展下去，中游的耕地尽“可能”地无休止地继续扩展，下游的决徙之患也就无休止地愈演愈烈。国营牧场随着政治中心边防重心的东移而移向黄河下游和河朔边塞。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之下，为了生存，惟有采取广种薄收的办法，随着原

来的地势起伏，不事平整，尽量扩大垦种面积。黄土高原与黄土丘陵地带在这样的粗放农业经营之下，很快就引起严重水土流失，肥力减退，单位面积产量急剧下降，沟壑迅速发育，又使耕种面积日益减缩。还是为了生存，农民惟有继续扩展垦地，甚或抛弃旧业，另开新地。就这样，“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终至于草原成了耕地，林场也成了耕地，陂泽洼地成了耕地，丘陵坡地也成了耕地；耕地又变成了沟壑陡坡和土阜。到处光秃秃，到处千沟万壑。农业生产平时收成就低，由于地面丧失了蓄水力，一遇天旱，又顿即成灾。就这样，当地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穷，下游的河床越填越高，洪水越来越集中，决徙之祸越闹越凶。就这样，整个黄河流域都陷于水旱频仍贫穷落后的境地，经历了千有余年之久，直到解放以后才见转机。

总之，王景不是神仙，宋元明清的治河人员也不会都是低能儿；下游河防工事的技术和经验应该是跟着时代的演进而逐步提高、丰富的，贾鲁、潘季驯、靳辅等这一班人，只会比王景高明，不会反而比他差。这一班人的每一次努力之所以只能收功见效于三年五载，至多不过一二十年，而王景之后竟能出现千年之久长期安流的局面，关键不在于下游修防工事的得失，而在于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前后不同。这就是我对于今天这个讲题的答案，也可以说是我对于整个儿历史时期黄河安危的总看法。这看法到底是不是讲得通，是不是符合于历史真实，谨请诸位指教！

话讲到这里还不能就此结束，我们还得结合历史经验谈一谈当前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规划，并稍稍瞻望一下黄河流域的前景，这应该是同志们所最关心的。

黄河中游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这两区，按其自然条件而言，本来是应该农、林、牧兼营的地区。农耕只应该在不容易引起水土流失的平地上精耕细作地进行，不应该扩展到坡地、台地上去，这是地理学家、水利学家、农学家们早就作出的科学结论。我们在上面所讲的历史事实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什么时期的土地利用合乎此原则，那么本区与下游同受其利，反之，则同受其害。因此，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要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繁荣整个流域经济，那就必须对中游这二区的土地利用予以充分的注意，作出缜密合理的安排与规划。否则，不仅当地人民的生活无法改善提高，下游也不可能单单

依靠三门峡水库就获得长治久安。因为三门峡水库的容积不是无限的，中游的水土流失问题不解决，要不了100年，泥沙就会把水库填满。

那么，我们现在是怎样地在对付这一问题的呢？请诸位放心，像这样的大事，党和政府当然是极为关心注意着的，并且多年来早就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正在有效地把千年以来的不合理现象予以改正。

采用了什么措施？是不是把所有非平坦地区的耕地一下子全部或大批予以退耕，还林还牧？不，这是不可能的。当地人民的粮食必需自给自足，不能依靠外援，此其一。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准原来就很低，不能再使农民因耕地退耕而受到损失，此其二。因此，健全的方针应该不是消极地单纯地耕地退耕，而是积极地综合地发展农、林、牧，结合着农、林、牧生产的提高和收益的增加，逐步移转或减缩耕地，变土地的不合理利用为合理利用。具体的措施是四化：1. 山区园林化。封山育林，同时利用所有荒坡、荒沟、荒地，大量植树种草。这样做不仅增加了林、牧业收入，并且对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良土壤都发生良好作用。2. 沟壑川台化。在沟壑中打坝淤地，制止沟蚀，变荒沟为良田。这样做既有效地控制了水土流失，又为逐步停耕坡地，把耕地从山上坡上转移到沟川准备了条件。3. 坡地梯田化。用培地埂的办法，起高垫低，把坡地修成一台台的梯田。4. 耕地水利化。打井，挖泉，开渠，修水库，天上水、地面水、地下水一齐抓，节节蓄水，层层灌溉。3、4两项都是改造现有耕地，提高产量，减少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

用一句话概括四化，就是改进农业生产，并从单纯的农业经济逐步向农、林、牧综合经营发展。短期内虽然还不能不以农为主，远景规划则以达到土地充分合理利用，水土流失基本消灭为目标。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党的英明领导之下，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彻底解决黄河中游的土地利用问题，从而永远保障下游免于决溢之害，将是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做到的事！

（原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2期；收入氏著《长水集》（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作者附志：此文发表以后，任伯平先生著文驳难。邹逸麟同志的答文，经我修改、补充，进一步阐发了原文的论点，故附录于后。

注 释

- [1] 载《地理知识》1955年8—9期。
- [2] 见《汉书·沟洫志》。
- [3] 见《水经·济水注》引《竹书纪年》。
- [4] 见《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史记·赵世家》肃侯十八年、惠文王十八年。
- [5] 见《汉书》文帝纪、武帝纪、成帝纪、沟洫志、王莽传。
- [6] 见《后汉书》明帝纪、王景传。
- [7] 专指发生在下游地区的,在中上游的不计。
- [8] 见《后汉书》桓帝纪永兴元年、五行志。
- [9] 见《晋书·傅祗传》、《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宋书·五行志》。
- [10] 见《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五行志;《宋书·五行志》。
- [11] 见《水经·河水注》、《元和志·鄂州卢县》。
- [12] 见两《唐书》五行志;高宗、武后、代宗、宪宗、文宗、懿宗、昭宗纪;《元和志·鄂州》、《寰宇记·滨州》。
- [13] 五代宋初黄河决溢次数虽已很多,灾害很严重,但或仅小改道,或改后不久即恢复故道。到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才大改道至今天津入海,从永平十三年算起至此将近一千年。
- [14] 见《再续行水金鉴》卷一五四、一五八引。
- [15] 同上。
- [16] 见《科学》7卷9期。《水利月刊》9卷2期,1935年。
- [17] 见《黄河变迁史》第八节七。
- [18] “屈产”二字,《公羊传》僖公二年何休注解作产马地的地名,《左传》杜预注解作产于屈地。今石楼县有屈产水。古屈邑在今吉县境内。
- [19] 见《史记·货殖列传》。
- [20] 《史记·货殖列传》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犮,山中纒,可以为布。”
- [21]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 [22] 见《汉书》武帝纪、昭帝纪。
- [23] 见《史记》始皇本纪、匈奴列传。四十四县本纪作三十四县,此从《匈奴传》、《六国年表》。
- [24] 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 [25] 见《史记·匈奴列传》。
- [26] 见《汉书·晁错传》。
- [27] 见《汉书·武帝纪》。
- [28] 见《汉书》武帝纪、食货志。《本纪》在“上郡”,下又有“会稽”,疑衍。

- [29] 见《汉书·食货志》。
- [30][31] 见《汉书·武帝纪》。
- [32] 见《汉书·晁错传》。
- [33] 见《汉书·食货志》注引应劭曰。
- [34] 见《汉书·匈奴传》。
- [35] 按县数计算。如雁门郡领县十四，一县今地无考，可考者十三县中，郡治善无及沃阳、中陵三县在沧头河流域，即作 $1/4$ 计。
- [36] 《后汉书》元武纪、匈奴传。
- [37] 《后汉书·匈奴传》。
- [38] 见《元和志》关内道、河东道缘边诸州。
- [39] 《晋书·王恂传》。
- [40] 《晋书·石勒载记》。
- [41] 《元和志·绥州》。
- [42] 《晋书·苻坚载记》。
- [43] 《魏书·铁弗传》、《食货志》。
- [44] 《魏书·食货志》。
- [45] 陇西、天水、平凉、安定、北地、弘化、盐川、上郡、延安、雕阴、朔方、榆林、定襄、五原、灵武、文城、龙泉、高石。
- [46][47] 《周书·稽胡传》。
- [48] 《北齐书·文宣纪》。
- [49] 《周书·稽胡传》。
- [50] 《元和志》丹州引隋图经。
- [51] 据《旧唐书·吐蕃传》，大历中郭子仪部下犹有稽胡。此后即不再见于记载。
- [52] 秦、渭、泾、原、宁、庆、鄜、坊、丹、延、灵、会、盐、夏、绥、银、宥、麟、胜、丰、慈、隰、岚、石二十四州，单于、安北二都护府。
- [53] 《元和志·原州》、《全唐文》卷三六一、《册府元龟》卷六二一、《新唐书·兵志》。
- [54] 《通典·食货典·户口》。
- [55] 《新唐书·地理志》。
- [56] 据《通典》、《唐会典》所载天宝元年与十三年、十四年户数比较而得。
- [57] 《通典·食货典·户口》。
- [58] 《资治通鉴》建中元年。
- [59] 《唐会典》卷八四，开成四年、会昌五年。
- [60] 隰州元和户反多于天宝，应有讹误。
- [61] 据《册府元龟》卷四八六，元和六年李温奏、《旧唐书·李渤传》元和十五年疏。
- [62] 《通典·食货典·户口》，此系杜佑估计数字。

[63] 《唐会要》卷八四,《陆宣公奏议均节赋税恤百姓》。

[64] 《册府元龟》卷五〇三。

[65] 《新唐书·兵志》、《通鉴》中和二年。

附：读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 长期安流的原因》后

邹逸麟

《学术月刊》本年第2期刊载了谭其骧先生《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第9期又刊载了任伯平先生《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一文。谭文的结论是:东汉以后,由于黄河中游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变成以畜牧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这是下游之所以会出现长期安流局面的决定性因素。任文不同意谭文的想法,对谭文论点提出了几点驳难,从而又作出了这一时期长期安流的原因“不能归之于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仍应归之于东汉初年王景治河的功绩的结论。我是同意谭先生的看法的,兹就任文对谭文的驳难和任先生自己的看法一一提出来加以讨论,请任先生和读者们指正。

任文对谭文的驳难主要有三点,就从这三点谈起。

一、任文说:“河道决溢与否不仅取决于洪水流量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于河道的宣泄能力。同样大小的洪水对于不同泄量的河流,可以漫溢冲决,也可以安然无事。”目前黄河下游河道“最大宣泄能力在22000秒立方米以上。试问东汉以前黄河泄洪的能力会有现在这样大吗?所以那时河道决溢次数频繁,并不能证明当时洪水或泥沙的流失要比现在来得大。”

前面一个论点完全正确。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解放以后,三门峡水库建成以前,当时的洪水泥沙量不会比解放前少,但由于下游堤防的增高培厚,却从没有闹过决溢。这一点谭先生在他的文章里也提到过了。后面一点看法就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谭文并未说过东汉以前的洪水泥沙流失比现在来得大,谭文推断西汉时代中游的水土流失相当严重,只是说相对地比东汉以后要来得严重而已,并没有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来得严重。其次,历史上各个时期黄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有多大?下游的宣泄能

力有多大？多大的洪水会造成灾害？这些问题由于记载缺乏，很难作出正确的量的估计。但西汉时代黄河的洪水与泥沙问题确乎很严重，这是可以用《汉书·沟洫志》里王莽时大司马史张戎如下一段话来证明的：

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

另一方面，当时黄河下游还存在着许多分支和湖泊，其宣泄调节能力肯定也不会很小。试问，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可以说当时黄河的决溢竟与中游的水土流失无关，专应归之于下游的宣泄无力吗？

二、任文认为如果东汉以后长期安流局面的出现是由于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和水土流失程度的减轻，那么河患应该是逐渐减少才对，因为人口和耕地的减少，自然植被的恢复，都是逐渐进行的。但据《后汉书·明帝纪》和《王景传》记载，东汉初年河患是十分严重的，等到王景治河工竣，河患即骤然减少，几乎绝迹，可见河患的消失“不是由于水土流失逐渐减少，而是防洪标准有了一个很大提高的原故”。

任文未将《明帝纪》《王景传》这两条材料引全，今将原文再引录一下，以便于问题的讨论。

《明帝纪》：“永平十三年四月……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日益甚，……议者不同，南北异论，朕不知所从，久而不决。今既筑堤理渠，绝水立门，河汴分流，复其旧迹。……”

《王景传》：“初，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后汴渠东侵，日月弥广，而水门故处，皆在水中，兖豫百姓怨叹，以为县官恒兴他役，不先民急。永平十二年议修汴渠，乃引见景，……”

据上引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西汉平帝时河决后，一直没有将决口堵住，听任河水漫流成灾。东汉初光武帝时曾想修塞过，但因莽末以来的战

乱,社会经济未获恢复,不敢大兴工役,作而复止。明帝即位后又因议者不同,塞否久不能决,以致拖延到永平十二年才决意发卒派王景负责治理。《明帝纪》中所谓“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正是指自西汉平帝(公元1—5年)时至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的六十余年。因此这两条史料实际上并没有说在这六十余年间有什么新的河患发生,只是说在西汉末年发生的决口,直到永平十二年长期未予治理而已。我们认为就在这六十余年间,中游的耕垦面积已经逐渐缩小,自然植被已经逐渐恢复,水土流失已经逐渐减轻,所以才能使王景的治河工程一经告竣,就出现了长期安流之局;否则是不可能出现这一奇迹的。任文想根据这两条史料来证明东汉时代的水土流失跟西汉时代同样严重,那是把史料原义误解了。

三、任文认为东汉以后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变农为牧,对下游而言,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东汉时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总数既达一百余万人,“他们所拥有的牲畜,粗略估算约在一千一百万头以上,到南北朝时牲畜头数更多,仅陕北一带就有六百万头以上”。“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过度放牧,从而引起自然植被的破坏”。又说“无论是不合理的开垦也好,过度放牧也好,都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究竟哪一种后果更坏,这是很难比较的”。

过度放牧和不合理开垦一样,也会破坏植被引起水土流失,这一点我们并不否认。但首先我们认为“哪一种更坏”,却不难比较。因为过度放牧只是使牧场衰退,土地的一部分失去植被保护而已,毕竟跟从事农耕时将自然植被全部铲除,并把土地翻松的后果比起来是迥然不同的。再者,从东汉到南北朝黄河中游一带的载畜量是否真正已过度了呢?恐怕未必。东汉边区十郡的总面积约计当在40万平方公里左右,当时农业人口和牧业人口的比例约为一比三,农业所占用的土地一般远比牧业少,牧区的面积当在30万平方公里以上;按任先生估算,当时的牲畜头数是一千一百多万(姑不论此估计数是否可靠),每平方公里载畜计三十多头。这个数字假如全是牛马骡驼等大牲畜,也只能说相当多,不能说多到过度,何况一般游牧民族的牲畜总是以羊只占大多数,那就距离过度相当远了。《魏书·食货志》中讲到当时河西畜牧业的原文是这样的:

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水草善,乃以为牧地……。

可见志文所谓“河西”应泛指赫连夏故地,统万一带的今伊克昭盟和秦陇

一带的今宁夏和甘肃东部也包括在内,并不专指陕北。这一地区的面积约计在二十万平方公里左右,牲畜数据任先生估计是六百余万头,那么每平方公里也不过三十多头。

任文接着对东汉以前历代河患的原因提出了他自己的两点看法,现在再就这两点来谈一谈。

第一,他认为周定王五年黄河第一次大改道的原因是岑仲勉先生所提出的“各国各自筑堤,以邻为壑”,“并不意味着上中游洪水泥沙的流失已经特别严重”。造成这次改道的“洪水流量不会很大,这一点从史籍记载的稀少和简略也可以推断(仅伪书《竹书纪年》中有‘河绝于扈’四字)”。

周定王时代中上游的水土流失当然还不会很严重,这一点跟谭文看法是相同的。至于此次黄河改道的原因究竟何在?由于历史记载过于简略,很难作肯定的解答,故不预备在此多作讨论。不过记载的稀少和简略根据一般的事理推论,似乎只能说明当时的河患比较少或不很严重,我不懂得任先生何以能据以得出改道的原因与洪水无关的结论来。

附带提到一点:“河绝于扈”四字不仅见于伪书今本《竹书纪年》,也见于《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那是真的汲冢《纪年》。

第二,任文引用了《汉书·沟洫志》、《后汉书·明帝纪》中关于战国以来下游竞筑堤防和西汉成帝时屯氏河塞的记载,认为“秦及西汉时,黄河下游诸分支已大都淤塞,从而使干流所需要抗御的洪水大大增加”,以至造成河患的频仍。我不理解筑堤防和分支淤塞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一条屯氏河一时的淤塞,怎能说成是诸分支已大都淤塞?事实上西汉河患从文帝时开始见于记载,武帝时已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而在以西汉末年资料为据的《汉书·地理志》里,黄河下游除了荥阳附近派分水水的庞大的鸿沟水系外,也还有瓠子河、漯水、笃马河、屯氏河、张甲河、鸣犊河、浮水等分支见在,怎能说“秦及西汉时黄河下游诸分支已大都淤塞”了呢?

最后,任文还是将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局面的出现,归功于王景所完成的治河工程,而这正是过去讲水利史的人们的一般看法,谭文论辩已详,无须乎我再在这里赘述。但不知任文说王景的治河工程是黄河下游自周秦以来第一次形成的统一防洪工程,这句话有什么根据?怎么知道在秦与西汉的统一时代,没有出现过统一的防洪工程呢?当然,谁也不否认在整个黄河治理史上,王景确是一大功臣;经过他的治理,黄河下游防洪的标准一定有很大的提高,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但如果将这一点作为

东汉以后数百年安流的主要原因,那就很难讲得通了。假如任文的看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解放后就不必兴建三门峡水库,也不必搞水土保持,只要把下游防洪标准提高就行了,但事实上恐怕不是这么回事吧!

再者,任文一开头认为谭文“论证了一个确切的事实,即黄河下游的灾害发展过程与中游的开垦过程是大体吻合的”。但下文却又否定中游土地利用与下游河道安危之间的关系,把安流与否的原因专归之于下游河道的宣泄能力。照这样说来,难道下游的灾害发展过程与中游的开垦过程之所以大体吻合,只是一种偶然性事件吗?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附识:本文曾送请谭其骧先生审阅,承谭先生详加修改增删,特此致谢。

(原载《学术月刊》1962年第11期)

参 考 论 著

1. 任伯平:《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学术月刊》1962年第9期。
2. 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复旦大学学报增刊·历史地理专辑》1980年。
3. 史念海:《历史时期黄河在中游的侧蚀》,载氏著《河山集》第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
4. 侯仁之:《陈潢治河》,《大公报·史地周刊》第126期,1937年3月5日;收入氏著《侯仁之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谭其骧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1]

本文回答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如何界定历史上的中国范围这一理论问题。本文认为应以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1840)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上的中国的范围，认为这一范围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内建立的政权，都是中国史上的政权。历史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变化的概念，以“中国”作为我国主权范围的概念是鸦片战争后经过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同时，文章还批判了清朝版图扩张论等观点。

翁独健同志要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在大会上讲一通。我说：“我不是民族史专家，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不要你讲别的，只要你讲一讲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他既然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就不便推辞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在此向诸位汇报一下我们在这套图集里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把这个讲话命名为《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吧！诸位听了如果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有不合理、不妥当之处，欢迎在明天小组会上提出来大家展开讨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图各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轄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羈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迄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十八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

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这还要从“中国”两个字的意义讲起。“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不提《诗经》等古籍中的“中国”是什么意思，简单说起来，拿“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在这以前的“中国”二字，在各种场合有各种样子的用法。远的我们不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举一个例子，魏源写《圣武记》所用的“中国”，有时候是符合现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讲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国，俄国算外国；讲到西藏，把西藏算中国，印度算外国。但有的时候，他还采用一种老观念，把十八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对立起来，只把十八省叫中国。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中国”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讲到“中国”就是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举几个例子：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游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看成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推翻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就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推翻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到了晋室南渡，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

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在宋朝也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看成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元朝人已经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难道我们还要作宋朝人？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现在当然不应该再以东晋人自居，再以宋代人自居。总而言之，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第二个问题。我们既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我们应该采用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为历史上的中国。我们认为18世纪中叶以后，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至于现在的中国疆域，已经不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那个范围了，而是这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了我们的部分领土的结果，所以不能代表我们历史上的中国的疆域了。为什么说清朝的版图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呢？而不是说清帝国扩张侵略的结果？因为历史事实的确是如此，清朝的版图的确是历史发展自然形成的。我们跟沙俄不同，沙俄在16世纪以前，和乌拉尔山以西的西亚、中亚细亚没有什么关系，16世纪以后向东侵略、扩张，才形成现在这么大的版图。但是清朝以前，我们各个边疆地区跟中原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东北地区在唐朝时候已经建立了若干羁縻都督府、羁縻州。到辽、金时代版图已东至日本海，北至外兴安岭，经过元朝直到明朝的奴尔干都司，都是如此。北方也是如此，蒙古高原上的匈奴在西汉时跟汉朝打得很热闹，最后匈奴还是投降了汉朝，甚至至于到东汉初年还入居汉王朝的版图之内。唐朝，从唐太宗灭了突厥颉利可汗、灭了薛延陀、灭了车鼻可汗之后，一度统治整个蒙古高原，远达西伯利亚南部，几十年之后突厥才复国。元朝的时候，蒙古高原是元朝的岭北行省。在西北方面也是如此，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唐设安西、北庭都护府，元曾经置阿力麻里、别失八里行中书省、宣慰司等等。虽然一般都不是连续的，但断断续续好几次，都跟中原地区在政治上属于

一个政权。至于经济、文化关系,那就更紧密。这个长期的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逐渐发展下来,越来越密切。我们很赞成前几天翁独健同志讲的一段话,我们历史上中原王朝跟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主流是什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打仗?我们看不必去深究它,确实有的时期是很好的,和平共处,有的时期是打仗,有的时期打仗还打得很凶。但是,总的关系是越来越密切。我看这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随着历史的发展,边区各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光是经济文化的交流关系不够了,光是每一个边区和中原的合并也不够了,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17世纪、18世纪清朝之所以能够在这么大的范围之内完成统一,这决不是单纯的由于那时的清朝在军事上很强,在军事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所能够做到的。单纯的、一时军事上的胜利和军事征服要是没有社会、经济基础来维持的话,统一是不能持久的。但是清朝在完成统一之后,巩固下来了,稳定下来了,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遭遇帝国主义从东南西北各方面入侵,给他们侵占了一部分土地去了,但基本上还是维持下来了。这是为什么?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边区,边区更需要中原,需要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这对中原人民有利,对边区人民更有利。我们知道,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古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主要是满、蒙、汉三区的统一。汉族地区指原来的明朝的地方,除汉族外也包括许多南方的少数民族,蒙族地区在内外蒙古以外,还包括青海、西藏以及南疆的维吾尔地区。这些地区本来都在厄鲁特蒙古统治之下,都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当时的准噶尔疆域,不仅是天山北路的准噶尔本部,还包括南路的维吾尔地区,青海、西藏、套西厄鲁特,都是在准噶尔统治之下。噶尔丹还进一步侵占了喀尔喀蒙古,即外蒙古。只有内蒙古在清朝入关之前早已纳入清朝版图。后来准噶尔又进一步要从外蒙古入侵内蒙古,这就爆发了清朝和准噶尔之间的战争。双方经过康熙、雍正、乾隆70年的斗争,清朝终于取得了胜利。清朝不仅把准噶尔本部收入版图,也把原来在准噶尔统治之下的青海、西藏、“回疆”,即天山南路,也纳入了版图。所以清朝统一基本上就是统一满、汉、蒙三区。蒙区实际上包括维吾尔地区及藏区。这三区统一完成之

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而由满、蒙、汉三族人民组成这个王朝,实际上还远远在清朝入关以前。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把国号大金改为大清,臣下所进呈的劝进表就是由满、蒙、汉三种文字写成的,充分表明这个王朝是由满、蒙、汉三种人组成的。据我来看,这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因为到了16世纪、17世纪时,汉满蒙等中国各民族已经迫切需要统一。这一点,我们从明朝与女真部族即后来的后金打的交道,明朝跟蒙古打的交道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中原的明朝和东北的满洲、北方的蒙古,时而打仗,兵戎相见;时而通过和谈规定明朝岁赠女真、蒙古多少物资,并进行互市。打也好,和也好,目的无非是女真人要拿人参、貂皮来换中原地区的缎布、粮食和农具,蒙古人要拿他们的马来换中原布帛、粟豆和茶叶。岁赠互市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时,就打进来掠夺。一边进行掠夺,一边要挟举行新的和议,增加岁赠。这说明边区发展到16世纪、17世纪时迫切需要中原地区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当然,中原地区也需要边区的人参、貂皮、马匹等等。但是比较起来说,边区更需要中原的物资。所以说,通过互市,通过战争,最后需要统一。因为统一之后,只要中原能用布匹、粮食等物资满足边区的需要,就可以平安无事,统一就可以巩固下来。所以我说清朝之所以能造成大统一的局面并且巩固下来,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历史的发展自然形成的。有人说,清朝这样大的版图完全是向外扩张的结果,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朝对于蒙古用兵不能算是穷兵黩武,就像汉武帝对匈奴用兵不能算穷兵黩武一样。汉武帝对付朝鲜、东越、南越,可以责备他是侵略,对付匈奴就不能算是侵略。他不对付匈奴,匈奴要打进来。唐太宗对付突厥也不能算穷兵黩武。同样清朝对付准噶尔也是不得不然。在那时候,准噶尔气势汹汹,占领了整个新疆、青海、西藏、外蒙,矛头指向清帝国统治下的内蒙,如果不把噶尔丹打败的话那还得了?那就可能再次出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即厄鲁特人主中原,再来一次改朝换代。要改朝换代可不是容易的。从当时情况看起来清朝还是比准噶尔进步点,让清朝统治中原地区比让准噶尔统治中原还是要有利一点吧。所以说清朝打败准噶尔,不能说他是穷兵黩武。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清朝把准噶尔统治的地区一一收入版图,这是为了彻底打垮准噶尔而必须要采取的措施,不是存心要去征服这些地方。清朝那时候并不是扩张主义者。我们知道,清朝打败准噶尔之后,阿富汗、浩罕、巴达克山等中亚的一些小国,曾经一度要加入清朝,但清朝拒绝

了,仅仅把这些国家列为藩属,以当时清朝的兵势、兵威所加,要进一步向中亚扩展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清朝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清朝之所以有这样的版图,决不能说他是扩张主义者,这是顺应历史潮流。所以说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有人主张拿今天的国土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认为那是不恰当、不应该的。要是那样的话,岂不等于承认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占的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地方吗?事实上在清朝以前,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已有几百年是在中原王朝直接统治之下的。再如大漠以北的蒙古高原,现在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是不是历史自然发展形成的呢?不是。1911年、1921年两次蒙古独立,都是后面有第三者插手的,要是没有第三者插手的话,它不会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是蒙古地区不论漠南漠北都应该和中原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到了20世纪,到了1911年、1921年,由于第三者的插手,结果分裂出去了。这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这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的中国只包括漠南的内蒙古而不包括漠北的外蒙古,尽管我们现在是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所有的北方民族,匈奴也好,鲜卑也好,柔然也好,突厥也好,回纥也好,全都是同时分布在漠南和漠北的。要是我们以今国界为依据处理历史上的民族,那该怎么办?同一个政权统治之下的一个民族,漠北的不算中国,漠南的才算中国,这就没法办了。但我们要是采用1840年以前的清朝版图为历史上中国范围就好办。出现在漠南漠北的蒙古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民族,都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能因为今天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之内就不算历史上中国的民族。当然,我们讲中国史的时候应当把这些民族作为中国史上的民族。但我们也不反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写它的历史的时候把这些古代民族写成它的先民。

有一点要补充一下,就是1840年以前有些跨国界的政权或民族或部族怎么办?这个问题最明显的事例就是高丽。我们现在是这样办的:我们认为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的中朝国界,这是历史自然形成发展的结果,没有什么帝国主义插手。历史上的高丽最早全在鸭绿江以北,有相当长一个时期是在鸭绿江、图们江南北的,后来又发展为全在鸭绿江以南。当它在鸭绿江以北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的,这就是始建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强盛起来的高句丽,等于我们看待匈

奴、突厥、南诏、大理、渤海一样。当它建都鸭绿江北岸今天的集安县境内，疆域跨有鸭绿江两岸时，我们把它的全境都作为当时中国的疆域处理。但是等到5世纪时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了，就得把它作为邻国处理。不仅它鸭绿江以南的领土，就是它的鸭绿江以北辽水以东的领土，也得作为邻国的领土。

我们处理历史上的中国的标准就这一条，并没有第二条。当初我们讨论的时候，正如昨天小组会上好几位同志的意见一样，有些同志总觉得只有这么一条不够，总想找到第二条、第三条，想要加一两条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总觉得应该跟中原王朝有一些什么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怎么能说是历史上的中国？什么关系呢？最好有过郡县。但是有的边区从来没设过郡县，那么羁縻州县也算郡县。这也是过去学术界不实事求是之风造成的。那时历史学界讳言“羁縻州”，“羁縻”两个字不许提，硬要把“羁縻”都督府、羁縻州的“羁縻”两个字去掉，变成某某州，要把它看成正式的地方行政区划一样。我们知道，府、州的长官是流官，是中央政府可以随时调动的。府、州秉承中央政府的政令进行统治，向中央缴赋税，服徭役。但羁縻府、州只是给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一个都督或刺史的名义，实际上是当地基本上自主的统治者，他的地位是世袭的。王朝动不了它，它只是归附而已，你要动他他就会举兵叛乱。羁縻府州和正式府州完全是两回事。因为正式的找不出来，所以硬要把羁縻府州算正式府州。这在实际上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有些地区连羁縻府州也没有设置过，这些同志就去找称臣纳贡的关系，只要称过臣、纳过贡，就算是归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了。或者是曾经接受过中原王朝封赠的爵位，中原王朝曾经封过这一部族的首领什么王，什么侯，或者是曾经授予一点什么官衔，那就把它说成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的版图了。搞来搞去无非就是要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好像只有跟中原王朝扯上关系以后才能算中国，否则就不能算中国。这是讲不通的。我们知道，朝鲜、越南是历代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接受中原王朝的封爵的，但我们能把朝鲜、越南算作中国的一部分吗？不行。它们跟明朝和清朝的关系只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藩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它们不是明朝的地方、清朝的地方。尤其明显的是日本有一颗被奉为国宝的印，叫做汉倭奴国王印，按照这些同志的说法，日本已接受了中国给他的这颗印，岂不是日本也要算中国的了吗？可见把有没有封爵纳贡这种关系看作在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以内这种说法，是绝

对讲不通的。尤其突出的是，一定要把跟中原王朝拉上一点关系才算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处理台湾问题就难了。台湾在明朝以前，既没有设过羁縻府州，也没有设过羁縻卫所，岛上的部落首领没有向大陆王朝进过贡、称过臣，中原王朝更没有在台湾岛上设官置守。过去我们历史学界也受了“左”的影响，把“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曲解了。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点没有错的，但是你不能把这句话解释为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明以前历代中原王朝都管不到台湾。有人要把台湾纳入中国从三国时算起，理由是三国时候孙权曾经派军队到过台湾，但历史事实是“军士万人征夷州（即台湾），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只俘虏了几千人回来，“得不偿失”。我们根据这条史料，就说台湾从三国时候起就是大陆王朝的领土，不是笑话吗？派了一支军队去，俘虏了几千人回来，这块土地就是孙吴的了？孙吴之后两晋南朝隋唐五代两宋都继承了所有权？有人也感到这样实在说不过去，于是又提出了所谓“台澎一体”论，这也是绝对讲不通的。我们知道，南宋时澎湖在福建泉州同安县辖境之内，元朝在岛上设立了巡检司，这是大陆王朝在澎湖岛上设立政权之始，这是靠得住的。有些同志主张“台澎一体”论，说是既然在澎湖设立了巡检司，可见元朝已管到了台湾，这怎么说得通？在那么小的澎湖列岛上设了巡检司，就会管到那么大的台湾？宋元明清时，一个县可以设立几个巡检司，这等于现在的公安分局或者是派出所。设在澎湖岛上的巡检司，它就能管辖整个台湾了？有什么根据呢？相反，我们有好多证据证明是管不到的。因此，你假如说一定要与中原王朝发生联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明朝以前台湾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行吗？不行。台湾当然是中国的，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因为历史演变的结果，到了清朝台湾是清帝国疆域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岛上的土著民族——高山族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对台湾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在明朝以前，台湾岛是由我们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高山族居住着的，他们自己管理自己，中原王朝管不到。到了明朝后期，才有大陆上的汉人跑到台湾岛的西海岸建立了汉人的政权，这就是颜思齐、郑芝龙一伙人。后来荷兰侵略者把汉人政权赶走了，再后来郑成功又从荷兰侵略者手里收复了。但是，我们知道，郑成功于1661年收复台湾，那时大陆上已经是清朝了，而郑成功则奉明朝正朔，用永历年号，清朝还管不到台湾。

一直到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平定台湾,台湾才开始同大陆属于一个政权,所以一定要说某一地区同中原王朝属于同一政权,中原王朝管到了才算是中国的话,那末,台湾就只能从1683年算起,1683年前不算中国,这行吗?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为什么是中国的?因为高山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台湾自古以来是高山族的地方,不是日本的地方,也不是菲律宾的地方,更不是美国的地方、苏联的地方,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地方。但不是属于中原王朝,是属于高山族的,到1683年以后中原王朝才管到,这样我们觉得就可以讲通了。一定要找出边疆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好像同中原王朝没有关系就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

我们自己思想中如果认为一定跟汉族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那就不好办了。国外有人说,中国的西界到甘肃为止,新疆从来不是中国的。这个论点大家都知道是胡说。但是,为什么是胡说呢?很多人就会这样讲了:因为新疆在汉朝就统治到了,唐朝也统治到了。汉朝设过西域都护府,唐朝设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但是我们的历史很长,西汉对西域统治多少时间?也不过五十年吧。东汉的统治更差。唐朝比较长一点,也不过7世纪到8世纪一百多年吧。我们有几千年的历史,除了唐汉一二百年统治了新疆之外,其他的时代怎么样?有些人只愿意谈汉唐,不愿意谈其他时代,因为一想到除汉朝、唐朝、清朝之外,中原王朝的确管不到新疆。那怎么办呢?好像理亏似的,于是有的同志就去找其他的关系。说是虽然不能直接管到,但在宋朝、明朝新疆的地方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朝鲜、越南都不算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新疆地区的政权向中原王朝进过贡,就算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是讲不通的。宋朝和明朝,新疆地区政权同中原王朝的关系实在是很难的,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王朝跟宋朝怎么说得上有什么臣属、隶属关系?怎么能说是向宋朝称臣纳贡呢?不过是来往一二次而已,不用说不在宋朝的版图内,连藩属也谈不上。到明朝更可怜了,明朝中叶以后,嘉峪关打不开了,嘉峪关之外都是一些与明朝没有什么关系的政权。所以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末新疆在宋朝、明朝根本就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能这样讲,不能说一定要与中原王朝有关系才算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分清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在1840年以前,中国版图之内的所有民族,在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是这么一条,没有其他标准。新疆在宋朝的时候,是西州回鹘、于田、黑汗等等。在明朝的时候,在察合台后王封建割据之下,分成好多政权,这是不是就不是中国了?是中国,不过它与中原王朝分裂与统一,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每一次由分而合,一般说来是扩大一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是在秦汉时期,秦统一时北至秦长城,西边只到黄河,根本没有挨上青藏高原。汉朝的统一,西边到了玉门关,到了青藏高原的湟水流域。比秦有所扩大。隋唐的统一又扩大一步,但是都赶不上清朝的统一。一次一次统一,一次一次的扩大,到清朝的统一,版图最大。而这个范围并不反映清朝用兵的结果,而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政治各方面密切关系所自然形成的。不过,我们说,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还需要政治统一来加以巩固的。所以讲到这点,我们不得不特别强调一下,“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这一句话并不是泛泛而谈的,少数民族对我们的贡献确实是很大的,除了经济文化方面我们暂且不谈之外,就是我们形成这么大的一个中国,少数民族特别是蒙古族、满族对我们的贡献太大了。我们设想一下,在12世纪我们这个中国分成七八块,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是南宋,东北和黄河流域是金,宁夏、甘肃的河西和鄂尔多斯这一带是西夏,云南是大理,新疆是西辽,西藏是吐蕃,分裂成许多部落的蒙古高原上是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整个中国分成七八块,每一块中间还不统一。由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孙三代的经营,才出现了一个大统一的局面,这个大统一的局面多么珍贵啊!譬如云南,虽然汉晋时代是中原王朝统治所及,但是南朝后期就脱离了中原王朝。到了隋唐时候,是中原王朝的羁縻地区,不是直辖地区。这个羁縻局面也不能维持很久,到了8世纪中叶以后,南诏依附吐蕃反唐,根本就脱离了唐王朝。南诏之后是大理。总的来说,从6世纪脱离中原王朝,经过了差不多七百年,到13世纪才由元朝征服大理,云南地区又成为中原王朝统治所及。又如新疆地区,从8世纪后期起就脱离了唐王朝,唐朝人被吐蕃又赶出来了,后来吐蕃人也站不住了,维吾尔人进入新疆建立了几个政权。总而言之,经过了四百多年,才由蒙古族征服西辽使新疆地区和中原地区又同属于一个政权。元朝的统治使中国各地区之间长期分裂又合在一起。没有蒙古的话,怎么能形成这样大的统一?这样分裂局面继续下去的话,那就不可想象。同样,在明朝时候,中国又进入一个分裂时代。明朝对东北辽东边墙以外,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是很薄

弱的,只是一种羁縻关系而已,真正的统治是谈不上的。我们要说老实话,现在把明朝对西藏关系来比之于元朝对西藏的关系、清朝对西藏的关系,这是不行的,是远远赶不上的。明朝对东北边疆以外女真各部的关系也不能和元朝、清朝相提并论。长城以外的鞑靼、瓦剌,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所以明朝的时候中国又分成好几块了。没有清朝起来,这个分裂局面不知又要延续到什么时候。明朝对新疆的关系更谈不上,根本管不上,连新疆发生什么变化都不晓得。要是没有清朝从努尔哈赤、皇太极,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这六代二百多年的经营,就不会出现18世纪的大统一局面。所以我们说中国是各民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我们今天还能够继承下来这么大的一个中国(虽然被帝国主义宰割了一部分,侵占去了好多地方),包括这么多的少数民族在内,不能不归功于清朝。所以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我们中国是各族人民共同的中国。很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元朝,没有清朝,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我们怎么能把中国看成汉族一家的?王朝跟中国不能等同起来,应该分开,整个历史时期只有清朝等于全中国,清朝以外没有别的中国政权。清朝以前任何历史时期,中国都包括两个以上的政权,我们绝不能说这个政权是中国的,那个政权不是中国的,不能这样分,要分也分不清。

历史上同时存在两个以上的中国政权时,那就得承认事实上当时几个国家并峙,谁也管不到谁,不能硬说中原王朝管到了边区民族政权。有些同志要把吐蕃说成是唐朝的一部分,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唐和吐蕃敌对战争时多,和亲通好时少。就是在和亲通好时,唐朝也完全管不了吐蕃。汉朝和匈奴,唐朝和突厥、回纥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如此。我们只能认为吐蕃、匈奴、突厥、回纥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但不能说它们是汉唐王朝的一部分。

历史上的中国政权有时管到了历史上中国范围以外的地方,我们也得承认这些地方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确在几个中国王朝版图之内。例如,汉晋间曾在朝鲜西北部设置过乐浪、带方等郡,汉唐间曾在越南北部设置过交趾、九真、日南等郡,这些设郡县的地方,当然是汉、晋、唐等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所以朝鲜、越南虽然不在历史上的中国范围之内,但历史上的乐浪、交趾等郡,则为汉、唐等王朝的领土,那是无可讳言的。以郭老名义出版的《中国史稿》第一版(后来的版本改动过没

有,我不知道),把汉朝同交趾、九真、日南的关系说成是对外关系,我看是很难讲得通的。这三郡明明在汉王朝的统治之下,版图之内,汉朝其他地区对这三郡的关系只能说是内地或中原对边区的关系,怎么能说成是对外关系呢?这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我们对内提倡民族团结,对外提倡尊重邻国,特别是比较弱小的邻国,这是对的。但不应该,也不需要为了要尊重邻国,就抹杀或歪曲历史事实。交趾、九真、日南等郡确在汉唐王朝疆域之内,不能因为在今天是越南的国土,便硬说汉唐跟这几郡的关系是“对外”。五代以后越南脱离中国独立建国,那我们就该尊重其独立,不能因为它曾经向宋、元、明、清等朝称过臣、纳过贡,而不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邻国看待。

在我们的图上,我们没有把秦朝的象郡按我国的传统说法划在越南境内。有些同志认为我们在画秦图时是在与越南友好的时候,所以就不敢把象郡画在越南。我们是把象郡画在广西、贵州一带的。他们说,我们现在要修订这套图,应该可以把象郡画到越南去了。实际把历史上的郡县画在哪儿,这是不能以对某个邻国友好与不友好来决定的。我们当初没有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我们是根据史料认真地作了分析,觉得还是不把象郡画到越南去更妥当一些。我们也知道把象郡放到越南去也有一定的史料根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都说秦朝的象郡在越南。但是我们没有采用这种说法而主张象郡是在广西、贵州,我们觉得这种主张的根据更坚强一些。因为《汉书·地理志》赶不上《汉书·本纪》可靠,而《汉书·本纪》的材料证明象郡应该在广西。《水经注》的材料虽然可贵,但《山海经》的材料比《水经注》更早一点。《山海经》的材料说明象郡应该在贵州。因此,我们是老老实实根据历史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以后才下结论的。我们决不能今天与这个国家友好了,就这样画,不友好了,就那样画。

有的同志说如果我们把历史边疆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看成是历史上的中国,那是不是就没有民族英雄,就没有汉奸、卖国贼了。是不是宋辽之间、宋金之间的战争都是内战了?这显然也是不对的。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那末,当然应该有民族英雄,有卖国贼,岳飞当然是民族英雄,秦桧当然是卖国贼,这怎么推翻得了呢?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

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就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所以岳飞还是应该颂扬的,秦桧还是应该谴责的。不过今天汉人与满人都已经是一家人了,写历史的时候虽然应该按历史事实写,但在今天已没有必要把这段历史大事宣扬,不需要宣扬并不等于否定,不等于否定民族英雄。我们要宣扬爱国主义的话,应该宣扬近一百几十年来在抗英、抗法、抗俄、抗日斗争中间的民族英雄,岂不是更好吗?何必过分宣扬历史上的?同样,我们肯定元朝、清朝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但是不等于说要否定文天祥、陆秀夫,不承认他们是民族英雄、爱国主义者,也不等于说洪承畴、吴三桂不是卖国贼,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我们不能拿后来的关系看当时的关系。假如认为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何必抵抗呢?那么从秦汉以后秦、楚也都是一家,在屈原的时代,岂不是他无需站在楚国的立场上,抵抗秦朝的侵略了?假如说后来已成为一家,当时就可以不抵抗的话,那么将来世界总有一天要进入共产主义的,国家总是要消灭的,那么将来讲起历史来岂不就得认为历史时期被侵略者、反抗侵略都是无聊的?要这样讲起来,那我们的抗日战争岂不也是多余的?

所以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全国各个民族是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我们今天的命运是相同的,兴旺就是大家的兴旺,衰落就是大家的衰落,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斗争。

(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收入氏著
《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注 释

- [1] 这是作者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时本人做了一些修改。



参 考 论 著



1. 黎敬文:《明代东北疆域考》,《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2. 顾颉刚、王树民:《“夏”和中国——祖国古代的称号》,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3. 于省吾:《释中国》,载于《中华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 《清朝前期的边疆经略》,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史念海

三门峡与古代漕运

黄河中游的三门峡自秦汉到唐末,一直是古代东西漕粮运输的枢纽。本文从考察三门峡地理形势入手,全面论述了古代漕运的历史。文章首先分析了三门峡漕运的地理环境,列举历史上改变三门峡运输条件的种种举措,力陈三门峡漕运之艰险;其次,论述了关中及其附近地区粮食生产及其需要,认为尽管人口与边防均造成关中对关东的漕粮需求,但统治阶层的奢侈浪费是主要原因;再次论述了关东各地盛产粮食地区和运输网的变迁。最后指出,尽管历代王朝采取了多种解决关中粮食问题的措施,但始终摆脱不了对关东漕粮的依赖。作者认为,秦汉以来漕粮的不断西运并不说明关中及其附近地区没有很大的农业生产能力,当从封建王朝的生产关系中寻找原因。

史念海(1912—2001),山西平陆人。生前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建者之一。他在黄土高原历史地理和中国古代都城等方面的研究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创办、主编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术刊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在研究方法上,重视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著述颇丰。

一 关东西漕运的枢纽

黄河中游的三门峡为古代东西漕粮转输必经的要道。从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起,这条运道即已发挥了作用。^[1]其后虽也有若干次中止的时期,但作为主要的运输力量,却一直维持到唐朝的末年。就是在北宋时对于这方面也还有所致力。^[2]北宋以后,这里就默默无闻,不为人们所重视。所谓漕运,主要是指由关东各地转输粟米接济关中的需要。当然,也有一些时期关中的粮食曾经沿河而下,运到中原,不过那究竟是无关大旨,不居重要的地位。

古代漕运频繁的时期,三门峡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甚至被人们视为畏途。所以这样的缘故,是由于这里水流激湍,是运道中一个十分危险的所在。本来黄河自潼关以东,流经中条和骰山之间,两山相夹,河身受到约束,实际是处在峡谷之中。到了三门峡,狭窄的河谷却为雄峙在河中的两大石岛所分开。正如三门峡名称所表示的,黄河在这里分成了三股,水势更加湍急。三门峡以下,一直到五户滩头 120 里内还有若干险滩,同样使船只的航行受到阻碍。^[3]但比起三门峡来已经要算平易了。因为三门峡的黄河不仅河道狭窄,而且还有许多暗礁。水面到处出现漩涡,船只至此,稍有不慎,便立刻沉没。这样艰难的途程,严重影响黄河中游的运输。

与这段黄河平行的还有一段陆道,人们本来是可以舍水就陆的,但是事实却并非这样简单。这条陆道逶迤穿行在黄河南岸骰山山谷之中,远在石器时代可能已经有了。^[4]后来周武王伐纣,就是由这里向东进兵的。就运输效力来说,陆道究竟不如水道来得便捷,黄河中游固然有三门峡的阻碍,但山中道路也不见得就是省力。骰、函山谷中的道路有南北两条,东汉末年以前,人们一直走的是南道。曹操西征汉中时,才另外开了一条北道。^[5]所以要另外开辟一条北道,自然是因为南道恶险,不便于往来。可是到南北朝末年,人们却舍弃北道而又改行南道,这说明了北道也不是平易舒适的。据说这条道路中由东骰到西骰之间的一段,更是非常险峻,东骰的情形已是“峻阜绝涧,车不可方轨”,西骰的长阪,艰难的程度也是不下于东骰的。^[6]虽然这样的险绝,但由于三门峡覆舟的频繁,人们有时候还是会舍水就陆的。隋初,由关东运来的漕粮,就是在小平(在今河南

孟津县西北)开始陆运,通过骹、函山路运到陕郡(今河南陕县),再转从水运,循河西上。^[7]直到唐朝初年,骹、函山路倒成为一条主要的运道。东方运来的漕粮,在小平以东的洛口就转入洛水,运到洛阳,然后再陆运到陕州(即陕郡)。在洛阳,隋时置有河阳仓,唐时置有含嘉仓^[8],都是为了存储和运输漕粮的方便。这样是绕过了三门峡的险阻,免于复舟的危险,但是车辆运输仍然有很大的耗费,而且大量使用牛力,影响了附近地区的农业生产,也算不得上策。人们就设想:既然这段黄河的险阻,主要是三门峡,路程究竟不算很长,是不是可以只避开这一段水道而尽量利用黄河的力量?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裴耀卿主持漕运,就是在这方面打主意。当时在三门峡以东置集津仓(图1),在三门峡以西置盐仓,从关东来的漕船由黄河直至集津仓下,再由陆运转到盐仓,复行水运。集津仓和盐仓之间相隔18里。这18里虽不算很长,但其间地峻山高也是诸多困难。为了运输漕粮,只好凿山开道。这段陆运当时为区别于骹、函山道,称为北运。据说:自北运道路凿通以后,三年之中节省运输开支三十余万缗,显然有了很大的成就。说也奇怪,这样有成就的道路却只用了三四年的光景。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便已废弃不用。^[9]为什么会如此?正说明虽然只有18里的山路,也是异常险峻,不易发挥运输力量。安史乱后,在李泌的主持下,旧话重提,才重新修整了裴耀卿所开凿的故道,并在故道的侧面山坡又开了一条新路,下路运粮,上路作为回转空车之用。^[10]这样,比裴耀卿时的故道要好一些,不过也只维持了十几年的光景,仍然废弃。^[11]看来在这里陆运粮食,确实是困难的。

应该指出,从秦始皇开始,由关东转输粮食时,运粮的船只就已经通过三门峡了。西汉初年,张良劝刘邦建都关中时,就曾经说过:“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正道出了那时的情况。^[12]漕舟由三门峡上溯,必须用人力挽曳,这自然是十分困难的。当时,是不是在沿岸开凿过山崖,修筑栈道,以供挽船的船夫行走?现在已不可知了。在现存的漕运遗迹中,也未见发现当时的遗存,看来是没有任何施工的。秦始皇是出名的暴虐皇帝,自来不以人民的生命为重,当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也是可能的。现存的栈道遗迹至迟是在东汉桓帝和平元年(公元150年)以前开凿的。魏晋时期继续开凿的栈道,绵延分布在黄河的左岸,大致已足够供这段挽船之用。^[13]这种开凿工程在隋初还曾经进行过^[14],成就可能不大。唐朝初年,关中对漕粮的需要不断增加,陆运困难又多,只好改从水运。水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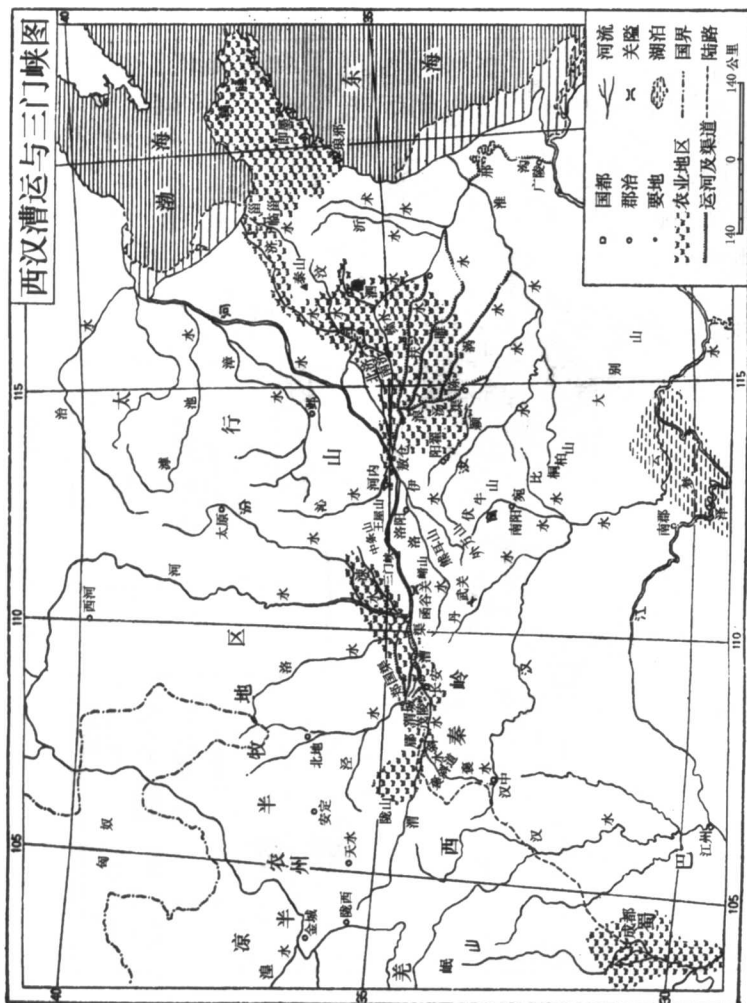


图 1 汉西漕运与三门峡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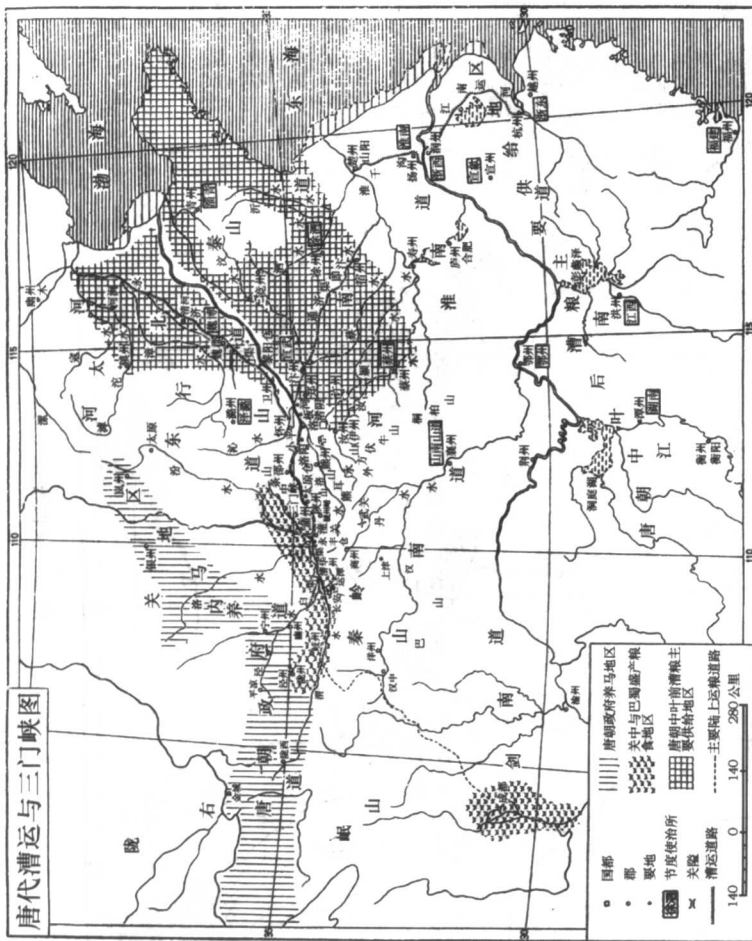


图 2 唐代漕运与三门峡图

不能不用人工挽舟,也就不能不开凿栈道。唐高宗时,曾经一次调拨了6000人施工,但是并不能完全改善运道中的困难情形。^[15]最大一次开凿栈道工程是在由中宗到玄宗的时候。这次工程是由杨务廉主持的,他们烧石凿山,虽然也取得一定成就,但是当时死亡的人数很多,一节节栈道都留下了施工人民斑斑的血迹。^[16]就是这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

还在三门峡漕运的初期,人们就曾经设想过:是不是可以改善河道,使河身稍宽,暗礁稍平?西汉成帝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就曾为这种目的进行过施工。他们凿开水旁的石崖,打算使河身加宽,水流稍为舒缓。但是结果石块坠入河内,反使水流更加湍急。^[17]魏晋时期,也曾不断地努力,甚至长期住有人工,按年修治,可是一样解决不了问题。根据记载,当时的情况是:“虽世代加功,水流澎湃,涛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鲜不踟蹰难济。”^[18]

最大一次整理河道的工程,是在唐朝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当时想彻底解除三门峡运输的困难,就在人们以北的岸上,另外开凿了一条新河,使漕舟避开黄河的正流,由新河上行,这就是所谓开元新河^[19]。按道理说来,新河应该比黄河正流便于漕运。实际上新河的作用并不能尽满人意,因为开河时,岸上凿下的石块坠入河道中,河水一样湍急,漕舟不能够顺利进入新河,仍然要由船夫牵挽。不过究竟比较从黄河正流直上要好一点。因为在新河开凿后的几年中,运入关中的粮食确实是比以前增多了。^[20]由于新河本身的缺陷,也由于河水夹杂泥沙太多,所以不到几年,新河也就淤塞不能通行了。^[21]西上的漕舟还必须艰难地由三门峡通过。

通过三门峡西上的漕舟的困难情形是可以想见的。关于这一点,出于唐人之手的《邨侯家传》曾有深刻的叙述。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自集津上至三门,皆一网船夫并牵一船,仍和雇相近数百人挽之。河流如激箭,又三门常有波浪,每日不能进一二百船,触一暗石,即船碎如末,流入旋涡,更不复见。上三门篙工,谓之门匠,悉平陆人为之,执一标指麾,以风水之声,人语不相闻。陕人云:‘自古无门匠墓’,言皆沉死也;故三门之下,河中有山,名米堆、谷堆。每网上三门,无损伤,亦近百日方毕。所以漕运艰阻。”^[22]历尽这样的困难,关东的漕粮才能源源运来到关中。

由此可以看出,以前建都在长安的王朝,为了满足他们统治阶级的需

要,是如何摧残人民的生命,从事艰苦的运输粮食工作。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在三门峡上下不顾艰难困苦,克服险阻,战胜自然的伟大毅力。

二 关中各地对于漕粮的需要

通过三门峡的漕运既然是这样的困难,为什么这些王朝的统治者还要不断地从事运输?这要从关中及其附近地区的粮食生产及其需要的情况去解释。

关中本是一个适宜农业的地区,从汧、雍以东至华山之麓和黄河之滨都是属于黄土地带,沃野膏壤,自来就是被列为上上等的土地。人们称之为陆海,以显示当地物产的丰富。^[23]这样的地方在战国末年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秦国的粮食本来是差可自足的。那时秦国正在向外发展,对粮食的需要也就较为迫切。秦国为了这样的目的,向南发展,占领了巴、蜀。巴、蜀也是个富庶的地方,秦国就仰赖那里来解决它的粮食问题。^[24]巴、蜀和秦国距离遥远,中间又隔着秦岭和巴山,为了运输粮食,秦国在山间岭畔,修筑了千里的栈道。^[25]虽然如此,困难还是不小的。

秦统一六国后,咸阳成了全国的都城,人口必然大量增加。秦朝又从各地迁徙豪强贵族,充实都城,关中人口的增多更可以想见。秦国还为了防止匈奴的侵略,在边疆地区驻扎很多军队。这一些都必然增加粮食的消耗,也就超过了关中农业生产所能够负荷的数量。所以由秦统一时起,从关东运输粮食就成为当时的急务。这种情况在后来统一局面的西汉和隋唐,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这些王朝的国都同样是建在关中。秦时咸阳的人口有多少,不得而知。西汉时期的长安已经有八万户人家,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汉朝也和秦时一样,不断从各地徙人实都,和长安相距不远的长陵有五万多户,另外一个茂陵也有六万多户。^[26]这都是关中的城市,自然都增加了关中人口的数目。隋唐时期的长安及其所在的京兆府,人户都在三十万以上。^[27]如果除去各县的人户,长安实有数目或者比西汉还要多一些。关中于当时全国的形势偏于西北,而西北边外各族又复经常内侵,在汉时的匈奴依然猖獗,隋唐时在匈奴故地兴起的突厥同样是向南侵略。后来突厥灭亡,吐蕃和回纥又先后成为唐朝的劲敌,为了保障国土不受蹂躏和国都的安宁,又不能不驻重兵。汉时在北边经常乘

塞列隧的吏卒只有数千人^[28],虽不算很多,但遇匈奴发动内侵时,屯集防胡的兵力就不在少数。就如汉文帝时,匈奴人烧回中宫那一次,汉军屯于长安附近的就有10万人^[29],可为一例。唐时西北的边兵也是不少,论实力已经占有全国的半数。^[30]当然这许多的人户和边兵所消耗的粮食都是有相当的数目要仰给于关东的漕粮的。

秦朝每年从东方运来有多少漕粮?已难知确实数字。西汉初期,每年却只有数十万石。^[31]唐朝初年和汉朝差不多,每年所运的漕粮也不过20万石。^[32]但是汉朝到了中叶武帝时候,每年所需要的漕粮竟高达400万石。^[33]唐朝到了中叶玄宗时候,每年所需要的漕粮也同样是达到了400万石。^[34]这里面就有问题了。为什么西汉和唐朝中叶所需要的漕粮竟有这样多的数目?如果说漕粮需要数目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当时国都人户的众多,则汉初到武帝末年和唐初到玄宗天宝初年,都不过一百多年,人户的增加显然不像粮食需要数目增加的那么多。上面所举的汉时长安城人户的数字是西汉末年的记载,武帝时候长安城中的人户当不至比这个数字还高。武帝时候较汉初的增加数,已经不能得到确实数字。不过就唐朝来说,已经可说明问题。唐朝高宗永徽时全国人户计有380万,到天宝初年增加到853万^[35],所增加的不到三倍。但是这个时候的漕粮却增加了三十倍。这样看来,长安人口的增加确实不是漕粮增加的主要原因。汉唐两代中叶边疆用兵的次数和所用的兵额都比较繁多,边兵既多,耗费的粮食也应该随之增加。可是问题不是这样的简单。汉武帝末年因感对外用兵的频繁和国力损失的严重,遂颁布轮台诏书,痛陈以往的过失,减少了边地屯田的吏卒。虽然如此,直到宣帝时候,从关东运来的漕粮依然维持在400石的高额,并未有所减低。^[36]至于唐朝,如果说是中叶漕粮增加到400万石是由于边地的兵多,可是中叶以后,防边的兵力并未有所减少,关东的漕运有时候却大致只有一百多万石。^[37]漕运的减少虽说主要是由于关东江南的粮食来路不易,不过这样看来,边地驻军数额的增加也确实不是漕粮增加的主要原因。要追求漕粮增加的主要原因,应该从统治阶级本身去寻找线索。像汉唐这样的王朝都是在农民起义之后建立的,在初年的时候,农民起义的威力还使他们感到有所畏惧,不敢过分的剥削;时间稍久,他们就得意忘形,奢侈浪费,因而也就多方搜括。《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时的情形,说是:“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司马迁的意思自然是以此来说明当时的富庶,但也可以

给漕粮增加的原因找到一些线索。唐朝开元、天宝之际，钱谷之臣从事腴刻的原因也是由于“天子骄于乐佚，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于其所入”的缘故。^[38]至于当时后世一些记载里，更是有不少人提到这些统治阶级的狗马食粱肉的事情。像这样的腐化奢侈，从关东运来漕粮的数字又怎能不一再的增加而达到最高的数额呢？还应该指出，汉唐两朝每年需要漕粮的最高数额都达到400万石，却也有所不同。因为历代衡量各异，汉时一升仅合0.3425公升，而唐时一升却合0.5954公升^[39]，唐之衡量几为汉之一倍。当然，汉唐两代的情形各有不同，不能以汉制来说唐制，但由消耗粮食来说，唐朝统治阶级的极端腐化至少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从这种种情形看来，漕粮数额的增多和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不能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他们的奢侈浪费还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

就以每年四百万石的数目来计算，按当时生产的情况来说，实在不是一个小的数目。隋唐时期，全国各地都设有义仓，义仓储藏的数目可以和最多的漕运数目互相比较。据天宝八年（公元749年）的数字，全国义仓总储粮数为六千三百一十七万多石。其中关内道储粮五百九十四万多石。^[40]这四百万石漕粮占全国义仓总额的十五分之一，也占关内道义仓所储蓄的三分之二。这样说来，漕粮的数目确实是不少了。唐初制度是实行租庸调法的。按照租庸调法的规定，每丁授田百亩，输租二石。如果按地亩平摊，每亩应是二升。当时义仓储粮的来源，是在租庸调法制度以外，按垦田亩数每亩征收二升。这是说，义仓征收的数额和租庸调制度中的租是一样的。那么，四百万担的漕粮也等于关内道人民每年按租庸调制度输租总额的三分之二了。从这一点来看，漕运的数目确实是不小的。

就关中和其附近地区来说，农业生产的情形是不完全一样的。唐朝的关内道是包括现在陕西省秦岭以北，一直至内蒙古的河套。陇右道大约就是现在的甘肃省。泾、渭流域在关内道的南部，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关中平原。这里本来是一个富庶的地区，农业特别发达，可以担当粮食仓库的名称而无愧色。不过就整个关内道和陇右道来说，这个平原究竟还是比较狭小的，它的农业生产难免有一定的限制。在此以外，富庶程度就难得一概而论。论起土壤情况，关内道和陇右道都属于黄土区域。黄土本是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但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自来这样的地带并不完全都是农业区域。从汉朝起，人们就经常说：“凉州之畜为天下饶。”^[41]汉朝的凉州就是现在的甘肃。这意味着凉州是一个以畜牧业为

主或者半农半畜牧业的地区。那里虽然也有农业,是应该让畜牧业一筹的。以畜牧业为主或者半农半牧的地区,实不仅限于这一带,应该包括现在陕西的北部,实际当时还兼有关中的以西以北各地。真正成为主要农业区域的也只有泾渭中下游和洛水下游而已。汉朝如此,隋唐时期虽有所改变,但还有些地方仿佛汉朝的遗规。唐朝国家养马的地区极为广大,现在甘肃黄河东南各处,还有陕西和山西的北部一隅,都陆续包括在内。^[42]当然隋唐时期陇右各地垦田已多,不能再把它作为半牧半农地区,但既然成了养马地区,不能说对农业没有影响。就如唐初始置监牧之时,较好水草腴田就已经一律割隶监牧。其后牧地向东扩展时,种植乌秣的田亩竟有 1230 顷之多,这都不是一些小的数目,是值得注意的。在西汉和隋唐时期,为了减少内地转输之劳,在西北边地都推行过屯田政策,西汉赵充国在湟中的屯田已经成为历史上的佳话^[43],唐朝娄师德经营边地垂 30 年,足迹所至,遍及陇上各地,也同样卓有成效。^[44]唐朝中叶,甚至还有由陇右运粮沿黄河而下,接济关中的事情。^[45]这固然是一个奇迹,但究竟不是经常的事情。边地屯田,虽有一定的收获,也不可能完全解决驻扎在边地军队的给养问题。如果这些困难都要泾渭流域的农业区域来解决,自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也是当时统治阶级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只好仰给于关东的漕运粮食了。

三 关东各地盛产粮食地区和运输网的变迁

运到关中这样多的漕粮,主要都是从关东各地来的。但是关东盛产粮食的地区并非一成不变。最初黄河中下游地区是漕粮的主要来源地。由于人为的影响,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受到不断的摧残,因而难以满足统治阶级这样的需要。黄河流域有了变迁,长江下游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代替了黄河流域成了关中漕粮的供给地。虽然长江流域不属于关东的范围,为了叙述方便起见,不妨把它们看成一起。这样说来,北从太行山东,南至五岭之麓,这一广泛的地带都曾经先后成为漕粮取给的处所。地区虽有变化,运到关中的漕粮还是必须经过三门峡,这也是三门峡所以成为重要地方的缘故。为了说明这一点,还有必要对于关东各地盛产粮食地区的变迁情形,以及相随而来的各王朝运输网的改变,作出较为详细的阐述。

最早由关东运粮的是秦始皇。据汉朝人的说法,秦始皇所运的粮食是取之于东海之滨,黄、腓、琅邪等地。^[46]秦始皇为什么从这么远地方运粮?应该从两方面来解释:秦始皇对于人民的剥削极为残酷,由咸阳到东海之滨必须经过中原,他绝不会舍弃中原不加过问,这当是他已经在中原各地搜刮,然后才到东海之滨。同时还可以说明东海之滨也是一个富庶的地区,不然,秦始皇为什么会光顾到这里来?当时关东产粮食的地区,当然不仅是东海之滨的一隅之地,最主要的所在还是齐、鲁、梁、宋等处。而黄、腓、琅邪也就是原来齐国的土地。具体说来,这样的地区,大致是起于现在河南的荥阳附近,一直向东至海滨。北边起自现在的山东北部,南边几乎快要到了淮水之北。这样一个地区是要比关中的泾、渭流域平原广大的多。因而成了秦和西汉漕粮所取给的地方。秦汉时代的疆土固然早已达到长江下游,但是那里的农业当时还相当落后,依然稽留在火耕水耨的生产方式。^[47]自然难得有许多余粮,所以不在供给漕粮的地区之列。

秦汉时代从这个富庶的地区运输漕粮是比较方便的。因为这里有许多自然水道和人工开凿的水道可供运输之用。它们彼此灌注,正构成了当时的漕运网。这些水道指的是济水和鸿沟系统。济水是当时的一个自然河流,而鸿沟系统乃是人工开凿的水道。鸿沟系统包括泅水、获水、狼汤渠、睢水、涡水等几条河流。济水的故道大致就是现在黄河下流的河道。因为那时黄河是由现在河南荥阳县附近向东北流去,一直流到现在天津附近入海,和现在河道不同。就是在济水和黄河分流的地方,大约是战国时代,人们又从黄河里面引出了鸿沟。这几条水道正好分布于当时的农业地区之中。在济水中游,春秋末年的人们又在今山东旧定陶县附近开了一条菏水,东南流通到泗水。这条菏水离鸿沟系统中的泅水还不甚远。在济水下游,人们还开凿了一条人工水道,使它和淄水连接起来,这样现在的山东半岛在当时也归入这个运输网中。既然这几条水道都直接间接和黄河有关,各地的漕舟都可以因之而集中到黄河之中,再越三门峡向西运输。必须指出,这个漕运网还应该包括渭水下游的漕渠。渭水虽没有三门峡的水流湍急,但是泥沙太多,容易沉淀,运道也就经常受阻。西汉中叶为了解决这个困难,才开凿了这条漕渠,所以说到三门峡东西的漕运网,应该把这段漕渠包括在内。

西汉末年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黄河的不断决口,使鸿沟的水道受到影响,破坏了漕运网。东汉的国都设在洛阳,这就使通过三门峡的漕运

没有必要了。东汉以后分裂局面较长,王朝也时有更迭。这些新的王朝许多都不以长安为国都,因而运输漕粮与三门峡的关系不大,即令在关中有所征发,也是顺河而下,虽仍然通过三门峡,究竟顺水行舟,比逆流而上要省力得多,何况这样的漕运数目,远不如以前向关中运输之多。固然在这个时期中,关中也曾经有过王朝建都,但是分裂时期的政权是不能和统一的局面相比拟的。

隋初统一南北,使漕运的情形顿时有了改观。不过由于经过长期的分裂,当时的情形和秦汉时代有所不同。这时候黄河下游的南北地区的农业已经相继恢复,能够负担关中漕粮的需要,不过运输系统却得从新调配。当时在三门峡以西渭水下游地区,开凿一条广通渠,它的规模仿佛汉朝的漕渠。关东的情形却和汉朝完全不同。前在《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一文中,根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指出隋初漕粮的供给地区。这里不妨再度提及。据《隋志》所说,当时为了向长安运输粮食,曾在蒲、陕、虢、熊、伊、洛、郑、怀、邵、卫、汴、许、汝等水次十三州,置仓募丁,从事转运。这十三州之中,蒲、陕二州在三门峡的上游,郑、怀、邵、卫四州在三门峡的下游,这都是濒于黄河的地方,不必说起。其余虢、熊、洛三州在洛水流域,伊、汝、许三州在颍、汝二水流域,汴州在汴水沿岸,也就是后来的通济渠流经的地区。由这十三州的分布可以看出当时已粗具小型运输网的雏形。应该指出:颍、汝二水向南流入淮水,和黄河并不连接。由颍、汝二水上游,转运粮食如果要达到黄河沿岸,还须经过一段不很短的陆运。可是沿颍、汝二水而下,就可以达到淮水沿岸。就是说,这个交通网也应该包括淮水附近的地区。不过这个运输网也有它的狭隘性:洛水流域在当时并不是主要产粮区域,可是在沿岸三州却都设有仓库。其次,这个运输网只限于黄河中游的两岸,好像没有涉及到下游各地,这是大概由于隋朝建立未久,规模还没有完备。黄河下游在分裂时期也是曾经受到巨大的摧残,但是南北朝末年这里已经恢复,而且也同样盛产粮食。所以这个产粮的地区应该包括现在河南的东部和中部,兼有山东的西南隅和安徽的西北部,以及现在江苏的北部。另外太行山东的广大平原,包括现在河北省中部以南各地,在当时也是一个富庶的地区,论情形是和黄河以南的地方相仿佛的。^[48]由这些富庶的农业地区看来,隋朝初年包括十三州的运输网似乎是偏西了一点。

自来统治阶级对于人民的剥削是不肯轻易放松的。如果说隋朝初年

的运输网不能达到所有的农业富庶地区,对于统治王朝说来是一个缺陷,那么这个缺陷在炀帝时候就完全得到补充,满足了他们的需要。隋炀帝开凿了永济渠和通济渠,就是通过了一些富庶的农业地区。通济渠是引谷、洛水入河,再由板渚分河而出,一直流向东南通入淮水,更与淮水之南的邗沟相连接,达到长江。越江而南,还有江南运河,绕过太湖之东而达到杭州。隋炀帝所开的永济渠是在黄河以北,引沁水南入黄河,北到现在天津的附近;又循潞水而上,然后达到当时涿郡所治的蓟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不管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何在,这两条运河应该是隋朝初年的运输网进一步的发展。通过这两条运河,黄河南北及其有关地区所产的粮食,都可运到黄河沿岸而转输到关中去。如果说这个运输网还不够完整,那就是通济渠流向东南,而永济渠通向东北,其中就剩下了现在山东的西部和中部没有包括进来。这一点在后来的唐朝得到补充。武则天时候,在汴州附近从汴河(即隋时的通济渠)引了一条湛渠,东北灌注到现在河南省开封以北的白沟,目的是通到曹州和兖州,也就是现在山东菏泽和旧滋阳县。这条渠道经过的地区虽然不十分明了,不过后来宋朝为同一目的而兴修的广济河就是从这一带流过^[49],可能湛渠就是广济河的前身。在唐朝穆宗时候,在兖州又开凿了盲山故渠^[50],于是泰山附近各地也归入这个运输网中。唐朝前期,关中所需要的漕粮主要取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这个运输网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安史乱后,局面有了很大的改变,黄河下游南北各地成了藩镇割据的场所。由于不断的战争,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摧残。即令生产一些粮食,也被藩镇就地扣留,不能转运到关中去。好在长江下游农业生产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因而唐朝统治者的剥削目标,就集中在东南各地。东南各地所产的粮食也就顺着邗沟、汴河源西运。这时候的永济渠在漕运方面已经不发生若何作用,但通过三门峡的漕舟却并未为之减少。长江下游农业发达的地区,当然是指长江三角洲而言,也就是包括太湖附近在内的地区。不过唐朝统治者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扩大其重点剥削的范围。唐宪宗时,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论当时国内形势。按他的叙述,凤翔、鄜坊等十五道七十一州,是属于藩镇割据的区域,唐朝政府不能够多事过问;唐朝政府的财政开支,仰给于浙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八道四十九州。^[51]当时全国实有州数一共二百九十五州。李吉甫所举的两宗州数,合起来才有一百二十州,就是说还有一百七十五州没有为他所提到。李吉甫没有

提到的原因,并不是唐政府不能控制那些地方,而只是说,那一百七十五州的财政收益不十分丰富,无关全局的盈绌。李吉甫所举的东南八道,是包括淮水以南,五岭以北,现在湖南和湖北中部以东各地。当然各道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像鄂岳、湖南两道,地处长江中游,濒于洞庭湖周围,也是一个从来就很富足的地区,堪与长江下游太湖区域相媲美。肃代二宗之际,刘晏绍领转运盐铁,以搜括财富为己任。他曾经指出:潭、桂、衡阳必多积谷。并且打算:漕引潇湘、洞庭,西指长安。^[52]他所说的潭、桂、衡阳,正是现在洞庭湖以南的长沙、桂林、衡阳等处。其余各道,虽较这里还差一点,但由于没有藩镇割据,没有战争破坏,农业生产还是有成就的。唐朝后期,漕粮取给于东南八道,不是没有缘故的。

唐朝为了从东南各地运输漕粮,充分利用了汴河和邗沟,长江下游沿岸扬州的繁荣,就是因为它在邗沟的口岸,便利运输的缘故。由扬州再向东南,隋炀帝所开的江南运河还依然无损,可以充分利用。当然由扬州往西,滚滚不尽的长江同样起了转输沿岸漕粮的作用。再加上当地其他一些小水道,就可通向这八道的腹地。这样也就形成了以扬州为中心的运输网。而扬州又由邗沟,汴河通过三门峡,而与长安相连接。

应该指出,当时的巴蜀在运输漕粮方面也是属于以扬州为中心的运输网范围之内。巴蜀自古以来就是个富庶区域。前面说过,在秦统一六国之前,已经翻越秦岭、巴山,由巴蜀运输粮食以补关中的不足。汉唐初年也有同样的情况。巴蜀距离关中虽不算十分遥远,但秦岭、巴山的险阻,毕竟会使粮食的运输受到阻碍。西汉初年以后,巴蜀的贡赋如何运到关中,不得而知。唐朝中叶以后,却已经可以看出改变的痕迹。唐德宗时,杜佑司转运,统筹全国漕运,就是把黔中、蜀汉等地的粮食向东运输,顺长江而下,然后再转运到关中去。^[53]这样看来,通过三门峡的漕粮,不仅来自黄河中下游的南北地区,不仅来自东南八道,而且也来自巴蜀了。正如千壑万江汇在一起,要通过尾闾,才能流入海中一样,三门峡正是关东来的漕舟不能不通过的地方。

四 封建王朝解决关中粮食问题的不彻底办法

秦汉隋唐的漕运历史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些王朝的都城皆在关中,关中成为政治中心地;但是当时的经济区域却距关中相当遥远。经

济区域不论是在黄河中下游,或者在长江下游,要和政治中心地的关中相联系,就必须利用黄河,也就是说要通过三门峡。而这里的险阻却使政治中心和经济区域的联系有着很大的困难。是不是还有其他办法改善这种状况?当时的人们一直在考虑着。如果不通过三门峡,漕粮的西运是不是还有可能?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因为三门峡的南岸,由崤山向南,依次接着熊耳、外方、伏牛诸山,向北,又和中条、王屋、太行诸山相对峙。这些崇山峻岭的中间只有黄河一线,连接着东西两方,如果不通过三门峡,运输的艰辛也未必能减轻。

很早以来人们就曾经设想:是不是可从绕远一点路程通向关中?本来由关中往东南,还有越过秦岭、通过武关的一条道路。但是这条道路迂曲险峻,并不下于骹函山路。所以从来提出改道方案的人很少考虑过这里。唐朝中叶以后,由于黄河下游的藩镇割据,东南漕粮不能运到关中,当时曾经改道,由长江汉水而上,越商於,过秦岭,运到关中。^[54]但是行之不久,即告终止。在这以后,虽然整理了这条道路,从蓝田到内乡开了七百余里新道,使往来行旅感到方便^[55],然而却没有听说再从这里转运过漕粮。

还在汉武帝的时候,有人提出开凿褒斜道的主张,想用这种办法来解决通过三门峡的困难。褒斜道在长安以西,而三门峡在长安以东。方向根本不对头,这话怎样说起?原来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是这样设想的:如果把黄河中下游各地的漕粮用各种方法都集中到河南南阳附近,再由南阳附近的清水、比水运到沔水。沔水即现在的汉水。漕粮由沔水西上,运到汉中附近。那里有由秦岭发源的褒水流入沔水,那么在沔水中的漕舟就可以溯褒水而上,达到秦岭山中。离褒水发源不远的秦岭南坡另有一条斜水,它是向北流入渭水,而渭水正是流经长安城下。这个建议的人设想:如果把褒水斜水之间的秦岭山道加工修凿,使稍平坦,用车辆从褒水转运粮食至斜水上游,再装船下运,就可以运到长安城下了。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派人去修凿褒斜道。褒斜道是凿成了,陆运不成问题,但褒水和斜水却整理不好,水流依然湍急,漕舟不能上下,只好作罢。^[56]从整个情况看来,这条整个道路绕的圈子很大,开凿褒斜道的工程也不是十分简单。为什么汉朝政府听从了这个意见,还不惮其烦地进行施工?这正说明了三门峡的运输是如何的困难,它迫使汉朝政府作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和举动。

改变道路既然是不可能的,人们又想:不仰给关东的漕粮是不是可能呢?当时人们是曾经这样做过,从巴蜀转运粮食,就是具体的措施。巴蜀的粮食虽然可以解决一时之急,但是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汉唐初年,曾经从巴蜀运输过粮食,为时未久,都先后停止,就是这个道理。汉朝中叶时,人们也曾想到由河东、上党、太原诸郡转运粮食,这些相当于现在山西的地方,固然有汾水可以供运输,不过这些地方所产的粮食究竟有限,纵然可能运出一些,一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能够解决问题的是从关中和附近地区本身着想。简单的说,就是如何能够提高当地的农业生产。在生产工具没有新的改进时,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办法只有兴修水利一途。秦汉和隋唐都在这方面下过工夫,郑国渠和白渠就是具体的成就。尤其是白渠从汉朝中叶开凿起,一直到唐朝,还能发挥出一定的作用。当然由于兴修水利而增加农田的收成,是可以减少由关东运来漕粮的数目的。不过兴修水利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在封建社会生产关系支配下,地主豪强垄断了土地,甚至在有些地方还控制了水源,使水利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譬如郑、白渠原来可以灌田四万多顷,到了唐朝初年只能灌溉一万多顷。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由于富商大贾地主豪强竞造碾磴,浪费了水流。这种情况虽曾经作过纠正,但在封建社会里不可能根本除掉,所以过了一些时候依然如故。到了唐朝中叶以后,可能灌溉的面积只有六千多顷,作用已经不十分大了。⁽⁵⁷⁾这些王朝在泾渭流域以外其他各地也曾经兴修过若干水利,贺兰山下的黄河西岸和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都曾经有过不少的水利建设。由于当地水利的兴修,确实也解决过一部分边地军民的需要。但是问题的症结乃是在这些水利工程的灌溉面积毕竟有限,有些工程甚至不能够支持许久,因而也就难于充分继续发挥它的效率。

本来关中及其附近地区属于黄土地带,而黄土地带正是适于农业的耕植,只要雨水调匀,是一样可以有丰富的收获的。唐朝中叶开元年间,曾经由于彭杲的建议而推行了和籴办法,并且取得一定的成绩。……彭杲的办法虽不是新的创见,但当时实行的范围比较广大,是值得重视的。其实这种办法如果行之不好,就难免流为一种变相的强夺豪取的手段。彭杲的建议初实行时,不见得就会如此,但是推行一段时期以后,就再推行不下去了,可见其中是有弊病的。但是这种办法最初推行的时候,却也反映了关中地区农业的情况。彭杲建议推行和籴的时候是在开元二十五

年。细检两唐书《五行志》，开元二十五年的前几年，关中地区并没有很大的自然灾害发生。虽然在开元二十四年，曾经记载过夏旱，但这条记载并没有肯定的地区，应该是一个广泛的情况，不限于关中一隅。另外在开元二十二年，有两条记载：一条是“关辅河南州十余水害稼”，另一条是“京畿渭南等六县大风雹”，都是属于自然灾害的范围。虽然有这两条记载，但离彭杲推行和籴法时已经两三年了，应该不至于有很大的影响。可见开元二十五年这一年算得上风调雨顺，就是前两年也还算得没有灾害，因而使彭杲建议的办法能够有实行的基础。这说明在适宜的自然条件之下，关中及其附近地区的农田是可以获得丰收的。应该指出，自然条件的适宜并不是促进农业生产的唯一的条件。因为封建社会里受着封建的生产关系的影响，农业生产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即令有很好的自然条件，也不一定就能够很充分利用起来。何况还有很多人为了的破坏，带来了许多不利于生产的阻碍。

这些事情都可以证明：从秦汉以来的漕粮不断西运，并不能够说明关中及其附近地区就没有很大的农业生产潜力。如果经过人为的努力，这样的潜力是可以发挥出来的。但是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下是办不到的。他们只好求之于关东各地。现在黄河下游各地，当时用作运输漕粮的河道有的早已湮没无存；而当时所谓的运输网也早已成为纸上的陈迹。虽然如此，在三门峡的旁边还可以看到当时栈道的遗存；还可以看到当时船夫曳舟用牵绳在石上磨下的深壕。这种难于磨灭的痕迹正说明当时从事漕运的人民所受的痛苦。

（原载《人文杂志》1960年第4期；收入氏著
《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注 释

- [1] 见《汉书》六十四上《主父偃传》。
- [2] 见《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十六。
- [3] 见《水经·河水注》。
- [4] 见本书《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一文。
- [5][6] 见《元和郡县图志》五《河南道》。
- [7] 见《隋书》二十四《食货志》。

- [8] 见《隋书》二十四《食货志》及《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9][10]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11] 唐宪宗时,王播领盐铁转运使,曾实行水运。见《文苑英华》八八八李宗闵《故丞相尚书左仆射太尉王公神道碑》。
- [12] 《汉书》六十四《主父偃传》说到秦始皇时的漕运,提到“飞乌挽粟”的方法。据颜师古《注》,挽谓引车船,似当时车船兼用,漕粮不一定就通过三门峡。但《史记》五十五《留侯世家》,记张良劝说刘邦定都长安时说,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张良的话自然是根据秦时情形来说的。这样看来,秦时关东粮食的西运应当是循河而上的。
- [13] 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门峡漕运遗迹》附录一。
- [14] 见《隋书》二《高祖纪》下。
- [15] 见《唐会要》八十七《漕运》。
- [16]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17] 见《汉书》二十九《沟渎志》。
- [18] 见《水经·河水注》。
- [19]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关于这条新河的名称,曾有过不同的记载,参见《三门峡漕运遗迹》附录一。
- [20]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21] 见《通典》十《食货典》。
- [22] 见曾慥《类说》二引。
- [23] 见《汉书》二十八《地理志》。
- [24] 见《战国策·秦策》一。
- [25] 见《战国策·秦策》三。
- [26] 见《汉书》二十八《地理志》。
- [27] 见《隋书》二十九《地理志》及《新唐书》三十七《地理志》。
- [28] 见《汉书》六十九《赵充国传》。
- [29] 见《汉书》九十四上《匈奴传》。
- [30] 见《旧唐书》三十八《地理志》。
- [31] 见《汉书》二十四《食货志》。
- [32]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33] 见《汉书》二十四《食货志》。
- [34]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35] 见《唐会要》八十四《户口数》。
- [36] 见《汉书》二十四《食货志》。
- [37]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38] 见《新唐书》五十一《食货志》。
- [39] 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
- [40] 见《通典》十二《食货典》。
- [41] 见《汉书》二十八《地理志》。
- [42] 见《唐会要》七十二《马门》及《新唐书》五〇《兵志》。
- [43] 见《汉书》六十九《赵充国传》。
- [44] 见《新唐书》一〇八《娄师德传》。
- [45] 见陈鸿祖《东城老父传》。
- [46] 见《汉书》六十四《主父偃传》。
- [47] 见《史记》一二九《货殖列传》。
- [48] 见《开皇天宝之间黄河流域及其附近地区农业的发展》。
- [49] 见《宋史》九十四《河渠志》。
- [50] 见《新唐书》三十八《地理志》。
- [51] 见《旧唐书》十四《宪宗纪》。
- [52] 见《旧唐书》一二三《刘晏传》。
- [53]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54] 见《新唐书》五十三《食货志》。
- [55] 见《新唐书》三十七《地理志》。
- [56] 见《史记》二十九《河渠书》。
- [57] 见《元和郡县图志》一云阳县《泾水》条。

参 考 论 著

1. 黄盛璋:《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地理学报》1957年第4期。
2. 王文楚:《历史时期南阳盆地与中原的交通发展》,《史学月刊》1964年第10期。
3. 邹逸麟:《关于楚汉分界鸿沟所在地的商榷》,《文物》1974年第1期。
4. 史念海:《子午岭北段上的直道遗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2期。
5. 王子今:《秦汉黄河津渡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

周原的变迁

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是一个由山川分割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自原始社会起,周原即有发达的农业,周人选择此地为居住地后,周原遂闻名于世。周人时期的周原山川轮廓大致和现在相仿佛,但土地广漠平衍,不同于现在的分割破碎;原上主要的河谷虽已基本形成,但谷地尚浅,不如现在深邃。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本文推断当时的周原水源丰富,饮水便利,农耕兴旺;河谷宽浅,森林茂密,渔猎发达。此后,人类活动使周原不断发生变迁。尤其在唐宋时期,随着岐山及其附近地区森林的砍伐殆尽,河谷发生大幅下切与侧蚀,增加了河流的深度与宽度以及沟壑的密度,周原不断破碎并被切割成若干小原。同时由于河流及沟壑的加深,降低原内的地下水位,使原上的用水感到困难,周原上古代县址的迁移原因即在于此。

一 锦绣的周原

周原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的西部。它北倚崔嵬的岐山，南临滔滔的渭河，千河逶迤经过西侧，漆水河蜿蜒纵贯东面，包括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四县的大部分，兼有宝鸡、眉县、乾县、永寿四县的小部分，东西延袤七十余公里，南北宽达二十余公里，顺着渭河成为西北东南走向。周原广漠，地势大体平衍，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比较充沛，很早以来，就以秀丽富饶闻名于世。

周原西北高敞而东南低下。岐山山脉以西北诸峰为最高，山麓的平原海拔在九〇〇米左右。由于原面向东南倾斜，漆水河西仅高五〇〇米左右。其间高差约三〇〇多米。在长达七十余公里的原上，这样的高差是逐渐递减的。凤翔县城与岐山县城相距 24 公里（以直线距离计，下同），后者较前者低 110 米；岐山县城距扶风县城 25 公里，扶风县城北的原头又较岐山县城低 100 米。旧武功县城位于漆水河谷，恰在周原东麓，其西侧的原头距扶风县城北的原头 22 公里，高程也低 50 米。这种由西北向东南高差递减的慢坡状地形，使周原具备了独异的特点：渭河、千河与漆水河三面环绕，与周围地区界线分明；原面高出周边河床 60 米到 200 米之间，屹然矗立，高平辽阔，不同他处；原上河流，自成体系，主干支流，纵横交错，随原面的倾斜，流向东南。登上岐山，极目向南远眺，但见平畴无垠，沃野连绵，城镇参差，村落栉比，河流曲曲折折，穿插其间，如绣如织，真是一幅天然画图，宏伟而又壮观（图 1：周原地区略图）。

岐山巍巍，早就受人称道。一般习惯所说的岐山，仅指岐山县城东北 6 公里处的箭括岭而言。这里双峰并起，称为岐山，非常形象。虽耸峙入云，究竟不过是岐山山脉中较高的峰峦。岐山山脉绵亘东西，实为周原北面的屏障。峭拔的危峰仿佛就要刺破青天，断续的悬崖像绝壁一样隔断上下，使秀丽的周原气势更加雄伟。嶙嶙的层峰，漠漠的平原，山原衔接，交相辉映，景色绮丽（图 2）。

沔河是周原的主要河流，发源于凤翔县北的老爷岭，横贯周原东西，随着原面的倾斜，曲折回旋，奔流而下，经凤翔、岐山、扶风诸县，到旧武功县城南注入漆水河。沔河随地异名，在凤翔县境称为雍水，岐山县境称为后河，扶风县境称为沔河，到武功县境称为小北河。沔河南侧原面较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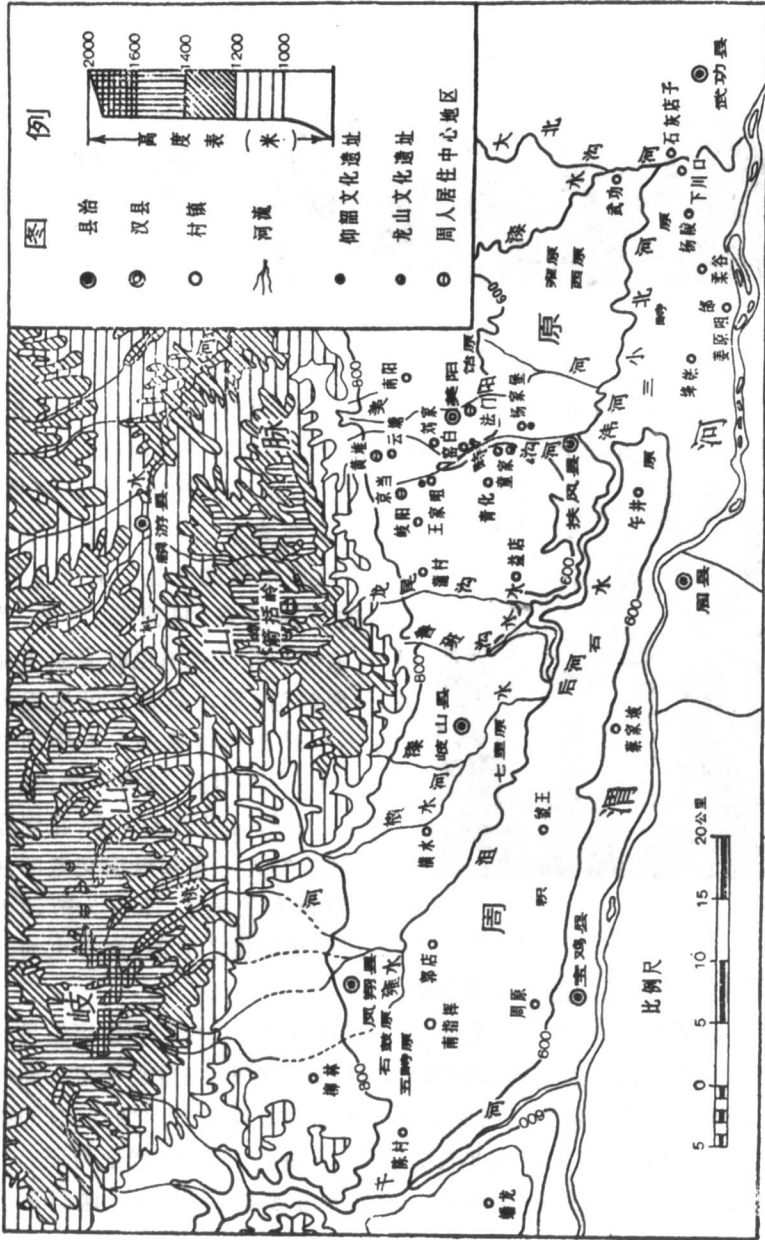


图 1 周原地区略图



图2 从西观山上南望周原图

坦,无支流下注,北侧距岐山更近,山谷中往往有水流下,其支流有横水河、鲁班沟水、龙尾沟水、麻叶沟水、峙沟河、美阳河等。横水河源远流长,亦由西北趋向东南,其他诸支流,则由岐山山麓南流入于沔河(图3)。



图3 陕西省扶风县东关沔河图

沔河水系的水源除地表径流外,常流水主要靠泉水。这些水泉主要分布在岐山山脉的南麓。从西向东,著名的有凤凰泉、润德泉、凤泉、龙泉、马泉等。各河谷中也时有泉水流出,涓涓淙淙,难计其数。可见周原的地下水是相当丰富的。近年到处兴修水库,泉库相接,络绎不绝,宛如长夜天空中的闪闪明星一样,在周原各处,晶莹发光。这些纵横交差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泉水,不仅为劳动人民生活饮水提供了方便,而且也

也为开发、利用和改造周原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原山川秀丽,自然条件优越,自古就是劳动人民生产和繁衍生息的好地方。从原始社会后期起,周原的人口就日趋稠密,农业经济也逐渐发展。当地河流沿岸已经发现的原始社会文化遗址就有三十余处,有的相当广阔,双庵龙山文化遗址南北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就是例证。自那时以后,周原在经济文化各方面一直都居重要的位置,引人瞩目重视(图4)。



图4 陕西省扶风县双庵龙山文化遗址图

二 周人与周原

周原有名于世是从周人居住在这里开始的。要说明周原,就应该从周人说起。

周人时期,周原的山川轮廓大致和现在相仿佛。高耸的岐山是周人恃为兴起的标志,滔滔的渭河在周人未到周原之前即已浮船摆渡^[1],现在的漆水河,周人叫做杜水^[2],周人很少提到千河,大概是和其西的陇山来往不甚频繁。那时的周原广漠平衍,不似现在的分割破碎。原上主要的河谷虽已基本形成,谷地尚浅,不似后来的深邃。周人称当地河流,以漆沮并举^[3],漆水就是现在的横水河^[4],而沮水则是现在的沔河^[5],漆沮两水合流之后,两个水名可以通用^[6],也可以合起来称为漆沮水^[7]。沔河和横水河而外,龙尾沟水、麻叶沟水和峙沟河的沿岸皆有原始公社后期遗址的发现^[8],说明这些河内早已有了水流。周人对此从来没有提到,可见是河小水浅。其实,直到6世纪酈道元撰《水经注》时,还没有把这几条河作为沔河的支流。^[9]

周人的先世选择他们居住的地方是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未迁到周原以前是居住在今陕西彬县、旬邑一带。^[10]他们在那里居住了300多年,到古公亶父时,才迁到周原,又过了一百多年,周人才灭掉殷商,正式

建立周王朝。^[11]

周人为什么离开他们居住了三百多年的故居迁到周原？这是因为受到北方游牧部落压迫的缘故。当时南迁的路径是翻越梁山，经过杜水，到了漆水附近，止于岐山之下。^[12]岐山之下就是周原。梁山在今永寿、乾县间。^[13]用现在的地理来说，当日古公亶父南迁时，大致是由彬县趋向东南，上了永寿梁，改沿漠西河南行，又循现在的漆水河而下，再溯渭河西上，到了横水河畔，然后至于岐山之下。

古公亶父过了梁山之后，为什么没有再朝着东南方向前进，却转向西南，到了当时的漆水旁边？这是由于商王朝在泾渭下游仍有相当的控制力量的缘故。今户县东北当时是崇国。^[14]今三原、兴平诸县间，那时有一个荡社，荡社之王称为亳王^[15]，这个亳王后来也称商。^[16]崇国和荡社都是商王朝在西方的诸侯。古公亶父既受游牧部落的压迫，率领整个部落逃走，当然是想寻找一块商王朝控制力量薄弱的地方，不会跑到商王朝的诸侯之间。

现在已经发现周人当时居住的中心地区，就在岐山县京当公社与扶风县黄堆公社和法门公社之间。周人选择这里作为居住的中心，一方面是因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便于继续经营他们久已娴习的农业；另一方面是凭倚岐山，防御来自北方的侵扰。古公亶父所以迁到周原，是由于受到了游牧部落的压迫。如何防御游牧部落，便成了当务之急。当时的漆水河畔诚然有居住的便利条件，广漠的平原却难于抵抗外来的骚扰。现在京当公社近在岐山之麓，岐山险阻，是可以限制游牧部落的铁骑的。周人迁居周原之后，游牧部落不是没有再肆侵袭过，但周人修筑了城池，作好了准备，游牧部落的侵袭就难于得逞了。^[17]

当时选择居地，首先应该注意水源的远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多分布在河滨水畔，正是这样的道理。古公亶父时周人是否已知道凿井？还有待继续证实。近年来在法门公社任家村发现了一眼周代的井。井是椭圆形，与沔西遗址发现的西周井相同。周人迁居周原之后，历年长久，这眼井目前还不能肯定就是古公亶父初来时凿成的。即令是当时已知凿井，但从周人选择居住中心地区的地理形势来看，当时饮水主要还是取之于河流或水泉的。

扶风县城东门外的畴沟河，上游通到王家嘴。再往北去，称为王家沟。京当就在王家沟西。京当以南，沟内都有水流。这条河形成很早。

沿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不少,丁董家为仰韶遗址,双庵、窑白、杨家堡皆为龙山遗址,那时的人皆濒河流而居,是为了取水方便。这些遗址的发现,就可证明这条河里当时已经有水。居住在京当的周人自可就近于王家沟取水饮用。

由当地的地形观察,周人始迁到这里时,水源应该是很丰富的。黄堆以南,刘家、任家以北,是一个低凹地带,成为东西略长的盆地。这里的土壤为灰油土层,相当肥沃,与附近各处不同。这显然是山坡表土随洪水而下淤积起来的,推测这个盆地的最低凹处在古代可能有些较小的泽藪。齐家村旁尚有湖泊遗迹可以为证。泽藪中可能有鱼,齐家周代墓葬中曾发现大量鱼骨,说明周人食鱼的一部分是由附近泽藪捕捞的。

岐山南麓的泉水也是周人饮水的来源。周人经常以南北二山并提。南山自是终南山,而岐山就包括在北山之中。南北二山森林都很茂密,郁郁葱葱,互相媲美。^[18]山上森林茂密,山下水源自然丰富。周人对于泉水本来就是相当注意的。公刘初迁到邠时,先要观其流泉^[19],就是例证。周人到了岐山之下,对于泉水还是十分重视。^[20]周人以周原为居地,丰富的水源是起到一些吸引作用的。现在岐山南麓的泉水已经不多了,但京当公社之北仍有数处,潺潺涓涓,可以想见当年的盛况。其中西观山上的龙泉附近,曾是隋代龙泉寺的所在。寺中旧有隋时舍利塔铭,现存扶风县文化馆。今天龙泉依旧,只是水量不如以前旺盛了(图5)。

岐山的森林茂密,适于狩猎,也是周人选择这里作为居地的一个原因。周人虽以经营农业著称,但对于狩猎也十分重视。狩猎所获禽兽,用以款待诸侯和供群臣的饮宴。周人的诗歌就曾经提到这一点。^[21]而岐阳附近也正是一个著名的狩猎场所。^[22]现在黄堆公社云塘村发现周人的制骨作坊,就是证明。这个遗址范围有五万多平方米,是全国已发现的最大的制骨作坊。目前发掘的还只是一小部分,就已经清理出加工过的废骨几万



图5 陕西省扶风县西观山龙泉图

斤。这些兽骨不一定完全取之于岐山,但岐山就近在眼前,周人对山上的飞禽走兽当然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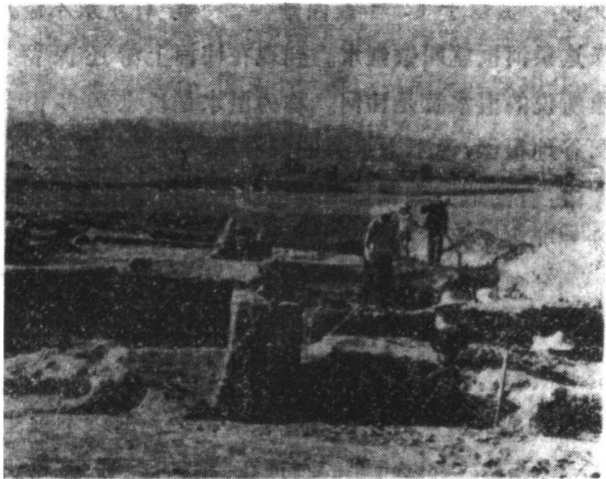


图6 陕西省扶风县正在发掘中的云塘村
周人制骨作坊图

当时的狩猎区域也还应该包括周原上的一部分林地。虽然周人曾经称道过“周原赳赳,萁茶如飴”^[23],而萁茶只是有苦味的生菜,但周原上还是有灌、柵、桤、椴、檉、柘等类的树林的。树林中竟然经常有菑、有翳,菑是立死的树木,翳是自毙的树木。^[24]这种自生自灭的现象正显示出森林面积的广阔。广阔的林区自是适宜于狩猎的场所。

周人是经营农业的部落。当他们初到豳的时候,就曾在那里“度其隰原,彻田为粮”^[25]。到了周原,同样要疆理田亩的经界,按时耕种。^[26]由于农田的不断扩展,居民点也就相应地增加,奴隶主的采地也随着到处分布。从汉代以来,周原上就常有周人的文物出土,其中有的还是成批的。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积存,应该是奴隶主采地的遗物。这些成批文物的不断出土,正是奴隶主采地增多的表现。随着采地的增加,剪伐森林,开垦种植,耕地面积也就迅速扩展。

周原上的周人于狩猎农耕之外,还经常捕鱼。当时主要的捕鱼区就是漆沮水。那时的诗人歌颂说“猗与漆沮,潜有多鱼”^[27],正是这种情况的具体描述。游鱼多了,就有食鱼的白鹭飞来。因此诗人又说:“振鹭于

飞,于彼西雍。”^[28]“雍”有止水不流的含义,所以后来这条河也就叫做雍水。到现在沔河上游还保留这个名称。这里所说的沮水就是沔河。称为沮水是说水旁多沮洳地。^[29]现在沔河谷地很深,说不上水旁的沮洳地。可是从凤翔县以下,河谷都很宽敞,有的地方竟宽过一公里。沔河南岸是陡岸,有的地方已经深陡到九十多米。北岸却是漫坡,形成了滑移阶地。这都是后来冲刷的结果。周人初到这里时,当不是如此。那时河谷既然不深,河水有时甚至滞而不流。虽然是一条河流,有这样宽的河谷,水涨满的时候,说它是个水泽,也是合乎情理的。

这个沮洳地的河流,不会有什么舟楫之利的。不过沔河南距渭河不远,渭河上是可以行船的。远在公刘居豳时,就曾使人渡过渭河,采取南山的磨刀石。^[30]周人迁到周原之后,离渭河更近,充分利用渭河的交通条件,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三 周原的切割

周人以后的周原,在悠长的岁月中不断发生变迁,酈道元撰《水经注》,论述地理,考古证今,率属确实。其说周原,乃在今横水河行将流入沔河河段的东北,岐山之下。^[31]虽然说得明确,但和周人所说的周原就不同了。周人所说的周原是“居岐之阳,在渭之将”^[32]。这里的“将”字有侧旁的意思,是说周原在岐山的南面,靠近渭河。酈道元的解释,周原不仅没有靠近渭河,而且离沔河还有一段路程。这不是酈道元有意说错了,而是周原已经发生了变迁。后来一些县志,越说越小,也互不一致。有的说在岐山县交河(横水河与沔河会合处)东北 30 里^[33];有的说在扶风县东北,延 60 里,袤 40 里,北枕梁山、美山之麓,南临沔河,西阻峙沟河,东到武功县的西原^[34]等等。总之,范围越来越小,方位也不断变化。

周原变迁的显著特征就是原面的缩小和破碎。魏晋之间,已经分出了一个积石原^[35],唐代又添了三峙原^[36]和武功县的西原^[37],这个西原到明代又称为雍原^[38]。以后的原名更多,凤翔县有五峙原、石鼓原^[39]、彭祖原^[40],岐山县有七里原^[41],扶风县有饴原^[42]。如果算上那些以“原”字为名的村庄,就更为繁多了。

从周原分出的这几个原中,以积石原为最早。积石原见于记载既在魏晋之间,上距古公亶父的南迁,大约有一千五百年上下。促成周原的初

步切割和积石原的形成,关键就在沔河的下切已到了明显的程度,这时已经不是沮洳地的沮水,而是切割周原的一条较大河流。因此,在积石原见于记载以后约三百年,酈道元撰著《水经注》时,就把周原缩小到只有横水河下游以东的一部分了。

促成河谷的下切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沔河仅长一百多公里,迄至现在仍穿行于黄土层中,没有下切到基岩,还不算十分显著。这是由于周原西北与东南的高差只有三百多米,原面逐渐倾斜,坡度较缓的缘故。所以在周人迁居之后,沔河两岸仍是一片沮洳地。既然沔河在那时为沮洳地,而且还潴而成泽,则当时沔河口的侵蚀基准面还是相当高的。西汉中叶,曾在周原下开凿一条成国渠,引渭河水东流。成国渠的渠道近年已大致探出,经过漆水河的地方是在武功县西6公里的石灰店子。成国渠是怎样经过漆水河的?估计当时不会在漆水河上架设渡槽,可能是筑堰堵水,引漆水河水入于成国渠中。这就说明,当时的漆水河谷还是比较浅的。现在石灰店子附近成国渠故道下距漆水河谷地已经30米(图7)。自成国渠凿成时到现在约为2100年。则这里的漆水河谷大致平均每百年下切进度为1.5米。由成国渠凿成时到魏晋之间,约三百八十年上下。按每百年平均下切进度计算,则魏晋之间石灰店子的漆水河谷只下切了5.7米上下。隋时曾引杜阳水灌溉三畹原。^[43]杜阳水就是现在的漆水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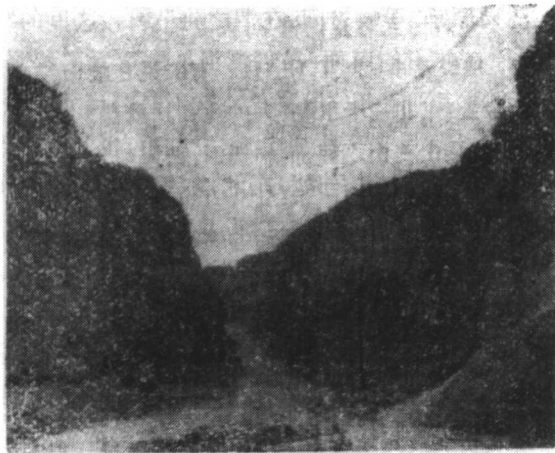


图7 陕西省武功县石灰店子村西漆水河岸旁高崖及大路图

当时引水口在什么地方不可知,但能够引水上原,说明河谷不是太深的。漆水河的下切自然会影响到沔河口的下切,使沔河的侵蚀基准面降低。上面所说的数字虽不是很大,但也会增加沔河的落差,促使沔河的下切较前加快。正因为如此,遂使原来完整的周原中间好像有了一条界河,分周原为两半,而沔河以南的部分就另成为积石原。当然,促成这样的现象,还应该有其他的原因,譬如周原上森林的剪伐也会加速土壤侵蚀,使沔河的下切加速。

积石原从周原分出以后,南北两原的土壤侵蚀各有不同。积石原面积较小,最宽处才十余公里,窄处只有几公里。原上的倾斜面仍是朝着东南,无论是南临渭河还是北临沔河的一面,倾斜度都不是很大的。所以再不会引起很严重的土壤侵蚀,因此原面一直保持着平整,就是原边的沟壑也是十分短促的,临渭河的一面更显得如此。

缩小后的周原则另是一番景色。明显的变迁就是沟壑的增多、加深与原面的支离破碎。靠近岐山的部分,地面倾斜度较大,土壤容易为流水侵蚀。周人以后的周原,就逐渐为沟壑切割成南北向的长条块,最宽的原面不过13公里。与周人在这里居住时的情况大不相同。造成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是岐山及其附近地区森林的被剪伐罄尽。

周人迁居周原时,岐山的森林参天蔽日,郁郁葱葱,到处是一片绿色的海洋。岐山森林的基本消失是在唐宋之间,唐代建都长安,曾大量砍伐岐陇材木供京师之用。为了运输方便,还专门开凿一条引千河水东流的升原渠^[44]。唐代以后,岐山已经没有材木,所幸陇山森林还有孑遗,于是采伐区域向西推移。宋代建都开封,秦陇两处都成为砍伐材木的重点。宋代为防备西夏,关中西经常驻有重兵。边防将帅和军士贩运秦陇材木到开封,都大发其财^[45],足见其数量十分惊人。由于岐山已无森林,所以当时苏轼就说“况当岐山下,风物犹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46]。秃山泔河,说明水土流失的严重性,周原的许多深沟大壑显然是唐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因为在沔河集水区内,沔河以北的原面既较积石原为广阔,又因靠近岐山,地面坡度也大,地表径流丰富,在植被保留很少的情况下,每遇暴雨,径流骤生,必然形成强烈的侵蚀与切割。

沟壑的发展主要是沟头的向上伸延。周人留下的文化遗存集中在京当、黄堆、法门之间。而这里正是沟壑最为密集的地区。有些沟头显然仍在不断向上伸延,有的甚至已经伸延到山麓。这里位于畴沟河的上游。

峙沟河在王家咀以北称为王家沟。峙沟河在王家咀附近,东受齐家沟,西受岐阳沟和双庵沟。双庵沟甚短促。王家沟形成很早,齐家和岐阳、双庵三沟都远较王家沟为迟。特别是刘家沟在刘家附近冲断了一处东汉墓群,说明这条沟的形成最早也应在东汉以后(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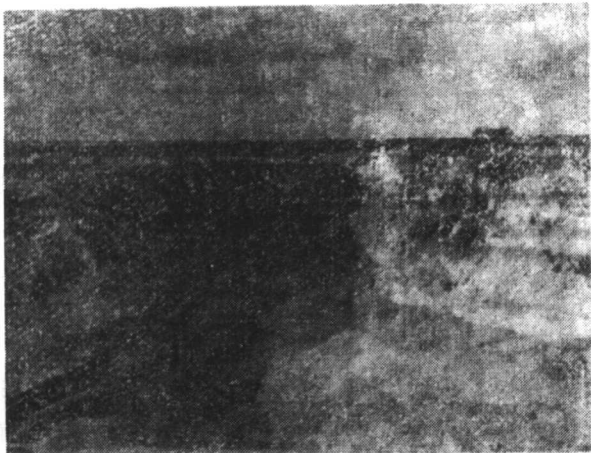


图8 周人居住中心地区的刘家沟图

沟壑的加深促使地下水位的变化。因而引起周原上各县县城的迁徙,而迁徙的时期集中在由南北朝到唐代之间。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变法,开始设县。当时周原上设有雍县和美阳二县^[47],雍县故城在今凤翔县南古城村,近年曾经发掘过^[48]。美阳县故城在今扶风县北十公里法门寺,即崇正镇。今美阳河东岸东桥堡残留汉瓦当甚多,可以为证。北魏时雍县始迁于今凤翔县城东五里^[49],美阳县也迁到古郿城^[50]。北周时迁美阳县于今旧武功县城北的原上。^[51]但只有四年,就省掉这个美阳县,别于今武功公社设立武功县。^[52]北周还设立了一个三龙县^[53],其故地当在今岐山县城东北杜城附近。^[54]然二十余年后,三龙县就移到岐山南10里,并改为岐山县^[55],其地在今岐山县城东北故郡寺^[56]。隋时雍县始移于今凤翔县城^[57]。岐山县再经移徙,至唐初始定治于今岐山县城。^[58]唐初于今扶风县境并设岐阳县扶风县。^[59]岐阳县故城就在法门公社^[60],扶风县即今县治。岐阳县只设了一百多年,即行废去。^[61]

在这段时期里,几个县城频繁的迁徙,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一再迁徙?史书都没有记载原因。北魏于今凤翔县城东别置雍城镇^[62],雍县随

着迁徙。当时置镇具有军事意义,雍城镇也应该是一样的。其他各县城迁徙之际,周原上都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故。所以迁徙的原因还应从这些县城的迁徙地点去探求。三龙县是由今杜城附近迁到今故郡寺,故郡寺正在鲁班沟水的源头。鲁班沟水迄今依然是条小溪涧,当时水源也难怪得很旺,所以县城不久还是迁走了。美阳县是由周原上迁于渭河沿岸。后来虽迁回原上,只有四年,又改名另迁到漆水河边。从迁城的过程可以说明,显然是为了取水的方便。今法门公社虽曾长期作过县治,但自岐阳县废省后,再没有在这里设县。这就不难看出,唐代以后美阳河已经十分深邃,法门寺饮水困难,已不宜再设立县治。美阳河的下切进度已难确知,但从赵家窑(法门寺北3公里)以北东到柳村(赵家窑东北3公里)之间,和法门寺北城门经大北巷到云岭(法门寺东南2公里)之间发现古代河床看来,过去的美阳河可能很浅,同时也不固定。估计秦汉王朝在这里设立美阳县时,美阳河谷不是很深,法门寺一带地下水也较浅,取水比较容易。秦汉以后,随着美阳河的下切,到唐时可能取水已不方便,岐阳县就设而复废。现在,法门寺附近的美阳河深达三十余米,当地地下水很深,取水不便。由此证明,美阳县的迁徙,岐阳县的废掉,都是不得已的事情。南北朝和隋唐以后,周原上的几个县城或者近在河旁,或者就在河谷,所以用不着再迁徙了。

周原的变迁主要是由于河流的下切与侧蚀,增加了河流的深度与宽度,以及沟壑的密度,使周原不断破碎,切割成若干小原,促成这种情况的发展,则是由于岐山上森林的消失和侵蚀基准面的降低。前者使大雨时山洪暴发,地面径流骤增,后者则增大了河流的落差,这些都加速了土壤的侵蚀。同时由于河流及沟壑的加深,降低原内的地下水位,使原上的用水也感到困难。当然,由于地下水层的分布不均匀,周原地区的地下水深度也难得一致。

(原载史念海:《河山集》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

注 释

- [1] 《诗·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 [2] 王引之《经义述闻》的《自土沮漆》条。杜水见《汉书·地理志》。其下游经中亭川,称中亭水,见《水经·渭水注》。后称武亭水,见宋敏求《长安志》十四。康海

《武功县志》则以之为漆水，讹误竟流传至今。康海原意是想借此解释“自土沮漆”的漆，却没有想到，如果这条水是漆水，那么，杜水又将在什么地方？

- [3] 《诗·周颂·臣工之什·潜》。
- [4] 这条漆水的问题最多，各家解释互有参差。其详见胡渭《禹贡锥指》十。不过作为古公亶父所到的漆水，应该在周原或近于周原。《水经·渭水注》曾叙述到这条水。据说，“漆水出杜阳县之漆溪，谓之漆渠。”并引徐广说，“漆水出杜阳之岐山者是也”。接着又说，“漆水南与杜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俗谓之小横水。”小横水就是现在的横水河。按照这样的说法，只有岐山县由润德泉流下的南溪沟水可以当之。现在南溪沟水流入横水河，横水河又流入渭河。郦道元没有说明南溪沟水以下的横水河和渭河作为杜水，实际上所谓漆水就无从附丽了。到周人的时候，这几处河段都应该叫做漆水。《诗·大雅·绵》篇叙述古公亶父南迁的过程，曾说，“自杜沮漆”；又说，“率西水浒，至于岐下”。当时的路程是循杜水而下，再溯漆水而上。这是沿着河谷而行的。如果现在的渭河在今横水河后这一段在那时不是漆水，这句诗就没有着落了。周人当时溯漆水而上，曾到过现在横水河沿岸，再由此东折到岐山之下，现在已经证明周人部落当时的中心居地在今岐山县京当公社和扶风县黄堆公社之间，正是在横水河以东。《绵》篇所说的“水浒”，指的就是漆水旁边。《毛诗正义》解释“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说是“循西方水涯漆沮之侧，东行而至于岐山之下”，正是这样的意思。康海《武功县志》以杜水为漆水，自然是错误的。嘉庆《扶风县志》驳斥了《明史·地理志》以时沟河为漆水之说，这是对的。它虽因袭了《武功县志》错误的说法，却又同意刘世瑞《扶风漆水考》的说法。这篇考证文字实际上仍是因袭《明史·地理志》的旧说。据原作者说，这是根据《水经注》得出的结论。但《水经注》所说的漆水是流入横水河的，而时沟河却是流入渭河的。
- [5] 辛树帜：《禹贡新解》，页144。
- [6] 参见注[4]及《诗·周颂·潜》。
- [7] 王引之《经义述闻》曾作过解释。本来二水相合互受通称，这在《水经注》中是早已阐明过了的。但王氏却说：“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诗、书皆以二字连称，分言则谬矣。”按王氏所说，则渭河下游固然是漆沮，渭河上游即现在的雍水也应是漆沮，而横水河只能算是它的支流。王氏既作这样的解释，所以他解释《诗·绵》篇的“率西水浒”，就难免牵强了。
- [8] 陕西考古所渭水队《陕西凤翔、兴平两县考古调查报告》，刊《考古》1960年第3期。
- [9] 《水经·渭水注》。
- [10] 关于旬邑及彬县的周人遗址，见石璋如《传说中周都的实地考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册。

- [11] 《史记》一一〇《匈奴传》。
- [12] 《史记》四《周本纪》说：古公亶父“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地诚有漆水，但无沮水。渡漆水乃是逾梁山以后事。《周本纪》在这里颠倒了路程的次序。
- [13] 梁山，一般皆说是在今乾县北5公里处。但漠西河上源永寿县北的山也属于梁山一脉。《水经·渭水注》就称之为梁山大岭。
- [14] 《史记》四《周本纪》。
- [15] 《史记》五《秦本纪》。
- [16] 今传世的小孟鼎的铭文中就提到这个部落。或说这是殷灭后逃窜来的遗民。殷周之际，周人势力方强，殷民何能西向逃至周都的附近？当是此地旧有的部落，而与殷的关系密切。
- [17] 《诗·雅·文王之什·绵》。
- [18] 《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南山有台》所说的就是一例。
- [19] 《诗·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 [20] 《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及郑玄笺。
- [21] 《诗·小雅·南有嘉鱼之什·吉日》。
- [22] 《左传》昭公四年。
- [23] 《诗·大雅·文王之什·绵》。
- [24] 《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及郑玄笺。
- [25] 《诗·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 [26] 《诗·大雅·文王之什·绵》。
- [27] 《诗·周颂·臣工之什·潜》。
- [28] 《诗·周颂·臣工之什·振鹭》。
- [29] 辛树帜《禹贡新解》页144。
- [30] 《诗·大雅·生民之什·公刘》。
- [31] 《水经·渭水注》。
- [32] 《诗·大雅·文王之什·皇矣》及郑玄笺。
- [33] 光绪《岐山县志》一《地理志》。
- [34] 嘉庆《扶风县志》三《山水》。
- [35] 《晋书》一《宣帝纪》。
- [36] 《元和郡县志》二《京兆府》下。
- [37] 《新唐书》三十七《地理志》。
- [38] 康熙《武功县志》一《地理》。
- [39]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十六《凤翔府》。
- [40] 乾隆《凤翔府志》一《舆地》。

- [41] 光绪《岐山县志》—《地理志》。
- [42] 嘉庆《扶风县志》三《山水》。
- [43] 《隋书》四十六《元暉传》。
- [44] 《新唐书》三十七《地理志》：“凤翔府虢县，西北有升原渠，引潏水至咸阳；垂拱初，运岐陇水入京城。”岐陇水当为岐陇木之误。
- [45] 全汉升《宋代官吏之私营商业》，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册。
- [46] 《苏东坡集·前集》二《东湖》。
- [47] 《元和郡县志》二《京兆府》下。
- [48] 陕西省考古所凤翔发掘队《陕西凤翔南古城村遗址试掘记》，刊《考古》1962年第9期。
- [49] 《元和郡县志》二《凤翔府》。
- [50] 《太平寰宇记》二十七《雍州》。
- [51] 《太平寰宇记》二十七《雍州》。
- [52] 关于美阳县故城所在地的说法不一。《后汉书》四十七《梁懂传》说，懂尝转战武功美阳关。章怀《注》，“美阳，县名，故城在武功县北七里，于其所置关。”东汉时，武功、美阳本是两个县治。当时美阳县并未省去，何能于其故地置关。既说是武功美阳关，当是武功县境别有美阳关。形成这样的错误，与北周的美阳县有关。《太平寰宇记》说，北周时还旧理。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美阳县复迁到崇正镇秦汉时期的美阳县故城。其实不然。今崇正镇有一古城，据唐释道宣《法苑珠林》说，此城是隋炀帝大业末年所筑，以防外寇。大业末年上距美阳县治的再迁不到五十年，如果当时秦汉故城犹在，何必再筑新城？这正说明美阳县治并未迁到秦汉时期的美阳县故城。《后汉书·梁懂传·注》所说美阳故城在武功县北七里，所指的乃是北周迁徙的故城，并非秦汉时期的美阳县故城。《太平寰宇记》又说，美阳城在武功县西七里。可知所说与秦汉时期美阳县故城无关。北周时美阳县故城有武功县北七里和西七里两种说法。实际上当在县北七里。今武功公社北两公里处有一条古道沟，就沟的地形和沟的名称看来，这里本是一条旧路，由于久无行人，遂冲成沟壑。这条旧路当是适应美阳县城而修的道路。如果这种推论不错，则美阳县故城应在古道沟上端新寨与凉马村之间。《水经·渭水注》说，“中亭川水又南径美阳县之中亭川，注雍水，谓之中亭水。又南径美阳县西。”这是说，北魏时的美阳县城在今漆水河和沔水河合流后向南流的东面。这一段漆水河谷相当窄狭，当时不可能在此设县。其北东面的原上也无故城的遗迹与记载，《水经注》所说的“又南径美阳县西”，可能是县东之误，漆水河西正是《太平寰宇记》所说的郃城。
- [53] 《元和郡县志》二《凤翔府》。
- [54] 嘉庆《清一统志》二三六《凤翔府》引《旧志》，三龙故城在岐山县东北五十里。

嘉庆《扶风县志》二《疆域》谓在岐山县东北四十里。光绪《岐山县志》一《地理》谓今杜城上营诸村左右为三龙县故址，与嘉庆《清一统志》、嘉庆《扶风县志》的说法相合。惟《岐山县志》以此为隋开皇十六年所移的新县城。按《元和郡县志》，开皇时移县于岐山南十里，显非杜城上营等处。

[55] 《元和郡县志》二《凤翔府》。

[56] 光绪《岐山县志》一《地理》谓即岐阳宫。然《元和郡县志》明言移县于岐山南十里，当是故郡寺，而非岐阳宫。

[57] 《元和郡县志》二《凤翔府》。

[58] 《元和郡县志》二《凤翔府》。

[59] 《元和郡县志》二《凤翔府》。

[60] 根据《元和郡县志》的记载，岐阳县和扶风县均距凤翔府一百里，辨其里程方位，岐阳县治应在今法门公社。隋代曾在法门修有城池，唐初设县，也足资利用。今岐山县有岐阳堡，与此岐阳县无关。岐阳堡距杜城仅二公里半，杜城附近为三龙县旧治所在地。岐阳县始建置时，三龙县迁去未久，当时不会于三龙县废弃的旧址近旁复置新县。

[61] 《太平寰宇记》三十《凤翔府》。

[62] 《元和郡县志》二《凤翔府》。

参 考 论 著

1. 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2. 唐少卿、伍光和：《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自然条件变化的若干问题》，《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4年第1期。
3. 王守春：《论古代黄土高原植被》，《地理研究》1990年第4期。
4. 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 境变迁概况》，收入氏著《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古文献中的“江”不是长江的专称

古文献中的“江”作为长江的专称,是沿革地理研究中一种流行的观点。作者引用大量史料例证,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异议。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证明早期四渎——“江、河、淮、济”是以邹、鲁、泗上(今山东中南部)为中心的古代“山东”居民对这一带主要水道的认识,其中的“江”不指长江,而是指鲁东南的沂河。第二、三部分进一步指出,“江”并不是长江水道的专称,在古文献中,今淮水和汉水及荆楚地区某些河流也被称为“江”。作者指出,对待古文献中的“江”,不能一概认为指长江,应作具体分析和鉴别,以免造成空间上的错觉。用史实考证地望是本文的特点。

石泉(1918—2005),安徽贵池人。生前为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荆楚历史地理、中国近代史研究。

把古文献中的“江”字,视为长江的专称,这似乎是直到目前还相当流行的一种传统看法⁽¹⁾,而且往往以此作为考订古代地理的一个前提,据以推断与这些“江”字相关的其他地名方位。但是,如果我们对有关的原始资料作一些具体分析,就会发现:古文献中的“江”字并不专指长江。简单地把带有“江”字的地名,都和长江联系起来,从而把这些地名都定在长江附近,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个问题是研究古代长江流域历史地理在资料上必须弄清楚的起点之一。因此,值得进行一番认真的探讨。

让我们看看以下几方面的例证。

一 古“四渎”之“江”不是长江,当是 今苏北、鲁东南之沂河

古代“四渎”(江、淮、河、济)中的“江”,一般都认为是指长江。但是,从“四渎”的最古记载来看,却不像是如此。《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云: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四渎”的方位,却是淮在南而“江”在东。如果这个“江”是长江的话,则淮水还在它以南,怎能讲得通?

这个问题,前人已注意到。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所引史诂的说法,就转而怀疑这段《史记》关于江、淮二水的方位是因错简而颠倒,并举出唐人徐坚《初学记》所转录上述《史记》关于“四渎”的河与济两水方位与今本《史记》互倒(作“北为河,……西为济”)为例⁽²⁾,来加强这种看法。

今按:此说并无确据,只是在认定“江”是长江的前提下,为了解决由此引起的同《汤诰》所记“四渎”之“江”在方位上的矛盾而作的一种设想而已。他所引的《初学记》关于河、济二水的记载,虽与今本《史记》所记互倒,但江、淮二水的方位,却仍同《史记》所引《汤诰》一致。这就更不能据以推断《史记》之江、淮二字也有误倒了。

如果《史记》不误(梁玉绳也认为《史记》不误,并指出司马迁曾亲见孔安国所整理的古文《尚书》真本,所以这篇《汤诰》虽为今本《尚书》所无,当非伪造),则古“四渎”之“江”,就不会是长江,而应是在淮水东北方,即今

鲁南、苏北地区的另一条较大河流。在这里,较著名的水道是沂河(旧称沂水),发源于鲁中的山区,与沭河(旧称沭水)并行南流。据《水经注》卷二十五泗水篇及沂水篇末,以及卷二十六沭水篇所记,此二水在古代都在下邳城(今江苏邳县南,古邳州城)附近入古泗水,更东南流,于今江苏清江市(旧淮阴县)以北入淮水。如果按照汉代以来的解释,“四渎”都直接入海,这条沂水也可以说得通,因其下游也有分流入海之道,而且不止一途。这从今天的地形图上也可看出。总之,这条古沂水同上述“四渎”之“江”的位置,看来基本相符。

还可找到足以与此相证的其他材料:《韩非子·喻老篇》云:

吴兵既胜齐人于艾陵,张之于江、济,强之于黄池,故可制于五湖。

这里以江、济连称,而且与春秋末期吴、齐艾陵之战相联系,则此“江”必接近艾陵。济水故渎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境的黄河下游。艾陵则在今山东省中部泰安、莱芜二县间。⁽³⁾那么,这个“江”就又不可能是长江,而只能在今山东省境。这就又同上文所考“四渎”之“江”(沂河)的位置相合,而艾陵也正位于此“江”与济水之间。

《国语·吴语》对这件史事也有如下记载:

吴王夫差既胜齐人于艾陵,……乃起师北征,闾为深沟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

这段记载正可与上引《韩非子》互相印证,两者都以艾陵之战与黄池之会为首尾,记吴王夫差北上争霸的活动。《国语》所说吴国在商(即宋,今豫东、苏北及鲁西南一带)、鲁(今山东中部,曲阜至费县一带)之间开深沟(运河),北连沂水,西接济水,正是《韩非子》所说吴人活动于江济之间的具体补充。把这两个材料结合起来看,《韩非子》所说之“江”,其位置同《国语》所说之“沂”,又正相合。

另一条有力印证是《史记·封禅书》所云:“四渎咸在山东”。当时“山东”的范围并不包括长江流域,所以《史记·平准书》云:

是时(指汉武帝元鼎二年),山东被河蓄,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诏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

这里的“山东”与“江淮间”是显然分列为两个地区的。由此也可看出:直到汉武帝时,“四渎”之“江”也还不是指长江,而是与其他三渎“咸在山东”。

还有一个称为“江”而非指长江的重要例证。《山海经·东山经》云：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环水出焉。东流，注于江。

《山海经·东山经》所记诸山，基本上都在今山东省境，这是前人一致的看法。即使作个简单的初步分析，也会看出：发源于今山东省境泰安附近的河流，又是“东流注于江”，则所注之“江”显然不会是长江。

我们再作进一步的考订，就更可看出这个“江”仍然指的是今之沂河。关键则在于环水所发源的“泰山”究竟在哪里。

前人由于总认为古文献中的“江”专指长江，跳不出这个框框；同时，又一向认为“泰山”就是现在山东泰安市北的东岳泰山（又称岱山、岱宗）。于是对《山海经》这条记载就很难解释得通，从而就产生了牵强附会的说法，甚至硬把这个“江”字改为“汶”字。^[4]

现在需要先弄清这个“泰山”的地望。古代以“泰山”为名的山，在今山东省境内有文献记载可考的，就有好几处。例如：今山东东部，临朐县南，穆陵关（古称大岈关）以西的沂山，也叫泰山，又称东泰山，亦名小泰山。^[5]今山东省中部，新泰县西北四十里，与莱芜县交界的新甫山也叫泰山。新泰县始设于西晋初期，其名称来源就是“取新甫、泰山之意”。^[6]

更值得注意的是春秋初期以前鲁国的“泰山”。这也是现存史料中关于“泰山”的最古记载。《左传》隐公八年经云：“郑伯使宛来归枋田。”杜预《集解》云：“枋，郑祀泰山之邑，在琅琊费县东南。”《左传》对于上引经文又作了如下的补充说明：“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枋易许田。”孔颖达《正义》释此云：“郑以桓公之故，受邑于泰山之下。……刘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谓泰山之旁有此邑。”《公羊》、《谷梁》二传中所引《春秋》的这段经文，“枋”（音崩）皆作“邲”。这两字是双声，音近，当是同一城邑名称的不同写法。《公羊传》隐公八年记此事云：“邲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

据上引各项较古的记载和注释，枋（邲）邑显然是在鲁国境内的泰山之旁。而据上引杜预注，枋邑又明确定在魏晋时的琅琊郡费县东南，亦即今鲁东南的费县附近。^[7]酈道元《水经注》对此也有记载（详后），与杜注一致而更详。

在这一带也正有这样一座地望、条件相当的名山，就是蒙山。其主峰龟蒙顶就在今费县西北不远。当时鲁国的泰山盖应在此，即蒙山在古代

之另一名称,就好像沂山、新甫、岱山(岱宗、东岳泰山)之亦称泰山一样。这也使我想到:在今山东一带,古代以“泰山”为名的大山,如此屡见不鲜,很可能“泰山”古非专名,而是这一带的一些著名大山之通称。因此,《诗经·鲁颂·閟宫》之“泰山岩岩,鲁邦所瞻。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诗句,似应理解为:泰山即指龟蒙,而非传统解释之以泰山为东岳泰山。

发源于这个“泰山”附近的水,只能东(或东南)流入沂河,这是地形决定的。而沂河又正是上文所考古之“四渎”之“江”,这就又同《山海经·东山经》所记发源于泰山、东流入江的环水,在源流及所入之水等方面都正相合。《水经注》卷二十五沂水篇有“治水”,又称小沂水,东南流,入沂水。在治水北岸,费县故城的东南,还记有柘城。注文并指出:这就是《春秋》和《左传》所云郑人祀泰山之柘邑。附近另有柘河,为治水支流,东入治水。合流之后,下游亦称柘水(现在地图上则把这条治水统称为柘河,亦称浚河)。结合上文所考来看,这条水应即上引《山海经·东山经》所说的环水。今本《水经注》在汶水篇中把环水作为汶水支流的石汶水,说它入于汶水。虽引了《山海经》环水入江的记载,却未能把二说协调起来,至多只能使读者由此得出“汶水或亦称江”的推论而已。这也是由于沿袭了郭璞注之误,把《山海经》中的“泰山”当作东岳泰山而必然导致的结果。

综上所述,可知从《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到《封禅书》所记“咸在山东”的早期“四渎”,应是反映着当时以邹、鲁、泗上(今山东省中南部)为中心的古代“山东”居民(似可一直上溯到分布于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文化”以及随后的“山东龙山文化”居民)对这一带主要水道的知识。江、淮、河、济分据东南西北的方位,就是围绕着这一地区而定下的。后来(大致从西汉后期开始)^[8],随着长江流域的逐步开发,长江在全国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于是长江就成为“四渎”之一,并反映在东汉初年成书的《汉书》中。日久之后,《史记·殷本纪》所引《汤诰》中关于“四渎”的最古记载、《封禅书》所引汉初人“四渎咸在山东”的说法等等,反而被看成不可理解,从而很少被人提及了。

二 淮水古亦称“江”

淮水在先秦时期亦有“江”之称。这从以下五点例证可以看出:

(1)《左传》哀公元年云:“春,楚子围蔡,报柏举也。……蔡人男女以

辨。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杜预《集解》云：“楚欲使蔡徙国，在江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权听命，故楚师还。”东汉人服虔释此“江”字，认为是指江国（见孔颖达《正义》引）。江国即在蔡国西南，今河南正阳县南，息县西，淮河北岸。^[9]孔颖达《正义》驳此说，认为江国与汝水之间早已是楚地，蔡无从割让，且“汝水与江国不可共文”，因而主杜注之说，认为楚使蔡在长江与汝水之间自择疆域，欲令迁都近楚。

今按：孔《疏》驳服虔以“江”为江国之说甚是。但所主杜预之说，亦难成立。这个与汝水连称之“江”，能否就是长江？有人对此已提出过疑问^[10]，因为汝水与长江相去很远，两者之间，包括整个大别山区，中间还隔有淮水，汝水即东南流入淮。当时蔡国的都城新蔡就在汝、淮之间。淮水以南，直到长江，地区广大，从来与蔡国无关。大别山周围，原先小国林立，后来陆续并入楚国。楚果欲徙降服之蔡，当如春秋时惯例，指定地点，进行迫迁即可，岂能令蔡人于此广大地区之内自择疆土？果真要迁徙蔡国，也决不能使之“疆于江、汝之间”，因为汝水以南，近淮之地，本是蔡境，如果所疆之地又听蔡自择，则蔡人尽可仍在汝南故居，尚何云徙？《左传》原文：“使疆于江、汝之间而还”，语意明确，显然是楚人重新划定了蔡国疆域，然后还师。这里看不出有使蔡国在长江与汝水间广大地区中自择疆域之意。反之，倒是楚国划定了蔡疆，还师之后，蔡人深感威胁，于是“请迁于吴”，第二年就迁到州来（即下蔡，在今安徽凤台县北，淮河北岸，与寿县相对）去了。^[11]

此次楚之攻蔡，《左传》明言是“报柏举也”。十二年前（定公四年），蔡人曾联吴伐楚。柏举之战大败楚师之后，直下郢都，使楚几濒于亡。估计此时蔡人当并有楚地，扩大了疆域。^[12]此次蔡人降服之后，楚当已重取失地，缩小了蔡国疆域，使之局限于江、汝之间，则江、汝二水理应相近，此“江”当非长江，而应是汝水以南不远，位于蔡国南境之淮水别称。所谓“江、汝之间”，实即淮水与汝水之间，亦即吴、唐、蔡师入郢以前的蔡国故地。这样解释，似较符合当时形势。服虔以江国释此“江”，固非；但淮水之又称“江”，或与此位于淮水上游北岸的江国之名“江”，不无关系。

(2)《左传》哀公四年还有以下一段记载：

夏，楚人……乃谋北方。……致蔡于负函，致方城之外于缙关。曰：“吴将沂江入郢，将奔命焉。”为一昔之期，袭梁及霍。……蛮氏溃，蛮子赤奔晋阴地。

这里“吴将泝江入郢”之“江”，通常被认为是指长江。但如果我们结合春秋时吴楚作战的总形势以及当时的水上交通条件来看，就不能不发生疑问：由吴至楚，如果溯长江而上，道途远非近便。那时的船舶构造以及航行技术是否足以有效地克服长江风涛之险，进行大规模的水上行军，特别是远途溯流行军？恐吴人不大可能选择这样的进攻道路。事实上，春秋时吴楚交兵的主要战场一向是在淮水流域。《左传》所记定公四年吴师入郢的著名战役，就是泝淮西上，舍舟于方城之外的蔡境，然后会蔡、唐之师，深入楚境，直下郢都。这次“泝江入郢”之说，看来仍是指的这条行军路线。所以楚人借口备吴而作的军事布置，也都在“方城外”的淮水上游。然后出其不意，由此突然转道北进，攻灭了汝水上游及洛阳以南的山区中“蛮氏之国”。由此看来，“泝江入郢”之“江”，应仍指淮水，而非长江。

(3) 淮水又称“江”，还表现在古文献中常有以“江淮”连称，而实际上是指淮水之例。

《史记·楚世家》云：

是时(惠王四十四年)越已灭吴，而不能正江淮北，楚东侵，广地至泗上。

又《越世家》云：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周元王……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地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从这两段记载中可看出：越灭吴后，控制了“江淮东”。它所不能控制的“江淮北”，则放弃给楚、宋、鲁等国，而这些地方(所谓“淮上”、“泗东”及吴所侵宋地)却都是在淮河以北，并不包括江北(淮南)地区。张守节《史记正义》根据唐朝人的地理概念解释说：“江淮北，谓广陵县、徐、泗等州。”应该指出，他把江北(淮南)的广陵县(今江苏扬州市一带)也包括进去，并无史实根据；而且广陵正属于“越兵横行”的“江淮东”地区，又正当越人北上争霸的通道，在勾践称霸以后的全盛时期，怎能任楚侵据？所以这里的“江淮北”实际上是指淮北。这也就反映出：“江淮”实际上是指淮水。

(4) 战国时人谈到楚国灭越以前的东部边境形势时，常以“江南”、“泗上”并称，视为两大要地。例如《史记·越世家》记越王无强对齐使谈论越与楚的边境形势时，就说：“楚之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战国策·楚策

一)记城浑劝说楚国的新城令,以新城近秦宜阳(今河南宜阳县),受秦的威胁很大,因而“今边邑之所恃,非江南、泗上也”。而建议楚王增设新城郡以御秦。这里的“江南”通常也被认为是指长江以南。张守节《正义》解释《越世家》所记“江南”,就认为是指洪、饶等州(今江西省北部,南昌至上饶一带),以此为当时楚之东境。但这样一来,楚越边境要地就恰恰缺少了在当时楚国东境以寿春(今安徽寿县)为中心的淮南、江北一路,而这一路在当时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交通上,都远比长江以南重要。《左传》所记春秋后期吴楚之间的边境形势以淮河流域为最突出,就是明证。而战国晚期寿春之所以能成为楚都,下至汉魏六朝,一直是淮河流域的中心城市和军事重镇,直至大运河修通之后,始渐为楚州(今江苏淮安)所取代。不能设想,战国人议论楚国东部边防时,竟会完全忽视淮河流域这一路,反而把当时的长江以南提得更为突出。所以,结合上文淮亦称“江”的考释来看,这里所说的“江南”,应亦指淮水以南,换言之,此“江”也是指淮水而言。

(5)最后,在古文献中,还常有同一史事在不同书中或同一书的不同版本中,出现了以“江”作“淮”,或以“淮”作“江”等情况。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将王翦攻取楚国淮北地区的陈、平舆一带,捉住楚王之后,“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裴駮《集解》引徐广曰:“‘淮’亦作‘江’。”换言之,“淮南”亦作“江南”。又如《国语·吴语》云:“于是勾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吴越春秋》记此事则作“屯海通江,以绝吴路”。再如《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六》云:“晏子……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淮南子·原道训》则云:“故橘之江北,则化而为枳。”这类记载上的出入,过去通常被视为版本校勘或记载分歧的问题。现在我们如果结合上文所考,淮水本亦可称为“江”,则当时人对淮水之传述与记载,自可以“江”、“淮”互相转用。这样,那些出入之处也就可以相通,而不一定是文字的正误问题了。

三 汉水及荆楚地区某些河流古亦称“江”

汉水又称“江”,在古文献中有较明显的记载。

《史记·周本纪》云:“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周昭王南征是在汉水上,这是古今皆无异议的。《史记》在这里所称之“江”,显然不是长

江,而只能是汉水。

《三国志·关羽传》云:“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刘备当时驻军于汉水北岸的樊城,在曹操大军南进的压力下,率部南退。过江之后,便到襄阳。以后还在当阳长坂被曹操率军追及,打了个大败仗。则自樊南渡之“江”,显然又只能是指今湖北襄樊市附近的汉水。

《舆地纪胜》卷八十四京西南路,郢州“风俗形胜”栏引唐郢州刺史崔耿所作《天王堂记》云:“今之郢理,古石城戍也。郡城跨大江之东。”唐之郢州治长寿县,即今湖北钟祥县,位于汉水东岸。而崔耿却说是在“大江之东”。这说明唐代的汉水也还有“大江”之称。

此外,“江汉”连称,而实际上专指汉水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史记·封禅书》记齐桓公的话:“寡人……南伐至召陵,登熊耳以望江汉。”召陵和熊耳山都在今河南省境,登熊耳山所能望到的“江汉”,只能是襄樊一带的汉水,不可能望见长江。同样,《史记·齐太公世家》记春秋时召陵之盟,楚屈完对齐桓公所说:“则楚方城以为城,江汉以为沟,君安能进乎?”这个“江汉”也显然是指汉水,因齐师由东北来,而长江犹在楚都以南,只有汉水才能阻齐。《史记》这段记载主要依据《左传》,彼此内容基本相同。但《左传》僖公四年记此事,则作:“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可见,“江汉”实即指汉水。再如《荀子·议兵》云:

(楚)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郟、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阻隘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也。

这里提到的“江汉”作为防秦的“固塞阻隘”之一,显然也是专指汉水。

在古代的荆楚地区,除汉水外,其他河流也还有称“江”的。《晋书·桓玄传》云:“移沮、漳降蛮二千户于江南,立武宁郡。”《宋书·州郡志三》荆州“武宁太守”条云:“晋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蛮立。领县二。……乐乡令,……长林男相。……”这个武宁郡及其属县乐乡与长林都在今湖北省荆门市北境和钟祥县西北境,^[13]这是一般都同意的。但《晋书·桓玄传》却把这里称为“江南”。则此所谓“江”,显然又不是长江,而只能指武宁郡以北的今蛮河(汉水支流,在今宜城县南境,东南流,入汉)的下游。

《宋书·王镇恶传》云:

(平刘毅后,)出为安远护军、武陵内史。……初行,告(荆州)刺

史司马休之，求遣军以为声援。休之遣其将朱襄领众助镇恶。会高祖（刘裕）西讨休之，镇恶……乃率军夜下。江水迅急，倏行数百里，直据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笼盛石，堙塞水道。襄军下，夹岸击之。斩襄首，杀千余人。

刘宋时的武陵郡在今湘西北一带。王镇恶由这里顺流北归所经的这条“江”，可以“倏行数百里”；可以用竹笼盛石，加以阻塞；并且在截击朱襄的军队时，还可以两岸夹击。这都说明：这条位于武陵郡、水流很急而又并不深广的“江水”，显然不会是长江。据《宋书·州郡志》，武陵郡治临沅县，当在今湖南常德市西。^[14]据《水经注·沅水篇》，武陵郡都尉治在沅陵县故城，当在今湖南沅陵县南。^[15]则此“江水”应是沅水上游，沅陵以西一段。

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江”就不是长江的专称。因此，当我们在古文献中遇到“江”字时，决不能简单地认为一律是指长江，而必须结合相关的材料，进行具体分析和鉴别。这样才能避免张冠李戴，造成空间观念上的错觉。

（原载《文史》1979年第6辑；收入氏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注 释

- [1] 这种传统说法，可以清初人胡渭《禹贡锥指》为代表。胡渭在书的“略例”中说：“南人得水，皆谓之江；北人得水，皆谓之河。因目岷江曰大江，黄河曰大河。此后世土俗之称，非古制也。……禹主名山川，亦未尝假借。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水经》篇题，概曰某水，绝不相假借，深得《禹贡》之意。”《禹贡锥指》一向被认为是研究《尚书·禹贡》的权威著作之一，因此也就成了传统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
- [2] 参阅徐坚《初学记》卷六，江第四。
- [3]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山东二，济南府泰安州莱芜县，“马尔关”条附“艾陵亭”条，说艾陵在莱芜县东北；沈钦韩《春秋左传地名补注》卷十二，哀公十一年，“战于艾陵”条引《山东通志》云，在莱芜东境；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七之一，都邑，齐，艾地附“艾陵”条云，在泰安东南。三说互有小出入，但大致不出今泰安、莱芜间。
- [4] 例如郭璞在“江”字下注云：“一作海。”但“注于海”同样是讲不通的，因为地形决定了发源于今东岳泰山一带的水，只能西南流入汶河，不可能东流入海。《水经

注》卷二十四汶水篇环水条引了《山海经》关于环水源流这一条,但今本《水经注》则把旧本《水经注》引这一条的“入于江”原文,改为“入于汶”。清人赵一清校释这一条的按语说:“郭璞曰:‘江,一作海。’此‘江’字固误,‘海’字亦非,当作‘汶’。”但尚未径改“江”为“汶”。而稍后的戴震校刊本(即通行的所谓“官本”)就干脆把“江”改成“汶”,并加按语说:“近刻讹作‘江’。”戴震并说,他是根据《永乐大典》中的《水经注》来校改的(参阅“官本”目录末纪昀、戴震的按语)。但是现在《永乐大典》本《水经注》已经影印流传,其中所引的这一段《山海经》却仍是“江”而并不是“汶”字。所以戴震在这一问题上的弄虚作假,已经不攻自破。

- [5] 参阅《水经注》卷二十六沭水、巨洋水、汶水诸篇及赵一清释;民国《山东通志》卷二十一疆域志,山川总,“沂山”条。
- [6] 参阅《新泰县志》(光绪十七年增修本)卷一,建置沿革;卷三,山川(增),“新甫山”条;卷七,古迹,八景,“新甫拥翠”条。
- [7] 参阅《读史方輿纪要》卷三十三,山东四,兖州府沂州费县“费城”条;《大清一统志》(乾隆本)卷一百四十,沂州府一,古迹,“费县故城”条。
- [8] 《汉书·郊祀志下》记汉宣帝神爵元年以后,“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并指出此后江、淮、河济都有固定的祠祀地点,“江”祠定在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南),每年祠祀四次,仅次于黄河(五次)。这反映出,从西汉后期起,“四渎”之江已是长江,而不再是位于淮河东北方的沂河了。
- [9] 关于江国地望,参阅《汉书·地理志上》汝南郡安阳县下,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左传》僖公二年杜预《集解》;及《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篇;《读史方輿纪要》卷五十,河南五,汝宁府真阳县,“安阳城”及“江城”条;《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十六,河南省汝宁府古迹,“安阳故城”条;又卷二百十五,汝宁府建置沿革,“正阳县”条。
- [10] 参阅董书业《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1962年中华书局版)页98、99,《春秋楚郢都辨疑》。
- [11] 关于蔡迁州来,参阅《左传》哀公二年十一月所记,及《水经注》卷三十淮水篇。关于州来今址,参阅《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七,安徽凤阳府古迹,“下蔡故城”条。
- [12] 关于蔡国在柏举之战后,曾乘胜兼并楚地,一度扩大了疆域,今存史料虽无直接记载,但《左传》所记楚国当时灭胡国的情况,可以作为旁证。《左传》定公十五年云:“吴之人楚也,胡子尽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二月,楚灭胡。”胡国,据《左传》昭公四年杜预注,在魏晋时汝阴县西北之胡城。汝阴县当在今安徽阜阳县;胡城故址在县西北二里(参阅《大清一统志》卷八十九,安徽省颍州府古迹,“汝阴故城”、“胡城废县”条;《读史方輿纪要》卷二十一,江南三,颍州,“汝阴废县”、“胡城”两条),则胡国正位于蔡国东邻。胡国既能在吴、蔡、唐三国军队攻入楚国之时,乘机夺取本国附近的所有楚国城邑,则比胡国强大、又直接参加攻楚战役的蔡国,自必更有力量占领本国附近

的楚地,从而扩大了疆土。

- [13] 参阅《读史方輿纪要》卷七七,湖广三,荆门州,“长林废县”、“荆门城”、“乐乡城”诸条;《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六十五,湖北省安陆府古迹,“长林故城”、“乐乡故城”条。《湖北通志》卷三十六,建置志十二,关隘二,荆门直隶州,“乐乡关”条云,乐乡关即古乐乡县治所,位于今荆门市北端,与钟祥县交界处,故应包括今钟祥县西北境。今乐乡关一带已划入钟祥县境。
- [14] 参阅《宋书·州郡志》,郢州“武陵太守”条;《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湖南常德府古迹,“临沅故城”条。《读史方輿纪要》卷八十,湖广六,常德府武陵县“临沅城”条说在沅陵县东。《大清一统志》对此有考订,今从之。
- [15] 参阅《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篇;《大清一统志》卷二百八十四,湖南辰州府古迹,“沅陵故城”条。

参 考 论 著

1. 史念海:《论禹贡的导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黄河》,《陕西师大学报》1978年第1期。
2. 谭其骧:《〈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中华文史论丛》第7辑;收入氏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石泉、鲁西奇:《古夏水源流新证》,《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陈桥驿

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将绍兴地区历史时期形成的聚落按地域类型分为山地、山麓冲积扇、孤丘、沿湖、沿海和平原聚落六种主要类型,分析了它们形成的原因及其各自职能,并探讨了各类聚落在数量、类型与地理位置方面的发展与变迁。本文认为,古代绍兴地区的聚落形成,始于会稽山地聚落,这种聚落适应了当时迁徙农业和狩猎业生产的需要,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了从山地向平原的开发进程,适宜定居农业的山会平原聚落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聚落类型。而山麓冲积扇聚落等其他聚落类型均是在开发平原的过程中派生而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反映了历史时期人们对各种不同自然环境的利用和改造。

陈桥驿,1923年生,浙江绍兴人。浙江大学地理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区域地理,并多年进行《水经注》研究。

聚落的形成与地域类型

本文论述的范围,指南起会稽山地,北抵杭州湾,东西各以曹娥江和浦阳江为界的地区,即历史时期的山阴、会稽两县和萧山县的一部分。本区南部是一片高度不超过一千米的会稽山地,山地北缘分布着一系列山麓冲积扇,冲积扇以北是开阔的山会平原。在古代,平原上除了崛起于冲积层的若干孤丘外,是一片河湖交错的沼泽地。北滨杭州湾,古代称为后海。这个地区的气候是一种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会稽山地人为活动没有大量破坏以前是茂密的原始森林。本区自然条件优越,人类活动发轫甚早,聚落出现有了悠久历史,本文叙述从有历史记载的越部族开始。^[1]

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越部族的生产活动主要是迁徙农业和狩猎业,这就是《吴越春秋》卷四所说的“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部落居民的活动范围还局限于会稽山地,聚落的形成当然也在山地之中。当时,越部族的中心,也常常迁徙于会稽山地之中,仅《水经注》记载的就有两处^[2],一处称为“埤中”,据记载在“诸暨北界”;另一处在秦望山南,《水经注》说:“山南有嵯岷,岷里有大城,越王无余之旧都也。”像这一类部落中心的大型聚落,直到刘宋时代,尚有遗迹可寻。^[3]其它著述中记及会稽山地在越部族时代的大型聚落的还有:《越绝书》卷八记载的会稽山上城、木客、苦竹城;《越州旧经》记载的侯城^[4]等等,这些称城的聚落,有一些至今仍有线索可稽。以《越绝书》记载的苦竹城为例,今漓渚镇以南4公里绍兴(兴)诸(暨)界上有苦竹村,座落在娄官江上游的一处山间盆地中。《越州旧经》说“苦竹城在山阴县西南二十九里”^[5]。按方位里程今苦竹村与《旧经》所记符合。其实,在自然条件较好的山间盆地或河谷地之中,当时都可能建立聚落,只是不见于记载罢了。由于人们从事迁徙农业和狩猎业活动,所以这些原始的聚落可能从不固定,这就是《吴越春秋》所说的:“无余质林,不设宫室之饰,从民所居。”^[6]但是无论如何,会稽山地中这一时期形成的聚落,是绍兴地区历史时期见于记载的最早聚落。

古代绍兴地区的聚落首先在会稽山地形成,这是和当时的生产性质及自然条件有密切关系的。因为山地中拥有丰富的森林和动物资源,山间盆地和河谷地有平坦的土地可以进行刀耕火种,因此,越部族原始聚落

就在这里形成,并且持续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部族人口的增加,聚落分布局限在会稽山地的这种情况就开始有所改变,《越绝书》记载关于越王勾践迁都的事^[7],就是这种变化的标志。勾践在公元6世纪后期移治会稽山北。据清毛奇龄的考证,其地在今平水镇附近的平阳^[8],这说明越部族的生产活动范围,已从崎岖的会稽山地,进入了山北的一系列山麓冲积扇地段。除了平阳以外,《越州旧经》记载的越王城,即今古城村^[9],也正在这一地段。从自然条件来说,这一带土地广阔而平坦,灌溉便利,水土资源的丰富较之会稽山地不可同日而语;而和北部的沼泽平原相比,它们却又位处山麓,地势高燥,不受咸潮的威胁,有利于定居农业的发展。而且每一冲积扇都有流入平原的河流,交通便利。越王勾践所说的:“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10]恰恰就是这个地带。这样,山麓冲积扇就成为越部族从会稽山地进入北部平原的跳板,形成了越部族在会稽山北的第一批聚落。从这一带近代发现的许多战国和汉代古窑址中也可以得到证明。^[11]

定居农业在山麓冲积扇地带的发展,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部族居民进一步向水土资源更为丰富的北部冲积平原推进成为势所必然。这就是《吴越春秋》卷五越大夫范蠡所说的:“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焉立霸主之业。”不过,要开发江湖密布、咸潮出没的沼泽地,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于是,崛起于冲积平原上的许多孤丘,就成为人们开发沼泽平原的立足立。山会平原上的这类孤丘多至数百,它们从二、三十米以至百余米,不受咸潮的冲刷。孤丘上的森林和泉水,提供了燃料和饮水的方便。孤丘南麓的向阳地带,又为人们的居住提供了有利的小气候条件。于是人们就以此为基地,在此地围堤筑塘,发展农业生产。这样,在公元前6世纪之末,山会平原上的孤丘聚落就陆续形成了。其中可以作为代表的是种山以南的小城。种山即今卧龙山,是一座东北西南向伸展的孤丘,长约2公里,最高点75米,北坡颇陡,南坡缓倾,全山至今尚有泉水五处,其中在南坡者四处。种山南麓是建立聚落的理想地点,越王勾践七至八年(公元前490—489年),开始在此山南麓建立聚落,称为小城。^[12]它接着和附近其他七处孤丘聚落连成一片^[13],成为今绍兴城。在越部族进入山会平原的初期,孤丘聚落一时纷纷形成,仅《越绝书》卷八所记载的,就有种植衣料作物的麻林山和葛山,驯养牲畜的犬山、白鹿山、鸡山、豕山,此外还有稷山、独山、巫山、独妇山、龟山、土城山等等。

孤丘聚落的形成对于开发广大的平原沼泽地是一个有利条件,从春秋至秦汉,山会平原特别是它的南部,由于地形较高,排水容易,必然已经有了较多垦植并出现了许多聚落,只是由于缺乏记载,以致这一时期聚落形成的具体过程不很清楚。后汉初期鉴湖工程完成,这里出现了鉴湖这样一个面积达二百余平方公里的巨型水库,山会平原南部从会稽山麓线以下直到湖堤的地区,聚落均遭淹没。但鉴湖筑有长达 127 里的湖堤,堤上设置了 76 处闸堰等水工建筑。^①沿湖堤一带,当然是一片高燥地带,这个地带于是立刻形成了许多聚落,举凡从事闸堰管理、农业、水产业、运输业等等居民,都聚集在这带状分布的沿湖聚落之中。这类聚落,常常以闸堰为名,至今尚存的陶家堰可以为例。^[14]甚至在鉴湖湮废,闸堰消失以后,这种以闸堰为名的聚落依然存在。清平步青所说的:“越中常禧门外,自跨湖桥迤南而北,有中堰、湖桑、清水闸、沈酿堰、湖塘诸村,绵亘四十里。”^[15]就是沿湖聚落中的一段。

在沿湖聚落形成以后,北部杭州湾(后海)沿岸的沿海聚落也接着逐渐形成。早在春秋越部族时代,由于海运和制盐业的需要,少量沿海聚落已经出现,《越绝书》卷八记载的固陵、杭坞、防坞、石塘等,都是为了军事需要而建立的沿海聚落,其中固陵和杭坞等的地理位置,目前都仍比较清楚。^[16]由于制盐业而形成的沿海聚落称为朱余,可能即是今日三江口附近的朱储村。当然,当时因为海塘并不完整,沿海聚落只是零星地出现。等到鉴湖工程完成以后,由于山会平原北部迅速开垦,海塘建筑成为当务之急,而随着海塘的建筑,沿海聚落就开始大量地形成。古代绍兴北部海塘修筑的正式记载见于《新唐书·地理志》,为时在公元 8 世纪(722 年、开元十年),说明了唐初海塘已经完整,则沿海聚落必然有了很大发展。

鉴湖成堤以后,山会平原北部广大地区的垦殖具备了良好条件。特别是公元 4—5 世纪晋代的北人大规模南迁,山会平原的土地到达“亩值一金”^[17]的程度,垦殖加速进行,平原聚落大量形成,迅速发展。当时,在聚落形成的初期,大量聚落必然首先在接近湖堤便于垦殖的地带建立,但是随着沿海堤塘的修建,远离湖堤的土地也有了垦殖的条件,于是湖堤与海塘之间的广大地区,都有了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海塘全部完成以后,整个山会平原摆脱了咸潮的影响,河湖网迅速得到整理,鉴湖积蓄的淡水开始向北部转移,鉴湖的功能逐渐为分散于北部平原的广大河湖网所代替,

湖底淤浅,围垦加速,最后终于在12世纪初叶,即宋代的北人大规模南迁中全部湮废。^[1]于是,原来是湖面的山会平原南部随即迅速垦殖,大量聚落在这里出现。这样,从南宋以后,整个山会平原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平原聚落空前发展,人口稠密,聚落栉比。明人在这一带的旅行记载是:“十树一村,五树一坞。”^[18]清人的记载更为生动明白:“湖田日辟,屋庐坟墓日稠,千村万聚,一望如屯云。”^[19]平原聚落在古代绍兴地区的各类聚落中形成最晚,但却得到其它各类聚落所完全不可比拟的发展,它在清代官方登记的山、会二县的1353个聚落中约占73.5%的绝对多数。^[20]

平原聚落的分布与河湖有密切关系,大量的这类聚落分布在河流沿岸,这就是明王阳明所说的:“越人以舟楫为舆马,滨河而廛者,皆巨室也。”^[21]此外,有的分布在渡口桥边、河港尽头,有的分布在大小河流的汇口,有的分布在葑泥填淤的洲岛,这些聚落,常常以河、湖、港、渚、泾、桥、渡、汇、埭、荡、葑、埠等为名。在清代官方登记的山阴县的668处聚落中,以上述河、湖、港、渚等为名的达230处,在会稽县的685处聚落中,更达263^[22]处,在山、会二县清代官方登记的聚落中占三分之一以上,情况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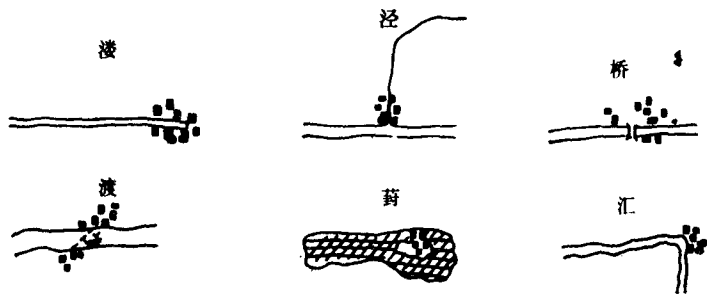


图1 平原聚落的几种图式

如上所述,绍兴地区历史时期形成的聚落,按其地域类型有山地聚落、山麓冲积扇聚落、孤丘聚落、沿湖聚落、沿海聚落、平原聚落等。每一种地域类型的聚落,不仅有其特殊的自然环境,而且也有其特殊的聚落职能,即聚落居民所从事的主要生产活动。聚落的地域类型的形成,实际上就是历史时期劳动人民对各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利用和改造的反映,而聚

落的命名则往往和自然环境及聚落职能有关。以《越绝书》卷八所载的若干地名为例：富中大塘以建筑堤塘发展农业得名，朱余以制盐业得名^[23]，独山、龟山以自然环境得名，豕山、鸡山则是以畜牧业的聚落职能和孤立的自然环境两者结合而得名。绍兴地区历史时期形成的各聚落类型，其自然环境、职能和常见地名等大体如下表所列。

聚落类型	自然环境	聚落职能	常见地名	占聚落总数*的百分比%
山地聚落	1000米以下的丘陵，山间盆地，河谷地。	开始是迁徙农业和狩猎业，以后转入定居农业。	山、岭、城、溪等。	13.5
山麓冲积扇聚落	向北缓倾而平坦的冲积扇北缘是河流的通航起点。	农业、内河运输业。是山地和平原的交通纽带。	塘、埠、埠头等。	4.5
孤丘聚落	二三十米到百余米的孤丘，周围是沼泽平原。	农业、畜牧业。	山。	3
沿湖聚落	人为的湖堤，堤南是鉴湖，堤北是沼泽平原。	闸堰管理和内河运输业、农业、水产业。	闸、堰、塘、坝等。	2
沿海聚落	人为的海塘，塘南是山会平原，塘北是杭州湾。	塘闸管理和航海业、水产业、农业。	塘、闸、山、溇**等。	3.5
平原聚落	沼泽平原河流交错，湖泊密布。	农业、水产业、内河运输业。	河、湖、港、溇、泾、桥、渡、汇、溇、荡、葑、埠等。	73.5

* 据《山阴都图地名》及《会稽都图地名》所载的聚落总数。

** 绍兴方言，河港尽头的聚落称“溇”，沿海聚落往往位于南北向河港的尽头，故名“溇”者甚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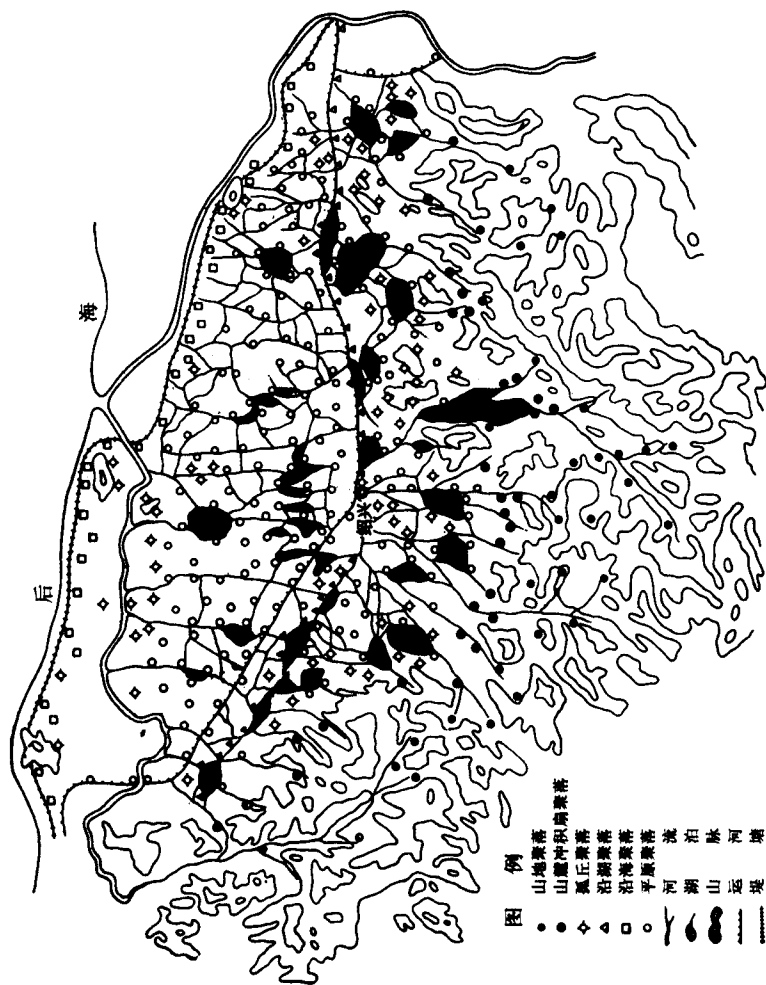


图2 南宋绍兴地区聚落分布图

聚落的发展与变迁

聚落的地域类型及其分布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加以及自然环境在人类利用和改造下所发生的改变,聚落类型及其分布也不断地发展变迁。

在历史时期聚落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当然是聚落数量的增加,这是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加的必然结果。山、会二县有人口统计数字始于北宋大中祥符年代(1008—1016年),两县人口约为5万人。^[24]到了南宋嘉泰元年(1201年),两县人口就增加到约12万人。^[25]到了明洪武年代(1368—1398年),人口增加到约33万人^[26],而万历年代(1573—1620年),增加到约64万人^[27],到了清嘉庆七年(1802年),仅山阴一县,人口就达1008000余人。^[28]清代末叶,山会平原地区已经到达“水岸田畔,凡可资耕种者,几无一隙之存”^[29]的情况。人口成倍地增长,土地利用又这样地高度集约,聚落增加自可想见。当然,聚落的增加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是平均发生的。以会稽山地为例,虽然这个地区的面积要占山、会二县总面积的47%^②,但自从平原逐渐开发,越部族北移以后,人口和聚落的增长都是十分缓慢的。主要的原因是丘陵崎岖,缺乏平坦的可耕地,农业发展困难。尽管唐代以来因植茶业的兴起而利用了若干山坡地^③,但是直到南宋,会稽山地虽然人口不多,但农民仍然不得不在收获季节到耕地众多农事繁忙的山会平原去出卖劳动力。^[30]像平水镇这样的山区大集镇,却还是“山鸟啼孤戍,……草市少行旅”^[31]。而陆游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32],就是写的这一带聚落稀疏的情况。这和山会平原“十树一村,五树一坞”,成为明显的对照。明代后期,玉米和番薯这两种适宜于在山地种植的粮食作物先后传入这个地区^[33],山地才开始大量垦殖,清代记载这个地区已“无森林之可言”^[34],说明垦殖扩大,人口和聚落当然大有增加。但和山会平原相比,百分比还是很低的。

各聚落类型之间的差异,历史时期也不断发生变化。上文已经论及,聚落分布之所以具有不同的地域类型,是由于不同地区在自然环境上的特殊性以及这种特殊性所引起的聚落在职能上的差异。一旦这种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在人类利用和改造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聚落的职能也会相应改变,于是,不同类型的聚落之间的差异也就随之消失。例如山会平原上

早期形成的孤丘聚落,是作为人们在咸潮出没的沼泽平原上的立脚点而出现的。在孤丘周围的沼泽平原得到改造以后,这类聚落和一般平原聚落之间的差异也就消失。同样,沿湖聚落的形成是鉴湖水利工程修建的结果,鉴湖湮废以后,这类聚落也就成为平原聚落的一部分。北部滨临杭州湾的沿海聚落也随着海岸的移动而发生变化。自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钱塘江河口是稳定在南大门的。但从明代开始,逐渐有了北移现象。山阴海塘以北的涨沙也随着逐渐扩大。到了清代初期,江道转移到北大门,南大门全部淤涨,沿海聚落从此不再滨海,就变为一般的平原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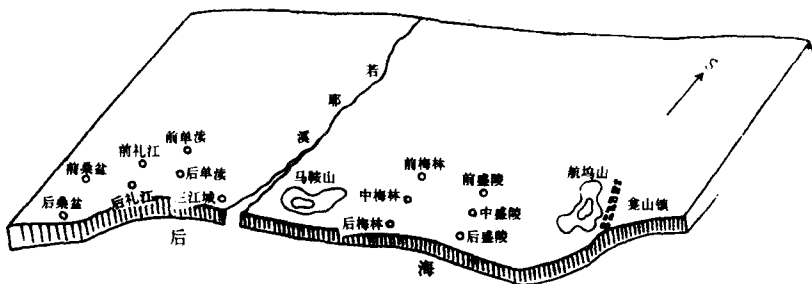


图3 沿海聚落迁移示意图

历史时期的聚落变迁除了上述数量的增加和类型的转变外,其地理位置,有时也可能发生变迁。当然,这种变迁也是和生产密切相关的。早在越部族时代,会稽山地的聚落就迁徙无常,这种迁徙是为了适应当时“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迁徙农业和狩猎业生产的需要。此后,在其它聚落类型中,也有相似的情况,山麓冲积扇聚落可以为例。前面已经提及,聚落从会稽山地向北部冲积扇发展,这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标志。人们在冲积扇北缘围堤筑塘,发展定居农业,因此,这类聚落地名常常称塘,如破塘、伦塘、型塘等等;人们又利用这一带的河流发展北部平原的内河运输业,因此,这类聚落又常常称埠或埠头,如旧埠、西埠、迪埠、平水埠头、娄官埠头等等。定居农业发展以后,整个冲积扇遭到开垦,土壤流失空前加速,于是,河流开始淤浅,通航起点就逐渐下移。以山会平原最大的河流若耶溪为例,唐代舟舫可直达秦望山下的云门诸寺。^[35]宋时虽已淤浅,但载重 50 石的舟楫循干流尚可以从平水上溯 25 里^[36],溯其支流则犹可到达天柱峰下^[37]。到了明代,舟楫只能到达平水为止。^[38]

从清代以至目前,则又向北退缩到距平水八里的平水埠头。从其他冲积扇流出的河流也莫不如此。例如西南部的娄宫江,在南宋淳熙元年(1174年)舟楫约可通至今新桥头附近^[39],明代末年后,只能通至娄宫埠头^[40],已比南宋退缩了十里。笔者曾从西埠溯西埠江上行十里,在施家桥观察早已淤浅的清代石桥,石桥边孔内置有可供拉纤者行走的石路,纤绳擦痕,深深地楔入石块之中。说明载重船舶曩昔曾可过桥上溯。询问当地父老,知民国初年,重载石料船尚可抵桥下,桥边设有凿石场。但此河久已淤浅,目前通航起点在西埠以下。其它如破塘江、上灶江和所有从各冲积扇北流的河道都是如此。通航起点一旦北移,原来的聚落在经营运输业方面就失去意义,于是聚落随着北移,在新的通航起点形成第二个甚至第三个这样的聚落。这样的聚落往往在地名上有所反映,例如新的平水称为平水埠头,新的破塘称为破塘下埠,新的谢墅称为下谢墅,新的上灶依次称为中灶和下灶^[41]等等。聚落一旦迁徙,原来的聚落并不废弃,但其职能随即变化,或为一般的农业聚落,而新建的聚落则在运输业上取代了旧聚落的地位,并且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滨临杭州湾的沿海聚落,在历史时期也有类似冲积扇聚落的迁徙情况。这类聚落,在职能上除了一般地经营农业外,主要是从事海上运输业、捕鱼、制盐和其它海涂生产。因此,聚落位置必须紧靠海岸。绍兴北部的海岸,即是钱塘江河口的南大门,从春秋越部族起一直稳定少变。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年),盐官县虽有“海失故道”^[42]的记载,但嘉定末年,山阴县仍有修护河塘的记载^[43],而元至正四年(1344年),山阴沿海仍有大型船舶靠岸^[44]。说明海道虽有变化现象,但南大门基本畅通。从明代初期起,变化开始频繁出现,从永乐到万历,海宁县出现了五修堤塘的记载^[45],说明钱塘江入海道正在逐渐从南大门移向北大门。于是山、会两县海涂外涨,使原来许多紧靠海岸的聚落逐渐远离海岸,这样,沿海聚落就一时出现了纷纷北移的现象。和冲积扇聚落一样,沿海聚落的北移,往往也在地名中留下迹象。例如桑盆村因北移而出现前、后两桑盆村,此外,如前、后礼江村,前、后单湊村等都是如此,前村在南,后村在北,其间相距五至十里不等。有的聚落是一迁再迁,如梅林村和盛陵村等,都有前、中、后三村。以盛陵村为例^[46],此村在明成化以前,原是徐氏聚族而居的一个沿海渔村,成化间(1465—1487年)北迁四里另立一村(即中盛陵),天启间(1621—1627年)又北迁三里再立一村(即后盛陵)。盛陵村以

西今属萧山县的瓮山镇,历史时期的这种聚落迁徙又具有另一特色。瓮山镇在航坞山下,《越绝书》记载的杭坞也就在这一带。这个聚落在宋代已见记载^[47],是一个以海运业为主的沿海港埠,其聚落建筑是略呈南北向的两行房屋所构成的一条狭街。随着海岸的北移,这条狭街就不断向北延伸,整个聚落最后成为东西宽不过十余米而南北长达3公里的一条狭窄的长带。所有这些聚落最后由于钱塘江江道的整个北移而完全与海洋隔绝了联系,除了上述瓮山成为一个商业集镇外,其余大部分都转变为一般的平原农业聚落。

小 结

绍兴地区历史时期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发展的过程。而聚落的地域类型,也就反映了生产的地域差异。此外,聚落形成以后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发展而不断发展变迁的。聚落的发展变迁,主要是由于人们为了组织生产的方便,是生产不断发展的反映。既然历史时期的聚落是随着生产发展而不断变迁的,这种趋向,今后仍将继续。因此,研究历史时期聚落的形成、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对今后聚落的发展和变迁具有指导意义。

如上文所述,古代绍兴地区的聚落形成,始于会稽山地聚落,这类聚落是适应当时的迁徙农业和狩猎业生产的。但是迁徙农业和狩猎业只是人类的低级生产活动,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定居农业必然逐渐地取代迁徙农业和狩猎业,于是,人们就不断要求耕地的扩大和水利条件的改善,而山会平原的垦殖乃是势所必然。所以在广大的山会平原上建立的平原聚落,最后必然成为这个地区各类地区各类聚落中数量最大、对生产具有最重要意义的聚落类型。这类聚落的特点,第一是密集,即清人所说的“千村万聚一望如屯云”。这至今仍是山会平原上十分显著的特色。第二是聚落规模不大,除了少数商业集镇外,聚落多是小型的。聚落密集当然是由于垦殖长久、人口增加的缘故。一个聚落派生另一聚落的事,在目前尚能见到的家族谱牒中充篇累牍,在地名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因为派生的新聚落,其地名往往也是派生的。例如由皋埠派生的小皋埠,由谷社派生的外谷社,由豆疆派生的东豆疆,由温渎派生的下温渎等等,不胜枚举。这样自从东晋(平原北部)和南宋(平原南部)以来,

聚落一再派生的结果,就形成今日平原上千村万聚,聚落十分密集的现象。平原聚落在历史时期一再派生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这个地区垦殖的不断扩大。在农业生产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为了肥料运送、作物收获等田间劳动的方便,都要求聚落接近耕地,这就是三家五宅的小聚落到处出现的主要原因。在历史时期,这样的聚落确实为山会平原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必须认识,这种聚落对山会平原的农业生产,只有在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制度和农业技术相对落后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促进作用。随着集体劳动制度的建立和农业技术的提高,这样的聚落,就愈来愈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由于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聚落深入田间已无必要;随着土地私有制的消灭和机耕的发展,土地的平整成为当务之急。而这种集密而狭小的聚落,既浪费土地,又是平整土地的障碍。特别是在可以预见的农业现代化的到来,这样的聚落必然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应该看到,一个地区在一个时期的聚落,反映了当时当地人们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程度,也反映了当时当地的生产水平。绍兴地区历史时期聚落形成和发展变迁的过程,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是在过去,人们自发地、无计划地逐渐使聚落的发展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今天,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应该通过区域规划和农业区划等工作,有计划地改造我们的聚落,从而促进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的更快发展。

(原载《地理学报》1980年第1期)

参考文献

- ① 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
- ② 陈桥驿:《绍兴县乡土地理》,《地理知识》,1961年第1期。
- ③ 陈桥驿:《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地理学报》,1965年第2期。

注 释

- [1] 会稽山北的若干冲积扇和孤丘,曾经发现过一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说明远古居民在这个地区建立的零星聚落为时甚早。本文论述的则是有历史记载以后的成批聚落的形成发展过程。
- [2] 《水经·浙江水注》。

- [3] (南北朝宋)孔令符:《会稽记》(宛委山堂《说郛》号六十一):“越之中叶,在此为都,离宫别馆,遗基尚在”。
- [4] 嘉泰《会稽志》卷一所引。
- [5] 嘉泰《会稽志》卷一所引。
- [6] 《吴越春秋》卷四。
- [7] 《越绝书》卷八。
- [8] 《重修平阳寺大殿募疏序》(《西河合集》卷十六)。
- [9] 嘉泰《会稽志》卷一所引。
- [10] 《吴越春秋》卷六。
- [11] 张拯亢:《续绍兴出土古物调查记》,手稿本,绍兴鲁迅图书馆藏。
- [12] 《越绝书》卷八。
- [13] (宋)孙因:《越问》(宋宝庆《会稽续志》卷八):“八山蜿其中蟠兮”。(原书注:“府城内有八山”。案:八山为种山、戒珠山、龟山、白马山、彭山、鲍郎山、峨眉山、黄琢山。)
- [14] 光绪《会稽陶氏族谱》卷一:“陶氏所居,鉴湖州渚地,曰东陶家堰,曰西陶家堰”。
- [15] 《震外摺屑》卷四。
- [16] 固陵即今西兴镇,见张宗祥校本《越绝书》卷八注;杭坞即今航坞山,见《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
- [17] 《宋书》卷五十四《孔季恭传》史臣曰。
- [18] (明)王穉登:《客越志》(《古今游名山记》卷十下)。
- [19] (清)陈绶:《俞公塘记事》(乾隆《绍兴府志》卷十六)。
- [20] 据《山阴都图地名细号亩分额南米科则》及《会稽都图地名细号亩分额南米科则》(均系清钞本,绍兴吴宅梵藏书)。
- [21] (明)王守仁:《浚学河记》(《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四)。
- [22] 《山阴都图地名细号亩分额南米科则》,《会稽都图地名细号亩分额南米科则》。
- [23] 《越绝书》卷八:“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去县三十五里”。
- [24] 嘉泰《会稽志》卷五记载的两县成丁人口,再外加占成丁人口1/4的不成丁人口。不成丁人口对成丁人口的比例数,仍系参照《嘉泰志》的人口统计拟定,该志统计中,山会二县总人口的25.5%,绍兴府的不成丁人口则为全府总人口的24.2%,故比例数定为1/4。
- [25] 嘉泰《会稽志》卷五。
- [26] 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
- [27] 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
- [28] 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一。

- [29] 《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宣统三年上期，稿本，绍兴鲁迅图书馆藏。
- [30] (宋)陆游：《秋日郊居》(《剑南诗稿》卷二十五)：“上客已随新雁到，晚禾犹待薄霜收”。陆游自注：“剡及诸暨人以八月来水乡助获，谓之上客，以其来自山中也”。
- [31] (宋)陆游：《山行》(《剑南诗稿》卷七十六)。
- [32] (宋)陆游：《游山西村》(《剑南诗稿》卷一)。
- [33] 玉米在绍兴地区引种记载始见于万历《山阴县志》，但此志已佚，今仅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及乾隆《绍兴府志》卷十七引及。番薯的引种记载，始见于(明)祁彪佳《寓山注》卷下。
- [34] 《会稽县劝业所报告册》，宣统三年上期。
- [35] (宋)熊克：《镜湖》(嘉泰《会稽志》卷十三)。
- [36] 嘉泰《会稽志》卷十二：“若耶溪路南来自县五云乡界，经县界二十五里，北入镜湖，胜五十石舟”。
- [37] (宋)邓牧：《陶山游记》(《伯牙琴续补》)。
- [38] (明)刘基：《出越城至平水记》(《诚意伯文集》卷六)。
- [39] (宋)吕祖谦：《入越记》(《东莱吕太师文集》)：“辨色发枫桥，……十里干溪，……十里古博岭，……十里含晖桥亭，天章寺路口也，遂穿松径入寺。……复出官道数里，买舟泛鉴湖”。按上述里程计算，吕登舟在今新桥头附近。
- [40] (明)祁彪佳：《小球录》(《祁忠敏公日记》，辛巳十月二十三日：“吊何大鲁至娄宫登岸，觅肩舆不得。”
- [41] 上灶溪今又可通航至上灶，这是因为(明)嘉靖间曾对此河进行了一次工程甚大的疏浚的缘故，事见(明)沈宏道《浚上灶溪记》(雍正《浙江通志》卷五十七)。
- [42] 《宋史·五行志》。
- [43] 宝庆《会稽续志》卷四。
- [44] (明)王祎：《绍兴讞狱记》(《王忠文公集》卷八)，“至正五年，……山阴白洋港，有大船飘近岸”。
- [45] (明)陈善：《海塘议》(《两浙海塘通志》卷二十)。案海塘五修为永乐九年(1411年)、成化七年(1471年)、弘治五年(1492年)、嘉清七年(1528年)、万历三年(1575年)。
- [46] 《盛陵文和堂徐氏宗谱》卷一，世系。
- [47] (宋)陆游：《舟中》(《剑南诗稿》卷三十八)：“瓮山古戎更漏声”。



参 考 论 著



1. 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与扩城建郊》,《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4期。
2. 斯波义信:《宁波其及腹地》,载[美]施坚雅著,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3. 徐少华、江凌:《明清时期南阳盆地的客商与城镇商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八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先秦两汉时期黄淮海平原的 农业开发与地域特征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本文按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晚期,商代,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和东汉六个时期,论述了公元3世纪以前黄淮海平原农耕地的发展过程及其区域特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农业聚落分布在山前洪积冲积扇地带,晚期向平原中部高敞的台地迁移。到殷代,黄淮海平原大部分地区成为农业区,但农田处于分散状态。西周春秋时期,农田规划和整治技术成为这一地区农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但农田开发只限于经过选择的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战国中期至西汉,得益于铁制农具的利用和鼓励农耕的经济政策,大片荒地的垦辟和农耕地的扩展,河北平原出现了聚落或城邑。水利工程的大力兴建,促进了平原农业的发展,形成了与汉代刺史部相对应的若干经济亚区。东汉时期,大规模兴修水利和推广水稻种植使黄淮海平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邹逸麟,1935年生,浙江宁波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面为中国历史区域地理、中国古代地理文献等。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主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即以农耕地为主要产业;商周以降,一直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产区。但数千年来几度兴衰,经历了曲折迂回的过程。本文就公元3世纪以前,黄淮海平原农耕地发展的过程及其区域特点为内容,作一番概括的论述。

—

近几十年考古发现的成果,显示出黄淮海平原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聚落分布的地理特征:首先,相对集中在太行山东麓东北延伸至燕山南麓的山前洪积冲积扇地带,分布在今京广线左右;其次,黄河以南伏牛、熊耳、嵩山山脉的东麓洪积冲积扇与河北太行山东麓连成南北带状分布区,其中以发源于熊耳、嵩山山脉的汝、颍河上游最为集中;再次,鲁中山地周围山麓地带也是聚落集中地。这些地区的共同特点是地势高爽,坡降适度,水源丰富,排泄良好。近山林有利于采集和狩猎经济,但又有平敞的土地宜于耕种。于是先民们就在这里居留下来,在七八千年前已进入以农耕地为主的社会经济阶段。因此可以说,黄淮海平原上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聚落分布地带,也就是该平原最早出现农业的地区。

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淮海平原上聚落分布出现了新的情况,即呈散状分布形态,并大多出现在河流两边的台地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已从山麓地带向平原中部比较高敞的台地迁移,以寻觅更多更好的农耕地。可是引人注目的是在当时河北平原中部,大致由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北西东约相去自百数十公里至300公里间,却始终是一片极为宽广的空旷地带,没有任何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直至商周时代仅太行山东麓的聚落稍有东移外,平原中部空白区仍达百数十至二百数十公里。这是因为从史前至春秋时代黄河下游河道在河北平原中部长期任意泛滥,河道呈扇形摆动,地面上形成许多沙岗、洼地以及史前时代残留下来的大片沼泽,以致早期人类无法在这片土地上长期居留形成聚落。⁽¹⁾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和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是黄淮海平原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代表。磁山遗址在今武安县西南洛河北岸的台地上,高出现代河床25米,C¹⁴测定约公元前6000—前5600年间。考古学界称此时为前仰韶期文化。在遗址中发现的80个窖穴中存有腐朽粮食的堆积,有的厚达2米以上,经过鉴定为粟。同时出土的还有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以及

家畜猪、狗、鸡和鹿、鱼、蚌、鸟类的遗骸,还有碳化了了的果实榛子、胡桃、小叶朴等,反映当时种植业已为主要生产部门,并有余粮储藏,渔猎、采集经济仍有较重要的地位。^[2]

裴李岗遗址在今新郑县西北约 7.5 公里处,位于双洎河拐弯处北岸一个岗地上,高出现代河床约 25 米。文化面貌与磁山颇多相似之处,经济也以种植业为主,作物有粟,并兼营渔猎、采集,出土较多的农业工具,其中有带锯齿的石镰,较磁山为精致。据 C¹⁴测定,时间约公元前 6000 年以前,与磁山遗存时代相当或略早。裴李岗类型遗址除新郑外,在河南中牟、密县、登封、巩县、鄱陵、长葛和郑县、郑州等地陆续有所发现,说明豫西山麓地带是黄淮平原上前仰韶期人类聚落之地,也是当时的农业区。^[3]不过前仰韶期遗址文化堆积都很薄,最厚不过 2 米。这说明当时地广人稀,生产水平低下,农耕制度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田莱制,就是在一块土地上耕作了一二年后,即将其抛荒,另外开辟耕地。因此人们固定居住在一个地点的时间不长。同时从聚落的微观分布来看,大多处在河流沿岸的高地上,可见都是经过选择的。^[4]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时间约公元前 5000—前 3000 年,在黄淮海平原上有大量发现。今河北省境内有曲阳钧鱼台(今属唐县)、正定南杨庄、西杨庄,武安赵窑、邢台柴庄、磁山下潘汪、界段营,永年台口、邯郸百家村,北面还扩展到了桑乾河流域,如蔚县四十里坡、桃花嘴,涿鹿下水磨等。河南省仰韶文化遗址也十分丰富。郑州东北 6 公里的大河村遗址是比较典型的,其他还有安阳后岗、高井台子、大正集、大司空村以及浚县大赉店等。

仰韶文化时期居民已进入定居阶段,文化堆积层普遍较厚,并出现半穴居及地面房屋,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也饲养家畜,兼营渔猎、采集。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一瓮炭化粮食,有人鉴定为高粱。^[5]当时的一个遗址往往就是一个农业聚落。而这种农业聚落分布地理特点,显然是前仰韶分布点向洪积冲积扇前缘发展的结果。

黄淮海平原东部地区代表性新石器时代文化为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泰山山脉周围山麓地带,向东发展至黄海之滨,北抵渤海南岸,西至鲁西平原东部边缘,南及江苏淮北一带。豫东南、安徽淮北地区也有零星发现。这种以泰山周围山麓地带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分布的格局,与黄淮海平原西部太行山、豫西山地东部山前地带分布的格局如同一辙。大汶

口文化分早中晚三个时期,约当公元前 4300—前 2500 年,稍晚于仰韶,社会经济也以农业为主,种植物为粟。在胶县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出土约 1 立方米的朽粟^[6],说明当时粮食生产已有相当的贮存。兖州县西南的王固遗址属大汶口文化,遗址周围地势平坦,中心部位高出周围平地 1.5 米,有房址十余座,窖穴和灰坑近百所,墓葬 800 余座,是一个不小的农业聚落。^[7]

大汶口文化发展为典型的龙山文化。年代相当公元前 2500—前 2000 年。地域分布较大汶口文化更广。迄今为止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有 200 余处,很多在大汶口文化堆积之上,并有逐渐由山麓地带向河流、平原中部发展的趋势。

黄淮海平原西部的龙山文化,分布在冀南、豫北、豫东、鲁西及安徽淮北西北部等地,社会生产均以农业为主。邯郸涧沟遗址出土了不少当锄用的扁方形石铲和方形厚壳蚌,收割工具的大量出土,也证明农业生产较前发展。人口也随之繁殖,村落的规模相应增大,汤阴白营在 1400 平方米的范围内,清理出 62 座房屋基址。安阳后岗遗址在 600 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 38 座房基,反映了一个人口密集的原始村落遗址,这与当地农业的发展有密切关系。^[8]引人注目的是当时人们已发明了凿井技术。邯郸涧沟发现了二口井,汤阴白营发现一口,都在住址附近。井的发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一大进步,主要是解决人类的饮用问题,但也不排斥有用来浇灌园圃的可能。龙山文化聚落分布的微地貌特点已不像仰韶期那么有限制,可以选择远离水源的地方,与凿井技术发明有关。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农作的范围,对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前仰韶期到龙山后期,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黄淮海平原农业开发已到了相当的水平。农业工具已分为农耕、收割和加工三类,定居更趋稳定,出现了大规模的聚落,遗址面积从一二万到数十万平方米不等,有很多的房屋、窖穴等遗迹和一定的村落布局,居住地附近即其耕地。因此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分布本身也就是当时农耕区分布的反映。

黄淮海平原在新石器时代农耕区的扩展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开始发生在山前洪积冲积扇平原,以后向冲积平原中部延伸。以太行山东麓为例,从前仰韶期(磁山)——仰韶期(后岗、大司空村,均属安阳)——龙山期(后岗二期),遗址分布时间大致自西向东发展。河南龙山文化自西向东发展的趋势更为明显。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则自东向西推进。

豫东、鲁西、淮西北是这两个方向农耕区的交接带。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的另一个地理特征是向冲积平原中部推移时,大多选择较高的河流阶地和平原的岗丘上。如河南永城黑垆堆、王油坊,商丘坞墙,汤阴白营等遗址都是高出周围平地,显然是为了避免洪水的淹没;近河流目的是为了提供水源,虽然当时还不可能有人为的灌溉工程,但引用天然河流进行灌溉的可能性也不能排斥。

但是河北平原中部在京广线以东、徒骇河以北的一片广阔地区内至今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说明在这一漫长时间内,以黄河为主的平原河流的泛决、湖沼密布的情况始终没有改变,人类尚不能在此进行农耕,是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最为迟晚的地区。

二

商代是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社会已经考古和文献资料所证实了的。建国以来在黄淮海平原上发现的商代遗址数量很多。就河北省而言,涿县、满城、保定、蠡县、平山、曲阳、定县、石家庄、藁城、宁晋、赵县、内丘、隆尧、邢台、邯郸、磁县、涉县、安新等地境内均有发现。分布的特点仍然是沿着太行山麓一带比较稠密,如邢台一地仅市郊就有十余处。这些遗址都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商代定居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属于先商时代的邯郸涧沟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器工具,其中农业工具多于狩猎工具,又发现狗、猪、水牛等骨骼,说明当时人们以农耕为主,狩猎已退至次要地位^[9]。磁县西南下七垣遗址在漳河北岸,也是一处以商代为主的遗址,出土的工具中以用于农业收割的石镰为最多。^[10]邢台附近商代有十余处遗址,车站西南1公里的曹演庄为典型的遗址之一,在一窖穴内曾发现一装满谷物的陶罐及种过谷物的土层。^[11]藁城台西遗址也是一处十分重要的商代遗址,出土过336件石镰,还有房子14座,为夯土土坯做法,有水井二眼,为一重要农业聚落。^[12]

河南省商代遗址集中在豫西、北、中,在黄淮海平原范围内,比较典型的是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和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三大处的发掘,从中可以看出黄淮海平原商代早中晚三期农业发展的概貌。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生产工具还是以石制为主。农业工具尤以石铲、石镰较多,蚌铲、蚌镰、骨铲也有发现。有觚、爵、盃等酒器出土,反映粮食生产较前有发展。

青铜器有铤、凿、刀、锥等,使用在农业上显然不多,不过青铜工具的发明和运用,对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和技术提高,无疑是有促进作用的。郑州二里冈和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对殷墟前商代社会生活有具体的了解。例如制铜技术有明显的发展,发现两处铸铜遗址,南关外一处铸铜遗址多出钺范,说明了已有铜制农具。殷墟出土的遗物很能反映当时农作的规模,石镰共有 3600 余件,宫殿区一个窖穴出土 440 把石镰,小屯村大连坑一处堆积中出土上千把石镰,说明有大量奴隶从事农业劳动,耕种的规模及其所开辟的农田已相当可观。卜辞中记录了殷人有相当丰富天文历法知识,也是农业发达的一种反映。文献记载商汤灭夏前居亳。后人皇甫谧有“三亳”说。三亳之今地,诸说纷纭,迄无定论。不过都不出黄河下游扇形冲积平原上端的范围。近人认为汤灭夏以前,活动中心在内黄、浚县、濮阳三阳之地,即今冀、豫交界一带,与后来的殷墟相近。^[13]由此可见,漳卫河下游洪积冲积扇是商代农业的中心地区。有人根据甲骨文卜辞中从事田猎农作的地名分布及遗址进行分析,认为以殷墟一带为中心的太行山东麓地区在当时广布着常绿阔叶林、针叶或混合林为主的植被,农耕地散布于丛林之中,一个农业点的范围,因人口、地势不同而异,可大至二三十平方公里,小至三平方公里以下,在农业据点内并非纯一色耕地,而是耕地与丛林杂处。^[14]甲骨文中田字作“田”、“田”、“田”,“疆”字作“疆”形,反映当地的耕田已经过规划,非随便开垦。这种规划必先以固定农耕地为前提。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了许多有名称的农耕区,如名、姁、閼等,虽不如今地所在,但这些都是比较固定的农业中心当属无疑。^[15]固定耕地的出现,对农耕地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明显一点就是水利建设的开展。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𠂔”字,即田间的灌溉渠道。自觉地引用河水进行灌溉可能始于商代,地点也应该在太行山东麓漳上河洪积冲积平原,这里河流众多,地面微有倾斜,有利于引水灌溉。

胡厚宣先生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指出:“殷代之农业区域,西至今陕西兴平县境,东至今江苏睢宁县境,南至今河南之浙川,东北至今山东之临淄,俨然据今黄河流域苏、皖、鲁、豫、晋、陕六省之地。”^[16]近几十年考古新发现说明还应该包括冀南地区。换言之,今黄淮海平原大部分地区在殷代已为农业区。不过当时的农田还处于分散状态,各视其自然条件而定,没有像后代阡陌相连的情景。

三

西周春秋时代,黄淮海平原上农业在商代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周人原是农业民族。相传其祖先名后稷,年轻时就“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17]在灭商以前根据地陝西周原一带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农业。“周原赳赳,萑荼如飴”,^[18]即其写照。灭商以后,其势力扩展至黄淮海平原,同时也将先进的农业技术传播至东部地区,大力开辟荒地,促进了黄淮海平原农业的发展。^[19]

周人原先就有许多重视农业的规定和措施。《国语·周语中》：“单襄公曰：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余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所谓“无非谷土，民无悬耜”，未必一定是事实。但周朝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并采取了許多相应措施是无可怀疑的。西周末年，宣王即位，不籍千田，虢文公諫曰不可，以为“民之大事在农”，“王事唯农是务”。^[20]反映了以农立国的思想，所以当其控制了黄淮海平原后，平原农业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

西周春秋时代黄淮海平原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农田规划和整治的技术在平原上的推广。周族先人公刘自豳迁至周原后，为安置部落生活和农业生产，根据日影来确定向阳向阴的方位，观察泉源的流向，丈量低湿和高敞的土地，在选择好的土地上进行烧荒开垦，形成了一批固定的耕地，保证了粮食的来源。^[21]这种田亩规划和整治方法带到东部地区与原先殷商农田整治的经验相结合，必然大大推进了平原农田的开发。

《诗经》里保留了许多反映当时农田开辟的资料。《周颂·载芟》：“有略其耜，俶载南亩。”《周颂·良耜》：“翼翼良耜，俶载南亩。”《小雅·信南山》：“我疆我理，南东其亩。”高亨注：“周人称南北阡为南其亩，称东西阡为东其亩。”南亩指向阳的耕地，日照长，土温高，土壤细菌活跃，对作物生长有利，是理想的农田。所以南亩以后成为农田的通称。《史记·平淮书》：“而民不齐出于南亩”，即是。

在耕作前先对农田进行规划和整治的方法，春秋初年已相当普遍。

《诗·齐风·南山》：“蓺麻如之何？衡从其亩。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郑玄注云：“蓺，树也。树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后树之，以言人君娶妻，必先议于父母。”这说明春秋时东方齐国对农田的整治已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春秋时鲁国也是一个农业很发达的国家。鲁僖公时已将农田和牧地划分得很清楚。《诗·鲁颂·驹》：“驹驹牡马，在坰之野。”诗序云：“驹，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郑玄注：“坰，远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孔颖达疏曰：这首诗歌是颂鲁僖公“务勤农业，贵重田谷，牧其马于坰远之野，使不害民田”。鲁国为了保护已开辟的农田，将牧地迁至距农田很远的地方。

《春秋》、《左传》中“田”字有两种含义。一作狩猎解，此为众所周知。另一个含义指经过悉心整治的农田(熟田)。《释名·释地》：“田，填也。五谷填满其中也。已耕者曰田。”《禹贡·冀州》：“厥田堆中中。”郑玄注：“能吐生万物者曰土，据人功作力竟得而田之，则谓之田。”《说文》：“田，陈也。树谷曰田，象形□十，阡陌之制也。”《国语·周语下》：“民力雕尽，田畴荒芜。”韦昭注云：“谷地为田，麻地为畴。”

这类经过对自然条件的选择(水源、日照)，再经过修治阡陌，平整土地，开挖沟洫等等整治过的农田，在春秋时期的黄淮海平原已经出现不少，现将见于文献记载熟田列表于下：

今省名	古农田名	相应方位	今地	资料出处
山	郛田	济水、大野泽侧旁	今山东郛城县东北一带	《左传》昭公元年
	郛田	郛，今山东滕州市。“取郛田自鄆水”。鄆水，今滕州市南城河，古时流入泗水。	今山东滕州市一带	《左传》襄公十九年
东	汶阳之田 郛、灋、龟阴之田	杜注：汶阳，汶水之北也。杜注：三邑皆汶阳田也。	汶水，今山东汶河	《左传》僖公元年、成公二、三年、定公十年

续表

今省名	古农田名	相应方位	今地	资料出处
山东	济西田(鲁地)	济,济水。古黄河南岸一大分流,单独入海。今埋。	约今山东鄄城、郟城一带	《春秋》宣公元年、《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漯东田	漯水见上。	今山东滕州市以东	《春秋》哀公二年
	沂西田	沂水,今山东沂河。	今沂河以西一带	同上
	郟田	郟,今山东苍山县西北。“莒人伐我东郟,以疆郟田”。	今山东枣庄市、苍山县间地	《左传》襄公八年
	莒田		今莒县附近沂沭河流域	《左传》昭公六年
	枋田	枋,今山东费县东南。	今枋河北岸	《左传》桓公元年
	杞田	杞,今山东安丘县东北。	今濰河流域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昭公七年
河南	阳樊、温、原、潁茅之田(又称南阳之田)	阳樊,今河南济源县西南。温,今温县西。原,今济源县西北。潁茅,今焦作市东南。	今沁河下游冲积扇及豫北沙河流域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昭公六年,《国语·晋语四》
	苏忿生之田:温、原、緡、樊、隰郟、潁茅、向、盟、州、醜、怀	温、原、樊、潁茅,已见上。隰郟,今武陟县南。緡,今沁阳县西南。向,积县西。盟,洛阳北。州,今温县北。醜,今修武县北。怀,今武陟县西南。	今沁河下游冲积扇	《左传》隐公十一年

续表

今省名	古农田名	相应方位	今地	资料出处
河	制田	《水经·河水注》 记今新郑县旁有制泽。	今河南新郑县 东北	《左传》成公十 六年
	许田	杜注：近许之 田。	今河南许昌市 东南	《左传》隐公八 年、桓公元年、成 公四年
	州田		今河南温县北	《左传》昭公三 年
	戚田	古黄河侧旁。	今河南濮阳县 北	《左传》文公元 年
	汝阴之田	楚地。	今河南汝河北 岸	《左传》成公十 六年
南	郟田	杜注：郟，温别 邑。	今河南武陟县 西南	《左传》成公十 一年
	鞮、栝之田	郑邑。鞮，河南 叶县西。栝，今禹 县。	今河南颍河上 游、沙河南岸。	《左传》昭公十 三年
安	濮西田	在濮水之田。 濮水古沙水别称， 见《水经·渠水 注》。	今安徽茨河一 带	《左传》昭公九 年
徽	州来田	州来，今安徽凤 台。	今安徽淮河和 茨河间	《左传》昭公九 年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秋时代黄淮海平原农田开辟的地理特征：

一、经过整治的“熟田”，主要分布在豫西山地和齐鲁山地之间的冲积平原上，当时的郑、齐、宋、卫、曹、鲁等国境内，相当今豫东、豫北、鲁西、淮北地区。这说明农田的开辟已从山麓洪积冲积地带向冲积平原中部推进。

二、在冲积平原上开发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起先为避免洪水淹没，先选择比较高亢的“丘”作为定居点。《说文》：“丘，土之高也。”见于《春秋》、《左传》称丘的有48处：宋十一、齐十、鲁七、卫六、晋四、曹郟各三、楚二、莒陈各一。《尔雅·释丘》：“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这些“丘”都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或为都城所在，或为会盟地点。如楚丘、营丘、顿丘、商丘等等。这些地方开发最早。以后洪水渐平，遂下丘而居平地，即《禹贡·兖州》“是降丘宅土”的意思。^[22]退居平地后则选择近河流、

湖沼的阶地上进行垦殖,以便利用丰富的水源进行灌溉,“汶阳之田”、“济西田”、“漕东田”、“沂西田”、“制田”大多类此。黄淮海平原南端著名的有“州来之田”,在楚国境内。公元前6世纪末,楚相孙叔敖在今河南固始一带“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23],开辟了史灌河流域的农田。

三、河北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上没有良田的记载。其原因主要是平原中部仍然是一大片河流泛滥、湖沼密布的地区,大致是古代的“九河”之域,影响了农耕业的推进。而平原南部的“邯郸仓库实”^[24],反映该地的农业还是相当发达的。

四、这时期黄淮平原的农业开发超过河北平原,是当时主要粮食产地。《左传》隐公元年:“冬,京师来告饥,公为之请籴于宋、卫、齐、郑,礼也。”其间则尤以东部泗水流域的鲁国最为发达。除了自然条件外,与鲁国私田数量最多有关。如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25],即按亩征税,废除了奴隶制所有制的“籍田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郑国也十分重视农田管理,禁止进入农耕区进行采樵、放牧。^[26]上述各处良田大多分布在黄淮平原,与当地各国都十分重视农业不无关系。

但总的说来,西周春秋时代黄淮海平原农田开发只限于一部分地区。就是经过选择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被开发为农耕地。这些耕田被视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往往用来馈赠、贿赂或交换,因此不一定连成一片,很多是插花地。平原上还有相当多的土地处于灌木密布、蓬蒿丛生、草莱未辟的状态。《孟子·滕文公上》所说“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于道,交于中国”的情形,依然存在。春秋前期,燕齐之间,相当今德州以北地区有一大片隙地,以至燕庄公送协助伐山戎的齐桓公回国,误入齐境而不知。齐桓公遂将燕庄公所到的齐境割让给燕^[27],可见这是一片未经开辟的荒地。春秋末年,宋郑之间有隙地,经当地人开垦,形成了弥作、顷丘、玉畅、岳、戈、锡六个聚落。但宋、郑两国都不要,肯定是比较差的土地,不值得为其防守,以后在宋、郑之间战争中,“六邑为墟”。^[28]因此,西周春秋时代黄淮海平原上畜牧业仍是一个重要的生产部门。一方面是平原地区还杂居着狄、戎、夷等仍以畜牧为主的民族^[29],另一方面是华夏各国还相当重视牧业。鲁国在城市的远郊辟有牧场。《诗·鲁颂·有骝》描述当时贵族拥有很多强壮的雄马。郑国的商人弦高以贩牛为业,鲁僖公三十三年路遇伐郑的秦师,“以乘韦先,牛十二犗师”(《左传》)。鲁宣公二年郑宋战争,宋华杀羊食士,以后华元被郑国所获,“宋人

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贖华元于郑”(《左传》)。总之,当时中原各国拥有大量的牛、羊、马,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四

从战国中期至西汉的二百多年里,黄淮海平原的农业有突破性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是生产力的发展,二是经济政策的变化。

先讲第一条,战国中期开始铁制工具已广泛使用于农业生产。据雷从云 80 年代初不完全的统计,我国河南、河北(含天津)、山西、陕西、辽宁、山东、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诸省区都有战国时期的铁器出土,器类有农具、手工业工具、兵器、生活用器和装饰品等,而以生产工具为大宗。在黄淮海平原的冀、豫、鲁、皖四省出土的铁制农具的地点约占全国出土农具地点的三分之一强。铁农具的器类有犁铧、镵、铲、锄、镰多种,基本已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如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晚期的 5 座魏墓,出土铁器 95 件,其中农具有犁铧 7 件、镵 4 件、铲 10 件、锄 33 件、凹字形铁口锄 3 件、镰 1 件。这些铁器的冶炼工艺水平相当高,具备了坚硬、锋利和耐用的性能。同时考古工作者还在黄淮海平原上发现多处冶铸遗址,规模都不小。如齐临淄故城发现东周冶铁遗址 6 处,分布面积竟达 90 余万平方米。^[30]河南郑州西北 20 多公里汉荥阳城西墙外有一处约当西汉中期至东汉的冶铁遗址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汉书·地理志》里置有铁官的有 48 处,在黄淮海平原内有 22 处,几占二分之一。“铁耕”^[31]从战国开始为普遍的事,铁制工具的使用,“使更大面积农田耕作,开垦广阔森林地区成为可能”。^[32]到了西汉铁制农具更为普及。《盐铁论·水旱》:“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黄淮海平原农业发生突破性进展是必然的事。

再说第二条,战国中期各国相竞变法,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奖励垦荒,发展农业,增加租税收入,推动粮食生产,充实各国战争中的粮秣需要。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就是“尽地力之教”,“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收获如寇盗之至”^[33],都与农耕有关,魏国由此富强。魏襄王时,“田舍庐庑之数,曾无所刍牧”^[34],说明在魏国境内已是单一农耕业经济了。齐国早在春秋桓公时管仲为相,即力主发展农业,“实圯虚,垦田

畴，修墙屋，则国家富。”^[35]其名言“仓廩实而知礼节”，“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正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社会思想的反映。到了战国时，齐国富强可与秦国匹敌，史称“东秦”。秦国商鞅变法主要内容也是重农抑商，奖励垦荒，发展农业，“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36]虽然发生在关中，但对关东六国的影响是很大的。荀子初次到秦国，看到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甚为感叹^[37]，正是这方面影响的反映。

以上讲了战国中期至西汉时期黄淮源平原农业发展的内在原因，而其具体表现有下列两个方面。

一、大片荒地的垦辟和农耕地的扩展。战国时期各国在变法过程中垦辟了许多荒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直是人迹稀少的河北平原中部，到战国末年出现了令卢、高唐、平原等地城邑市五十七。^[38]这是因为战国中期赵、魏、齐国在黄河下游两岸修筑了千里长堤，堤距较宽，东西 50 里，黄河河床可以在宽堤内游荡，不至于任意泛滥成灾。堤外平地因此而得到开发。以后由于黄河河床在大堤内作游荡性摆动，“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到了西汉末年黄河滩地上民间自修的民埝有数重，近者去水数百步，远者也只仅数里。这样不仅堤外平地得到了开垦，在堤内滩地上也种了庄稼，形成聚落。内黄县境黄泽在先秦时为一著名湖泊，方圆数十里。到西汉末年魏郡太守也将湖滩租给人民，以收赋税。民“起庐舍其中”，变成了农耕区。^[39]所以从战国中期至西汉末年，黄淮海平原上出现了许多新的聚落，其中不少已为某一区域的政治中心（县治）。

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末年全国共设 103 郡国，地处黄淮海平原的有 43 个，约占 40%。又据不很精确的统计，平原地区共有 606 个县，约占全国 1587 个县的 38%。户数约六百三十余万，约占全国一千二百余万户的 52%；口数约三千余万，约占全国五千七百余万的 50% 余。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 25%。以上数字虽不很精确，但与实际情况相差不致太远。西汉元始二年，全国人口密度，除了长安附近三辅地区外，数黄淮海平原最为密集。^[40]可见到了西汉末年黄淮海平原已得到全面开发，成为全国最大的农业区。

二、水利工程的大力兴建，促进了平原农业的发展。众所周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黄淮海平原属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雨量不足，分配不

均。特别是平原北部、中部年降水量偏少，完全靠天然降水，极不稳定，需要有人工设施加以调节。可是在铁制工具出现以前，光靠木石制工具是不可能，所以到了战国中期平原上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首先，是修筑黄河大堤包括黄淮海平原其他某些容易泛滥河湖的大堤，疏浚河道，消弭水患。《汉书·沟洫志》载贾让说：“盖隄防之作，近起战国，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禹贡》冀州“覃怀底绩，至于衡漳”；“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濞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其猪，东原底平”。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诸”。又导河、导洛、导淮，最后“九州涤源，九泽既陂”，以上都是战国时期黄淮海平原的排除水患的工程，于是平原水患消弭，为大力发展农耕地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魏文侯时邺令西门豹在今冀豫交界的磁县、临漳一带引漳水凿十二渠以溉民田，即著名的“漳水十二渠”灌溉系统。史称“西门豹引漳水灌溉邺，以富魏之河内”^[41]，河内即当时的黄河以北大致相当今河南省黄河以北、河北省南部的漳卫河冲积扇。从此成为黄淮海平原上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漳水十二渠灌溉系统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里，为历代政府所重视，经不断改建修缮，为发展河北平原南部的农业起着重要的作用。魏惠王时代在黄淮平原上开凿的鸿沟，即在今河南原阳县北引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郑州、中牟间），又自圃田泽开凿名为大沟的渠道引水东流至大梁（今开封市），折而南流至今淮阳入颍水，沿线沟通济、汝、淮、泗等河流，形成了以鸿沟为干渠的水运兼灌溉网络。这一系统流经的宋、郑、陈、蔡、曹、卫诸国，除了水运外，“有余则用溉浸，百姓向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42]这就是说从大河引水至干渠，由干渠再引至支渠，由支渠引水至每一块农田间沟洫，即指“田畴之渠”，使这一水利灌溉系统，如同人身上动静脉，伸入每一部位，为黄淮海平原农业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黄淮海平原上的“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43]。元光年间，黄河下游两岸“人庶炽盛，缘隄垦殖”。^[44]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将西汉疆土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并列举各区特产，以示各区经济的特色。这种格局是战国以来至汉武帝时二百多年演变而形成的。其中所谓“山东”，即以今黄淮海平原为其主要部分。在这个大区内还可以分成若干亚区，其农业发

展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一) 三河地区。即河东、河南、河内,大致即今山西西南部、河南洛阳地区和河南省黄河以北部分。以地貌而言,为汾涑河流域、伊洛河下游冲积平原、沁丹河洪积冲积倾斜平原。这里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夏、商、(东)周三代政治中心,“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45],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区。

(二) 以邯郸为北界的河北南部。今漳、卫河洪积冲积扇平原区。是殷代以来传统农业区,包括殷墟和战国邺地。其俗与南面的“郑、卫相类而近梁、鲁”。

(三) 河北中部的赵、中山故地的东部,今滹沱河、唐河(古滹水)、子牙河洪积冲积扇平原区。原为“九河”的上部。战国中期修筑黄河大堤后,水患平息,渐次开发,至西汉成为一重要农业区。

(四) 渤海之间的燕国,为黄淮海平原最北部。今潮白河、永定河洪积冲积扇和渤海滨海海积平原、滦河洪积冲积平原。气温低、近山区,农业不发达。南端又为“九河”下游,河流支岔分歧,沼泽密布,土壤碱化,不宜种植。故本区主要依靠“鱼盐枣栗之饶”。苏秦说燕文侯曰:“民虽不由田作,枣栗之实,足食于民矣。”^[46]

(五) 齐鲁地区。齐国带山靠海,在黄淮海平原范围内是鲁北山前洪积冲积倾斜平原区。“膏腴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盐,尤为富庶。邹鲁地区为鲁西北山前洪积冲积倾斜平原,古代为泗水流域,是传统农业区。地滨洙泗,“地小人众”,“颇有桑麻之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

(六) 梁宋地区。“自鸿沟以东,芒、碭以北,属巨野,此梁宋也。”即今天的豫东黄河冲积平原区和南四湖西堆积平原区。自战国以来即被全面垦辟,最早成为单一农耕经济区。当时宋国境内已“无长木”。^[47]魏国境内都是“庐田庑舍,曾无所刍牧牛马之地”。^[48]西汉时“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穡,虽无山川之饶,能恶衣食,致其蓄藏”。《盐铁论·通有》云:“曹、卫、梁、宋,采棺转尸。”可见森林树木砍伐殆尽,均被农作物所替代。

(七) 西楚地区。司马迁说:“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笔者按:南郡与沛、陈、汝南相隔殊远,应属南楚,此处有误)。大致即今豫西山前洪积冲积倾斜平原、淮北冲积平原和大别山麓洪积冲积波状平

原区。西汉时为一重要农业区。

(八)东楚地区。司马迁说：“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其俗类徐、僮。”大致即今沂、沭河、废黄河冲积平原和洪泽湖、里下河堆积平原区。战国以来也是传统重要农业区。

以上将黄淮海平原分为八个小区。如以西汉刺史部区域揆之，则(一)区为司隶之东偏，(二)、(三)区为冀州之域，(四)区为幽州南部，(五)区为青南兖东之域，(六)区为兖州主要部分，(七)区为豫州之域，(八)区则为徐州中南部。由此可见，西汉刺史部区域的划分与农业生产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以上各区在西汉时都是主要粮食产地，畜牧业已退居末位。《盐铁论·未通》云：“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这里生产的粮食对秦汉统一政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秦代在荥阳以西置敖仓，就是为储藏关东转输去关中的粮食。楚汉之际刘项几次为争敖仓而战，目的就是欲控制这里的粮食。洛阳居“齐秦楚赵之中”，“转谷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其粮食主要来自东部平原。汉武帝时伐匈奴、筑边塞，岁漕山东粮食六百万石。由此可见，到了西汉中期黄淮海平原已是全国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

再就整个黄淮海平原而言，又以黄淮之间的兖豫大平原农业最为发达。这里气温、降水条件均优于河北的冀幽平原。《管子·治国篇》云：“嵩山之东，河汝之间，早生而晚杀，五谷之所有蕃熟也。四种而五获。”《史记·货殖列传》云：“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夏指颍川，梁、鲁、陈等地都是兖、豫二州之域。

武帝以后，黄河决溢频仍，洪水常泛滥于兖、豫二州境内，农业数年不登，谷价腾踊，人或相食，灾民流徙。昭帝时，河患稍息，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畜积。宣帝时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可见黄淮海平原的农业已有恢复。但到了元帝以后，成、哀间灾情加剧，特别是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决而不塞，兖、豫二州之民遭受了七十年的灾难，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北边及青徐地人相食，雒阳以东米石二千”，“流民入关者数万人”。^[49]

五

东汉初年,黄淮海平原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都处于极其混乱状态之下。王莽以来河失故道,泛滥于兖、豫之地数十年,战争使人民流徙、死亡,地方豪强又乘乱打家劫舍,杀害长吏,“青徐幽冀四州尤甚”。社会不安宁,农业生产难以恢复。刘秀即位采取了一系列对付豪强的政治手段,使社会趋安定。^[50]明帝永平十二年(70年)由王景主持堵塞了决溢69年的黄河,开辟了一条新的河道,河济之间、兖豫平原“渐就壤坟”。^[51]于是政府招抚流民,开垦荒地,经营水利,农业生产较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东汉时期黄淮海平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推广水稻种植。

东汉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本平原水利的兴修。除桓帝外(可能记载有脱漏),每一个皇帝在位期内都有比较重大的水利设施。光武帝建武年间,渔阳太守张堪“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52]狐奴县在今北京市顺义县东北,处于潮白河流域。这是黄淮海平原种植水稻的最早记载,也是本平原水稻的北界。这是一次十分大胆的尝试,使本平原北端农业发展有了良好的开端。此外,建武中汝南太守邓晨兴修鸿却陂,灌溉周围水田数千顷,“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53]明帝永平五年(62年)鲍昱为汝南太守,“郡多陂池,岁岁坏决,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54]章帝建初元年(76年)山阳太守秦彭在境内“兴起稻田数千顷”。^[55]八年王景任庐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孙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驱率吏民,修起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56]章帝元和、和帝永元初(84—90年)鲁丕先后任赵相、东郡太守,“在二郡,为人修通灌溉,百姓殷富”^[57]。元和三年(86年)张禹“迁下邳相。徐县北界有蒲阳陂,傍多良田,而埤废莫修。禹为开水门,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数百顷。劝率吏民,假与种粮,亲自勉劳,遂大收谷实。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至垦千余顷,民用温给”。^[58]李贤注引《东观记》说蒲阳陂“水广二十里,径且百里,在道西,其东有田可万顷”。《续汉书·郡国志》下邳国取虑(今睢宁西南)有蒲姑陂,疑即蒲阳

陂。章和元年(87年)马棱任广陵太守,“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59]永元中何敞任汝南太守,又修理颍阳(今安徽临泉西)旧渠(约今汾河、洪河间),垦田增三万余顷。^[60]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又兴修战国西门豹所开漳水十二渠,以溉民田。^[61]顺帝时崔瑗为汲令,开稻田数百顷。^[62]灵帝建宁年间又修复新息、褒信一带的青陂,灌溉五百余顷。^[63]献帝建安年间,夏侯惇为陈留、济阴太守时,堰太寿水为陂,“率将士劝种稻,民赖其利”。^[64]

以上列举的史实,说明东汉始终十分重视黄淮海平原的农田水利,且多以发展水稻种植为目的。这一方面反映本平原水资源的丰富和劳动力的充足。另一方面说明黄淮海平原的农业经济对一个以河北平原为根据地起家的东汉政权的重要性超过了西汉政权。章帝元和年间黄淮海平原“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65]不久整个平原的农业发展水平已超过了西汉时期。桓帝时崔寔《政论》说:“青徐充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王符《潜夫论·实边》:“中州内郡……田亩一金。”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时中原尚未扰乱,董卓举刘馥为冀州牧。当时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66]

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袁绍、曹操、吕布争战于兖、豫、青、徐、冀诸州境内,各有部众十余万、数十万,其破坏性之大可知。曹操在济北一次收编了黄巾军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这些都是因战争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致土地荒芜、农业凋敝。粮秣奇缺,以致出现袁绍军队在河北“仰食桑椹”,袁术部众在江淮取给蒲赢,“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局面。^[67]但由于自然条件尚好,所以一旦战争平息,招徕流亡,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三国曹魏杜恕上疏曰:“冀州户口最多,田多垦辟,又有桑枣之饶。……今兖、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68]卢毓《冀州论》:冀州“天下之上国也。……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69]。河北平原农业到东汉末年已发展到相当繁荣阶段。西晋以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使黄淮海平原的农业陷于衰落的境地,那是后话了。

六

根据考古资料,黄淮海平原上史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河北武安磁

山遗址、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都有发现。最近华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或大汶口文化出土若干人骨的碳 13 测定食谱表明，也是以粟为主要食物。由此表明，至少从距今 8000 年起，粟已在华北大平原上大量种植，远比其他地区为早，成为当地的主要粮食。^[70]

粟即稷^[71]，其株茎称禾，去壳者俗称小米。在新石器时代，稷不仅是黄淮海平原同时还是整个黄河流域最主要也是最普遍的一种作物。除稷外，另一种旱作就是黍。黍，古今同名，俗称黄米。另一名称为稷，是黍的不同品种。黏者曰黍，不黏者曰稷。虽然至今考古发现不多，但从后代文献记载来推断，黍是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仅次于稷的主要粮食作物是毫无疑问的。

商代黄淮海平原粮食作物种类较多，后世的所谓“五谷”都有了。在殷墟甲骨文中，黍、稷都有记录。黍字出现次数最多，约 300 余见。“受黍年”上百条。邢台曹演庄、藁城台西遗址都黍类遗物。^[72]黍在商代粮食中占很重要地位，恐与当时饮酒成风有关。在台西遗址发现过一座相当规模的酿酒作坊。^[73]稷在甲骨文中记载也不少，“受稷年”不完全统计约 20 余条，“登稷”至少也有十五六见，如果加上其他有关稷的记载，据不完全统计，少说也在半百以上，与黍比占第二位。但言“登稷”比“登黍”为多，反映稷仍是商人的主要粮食作物。^[74]《尚书·盘庚》：“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酒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这些都说明黍稷是商代黄淮海平原上主要粮食作物。

麦在卜辞中已经出现，多作“登麦”、“告麦”、“食麦”。麦的生长需要一定的灌溉条件，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还不可能广泛种植，但在粮食作物中已有其地位。稻在卜辞中也已出现。郑州白家庄商代早期遗址中也发现过稻壳的遗迹，甲骨文中“受稻年”约近 30 见，仅次于黍稷。^[75]当时水稻生产只能在低洼水泽地带种植，因品位较高，为统治者所重视。

甲骨文中还有“受桐年”的记录。“桐”当为一种作物。彭邦炯谓此处“桐”借为“苴”。苴是一种麻类作物。《诗·豳风·七月》：“九月叔苴。”《传》云：“苴，麻子。”《笺》云：“麻之有实者。”麻的籽可以食用，其皮可纺织为衣。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商代黄淮海平原大田的主要粮食作物已有黍、稷、麦、稻、麻数种，其中以黍、稷为主，稻、麦次之，而麻食用价值较差，

疑以其纤维织衣为主。

西周春秋时代黄淮海平原上的主要粮食作物,可从《诗经》中得到反映。《诗·小雅·甫田》:“黍稷稻粱,农夫之庆。”《诗·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彼黍离离,彼稷之穗”;“彼黍离离,彼稷之实”。《王风·丘中有麻》:“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麦,彼留子国。”《邶风·桑中》:“爰采麦矣,沫之北矣。”《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无食我麦”,“无食我苗。”《唐风·鸛羽》:“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鲁颂·閟宫》:“降之百福,黍稷重穆,稷稷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邶风·载驰》:“我行其野,芃芃其麦。”

仅据以上数条,则黍、稷、稻、粱、麦、苽、麻等都已有了。据刘毓琮统计^[76],《诗经》中黍出现 28 次,稷 16 次,黍稷连称或同时出现 16 次,粟 10 次,麦 11 次,稻 6 次,苽 9 次,麻 7 次。黍和稷出现的次数最多,散见《周颂》、《大雅》、《小雅》、《鲁颂》、《王风》、《唐风》、《曹风》、《豳风》等篇,所记地域范围包括了黄淮海平原。

西周春秋时代黄淮海平原粮食作物中黍、稷仍占主要地位,这是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传统。因为,一是黍稷作物耐旱,吸水量少,蒸发量低;二是耐碱对土地要求不高;三是生长期短,一般为 80 天左右。虽喜温,由于生长期短,在高寒地带也可种植。《孟子·告子下》:“夫貉,五谷不生,唯黍生之。”由而可知。其他作物麦,也是主要粮食之一。《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箕子朝周,路过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箕子伤之,作“麦秀之诗”,其云:“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但其地位不如黍稷重要。《春秋》庄公七年(前 687 年)“秋,大水,无麦、苗”。《左传》:“秋,无麦、苗,不害嘉谷也。”杜注:“黍稷尚可更种,故曰不害嘉谷。”稻在西周春秋时期的黄淮海平原仍有种植。《左传》昭公十八年(前 524 年)六月“邾人藉稻”。邾,妘姓小国,今山东临沂北,属沂河流域。然《论语·阳货》子曰“食夫稻,衣夫锦”,可见仍然是一种珍贵的粮食。麦在华北大平原无灌溉不能种植,稻更需要丰富的水源。因此,春秋以前这两种作物大多分布在水资源条件比较好的地方,不如黍稷种植普遍。

进入战国秦汉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水利灌溉系统的建设,大田的主要粮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一、粟仍然在粮食作物中占主要地位。郑玄注《周礼·地官·仓人》:

“九谷尽藏焉，以粟为主。”《孟子》一书中提到粮食，往往称“粟”或“菽粟”并称。《梁惠王上》：“河内凶，则移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滕文公上》：“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滕文公下》：“农有余粟。”《离娄上》：“赋粟倍于他日。”《万章下》：“君馈之粟。”《尽心上》：“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尽心下》：“粟米之征。”以上所列各篇中提到的粟，有的指具体的粟，有的则为粮食的通称，难于区分。《战国策》里以粟作为粮食的通称例子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管子》里提到粟的有“金与粟争贵”（《权修》），“菽粟不足，末生不禁”（《重令》），“壤可以为粟”（《中匡》），“辟土聚粟多众”（《小匡》）等等。《韩非子》提到粟的有“吾马菽粟多矣”（《外储说左》），“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外储说右》）。《墨子》：“耕稼树艺，聚菽粟”（《尚贤中》）；“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七患》）。《淮南子》：“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于口者”（《主术训》）；“量粟而舂，数米而炊”（《诠言训》）。《史记·项羽本纪》：“章邯军其南，筑通道而输之粟。”《平准书》：“汉兴，……转漕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汉文帝时从晁错建议输边粟者拜爵。汉武帝以桑弘羊为治粟都尉。《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说文》：“粟，嘉谷实也。”以上仅列举一部文献记载，仅此已足够说明粟（也即稷）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始终是广大人民的主要口粮，也是大田中主要作物。

二、黍在战国秦汉时仍普遍种植，但多用于酿酒。战国时祭祀时常用黍，《仪礼·特牲馈食礼第十五》：“佐食持黍授祝。”郑玄注：“独用黍者食之主。”贾公彦疏：“独用黍食之主者，案上文云尔黍于席上，不云尔稷者，以稷虽五谷之长，不如黍之美，故云食之主。”平时黍还被用来待客。《论语·微子》：“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管子·轻重》：“天子祀于太祖，其盛以黍。黍者，谷之美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蕡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淮南子·时则训》：天子“以雒尝黍”，天子“食黍与麩”。可见黍是比较好的主食。《吕氏春秋·审时篇》、《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都有种黍的记载。但《齐民要术·黍稷第四》：“凡黍，粘者收薄；稌，味美者，亦收薄。”因其产量不高，人们多用来酿酒，其在粮食中地位已不如稷。

三、菽即大豆。《管子·戒篇》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

布之天下”。可能于此时广泛种植于中原。但起先种植并不普遍。到了战国大豆在黄淮海平原有了进一步的推广,不过菽是劳动人民的粮食,不是贵族阶级餐桌上的食品。《战国策·韩策一》,张仪说韩王曰:“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麦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韩地大部分不在黄淮海平原,不过从中得知菽在当时被视为一种粗粮是无疑的。《礼记·檀弓下》: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谓之孝。”战国时代许多文献里常“菽粟”连称,如上文所引。《管子·重令篇》:“菽粟不足,……民必有饥饿之色。”可知为广人民生存之必需。有人说战国以后菽渐替代黍,与粟成为当时人民的主食是有根据的。《汜胜之书》云:“大豆保岁易为,宜古之所以备凶年也。谨计家口数种大豆,率人五亩,此田之丰也。”《后汉书·陈蕃传》:“又青徐旱,五谷损伤,民物流徙,茹菽不足。”可见直至两汉时,菽仍然是大田的一种基本作物。

四、麦有春种秋收的春麦和秋种夏收的冬麦之分。春麦又称旋麦(《汜胜之书》),冬麦又称宿麦(《淮南子·主术训》、《汉书·武帝纪》)。战国时春、冬麦都有种植,《战国策·东周策》记载,位于洛水下游今巩县的东周欲种稻,而位于洛水上游今洛阳的西周控制水源不让其种稻,东周只好改种麦。据《汜胜之书》:“三月种秔稻,四月种秫稻。”东周本欲种稻而改种麦,则必为春小麦无疑。另外《左传》隐公三年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杜预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言取者,盖芟践之。”可见所种为冬小麦。

春秋以降,黄淮海平原有部分地区已实行春种秋收,秋种夏收,再夏种秋收的二年三熟制。《吕氏春秋·任地篇》:“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汜胜之书》区种麦:“区大小如中农区。禾收,区种。”《周礼·地官·稻人》郑玄注:“今时种禾下麦为夷下麦,言芟刈其禾,于下种麦也。”由此可知,麦与其他夏作的轮栽在秦汉时代已经比较普遍。

西汉时黄淮海平原种植的主要是冬小麦。汉武帝时董仲舒上书,以为“今关中俗不好种麦”,“损生民之具”,建议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77]这也从侧面反映关东地区已普遍种植冬小麦。这是因为冬小麦可以在水旱灾后,接种以供翌年夏秋青黄不接时的需要。所以汉武帝元狩三年“劝有水灾郡种宿麦”。^[78]后汉永初三年,“诏令种宿麦,务尽地力”。^[79]

粟麦轮种的两年三熟制或一年两熟制,大大提高了黄淮海平原农业

的产量。从《吕氏春秋》、《汜胜之书》、《四民月令》、《齐民要术》等农书来看,麦的地位始终未超过黍稷。但从具体史事来看,从西汉到东汉,黄淮海平原上麦的生产有很大的发展。刘秀起兵河北,至饶阳无萋亭,冯异上豆粥,至南宫又进麦饭。^[80]陈留外黄人范冉与王奂友善,“及奂迁汉阳太守,将行,冉乃与弟协步齏麦酒,于道侧设坛以待之”。^[81]建武末,沛王辅等五王邀井丹,“设麦饭葱叶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来相过,何其薄乎?”^[82]可见麦饭在当时被视为粗食,是广大人民餐桌上的主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曹瞒传》:曹操在兖州行军麦中,令“士卒无败麦,犯者死”,曹操自己的马腾入麦中,割置置地以自刑。《太平御览》838引《英雄记》载吕布遣部将取刘备地麦以为军资。时刘备在下邳一带。以上记载说明东汉末年兖、徐一带也普遍种植麦子。

五、水稻种植自战国以后在黄淮海平原上有显著发展。笔者在《历史时期黄河流域水稻生产的地域分布和环境制约》一文中(刊《复旦学报》社科版1985年3期)有详细论述,此处只作概述。

战国至秦汉时期黄淮海平原上水稻种植有几处比较集中。

一、三河地区。战国时位于巩县的东周有种水稻的习惯,已见上述。河内地区的沁丹河下游冲积扇是传统水利区。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下诏修理这里的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83]袁准《观殊俗》将河内青稻和新城白粳并举。^[84]新城位洛阳西南河谷地区,所产水稻曾被曹丕誉为“上风炊之,五里闻香”^[85]的上等秔稻。清淇水流域的汲县一带泉流丰富,陂塘众多,是理想水稻种植区。东汉顺帝时,崔瑗为汲县令,“为人开稻田数百顷”。^[86]今河北西南部临漳县西南,自战国西门豹引漳灌田以来,以盛产水稻著称。东汉安帝元初二年修复了西门豹所开支渠,以溉民田。^[87]东汉末曹操都鄄,更注意周围的农业生产。《魏都赋》云:“西门溉其前,史起灌其后。塍流十二,同源异口。”“水澍粳稌(稻),陆蔚稷黍。”“雍丘之梁,清流之稻。”李善注:“清流,鄄西,出御稻。”

二、黄淮平原在先秦时期零星地区有过水稻种植,但大规模开展实始于西汉武帝以后,淮、汝之间,鸿却陂是主要水利灌区。汉末毁坏。东汉建武时重修,起塘四百余里,于是“汝土之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88]以后明帝、章帝时在汝、淮之间多次修塘堤塘,开发水利,种植水稻,上文多有论述,此处不赘。汝水以东,颍、涡、睢、汴等河之间的水稻生产,则是自东汉起勃兴,自建武初山阳太守秦彭在境内起稻田数千顷,至东汉末建

安年间曹操在许下屯田,引颍水灌田。终东汉一代,颍、汴之间水利屡兴,水稻生产较前大有发展。

三、幽蓟地区。今河北省涿县、新城一带是战国时代著名的督亢陂水利区。荆轲刺秦王,即以督亢地图为进献礼。东汉建武年间张湛在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幽蓟地势偏北,气温较低,但只要有丰富的水源,也完全可以种植水稻的。

总之,战国至两汉时期黄淮海平原粮食作物有明显发展,其表现:一为两年三熟制推广,提高了亩产量;二是水稻生产的扩展,冬小麦在粮食作物中地位逐渐提高,代替了黍,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要口粮之一。

(原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一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注 释

- [1] 谭其骧:《西汉以前黄河下游河道》,载《历史地理》第1辑。
- [2]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11期。
- [3] 《裴李岗1978年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3期;《试论裴李岗文化》,《考古》1979年4期。
- [4] 王妙发:《黄河流域史前聚落》,《历史地理》第6辑。
- [5]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和研究》,第69页,文物出版社。
- [6]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汶口文化条”。
- [7] 《山东兖州王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1期。
- [8] 《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第83页。
- [9] 《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4期。
- [10] 《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4期。
- [11] 《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
- [12]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6期。
- [13] 孙森:《夏商史稿》,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91页。
- [14] 《从卜辞地名看商代的耕田规模》,《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 [15] 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农田垦殖》,《考古》1972年第4期。
- [16] 《卜辞中所见殷代农业》,1938年。
- [17] 《史记·周本纪》。
- [18] 《诗·大雅·文王之什·绵》。
- [19] 《左传》昭公十六年,子产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

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

- [20] 《国语·周语上》。
- [21] 《诗·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
- [22] 顾颉刚：《说丘》，《禹贡》半月刊1卷4期。
- [23] 《淮南子·人间训》。
- [24] 《国语·晋语九》。
- [25] 《左传》宣公十五年。
- [26] 《左传》昭公六年。
- [27] 《史记·齐世家》齐桓公二十三年。
- [28] 《左传》哀公十二年、十三年。
- [29] 春秋时中原齐、卫、曹、鲁、郑、邢等国多居有狄、戎、夷人，见《左传》，不详列举。
- [30] 《战国铁农具的考古发现及其意义》，《考古》1980年第3期。
- [31] 《孟子·滕文公上》。
-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 [33] 《太平御览》卷821，引《史记》。
- [34] 《史记·苏秦列传》。
- [35] 《管子·五辅》。
- [36] 《史记·商君列传》。
- [37] 《荀子·强国》。
- [38] 《战国策·赵策四》：“赵王因割济（笔者按：疑应作河）东三城令卢、高唐、平原陵（疑衍）地城邑市五十七命以与齐。”
- [39] 《汉书·沟洫志》。
- [40]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附图，人民出版社，1987年。
- [41][42][43] 《史记·河渠书》。
- [44] 《后汉书·王景传》。
- [45] 《史记·货殖列传》。以下凡见同书的，不再出注。
- [46] 《战国策·燕策一》。
- [47] 《战国策·宋卫策》。
- [48] 《战国策·魏策一》。
- [49] 《汉书·食货志上·沟洫志》。
- [50] 《后汉书·光武帝纪》。
- [51] 《后汉书·明帝纪》。
- [52] 《后汉书·张堪传》。
- [53] 《后汉书·邓晨传》。

- [54] 《后汉书·鲍永传附显传》。
- [55] 《后汉书·循吏传秦彭》。
- [56] 《后汉书·循吏传王景》。
- [57] 《后汉书·鲁恭传附丕传》。
- [58] 《后汉书·张禹传》。
- [59] 《后汉书·马援传附棧传》。
- [60] 《后汉书·何敞传》。
- [61] 《后汉书·安帝纪》。
- [62] 《后汉书·崔骃传附瑗传》。
- [63] 《水经·汝水注》。
- [64] 《三国志·魏书·夏侯惇传》。
- [65] 《后汉书·章帝纪》。
- [66]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英雄记》。
- [67]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引《魏书》。
- [68] 《三国志·魏书·杜畿传附恕传》。
- [69] 《初学记》卷八。
- [70] 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 [71] 关于粟与稷是一种作物还是两种作物，农史学界争论不一。笔者信从粟即稷说。
- [72] 唐云明：《河北商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2年第1期。
- [73] 邢润川、唐云明：《从考古发现看我国古代酿酒技术》，《光明日报》1980年4月1日。
- [74][75] 彭邦炯：《商代农业新探》，《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 [76] 《诗经时代稷粟辨》，《农史研究集刊》第2集。
- [77] 《汉书·食货志》。
- [78] 《汉书·武帝纪》。
- [79] 《后汉书·安帝纪》。
- [80] 《后汉书·冯异传》。
- [81] 《后汉书·范冉传》。
- [82] 《后汉书·井丹传》。
- [83] 《后汉书·安帝纪》。
- [84][85] 《艺文类聚》卷八五。
- [86] 《后汉书·崔瑗传》。
- [87] 《后汉书·安帝纪》。
- [88] 《后汉书·邓晨传》。

参 考 论 著

1. 吴宏岐:《元代北方汉地农业经济的地域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期。
2. 吴松弟:《宋代东南沿海丘陵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七辑,1991年。
3. 司徒尚纪:《历史时期珠江三角洲水利事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初析》,《北京大学学报·历史地理学专刊》,1992年7月。

张修桂

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结合湖区地质、地貌、水文、考古调查和卫星遥感像片,对洞庭湖演变的全过程以及当代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论证。文章认为,自全新世,特别是有人类活动以来,由于内外营力相互作用,洞庭湖经历了从小到大、再从大到小的演变过程。作者将这一演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全世纪初至公元3世纪的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沉降为4—19世纪的宽阔的湖沼景观,19世纪中叶至当代洞庭湖处于淤塞萎缩中,呈现出目前的陆上三角洲为主体的平原—湖沼地貌景观。作者预测,在不久的将来,洞庭湖将因自然淤积而走向消亡。因此,文章在分析洞庭湖淤塞萎缩原因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湖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治洞庭湖,延缓其消亡进程的举措和建议。

张修桂,1935年生,福建惠安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自然地理,古地图研究。

洞庭湖位于湖南省北部、长江中游下荆江的南岸,面积 2740 平方公里,容积 178 亿立方米,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泊。它接纳湖南的湘、资、沅、澧四水和长江的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分流(调弦口已于 1958 年冬堵塞),由岳阳城陵矶泄入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 1661.5 亿立方米,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集水、蓄洪湖盆。

整个洞庭湖区,以赤山—南山一线为界,可分为东西两大部分。东部湖区由东洞庭湖(包括大通湖、漉湖)和南洞庭湖组成;西部湖区目前已为星罗棋布的小湖群所取代,目平湖是西部残存的最大湖泊。

全新世,特别是有史以来,由于内外营力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结果,洞庭湖经历着一个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演变过程,即由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沉沦为“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1]的浩渺无涯的湖沼景观,最后又淤塞为目前的陆上三角洲占主体的平原—湖沼地貌景观。在不久的将来,洞庭湖将因自然淤积而走向消亡。

研究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一方面可以从中掌握它形成、发展以至最后消亡的客观规律,为正确使用、合理整治湖区提供理论根据;另一方面,研究此类大型湖沼的演变模式,认识现代陆上三角洲和湖沼沉积相的建造过程,还可以加深人们对地质时期陆相地层建造过程的感性知识,从而为寻找陆相地层的矿物资源提供有益的依据。所以积极开展大型湖沼的历史研究,无论在理论上或生产实际上都有重大意义。

本文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结合湖区地质、地貌、水文、考古调查和卫星遥感像片,对洞庭湖演变的全过程,特别是历史过程和今后发展趋势进行论证,供有关方面参考,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河网交错的洞庭平原

(全新世初—公元 3 世纪)

洞庭湖是燕山运动时期所形成的地堑型盆地,后经老第三纪末的褶皱抬升,新第三纪的剥蚀夷平,湖盆形态基本消失。随着新构造运动的来临,夷平面在第四纪之初的继承性断块差异运动中迅速解体;湖区外围东、南、西三部分沿复活断裂带崛起成高山;北部自第三纪即已存在的华容隆起发生比较普遍的微弱沉降;湖区中部则因强烈拗陷成湖,重新开始接受沉积。卫星像片湖区东西两侧的 NE 向大断裂和南北两侧的 NW 向

大断裂清晰的反映这一构造特点。

湖区钻井资料表明,第四纪洞庭湖地区的沉降幅度已达 220(西)~270 米(东)(图 1)。湖南省地质局东洞庭湖中部新河口 32 号钻井的剖面,最具代表性,兹抄录如下^[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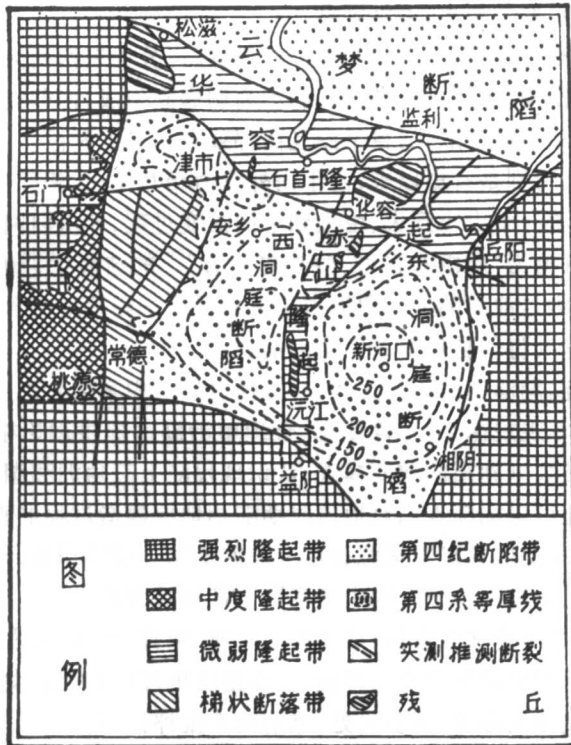


图 1 洞庭地区新构造图

洞庭组(Q_4):

12, 深灰、灰褐色粉沙质淤泥 3 米

11, 深灰、黄灰色含粉沙淤泥(在其他钻井中,本层一般为沙层)

5.4 米

.....假整合.....

下蜀组(Q_3):

缺失,地表所见为下蜀黄土或黄红色半棱角状古河床冲积砾石层

……………假整合……………

白砂井组(Q₂):

10, 灰绿带黄褐色、蓝灰色沙质淤泥, 含植物碎屑(在地表与其他某些钻井中, 为网纹红土)	9.6 米
9, 细—粗沙层	10.2 米
8, 沙砾层	54 米

……………假整合……………

汨罗组(Q₁):

7, 灰绿、蓝灰、黄绿色粘土, 底部变为沙质粘土	54.76 米
6, 浅黄色松散沙砾层, 顶部夹一层厚 20 厘米的泥炭	20.6 米
5, 深灰、灰绿色沙质或含沙粘土, 含植物碎屑	10 米
4, 蓝灰、黄褐色粘土	51.07 米
3, 蓝灰、深灰色粉沙—细沙层	11.16 米
2, 灰褐、黄褐、蓝灰色粘土层	24.79 米
1, 底砾层(有的钻井中厚达数十米)	0.2 米

(总厚 254.8 米)

……………不整合……………

下第三系(E)

从第四纪沉积物的旋回性以及发生于各组地层之间的四次沉积间断, 证明洞庭湖区的新构造运动具有间歇性升降的特征。在下更新世中期和中更新世中期的后半段时间, 是洞庭湖的两个全盛时期, 范围很大, 但湖水不深, 属断陷式的平浅型湖泊。由于赤山自下更新世末即开始伴随断裂作用发生隆起, 洞庭湖逐渐被明显地分为凹陷强度不等的东西两部分, 其最大的沉降中心偏于东部地区。上更新世洞庭湖区的新构造运动, 带有普遍陆升的特征, 在沉积物上, 仅形成下蜀黄土与河流泛滥层, 一般湖相沉积消失, 盆地呈现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这时, 赤山更明显地隆起, 基本上具备现今的形态; 华容隆起也有轻微抬升, 成为洞庭凹陷与云梦凹陷的天然分界, 并形成两级高度低于湖区周围的阶地。^[3]

全新世开始至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湖区形态继承上更新世河

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性质,为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提供了极其广阔的场所。今天湖区范围内各县,特别是湖区中心的安乡、沅江、南县和大通湖、澧湖、钱粮湖地区,普遍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4],就是最好的证据。大通湖农场的各个分场,在地表以下5~7米左右,均有遗址发现,石器甚多。其埋藏深度与新河口32号钻井全新世沉积物厚度基本一致,这就说明:上更新世进入全新世新石器时代,洞庭湖区仍然处于微弱上升阶段,沉积物缺失;因此,新石器时代的地面,基本上即上更新世河网交错的洞庭平原;而全新世7~8米厚的沉积物,应当属于新石器时代以后的近期沉降、堆积的产物。

新石器时代以后至公元3世纪的先秦汉晋时期,洞庭平原和华容隆起均有明显的沉降趋势,形成华容地区的埋藏阶地和平原上的一些局部性小湖泊;但整个河网交错的洞庭平原景观仍较显著,这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中有着极其明确的记载。

《庄子·天运》:“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又《至乐》:“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野即平野,《庄子》两次提及,可见战国时代洞庭地区为平原景色。

《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十二经:“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说明洞庭平原上,湘、沅、澧在洞庭山(今君山)附近与长江交汇,战国时代洞庭地区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已经清楚反映出来。

《汉书·地理志》记载更为明确:湘水北至下隼(县治在今湖北通城县西北)入江;沅水至益阳(县治在今县东北80里)入江;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澧水东至下隼入沅。^[5]只见湘、资、沅、澧在东洞庭平原上交汇分别流注长江,不见浩渺的洞庭湖面,一幅河网纵横交错的平原景观图,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图2)。

1957年出土于安徽寿县的战国楚怀王六年(前323年)所制“鄂君启节”,其中舟节西南水路铭文为“自鄂(今湖北鄂城)往,上江,入湘,入资、沅、澧、油”。舟节铭文水流交汇不及入湖^[6],与《庄子》、《山海经》、《汉书·地理志》所载一致,互为佐证,则先秦两汉时代的洞庭平原景观,客观存在,无可怀疑。

东汉三国时代的《水经》记载:“湘水又北过下隼西,又北至巴丘山入江;澧水又东过作唐县(治所在今安乡县北安全附近)北,又东至下隼县西

北,东入江;沅水又东至下隳县西北入江;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江。^[7]《水经》与《汉志》所载大体相同,洞庭四水基本上还是在洞庭平原上直接流注长江,平原景观未变。所不同者有二:

第一,《水经》明确记载澧水独流入江,和“鄂君启节”铭文一致,也和《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相符。古代澧水津市以下河段,是沿华容隆起南侧断裂带发育的东西向河道,即自今津市经安乡安全北,至华容东注长江。在华容以东、墨山南侧的澧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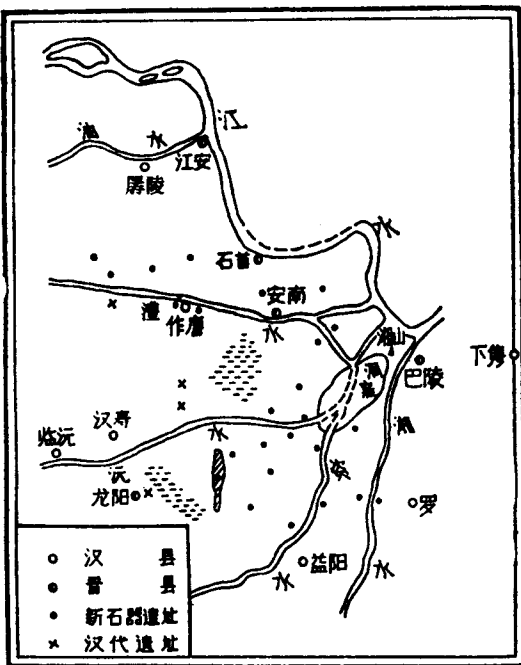


图2 先秦汉晋洞庭地区水系图

冲积扇上,估计存在扇状分流水系。主泓道因时而异:西汉时代走东南入沅的汉道;先秦和东汉三国时代,主泓道走偏北的入江汉道,东晋初年尚属如此。郭璞注《山海经》明确指出:“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8]以道里计,东晋初澧水入江口当在今岳阳(即古巴陵)西北广兴洲一带。

先秦汉晋时代,存在由津市经安全至华容东入长江的澧水河道说明:处于缓慢沉降中的华容隆起,在当时仍为云梦拗陷和洞庭拗陷的自然分水岭,荆江尚无分流干扰洞庭水系^[9],因此也就不存在先秦两汉时期长江主泓自今虎渡河南注洞庭的问题^[10]。

第二,明确记载洞庭平原之内存在湖泊于君山西南的资、沅水交汇处。应当指出,这是新石器时代以来,随着洞庭地区下沉而首先在沉降幅度最大的东洞庭形成的平浅型湖泊。《水经》可能因湖泊范围太小而不著其名称。但战国时代被放逐于洞庭地区的屈原,在《楚辞·九歌·湘夫人》中已有“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描述。此“洞庭”应即《水经》所

指的无名湖。秦汉之际,君山西南的这个“洞庭”,其洪水湖面当可扩及今湘水岳阳河段,故《山海经》中,汉初江南人的作品《海内东经》谓:“沅水出象郡谭城西,入下隼西,合洞庭中。”“湘水出舜葬东南陬,西环之,入洞庭下,一曰东南西泽。”下隼之西的洞庭;湘水所入的洞庭,当指这一部分。但总的说来,先秦汉晋时代的洞庭,尚属地区性小湖泊,只有在当地居住的或者是南方人,才知其存在。正因如此,当时详载全国各大湖泽的《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淮南子·地形》以及《禹贡》、《汉志》和《说文》等等,均不予以收录,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所以晋郭璞注《山海经》时,不但明确指出湘、沅、澧流经洞庭平原后直接与长江相会;而且干脆称《山海经》的这个“洞庭”为洞庭陂,而不称它为洞庭湖。其实,屈原的“洞庭波兮木叶下”,清人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楚辞地理考》中也早已指出是“微波浅濑,可供爱玩,无今日之浩渺大观”的形象描绘。

总之,先秦汉晋时代,洞庭地区属河网交错的平原地貌景观,虽有局部性小湖泊存在,但大范围的浩渺水面却尚未形成。因此,一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的所谓先秦汉晋时代,方圆 900 里的云梦泽包括江南洞庭地区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近年来,谭其骧先生分析了大量有关先秦汉晋时代云梦泽的史料,首次把“云梦”与“云梦泽”这二个既不相同又相联系的地理概念区分清楚,为研究江汉、洞庭地区江湖的历史演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谭先生指出:“云梦”泛指春秋战国时代楚王狩猎区,包括有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沼等多种地貌形态,范围几乎包括今天湖北东南部大半个省;“云梦泽”专指这个狩猎区内的湖沼地貌部分,范围仅局限在今江汉平原之内。二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1]由此可见,先秦汉晋时代的云梦泽与洞庭平原,不但在形态上属于二种不同的地貌类型,而且在地理位置上也毫无牵涉,各有其所。二者之间又以华容隆起为界,界限分明,根本不能、也不应该混为一谈。

二 沉降扩展中的洞庭湖

(4 世纪—11 世纪中叶)

新石器时代以来,洞庭平原和华容隆起均处于缓慢沉降之中。这种沉降趋势,已为现代重复水准测量资料所完全证实。1923 至 1926 年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施测的水准点,1951 年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复精密施测,结

果发现新旧高程有明显变化;1958和1972年广州地质大队在洞庭湖南岸常德—宁乡一线重复施测的水准资料也反映了同样问题(图3)。从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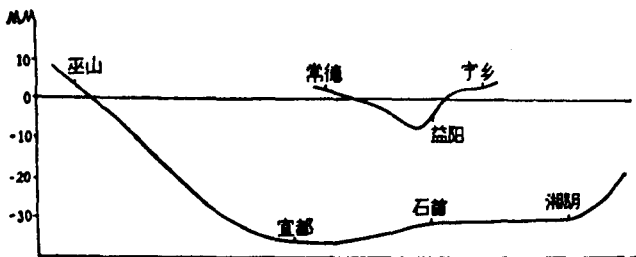


图3 洞庭地区重复水准测量差值图

可见,整个华容隆起地带,尤其是石首以西部分具有较大的沉降幅度,这就导致该地区埋藏阶地以及下荆江南移入侵现象的产生;而在洞庭平原地区,由于长期沉降的结果,至秦汉时代,估计平原景观开始向沼泽化方向发展,不宜人类居住和从事生产劳动。所以湖区之内,尽管新石器时代有人类频繁活动的痕迹,但秦汉时代地区经济并没有进一步发展,因而也就未能在此基础上设立郡县——尤其是现在湖区的中心部分,这很显然是受了沼泽化的自然条件所限制。

东晋、南朝之际,随着人为因素的不断加强,荆江江陵河段金堤的兴筑,以及荆江三角洲的扩展和云梦泽的萎缩^[12],在公安油口下游的荆江南岸,开始出现景口、沧口两股长江分流汇合而成的强盛沧水,穿越沉降中的华容隆起的最大沉降地带,进入拗陷下沉中的洞庭沼泽平原,开始干扰洞庭水系,使洞庭地区的地表形态产生重大变化:由沼泽平原景观迅速演变为众所周知的汪洋浩渺的大湖景观。

洞庭湖水面的扩展,首先反映在东洞庭拗陷的北半部地区。《文选》江赋注引晋张勃《吴录》载:“巴陵县有青草湖。”谓之“青草湖”,说明它是由水草丰美的沼泽平原沉沦淤汇所形成的平浅型湖泊。但从郭璞所说:江、湘、沅水共会巴陵头以及澧水独流入江分析,《吴录》所载青草湖的范围肯定还不小。至刘宋时期,盛弘之在《荆州记》中说:“巴陵县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13]可见东晋、南朝之际,荆江沧水分流汇注洞庭地区,平浅型的青草湖,水域范围迅速扩展。酈道元在《水经·湘水注》中明确指出:洞庭湖广圆五百余里,湘、资、沅、澧四水分别流注湖中。历史时期四水入湖的局面这时已经奠定。扩展的青草湖,洪水湖面

包有原在北边的洞庭湖水面,故青草、洞庭两名通称。统一湖面具有重湖性质,这是地体沉降、流水入侵在湖盆形态上的反映。

根据《水经注》记载:当时湘水北流经今汨罗县西合汨水,又北分为二支,主泓经磊石山西又北合东支注入青草湖,谓之青草湖口。^[14]资水经今益阳县,又东北流 80 里至古益阳县北,分为二支:东支东北流至磊石山北注入湘水,谓之清水口^[15];西支主泓又北至益阳江口注入洞庭湖。^[16]沅水自今汉寿县北又东北流,至赤山北麓东注洞庭湖,谓之横房口。^[17]在赤山西南、汉寿东南,当时有一片小湖沼。湖水北注沅水,称为寿溪;东通资水的交口称大溪口。^[18]湖区西北部自荆江景、沧两口南下的沧水,穿越华容隆起的最大沉降带,在今华容县西横断澧水故道,于南山—明山一线以西的今南县附近低洼沼泽区潴汇成湖,因属长江分流潴汇,水中含沙量较丰富,故称为赤沙湖。湖水东北通过生江口与荆江沟通;南面由沙口注澧共汇洞庭湖。^[19]澧水直接受荆江沧水分流的严重干扰,主泓道明显地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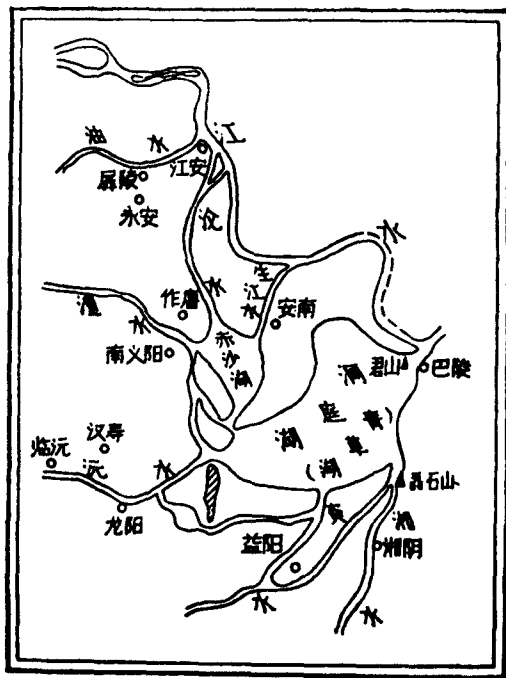


图 4 南朝时期洞庭湖水系图

津市为顶点,自正东的华容流路折向东南,经今安乡、安全之间东南流。原来安全北的澧水主泓变成汉道,称为澧水,受南下沧水制约折向东南于今安乡县东注入澧水。澧水合澧水后又东流分为三支:东支汉道流注赤沙湖;南支汉道注入沅水;东南支主泓则在明山以南汇注洞庭湖,谓之澧江口。^[20](图 4)

由此可见,南朝时期洞庭湖的主体范围在今赤山—磊石山一线以北;赤山—南山一线以东的东洞庭地区。君山矗立在湖中东北部,东南与扁山遥相呼应,成为洞庭湖出口处

的两座岛山。

今日之南洞庭地区,当时的洞庭湖面虽然尚未扩及,在地貌上属湘资联合三角洲的前缘部分,但河湖港汊却很发育。据《水经·资水注》记载:古益阳县左右,“处处有深潭,渔者咸轻舟委浪,谣咏相和”。三角洲上的这些水体,除了纳入资水外,还通过近10条泄水道,在磊石山附近汇注湘水,归于洞庭。^[21]在西洞庭地区,当时除了存在于今南县附近的赤沙湖外,在赤山以西、沅水以南也存在不少零星湖泊于沅水三角洲上。说明先秦两汉以后,东西洞庭地区均处于下沉状态。从湖泊范围的大小以及扩展方向分析:东洞庭地区的北半部,下沉趋势尤为严重,一旦荆江分流南注,低洼水面立即扩展成湖。联系到东洞庭地区第四纪沉积物厚度大于西洞庭地区,即东部沉降幅度大于西部,说明东西洞庭的现代构造运动的差异性,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特点。

唐宋时期,洞庭湖水面进一步向西扩展。形容湖区水域汪洋浩渺的“八百里洞庭”一词,开始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诗文之中。如唐僧可明的“周极八百里,凝眸望则劳,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22];宋梅尧臣的“风帆满目八百里,人从岳阳楼上观”;还有“洞庭八百里,幕阜三千寻”^[23],等等。

但据《元和郡县志》卷27岳州巴陵县:“洞庭湖在县西南一里五十步,周回二百六十里;青草湖在县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五里。”洞庭、青草两湖合计,周回仅五百余里,与《水经注》所载“广圆五百余里”一致,并无变化。因此,诗文中的“八百里洞庭”,当包括当时华容县境内的赤沙湖(此时亦称赤亭湖)在内。估计唐代东洞庭水面已开始向西洞庭扩展,赤沙湖有纳入洞庭湖的趋势。

宋代文献中,洞庭湖向西扩展的趋势已有明显记载。《皇朝郡县志》:“洞庭湖在巴陵县西,南连青草亘赤沙,七八百里。”^[24]《巴陵志》记载更为明确:“洞庭湖在巴丘西,西吞赤沙,南连青草,横亘七八百里。”^[25]可见随着湖区的继续沉降,水面扩展,赤沙为洞庭吞并的结果,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已连成一片汪洋水域(图5)。赤沙为洞庭吞并后,原来两湖之间的华容南境,地皆面湖,民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26]

在湖区向西扩展的同时,东部岳阳一带湖岸,因荆江日淤而南,湘江日淤而东,湖面百里之内又常西南风,沿湖岸线侵蚀倾颓颇为严重。《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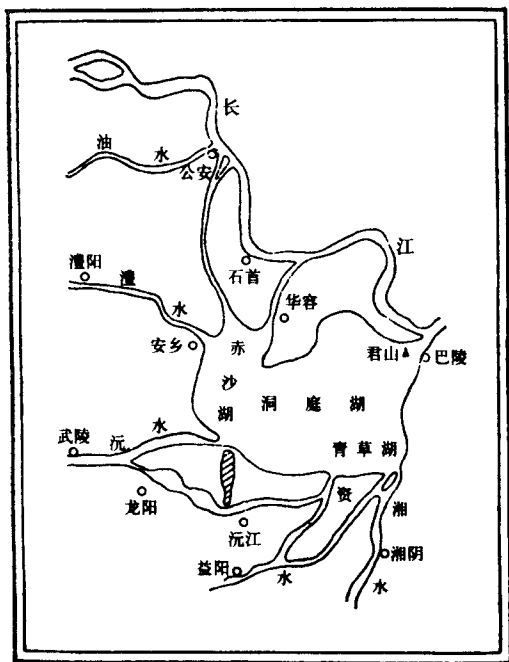


图5 唐宋时期洞庭湖水系图

《阳风土记》载：“郡城西数百步，历年湖水漱啮，今去城数十步即江岸，北津旧去城角数百步，今逼近石咀。”这时荆江口南移至岳阳城北五里，水深一二百尺，夏秋暴涨入于湖中，倒灌洞庭，南及青草，潇湘洞庭清流顿皆混浊。^[27]

这一阶段，荆江进入洞庭湖区的泥沙增加不太剧烈，洞庭四水来沙更少。史书记载：“沅江清悠悠”^[28]；“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了了见底。”^[29]因此，随着湖区的继续下沉，洞庭湖深度增至历史上最大值。“夏秋水涨，深可数十尺”^[30]，高数丈的千人

楼船可以在湖中便利行驶^[31]，成为历史时期洞庭湖发展至最深的阶段。

自东晋南朝至唐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长江流域经济迅速发展，地区开发加剧，原始植被遭受大量破坏，水土流失日趋严重，长江含沙量不断增大，首当其冲的江汉地区云梦泽逐渐淤填消亡，荆江统一河床形成。至元明清初时期，从上游带来的大量泥沙，继续淤高荆江河床，江患急剧增多。从明嘉靖、隆庆开始，为确保荆北地区安全，荆江北岸穴口基本堵塞，长江大量水沙涌向荆南，排入洞庭湖区。因此，在泥沙沉积量大于湖盆下沉量的情况下，洞庭湖底不断淤高；在来水有增无减、湖底淤高的情况下，洪水湖面范围则继续扩展，西洞庭湖和南洞庭湖就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形成、扩大。

嘉靖《常德府志》卷5山川：“洞庭湖，每岁夏秋之交，湖水泛滥，方八九百里，龙阳（今汉寿）、沅江则西南之一隅耳。”龙阳成为洞庭湖的西南隅，说明洞庭西吞赤沙之后，又向西南发展，把原在赤山西侧的《水经注》

时期的无名湖也吞并进去。因此,洞庭湖水面空前扩展,南北之间湖阔200里,东西湖阔250里^[32],周回达到八九百里。清雍正九年(1731年)修建舵杆洲石台的奏书中也说得具体:“洞庭一湖,绵亘八百余里,自岳州出湖,一望杳渺,横无际涯。而舵杆洲居西湖之中,去湖之四岸或百余里,或二百余里,舟行至此,倘风涛陡作,无地停泊,亦无从拯救,多有倾覆之患。”^[33]可见洞庭湖水面汪洋浩渺,较前有增无减。从南朝时期的五百余里,唐宋时期的七八百里,发展至本阶段的八九百里,成为历史时期洞庭湖扩展的全盛时代。

据道光《洞庭湖志》卷2记载:“洞庭湖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今常德)、龙阳、沅江,南带益阳而襄湘阴,凡四府一州九邑,横亘八九百里,日月皆出没其中。”这里,洞庭湖西北侵入石首境内,西连常德,南带益阳而襄湘阴,是水面汪洋浩渺的明证。据其附图计算,全盛时期洞庭湖的面积可达6000平方公里,约为现在湖面积的两倍以上。

湖区华容、安乡、汉寿、沅江、湘阴、岳阳等县县城均矗立湖旁;层山、寄山、凤山、明山、君山、扁山、磊石山、赤山等均成为湖中岛山,甚至澧县东30里的嘉山,也濒临湖岸。湖区群众传说:“八百里洞庭入嘉山”,可为这一全盛时期湖区扩展的生动概括(图6)。

但由于湖底高程不断增加,明至清中叶时期全盛的洞庭湖,其湖水深度却远远不如唐宋时代。这时统一湖面在平水期则瓦解为若干区域性的湖群。除了洞庭、青草、赤沙三湖之外,汉寿县有天心湖、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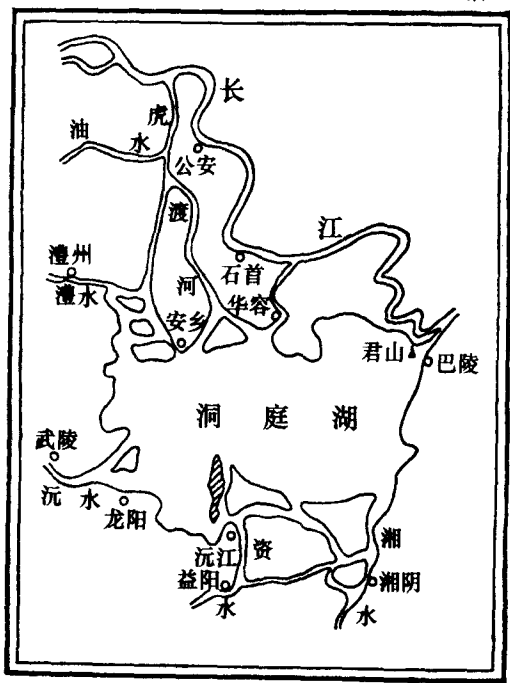


图6 明末清初洞庭湖水系图

白湖、安乐湖、太沧湖；沅江县有石溪湖、鹤湖、龙池湖；湘阴县有新塘湖、白塘湖、漉湖、羹脰湖；华容县有紫港湖、澧城湖、杜家潭湖、褚塘湖；安乡县有大通湖、大鲸湖、江西湖、安南湖等等。在冬春枯水时期，整个洞庭湖地区洲渚全露，唯一带水而已；岳阳西南的青草湖，唯见青草弥望；周回一百七十里的赤沙湖，几乎全部干涸，赤沙遍地。^[34]

明清之际，湖区西北部由虎渡、调弦两口夹带南下的泥沙所组成的水下三角洲已高度发育，前缘到达汉寿东北、沅江西北的赤山北侧，这是造成洞庭湖地区高程增大、湖区深度变浅的根本原因。在枯水季节，湖区水面退缩，三角洲出露，其前缘与赤山南北对峙，构成湖夹形态，分洞庭湖为东西两大部分，史称“洞庭夹”^[35]，是沟通东西洞庭的重要孔道。

由于湖盆北部水下三角洲的发育与扩展，造成大量北水南侵，是沉降中的南洞庭湖逐步形成与扩大的主要原因。据嘉庆《沅江县志》卷3《沿革》记载：“按旧志载，萧梁普通三年（522年），于洞庭正南建县，今县东八十里泗湖山、子母城等处，阡陌城址犹存，其地近岳州，今之县治乃其西南陲也。相传沅始有十一都，迄明中叶，仅以五里称。盖以襄汉一带，多筑堤垸，水势渐南，沅邑桑麻之地，多弃为鱼鳖场。”又载：“沅邑在昔，幅员颇广，自胜国荆江筑堤，西水南射，膏腴尽化为鱼游，田产既没，生养遂耗。”说明嘉靖之后，由于东洞庭南部水面的形成和扩大，沅江县东北一带低田均遭淹没，沦为泽国。

三 淤塞萎缩中的洞庭湖

（19世纪中叶—现在）

从19世纪50年代至现在，是洞庭湖在整个历史时期演变最为剧烈、最为迅速的一个阶段。汪洋浩渺的6000平方公里的洞庭湖，萎缩成今日之不足3000平方公里的湖面；在八百里洞庭中，淤出800万亩良田，主要就是这一百多年来演变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在于藕池、松滋两口的形成，使由荆江排入洞庭的泥沙急剧成倍增长；而人为因素也在相当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萎缩进程。

清咸丰二年（1852年），荆江马林工在小水年溃决，形成藕池口，因民力拮据未修，至咸丰十年（1860年），长江发大水，在原溃口之下冲成藕池河。同治九年（1870年），荆江黄家铺堤溃于长江大水，事后堵塞不坚，至

同治十二年(1873年),复溃不塞,形成松滋口及其分流松滋河。^[36]

藕池、松滋两口形成之后,从此荆江四口(包括太平、调弦两口)分流局面形成,荆江泥沙约45%(见表1)通过四口排入洞庭地区。而藕池、松滋两口的形成,使荆江涌入洞庭湖的泥沙急剧成倍增长。根据1934—1936年及1951—1964年共16年水文实测资料统计:四水、四口多年平均入湖泥沙总量为1.613亿立方米,其中四水为0.219亿立方米,仅占入湖总量的13.6%,四口为1.394亿立方米,占入湖总量的86.4%。而藕池、松滋两口来沙为1.206亿立方米,占四口分沙量的86.6%,占入湖泥沙总量的74.76%(见表2)。由此可见,19世纪50年代以后形成的藕池、松滋两口,使拥入洞庭的泥沙急剧增加三倍之多。而在1.613亿立方米的入湖泥沙总量中,由岳阳出口的泥沙仅为0.372亿立方米,占入湖泥沙总量的23.1%,湖内沉积1.241亿立方米,占入湖总量的76.9%,这就是最近一百多年来,洞庭湖迅速萎缩的关键所在。据湖南省水电设计院计算,1956—1962年全湖年平均淤积厚度达3.49厘米^[37]。可见湖区沉积量远远超过湖盆构造下沉量,湖泊的自然葑淤消亡趋势甚为明显。

表1 荆江四口历年分沙统计表

站名	松滋口	太平口	藕池口	调弦口	合计
全年分沙占枝江测站的%	11.6	4.5	26.8	2.1	44.9

表2 洞庭湖区各控制站历年平均输沙量统计表^[38]

名称	藕池	松滋	太平	调弦	湘水	资水	沅水	澧水	入湖总量	岳阳出口	湖内沉积
年入湖沙量(10 ⁸ 立方米)	80.8	39.8	15.0	3.8	7.54	2.84	8.18	3.31	161.3	37.2	124.1
占入湖总输沙量(%)	74.76		25.24						100	23.1	76.9
	86.4				13.6				100		

由于泥沙成倍增长来自湖区西北部,因此湖盆西北部的下水三角洲首先迅速加积,出露水面,成为陆上三角洲。它位于华容、安乡之南,当地群众称之为“南洲”。当洲土一旦出水,人为筑堤围垸工程随之兴起。至1894年,三角洲东北部的堤垸范围已达注滋口一带,南部堤垸已发展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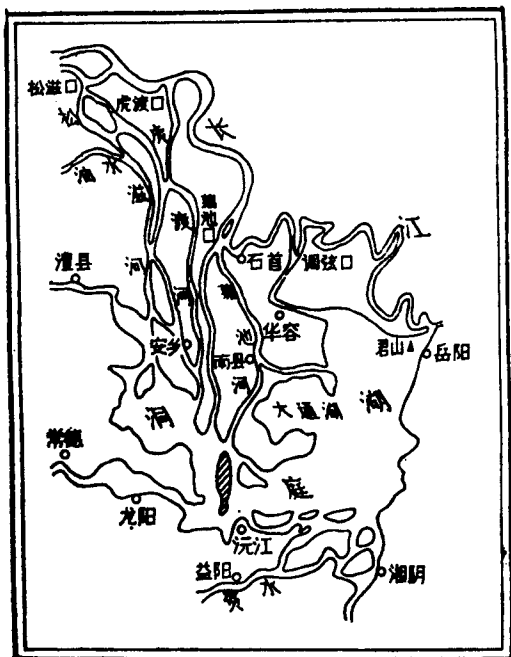


图 7 20 世纪初洞庭湖水系图

今武圣宫地区。原在湖中的明山、古楼山等均已上岸，团山、寄山也已处在高洲之中。由于三角洲筑堤围垸开垦的结果，1894 年始设南洲厅于乌咀，1897 年迁今南县治，1912 年改厅为县(图 7)。

在 19 世纪后期，由于陆上三角洲自北向南发展，整个洞庭湖被明显地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湖区首先承受藕池、太平、松滋三口大量来沙，湖面大半被壅塞。东部湖区水面也显著缩小，而且新的水下三角洲又在形成发育之中。在东部湖区的南部，因北水大量南侵，沅

江、湘阴两县境的堤垸不断溃废，弃田为湖，原有小湖群不断扩展合并为大湖，南洞庭湖在进一步扩展之中。

20 世纪初期以来，四口大量泥沙继续南注洞庭，湖区西北部的陆上三角洲在向东南发展的过程中，受水流交汇关系的影响，转向正东后又折向东北。随着三角洲的不断延伸，人工堤垸迅速增筑，洞庭湖终于被明显地分割为东、西、南三个部分(图 8)。卫星像片十分清晰地反映洞庭湖陆上三角洲的这一形成、发展和今后继续延伸的趋势。^[39]

西洞庭湖地区：在藕池河、虎渡河、松滋河和澧水、沅水泥沙的继续充填下，四口三角洲向南推进、沅澧三角洲迅速合围向东南发展。卫星像片显示，西洞庭湖已经基本淤积成陆。澧县东南的七里湖，在卫星像片上已经被芦苇滩地所取代；1911 年汉寿大围堤溃决形成的围堤湖，在像片上也已基本消亡。像片上黑色的小湖泊，如珊瑚湖、毛里湖、冲天湖、太白湖、鳝鱼湖等，均是三角洲合围后的西洞庭湖的残迹。现存较大水面的目

平湖,是北水南侵溃垸
 滞水扩展所成。1926年
 溃废成目平湖西南部分
 的大连障,其形态在像
 片上仍然清晰可见。现
 在目平湖的东、南两侧,
 受山地、丘陵制约,不
 能再下移后退,随着沅
 澧三角洲的继续向东南
 延伸,目平湖的最后消
 亡已不可避免。目平
 湖近年来淤积甚为严
 重,自1952—1976年,
 湖底淤高0.5~2.0米,
 其中大连障和老汪湖
 最为严重,淤高达0.8
 ~2.4米。据长办汉口
 水文总站统计^[40],
 1963—1978年进入
 西洞庭湖的泥沙每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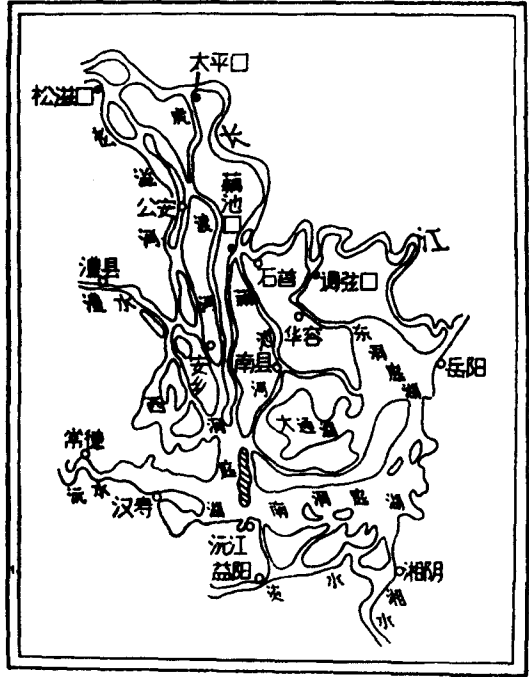


图8 20世纪30年代洞庭湖水系图

平均0.915亿吨,由南咀和小河咀出口为0.52亿吨,湖内沉积为0.395亿吨,即每平方公里淤积8.1万吨,相当于每年淤积5.4厘米的厚度。目前西洞庭湖(目平湖)平均高程28.1米(黄海),如果以此淤积速度继续下去,估计只需20年左右的时间,西洞庭湖除保留一定航道外,终将最后淤平。

东洞庭湖地区:东洞庭是众水所汇、泥沙大量排入的场所,因此它的萎缩进程相当迅速。卫星像片显示,四口陆上三角洲向东南延伸后折向东北,与藕池东支的扁担河三角洲合围的结果,使大通湖和澧湖从东洞庭湖中分离出来;东湖也是华容河三角洲与扁担河三角洲合围的产物;大面积萎缩后残存的东洞庭湖,则处在上述三个三角洲的合围之中。卫星像片还显示,四口三角洲前缘的武岗洲、上下鬃尾洲以及扁担河三角洲尚在迅速发展。其中白色部分为芦苇覆盖的稍老滩地;灰色部分为新近形成的在枯水期出露的无被复湖滩,它们的延伸方向表明今后东洞庭湖消亡

的形式和过程。像片上下飘尾洲的末端已接近君山,形成君山湖夹,显著地把东洞庭湖封锁起来;而藕池东支的扁担河三角洲,则在湖区西部迅速向东推进。从1952年和1976年实测地形图比较,扁担河三角洲向东洞庭湖中推进13.5公里,淤宽15公里,淤高2.5~5.0米。在卫星像片上,扁担河三角洲继续向东推进而形成的水下三角洲隐约可见;湖中泥沙流受君山湖夹制约,排回湖内。东洞庭湖的自然消亡趋势十分明显。现在东洞庭湖湖面,东西宽不过10余公里(图9),如果按上述扁担河三角洲推进速度计算,东洞庭湖的最后消亡估计也只需要二三十年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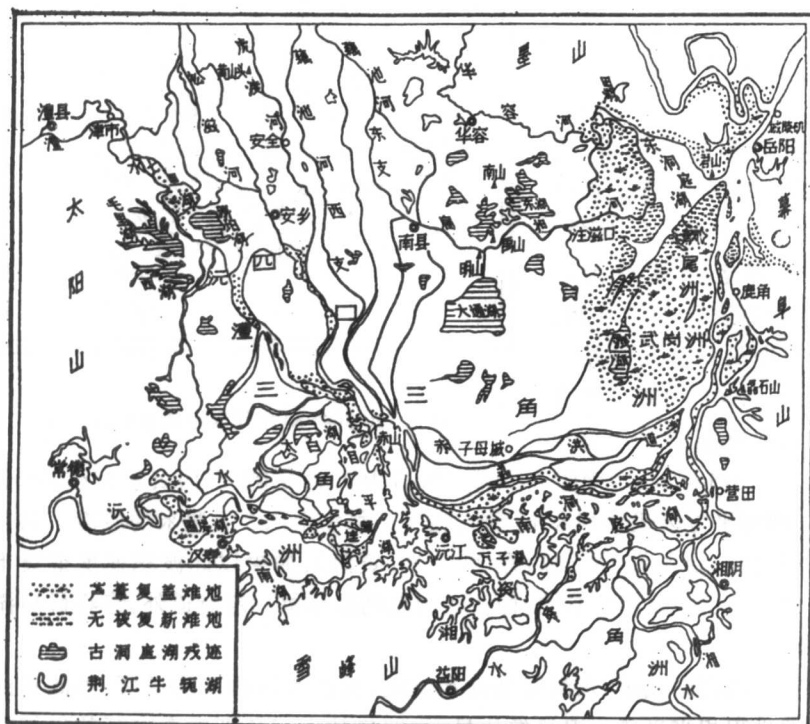


图9 洞庭湖卫星像片解释图

南洞庭湖地区:20世纪初期以来,南洞庭湖演变的特点是自北向南扩展,其原因在于四口陆上三角洲继续向东南延伸,造成大量北水南侵,使古老的湘资联合三角洲的前缘不断淹没,堤垸溃废,弃田为湖,以及三角洲上的小湖合并为大湖。卫星像片显示,南洞庭湖溃垸残迹十分清晰,



图 10 洞庭湖地区卫星像片

比比皆是,这和东洞庭湖的湖盆形态迥然不同,表明南洞庭湖是近期淤汇所成。早期沦湖的堤垸有:嘉禾垸、三里垸、嘉兴垸、徐家垸、永兴垸等等;后期沦湖的有发苑围、时生垸等。卫星像片还表明,由于入汇南洞庭湖的水沙来自西北一带,因此南洞庭湖北岸洲土尚在继续发育、迅速扩展中。南大垸、共华垸、双华垸、茶盘洲农场等都是近几十年来在新淤洲及原淹没的泗湖山、子母城等老垸上挽筑而成的;高程较低、未经围垸的湖滩,即在卫星像片上表现为白色的芦苇滩地,具有明显的向东南延伸发展的趋势。此外,比较卫星像片上的四口陆上新三角洲、沅澧陆上三角洲和湘资联合的古老三角洲,不难发现,色泽最深的湘资联合三角洲的沉溺形态最为显著。因此,在四口三角洲继续向南进逼的情况下,南洞庭湖仍有继续向南后退的趋势,南岸仍有沦湖的危险。所以目前在南洞庭湖南岸围湖造田尤其不合适。但从 1952 年和 1976 年实测地形图比较,南洞庭湖的淤积也在趋向严重,这是西洞庭湖基本淤塞的必然结果。解放以来,南洞庭湖平均淤高 2 米,湖区北部淤高 2~3 米。目前南洞庭湖湖底平均高程(黄海)26.7 米,湖泊水深一般为 1.5 米,如果今后湖区西北部来沙保持不

变或有所增加(在目平湖“水库”消亡的情况下),而东北出水口又保持畅通无阻,南洞庭湖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来沙充填而导致消亡。但从卫星像片分析,当今天的目平湖、东洞庭湖和南洞庭湖消亡之后,洞庭地区仅存各水通道和零星小湖,蓄洪能力将基本丧失。在非常时期,当荆江大量分洪南下,按其自然发展,目前地势低下的湘资联合三角洲地区,很有可能发展成 21 世纪的新的洞庭湖。明清以来南洞庭湖历史发展趋势清楚证明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值得警惕。

表 3 洞庭湖一百多年来萎缩进程表^[41]

统计年份	湖泊面积 (km ²)	湖泊容积 (亿 m ³)	相距时间 (年)	缩小面积 (km ²)	面积缩小率 (km ² /年)	缩小容积 (亿 m ³)	容积缩小率 (亿 m ³ /年)
1825	6000						
1896	5400		71	600	8.45		
1932	4700		36	700	19.44		
1949	4350	293	17	350	20.59		
1954	3915	258	5	435	87.00	25	5
1958	3141	210	4	774	193.50	58	14.5
1974	2820	188	16	321	20.06	22	1.37
1977	2740	178	3	80	26.66	10	3.33

综上所述,洞庭湖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演变过程,就是不断淤塞萎缩,逐步走向消亡的过程(表 3)。表 3 还说明,洞庭湖的萎缩进程与日俱增。19 世纪的后 70 年,面积萎缩 600 平方公里;20 世纪的前 50 年,萎缩 1050 平方公里;解放后的不足 30 年,面积萎缩竟达 1610 平方公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后将近 30 年的萎缩速度恰好与解放前一百多年的淤积进程相等;它又是在四口入湖泥沙总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日趋减少(表 4)的情况下产生的。

洞庭湖淤积萎缩进程不断加快的原因,关键在于四口泥沙长期充填湖中,使整个洞庭湖的湖底高程普遍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水下三角洲大面积出露水面成陆的速度必然加快,这是洞庭湖演变至现阶段的自然趋势。其次,人工围湖造田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解放前,豪绅在湖区竞相挽垸,使堤垸竟达 993 个,堤线长达 6406 公里,湖泊面积缩小率成

倍增长,水系极度紊乱,水利工程失修,洪涝灾害达到空前烈度。解放后,湖区进行大规模整治,开挖渠道 12000 公里,新建排灌涵闸 3323 处,修建电力排灌站 5031 处,进行大量园田化建设,堤垸合并为 245 个,耕地扩大到 828 万亩,防洪堤线缩短为 3742 公里,大大提高防洪抗灾能力,洞庭湖

表 4 四口年输沙量及占长江分沙比统计表^[42] 单位:10⁶ 吨

统计年代		四口年分沙量				四口占长江年分沙比		
		松滋	太平	藕池	调弦	四口总计	宜昌 + 清江	分沙比%
50 年代	前期	61.66	21.60	143.38	9.52	236.16	498.00	47.42
	后期	49.50	22.18	114.60	12.50	199.28	530.14	37.59
60 年代	前期	56.24	24.50	140.16	0	220.90	565.56	39.05
	后期	58.65	25.26	103.36	0	187.27	572.62	32.70
70 年代		45.13	19.18	45.03	0	109.34	503.54	21.71

地区面貌焕然一新,取得巨大成就。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湖区围垦速度也显著加快,50 年代湖区新围垦的面积竟达 1432.70 平方公里(表 5),除去同时期废垸还湖的 309.14 平方公里,纯增垸田 1123.56 平方公里。这一方面是扩大了粮食生产、为血防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却加速了天然湖面的萎缩进程,削弱了洞庭湖的蓄洪能力。50 年代洞庭湖萎缩 1209 平方公里,与纯增垸田相当;面积缩小率则由解放前的每年 20 平方公里,上升至 1954 年的 87 平方公里,1958 年的 193.5 平方公里,可见人工围垦对自然消亡中的洞庭湖起着加速的作用。1958 年后,围垦停止,洞庭湖面积缩小率直线下降(图 11),湖面萎缩趋向缓和,同样清楚地证明这一点。因此,70 年代以来,湖区围垦又有加快的趋势,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三,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趋于严重,使入湖沙量增大,也是洞庭湖加速萎缩的原因之一。以四水为例:澧水流域荒山面积由 1957 年的 367 万亩增加至 1976 年的 793 万亩,森林资源急剧减少和植被严重破坏,使澧水含沙量显著增加,成为四水中含沙量最高的河流,1963 年和 1969 年相比,在径流量相同的情况下,澧水年输沙量由 942 万吨增加到 1380 万吨,每立方米水含沙量由 0.54 公斤增加到 0.78 公斤,增长 44.4%;湘水也因上游水源林的严重破坏,使含沙量不断增加,1974 年与 1969 年相比,在径流量相同的情况下,含沙量由每立方米水含

沙 0.722 公斤增至 1.03 公斤, 增长 43%, 如果与 40 年代比较, 含沙量猛增五倍; 沅水含沙量 70 年代也比 50 年代增长 42.4%。^[43]

表 5 洞庭湖区解放初期围垦面积表^[44] 单位: km²

坑 名	解放初期新围垦		解放以前 围垦面积	解放前后 围垦总和
	围垦年代	围垦面积		
大 通 湖	1949 年冬	313.4	108.4	421.8
杨 林 寨	1952 年冬	30.0	0	30.0
民主阳城垦区	1954 年冬	143.9	207.6	351.5
冲天湖蓄洪垦区	1954 年冬	145.1	118.4	263.5
八官障蓄洪垦区	1954 年冬	36.0	229.5	265.5
西洞庭湖蓄洪垦区	1954 年冬	148.77	286.53	435.3
建 新 农 场	1955 年冬	48.67	0	48.67
南湖洋淘湖垦区	1957 年冬	115.0	0	115.0
钱 粮 湖 农 场	1958 年冬	168.3	45.0	213.3
屈 原 农 场	1958 年冬	109.19	24.11	133.3
君 山 农 场	1958 年冬	80.30	8.5	88.8
茶 盘 洲 农 场	1958 年冬	52.57	0	52.57
北 洲 子 农 场	1958 年冬	41.5	0	41.5
合 计		1432.7	1028.04	2460.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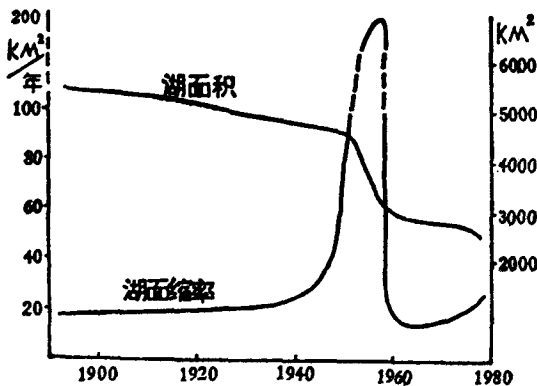


图 11 洞庭湖面积缩率图

总之,洞庭湖地区在内外力相互作用下,产生一系列演变过程。新构造下沉运动提供广阔的演变舞台;长江来水来沙在这舞台上相互争斗,扮演着主要角色。长江来水扩大了洞庭湖;长江来沙淤浅缩小了洞庭湖,不久将最后消灭洞庭湖。

当前洞庭湖地区存在不少问题:湖泊淤塞严重,湖面迅速缩小,蓄洪能力下降;防洪堤线太长,荆江洪水威胁仍然相当严重;河湖大量淤积,不少堤垸“垸老田低”,溃灾连年不断;河道淤塞,航运不畅,排涝也十分困难。因此,彻底整治洞庭湖已成当务之急。

洞庭湖的彻底整治,必须根据洞庭湖演变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湖南、湖北统筹兼顾,抓住主要矛盾,正确处理长江来水来沙问题。

鉴于数百年来长江大量泥沙充填洞庭地区,使目前荆南地势较荆北高6~7米,为延缓洞庭湖萎缩进程,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市安全,考虑荆北放淤加固荆江大堤,从长远来说是可取的;目前为了扩大荆江泄量,降低上荆江水位,减少江汉洞庭地区洪涝威胁,继续在下荆江进行系统裁弯工程,仍然很有必要;将来三峡大坝兴建,将是控制长江来水来沙,解除江汉洞庭地区洪涝灾害的根本途径。

但即使如此,在非常时期荆江仍有分洪洞庭地区的必要。因此,目前在湖区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延缓洞庭湖的消亡进程,使洞庭地区保留一定湖面(或分洪区),也是客观需要。其措施除口门(如藕池口或松滋口)建闸拦沙之外;还可利用湖区垸老田低的实际情况,进行有计划的人工放淤,减少入湖泥沙总量,延长残存湖泊寿命,此措施又可提升老垸高程,降低溃灾面积;此外,堵支并流,塞支强干,不但可以刷深河道,提高泄洪能力,缩短防洪堤线,而且对于改善湖区航运条件也有积极意义;最后,加强水土保持工作,在流域地区封山育林,严禁乱砍乱伐森林植被资源,迅速改变个别地区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应当马上着手进行。

本文据1978年10月的稿本补充修订。在野外调查和室内工作时,承蒙谭其骧先生的热情指导和湖南省水利厅、湖南省水电设计院、湖南省博物馆、岳阳地区水电局以及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帮助,汉口水文总站刘保太同志也给笔者很多帮助,特此一并致谢。

1980.6.20

(本文插图由吴磊、陈伟庆清绘)

(原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创刊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1月)

注 释

- [1] 《全唐诗》卷八四九《赋洞庭》。
- [2] 黄第藩等:《长江下游三大淡水湖的湖泊地质及其形成与发展》,载《海洋与湖沼》第7卷第4期,1965年。
- [3] 黄第藩等:《长江下游三大淡水湖的湖泊地质及其形成与发展》,载《海洋与湖沼》第7卷第4期,1965年。
- [4] 据湖南省博物馆提供的资料表述。
- [5] 《汉书·地理志》零陵郡、牂柯郡、武陵郡。
- [6] 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载《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62年。
- [7] 《水经》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篇。
- [8] 《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郭璞注。
- [9] 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 [10] 《禹贡锥指》卷七荆江,卷一四导江。
- [11] 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历史地理专辑第一集。
- [12] 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 [13] 《初学记》卷七;《太平御览》卷六六。
- [14][15] 《水经·湘水注》。
- [16] 《水经·资水注》。
- [17] 《水经·湘水注》。
- [18] 《水经·沅水注》。
- [19] 《水经·江水注》。
- [20] 《水经·澧水注》。
- [21] 《水经·湘水注》。
- [22] 《全唐诗》卷八四九《赋洞庭》。
- [23] 《舆地纪胜》卷六九岳州。
- [24] 《舆地纪胜》卷六九岳州引。
- [25] 《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大宝二年胡僧祐兵至赤沙亭,胡注引。
- [26] 《古今逸史·逸志·岳阳风土记》。
- [27] 《古今逸史·逸志·岳阳风土记》。
- [28] 《舆地纪胜》卷六八常德府。
- [29] 《元和郡县志》卷二七岳州湘阴县。
- [30] 《古今逸史·逸志·岳阳风土记》。

- [31] 《皇宋十朝纲要》卷一三引李龟年记杨么本末。
- [32]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五洞庭湖。
- [33] 道光《洞庭湖志》卷一皇言。
- [34][35] 《读史方輿纪要》卷七五洞庭湖。
- [36] 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根据记载结合实地调查访问所得。见该所编：《洞庭湖变迁史》。
- [37][38] 统计数字主要根据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编：《洞庭湖变迁史》。
- [39] 本文所用卫星像片系美国二号陆地卫星 1976 年 4 月 30 日获取的图像。
- [40]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口水文总站：《洞庭湖区湖泊淤积分析》(1979 年 9 月)。
- [41] 资料来源：湖南省水电局：《认识洞庭湖改造洞庭湖》(1979 年 2 月)。
- [42] 资料来源：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汉口水文总结：《洞庭湖区湖泊淤积分析》(1979 年 9 月)。
- [43] 湖南省林业厅科教处：《我省部分水土流失调查情况》(1980 年 5 月)。
- [44] 统计数字主要根据湖南省水利电力科学研究所：《洞庭湖变迁史》(1967 年 1 月)。

参 考 论 著

1. 张修桂：《云梦泽的演变与下荆江河曲的形成》，《复旦学报》1980 年第 2 期。
2. 谭其骧：《云梦与云梦泽》，《复旦学报增刊·历史地理专辑》，1980 年；收入氏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 樊自立：《塔里木盆地绿洲形成与演变》，《地理学报》1993 年第 5 期。
4. 景存义：《太湖的形成与演变》，《地理学报》1989 年第 4 期。

周振鹤

秦汉象郡新考

象郡是从秦代岭南三郡到汉末岭南七郡的转化过程中最大的谜团,其沿革与范围一直为学者所关注。20世纪以来,关于这一问题存在“郁林说”和“日南说”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前者以法国学者马伯乐为代表,主张秦象郡地跨《汉志》郁林、牂珂两郡间,至秦延续至昭帝时方才罢省;后者以法国学者鄂卢梭为代表,主张象郡治应南至汉日南郡之象林(即林邑)。本文通过对两派所据史料的可信性分析,认为日南说所据史料可疑而郁林说所据史料可信,因此赞同郁林说。本文认为《史记》、《汉书》本纪的记载比《汉书》本注更为可信,肯定了《山海经·五藏山经》及《山海经·海内东经》附篇包含的地理资料的真实性。此外,本文还对日南说所依据的北向户和西呕君问题进行了辨证,补充指出武帝平南越实置十郡而非九郡,秦代象郡应大于汉代象郡,其范围相当于桂西山地与郁江流域平原。

周振鹤,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地方行政制度史、文化方言地理学等。

秦始皇三十三年取五岭以南陆梁地置为南海、桂林、象郡。秦亡以后，南海尉赵佗拥三郡自立南越国。汉兴，无力用兵岭南，赵氏政权延续近百年之久。汉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置十郡，比秦代疆域有所扩大，昭、元两代相继罢省儋耳、象郡、珠崖三郡，此后至西汉末年，岭南地区并存有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

在从秦代三郡到汉末七郡的转化过程中，最成症结的问题便是象郡的沿革。由于对史料取舍的不同，历来的中外学者对象郡的去向基本上形成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则以为象郡自秦延续到汉昭帝元凤五年间，其领域大致跨《汉志》郁林、牂柯两郡间；一则认为秦象郡相当汉日南部，秦亡后即已消失。本文试图对这两种观点的立论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求得出象郡沿革的正确答案，就正于对这一问题有所研究的同志。

一 两种对立的观点：日南说和郁林说

清代以前，未有学者对象郡的变迁作过全面的论述，一般只是接受《汉志》日南郡下班固自注“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的说法，模糊地认为秦象郡应相当于汉日南郡。至于象郡范围到底多大，如何转化成日南郡，始终没有过详细的考订。杜佑《通典》虽然认为秦象郡范围应包括汉日南、九真、交趾三郡全部及郁林、合浦两郡的部分地域，但亦不详其原因。杜说一直为唐以后的学者所尊奉，杨守敬的《嬴秦郡县图》即据之以作。

1916年，法国人马伯乐(Henri Maspero)对象郡问题提出了新看法，他依据下列史料：

1.《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沅水条曰：“沅水出象郡谭城西，东注江，入下隼西，合洞庭中。”郁水条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

2. 臣瓚注《汉书·高帝纪》引《茂陵书》曰：“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

3.《汉书·昭帝纪》载：“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

得出象郡地跨《汉志》郁林、牂柯两郡间，自秦延续至昭帝时方才罢省的结论^[1](可简称之为“郁林说”)。

七年后,另一法国人鄂卢梭(L. Arousseau)著文^[2]指责上述史料不可依据:

1.《山海经》“奇异而迷离不明”,其材料不应采用。

2.《茂陵书》所述有脱误。临尘乃临邑(即林邑)之讹,依里距看,象郡治应南至汉日南郡之象林(即林邑)。

3.《汉书·昭帝纪》此载“毫无根据”,必须毅然摒除。

同时,鄂氏辑录了七类三十四条史料,据之维护秦象郡即汉日南郡的旧说(可简称其为“日南说”),明确指出,秦亡以后,象郡既废,不得再存在象郡问题。

马、鄂之争在学术界颇具代表性。60年来,有关象郡的论文,基本上不归马即归鄂,见仁见智,相持不下。不同的结论乃来自不同的依据,因此必须对马、鄂两氏所用史料进行认真分析,详加甄别,才能决定取舍,有所依违,对象郡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 日南说所据史料可疑

鄂文的分量较大,其中对马氏的批评留待后文讨论,这里首先对其所列举的大量史料作一分析,以确定其是否可据。鄂氏所引用的史料虽然洋洋洒洒,但细读之下,能够作为其结论的坚实依据的实仅数条而已。其余有的只是“凑数”(冯承钧语),如第七类的安南载籍;有的亦不直接证明象郡日南说,如《史记》、《汉书》的许多引文;有的其实要帮他的倒忙,如《淮南子》、《交州外域记》、《广州记》等。

最能支持日南说的史料归纳起来有如下几条:

1.《汉书·地理志》日南郡本注:“故秦象郡,武帝元鼎六年开,更名。”

2.《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韦昭注象郡曰:“今日南。”

3.《水经·温水注》引王隐《晋书·地道记》曰:“(日南)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

4.《温水注》:“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

这些史料表面上看来出自不同载籍而殊途同归,证成了象郡日南说。但仔细作一透视,四条史料实则同出一源,都本于《汉志》的注文。

班固《汉书》成于东汉中期,其后即广为流传。韦昭是三国吴人,作过太史令,参与《吴书》的撰述,并著有《汉书音义》七卷,因此他注《始皇纪》

乃因《汉志》之注文，并非别有所据。看他注桂林郡曰“今郁林也”，也是本《汉志》郁林郡班注“故秦桂林郡”而来，便知其中原委。因此，韦昭注实在不能充作一条证据。

王隐是晋人，其《地道记》成书于东晋时，上距秦代已500来年。象林县是汉日南郡最南端的县，但在《地道记》以前没有任何载籍提到过秦象郡亦有名为象林的属县。无论《史记》或《汉书》对象郡的叙述都很模糊，甚至连其方位、郡治都未正面提及，更不用提其属县了。但秦亡几个世纪以后才出现的《地道记》竟明确指出秦象郡属有象林县，其可靠性是令人怀疑的。清人钱大昕论运用史料的原则时曾说：“言有出于古人而未可信者，非古人之不足信也，古人之前尚有古人，前之古人无此言，而后之古人言之，我从其前者而已矣。”^[3]此论有一定道理。故王说未可轻信。推其“秦象郡象林县”之由来，无非因郡名与县名近似而发生的联想罢了。溯其源仍因为《汉志》言日南本秦象郡，而前者又恰领有象林县，遂以为后者也必辖有该县了。《地道记》中的无端臆想并不止这一条，还有如“交趾郡羸陵，南越侯织在此”的毫无根据的记载。南武侯织（王隐误武为越）高帝时封为南海王，其封地虽不能确指，要在汉初庐江郡与闽越、南越交界处殆无异义。《史》、《汉》明言织为闽越王无诸一族，又言南海王织上书献璧皇帝，淮南中尉擅燔其书，不以闻，复言南海民处庐江界中反，淮南吏卒击之，以此知南海地必在淮南国庐江郡南部边界。若交趾羸陵地远在赵佗南越国之后方，如何与庐江郡发生关系？《地道记》此文之虚妄，显而易见。因此《地道记》这一不可靠记录并不能作为日南象郡说的证据，相反却应看作是对日南即象郡这一说法的演绎。

又过了200年，到北魏郦道元写《水经注》时更进一步断定：“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但《温水注》这一条注文十分突兀，在其前不云有浦，只云郎湖，在其后犹接叙该湖，故“浦口”之浦，不知指何浦，王先谦以为指郎湖浦口^[4]，似不通，但该注文确插入郎湖事中；鄂卢梭氏以为指卢容浦，但前后文不见卢容浦之名，颇疑此文有错简之嫌。为便于判断，把前后注文一并具引如下：“寿冷水自城南，东与卢容水合，东注郎究，究水所积下潭为湖，谓之郎湖。浦口有秦时象郡，墟域犹存。自湖南望，外通寿冷，从郎湖入四会浦。……自四会南入，得卢容浦口，晋太康三年，省日南郡属国都尉，以其所统卢容县置日南郡及象林县之故治。《晋书·地道记》曰：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从这一段文字看来，

实在很难判断象郡墟域到底犹存于哪个浦口。鄂氏认定其为卢容浦口，自有深意。因《温水注》说汉日南郡治为西卷县，而该县也正位于卢容浦口，鄂氏因此说：“秦象郡同汉日南郡的前后治所，既在同一地方，此事若实，前《汉书》或者因此说汉日南郡即是故秦象郡。”但是以这样的方法来论证秦象郡与汉日南郡同在一地是很危险的。因为：（一）象郡墟域究在何处，尚需认真推敲；（二）西汉日南郡是否治西卷尚待证明，《温水注》引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郡，治西卷县”，乃是东汉之制，有人以为西汉日南郡应治《汉志》该郡之首县朱吾^[5]；（三）《水经注》一书凡提及秦郡治所时，必详其治于何县，“象郡墟域”一语甚为含糊，似乎即指象郡治之墟域，然则此象郡治是什么县？既其名无考，在秦亡600年之后又有何根据，判断其必为象郡治？令人无从信服。

考证地名和政区沿革本非道元所长，如西汉侯国至班固时多已不能指实其地，但《水经注》往往一一指明，结果造成笑话。或一侯国分指两地，或应在甲地而附会为乙地。甚至《汉书》已指明其地的，《水经注》依然自编自唱。如成安侯韩延年国，《汝水注》以为在颍川之成安，《泝水注》又作陈留之成安，实际上《汉表》明载其国分自郟县，应在颍川。临羌，《河水注》以为孙都之侯国，不知武帝封孙都时，临羌地尚未属汉，且孙都之封实在临蔡，并《汉书》亦未细读。《浊漳水注》以信都辟阳亭为审食其侯国，但本传言辟阳近淄川，非信都之辟阳明甚。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悉出于顾名思义、因缘附会，想当然耳。颇疑《温水注》所谓象郡墟域亦是受《汉志》日南即象郡说法的影响而误认，此墟域非酈氏亲历至为明显，大约亦得之某种传闻，而以讹传讹。因此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不便贸然相信这一墟域必定是秦之象郡郡治。

有此三端，而欲证明秦象郡与汉日南郡治同在一地，不亦难乎？大约有益于此，所以鄂氏乃以“此事若实……”的两可语气代替绝对的肯定。

《温水注》还有一段文字，鄂氏以为能引作强证的，其实还不如前所归纳的几条过硬。这里亦一并作一分析：“浦西，即林邑都也，治典冲，去海岸四十里，处荒流之微表，国越棠之疆南，秦汉象郡之象林县也。东濒沧海，西际徐狼，南接扶南，北连九德，后去象林林邑之号，建国起自汉末，初平之乱，人怀异心，象林功曹姓区，有子名连，攻其县杀令，自号为王，值世乱离，林邑遂立……”

鄂氏以为此文“明说古占波最初都城象林，就是秦汉象郡之象林县，

又可证明汉日南郡同秦象郡的南境是在同一地方”。这个证明真是糊涂。按鄂氏之观点,秦象郡即汉日南郡,亦即秦有象郡而汉无象郡,则注文中“秦汉象郡”一句本身就大不通。汉有象林县,但秦有否象林县尚待证明,怎能以此未经证明的说法去证明汉日南与秦象郡的南境同在一地?所谓秦象郡有象林县的说法与前述《地道记》同出一辙,毋庸多议。“秦汉象郡象林县”的提法说明了酈道元对秦象郡与汉日南郡关系的认识模糊。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承认秦有象林县,那么,鄂氏到底以哪一个象林县为准?以《温水注》本文,还是以《地道记》?前者相当《汉志》日南郡象林县,后者则相当同郡之卢容县,两者相去数百里之遥。西汉日南郡之象林县即后来之林邑国都,东汉永和二年(《温水注》以为初平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6]自此以后,象林县即不复归于中国版图。晋代曾一度复置象林县,但只是侨置于卢容县而已,已非西汉象林故地。《地道记》所谓“郡去卢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就是以晋之日南郡治卢容县(亦是侨置之象林县所在,汉卢容县同此)当秦象郡象林县地。而酈道元之“秦汉象郡象林县”,则在晋象林县以南数百里。两个所谓“秦象林县”的差异体现了后对象郡日南说的看法十分含糊,这种模糊认识发展到清代阎若璩就干脆说秦象郡治象林县,而不需要任何证明。鄂氏亦无视两个象林的差异说明秦郡象林县在他心目中也并不清楚,以此何能证明象郡日南说。

综上所述,能够支持鄂氏观点的最过硬史料无非就只《汉志》本注一条。其他几条不过是后人因此注文而作的推论和演绎而已。但是《汉志》本注也并不见得都是绝对可靠的,尤其在郡国沿革方面有许多靠不住的地方。如所谓“高帝置”之郡,竟有三分之一以上实非高帝时所置;记述河西四郡之置年,则无一处;广陵厉王之封域不足广陵一郡,而误以为兼有鄆郡之地;六安国乃以九江郡地置,却错当成是衡山国后身。^[7]凡此种种,说明班固不太精于地理沿革,许多注文出于想当然,因此对《汉志》不能过于迷信。

一般地说,《汉志》本注如果发生错误,总要和纪传表及他志记载发生矛盾,上面所引《汉志》种种错误,就是在发现矛盾以后通过《史》、《汉》有关纪传表志的综合考证纠正的。现在关于日南郡即“故秦象郡”的注文明显与《昭纪》“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的记载发生冲突,因此这条注文是否可靠就值得慎重斟酌了。一般而言,本纪往往比地志注文可信,这是

一;《昭纪》此载又有时代相去不远的《海内东经》和《茂陵书》作旁证(详后),而《地志》注文却仅是一条孤证,这是二;第三,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以日南说能圆满解释象郡的沿革而不与其他史料相抵牾,则日南即象郡之注文亦未可全非,然而遗憾的是,鄂氏持此说去设想岭南地区的沿革,虽然随意曲解史料而且加上许多臆想和假设,仍然得不到满意的解释。相反,如果根据《昭纪》所载(即郁林说)来看象郡变化,则圆通无碍,因此《地志》的注文实际上是不可信的。在举例说明日南说之不通与郁林说之可行以前,必须先分析鄂氏对马氏所引史料之责难是否真有道理。

三 郁林说所据史料可信

先说《山海经》。鄂氏对此书的地理内容持全面否定态度。《山海经》当然是一部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语怪之书,但其中所包含的地理资料反映了作者在创作该书时的地理知识,这是今天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具体就《山海经》各篇内容而言,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五藏山经》部分就比较平实雅正,包含丰富的地理内容。至若马伯乐氏所举沅水、郁水两条文字,更与《山海经》本文毫无关系,不能因为否定《山海经》就连带把它们也斥为“奇异而迷离不明”。

《山海经·海内东经》的篇末,附有一段千字篇幅的文字,叙述二十余条水道的出处、流向和归宿,沅水和郁水就包括在其中。这段文字无论从体例和内容看都与经文本身无关。清人毕沅说:“右《海内东经》旧本合‘岷三江,首……’以下云云为篇,非,今附在后。”^[8]已指出两者之区别,为方便起见,下文简称该段文字为《海内东经》之附篇。附篇除了一句话以外,毫无离奇荒诞的内容,显而易见是一份极可宝贵的水道地理资料,其中或有个别文字错讹,或有些地名无考,但所叙述的基本事实都与《汉志》、《水经》所载没有冲突,可资信赖。

其沅水条曰:“沅水出象郡镡城西,[人]东注江,入下隼西,合洞庭中。”

比较之:《汉志》牂柯郡故且兰本注云:“沅水东[南]北至益阳入江。”《说文》:“沅水出牂柯故且兰,东北入江。”

《水经》:“沅水出牂柯且兰县为旁沟水,又东至镡城县为沅水,又东北过临沅县南,又东至长沙下隼县西北入于江。”

沅水今古同名,以上四条记载,关于沅水的出处,流向和归宿大体一致,没有出入。但《海内东经》附篇的沅水条要早于其他三条史料,大致体现了秦汉之间的地理现实,时谭城以西之且兰地尚未内属,因此叙沅水源头只及“谭城西”。汉武帝以后,且兰地置为故且兰县,《汉志》遂系沅水于该县之下,表明其出处。三国时,故且兰县改称且兰县,《水经》故言沅水出牂柯且兰。由地名的演变可以看出地理现实的变化。

附篇沅水条记事之准确,说明谭城曾属象郡这一史实是可信的。谭城于《汉志》为武陵郡属县,是武帝元鼎六年以后的事(这点后文还要详及),于秦代它正是象郡的北界。《淮南子·人间训》说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玢,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岭……”证明谭城正在秦、越之交界。秦始皇三十三年置象郡以后,谭城即成为象郡最北部的一县。《淮南子》此文亦为鄂氏所征引,但未能直接证明象郡日南说,反倒可以成为《海内东经》附篇沅水条的注脚。

《海内东经》附篇郁水条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

《汉志》郁林郡广郁县:“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

《水经》:“温水出牂柯夜郎县,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又东至领方县东,与斤南水合,东北入于郁。”

郁水即今西江及其上游红水河之古称。郁水之源,秦汉间尚不清楚,只知其出象郡,未能言其具体出山。《海内东经》附篇所叙二十六条水道不言详细出处者唯郁水与白水两条。白水今嘉陵江及其上游白龙江,源出蜀郡徼外^[9],故亦仅能言其出蜀,不能详其出山。至武帝开西南夷,汉人地理知识更加扩大,知郁水(红水河)上源为豚水^[10],豚水出牂柯夜郎,即今北盘江。但红水河另有一上源南盘江。于《汉志》称南盘江下游为温水^[11],汉人视之为郁水支流。《汉志》牂柯郡谭封县本注曰:“温水东至广郁入郁。”合上文所引郁林郡广郁县本注观之,知温水与豚水合流后始称郁水,广郁县(今广西凌云、田林、凤山一带)即在两水合流处,正是豚水、温水、郁水三名称的分界点。

到了写作《水经》的时代(近人定为三国时期)又移温水名于豚水之上,豚水名遂隐,故《水经》云:“温水^[12]出牂柯夜郎县,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实际上相当于合《汉志》牂柯郡夜郎县:“豚水东至广郁”及郁林郡广郁县:“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两条注文为一。

郁水的流向是东偏南,《海内东经》言其“西南注南海”,西南应是东南之讹。古籍经过长期辗转抄写,常有错讹,尤其是道里方向,东误为西,南讹为北的现象颇为常见。即如前引《汉志》云“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东南显系东北之误,读史者决不至于因志文曰东南,而误认其为他水,同理,此处亦不会因经文“西南注南海”而怀疑其非郁水。

郁水入海处于《汉志》为四会,于《海内东经》附篇为须陵。须陵或汉以前之地名,其地望今已无可指实,或许与四会是名异而实同。《水经》粗看似未言郁水之归宿,反言郁水与斤南水会合之后,又复入于郁,显然不通。因此《水经》温水条最后一句“东北入于郁”明白是“东南入于海”之讹。^[13]入海误为入郁,东南讹为东北,必须如此更正于事理方合,也才与《水经》叙水道必详其出处、流程及归宿三要素的原则相符。

要之,《汉志》、《水经》与《海内东经》附篇有关郁水的记载表面上看来似乎有些差异,但实质完全一样,证明附篇郁水条所叙内容绝非虚妄。事实上,不但是上述沅、郁二水如此,《海内东经》附篇所有二十六条水道的纪录,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地理资料。不能仅仅因为它附在《山海经》一书之内而忽视其地理价值。就这些水道资料所表达的地理知识来看,似乎写定于秦汉间,如言白水出处不系广汉而系于蜀,言沅水、郁水出处只及象郡,而不及其西;又全篇不及汉以后出现的新地名;叙水道归宿时先言入某江或入某海,再及归宿处之地名,体例似比《汉志》、《水经》原始。唯全面之论证,已非本文所当及,容另文述之。

鄂卢梭氏以郁水当今右江—郁江—西江—系,《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亦作如是观,显然与《汉志》所载不合。《汉志》以为郁水之上源是出自牂柯夜郎的豚水。夜郎今虽不能确指何地,要在贵州安顺西南一带殆无异义,则豚水当今北盘江,郁水只能是其下游红水河—西江—系。若视郁水为今右江—西江,则夜郎只能位于今右江之源的滇桂边界一带。^[14]显然要与《史记·西南夷传》所载完全不合。《史记》说蜀枸酱是由夜郎经牂柯江到番禺。若夜郎在今右江之源,则枸酱运输路线将要越过南盘江与右江之分水岭再下右江,焉有是理?何不直走北盘江—红水河来得合理?汉人对豚水—郁水(北盘江—红水河—西江)—系本非常熟悉,又称之为牂柯江,是西南夷地区通岭南之交通要道。《汉志》关于豚水—郁水的记载也很清楚。因此,将右江—西江当成郁水是不妥的。

再说《茂陵书》。《茂陵书》或称《茂陵中书》。《汉书·王莽传》载:更始

三年，赤眉军入长安：“宗庙园陵皆发掘，唯霸陵、杜陵完。”论者以为《茂陵中书》即于此时由武帝茂陵中发掘所得。^[15]是书久已亡佚，由臣瓚注《汉书》所引有关地理和制度诸条文看，或为武帝时人所作，其记载亦足当信史。

鄂氏认为《茂陵书》“象郡治临尘，去长安 7314 里”之文有脱误，这是正确的。因为同书载珠崖郡治暹都，去长安七千三百一十四里，而儋耳去长安 7368 里，临尘（今广西崇左）离此两县（在今海南岛）当然不致有万里之遥，因此里距应当有误。但鄂氏看法却相反，以为数字不易错，地名容易错。临尘可能是临邑之误，而临邑即林邑，进一步，林邑又是象林县，因此结论是：象郡治象林县。但地名这样连环错法恐怕不可能，而且即使真是这般错法，要解释日南即象郡也还有困难：因为鄂氏自己已证明秦象郡和汉日南郡同治西卷县。现在若依照经他修正的《茂陵书》又说治象林，这就还要证明秦象郡曾由象林迁至西卷，对这一点，鄂氏也承认说不过去，“有些武断”。退一步说，如果象郡真治象林（今越南广南省会安附近），去长安亦远不足万七千五百里之数。数字讹误的可能性并不比地名小。本文其他章节所引用的《茂陵书》条文、地名均无疑问，但数字却间或不可信，如“沈黎治笮都……领二十一县”，领县数就明显有误。因此马氏所引《茂陵书》此条错的实在是里距，至于“象郡治临尘”的记载是完全可靠的。

再说《汉书·昭帝本纪》。鄂氏以为《昭纪》元凤五年“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之载，毫无根据，应毅然摒除。他引清人齐召南《汉书考证》说：“按此文可疑，秦置象郡，后属南越，汉破南越，即故象郡置日南郡，以《地理志》证之，此时无象郡名，且日南郡固始终未罢也。”齐氏此数语实不合逻辑，他并不是以其他材料来求证《昭纪》不可信，而是先认定《地理志》注文可靠，然后以之来否定《昭纪》，如果这种考证成立，何不可以倒过来，以《昭纪》为可信来否定《地理志》注文？所以鄂氏也不得不承认此种考证“不甚详明”。同一齐召南，在遇到河西四郡置年地志和本纪所载有歧异时，不加深考，主张从本纪，因为本纪直采官家记注，最为可据；然而在象郡问题上却又一反从纪之主张，奉地志注文为圭臬，这一正一反适足明其考证之草率，并非择善而从，而是择易而从。

就一般情况而言，《史》、《汉》本纪的记载的确是比较可信的，在没有坚实旁证的情况下是不好随便摒弃的，而且就《昭纪》此文而言，确是可靠

的。因为罢象郡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武帝几十年开疆拓土消耗了大量物力、财力后，昭帝年间明显地采取紧缩政策，罢省一系列边郡。始元五年，罢真番、临屯，以并乐浪，又罢儋耳并珠崖。元凤五年罢象郡的性质与上述三郡之罢完全一样，乃是以精简政区的方式来减轻负担。因此，借用数学术语来说，昭帝罢象郡是一个“可能事件”，不可视为乌有。

武昭间象郡之存在还可从“十七初郡”中得到旁证。《史记·平准书》曰：“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十七初郡”之名目，《史记》未详。集解引晋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也。”鄂卢梭氏因晋灼注中无象郡之名，遂引之以为证明西汉无象郡的一条根据。实际上，晋灼所说十七郡中，有一郡应该排除。零陵郡乃武帝分桂阳郡所置，^[16]绝非新开地上的初郡。除去零陵以后，此一空缺则非象郡莫属（后文还将举一条旁证）。故鄂氏所举此条，适足以成其反证而已。

从《汉志》郁林郡领域相对较大这一点，亦使人相信象郡地分属郁林之可能。汉末岭南七郡规模都较小，领县数不多。独郁林郡属县 12，为诸郡之冠，比南海、合浦、九真、日南等郡属县数多出一倍左右。推测其于武帝初置时，领域必无有如许之广，乃因后来接受象郡地后，才扩展至 12 县之众。

以上已经从个别方面，独立地论证了马伯乐氏所举《海内东经》附篇、《茂陵书》、《昭帝纪》的四条记载，是可靠的史料。而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史料的相互印证，可以进一步看出它们的可信程度。《昭纪》云：“罢象郡，分属郁林、牂柯。”《茂陵书》则曰：“象郡治临尘”，临尘于《汉志》正是郁林郡属县。《海内东经》附篇又曰：“郁水出象郡”，于《汉志》，郁水上游正在郁林郡之中，证明郁林郡部分地确故属象郡所有。又曰：“沅水出象郡镡城西”，则更明确了秦象郡的北界。镡城于《汉志》属武陵郡，其南则郁林，其西南则牂柯，是证象郡应跨于郁林、牂柯间。三种时代相去不远的不同载籍，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正好互为补充，综合说明了象郡问题的真相，这岂是偶然的巧合？当然不是。这只能说明《汉书·昭纪》关于象郡的记载是一件无可怀疑的事实，鄂氏对马氏所用史料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

四 郁林说可解释象郡沿革而日南说不能

《昭纪》之可靠既已证实,若以之为基础,再补充若干史料,则象郡和岭南地区的沿革大略已明。

《史记·南越传》云:“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

《南越传·索隐》引《广州记》曰:“交趾有骆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为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铜印青绶,即今之令长也。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他攻破安阳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

《水经·叶榆水注》所引《交州外域记》云:“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骆田……”与《广州记》略同。

由此可知,岭南地区的沿革大略是:

秦始皇略定扬越,置南海、桂林、象郡。象郡南界与《汉志》郁林郡一致。象郡以南之交趾地(今红河三角洲一带)为蜀王子安阳国所在。秦亡后,南海尉赵佗据南海自立,随之击并桂林、象郡。吕后文帝时,赵佗南越国之势鼎盛,以兵威边,灭象郡以南之安阳国,置交趾、九真二郡,形成地东西万余里的大局面。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置十郡(十郡之说后文另有证)。象郡建制保留至昭帝元凤间方罢。

这一沿革过程与上引史料毫无冲突,既简单明了,又顺理成章,是证郁林说之可行。

若以日南说代之,则情况完全两样。鄂氏不得不对上述史料随意加以改造,添上许多假定和臆想,即便如此也还不能自圆其说。

首先他想象蜀王子所攻取的不是“未有郡县之时”的交趾,而是秦之象郡⁽¹⁷⁾(直接与《交州外域记》矛盾)。然以秦之强大,何能为蜀王子所败?于是又必须进一步假定蜀王子之取象郡乃在秦始皇死后,但也不能太晚,太晚则与“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之记载相悖。于是乎蜀王子不早不晚,只能在秦始皇死的那一年夺取象郡,而他所建立的安阳国也只能存在三年,到秦亡之时,即为赵佗击并。这哪里是在解释历史,完全是在随意编造了,然而,即使是这样编造,也并不圆满。秦始皇死后,天

下虽已开始动乱，但中央集权制并未崩坏，终秦之世无有叛郡，便是明证。赵佗虽占据岭南地区的中心南海郡，其击并桂林、象郡犹须待秦亡以后，以小小蜀王子何能恰好于秦始皇一死就夺取偌大一个象郡？若象郡真成安阳国地，则《史记》必言佗击并桂林，灭安阳国，无有直书佗“击并桂林象郡”之理。而且安阳国若仅存三年，其事迹绝不可能成为传说而流传至数百年后。

《广州记》和《交州外域记》是根据掺有若干史实的传说写成的。因此安阳国的具体存在时间，也根本不可能像鄂氏所推测的那样绝对。从《史记》所载看来，赵佗灭安阳国当在吕后文帝间，即上引所谓“高后崩……因此以兵威边，财物骆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之时。但鄂氏既已认定佗并安阳国在秦亡之时，则《史记》此文遂不可通。于是他又假设，此文乃是“追记之文”。

凡此种莫须有的假设和臆想，皆由于死抱“日南郡即故秦象郡”之《汉志》注文不放的缘故。若相信《昭纪》的记载，主张象郡郁林说，则安阳国自在象郡以南交趾地，于秦汉间尚与赵佗无任何关系，殆至吕后以后方为赵佗所灭，置为交趾、九真两郡。这样解释圆通无碍，无须任何假设、臆想之辞，又与史籍所载相符，其合理性不是十分显著吗？

上文已经说过，《汉志》中有关郡国沿革的注文毛病不少，不可迷信；日南郡“即故秦象郡”更是一条孤证，它与《昭纪》的可靠记载相矛盾，已令人觉得其不可信，而鄂氏以之为据来说明象郡沿革又破绽百出，不能自圆其说。有了这样几重理由，日南即象郡之注文难道还不应该抛弃？这比鄂氏毫无道理地“毅然摒除”《昭纪》条文慎重多了。

班固对于秦郡并不了了。近人已证明秦一代郡数在四十以上，但依班固的看法，秦郡仅有三十六，一些他视为高帝所置的郡其实乃是秦郡。大约他以为秦郡与汉郡之间是一一对应的接续关系，秦桂林郡既被当成汉郁林郡的前身，秦象郡的后身当然要另找他郡，或许正因汉日南郡有象林县，遂被班固误认其与象郡有关，而被派作象郡的后身。

班固的真正思路是否如此，今已不明，这里不过略作推测而已。但他以为日南即象郡的想法则是完全错误的，已为上文的论述所证实。不过象郡日南说的支持者还有两点不太充分的理由需要予以驳正，一是北向户，一是西呕君。

五 关于北向户和西呕君

北向户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但长期以来被纠缠不清,以为可当成日南说的证据,故需略缀数语。在北回归线上,每年夏至那一天正午,太阳正好位于天顶,此时,在回归线以南的地方看太阳,其位置自然在天顶偏北处,而且越往南走,太阳越偏北,光线也就可以从北向窗子射入室内,这就是北向户的意义。这种现象在中原地带不能见到,因此人们将它作为南疆的一种特殊标志,以“南至北向户”表示秦帝国南疆的遥远。由于只要过了北回归线就会出现这种北向户现象,所以“南至北向户”一语只有定性的意义,并不能作为定量的标准。也就是说,只能表明秦代南境至少已到北回归线以南,而不能具体说明南至何处。当然,越往南走,太阳在天顶以北的日子越多,到了今越南中部的日南部,北向户现象更加明显,但更加明显已是充分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到了日南郡一定有北向户现象,但不能说,只有到了日南郡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合浦全郡、南海、苍梧、郁林南部都可以是北向户所在。因此鄂氏以此证明秦代南境已到达日南郡是没有说服力的。

而且即使在日南郡,出现北向户现象的日子也只在夏至前后的一段时间,其他大部分时候仍是南向视日。所以东汉日南张重举计入洛,明帝问他日南郡是否北向视日时,他并不以为然,并举例说云中、金城之名亦不必皆有其实。^[18]完全的北向户只有在南半球才能实现。我们显然不会因日南之名而以为其位于赤道以南,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北向户”就非至日南郡不可。

西呕君译吁宋问题。《淮南子·人间训》载秦始皇发卒 50 万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西呕究在何处?有人认为西呕当即后来《汉志》交趾郡之西于县。呕、于两音同部,可以通转。因而以此证明秦军已深入到交趾地,否定象郡分属郁林、牂柯之说。以为西于县之名与西呕有关,本可备一说,未可厚非,但以之证明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必在交趾地,却未必得当。有许多史料证明西瓠(即西呕)在桂林境内。如《太平御览》卷一七一引《郡国志》曰:“郁林为西瓠。”《史记·南越传》云:“桂林监居翁谕告瓠雒四十余万口降。”瓠雒即同传前述之西瓠、雒两族,至于唐以下载籍以西瓠地当秦之桂林者相当多,因非直接证据,无需具引。亦有人由考古

方面来证实这一点。^[19]因此,西瓯族很有可能由交趾地转移到桂林地,而在交趾地遗留下西于这一地名。在地名学上,民族虽然已经迁徙,但他们留下的地名仍然存而不废,是屡见不鲜的事。徐中舒先生推测“西于王为安阳王驱逐以后,乃北徙于桂林瓯雒地”^[20],于事理颇合。故秦军杀西呕君译吁宋完全可能在桂林地,不必非在交趾地不可。这件事并不能作为秦象郡即汉日南郡的证据。

综上所述,象郡日南说的论据均已被否定,按理说来,应该可以无条件接受郁林说了,但是暂时还不行,还有最后一道难关,即所谓九郡问题需要克服。

六 武帝平南越实置十郡而非九郡

《史记·南越传》云:“……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九郡这名,《史记》不详。《汉书·武帝纪》作:“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南越传》与此同,唯将儋耳、珠崖列于最前面。然据《昭纪》,象郡应至元凤五年才罢,何以九郡之中无象郡之名?对这个问题有过两种回答。马伯乐氏认为,象郡或在武帝建元六年开西南夷时先归属于汉,待元鼎六年平南越置九郡时,自然不在其中。日本学者杉木直治郎则以为^[21],九郡之名并不如《汉书·武纪》所列。因为《贾捐之传》、《地理志》篇末皆云儋耳、珠崖两郡为元封元年置,因此武帝元鼎六年之九郡,应是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及桂林、象郡两郡。杜佑《通典》实际上已提出这个见解,其《州郡典·古南越地》注曰:“分秦之南海、桂林、象郡,置苍梧、郁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并旧,九郡是。”

但是马氏之说,于史无征,没有说服力。杉木氏之设想亦无实据,未可从。且九郡之中若真有桂林,则该郡废于何时,又成另一悬案。杜佑《州郡典》之注文,亦纯属臆想而已。

要之,九郡问题的确比较棘手,历来成为证明汉代不存在象郡之铁证。凡主张象郡日南说者,包括鄂氏在内,无不以九郡之中无象郡之名作为否定《昭纪》的最强证据,其实这个证据完全是可以推翻的。

首先要肯定的是,汉武帝平南越后,所置实为十郡,而不是九郡,除《汉书·南越传》所载九郡以外,还应有象郡。元鼎六年所置者为大陆上的八郡,第二年,元封元年又渡海,在海南岛再置二郡。然则何以《史记》云

“遂为九郡”呢？这自然有其原因。

平南越地，置十郡后，仅隔四年，元封五年间，武帝就在开疆拓土版图扩大近一倍的情况下，分全国为十三刺史部，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监察区，以便于行政管理，加强中央集权制。其中除象郡以外的故越地九郡被划在交趾刺史部之中。自元封五年至征和二年（《史记》大约完成于此时）的十几年间，太史公习闻交趾九郡之说，而交趾又是故越地，因此越地九郡的错觉就逐步形成而至牢不可破。这种错觉的形成很自然，而且亦非仅此一例。高帝末年十五郡亦为太史公所习闻，然细数十五郡时，却误数入东郡、颍川二郡而忘记其于上年已分别益予梁国和淮阳两国。

然则象郡列入那一刺史部呢？曰：益州刺史部。杨雄《益州箴》曰：“岩岩岷山，古曰梁州……义兵征暴，遂国于汉，拓开疆宇，恢梁之野，列为十二，光羨虞夏……”所谓“恢梁之野，列为十二”者乃汉武帝扩大了《禹贡》梁州的范围，列郡十二，以成益州。十二郡之目，顾颉刚先生曾数其中十一，即：巴、蜀、汉中、广汉、犍为、牂柯、武都、汶山、沈黎、益州，而后说：“尚有一郡不可知，或后来有所并省。”^[22]此一郡其实可知，乃象郡也。由于象郡隶属益州刺史部，遂不与故越地其他九郡相提并论，故交趾九郡在太史公的印象中极为深刻，越地九郡之说遂见于《史记·南越传》之中。至班固著《汉书》时，遂据《史记》九郡之说，按图索骥，以汉末岭南七郡，加上海南岛已废之二郡，成九郡之数。此后南越地九郡之概念遂至不可移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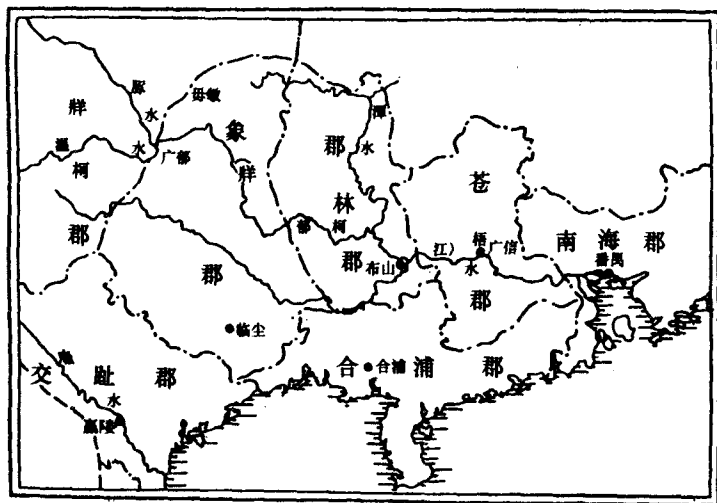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九郡之说有其历史原因，并不能因此否定象郡存在于西汉的事实。要之，武帝时岭南地区实际上并存有十郡，只是由于象郡单独列于益州刺史部之中，因此十郡并提的时间至多不过只有四年，在人们的印象中极为淡漠，故十郡之说遂不流行于世，象郡之下落亦随之不明。近人虽有以《昭纪》罢象郡之说为可信者，终因无法解释九郡之中何以无象郡之名，而不能理直气壮。究其实，《平准书》所言十七初郡已隐含象郡于其中，只因晋灼误以零陵代替象郡，后人不加深考，即宗其说，遂使象郡不见天日。陈梦家先生对晋注零陵郡亦有怀疑，然又并退犍为，而进酒泉、张掖，乃以错易错^[23]，至谭其骧师始云晋注应退零陵而进象郡^[24]。今幸《益州箴》“列为十二”之文具在，足以证成其说。于是象郡之存在于昭帝之前，既有《昭纪》之明确记载，又合十七初郡之数，复列于益部十二郡之中，并与太史公九郡之说不相冲突，则至此象郡建置之谜已得彻底解决，

而象郡之领域亦可随之而明矣。

七 象郡之领域

由《昭纪》象郡分属郁林、牂柯，及《茂陵书》象郡治临尘之说，知汉象郡应有《汉志》郁林郡西半部及牂柯郡部分地。其南界和西界北段当和《汉志》郁林郡同，与合浦、交趾、牂柯三郡为邻；西界北段当包有《汉志》牂柯郡毋敛县在内，该县位于郁林郡广郁县以东北，是牂柯郡唯一可能原属象郡之地。象郡北界即毋敛县之北境，东界无确证，要当沿今广西大明山—都阳山一线。此线东西各向成一地理单元，以东为桂中岩溶丘陵与平原，适足以自成一郡，郁林郡治布山即位于其中（今桂平县）；以西为桂西山地与郁江流域平原，即为象郡领域，象郡治临尘即在郁江支流左江岸边（今崇左县）。

马伯乐氏未指出秦汉象郡之区别，其实秦象郡之领域比汉象郡要大。北面应有《汉志》武陵郡镡城县，东南或有合浦郡之西部地，如下图所示。



武帝元鼎六年——昭帝元凤五年象郡领域示意图

镡城属武陵乃武帝元鼎六年以后之事。武帝平南越后，即调整与故南越地相邻诸郡之南界：以故属秦南海郡之曲江、含洫、浚阳、阳山四县地北属桂阳郡（四县地在阳山、横浦两关以南，两关原为南越与桂阳郡亦即

秦南海与长沙郡之界);以故属秦桂林郡之始安县地北属零陵郡(始安地在灵渠以南,史禄通灵渠前不属秦所有),以故属秦象郡之谭城县北属武陵郡;复以故属汉桂阳郡之谢沐、冯乘县地南属苍梧郡^[25](以上所列县名皆据《汉志》为说,除谭城县外,元鼎间未必均已出现)。合浦郡为武帝新置,该郡必分自故秦三郡,故推测其西部或原属象郡,其东部或原属桂林。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原题《象郡考》;
收入氏著《学腊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注 释

- [1] 见其所著 *La commandie de Siang* (《象郡》),冯承钧译:《秦汉象郡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第四编》。
- [2] *La premiere coquette chinoise des pays annamites* (《中国对安南的最初统治》),冯承钧译:《秦代初平南越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译丛第九编》,本章对此文之引语皆据冯译本。
- [3] 《秦四十郡辨》潜研堂文集卷十六。
- [4] 《汉志》日南郡补注。
- [5] 严耕望:《汉书地理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载《中央研究院院刊》第1辑(1954年)(台湾)。
- [6] 《后汉书·南蛮传》。
- [7] 参见周振鹤《西汉诸侯王国封域变迁考》有关章节。
- [8] 《山海经古今篇目考》,《经训堂丛书》所收。
- [9] 于《汉志》白水系广汉郡甸氏道下,注曰:“白水出徼外……”,广汉高帝置,秦为蜀郡地。
- [10] 不过汉人似亦未穷豚水之源,至三国时期方知豚水之上源存水(今北盘江上源革香河)。
- [11] 南盘江上游《汉志》另以桥水当之,这里已无法详述。
- [12] 此处温水尚可有其他两种解释:1.“温”为“豚”之误;2.温水与《汉志》温水同,指南盘江,但南盘江源不在夜郎,此一说有困难。
- [13] 戴震区别《水经注》经注文的原则为:“……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必重举其名以更端。”依此原则郁水前已见,后文亦不当有复入于郁之语。
- [14] 陈澧《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即持此观点。
- [15] 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有此说。

- [16] 参见前引周文第十章。
- [17] 主张象郡日南说者,皆以为象郡北界必在汉交趾郡以北,并非认为象郡完全等于日南郡,否则象郡领域毋乃太小,而且与桂林郡不相连。因此,蜀王子所取只能假设为象郡,而不是未有郡县时之交趾。若承认蜀王子所取为未有郡县时之交趾,等于承认象郡未至交趾地,日南说将不攻自破。
- [18] 见《温水注》所引范泰《古今善言》。
- [19] 蒋廷瑜:《从考古发现探讨历史上的西瓯》,见《百越民族史论文集》。
- [20] 《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见《论巴蜀文化》一书。
- [21] 见《秦汉两代にむける中国南境の問題》,载《史学杂志》59编11号(1950年)。
- [22] 顾颉刚、谭其骧:《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载《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 [23] 见陈梦家:《河西四郡的设置年代》,载《汉简缀述》一书,并参见前引周文第三章。
- [24] 《历史大辞典》条目之一:“十七初郡”,见《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0年第9—10期。
- [25] 参见前引文第十章并长沙马王堆出土古地图。

参 考 论 著

1. 马伯乐著、冯承钧译:《秦汉象郡考》,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
2. 谭其骧:《秦郡新考》,《浙江学报》1948年第1期;收入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另见氏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钱林书:《战国时期魏国置郡考》,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五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 陈伟:《晋南阳考》,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八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李晓杰:《战国时期赵国疆域变迁考》,唐晓峰主编《九州》第三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葛剑雄

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 迁移及其文化意义

自西晋末年永嘉丧乱起,北方汉族士人大批南迁,由于自然与社会诸方面因素的制约,一部分汉人迁往远离中原战场、长期保持相对安定、农业生产条件良好的河西走廊。本文梳理了自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至十六国时期,中原、北方汉族士人向河西地区迁徙的史实,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河西地区的文化成就。文章指出,北魏统一后,东迁的河西移民及其后裔与中原学者的结合,使传统的汉族文化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还呈现出新的特色。这种文化影响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因此,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葛剑雄,1945年生,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人口与移民史。

西晋末年永嘉乱起,北方汉族士人大批南迁,但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因素的制约,一部分汉人迁入河西走廊。这是因为河西走廊远离中原战场,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的安定,还由于当地的地理条件有利于农业开发,所产粮食足以养活大批移民人口。尽管其数量无法与南迁的规模相比,但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并不在南迁移民之下,而对北朝以至隋唐文明的影响显然更大于南迁移民。关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论稿》一书中已有论述。惟陈先生所论侧重于制度文明,并非研究移民,其他论著对永嘉乱后的移民也往往只注重南迁,对西迁语焉不详。本文意在以移民史实为基础,阐发其文化意义。

—

西晋永宁元年(301年),张轨“以时方多难,阴图据河西”,主动要求去凉州任职。当时凉州正值“鲜卑反叛,寇盗纵横”,一般人视为畏途,加上有公卿们的推荐,张轨即被任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1]

张轨祖籍安定乌氏(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家世孝廉”，应属当地望族；但至迟至其父亲一代已内迁，因而本人曾隐居于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女儿山。可见张轨选择河西作为自己避乱与创建“霸者”之业的基地，除了考虑到了天时和地利的条件外，也充分意识到了本家族在故乡的渊源这一人和因素。果然，张轨到官后就平定了鲜卑的反叛，“斩首万余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据记载，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掾虞夜观星象，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除去其迷信的外衣，我们可以肯定，由于张轨到任后的举措，河西这一传统的避乱地已更安全可靠，在当时中原人的心目中是首选之地。尽管史料中已找不到具体记载，但从张轨能很快取得军事胜利这一点看，必定有为数不少的人员、包括将士随他赴任。如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王横任职张轨属下，后定居于姑臧。^[2]自东汉后期、三国以来，有不少凉、秦家族像张氏一样侨居内地，如安定皇甫氏^[3]、北地傅氏^[4]、陇西李氏^[5]、天水阎氏^[6]、敦煌索氏^[7]、金城鞠氏^[8]等，我们推测，这些西北籍侨民可能成为张轨西迁时的招募对象。

在永宁元年之前，关中和秦陇曾有匈奴郝度元、氐帅齐万年等为首的羌、氐、卢水胡各族的武力反抗和晋朝的镇压，也经历过严重的天灾，而河

西虽有鲜卑的反叛,仍相对安定,必定会有部分流民迁人。另有一些中原人因特殊原因迁人,如北魏时宦官赵黑称其五世祖术河内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晋末为平远将军、西夷校尉,因居酒泉安弥县”^[9]。都水使者程良是广平曲安(今河北曲周县东北)人,因罪被流凉州,子孙就此定居。^[10]不过此类人数量很少。

永光(305—306年)时,张轨击破鲜卑若罗拔能,俘10万余口。俘虏的数量可能有夸大,而且所谓“鲜卑”中实际上必定有不少被掳掠或自愿投奔的汉人,所以就有大批鲜卑人和汉人就此起居于河西。在西晋覆灭之际,凉州是唯一能给洛阳实际支援的地方实力集团,这也是一些中原人以凉州为迁移目标的原因。永嘉五年(311年)洛阳陷落,“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为此张轨划出武威郡部分辖地置武兴郡,用以安置移民,可见数量之多。不过从当时的军事形势和地理条件分析,这批中州难民主要来自洛阳西北及关中。如江琼虽是陈留济阳人,但当时任冯翊太守(治今陕西大荔县),“永嘉大乱,琼弃官西投张轨”^[11]。武功(今陕西扶风县东南)人苏湛的先人,“晋乱,避地河右”^[12]。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裴佗的先人“因晋乱避地凉州”^[13];闻喜裴氏的另一支、晋冀州刺史裴徽的后人,“遇中朝乱,子孙没凉州”^[14];还有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王士良的先人^[15],河南洛阳人赵肃的先人^[16]等;估计都在这阶段西迁。

永嘉六年,其子张寔在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市西)一带平息了麴儒等的反抗,将其骨干部众六百余家迁走,估计是安置在张轨所治的姑臧(今甘肃武威市)附近。

《晋书·张轨传》载张寔(314—320年在位)时有京兆(治今陕西西安市西北,辖境约相当渭河以南关中盆地东部)人刘弘“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燃)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感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而张寔帐下阎沙、牙门赵仰都是刘弘同乡。刘弘势力之盛使他动了取代张寔的念头,虽事泄被杀,但阎沙等却杀了张寔。其弟张茂继位后,“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这一事变证实,在凉州的关中移民数量颇多,并且在张氏政权中已有很大影响。从刘弘已拥有众多徒众,阎沙等已位居张寔左右看,他们应是随张轨西迁或稍后就迁至凉州的。

从建兴元年(313年)愍帝在长安继位到前赵主刘曜平息关中和陇上的巴、氏、羌、羯的反抗,“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应了永嘉年间在长安流

传的一首民谣：“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东晋太兴三年（320年），自立为晋王的司马保（南阳王模世子）病死。由于司马保一度据有整个秦州^[17]，部众尚多，有万余人散奔凉州。如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东南）人崔彤“随晋南阳王保避地陇右”，子孙遂居凉州。^[18]《北齐书》卷十八《司马子如传》：“八世祖模，晋司空、南阳王。模世子保，晋乱出奔凉州，因家焉。……其自序云尔。”司马子如为司马模八世孙并不可信，但迁入凉州的司马保万余部众中也有司马氏家族成员，是完全可能的。

张骏在位时（324—346年），分凉州西部三郡置沙州，东部六郡置河州，又以戊己校尉地（今新疆吐鲁番东南一带）置高昌郡。这固然是前凉为自立而采取的扩充建置措施，但从前凉常能出动数万兵力看，这也是人口增加、开发范围扩大的结果。

从可考的迁往河西的中原移民看，其中虽不乏出于世家大族者，但本人的地位和声望都不高，既没有高官显贵，也未见一流人物，移民的层次并不高。这是因为永嘉乱起时，江东已成为晋朝遗臣希望所在，洛阳一带的官员士人大多选择南迁了。其次是由于关中经多年战乱和天灾已相当残破，长安虽作了几年西晋名义上的首都，实际人口少得可怜，文武官员也没有几个，以后又被刘曜迁走一批，能迁往河西的上层人物自然几乎为零了。

这一现象与以后河西经济文化的发达、人力的丰富似乎矛盾，其实并非如此。前面已经提到，包括张氏在内，有相当多一批凉州家族自东汉以后一直有成员在朝任职，或者已迁至内地，在两晋之际，已先后迁回凉州。这些人实际是移民，但由于他们一直使用原籍，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都是凉州土著的错觉。在发生京兆人刘弘、阎沙等企图取代张氏并杀害张寔的事件后，由中原回归的凉州籍人士更成为张氏的统治基础。同时迁入凉州的中下层移民数量不少，在可垦地充足、社会保持安定的条件下，当地会有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人口迅速增加。

二

东晋太元元年（376年，前秦建元十二年），前凉灭于苻坚，凉主张天锡被迁至长安。淝水之战时，张天锡在阵前投奔东晋，迁至建康。苻坚又将凉州豪右 7000 余户迁至关中^[19]，这些人口中既有河西土著，也有西迁

移民的后裔。如河东闻喜裴氏的一支(裴佗先人)在此时“东归桑梓,因居解县(今山西临猗县西南)焉”^[20];另一支(裴叔业先人),据《南齐书》卷五十一《裴叔业传》称“仕于张氏”,“义熙末还南”,显然也是先由苻坚迁至关中,然后随从关中撤退的晋军南迁的。武威姑臧人阴袭,义熙末随刘裕南迁^[21];刘裕占据关中的时间极短,作为凉州大族的阴氏显然也是由苻坚迁至关中的。但苻坚东迁的对象主要是张氏宗族和豪右,所以中原移民的后裔并没有全部迁离河西。

苻坚建元(365—385年)末,曾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今甘肃敦煌市西南),同时被迁的还有“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7000余户。^[22]前秦于建元十五年(379年)攻占襄阳^[23]，“江汉之人万余户”应即此次所俘获。这两批人都属惩罚性移民,必定受到强制措施的控制,所以到西凉李(玄盛)建初元年(405年)时还都居留于敦煌。此前的后凉龙飞三年(398年)发生内乱时^[24],武威、张掖及其以东有数千户逃亡至敦煌和晋昌(治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在敦煌一带居住的移民多达23000余户、10万余人。当年李由敦煌东迁酒泉,将这些移民重新安置,以其中5000户南方(江汉)人置为会稽郡,5000户中原人置为广夏郡(均在今甘肃安西县一带),其余13000余户分别安置在新设的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在今甘肃敦煌市南一带)。北凉时还置有会稽县,阚骃之父阚政曾任会稽令。^[25]据《隋书·地理志》,这个会稽郡到北魏时还存在,至少辖有会稽、新乡、延兴三县;至北周时郡废,三县并为会稽县;隋开皇年间改为玉门县。会稽郡、县的名称延续了近二百年,似乎证明了这批南方移民后裔的长期存在。

不过,这批移民的层次显然不高,至今尚未发现有事迹可考的人物见于记载。

三

前秦建元十八年(381年),苻坚遣吕光“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盛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以陇西董方、冯翊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颖为四府佐将。”^[26]吕光平定西域东归时,苻坚已在淝水战败,吕光留在姑臧,于386年(东晋太元十一年)建后凉。

吕光是略阳氐人,但其父吕婆楼已内迁,本人生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长期生活在关中,汉化程度很高。吕光的部属中自然有不少氐人、

羌人和其他非汉族人。如姜飞、彭晃、杜进、康盛四位将军都未称籍贯，而四位佐将却分别冠以陇西、冯翊、武威、弘农，很可能前者并非汉人，康盛更可能是中亚康国人后裔。但随吕光西征的7万多人中多数是汉人，这些人因前秦的覆灭和后凉的建立而留在河西，无疑可视为中原汉人又一次规模不小的迁移。这些人在河西定居后，关中尚战乱未息，他们的家属有可能来河西投奔^[27]；还有些人因避战乱而迁至较安定的河西，如苻坚南安太守（治今甘肃陇西县东南）、河内温县人常珍“因世乱遂居凉州”^[28]；因此移民人数还可能增加。

401年（东晋隆安五年）吕隆继位，国势衰弱，后秦兵临姑臧城下，城内“东人多谋外叛”^[29]。所谓“东人”，应该就是二十年来由关中等地迁来的移民。他们迁入时间不长，尚未与土著（包括早期移民的后裔）融合，在建都关中的后秦军队逼近时，自然希望能趁机返回故乡。以后在北凉沮渠蒙逊的围攻下，“姑臧谷价踊贵，斗直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余万口”。在回乡无望和饥饿的威胁下，百姓出城投奔北凉军队为奴婢的“日有数百”。吕隆怕动摇人心，下令以活埋来制止，“于是积尸盈于衢路”。403年（东晋元兴二年）吕隆无法自存，在后秦军保护下东迁长安，后凉亡。随吕隆东迁的有文武大臣和1万户百姓，此前还有大臣50余家至长安为人质。

至此，自吕光以来迁至河西的人口，无论是汉人还是氏、羌，或死或迁，遗留下来的已经极少。三年后南凉主秃发傉檀接收姑臧时称“吾得凉州三千余家”，说明城中人口不过3000户，1万多人。原凉州别驾宗敞向他列举当地人物时提到的是：“段懿、孟祎，武威之宿望；辛晃、彭敏，秦陇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30]其中段氏、孟氏是土著，辛、彭二氏迁自秦陇，裴氏显然即两晋间迁人的河东闻喜裴氏之后，马氏可能出于扶风。前凉主张氏宗族在国亡时东迁长安，但苻坚败后，张天锡之子大豫逃回河西，大豫虽被吕光所杀，张氏后裔尚存，张昶当为其中之一。张穆等籍贯不详，土著的可能性较大。可见中原移民后裔不多，并且都是早期迁人的。但三十多年后北魏灭北凉时，姑臧迁出的人口有3万户之多，证明在此期间不仅有大批河西旧人自关中迁回，还可能迁入了新的移民。

地处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昌，自西汉以来一直有汉人居住。前凉、后凉和北凉都置为郡，派遣了太守。吕光遣其子吕覆镇守高昌（今新疆吐

鲁番市东南)，“命大臣子弟随之”^[31]，其中也必定有一部分汉人。由于不断有中原人迁入，所以《魏书》卷一〇一《高昌传》称：高昌“国有八城，皆有华人”。421年北凉灭西凉时，晋昌冥安(今甘肃安西县东南)人唐和、唐契兄弟与外甥李宝避难于伊吾(今新疆哈密市西北)，“招集民众二千余家，臣于蠕蠕(柔然)”^[32]；这万余人主要是汉人。二十年后，“为蠕蠕所逼，遂拥部落至于高昌”。唐和所拥“部落”，看来已不全是汉人，以后也没有都在高昌定居，但因此而有一批汉人迁入了高昌。

北魏太武帝时，汉人阚爽自立为高昌太守。魏太延五年(429年)北凉主沮渠牧犍降魏后，其弟无讳在酒泉继续抵抗，战败后于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占有鄯善(今新疆若羌县一带)，不久又袭取高昌。^[33]这次西迁虽是以卢水胡人为首，但汉人仍是其中多数。至魏和平元年(460年)柔然人吞并高昌后，先后被立为王的有阚氏、敦煌张氏、马氏、金城榆中(今甘肃榆中县西北)麴氏等，麴氏并成为世袭的高昌王，可见汉人在当地一直占主要地位。

汉人对高昌的迁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对河西走廊移民的延伸，迁入高昌的汉人中绝大部分是从河西出发的。但高昌毕竟不同于河西，一方面原来缺乏汉文化的基础，另一方面非汉族人口仍占相当大的比例，汉文化的传播还处于初期。加上当地发展农业文明的条件有限，与河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四

北魏太延五年(439年)，魏军兵临姑臧(今甘肃武威市)城下，北凉主沮渠牧犍出降，北凉亡，当地3万余户被迁至京师。^[34]但这10余万人并不是都被安置在平城一带，其中有些人以后又转迁外地，如辛绍先内迁后定居于晋阳^[35]；刘哂的三个儿子迁至平城后，又被分配至各州，编为城民，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年)和正光三年(522年)才因有大臣请求，后人得以免除城民身份。^[36]这说明相当一部分人迁至平城后，又被强制分配至各地，世代服役，不得随意迁移，境遇是相当悲惨的。就连一些著名学者的生活也都相当贫困，如张湛“家贫不粒”，常靠崔浩接济。阚骃“家甚贫弊，不免饥寒”，偏偏他食量很大，“一饭至三升乃饱”，日子可想而知。主动归降的人员就受到较好待遇，如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县东南)人胡

叟,因在北凉灭前一年多就投奔北魏,“朝廷以其识机,拜虎威将军,赐爵始复男,家于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此非一般移民可比。即使如此,胡叟也过着“蓬室草筵”的日子。^[37]对移民家庭,太武帝曾允许“诸年七十以上听留本乡,一子抚养”,如刘哂得以在一年多后由姑臧返回敦煌,并有一子留在乡里;但迁移对象中年满七十者有限,能享受这一待遇的人极少。当然,凉主降时姑臧城内户口有20余万,魏军“分略诸郡,杂人降者亦数十万”^[38],迁移的并不是凉州的全部人口。武功人苏湛的先人在西晋末年迁至凉州,在此时还乡里^[39],估计他没有被列为迁移对象。

自从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开始就有不少中原人迁往河西,在以后的长期战乱中河西地区一般都能避免战火,在关中发生战乱如前秦、后秦、夏灭亡时又不断有人迁往河西,因而聚集了大批文人学者,至此基本东迁。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东迁学者中著名的有:

敦煌人索敞,本是刘哂助教,“专心经籍,尽能传之业”,至平城后任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受业于敞”;任教十余年。著有《丧服要纪》、《名字论》等。^[40]

闾駟也是敦煌土著,“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注王朗《易传》,学者藉以通经。撰《十三州志》,行于世。(沮渠)蒙逊甚重之,常侍左右,访以政治损益。拜秘书考课郎中,给文吏三十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沮渠)牧犍待之称重,拜大行,迁尚书”。入魏后,被任为乐平王丕的从事中郎,随他镇守姑臧,乐平王死后才回平城。^[41]

敦煌人张湛“弱冠知名凉土,好学能属文”,曾任北凉黄门侍郎、兵部尚书;迁入平城后,常与崔浩讨论《易》经,备受重视。

宋繇也是敦煌人,年轻时就随妹夫张彦至酒泉求学,“闭室诵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靡不览综”。沮渠蒙逊灭西凉时,见他室内有数千卷书,此外只有盐米数十斛,曾感叹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从此受到蒙逊及其子牧犍的重用。宋繇随沮渠牧犍迁平城,子孙均在平城和北魏各地任职。^[42]

姑臧人阴仲达以文学知名,东迁代郡后,由司徒崔浩提名,参与修国史,任秘书著作郎。^[43]

段晖、段承根,姑臧人,北凉末投奔吐谷浑,后投北魏。段承根被太武

帝当作上宾。经崔浩推荐为著作郎，参与修国史。后因被人告发企图南逃被杀。^[44]

金城(治今甘肃兰州市西北)人赵柔“少以德行才学知名河右”，内迁后，“高宗践祚，拜为著作郎”，后出任河内太守，曾为源贺的《祗洹精舍图偈》作注解，受到高僧的赞赏。^[45]

金城人宗钦，曾任北凉中书郎、世子洗马，著有《蒙逊记》十卷。入魏后封鹰扬将军，拜著作郎，有文章流行于世。其弟宗舒也内迁，封为威远将军。^[46]

祖籍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的移民后裔常爽，“笃志好学，博闻强识，明习纬候，《五经》百家多所研综”。当时“戎车屡驾，征伐为事，贵游子弟未遑学术”。常爽迁至平城后，“置馆温水之右，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学生中有官至尚书左仆射的元赞、平原太守司马真安、著作郎程灵虬等多人。他讲学二十余年，还著有《六经略注》。^[47]

江强祖籍陈留，迁居凉州已数代，东迁后，献出经、史、诸子千余卷及书法，被任为中书博士。^[48]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中除常爽、江强外，都是凉州土著。就是常爽，也已是第三代移民，主要是在凉州接受的教育。这与东汉时凉州的知名学者几乎都侨居内地，或在内地受教育，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证明凉州的文化水准非但已不低于内地，在不少方面已在饱经战乱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之上。这次迁移实际上使永嘉之乱后被分为东西两支的北方传统文化汇合，此后又超越南方文化，成为隋统一后全国的主流。

陈留江氏家族对文字学的研究，是这次文化迁移、保存、传播、融合和发展的典型事例。延昌三年(514)江强之孙江式上表称：

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从父兄应元皆受学于卫觐，古篆之法，《苍雅》、《方言》、《说文》之谊，当时并收善誉。而祖遇洛阳之乱，避地河西，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内附，臣亡祖文威杖策归国，奉献五世传掌之书、古篆八体之法，时蒙褒录，叙列于儒林，官班文省，家号世业。臣藉六世之资，奉遵祖考之训，切慕古人之轨，企践儒门之辙，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及孔氏《尚书》、《五经音注》、《籍篇》、《尔雅》、《三苍》、《凡将》、《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苍》、《广雅》、《古今字诂》、《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以类编联，文无复重，

统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隶诸体，咸使班于篆下，各有区别。训诂假借之谊，随文而解；音读楚、夏之声，逐字而注；其所不知，则阙如也。冀省百氏之观而同文字之域。^[49]

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依靠中原和河西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汇集了传世文献的精华，历经战乱而得以延续，最终在移民东归，文化合流后完成。

河西走廊地处中原与西域的孔道，在西晋末至十六国的战乱中，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不时中断，但河西却与西域交通不绝，成为西域文化向东传播的中介。《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称：“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可见这次移民也是佛教进一步东传的一件大事。

又如北方一些乐工避居河西，以后吕光又从西域带回大批乐师和乐器，形成发达的音乐。这批乐工的继承者都被迁至平城，成为北魏宫廷乐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为北朝和隋朝所继承。^[50]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迁长安城工巧2000家于京师^[51]，其中包括了关中历年汇集的工匠人，这些人中既有来自西域和河西的艺人，也有受到西域技艺和风格影响的汉族匠人，这对平城以至以后洛阳城的手工业和建筑的发展无疑具有重大作用。著名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和《洛阳伽蓝记》中所描述的辉煌的寺院建筑和艺术，显然离不开这类移民的贡献。

河西移民及其后裔与中原学者的结合，使传统的汉族文化不仅得到恢复，并且呈现了新的特色。由于平城的人口大部分迁入洛阳，洛阳的文化风貌就充分反映了北朝文化发展的成果。洛阳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远远超过了南朝的建康。永安二年(529年，南朝梁中大通元年)，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元颢归洛阳，失败后只身逃归南方。当时北魏国力大衰，洛阳在经历河阴之变后也远非全盛时代可比，但陈庆之回国后却发表了一段惊人的见解：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52]

洛阳的文化水准当然是整个北朝的反映,但河西移民及其后裔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其影响还延续到隋唐时期。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支移民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空前的。

(原载《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究会论文集》,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收入氏著《葛剑雄自选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注 释

- [1] 《晋书》卷八十六《张轨传》。以下据本传者不再一一注明。
- [2] 《魏书》卷九十三《恩幸传·王叡》：“自云太原晋阳人也。六世祖横，张轨参军。晋乱，子孙因居于武威姑臧。”王氏出太原晋阳并任张轨参军未必可信，但随张轨迁凉州当无可疑。退一步说，这一事例也有其代表性。
- [3] 《晋书》卷五十一《皇甫谧传》。
- [4] 《晋书》卷四十七《傅玄传》。
- [5] 《晋书》卷六十《李含传》。
- [6] 《晋书》卷六十《阎鼎传》。
- [7] 《晋书》卷八十《索靖传》。
- [8] 《晋书》卷八十九《忠义传·鞠允》。
- [9] 《魏书》卷九十四《阉官传·赵黑》。
- [10] 《魏书》卷六十《程骏传》。
- [11] 《魏书》卷九十一《术艺传·江式》。
- [12] 《魏书》卷四十五《苏湛传》。
- [13] 《魏书》卷八十八《良吏传·裴佗》。
- [14] 《南齐书》卷五十一《裴叔业传》。
- [15] 《周书》卷三十六《王士良传》。
- [16] 《周书》卷三十七《赵肃传》。
- [17] 《晋书》卷三十七《宗室传·南阳王模子保》。
- [18] 《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
- [19]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
- [20] 《魏书》卷八十八《良吏传·裴佗》。
- [21] 《梁书》卷四十六《阴子春传》。
- [22] 《晋书》卷八十七《李玄盛传》。
- [23] 《晋书》卷一百一十三《苻坚载记》。

- [24] 《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载记》。
- [25] 《魏书》卷五十二《阚骃传》。
- [26] 《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载记》。
- [27] 如《吕光载记》载光平定河西后，其甥石聪“至自关中”。《晋书》卷一百二十《吕纂载记》：吕光庶长子吕纂，“及坚乱，西奔上邽，转至姑臧”，则也是此时至自关中。其他人家属由关中等地来奔也在情理之中。
- [28]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常爽》。
- [29] 《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隆载记》。以下同。
- [30] 《晋书》卷一百二十六《秃发傉檀载记》。
- [31] 《晋书》卷一百二十二《吕光载记》。
- [32] 《魏书》卷四十三《唐和传》，卷三十九《李宝传》。
- [33] 《魏书》卷九十九《沮渠蒙逊传》，卷一〇一《高昌传》。以下同。
- [34] 《魏书》卷四《世祖纪》上。
- [35] 《魏书》卷四十五《辛绍先传》。
- [36] 《魏书》卷五十二《刘昺传》。以下同。
- [37] 《魏书》卷五十二诸人本传。
- [38] 《魏书》卷四《世祖纪》上。
- [39] 《魏书》卷四十五《苏湛传》。
- [40] 《魏书》卷五十二《索敞传》。
- [41] 《魏书》卷五十二《阚骃传》。
- [42] 《魏书》卷五十二《宋繇传》。
- [43] 《魏书》卷五十二《阴仲达传》。
- [44] 《魏书》卷五十二《段承根传》。
- [45] 《魏书》卷五十二《赵柔传》。
- [46] 《魏书》卷五十二《宗钦传》。
- [47] 《魏书》卷八十四《儒林传·常爽》。
- [48]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纪》五。
- [49]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三《宋纪》五元嘉十六年注。
- [50] 《隋书》卷十三至卷十五《音乐志》。
- [51] 《魏书》卷四《世祖纪》上。
- [52] 《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洛阳伽蓝记校注》，1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参 考 论 著



1. 陈寅恪:《晋代人口的流动及其影响》,载《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
2. 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人口迁徙》,载氏著《长水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
3. 马汝珩等:《康乾时期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2期。
4. 吴松弟:《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和南方汉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 曹树基:《赣、闽、粤三省毗邻地区的社会变动和客家形成》,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王北辰

古代居延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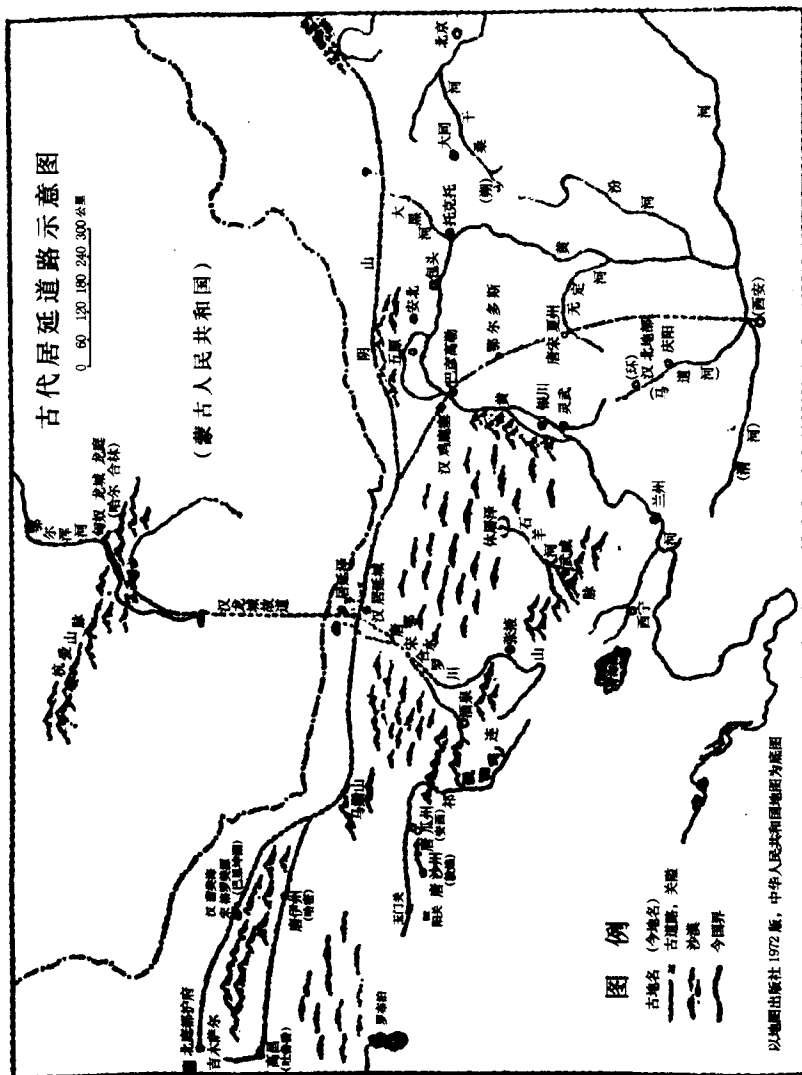
居延是匈奴地名的汉译,指今内蒙古西部额济纳族境内弱水游的居延绿洲。本文所称的居延道路大致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和沙漠,趋向天山南北麓,是连接北方辽河流域、河套平原与西域地区的重要交通线。由于该线路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地理位置偏远,历代记载与研究较为薄弱。本文作者通过全面整理居延道路沿线的历史资料,对这一交通线上发生的重大战役的行军、商贸与通使往来路线等详细考证,解决了与居延道路有关的一些历史地理问题。

王北辰(1921—1996),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生前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北方干旱区和半干旱区的历史地理研究。

在我国广阔的领土上,东部面海平原与西部内陆地区之间,自古就有经济、文化、政治的联系,长期以来各地区结成了一个整体。东西各地各族人民在长期友好往来中,逐步发现、开辟了几条便捷的交通大道。在几条道路中,联系着古代中原与西域的常用干线有两条:一是从关中平原沿渭河河谷向西北,经过现在的兰州,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出古玉门关或古阳关去西域的“阳关路”;一是经过兰州后转向湟水河谷,经过今西宁青海湖北岸,穿过柴达木盆地去西域的“青海西宁路”。^[1]关于这两条大道,自汉通西域而后,不但史书记载较多,且有不少古代的旅行记流传至今。其中,早期取阳关路西行的有晋代沙门法显,他写下了《佛国记》;稍晚,记叙了“青海西宁路”沿线风土的有北魏人宋云与沙门惠生的行记,通称为“宋云行记”,收在《洛阳伽蓝记》中;再晚些的则有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等。这些都是我国和世界上珍贵的地理古籍,已有不少专家对它们进行过研究。由于资料较为丰富,所以有关这两条路的历史地理情况也较为清楚。

在上述两条路以外,东西方之间当然还有其他的交通道路。以南方长江流域与西域间的交通而论,其起源虽必甚早,但直到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史书上才有了记载^[2],其路线自西而东大致是:由西域进入柴达木盆地,循盆地的南沿,经现在的松潘地区,南下四川盆地,再沿长江东行,趋赴南朝的首都建康(今南京)。^[3]以北方的辽河流域或河套平原与西域间的交通而论,文献记载也出现得较晚,河套平原是从公元前2世纪,辽西是从公元10世纪开始的。其路线大致是:从阴山山脉南北两麓向西,穿过戈壁、沙漠,趋向天山南北麓。这条路在沙漠里要经过居延绿洲(今内蒙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故在本文中名之为“居延道路”。

上述几条道路比较起来,居延道路在古代离经济、政治中心地区既远,地理条件也较差,因而它被利用的程度远不及阳关等路。对于它,不但史书记载很少,旅行者也极少留下记录,这就使得居延路的历史情况,远不及阳关路那样为后世所了解。整理一下有关居延道路的历史地理资料,对于进一步研究沿线各地区的历史、历史地理以及考古等都会是有益的。本文就是对这个问题所作的一个初步探讨。



我国内蒙古高原西部地区,地理上也称作阿拉善高原,这片地方东界贺兰山,西界北山(马鬃山),南边是河西走廊,向北则展延到中蒙边界。阿拉善高原自地质时期以来就是一片干燥的荒原,沙漠与戈壁相间,古籍中泛称之为“大幕(漠)”、“瀚海”、“流沙”等等。据《史记》、《汉书》所记,早在公元前若干世纪,这片荒原的四周已有不同的民族从事于农耕、畜牧、狩猎等各式生产活动。东面的阴山两麓有林胡、楼烦等部;南面的祁连山北麓有月氏族;西面天山的北麓有乌孙族,南麓则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城郭诸国”;大漠北方直到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活跃着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匈奴族。从史书记载看,各族之间夙有交往,然而史前时期的交通路线到底经过哪些地点?却没有记载。

本世纪以来,中外考古、地理学者们,在我国西北部的考察中得到了若干有关这方面的证据和线索,颇有学术价值。在内蒙古西部的考古调查发现,东起阴山,中经居延绿洲,西至天山中段,大致沿着北纬 42° 的一条地带,迤邐不断地分布有史前时代人类活动的遗址。各地点的出土器物有骨制品、陶片和细石器等。考古学者们比较、研究了各地的出土器物后指出,在这条东西二千里的地带,各地段内的出土器物各成类型,整条地带则可分为四段、四种类型:

- (1) 草原类型:主要分布在东经 140° 以东各地。
- (2) 阿拉善沙漠类型:分布在阿拉善高原地区及其北方的荒漠中。
- (3) 居延绿洲类型:分布在弱水下游居延绿洲上。
- (4) 黑戈壁类型:分布在居延绿洲以西到天山东端的喀尔力克山之间。^[4]

四个地段的四种类型间,并非截然不同,各地段的出土器物,从样式上看互有近似、共同之处,在地段毗连的过渡地方,其出土器物也具有过渡形式。这种现象表明,史前时期这条地带虽曾分属不同部族的活动范围,但各地各族之间并非孤立隔绝,而是互有交往的。各地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反映为毗连地方出土器物形式的相似。可以肯定,这条地带上的各地之间,远在史前时期必有交通路线,但交通的情况却还不得而知。

二

我国古籍对西北地区有较明确的记载,是由汉代起始的,《史记》与《汉书》中收有若干条关于居延道路的记事。西汉初期,居延道路在匈奴控制区中,随着汉对匈奴斗争的逐步胜利,居延道路才逐步归汉所有。因此,要了解这条路在当时的情况,就不能不概略地了解一下汉与匈奴在这片广阔地区内的斗争及其历史地理背景。

公元前2世纪,匈奴族渐趋统一,势力强大,匈奴贵族以漠北“龙庭”^[5]为中心向四方扩张、侵掠,向东南,乘秦末的混乱,侵入黄河以南的今鄂尔多斯地区,直接威胁到长安的安全;向西南,威慑天山南北各地各族;向南,则越过大漠,击走月氏族,夺占了现在的河西走廊。为了控制这片广大的土地,匈奴以白羊、楼烦二王部驻牧于鄂尔多斯地区;以休屠王部驻守河西走廊东段,并选在谷水(相当今石羊河)中游西岸修建了休屠城。^[6]以廋得王部驻守河西走廊东段,选在弱水(今黑河)上游修建了廋得城。^[7]浑邪王部驻守西段,以今酒泉地区为中心。对于西域,则选在位置比较适中的尉犁(今同名)设“僮仆都尉”,以控制各地并征收赋税、资财。那时位在塔里木盆地东口上的楼兰国也屈服于匈奴的暴力。

在匈奴强大的同时,汉王朝的实力也日益恢复、壮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后,凭依全国的人力、物力,开始了对西域的经营和对匈奴的斗争。

汉朝在其经营西域的战略计划中,充分考虑、利用了地理条件,这在每项重要行动中都有明显的反映。武帝即位之初,首先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在于联结月氏以夹击匈奴。遣使的另一目的又在于全面了解西域情况,作为经营西域的依据。在张骞西行尚未返回之前,武帝为了不失时机,不待张骞复命就开始了驱逐匈奴、经营西域的行动。

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汉军在卫青指挥下,自云中(今内蒙黄河西北隅的托克托)渡河进入鄂尔多斯地区,击破匈奴白羊、楼烦两王所部,驱逐了匈奴势力,收复了秦时故地,史书把收复了的地区称为“河南地”,或“新秦中”,意思是黄河以南的地方、新收复的秦时故土。汉朝修复了秦时所筑城塞,派兵戍守,建立郡县,移民实边,逐步巩固了收复的土地,解除了长安北方的威胁。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春,将军霍去病率领的骑兵兵团自陇西郡(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出发,一路向西北,打通了焉耆山(相当今乌鞘岭一带),袭击了驻守在今武威地区的匈奴休屠王部,取得了大的胜利。

当年夏季,汉军抓紧战机乘胜对河西匈奴进行了第二次攻击。这次派出的兵力较上次大为加强,一个兵团仍由霍去病指挥,另一个兵团则以合骑侯公孙敖为指挥。两军分路向河西进发,公孙敖失路未能与霍去病相配合,而霍去病兵团则再度取得了很大胜利。霍去病这次进军所选择的路线,从军事地理上看是十分卓越的,《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对此有一段较完整的记载:

去病至祁连山,捕首虏甚多。上曰:驃骑将军涉钧耆,济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武乎觶得。

这是一段有关居延道路东段(鄂尔多斯高原与居延绿洲之间)的最早史料,“居延”这个地名在此初见。以下即按史文考求一下此次进军的路途。

汉军出发地是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东部环江沿岸的庆阳县与环县之间,北地郡的西北部包括今银川平原。“钧耆”不详所在。“居延”就是今内蒙西部、额济纳旗境内弱水下游的居延海绿洲。居延是匈奴地名的汉译,含义不明。^[8]古代的居延盆地内有一片大湖,史书记作“居延泽”^[9]。居延泽周围是荒漠里的一大片绿洲,注入古居延海的弱水发源于祁连山地,它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自南而北穿过沙漠,沿岸形成了沙漠中的天然绿色通道。从地理上看,汉军既到居延,肯定是要沿着弱水南进以攻河西走廊的匈奴。

从上引史文看,汉军经过某条道路到了居延,从居延沿弱水南进,扬武于觶得城,取得了很大胜利,所以从居延到觶得之间的路线是清楚的。问题是,汉军从北地郡出发后,经过哪些地点、取哪条路奔赴居延的?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史书缺乏记载,在这里必须依据一些间接记载,再参考地理条件作出分析、推断。从军事上分析,首先要注意汉军此次出征的兵力增多了,出发地改由北地郡而不是陇西,其用意很显然是要直取居延,避免沿途的战斗消耗,以保持全部力量集中攻打河西走廊的心腹部分。因此,从北地到居延的道路必须是选择穿过没有匈奴抵抗的荒漠;而且是捷近的,不是迂远的。关于这条路,史书记载了三个地点,即居延、钧耆、北地郡,遗憾的是钧耆暂不得考。在这里待推断的就是道路的东端——

汉军从北地郡上路、出塞的地点。

从地理上看,北地郡的西北边境属于富平县,即现在的银川平原,按理这带地方应有汉军出塞的路口;但查《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以至更晚的古地书《水经注》,在富平县境内都未记有出塞的路口,这表明在前汉时期还不知道今贺兰山一带有路可以出塞。不但如此,就是在富平县以南的黄河沿岸(汉属安定郡),史书也不曾记有出塞道路,可见汉军的出塞路口只能从富平县向北、沿黄河西岸去寻求。

黄河自北地郡富平县向北流,进入了朔方郡内,河水向东转弯的地方是朔方郡麻浑县(大致相当今磴口县境)。《汉书·地理志》朔方郡麻浑县下记云:“麻浑,有道西北出鸡鹿塞。”^[10]这是西北三郡——安定、北地、朔方边境上惟一的西行路口,因此可以断定汉军就是从鸡鹿塞西去居延的。关于鸡鹿塞的确切位置及其出塞道路,长期以来不能肯定。1963年夏,侯仁之教授在内蒙乌兰布和沙漠进行历史地理考察,终于解决了这个疑问。^[11]据考察,麻浑县城址在今巴颜高勒市西北、沙金套海公社境内,蒙古名为“保尔浩特”。鸡鹿塞则是位在保尔浩特古城西北约20公里的一个山口,蒙古名是“哈隆格乃”山口,汉代的要塞石城至今还屹立在口旁的山崖上。出“哈隆格乃”山口向西,有路通居延绿洲,它一直被当地人所利用。

依据以上的论证可以复原霍去病的进军路线:大军自今甘肃境内的环江沿岸出发向西北行(古萧关就在此路上),抵达富平县(今银川平原)再沿黄河北行,在朔方郡麻浑县境出鸡鹿塞,向西北穿过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两片大沙漠,跋涉千里终达居延。目前虽还不知“钩着”是何地,但鸡鹿塞至居延之间的行军道路即是居延道路的东段则是无疑的。这条路当然不是汉军所发现、开辟的,它乃是各地牧民经过长期探查、实践而开辟的,汉军能取此路则可能是经过调查访问、并得到当地向导的指引才办到的。

汉得河西走廊后,于其地陆续设置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所谓河西四郡,驻军屯垦,移民实边,开辟了通向西域的长廊。于是,汉匈之间为了争夺河西走廊,曾进行过几次斗争,居延则是争夺的冲要地方。

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汉军通过西域远征大宛(今苏联中亚地区的费尔干纳盆地)。《史记·大宛列传》在同年记有一件事:“于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这条记事反映出,汉军远征之际,为了保

卫河西走廊不受匈奴的侵扰,乃于酒泉、张掖的北方建置了居延城和休屠城以保卫走廊的安全。司马迁的这段文字是个简略的记法,完整些说应该是建置居延城以卫酒泉,修复休屠故城以卫武威;从现代地图上看得很清楚,居延城位在弱水下游,它直接屏蔽着酒泉,而原系匈奴休屠王所驻的休屠城则位于谷水(今石羊河)中下游,它直接屏蔽的则是武威郡。居延是酒泉、张掖郡的北方门户,而休屠则是武威郡的北方门户,匈奴不论从居延或休屠南侵,显然都可以切断河西走廊,所以汉朝在此时建置居延城、修复休屠城以加强酒泉、武威的防御,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引史文虽只寥寥十五个字,但所记的事实却很值得注意,这是汉朝在居延地区建城设防的最早记录,它表明汉居延城废墟至今已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

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即居延筑城后二年,匈奴袭击了酒泉郡,且杀了汉酒泉都尉,史书虽未明记此次匈奴军来袭的路径,但《汉书·武帝纪》接着就记载了汉朝起用前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强弩都尉,驻守居延,且增筑了“遮虏障”,这就表明了匈奴袭击酒泉果然是由居延沿弱水南来的。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这样的事,足以说明居延作为南北通道口的重要性。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汉军以李陵为将,从居延塞出发北攻匈奴。李陵率步兵五千由居延出发,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东端),遇到了匈奴大单于亲率的三万多骑兵围攻,两军劳逸之情既不相同,步马之势又甚悬殊,汉军乃不得不且战且引,循“龙城故道”向居延塞退却。尽管汉军向匈奴作了壮烈的斗争,但由于寡难敌众又兼途中未得到接应,终于不幸在居延塞北方百多里的地方溃没(以里程计,约略在今中蒙边界附近)^[12]。

这里要注意的是“龙城故道”,既云故道可见是由来已久的道,它是从居延到浚稽山之间的道路,向北越过浚稽山可达匈奴的“龙城”。李陵这次出兵,雄心在于直捣单于庭,所以才取此路而北。“龙城”在今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尔合林附近,然则浚稽山的位置必在“龙城故道”上,距居延有三十日步行军路程的地方。《汉书·匈奴传》应劭注说:“浚稽山在武威塞北,匈奴常所以为障蔽。”按这些条件看,浚稽山应是今杭爱山脉东端某山,山北即是鄂尔浑河上游、匈奴龙城所在,这里即被匈奴视为“障蔽”,所以单

于亲率三万骑兵在此迎击李陵也就可以理解了。

除上述“龙城故道”外，在《汉书·李广苏建传》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同条下，还记有另一条行军路：“上〔武帝〕怒，……诏陵以九月发，出遮虏障，至东浚稽山南、龙勒水上，徘徊观虏，即亡所见，从浞野侯赵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这段史文所记的道路，大致是从居延向东，深入匈奴境内，再从“东浚稽山”向南回到阴山西段北麓基地。

两汉时期，史书中除了关于居延道上的军事记载外，也留下了和平往来的记载。《后汉书》记有和帝永元二年（90年），北单于因为汉朝友好地送还了他的弟弟，乃派遣使者到居延塞接洽，交涉从居延路入朝事宜，但被汉朝拒绝。同书还记有，北单于又一次遣使到居延塞请入朝见，并请派大使引导，汉朝这次派遣窦固率数百骑，偕同匈奴的来使出居延塞迎接。窦固等一行人出居延塞后，途中得到了匈奴内乱的消息，乃引还^[13]。这两条记事说明，居延——龙城道在战时是军事道路，在和平时期是友好往来之路。

如上述，居延绿洲位在大漠之中，形成了东西、南北交通大路的十字路口，特别是北通龙城南卫酒泉，所以汉朝对它十分重视。武帝太初元年于此筑居延城，并派都尉驻守，其后又起用老将路博德为都尉，增筑遮虏障。几度出兵北伐都以居延为基地。为了巩固、加强这个北方基地、北方门户，汉朝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命令驻军屯垦，移民实边，设置管理民政的居延县，设置管理民族事务的“属国都尉”，推行先进的耕作方法等等。对于这片绿洲的各种情况，不独史书有所记载，当地军政机构遗留下的大量简牍，更为我们了解此地区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以下各项就是居延历史地理情况的简单介绍。

居延地区的常住人口，据《后汉书·郡国志》记：“张掖、居延属国，户一千五百六十四，口四千七百三十三。”“居延属国”是汉代的一种行政机构，据刘昭注：“属国之长为属国都尉”，其职务是“主蛮夷降者”，这种机构和官制是从武帝元狩三年起设置的，设在安置外族降人的地方。居延设置“属国”，可见那里住的不仅是汉人而更多的则是匈奴及其他族降人。然则居延地区在当时是汉匈共处，其生产方式也必然是农、牧交错了。

汉时居延泽是一片大湖，它位于今索果诺尔（湖）的东南方，居延城的东北，那时的弱水下游从居延城外流过注入古居延泽。居延城虽然近湖、靠河，但其周围地区在那时就已有了沙害，“居延汉简”中有一片即记述这

里是“地热，多沙，冬大寒”。

驻守居延的汉军是从事农垦的，因为当地多沙，所以农业要依靠引水灌溉，开渠引水就是驻屯军的一项生产任务。简文中明记有“河渠卒”即开挖沟渠的兵士。简文还记有在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的一项水利工程中有1500多名兵士参加施工^[14]，可见工程的规模是相当可观的。

驻戍居延的兵士可以携带家属^[15]，家属总数虽无记载但仅以“戍田卒千五百人”为基数去加以估计，其人数也必不少。把戍田卒与有户籍的居民合计起来，后汉时期这里的总人口已达六七千人，与这么多人口相对应，其农垦的规模也必是不小的。

前汉时期，因为这里是新建的基地、农垦的农业区，大部耕地属于农垦，所以选择此地推广过先进的耕作方法“代田”法，提高了这里的粮食产量。^[16]

居延地区既有流沙之害，所以农业生产和军事工程都受到了沙的威胁，为与沙害作斗争，简文中明记兵士的任务之一是除沙。这表明，为了保护农田不受沙壅，军事工程不受沙壅，兵士们要常常从事于除沙的劳役。从这类简文可以知道，古代劳动人民在护田、防沙，同大自然作斗争方面是有着艰苦、光荣的历史的。

经过大约三个世纪的经营，东汉末年这里的人口与农垦规模都已达到了相当水平，所以在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年），汉朝乃把居延的行政机构级别提升为西海郡，与河西各郡并列。级别由县提升为郡，不仅反映出汉朝对此地的重视，更反映了此地区的发展。

东汉以降，迄于北魏，又历时300年，北魏在居延的建制仍是西海郡，行政级别不变格，反映这里的人口及生产情况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元6世纪初，北方的一部分游牧民族来投北魏，北魏朝廷专门讨论了对来归者的安置问题，凉州刺史袁翻提议说：西海郡位于酒泉的北方，是北方民族的交通要冲，又是汉朝行军的故道，其地平坦、肥美宜耕，适宜于安置来归的部落。^[17]他的建议被采纳了。袁翻是当地的高级官员，了解西海郡的情况，他的这段述评表明了居延地区在交通上的重要性不衰，地理条件仍然是宜于农、牧的。

三

居延及居延道路原在匈奴活动地区,对于初到这片地方的汉族来说,开始时是很生疏的。汉得河西与居延后,河西走廊成了东西交通的坦途,所以尽管居延道路在汉朝领土之内,通行的人仍必很少,人们对这条路仍必比较生疏;因此,有关它的记载也就零星稀罕。总之,公元6世纪以前的居延道路仍是偏僻冷落的。

公元7世纪初,唐朝统一了全国。唐代的西方疆土更逾于汉,唐和中亚、西亚的陆上交通也比汉代更盛。“丝绸之路”虽开自汉代,而其繁荣、昌盛则在唐代。“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在盛唐时期开放出了绚丽的花朵。

盛唐时期的河西走廊比往时更加兴旺,唐朝把河西各郡改名为甘、凉、肃、瓜、沙等州,其中最西端的敦煌(沙州)则是通往中亚的门户。唐代的漠北,先后有突厥、回鹘等族活动,所以唐朝对北方门户居延仍然是重视的。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凉州条下记载,当时汉代的居延故城还在,居延故城的东北仍有居延海,唐朝选在居延水(弱水下游)两汉之间设置了“宁寇军”(军事机构)以统领当地的军务,“管兵一千七百人,马五百匹”。从宁寇军向北千多里,有路通往“回鹘衙帐”,可见这里的南北通路基本与汉代相同。

在河西走廊畅通之时,居延道路并不为旅行者所重视,天宝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吐蕃贵族们乘中原战乱、唐朝无暇西顾之机,夺占了河西各州,切断了西域与长安间的联系。在河西路断的艰难时期,居延道路就成了避开河西吐蕃势力,代替河西走廊,联系西域与长安的捷径。以下两事即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唐朝在西域原设在北庭、安西两节度,前者驻今乌鲁木齐东北之吉木萨尔,后者驻今库车。河西路断后,两镇为与长安联系曾几度遣使东来,但都未得达,后来他们乃假道于北方的回鹘,穿过沙漠才到达长安^[18]。他们所假的路,当时通称为“回鹘路”^[19],须要知道,那时河西走廊各州以北的广大地区,即今北山以东的阿拉善高原,都属于回鹘范围。

吐蕃占据河西不久,敦煌唐人张义潮等聚众起义,驱逐吐蕃,首先在瓜、沙二州内恢复了唐政权。为与长安联系,他们派出军校十人,每人携

一大棒,把表文填入棒内,从瓜州向东北走,穿过大漠直到天德城才与朝廷取得了联系。^[20]张义潮起义事在宣宗统治时期,其时天德城的位置在今包头市西北方的大余太(安北)一带^[21],然则从瓜州到天德城间经过了哪些地点?对这个问题,《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条下有一段可贵的记载:“晋昌……东北有合河镇,又百二十里有百帐守捉,又东百五十里有豹文山守捉,又七里至宁寇军与甘州路合。”晋昌县城就是瓜州的治所,从晋昌有路向东北,经过合河镇(不明所在)、百帐(不明)、豹文山(不明),就抵达位于居延水两汉之间的宁寇军了。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从瓜州向东北有路通达居延地区。“守捉”是唐朝设在边防地带的第三级军事单位,沿途设有守捉,可见这条路是重要的。既然瓜州东去天德军的路要经过居延,那么从西方北庭都护府去天德军的道路岂不也可以经过居延吗?经过居延再趋天德军岂不是很合理的吗?遗憾的是,在唐代史书中尚未发现这类记载。非常可能,唐人所谓的回鹘路也就是居延道路。

四

从西汉武帝时(公元前1世纪)到宋、辽、西夏对立时期(公元10世纪)的一千多年间,史书所记有关居延道路的情况屈指可数,其中只有行军、通使的记事,没有商队往来、商品交流的迹象。推究其故,主要是居延道路沿线各地的生产水平,尚未达到商品长途交流的程度。公元10世纪,沿线各地的政治、经济地理情势发生了新变化,出现了新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居延道路上的交通也有了新的进展。

从唐会昌年间(大约公元9世纪50年代)起,漠北的回鹘各部大举南移,分别进入了河西走廊与天山南北各地,各部各自建国不相统属,其中以甘州回鹘及西州(高昌)回鹘为最强。回鹘各部既扼据交通要地,乃利用地理之便从事东西贸易,因而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东西贸易都和回鹘商人有关。

在东北的松辽平原上,先后在今牡丹江流域出现了渤海国,在辽河上游出现了契丹国。公元10世纪后,契丹日益强大,向南侵占了“燕云十六州”,向东征服了渤海与高丽等国,向西征服了阴山以西大漠中各部,建都于临潢(今辽宁西部巴林左旗林东镇附近),后改国号为辽。

宋代的东方和西北方疆土远逊于汉、唐,其中西北边的河西、灵州(今

银川平原)、夏州以北各地都被西夏所据,北方为辽所据,黄河流域陷于宋、辽、西夏对立的局面。居延道路上的交通和这种政治局面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期间,居延道路上出现了两件大事,一是981—983年间宋使团的往返,一是1122年一支辽军的远征。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西域高昌国(今吐鲁番)遣使到开封通好,宋朝派遣了以王延德为首的使团去高昌答聘,他们往返行程“三万里”,历时两年,归国时仍循旧路,还偕带来了高昌使团百多人。王延德提出了出使报告——“西州纪程”。^[22]在报告里,较详细地记载了所经各地的情况,它是居延道路上一份完整的、珍贵的旅行记。前人对它已有不少研究,兹按原文复原一下居延道路。

王延德行记是从夏州记起的。夏州乃沿用唐名,宋人乐史所编的《太平寰宇记》卷37对它有简要的介绍。宋夏州城就是公元5世纪赫连勃勃下令修筑的“统万城”,其址在今内蒙伊克昭盟乌审旗境内红柳河北岸,当地今称之为“白城子”。夏州自古就是交通要地,早在唐代从夏州向西北经过宥州(“经略军”,大致在今鄂托克旗乌兰巴拉嘎苏镇地区),就有一条重要的驿路通达天德军(今大余太,见上文)。王延德西使不经河西走廊而出夏州,是因为当时西北道路已被吐蕃隔断,河西走廊尚被回鹘所据的缘故。

《宋史》所收王延德行记原文节录如下:

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次历茅女唃子族,族临黄河,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或以橐驼牵木筏而渡。……次历楼子山,无居人,行沙碛中,以日为占,旦则背日,暮则向日,夕行望月亦如之。……次历拽利王子族,有合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之地,城基尚在。……经马鬣山望乡岭,岭上石龕有李陵题字处。次历格啰美源,西方百川所会,极望无际,鸱鹭兔雁之类甚众。……次历伊州……次历纳职城,城在大患鬼魅碛之东南,望玉门关甚近。……凡三日,至鬼谷口避风驿。……凡八日,至泽田寺。……次历地名宝庄,又历六种乃至高昌。高昌即西州也。

王(或作玉)亭镇在夏州城北不远,当时是夏州北方的防御性据点。黄羊平不明所指。在这片地方,王延德曾记说有沙,估计和现在的地理景象相

似。重要的问题是,王延德一行在何处渡过黄河的。按地理条件分析,唐代早有驿路通向天德军,此时驿馆虽废但驿路必仍存,宋人依循唐人旧路而西北行是事理之常。而且,要从黄河河套以内去西北,必须在河套西北角渡河,从地理上看这是没有疑问的。再者,他们决不可能是从银川平原、贺兰山一带渡河西去的,因为当时的政局不允许他们这样走,而且在行记中完全没有银川平原的迹象。剩下的惟一合理的推断是:使者们在黄河西北角今海勃湾——磴口之间某地渡河,渡河后即进入了“六窠沙”即今之乌兰布和沙漠。再西即越过了“楼子山”,相当今狼山的南端,楼子山隘道很可能就是汉代的鸡鹿塞道(今之哈隆格乃山口)。

越过楼子山向西,又进入了沙漠,其东部即今亚玛雷克沙漠,其西部即今巴丹吉林沙漠。在沙漠中他们步步西行,方向显然是趋赴居延的。途中经过了几个部落所住的绿洲,相当今之何地都不可考。经过沙漠长途旅行之后,遇到了一条大河即合罗川。

合罗川是沿用唐名,初唐时编辑的地理书《括地志》卷8^[23]记云:弱水又名合黎水,亦名张掖河。合黎水是少数民族称呼的汉译,音与合罗川相似。另外,在唐、宋的文牒中则都使用合罗川这个名称^[24],它就是今之弱水。晚唐以来,合罗川(弱水)沿岸直到甘州都是回鹘居住之区,唐朝又曾把公主嫁给回鹘可汗为可敦,所以在合罗川下游沿岸有唐公主所居之城是可以理解的。王延德在这里没有提到居延泽,也没有提到汉居延故城或唐宁寇军故城,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渡河点在汉、唐故城以南的关系。至于“黑城”(本世纪初,俄、瑞典、英、中各国探险队所考察过的“黑城”),乃是西夏的“威福军”城,王延德过此时尚未建置。

合罗川以西的“马鬃山”不论从名称上看或从地理上看,都指的是现在的马鬃山,这里一向是东西交通必经之地(王延德记的是山名,不是现在的公婆泉又名马鬃山镇)。

其经过的“格罗美源”,按所记是一片浩瀚的大湖。从路程看,它位于马鬃山与伊州(哈密)之间,从地理上看,这带地区内只有巴里坤湖可以相当。巴里坤湖位于博格达山脉北麓,古代匈奴名是蒲类海或婆悉海,海至博格达山之间素称沃衍,汉代从酒泉出兵击匈奴于天山即指此地,汉、唐从酒泉至此皆有行军故道,王延德一行由马鬃山至此,依循的正是汉、唐故道。从此越山而南就是伊州(哈密)。

伊州以西,循今博格达山脉南麓通往高昌的路,是众所周知的老路,

这里不再赘述。

通读王延德行记,可以看出他们所走的路,正是出古鸡鹿塞,趋居延,再趋马鬃山,经巴里坤湖至伊州,由伊州而西终抵高昌。这条穿过沙漠、大致与河西走廊平行的东西大路,本是汉唐以来的故道,也即居延道路。王延德虽是这条路上晚来的旅客,但却是第一个留下了全程旅行记的旅行家。这份报告是很珍贵的古代居延道路记录,其丰富内容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据史书所记,王延德西使是为了答聘,可见先来的是高昌使团。史书又记:王延德等“与其谢使凡百余人,复循旧路而还”。可见高昌与宋的使团已经几次往返在这条路上。还有史料表明,不独西域的使者,还有从天竺来的僧人,也是经过这条路到开封来的。^[25]经商的合罗川回鹘人当然也走此路。^[26]这些事实,证明了这时期的居延道路已经不冷僻了,已经成了东西方旅行者常用的路。

百多年后,史书又记载了一宗居延路上军队长征的事。辽代末年,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被金兵所困,辽天祚帝逃避金兵于“夹山”,皇族耶律大石见大势已去,又与天祚帝不合,乃率一支部队宵遁,另谋出路。关于耶律大石西征并建西辽国于中亚一事,中外学者多有研究,这里依据《辽史·天祚纪附大石》的史文,考求一下他的行军路线。^[27]

大石出发的地点是夹山。按《金史·地理志》,夹山在其西京路云内州柔服县境。柔服即今山西省朔县。从地形看,夹山指的是今桑干河上游、管岑山与恒山之间的盆地。

从夹山向西北急行三日所过的黑水,即今呼和浩特市南方的大黑河。大石过黑水后,在今呼和浩特平原某地,得到了一批牲畜,继续西行。

可敦城,是唐代突厥某可汗为其妃(突厥语为可敦)修筑的居城。《辽史·地理志》西京道云内州下记说:唐中受降城附近有可敦城,唐中受降城略在今包头市附近。史文说,大石“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这是误记。唐代的北庭都护府远在今新疆吉木萨尔,与此处的可敦城无关。查唐代地理书,安北都护府后期曾设在中受降城附近的可敦城,《辽史》所记与唐代所记恰合。唐安北都护府是当地最高军政机构,在当地少数民族中影响大而印象深,所以《辽史》记可敦城而兼及都护府。遗憾的是辽史编者误把安北记作了北庭。正确记法应是,“至可敦城,驻安北都护府”。其地应在今包头市附近。

大石在今包头附近聚集力量作了准备后,翌年乃振族而西,其路途当然是沿黄河北岸西行,取捷径,出古鸡鹿塞隘道,直奔居延。为了假道,先期送信给甘州回鹘王,请求假道西行,其时的居延绿洲、合罗川沿岸都在甘州回鹘区内,倘非经过居延则何须假道?既是假道也必无迂回向南进入甘州之理,所以应该肯定,大石西行也是经过合罗川下游的。自居延向西,经过今马鬃山、巴里坤湖(王延德所记的“格罗美源”),再傍天山北麓向西,有一条通向中亚的大道,这里不作介绍。大石即循此路,兵行万里,远至中亚寻思干(今撒马尔罕),终于建立了“西辽国”。大石的长征,再一次反映了此时期居延道路的情况。

五

公元11世纪至12世纪之间,黄河中下游地区处于宋、辽、西夏对立的局面,各国之间的边禁还是很严的,政治往来当然受严格控制,即使是商业往来也要受到盘剥和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辽国首都上京临潢府与西域各国特别是高昌之间却有着商业往来,其交通路的一大段也是利用居延道路。

据《辽史·食货志》记载,辽政府为了广收对外贸易之利,曾在几个地点设置过国际贸易关口,名为“互市”:对宋的设在雄州(今河北雄县),对高丽和东方各部的设在渤海(今牡丹江上游的东京城废墟),对西域各国的则设在高昌。

关于高昌以及龟兹、于阗等西域诸国对契丹的贸易情况,《契丹国志》(卷21、26)里有不少记载:高昌等国每三年到契丹来进行一次交易,他们的使团(实质是商队)每次多达400人,带来的商品有珠、玉、琥珀、犀角、乳香、皮革、细毛织品等等,契丹付给他们的代价至少也不下于40万贯钱。西域高昌等国送来的商品都是昂贵、精美、宜于长途贩运的东西,其中引人注意的是珠、犀角、琥珀、乳香等物。这几种商品都不产于西域,琥珀原产于北欧波罗的海南岸,珍珠产自波斯湾沿岸,乳香产自南阿拉伯,犀角则产自非洲。这些都是“丝绸之路”上的传统商品,经过高昌等国的居中贩卖而来到契丹。

高昌是契丹在西域的外贸中心,那么在契丹境内的外贸中心是何地?据《辽史·地理志》上京条下记:“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

营居之。”即是说，回鹘商人留居临潢者甚多，辽政府特地在南门之东划定了专区，供他们居住。所说回鹘不但包括西州回鹘（即高昌），还包括甘州等地的回鹘。这表明了上京临潢是对高昌等西域各国的贸易中心。

上述情况表明，西域与契丹临潢之间的商业交往是经常的，使团规模相当大而携来的货物也相当多。除此之外，双方当然还有政治联系，使团往来。前引的王延德“西州纪程”记有一件事，王延德在高昌期间，契丹使者也来到了高昌，契丹使臣曾在高昌王前挑拨离间宋与高昌的关系，王延德得知后，向高昌王揭露了契丹使臣的阴谋，且愤然欲杀之，高昌王固劝方止。这只是使团间斗争的一次记载。此外，契丹与高昌、甘州回鹘间的政治互访当然还有多次。据王日蔚先生统计，11、12世纪间，各地回鹘使团来临潢者多达64次，平均每三年半一次。^[28]这个统计与前引《契丹国志》的记载是基本一致的。

上述那样规模的、频频的政治与商业来往，取的是哪条道路？史文虽缺乏直接记载，但从政局和地理两个因素却可做出可靠的推断。从政局看，那样规模的来往显然不可能穿过西夏领土，史书中有记载说西夏是拒绝使者过境的，它只能选择一条不经西夏而直达的路。从地理上看，当时阴山以西直到居延地区的漫衍地区，基本是在契丹势力范围内，也即是说，自居延而东就进入了契丹势力范围，阴山以东则是契丹的直辖领土。然则高昌国使团循居延道路东来，到狼山南端（古鸡鹿塞外），不入古鸡鹿塞而转向东北，即可直趋临潢，岂不是显而易见的吗？他们既然可以循此路去宋，当然也可以循此路去临潢，道路的分歧点就在狼山南端、古鸡鹿塞（哈隆格乃山口）外。至于甘州回鹘人去临潢的道路，那当然是要从居延东行，再转东北趋向临潢。总之，西域、甘州各地回鹘与契丹首都临潢间的联系是利用居延道路进行的。公元10至20世纪间，居延道路上不但有军事交通，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了频繁的政治、经济交通；它已不是一条冷僻的道路，而是一条经常被利用的、兴旺起来的道路了。

结 束 语

我国西北部的阿拉善高原上是一片辽阔的荒漠、半荒漠，东连阴山、河套（鄂尔多斯），西接天山，北通蒙古人民共和国，南达祁连山地，而居延绿洲则略位在这片广阔干旱区的中心。在古代，东西横穿大漠、南北纵贯

大漠的古道,都交会于居延,以居延为其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街头”,以及东西、南北交通干线,在历史时期曾起过相当的作用,本文只是对它作了个初步介绍,不少问题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从当时的形势看,古代交通以役畜为工具,深受地理条件的限制,所以通过居延的南北道路曾以弱水为绿廊,直到19世纪末,俄国的探险队还是取此路进入我国甘肃、青海等地从事窥探活动。时至今日,交通手段大大前进了,这条弱水绿廊是否还有和平、友好交通的价值?在军事上是否也有防御的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居延绿洲东接阴山、河套,西连天山南北,我国东部与西部之间虽以河西走廊为坦途,但居延道路既与河西走廊平行,又直捷穿过阿拉善高原而联系着东西两大部,直到现在仍为当地群众所利用。那么,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形势下,随着东西部地区生产的空前发展,居延道路是否会发挥它的新作用,为东西交通做出新贡献?这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原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收入《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

注 释

- [1] 夏鼐:《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考古学报》,1958年1期。
- [2] 《南史》卷80:“高昌国……梁大同中遣使献鸣盐枕、蒲桃、良马、氍毹等物。”“龟兹西域之旧国也,自晋渡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胜遣使奉表贡献。”“于阗者西域之旧国也,梁天监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献方物。”
- [3] 见前引冯汉镛文。
- [4] John Maringer, *Contribution to the Prehistory of Mongolia*, Stockholm, 1950.
- [5] 据《史记》、《汉书》的《匈奴传》,匈奴的政治中心地称为“龙庭”、“单于庭”、“龙城”等,其故址,前人考证甚多,兹据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版),其故址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附近(采用地图出版社《世界地图集》的译名)。
- [6] 休屠城:据杨守敬《水经注疏》(科学出版社影印本)卷40都野泽条下,休屠城“在今武威县北六十里”,《元和郡县图志》卷40武威郡凉州,“休屠城在[姑臧]县北六十里”的记述,休屠故城应在今石羊河中游某地,确址待查。
- [7] 觿得城,《元和君县图志》卷四十甘州:“今甘州郭下张掖县,本匈奴觿得县。《西河旧事》云,此地本匈奴觿得王所居,因此名之。”《大清一统志》仅说地在张掖县

西北。确址待查。

- [8] 居延是匈奴地名。《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六年(73年)春二月,遣耿秉出居延句下,李贤注云:“本匈奴地名也,武帝因以名县。”
- [9] 《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皆记云,泽在居延城东北。关于汉居延城故址,根据中外考古学者调查,《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所附“额济纳河流域略图”标出其址在今索果诺尔南、黑城废墟东北十余公里处。中外学者们的野外考古调查证明,居延城废墟东北确有大片盐结壳地及古河床,其地当即古居延海所在。1978年夏,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的同志们和侯仁之教授等也初步调查了居延地区,《人民画报》1980年1期对此作了报道。其他还可参看:Sommarström B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 Stockholm, 1956。劳干,《居延汉简考释》卷后记,1943年重庆石印本。黄文弼,居延海考,《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松田一政,西夏の死都カラ・ホト調査の概要に就いて,《东方学报》(京都)19—20号。董正钧:《居延海》,中华书局,1952年;等等。
- [10] 又见于《汉书·匈奴传》、《水经注》卷三河水三。
- [11] 参考侯仁之、俞伟超、李宝田,“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治沙研究》,第7期,1965年。
- [12] 《汉书·李广苏建传》:“……陵于是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陵且战且引……东南循龙城故道……令军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期至遮虏障者相待……陵败处去塞百余里。”
- [13] 《后汉书·班彪附子固传》:“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单于闻汉军出,遣使款居延塞,欲修呼韩故事朝见天子,请大使。宪上,遣固行中郎将事,将数百骑与虏使俱出居延塞迎之,……固至私渠海,闻虏中乱,引还。”私渠海,不明所在。
- [14] 《居延汉简甲编》(科学出版社,1959年)释文之部页66,1950号简文:“(前略)谨案属丞始元二年戍田卒千五百人为驛马田官写泾渠迺正月己酉淮阳郡。”
- [15] 同上书,释文页65,1571号简文:“(前略)田卒淮阳郡莱商里高奉职已移家在所。”1062号简文:“卒家属在著名籍。”
- [16] 《汉书·食货志》上:“武帝末年,……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又教边郡及居延城。是后,边城、河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
- [17] 《魏书·袁翻传》:“西海郡本属凉州,今在酒泉直北,……去高车所住金山一千余里,正是北虏往来之冲要,汉家行军之旧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且可水为重戍,镇防西北。”
- [18] 《新唐书·回鹘传》:“安西、北庭自天宝末失关陇,朝贡道隔,伊西北庭节度李元忠、四镇留后节度郭昕,数遣使奉表皆不至。贞元二年(786年),元忠等所遣,

假道回鹘乃得至长安。”

- [19] 《册府元龟》卷九九四外臣部备御七：会昌三年，“赵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护府，宜出兵应援。李德裕奏曰，据地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时向西路自河西陇右出玉门关……自艰难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
- [20] 《新唐书·吐蕃传》：张义潮等，“以部校十辈皆操挺，内表其中，东北走天德城，因防御使李丕请命于朝。”
- [21] 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元和以后的天德军治所再未迁移。按《元和郡县图志》卷四丰州天德军条，天德军的相对位置是，“西至西受降城一百八十里，东南至中受降城二百里”。三受降城中的东受降城位置已基本明确。据同书同卷记，东城“在榆林县东北八里”。唐榆林县址，据内蒙古文物工作队李作智同志勘察，是准格尔旗境内的“十二连城”废墟，东受降城应在托克托附近。东受降城既定，按各城的相互位置推测，天德军旧址应在今大余太附近。是否得当，有待同志们指正。
- [22] 事见《宋史》卷三〇九《王延德传》。其行记收在《宋史·外国传》“高昌”条内。此行记还收在《挥尘前录》卷4、《文献通考》卷336“高昌传”之中。
- [23] (清)孙星衍辑本《括地志》卷8，岱南阁丛书本。
- [24] 《全唐文》卷七〇七，《李德裕代刘沔与回鹘宰相书》：“(前略)踏步合祖云，訖挖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庭、达怛等五部落(下略)。”可见合罗川是回鹘旧居之地，西通安西、北庭。《宋会要辑稿·蕃夷四·回鹘》(中华书局影印本第8册，第7714页)：“雍熙四年八月，合罗川回鹘第四次太子，遣使来贡输石。”可见合罗川回鹘与宋有交往，其交通路当必即王延德出使之路。
- [25] 《宋史·外国传·天竺》：“又有婆罗门僧永世与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师。永世自云，……其国东行经六月至大食国，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从西州(高昌)经夏州而至开封，其路显然也是高昌使团和王延德使团所走的路。
- [26] 见前注：“雍熙四年八月，合罗川回鹘……遣使来贡输石。”
- [27] 《辽史·天祚纪附大石》：“……大石不自安，……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明年二月甲午，……整旅而西。先遣书回鹘王毕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即遣使至甘州，……是与尔国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将西至大食，假道尔国，其勿致疑。……兵行万里……至寻思干。(下略)”
- [28] 王日蔚：《契丹与回鹘关系考》，《禹贡》，4卷8期。



参 考 论 著



1. 王文楚:《从内蒙古昆都仑沟几个古城址看汉至北魏时期阴山綽阳道交通》,《复旦学报增刊·历史地理》,1980年。
2. 蓝勇:《唐宋川滇、滇缅通道上的贸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
3. 王文楚:《唐代两京驿路考》,《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李孝聪

唐宋运河城市城址选择与 城市形态的研究

本文是作者在对浙东、江南、淮南运河全线、汴河遗迹以及永济渠的部分地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所做的关于上述运河沿岸部分城镇的建址条件和平面形态的研究。文章在论及各区运河城市时,首先对该段运河的功能、开凿和疏浚历史进行了梳理,然后利用文献与田野考察两方面的材料,对所列举沿岸城镇的选址与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变进行考证和论述。作者认为,唐宋运河城市的选址受到了区位与距离两种因素的影响,运河交通对周围地区的城市的吸引力导致它们向运河岸侧的城址转移。受交通和物质集散功能的刺激,唐宋运河城市在布局上最先突破封闭的市坊制度束缚,出现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城市形态。这些新型城市多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沿河商业街,其发展主要取决于商业和转输功能,其格局对明清运河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功能分区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作者还质疑了“9至13世纪是中华帝国史上的城市革命期”的观点。

李孝聪,1947年生,四川成都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与古地图的研究。

从唐朝后期开始,中国城市的市坊制度逐渐解体,官府对城镇物资交易的控制有所松弛,大批中、小城镇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城市商业职能以买卖街为表现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加强,从而使城市布局形态开始摆脱过去因受严格的等级市坊制约而呈现的整齐划一的特点。这一现象在唐、宋运河沿线的城镇中表现尤为突出,并影响了明、清时代运河城市的发展。

1984年夏季,我作为中国唐史学会组织的唐宋运河考察队的一员,曾对浙江、江苏、安徽和河南境内的浙东、江南、淮南运河全线及汴河遗迹进行了为期四十余天的实地考察;1987年又对河南、河北、山东境内的永济渠(御河)遗迹的某些地段做了实地调查。现仅就上述运河沿岸部分城镇的建址条件和平面布局形态的发展演变,分段略作探讨。由于还有一些唐宋时期的运河未作实地调查,如:关中漕渠、惠民河、蔡河、广济河等,因此,本文不能算是唐宋运河城市的完整研究,不当之处,敬祈指正。

一 永济渠(御河)沿岸的城市

永济渠是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在曹魏所开白沟的基础上开凿的一条南达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市)的运河,藉以用兵辽东。唐、五代又加以疏浚、筑堤,成为维持中原与幽燕地区水上往来的纽带。北宋继续沿用,习称“御河”,惟北段淤塞,兼因宋辽对峙,改由乾宁军(今河北青县)西北入塘泊。御河主要承担北宋河北边防军粮的送达,岁运近百万斛,实乃备边之命脉。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商胡决口之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占御河,导致河堤残破,河床淤积,已不堪承运。金朝初年,黄河南趋,加之建都中都(今北京市),为通山东、河北之粟又对御河加以疏浚,濒河之城置仓以贮傍郡之贡,御河航运又有所恢复。但馆陶(今北馆陶)至武城(今武城县旧城)段不绕行清河(今清河县西城关镇),改行今临清市。元朝自临清开会通河以后,临清卫辉路汲县段御河通漕作用逐渐降低,河床逐渐被源自太行山的诸河水泛滥冲没。明朝永乐年间曾为江南粮饷转输北京而复行疏凿,但是临清以上河段已多有改变,最终形成今天尚能见到的卫河。唐宋时期永济渠的流经路线,近人已有的考证。^[1]大致为:自河南武陟引沁水东北流经新乡、汲县、淇门、黎阳(今浚县)、内黄(今县

西旧县)、洹水(今魏县洹桥村)、魏县(今未城)、魏州(今大名东北大街乡)、馆陶(南馆陶)、永济(北馆陶)、临清(今临西)、贝州(今清河县西旧城关镇),东折经武城(今县西旧城)、历亭(今武成县),复折北流,经长河(今德州)、安陵、东光、长芦(今沧州)、乾宁军(青县)至独流折向西北,经安次(今旧州),利用桑干河(今永定河)至幽州(今北京)西南。今天除卫河、南运河占压的原御河地段外,地表已很难发现永济渠的踪迹,现卫河和南运河北段仍为地上河,内黄至德州之间有大片沙岗和沙淤地,这是北宋以来黄河洪流泛滥留下的,也是永济渠淤没的主要原因。

随着永济渠的开通,沿流陆续兴起了一系列城镇,共计 20 余座,形成一条城市密集带(图 1)。这些城市最突出的特点是多因水运码头或桥渡功能而发展,离运河极近;或当旧城废弃之后,新城趋向运河而建。例举如次:

魏州,(今大名县东北大街乡一带)有“魏桥”,唐朝引永济渠绕城,夹河而成聚落。玄宗开元二十八年(740 年)九月,“刺史卢晖移永济渠,自石灰窑引流至州城西,却注魏桥,夹水制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2]。魏州在唐朝后期为魏博节度使治所,其前身——隋武阳郡,原仅辖二个小县:贵乡、昌乐。永济渠修成后,因控据魏桥水陆枢纽,地位重要,才发展成统辖 14 个县、拥众数十万户的大郡。唐朝中后期屡为强蕃、官军所争。唐德宗建中三年(782 年),马燧、李怀光与朱滔等战于魏州城下,滔堰永济渠水入王莽河故道绝官军粮道及归路,马燧退保魏县(今大名西北,原治永济渠南),双方隔渠水列营相拒,互争魏桥,最为惨烈。^[3]

贝州,唐懿宗咸通(860—874 年)以前城址在今清河县西北,永济渠在城东南十里,有“孔桥”。唐朝贮江淮租布甲仗于此,以备河北军用,号称“天下北库”。^[4]孔桥北接冀、深、瀛(今河间县)、莫州(今任邱莫州镇)之间的华北平原中央地带的南北交通大道,南连博(今山东聊城)、济(今聊城西南)、郛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及黄河重要津渡口:济州津、杨刘渡(今东阿杨柳村),恰与永济渠形成十字型水陆交通骨架,故军事地位尤为重要。武则天永昌年间(689 年)原在永济渠东南 30 余里的清阳县缘地久积碱卤,遂西移于永济渠东孔桥置城;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 年)又移于永济渠西岸。^[5]懿宗咸通中贝州亦东徙,南临永济渠为城,以清河、清阳二县附郭,直至北宋,即今清河县西城关镇。^[6]

内黄县(今内黄县西旧县村),永济渠在县北二百步,有“永定桥”。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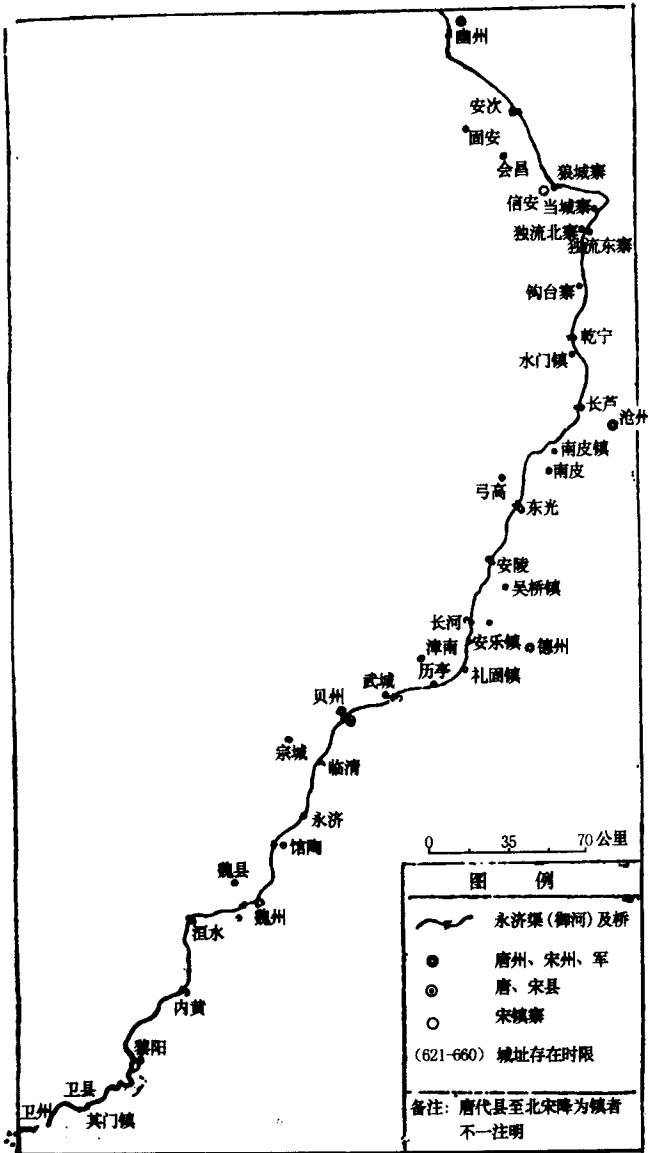


图1 永济渠(御河)沿岸城镇分布示意图

昭宗大顺二年(891年)朱全忠击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于内黄,五战皆捷,至永定桥,斩首万余级。^[7]内黄当魏、贝去洛阳之要途,又兼桥渡之利,故有所争。

馆陶县(今南馆陶镇),永济渠在城西十里,有“永济桥”,为兵家必争之地。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刘黑闥至馆陶,永济桥未成,不得渡,自视作桥成,而过桥西。^[8]又,德宗兴元初(784年)朱滔谋取汴州(今开封),使人见魏博节度使田悦,约会馆陶,偕行渡河。^[9]也是由于馆陶位在道中,又有永济桥之便。但是,馆陶县毕竟与运河还有十里之距,不如其北面的永济县跨渠为城来得方便,所以北宋以后县治北移永济。

永济县(今山东北馆陶东南肖城),此县城建置较晚,原来只是永济渠上的一座桥,因行旅客商住店、买卖,渐渐形成市廛聚落,称“张桥店”、“张桥行市”。唐代大历七年(772年)始由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奏于张桥行市置县,永济渠在县西郭内,阔170尺,深2丈4尺,穿县入临清,故以为名。^[10]

临清县(今临西县),永济渠在县西门外,为魏、贝之间蓄积粮粟之地。唐末五代,凡欲取贝、魏者,皆先顿兵于临清。北宋因地处宋辽驿道,为迎候宋辽使臣曾设驿馆。^[11]

武城县(今山东武城县旧城西北),隋开永济渠时,城址在渠西北十里之外,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武城县迁至永济渠北义王桥西二里,扼义王桥东通德(今山东陵县)、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之道。^[12]北宋末年,迫于河患,复徙渠东,即今旧城关镇。^[13]

长河县,原在今德州市东,永济渠在县西十里,有“白桥”。城为水所坏,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十月移就白桥于永济渠西岸置县,十年(815年)又在渠东置小胡城。^[14]晋一度移德州治于此,旋废为长河镇。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复移将陵县治于长河镇,即今德州市。^[15]

安陵县(今景县安陵乡),城东临永济渠(即今南运河),有“柏杜桥”。隋开永济渠时置曾县,然城址并不临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移至柏杜桥,于运渠西岸建新城。^[16]

东光县,永济河渠在县西二百步,渠上有桥名“白桥”。自桥西有路通景州弓高县(今景县),桥东北有道去沧州(今沧州市东南旧城),史称“白桥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王承宗遣兵2万人东光,断白桥路。后梁乾化三年(913年)杨师厚亦自弓高渡御河而东逼沧州。^[17]白桥显然

是维系河北平原腹地与东部滨海地区之间的交通孔道。

以上三座城市皆据永济渠桥头而设置,且三座桥都同“白”字有关,“白”、“柏”与“泊”、“摆”仅一声之转,“杜”与“渡”亦同音(《旧唐书·地理志》景州安陵县条作“白社”,“社”当“杜”字型之讹)。因此,“柏杜”很可能源自“泊渡”二字,意即永济渠上的津渡口,今沧州市与东光之间南运河上还有泊头镇,也似取自泊渡或漕船停泊歇息之义。如果此说不误,则上述三桥皆由泊渡发展而成,建桥后又因水陆交汇地至关重要,逐渐将附近的州县城吸引至桥头。这三座桥当时可能并未赐以正式名称,故俗称白桥或柏杜桥。

永济渠畔还有一些城镇可以查到与运河桥的关系,如:涿水县和“涿桥”(今魏县西南涿桥村)、长芦县和“市西桥”(今沧州市)、乾宁军和“冯桥”(今清县)、安次县和“耿桥”(今廊坊市西旧州)等。说明永济渠沿线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城市位置的选择或城址转移是与运河桥渡密切相关的。桥渡的军事交通地位比较重要,行旅停舟和物资集散转运也容易在桥头形成市场聚落,因此运河对周围的城市有极强的吸引力。永济渠沿线城镇分布的间距也比较均匀,尤其北宋的镇市大批兴起,两座城镇间距一般不超过50公里,当与那时的航程有关。金、明、清经过局部河段的改造,最终形成卫河、南运河运河体系,凡与原永济渠重合地段的沿线城镇,继续沿用唐宋旧基,尽管河北平原水患灾害不断,却未再发生城址转移。相反,一些唐宋时代不在运道的州县,此时也移至运河岸侧原唐宋县镇旧址为治所,或在运道侧觅新址而发展。如沧州、德州、浚县、临清的城址转移和发展,皆应视为唐宋运河对沿线城市吸引力的迟滞作用的影响。

唐宋时期永济渠沿线城市的布局形态,今天尚能看到的唯有魏州(大名府)和贝州二座,余皆埋于水患泥沙或后代改建而不易辨认。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大街乡周围前后门口、北门口、铁窗口、南门口村之间断续的夯土城垣,即唐魏州和北宋大名府城。魏州城初建于隋,唐末五代展拓重修,北宋升为北京大名府又增筑宫城。现存断墙残垣周长约42里,与《宋史·地理志》所载大名府外郭周48里大致相符。城垣轮廓不是唐代州城常见的受坊市制约的四方规整型,而是南北两面明显外突,使东南、西北、东北城角皆呈屈曲状(见图2)。根据文献推考,这南北两面的外突应是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5年)魏博节度使乐彦桢展拓的。^[18]如果自前、后东门口南至蒋庄,直西沙堤村,北至铁窗口村,复直与后东门口村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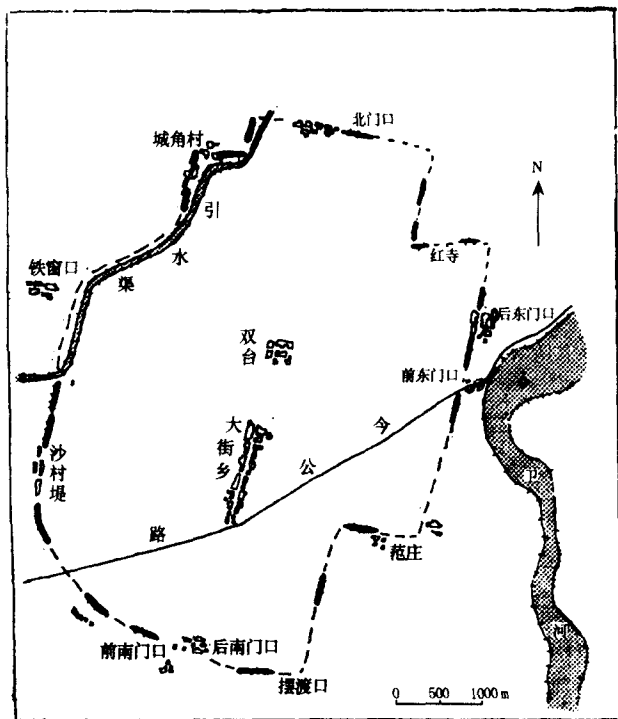


图2 唐魏州(北宋大名府)城遗址图

东城垣相连,即不考虑南北外展的两部分,则是一个较规整的方形,这应该就是唐魏州城原来的轮廓,显然符合坊市制度下唐代州城的形态。魏州城旧有形态的突破,除受军事防御思想的驱使外,可能更多地考虑到永济渠水运之便对城市的影响,从城南两座城门分别命名为“广运门”和“登槽门”即可得到印证。唐宋贝州城遗址在今清河县旧城关镇,在明清旧城外围有一圈断续的土垣环绕,此即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重修的城垣。从形态观察,也已不再恪守唐代坊市制约下的整齐划一的特点。^[19]虽然由于历年河流泛滥,泥沙堆积,已难确认当年永济渠的痕迹以及与城市的关系,但是从明清城镇聚落分布形态来看,宋代城址被废弃之前并未沿运河形成市街,而与下文将要介绍的另外几条运河沿线的城镇形成对照。

二 汴河沿岸的城市

唐宋汴河的前身是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凿的沟通河、淮的通济渠。由于古代文献记载不一,学术界对于隋通济渠自梁郡(今商丘)以下的流向,究竟走彭城(今徐州)会泗水南流入淮,还是经永城、宿州、灵璧取东南直路至古泗州(今盱眙北,已没入洪泽湖)入淮,争议颇大。本节所述仅涉及唐宋汴河即由板渚(今荥阳汜水镇东北)引河东南流,经汴州(今开封)、陈留、雍丘(今杞县)、襄邑(今睢县)、宁陵、宋州(今商丘县)、谷熟、永城、宿州、灵璧、虹县(今泗县)至泗州入淮的运道。汴河自隋朝开凿,历唐、五代、北宋,至金朝初年堙废,先后通航五百余年,自唐朝中叶起,曾是维系中原王朝政治中心和江南经济重心联系的大动脉。因为汴河水源长期引自黄河,泥沙俱下,河床淤高,北宋政府一直靠筑堤培岸、岁岁疏浚来维持。宋金南北分治以后,汴河转漕作用锐减,金人又不维护,河道很快淤塞。鉴于商丘至灵璧之间汴河顺直,高厚的河床即被改作车路,元明以降,一直是河南与安徽之间的驿道。因多数路段处于汴河河槽之中,故当地人又称之为槽子路。考察途中,在濉溪县三铺乡石圩子村宿(县)永(城)公路北侧临时挖开的一条探沟内,清晰地看到汴堤夯土与河床淤沙的土层关系,从而证明时至今日,永城县至灵璧的公路依然修筑在原汴河的河身或堤岸上。

截止于北宋末年,汴河沿岸的州府县城共有14座,镇11座,除开封、雍丘(今杞县)、应天府(今商丘县)、虹县(今泗县)四城起源较早,汉代就已筑城,其余皆随通济渠——汴河开通而出现。汴河沿岸城镇位置的选择也是既考虑到汴河航船上、下行的航速和航程,较均匀地分布;而且多就水陆交会点设置,城镇内普遍建有横跨运河的桥梁,以利南北往来。这一点在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溯汴河自泗州至汴京的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20]成寻的日记讲到他的船每每皆在大桥下过夜,桥上有市,入夜灯火万千,买卖繁昌,店家多得不可计数,歌之声很远就能听到。为了让船工上岸买卖,成寻两次路过宿州皆停船逗留多时。时规定汴河内的船只在宿州一次上岸出售的干姜不得过三十石,南京应天府不得超过五十石,反映沿河城市交易买卖的频繁使官府不得不有所干预和限制。汴河桥市的买卖活动,无论从空间位置、或是时间规定上,无疑都

是唐朝中期以后市坊制度解体和夜禁制度弛废的结果,也是刺激沿河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汴河水运码头和桥渡职能的限制,汴河沿岸的城市布局形态亦呈现跨河为城,以一条市街为主干,有别于北方平原一般州县城市的特点。

宿州,最初只是一座桥,名埇桥。中唐以后自宋州取东南直路人淮成为正途,“埇桥为舳舻之会”^[21],路扼彭门(今徐州),西拉睢阳(今商丘),南临淮甸,当漕运之要,水陆之冲。唐宪宗元和四年(809年)置州,跨河为城,临河街巷分布着馆驿、酒楼和仓储,每日众多官私船只停泊城内。咸通九年(868年),庞勋起义军乘夜攻入城内,一次劫获城中大船三百艘,备载资粮,顺流而下^[22],可以想像其城内运河的容纳量甚为可观。北宋时,宿州久无兵乱,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居民日增。自唐以来修建的罗城已嫌狭小,居民多散在城外,就草市买卖,使朝臣曾萌动拓城之念。^[23]南宋之际,宋金屡次交兵于淮、汴之间,皆为争夺宿州控扼的主动权,宿州城受到摧残破坏。宋金隔淮而治以后,金人曾重修宿州城。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09年)楼钥出使北行,路途所见就是刚刚修过的宿州城,他写道:“又六十里宿宿州。自离泗州循汴而行,至此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由其中,亦有作屋其上。(宿)州城新筑,雉堞甚整,闻是五月下旬上畔指挥重修……城中人物颇繁庶,……大寺数所,皆承平时物。酒楼二所甚伟,其一跨街,榜曰‘清平’,护以苇席,市肆列观无禁。”^[24]“皆承平时物”指的是北宋时期的建筑,推想金朝之重修只在培筑城垣,宿州城内结构未有动改。今天所能见到的宿州市老城区是明朝初年缩筑的,周回只有六里,主要建筑和城市布局仍遵循宋金旧址。^[25]今东西横贯全城的红旗路(旧中山路)是主干商业街,高出两侧地面1.5~2米。据当地老人讲:此街即建在隋堤上。紧傍其南侧20米处,有一平行的东西向小街,现仍名“大河南街”,当是以旧在汴河之南而得名。宿州老城为一东西狭长型轮廓,多东西横街,南北纵巷甚短,只有淮海路贯通南北,或许其与红旗路相会的十字路口(此处地势最高)就是埇桥故址,也是符合当时水陆交通区位的。汴河虽然堙废了,但是东西向陆路通干线的传统优势并未减弱,从而制约了明清时期城市的形态,仍然保持沿河城市布局依从河流走向延伸的特点。(见图3)

灵璧县,灵璧一名早在楚汉相争之际就出现了,项羽败刘邦军于彭城,“楚又追击至灵璧东睢水上”。^[26]不过那时的灵璧在今濉溪市境内,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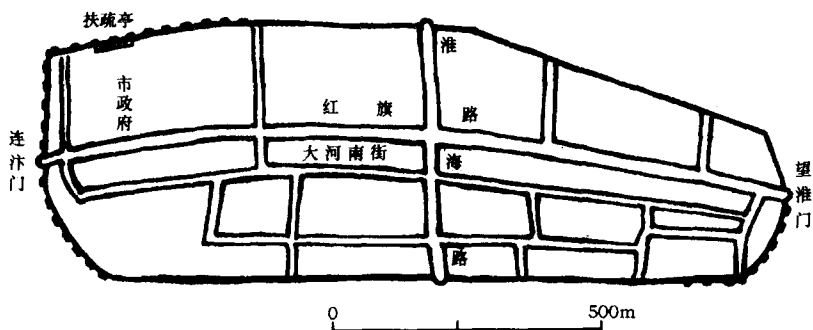


图3 宿州市老城布局图

在今县。汴河开通以后，宿州与虹县相距过远，往来的船只不得不在中途停靠过夜。地点选择在位置适中、又是运河两岸惟一有石质山丘的南麓，即今天县城所在的位置。^[27]慢慢地这里开始出现为过往船客服务的店家，有桥相连，起名为零壁（意为孤独零丁的村落）。北宋汴河的繁忙也带来了昌荣，零壁发展成镇市，买卖的兴隆竟使政府在此地收取的商税（熙宁十年税额 2156 贯）超过了所从属的虹县税额（2042 贯）。为了便于管理，哲宗元祐六年（1086 年）不得不把零壁镇升为宿州属下的一个县^[28]，后又因此地产磐石，改零壁为灵璧。南宋两次北伐，皆与金人争夺灵璧城，居民流散，城郭为墟。元代，自徐州南下扬州的陆路取道褚兰（今宿县东北褚兰乡）、三村（灵璧西北，久沉于水），经灵璧东去虹县（今泗县）、青阳（今泗洪县），而不由宿州^[29]，灵璧的地位因驿路所经又有回升。

灵璧县城垣始于北宋，明朝万历四十七年（1618 年）陈泰交始修《灵璧县志》以为：“自宋立县，历金元至明初尚未有城，弘治八年始筑城。”其实不然，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 年）宿州之役，李显忠败金将肖琦于灵璧城下，“遂复灵璧，入城”^[30]。乾道三年（1169 年）楼钥《北行日录》也记载“灵璧两岸人家多瓦屋，亦有小城，始成县”。又，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 年）宋将毕再遇和金兵战于灵璧，尝发誓言：“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31]由此可知宋代灵璧县城虽小而城垣具备，县署就在城内东南隅。又康熙十三年（1674 年）吴嵩重修县志云：“设县之初，民居夹堤”，“（汴）河形久失，县治东西大路即其堤也”。这也证明明朝重筑砖城一仍宋金旧址，只不过把县署、馆铺移至城西街路北，而北宋城市初创时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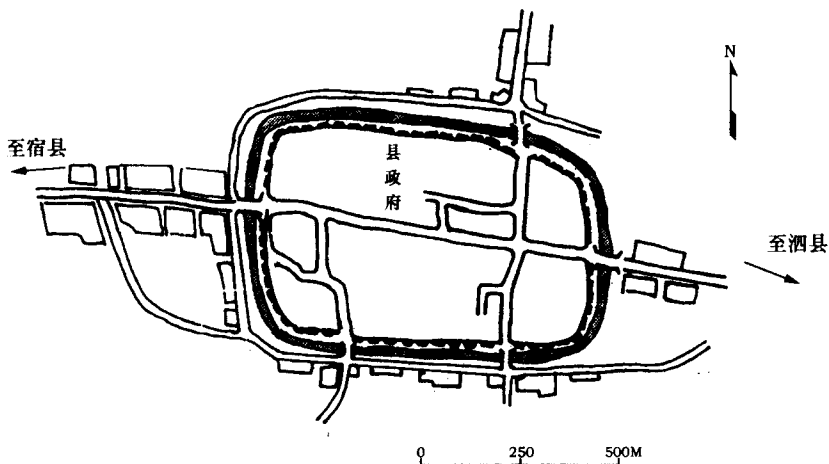


图4 安徽省灵璧县城示意图

的运河桥与汴河十字型交通骨架仍然保存在县城东半部。今天的灵璧县东西长 800 米,南北不足 500 米,主要是一条东西大街穿城而过;距东门不远,为一短而弯曲的南北街与横街相交,两端各通一门。这条横街就是当年的汴河,那十字街口自然应该是城市的生长点——汴河桥的位置了。(见图 4)

类似的情况还有永城县,受运河交通机制的吸引,城市移至汴河岸侧,夹河筑城。^[32]城垣东西狭长,中山街斜贯全城,高出两侧地面,也应该是昔日汴河之所在,受泥沙淤高而造成的。中山街在东关附近向北折曲,随即又回复到汴河原来的走向上,当是唐宋以后受某种偶然因素或建筑的影响。汴河在永城县的流向完全制约了城市平面布局和房屋建筑设计的主导方向,使永城县城市形态违反了中国北方平原城市设计上一贯采用的座北朝南的定式。(见图 5)

虹县(今泗县),该城历史很久,早在二千年前,西汉曾设立了夏丘县。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 年)移虹县治此,以临汴河,北宋因之。清朝乾隆年间因泗州被洪泽湖淹没,徙州治于虹县,取其地势高,不惧水患,虹县名称遂改。^[33]

虹县城东南为一系列北北西向砂礓缓岗,高程为 37.3 米,使城东地势明显高于城西的徐淮黄泛平原。当年汴河不易开凿,只得偏向东北,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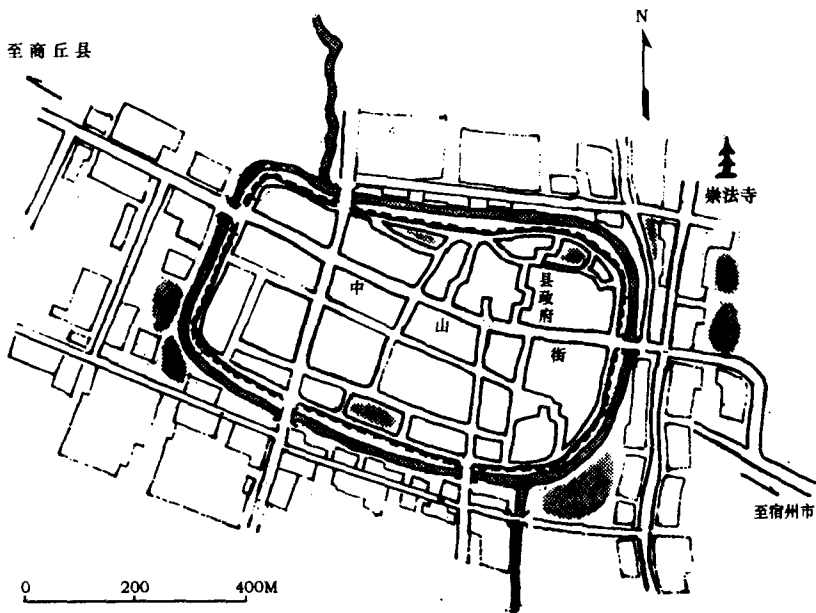


图5 河南省永城县城示意图

行今枯河头，再折向东南。当地盛传隋炀帝乘舟东下扬州，行至枯河头，因水涩舟止，不得不“纳粟行舟”，即在缺水河段用稷子拌香油铺于河底，两岸由人拽船而进。50年代整治河道，当人还真的从老汴河南岸挖出数十石稷子。文献记载虹县以东汴河河道唐宋时期也确实屡有兴作，如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河南采访使齐瀚以江淮运漕经淮水波涛，有沉溺之忧，遂开广济渠下流，自虹县至楚州淮阳县北十八里合于淮，踰时毕工，后以水流湍急，行旅艰阻，旋又停废，仍由旧河。^[34]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遣宿、亳丁夫自泗州至虹县沿汴河修作踏道辮岸，其浅处为锯齿，以束水势，使其浚成河道”。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都水监丞侯叔献言：“昨疏浚汴河，自南京至泗州，概深三尺至五尺。惟虹县以东，有礧石三十里余，不可疏浚，乞募民开修。”徽宗大观中泗州知州胡师文因创开泗州直河，筑签堤阻遏汴水，兴师动众，费钱谷累百万计，寻复淤淀，生事匿功而坐降。^[35]以上事例皆说明虹县城东的砂砾缓岗给汴河行水载舟带来很大不便，汴河不得不在虹县由东南流向折转东北。虹县城恰好处在

两种不同地貌景观的分界带上,按照城市地理学观点,正是城址长久不废的原因所在。汴河河道的改向亦导致了虹县城市布局也是违背正南正北的传统主导方向(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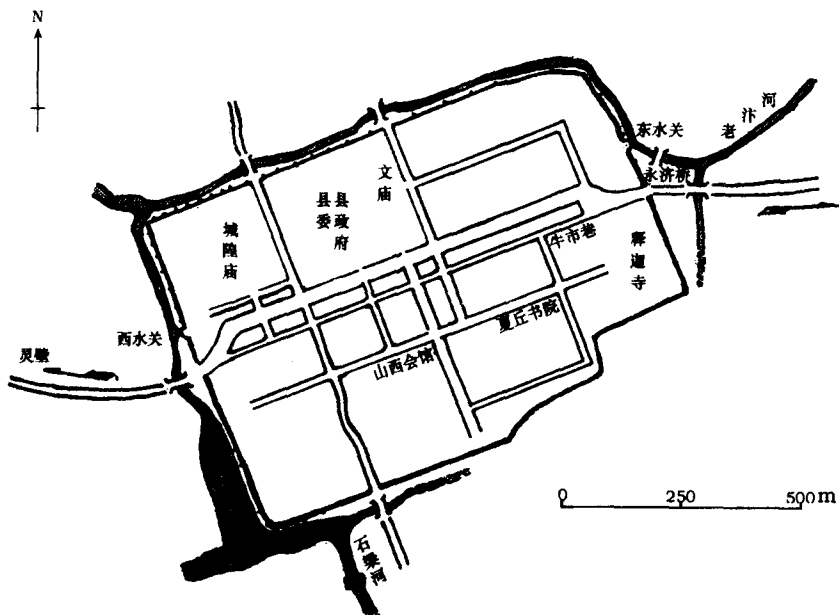


图6 泗县城布局示意图

今泗县城区东西长约1公里,建筑形势呈东北——西南走向,东西门之间的老街集中了全县最主要的商店、旅馆、饭店和影剧院,行人熙攘。此街北侧十余米又有一条同方向的大街紧邻,现已辟作穿过城区的干线公路,其地面明显低于两侧,形成相对高差3米多的南北陡坡。据文献记载:“汴水由虞姬墓经阴陵、鹿鸣二山人州境,穿城东注。西关外为西汴河,东关外为东汴河。”“城内汴河一道,穿泮池而东,长二百八十丈。万历四十四年……以城内汴河道淤塞,城外水冲反跳,乃于水口筑石坝以截其流,开通东、西水关,浚深内河,就河道凿泮池,使河口往来无滞。由是潼、汴二水之赴于虹者,会城西,穿城东,出东水关南绕,复迤邐而西注,始旋转而东流。”^[36]这条低于城内地面的行车干道就是当年汴河的遗迹。经县文管会同志指引,找到了它的西端——西水关旧址,砖砌券拱式水门宽3米,拱顶离地面2米,门内水道已为砖填塞。今泗县城的老街当年可能

是汴河的南堤,沿河形成市街,买卖业集中的传统迄今不改,还保存着“牛市巷”之类具有商业功能含义的地名。明清时期山西商人的会馆也邻街选址。城内汴河北岸依次集中着州县衙署、文庙、城隍庙等行政职能机构和受官府政权直接管理的科考、祀典场所。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郑刚中尝沿汴路西去陕西凤翔,留下一部记述沿途见闻的《西征道里记》,其中关于虹县的一段是这样说的:“虹县城因隋渠为壕,濬水深阔,城具楼橹。虹以西诸邑往往皆城,虹独坚密……隋渠自虹以上为陆,木已丛生,县以东水接淮口。”文意表明虹县护城壕水也与汴河相通,这与今日泗县城周围水道的形势是相符的。骑河筑城,城内行船,濬河相通的结构可能是汴河城市的显著特点。由此观之,汴河道上的宿州、虹县、灵璧、永城无论为州为县,皆遵其制。受运河流向和水运码头机制的影响,汴河城市沿运河走向的横轴拉得很长,而城市纵深相对很短。上述特点也影响了汴河故道上的村镇聚落,如青阳镇(今泗洪县)、马翁店(今马公店)、通海镇(今通湾店)、静安镇(今大店乡)、蕲泽镇(今四铺集)、白禅(白善集)、柳子镇(今柳孜)、酃阳镇等,房屋建筑皆沿汴河而建,拉得很长。甚至影响了今天公路行车的速度和安全,交通部门正在着手改线,绕行村镇外圈,因为这些村镇房舍纵深不大,改线无须绕行过远。由于汴河淤废以后,河床改作车路,继续保持交通干道的功能,沿线城市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故能长久不废,很少有城址迁移的现象出现,这与前文介绍的永济渠——御河沿线城市的发展演变有所不同,虽然双方都处于易遭受洪水威胁的黄淮海大平原上。至于城市布局,则因为永城以西至开封间金元以降屡遭黄河溺荡,地面淤高,汴河形迹不存,旧城湮没,驿路改途。原来受汴河水运机制影响而出现的市街码头布局特点也渐渐丧失,故汴河西线带上的城市格局又转而服从明清北方平原城市方整的布局规律,不再显示运河沿岸城市的特点了。

三 淮南运河沿岸的城市

唐宋时期沟通江淮的淮南运河,隋唐亦称邗沟,宋代又称楚州运河,是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在古邗沟和汉、魏、两晋中淡水的基础上,经过疏浚、治理的运道。由扬子(今邗江县扬子桥)直抵山阳(今淮安),不再东绕射阳湖。但是,由于还要穿行白马、樊良、邵伯诸湖,受湖水盈缩的影

响,运道一直不畅。直至唐元和年间,淮南节度使李吉甫始筑平津堰“以泄有余,防不足,漕流遂通”^[37],运道也相对稳定。入宋以后,于继续加修运河堤岸的同时,更筑船闸,运河逐渐与诸湖隔离,漕船无阻,公私大便。^[38]今天苏北地区的里运河基本是在宋代运河的基础上拓宽淘深。纵然明清以来这段运河已经多次改造,使人们不能一睹当年运河全貌,但是由于基本线路未变,运河沿岸城址未发生转移,人们还能以扬州、淮安、高邮、宝应为例,探索一下唐宋时期这条运河沿岸城市的选址和建筑布局的特点。

唐宋时期淮南运河沿岸的州县级城市是扬州、楚州(今淮安)、高邮和宝应。北宋以来还形成了瓜洲、扬子、弯头、邵伯、黄蒲、北神诸镇市。四座州县级城市早期城址的起源与位置的选择都不是公元七世纪初隋代运河开通时的事情,但是以后的发展演变却与江淮之间人工水道的完具与畅通密不可分。

扬州,最初的城址——邗城建于今扬州市西北蜀岗之上,是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开邗沟通江淮的同时兴筑的。当时的蜀岗是长江北岸的阶地,宽平干燥,北有溪水汇注的雷塘提供水源,适于城市聚落的兴起。而岗下的平地尚为江水泛滥之河漫滩,沮洳卑湿,不堪居处。迨至隋朝统一之际的一千多年间,长江挟带的泥沙不断在北岸堆积,边滩淤涨,主泓南移,江岸至今三汊河、扬子桥、施桥一线,蜀岗下退出四十里宽的冲积平原。东晋南朝以来,陆续有人开垦成田,辟宅建寺。^[39]隋炀帝重开邗沟,绕蜀岗下而南,却仍置官衙于蜀岗之上,唐初亦然,扬州大都督府衙等也集中在蜀岗上,未曾移下平地。随运河开通而云集的工匠、商贾只能在靠近蜀岗下的平地,沿运河两岸卜居择处。这就导致以后唐宋扬州城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行政机构和工商业居民区相脱离的趋势。不过,从近年扬州市唐城遗址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以中晚唐最为丰富,初唐文物极少,说明唐朝前期,蜀岗下尚未极度繁荣。蜀岗下运河两岸发展到宋代洪迈《容斋随笔》所云“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的局面,应该是公元八世纪中叶以后。安史之乱,天下衣冠士庶多避处江淮间,江淮地区由于未遭受战乱,人户增殖,经济崛起,中央政府对东南八道供应的依赖逐渐加强,邗沟的漕运愈来愈频繁和重要。扬州和楚州分别扼住了运河与长江、淮河两条天然河流相交会的襟喉之地,又是海外船只到发锚地。尤其在刘晏改进裴耀卿的漕运转般法之后,“江船

不入汴，……江南之运积扬州”，扬州成为东南物资集散之地，万船攒动，日益繁荣，才终于发展成江淮间富甲天下的城市。邗沟北端的楚州，最初的城址在今淮安县城北五里的末口故址。古邗沟初开时，水位高于淮水，为防止运河水泄走而立土堰于水口，后称“北辰堰”，或“北神堰”，亦号平水堰，舟船需牵挽过堰，曾筑山阳小城以守。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为控制南北水运襟要，在其南侧又兴筑了山阳郡城，即今淮安城之前身。^[40]隋文帝伐陈时，利用山阳旧城濒临末口之便，修筑仓城，储军粮逾百万，隋亡遂废。山阳郡城则因邗沟水运交通的频繁而日显重要。唐朝初年于此置楚州。^[41]

扬州和楚州两座城市都选中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相交的运口附近、天然河流的河漫滩淤积平原上。随着长江、淮水主泓周期性的偏摆，淮南运河的水位又同长江、淮水之间有一个落差，两座城市在日后的发展中都渐渐离开了天然河流的河岸。因此，唐宋之际这两座城市的发展演化过程颇为相似，即不断出现重新开辟、延伸新的运河或改变运口的现象。例如：瓜洲伊娄河的开辟^[42]，楚州开沙河运道^[43]。而且，因在运口设置堰闸，常常积船待挽，逐渐形成新的聚落，也就是后来的扬州瓜洲镇和楚州北神镇，各自与州城及运河漕运管理构成一种特殊的关系，相互依托却又显示不同的城市功能。这种现象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

建筑形制方面：唐朝初年，扬州移治江都县时，仍倚于蜀岗上的江都县旧城，其后大都督府衙、淮南道采访使（开元二十一年设）和节度使衙（至德以后置），亦皆治于此，故称“衙城”、“牙城”，蜀岗下建罗城后又称“子城”。平面布局沿袭唐中叶以前封闭的坊市制规划，城垣方正规整，开四门，内部为十字街格局。上述衙署位于十字街交会处之西南相位。^[44]扬州罗城始建的准确时间尚不得而知，目前据现有资料推测，大致为唐朝中叶坊市制度行将解体的时期。因为从近年研究的情况看，唐罗城有意识地保持了四方规整的外廓，这是受坊的制约而形成的传统。但是其内部街区结构因服从于运河码头职能的需要，仓场、馆驿和市肆多濒城内官河两岸而设，依桥、道而延伸，住宅区和手工作坊区也是自官河向两翼拓展，形成开放的街巷式格局，未受封闭坊墙和固定市场的限制。^[45]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淮南节度使杜亚开拓疏启城内官河时，提到扬州罗城“侨寄衣冠及工商等多侵衙造宅，行旅拥弊”的现象。^[46]民宅和工商业户侵衙是封闭的市坊制度解体的标志之一，说明坊墙的限隔已被打破。再

如描写扬州市井繁盛的唐人诗句“十里长街市井连”(张祜)，“夜桥灯火连星汉”(李绅)，“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王建)，也已经不是入夜闭户，固定一、二个市场依时开放的市坊制城市景观了，夜市的开放也是坊市制度弛废的标志之一。^[47]另外，从上述诗人生活的时代来看，应该是唐朝中后期的扬州景观。当然，如上推断是否属实还有待扬州唐城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王播为盐铁转运使，因“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早即滞漕船。乃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取禅智寺桥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48]。从此，淮南运河主干不由城内官河，改傍罗城东南城垣而行。市肆、民宅等工商业区受运河机制吸引趋向城东部发展，罗城西部渐渐冷落萧疏。所以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和北宋初年李重进两次重筑扬州城皆依托唐罗城东南隅而建，收缩西城垣，以唐北三桥、中三桥和南三桥所在之河作为西城壕。这个向东南发展的趋势一直被南宋扬州大城及明、清新旧二城所继承。(见图7)

楚州(今淮安县)，没有像唐代扬州子城与罗城那样地势的差别及建城的时间差，城市格局遵循了以州衙(子城)为中心，突出中轴线，外套罗城的传统形制。今日淮安县旧城基本上还是唐代奠定的格局，城内街巷分布明显带有里坊制度下条块分割的痕迹。(见图8)

高邮、宝应两座县城城址的选择，如果仅仅从当今地貌条件来分析，似乎看不出多少可以凭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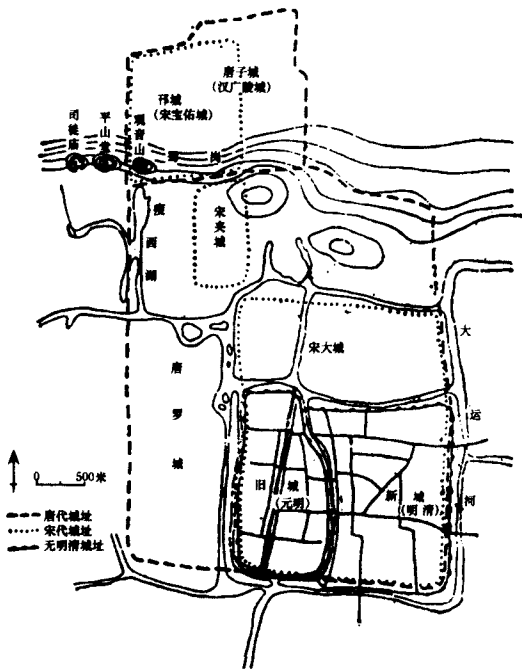


图7 扬州历代城市变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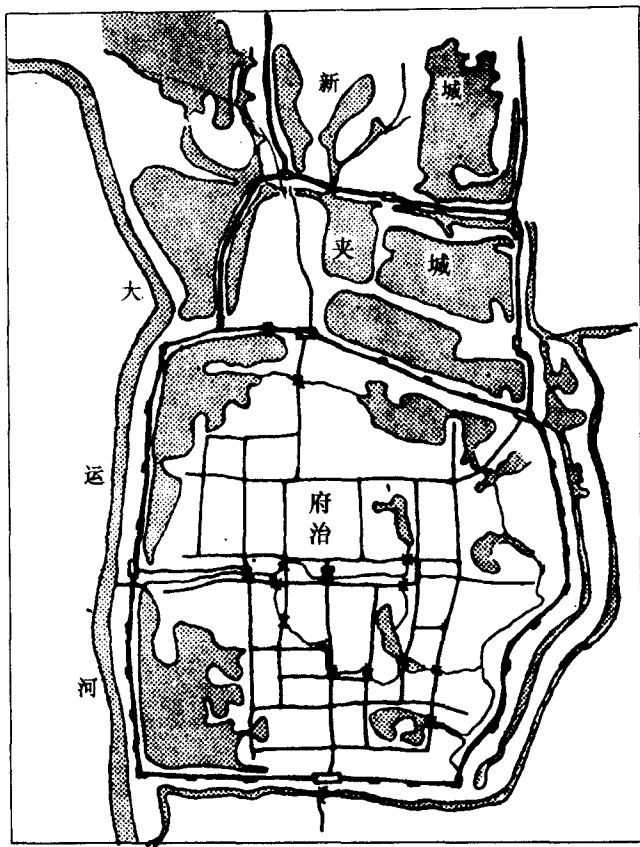


图8 淮安旧城街巷图

的理由,那么上溯一千多年前的情况又如何呢?唐代高邮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件是公元684年武则天废唐中宗,欲圣衷独断。徐敬业谋乱,起兵扬州,双方军队对峙于高邮城北之下阿溪。^[49]另一件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庞勋反唐,率部过浙西入淮南。淮南节度使令狐绹属下李湘劝令狐绹利用高邮运河岸峻水狭之势,设伏邀击。^[50]这二则材料表明高邮既位于从淮河岸侧的泗州盱眙南逾缓岗而东出江淮间的孔道——下阿溪之控扼点上;同时,为避开江淮之间泻湖平原多水沮洳带来的不便,城址又选择在下阿溪南岸较高的台地上。高邮早在西汉即已置县,隋大业中一度移治下阿溪畔的樊梁镇,唐初迁回旧所,与其所处的地理条件

不会没有任何联系。正是由于高邮城避开低洼,状如覆盆,才造成淮南运河这一段岸高水涩,不得不在高邮城南的邵伯镇设闸以节制水量。也正是明了这样一种地势的选择,才能理解为什么宋朝诗人秦观有诗云:“高邮西北多巨湖,累累相连如贯珠。”宝应的前身是西汉平安县,其城址在今宝应县汜水镇西南,运河西岸大汕隔堤一带。1971年兴修隔堤时,曾在3.5米深的地下发现大量汉代砖瓦、井圈、房屋、窖灶、砖铺路面及汉墓,还出土一枚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铭文的西汉铜镜和数枚西汉五铢钱,故结合文献推测此地即汉平安县城故地。大汕河的前身,据当地人推测,有可能是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为沟通樊良湖与津湖(今皆沦为高邮湖)而开挖的“永和沟”。因《水经·淮水注》关于中渚水的注文有误,目前尚无从考证。^[51]南朝萧齐时,于汉平安县城故址复置安宜县,以城濒安宜溪而名,直至隋末,此城毁于战乱。当地人以小汕河指为安宜溪,仍是无从确认的问题。不过,从汉平安县至隋安宜县,此城址断断续续历八百余年沿用而不迁,其控守出入湖群水道的意图已不言自明。唐朝立国之后,因运河不再穿越湖群,安宜县城逐渐北移至经过隋炀帝整治顺直的邗沟新线岸侧重建,也就是今天的宝应县城所在地,并于肃宗上元二年(762年)更名为宝应。宝应城址的迁转受到邗沟水道变迁的影响,反映了运河同沿岸城市相互依托的关系。

对上述二座城市的选址条件略作分析之后,再来看看它们的建筑布局结构。宋代高邮曾有新旧二城,旧城即今县城所在,据载:高邮城始筑于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南渡以后,江淮间屡为宋金争夺,故自高宗绍兴初年开始,高邮城又经历多次营缮,形成周长十里,开四门,南北各开一水门,内通市河的规模。元、明、清仍因其旧。新城在北门外,系南宋咸淳初年(1265年)扬州制置使毕侯为护卫高邮军城而加筑的前沿小城,明代渐废,仅存土城基址。^[52]今高邮城尚存明、清城垣的东南隅,于墙内发现宋代砖质“隔干”,成丁字型排列,起加固作用,并有砖铭“高邮军”。显然,明、清高邮城垣的确一仍宋代旧基,这就为探讨宋代城市布局提供了条件。从现存宋代文献来看,淮南运河穿高邮城而过,舟船需等待南北水门开放,方得入城。^[53]城内运河就是市河,原与南、北之间的直街傍行,惟临近南、北水门段稍有曲折,组成一街一河的空间框架。解放后,市河已改作与南北直街相平行的一段小街,然其南北两端的延伸线仍与明清京杭大运河河道保持在同一条轴线上。明朝为便于漕运,于高邮城西与湖

堤之间另开漕河,使漕船不必穿城,于是大运河在高邮城西折了一个大弯。^[54]这段运河经过明、清以来屡次毁废重修,渐次向东拓展,几乎占压了高邮城西半部城区的一半,使西城垣全部沦入河底。原来矗立于旧城西南隅、始建于唐僖宗时代的镇国寺塔,如今已变成一座孤岛,形影只单地立在大运河主航道与西堤之间。它是我们研究高邮城昔日规模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尺(见图9)。宋代高邮军城保持了四方形的城廓,以市河及南北直街为主干,将城市分为东西两部分,州军衙署等行政职能的建筑群集中在城市东北部,至今仍为县政府主要机关所在地。市河西侧多仓库、寺观,民宅偏于城东南,并由市河引出一条小河环绕,起名“濯衣河”,顾名思义,当是图市民洗濯之便。据明天一阁藏嘉靖《淮扬志》转录旧志记载:宋高邮军旧城内市河上建有三座桥,由北向分别是高桥、中市桥和西市桥,形成城内三条东西向同市河、南北直街相交的横巷,迄今未改。中市桥、西市桥和后世兴起的南市桥皆集中在东南隅,当是昔日住宅区与市场买卖业最集中的区段,后世运河改行城外对其影响不大。

宝应县的城垣据《嘉靖宝应县志略》记载,始筑于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贾涉任宝应知县之际,城周九里三十步,南北长三里,东西宽二里二百六十步,东、南、北各开一门及三水门。^[55]明朝中叶依旧址内缩1/3重筑,变成东西宽度与南北长度相当的斜方型。新城周1047丈(不足七里),设五门及水关,隆庆六年(1572年)将东偏之南门改造成正对城中街的大南门;万历十三年(1585年)塞小东门,另辟小南门于南水关西侧,此格局相沿至今未再大变,而宋代规模形制究竟如何,似难以确指。笔者利用明清留下的县志结合实地调查,认为明中叶内缩之前的南、北城垣应以宝应老城南、北门外水洼地为限,因为明、清运河旧道刚好在此界限之间向西折回成一个大弧形,并截断西南一隅^[56],而城内始终保持着唐宋形成的街河相依的格局。宝应人常喜欢引用唐朝安宜尉储光羲“十里次舟楫,二桥通往来”的诗句来说明宝应县城是先有桥路,后成商埠的发展脉络。“二桥”指的是今宝应县城内的大、小新桥。大新桥在北大街中段西侧,直对县政府所在的县前街,宋宁宗嘉定年间重修,开二孔,遂更名为“嘉定桥”,嘉定桥维系的東西横街与北大街组成这座城市内最主要的十字型骨架,县治、儒学等行政职能机构大多集中在这个框架内。小新桥,旧名“广惠桥”,位于南大街中段路西数米处,现存一座单孔砖砌拱桥,桥下已淤塞成五米多宽的一条水沟,据当地老人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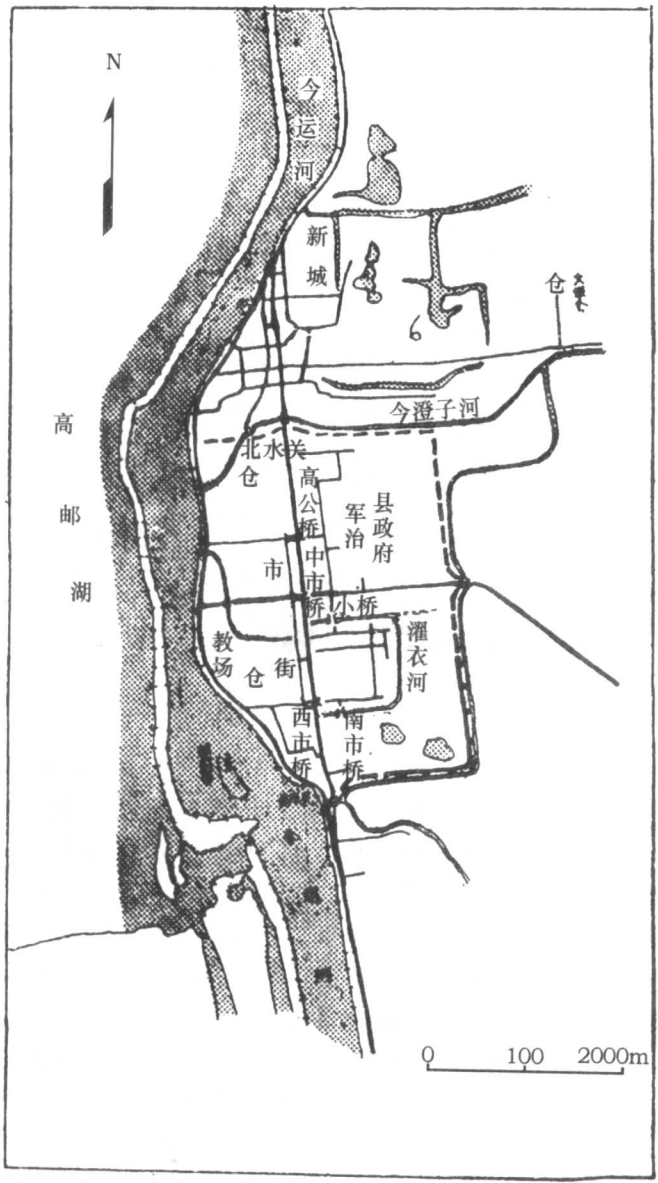


图9 宋高邮军遗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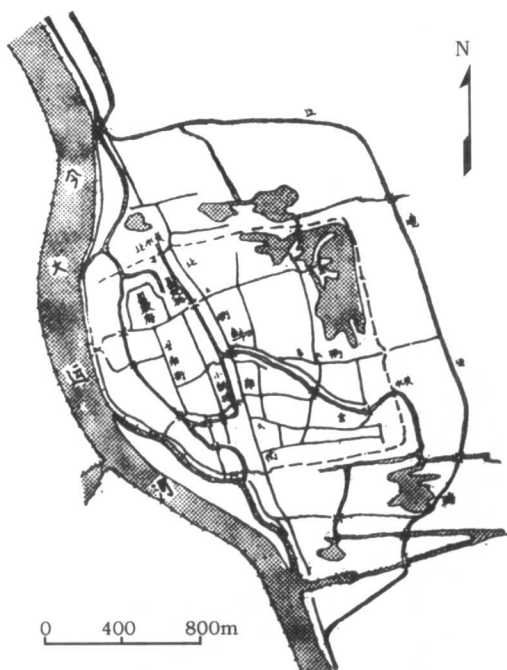


图 10 宝应县城市图

下尚能行船。这条水沟的南端向西折转，同南水关引入的弧形渠道相连；北经大新桥下，直至北水关遗址处淤断。大、小新桥之间，此沟有一支流斜向东南，出东南水门，流向望直港，俗呼“市河”。尽管流经大、小新桥下的水沟南北两端已经改造或淤断，但其走向仍能与明清大运河河道相直，可以断定这条水沟就是唐宋时期穿逾宝应县城的运河遗迹。其与县南、北大街傍行的结构同高邮颇为类似，稍有不同的只是宝应县南大街尚未像高邮县那样改造拓宽，仍保持着整齐的条石铺成的路面，不许机动车通行。街两侧店铺鳞次栉比，那熏黑的雕花栏板立刻使人感受到昔日店肆繁多的历史气息。元朝人王恽泛舟运河，南下吴越，有诗云：“重桥穿宝应，一岸入高邮。”重桥就是指大、小新桥，由此可见，自唐迄元，淮南运河一直穿过宝应城内。也是到了明代，由于城内运河淤涩，无以应付日益繁忙的漕运，才在城西另外开辟一段运河绕城而过，并在城内自南水关开挖“学河”成弧状环抱县治、县学，而局部改变了宝应县城内的原有水系。可是城内沿唐宋运河——市河形成的买卖市街的传统却未因局部水系的打

乱而动摇。从城市发生学理论来分析,大、小新桥之间的这段运河确实是宝应城市聚落起源的发展的生长点。(见图 10)

唐宋时代逐渐形成的高邮、宝应挟运河而城的建筑布局反映了运河、桥道、市廛、城市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但是,这种空间的结构又限制了后世城市与运河的发展,尤其当中央政权对运河漕运的依赖程度及当地自然环境对运河的影响同时加强之际更是如此。大运河不得不在城外绕一个大弯,这个大弯对我们追索唐宋城市的规模和结构提供了有益的线索,这一点在下文还会遇到。近半个世纪以来,高邮、宝应城市建设的发展呈现了沿运河走向延伸的趋势,然而受苏北运河河堤宽度的影响,延伸将受到限制,城市发展只能向东开拓。二城相比,高邮由于行政中心原在旧城东部,向东拓展不会引起城市重心的倾斜,而宝应则可能由于行政中心偏于西北隅,不得不有一个将行政中心向东搬迁的过程。

四 江南运河沿线城市

唐宋江南运河起自润州(今镇江),迄于杭州。这条运河的某些河段既是历史上我国境内开凿最早的运河,也是迄今为止使用时间最长、发挥效益最大的运河。江南运河之始凿,据现有资料研究是距今 2500 年前的春秋吴国控制长江下游、逐渐强盛并欲向外拓张的时期。早期运河河道迂回曲折,穿行于湖泊之间,当是吴人善于利用太湖平原河流湖泊众多的自然条件。目前尚能见到的最早记载这条水道的文献是《越绝书·吴地传》,对其走向,已有学者做过考述,即以吴都城(今苏州)为中心,北支出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无锡梅村),入杨湖(即阳湖),北趋渔浦(今江阴利港)而入江;南支经今平望、嘉兴、崇福,直南入钱塘江。^[57]秦始皇统一六国,南巡会稽曾重新整治江南水道,发囚徒掘陵岗,开通丹徒水道(今镇江至丹阳),逐渐形成江南运河的主势。江南运河沿线的城市因秦汉以来运河走向基本稳定,所以城市的位置,如:曲阿(今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秀州(嘉兴)、杭州等,自秦汉奠基以后,未再迁改,只有润州(镇江)稍有例外,其城址一度随江南运河出江水口的变换而有所转移。最初,秦汉丹徒县城址在今镇江市东南丹徒镇,当时恰好控扼丹徒运河入江水口;东晋元帝时,琅琊王司马裒镇广陵(今扬州),欲由江南运粮西出京口(今镇江市),乃自丹徒西延运道,遇水浅涩,立埭以节制水量,粮船始通。因丁

卯制可,故名“丁卯埭”(今镇江东南丁卯桥附近)。^[58]此后,江南运河出江北口基本稳定在京口。随着运口的变换和京口控扼地位的上升,晋元帝太兴(318—321年)初年,晋陵郡及丹徒县悉移治京口,晋陵郡城址位于今镇江市北固山东南花山湾,其罗城遗迹已于1984年被发现并作了试掘。^[59]此城因山为垒,凭高据险,军事控守功能十分明显,六朝时期,史籍中经常提到的京口城就是指的这座城。隋、唐改置润州,仍依京口城旧址,未尝迁徙。不过,润州因馆穀运口,过往船只皆需停靠在京口堰内外候潮越堰,^[60]随着江南运河水运日渐繁忙,买卖业、旅馆业、仓储地应运而生,京口堰附近渐成市井,城市建设不再局限于北固山东南岗丘上的原京口城一隅,而向西转即向运河两岸延长。特别是两宋时期,京口堰被改造成多级澳闸,吞吐能力加强,沿运河东岸增置大型转般仓、军资甲仗库、公使钱库、交钞库等国家仓储并加修甘露港上下闸;在北固山下又开辟一个江船避风港,通过关河南联运河,以减轻京口闸积船的压力,于是在原京口城与运河之间形成建筑面积几倍于旧京口城的新城市区,并出现了五个市场:大市、小市、马市、米市和菜市。城市性质已经摆脱单一的军事控守功能,开始向商、手工业及转输中心发展,这一职能转换的奠定大致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嘉定年间(1214—1224年),以史弥坚新作镇江府城的完成为标志。^[61]尽管南宋镇江府主要行政机构仍然集中在旧京口城(时称“子城”)内,亦尽管元代镇江城市发展的速度较宋代曾有所减慢,但城市核心向运河岸侧转移及城市职能转向商埠的趋势,直到上个世纪中叶,一直未有间断,不能不承认这是江南运河对她的惠顾。

在城市布局形态上最能表现运河对一座城市发展起过刺激作用的例子,是宋代的常州和无锡。这两座城市的轮廓皆状如纺锤,与一般平原城市四方规整的形制大相径庭。

常州城址位于宁镇丘陵向东延伸的边缘,城市西北10里的新闻镇即5米等高线的上下结合部,愈向西北地势愈高,城市的东北、东南和西南,历史上曾形成过以芙蓉湖、杨湖和溇湖为代表的烟波浩渺的低洼湖区。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探明,常(州)无(锡)之间的大片水体最多不过是三千多年前才开始形成的^[62],所以《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的吴古故水道方能借助湖群曲折而行,吴古故水道未能自今常州所处位置继续西进而北折渔浦,正是由于常州西北地势渐高的限制。后世江南运河于丹阳至常州段一定要建吕城、奔牛等堰闸逐级节制水流以助运,亦盖出此因。自六朝

迄至唐宋可能是历史上的太湖及其周围湖群水面最为扩大的时期,当然自秦代选择了今天常州所在的较高地势作为延陵县治以后,城址一般是不会再改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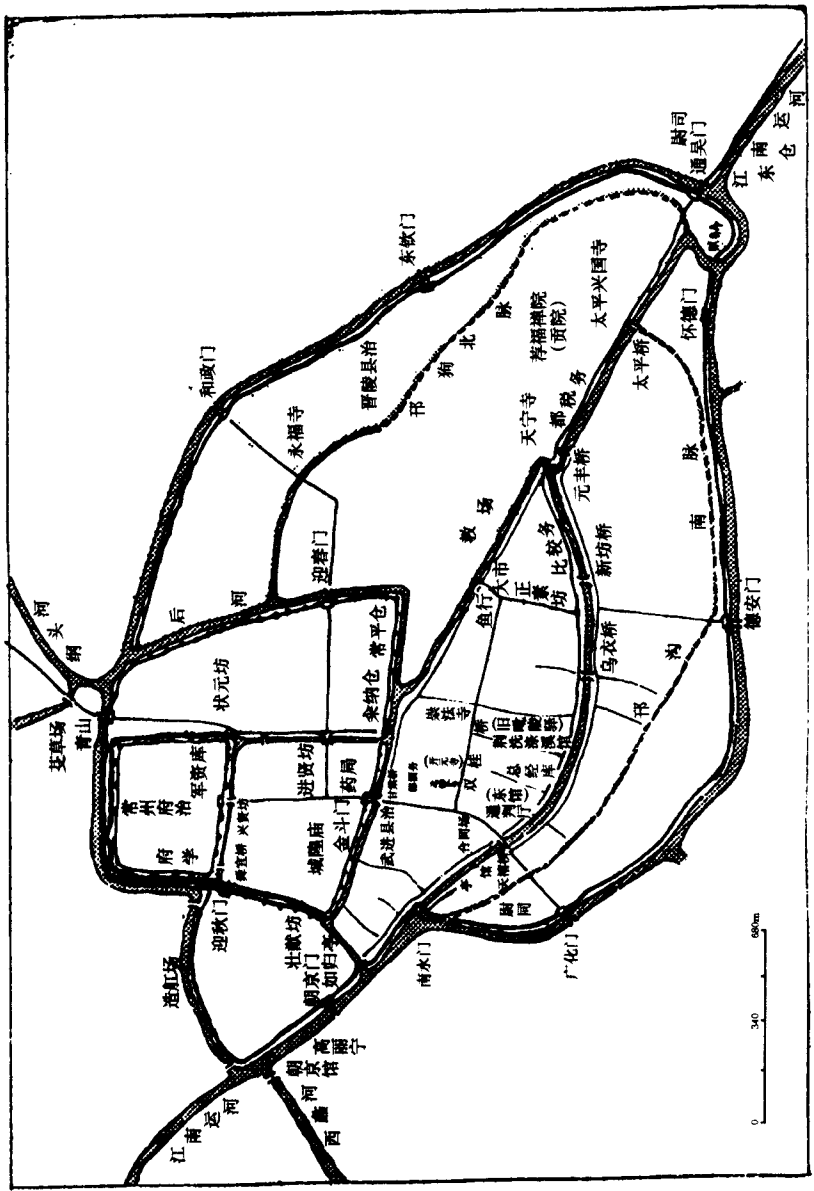
唐朝常州城位于今常州市西北东西横街与北直街围成的地段,市体育场就是当年的州治,唐末毁于兵乱。昭宗景福元年(892年),淮南节度使杨行密遣唐彦随权领常州时重修,周回二里三百一十八步。^[63]运河在城南一里许,这座城的轮廓和建筑布局基本上仍保持着衙署居中、规整的四方形,可能还是受着唐前期坊市制度的影响。北宋常州衙署亦治此城,俗称“内子城”。

据《咸淳毗陵志》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常州城曾有过两次增筑。第一次在杨吴顺义年间(921—927年),刺史张伯棕倚内子城向东、南两个方向展拓,筑砖垣周回七里三十步,高二丈八尺,厚二丈,城外开壕。开四门:东“迎春”(今局前街与市河相交处)、南“金斗”(今北大街南口)、西“迎秋”(今邮电路中段)、北“北极”(今北直街北口),宋代称“外子城”,俗号“金斗城”。外子城平面轮廓仍略呈方形,四门虽不正对,但城内街道平直规整,其面积比内子城扩大了三倍,城南已与江南运河故道相邻。^[64]此后,常州附近一度不宁,“江盗旁舞,民不奠居”,远近百姓为求庇护纷纷“徙附郡城”,在外子城东南及运河北岸择地而居,使外子城、城外民宅和江南运河渐渐连为一体。杨吴天祚二年(936年),刺史徐景迈再次展拓常州城垣,索性夹运河而筑。城垣周回二十七里三十七步,高二丈,开九门:东曰“通吴”(今水门桥西),次东曰“怀德”(今温家村南);南曰“德安”(今德安桥北),次南曰“广化”(今广化桥北);西南曰“南水[门]”(今西下塘北口),西曰“朝京”(今怀德桥北);北曰“青山”(今青山桥南),次北曰“和政”(今新丰桥南),东北曰“东钦”(今小东门桥西);外仍有壕。这座大城宋代称“罗城”,面积比外子城又扩大了五倍。两宋常州城“仍其旧制”,未有增损,置州衙于内子城,而把副长官“通判”的治所放在外子城与运河之间、天禧桥北的东馆;晋陵县衙在外子城东,武进县衙在金斗门外街西,二县以新坊桥为界,分管东西。虽然常州城的两次展拓并不在宋代,但是两宋时期对常州城内水道、建筑、街坊皆有改作,明代只是内缩东、南、西三面城垣,所以城市发展建设最具代表的格局应该是宋代完成的。

宋代常州城平面呈不规则的纺锤型,城垣曲屈,城中部宽阔,南北间距近五华里,城东西两端狭长,间距不足一里。江南运河由朝京门经天

禧、新坊、元丰、太平诸桥至通吴门，呈弧形横亘城中，但是运河并没有平均分割城市为二部分，运河北岸的建筑面积比南岸大得多，反映了常州市发展依托旧城和江南运河逐次外展的时空序列。内、外子城集中了代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军事、行政职能的大部分建筑群落，例如：州衙、州学、军资库、城隍庙等；凡存储准备上交中央朝廷的粮草赋税的余纳仓、总经库多集中在外子城南，并“于仓后浚河以便漕”；各级主管专卖的场务和接待四方行旅的驿馆则集中排列在子城外天禧桥至新坊桥之间的运河北岸，临水建屋，如：合同场在天禧桥西，都酒务在金斗门外街东，都税务在元丰桥东，比较务在新坊桥北，荆溪馆（旧毗陵驿）在天禧桥东，行衙亭、使星亭、弭节亭依次排列在荆溪馆西侧，白云亭在天禧桥西，相当于今天常州市由麻巷、青果巷至西运里一带。宋代农、手工业都有较大发展，城市经济日趋繁荣，常州的绢丝织业尤其发达，“晋陵绢”曾名噪一时，城内外出现了许多官营手工业作坊。解放后在新坊桥附近发现了宋代作坊遗址，据而推测当时手工业作坊区不会远离运河。伴随着城市繁荣，宋代常州也是人文荟萃之地，苏东坡、王安石等都在城内留有足迹，一些坊巷也因文人居处而得名。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一科300名进士，常州竟得53名，来常的文人相宅卜居因外子城内已无隙地可觅，遂愿选择外子城南至运河之间的地段，如：以宋维、宋绛和丁宝臣、丁宗臣两对兄弟同登进士而命名的双桂坊；以及因文人宅第命名的正素、壮猷、世贤诸坊巷皆在这一带，使外子城南与弧形运河之间渐渐发展成常州城的商业重心区和官绅住宅区。所以，专主户籍、钱谷、赋役之责的通判衙署也设在这块区域内就毫不奇怪了。宋代常州城内共二十多个坊区，大部分集中在运河北岸，南岸仅定安、椿桂等四、五个坊区，其余为教场、尉司所占。据《毗陵志》载，运河以南原本荒地农乡，宋室南渡后，迁入常州城的人户渐多，遂改乡为坊。运河两岸的坊巷以沿河走向的横巷和伸向运河的短巷为主，自由排列，间隔不一，显然是城市建筑用地膨胀所致，没有预先经过规划。

宋代常州城内水系比较复杂，《毗陵志》载城内旧有二条水沟，皆称“邗沟”：“一自太平桥（太平寺——今文笔塔门外，跨江南运河）西环绕城南，首尾俱枕运河，为南脉。一自通吴门内，南枕运河，沿关城（宋罗城）历太平寺后，出晋陵县治前（今小东门路西段北侧），入新巷永福寺南，汇归斜桥，至虹霓桥后（今中山路中段），与后河合流，为北脉。南脉仅有流通，北脉多堙塞。”（见图11）目前由于一些地名、位置尚待考定，还不能确切



判断“邗沟南、北脉”出现的时代以及是否为人工渠道。明初,洪武二年(1369年)守将汤和因常州罗城地大难守而收缩东、西、南三面改筑新城,可能就是以“邗沟南、北脉”分别作为南、东城垣的护城壕。宋代为了便利城内联系还曾开挖了两条新河(与其说“新河”,不如说重新疏浚内外子城壕和江南运河旧道),其一曰惠明河,由南水门引西蠡河、荆溪之水入城,北流入外子城,经舜宜桥(今邮电路中段)沿内子城南垣东流,入化洞河,又南与后河合流,复东流入运河。此河位置即今常州市东、西横街路南与化龙巷、小河沿街西侧。其二曰后河,俗称“市河”,亦自南水门入城,与惠明河分流,环外子城,经金斗桥(一名甘棠桥,今市中心十字)穿都市,复与惠明河合,东流入运。此河系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年)李余庆所开。这两条河利用内、外子城原城壕而与江南运河联通,不仅使内子城州府官署区的对外联系更加便利,而且使外子城仓库区、旧民坊同运河两岸新的商业、手工业区和新民坊区连成一体,并在外子城南的市河一带形成常州城最繁华的市场商业街。解放后上述几条河流相继改作马路,今东大街北侧路面明显低于两侧二米多,仍能看出这就是“市河”旧迹,其南侧皆前后门相通的商业店铺,繁荣程度仍不减当年。

唐宋常州城的繁荣演进是五代至南宋江南地区相对安定,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的结果。内子城是宋以前地方行政职能中心,也是常州城市最早起源的地段,五代至两宋三百多年间城市发展始终以内子城为依托,以外子城南和运河河畔的旧毗陵驿——宋代荆溪馆为核心,沿运河走向逐渐向两翼伸展,府治南面的直街经金斗门(明清建有鼓楼)至天禧桥与运河构成城市发展的十字型骨架,愈接近十字型骨架的核心,城市南北距离愈宽;愈远离,南北间距愈短,因此才形成了纺锤形。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在江南水乡,能通航的河流对城市发展的刺激是多么的强烈。宋朝曾把常州的部分官署机构迁出外子城,借用城南与运河之间地段的一部分寺庙亭馆权充办公之地。如:晋陵县治借寺庙办公,通判西厅占用东馆,法济寺改作县学等等。待这一地域建筑过于拥挤,城市的某些职能机构只好沿运河再向外寻找便利地点安置,于是有名的荐福禅院(今红梅阁所在地)改作贡院。即便如此,仍不敷用,宋代常州的建筑区遂突破罗城城垣的限制,在朝京、通吴门外夹运河绵延二、三里分别安置晋陵、武进二县县级馆、驿、税务、场所,形成新的市街和民坊区,例如大市、密务皆在通吴门外。解放后在水门桥以东的运河北岸发现了许多宋井,迄今此地还

沿用“水门桥”、“东仓桥”等地名,考虑到明代常州城垣内缩后,这里已离城较远,那些地名定不会是明代所起,而是宋代地名之遗存。城西的朝京门外,有著名的高丽亭(门外一里),北宋时专为接待高丽使臣,南宋重修,易名为朝京馆。由于西蠡河自朝京门外分枝,一入溇湖通宜兴,另一支入太湖通长兴、湖州,馆穀水陆,居停的匠户、商人较多,则逐渐形成新的手工业作坊和店铺聚集区,明清时期尤以生产“宫梳名篦”闻名,并以匠户行业名巷。城北的青山门外则因有利港东北通江阴入长江,慢慢地也形成市廛。宋代常州城内外的发展趋势和建筑格局不但为以后的明清两代所继承,而且也影响着今天常州市的城市规划。

无锡城市演进的时空序列与常州很相似。早期城址不在今无锡市区内,而是位于古历山(今惠山)的东北麓,即“范蠡城”和“黄城”。^[65]春秋时期,古历山北麓曾是西去阖闾城(今无锡市西南胥江口),进而浮桐汭西通荆楚的“吴古陵道”(陆路交通线)^[66];历山脚下的梁溪则是被穿行于古杨湖和巢湖之间的“吴古故水道”所利用的一段天然河流。范蠡城和黄城选择较高的山麓地带,反映江南地区早期城市比较注意躲避水患及单纯军事控守功能。至秦统一而设置无锡县时,江南运道已经过改造,不再循吴故水道曲折穿湖,而是由丹徒、曲阿、延陵直下会稽郡(今苏州),无锡县城若仍在历山北麓则不便于控制,于是秦朝无锡县将城址选择在梁溪的东岸,位置大约在今无锡市人民会堂一带。秦汉无锡县城范围究竟多大?《越绝书》卷二“吴地传”第三载:“无锡城,周二里十九步,高二丈七尺,门一楼四。其郭周十一里百二十八步,墙一丈七尺,门皆有屋。”由于缺乏考古发掘资料,尚难以界定。但此城址一直被六朝、隋、唐无锡县沿用。

根据文献所记无锡城内几座始建于隋唐之际的桥梁^[67]:“通济桥”,又称“利津桥”,隋大业八年(612年)始建,跨江南运河(今无锡市内中山路),宋代改称“大市桥”,位置在今东大街东口;“梁溪桥”,隋大业中建,跨梁溪,在西门外,宋人又称“西门桥”,位置在今人民桥南;“东桥”,唐咸亨二年(671年)建,运河西,与崇安寺(今公园路崇安菜场)相望,宋人又称“胡桥”、“沈桥”,位置在沈果巷北口;“风光桥”,唐武德七年(624年)与风光寺同建,运河东,跨第六箭河(今崇宁路),位置在今崇宁路西口;“新桥”,唐武德中(618—626年)凿运河时建,跨运河,宋人称“南市桥”,位置在今南市桥巷东口;“将军堰桥”,《风土记》云:唐景龙三年(709年)置堰,堰旁有梁萧将军墓,遂名,宋嘉祐中(1056—1063年)开运河通梁溪,取太

湖水,堰遂废,位置约在今学前街与健康路口;“斜桥”,唐咸亨二年(671年)建,跨第六箭河,宋崇宁间重建,亦名“崇宁桥”,位置在今崇宁路与新生路相交汇处;“莲蓉桥”,唐贞观三年(629年)建,有闸,以湖故名,今北塘街东口。其余诸桥皆唐代以后所建,据此可以推拟出唐无锡县城的规模:东临江南运河(今中山路),西界梁溪,北以胡桥河(今公园路)为城壕,南以将军堰所在之束带河(今学前街)为南城壕,周回约4里。县治位于城北,亦有城壕环绕,即今石皮路和人民中路两段之间,形成子城。子城南有一条直街(今健康路)直抵南门将军堰桥,并与县衙前的东、西横街构成丁字型骨架,这是以后无锡城市演进的核心区,同前文所述唐代常州内、外子城的形制很相似(图12)。从江南运河故道——今中山路中有一段折曲分析,唐代可能对无锡城下的一段运河进行过改造,改线的运河走向一直影响到后世。^[68]运河东岸旧有九条支汊,也就是《咸淳毗陵志》记载的“九箭河”,多半用来宣泄运河河水。无锡建造年代最早的寺庙——崇安寺,创于东晋兴宁二年(364年),始名“兴宁寺”,虽在唐无锡县城外的运河东岸,但寺庙附近可能已有不少人户落居,并沿九箭河向东南延伸,不然不会修风光桥和斜桥。

北宋乾兴元年(1022年)县令李晋卿曾依前代旧址重修无锡县子城“东接运河,西距梁溪”,衙前建谯楼作击鼓报时之用。^[69]据《咸淳毗陵志》记载,宋无锡城尚有罗城,“门关有四:东熙春,经胶山(通常熟,位置在今人民中路东口);南朝京,经平江(通苏州,今解放南路体育场桥北);西梁溪,经惠山(通宜兴,今西门);北莲蓉,经郡城(通常州,今解放北路与中山路交口)。罗城何时兴筑,于史无证,但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乘船溯运河北上,途次无锡时曾记载:“……常州无锡县宿,广大县也,宛如州作法。”^[70]也就是说,至少在北宋中叶,无锡县城规模已非如唐县城4里之围,而与州府相当。《宋会要辑稿》食货十五所列熙宁十年(1077年)无锡商税额已逾万贯,人口已逾万户,在东南诸路中委实不同于一般县城了。然,根据无锡罗城南门称“朝京”,未录旧称,意味着此门命于以杭州为临时京师的南宋时期。还有一点是:南宋中叶,镇江至丹阳段江南运河夹岗水涩,京口闸上下河道浅塞,积船严重,诏纲船改自江阴军宽转,由五泻堰(今无锡市北郊高桥)入运河,无锡县的转般仓储功能大大加强,也必然会刺激城市建筑面积的扩大。^[71]因此,可以推想北宋时无锡县城附近的各类建筑占地面积已很大,而罗城的拓筑可能最终完成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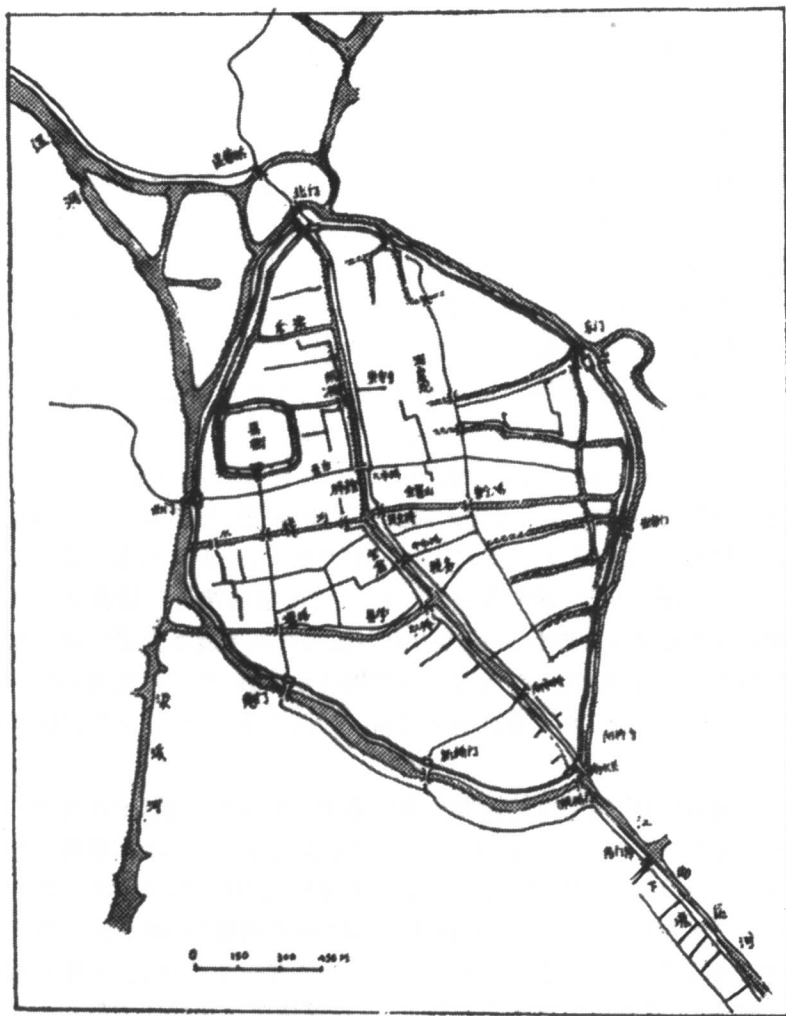


图 12 宋无锡县城图

南宋。其四隅即今解放路围成的纺锤形轮廓内，周回大约 12 里。江南运河纵贯其间，南水关在今朝阳桥北，北水关在今胜利门。宋代俗称罗城半圆形东城壕为“弓河”，以运河比之弓弦，九条泄水沟比之箭也。

宋代为接济江南运河水量，废掉了唐无锡县城西南隅束带河（今学前街）“将军堰桥”下的原有堰坝，并在县衙所在的子城南北相继开凿“斥渎”

(今西河头巷)和“水碓河”(今后西溪街),皆引梁溪水贯城而东入运河,分别与运河东岸的第九、第六箭河相对。宋代还在城内河汊上架桥近20座,通过崇宁桥及南北街与第六箭河在运河东岸形成新的城市主干骨架,桥路与城内河道组成的无锡城内街巷网络相沿至今而未改。宋代无锡城内曾形成了三个交易市场:一在县治南横街东口,运河通济桥下,称大市,故此桥又称“大市桥”;一在城东南隅运河新桥下,称南市,桥亦易名为“南市桥”;一在官仓“三登仓”(今北禅寺巷东段路北)东侧运河仓桥下,此桥遂易名为“中市桥”。鉴于无锡新罗城三座正门偏于城西、城北,东南隅市民进出城不便,宋代还在东南城垣新开辟了三座偏门:顾桥门(今朝阳广场),通运河下塘;新桥门(今南市桥巷西口),东接南市桥,南联朝京门外去平江府的驿路;董家门(今东河头巷口),通南禅寺前,专为便利城内民户进香。过去有人误以为此三偏门之设专为对付吴越钱氏,实不了解无锡城市演进时空之故也。宋代无锡县的官仓、税务、驿馆及三个市场都位于城内江南运河岸侧,是在运河水运机制刺激下,城市非军事行政机构寻求交通便利地带,寻求人流集中地段而配置的结果。这种区位规律必然导致无锡城市建筑区以运河为中心轴向两极伸展而形成纺锤型城市平面形态。而且,随着江南运河水运作用持续不衰,城市建筑也必将会突破城垣的限制,这已为明清时期北塘和下塘两个手工业、商业街区的繁荣所证实。

无锡、常州两座城市纺锤形平面形态的出现反映了唐、宋江南运河沿岸城市发展的时空规律。由于这段运河开凿较早,沿河已经形成一些城市聚落,后世城市建筑区的膨胀既受到水运机制的推动,又受到中国封建社会城市作为地方军事行政中心这一传统功能的限制,即一定要依托前期城市固有的位置。因此,在城市形态上,多有一个子城,其为唐代或更早时期所建,受严格的市坊制度约束,一直保持较规整的四方形和十字相交的街道格局;还有一个较大的罗城,系五代以后所建,此时市坊制已解体,人口膨胀,市廛繁荣,被展拓的新罗城服从运河沿岸城市物资集散、运输、交易功能的需要自然伸展,呈现出不偏规矩的特点。一般地讲,五代十国以前城市尚不夹运河而筑,两宋时期始然,亦反映运河城市职能于此时开始发生部分转换,明代因城内运河河道过狭,往往在城外另辟新道,于是城内运河旧道则慢慢地演化成商业街。

五 浙东运河及其沿线城市

浙东运河西起浙江萧山县西兴镇钱塘江南岸,东至上虞县丰惠镇通明坝与姚江相接,现存有关浙东运河的最早记载是《越绝书》,其记曰:“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县五十里。”按其方位里程,大致从今绍兴城东至曹娥江。据近人研究,《越绝书》成于东汉之际,所记皆春秋越国历史,可以推测这条水道之首凿当不会与公元前490年越王勾践于今绍兴城所在地兴筑大、小城的时代相去过远。否则何以实现越王和范蠡君臣讨论都城选址提出的“不处平易之都、四达之地,焉将立霸主之业”的条件呢?^[72]东汉永和五年(140年),鉴湖湖堤修成后,这条运河承载舟楫的必要水位更有了保证。至西晋末年,在贺循主持下,将原有的水道疏浚连通,并向西延伸至钱塘江畔著名的渡口西陵(今萧山西兴镇),筑西陵埭,借牛牵挽船只盘驳过堰,使钱塘江和曹娥江之间的这段浙东运河逐渐成形。^[73]不过东晋南朝至唐朝中叶,这条人工水道的功能主要是用以溉田而兼作航运。直至宪宗元和七年(815年)越州观察使孟简在越州府城西北二里开“新河”并主持修造便于船夫拉纤和船只停泊的百里“运道塘”^[74],浙东运河的航运职能才较前代大为增强。曹娥江以东与姚江相接的那一段运河可能也在此前不久凿通,从上虞县城址的并废复置与城址转移略可看出端倪,下文将作说明。当然,浙东运河真正充分发挥其水上运输效益的时代是在两宋。因为宋代明州(今宁波)作为海外来华船只的主要锚地之一,海商使臣多愿“浮杭达吴”,“由两溯汴至都下”(指北宋都城开封);特别是宋室南渡,偏安于东南半壁江山之际,以行在临安为都,先后裁撤杭州、江阴、温州和秀州青龙镇的市舶务,“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即只保留庆元府(今宁波)作为两浙路唯一可以接纳海舶的对外口岸,^[75]浙东运河成为维系国都与对外口岸之间最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加之这个时期钱塘江口水阔二百余里,且多沙洲,“海商船舶畏避沙滩,不由大江(指钱塘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76]。促使南宋对浙东运河的依赖更为加强。文献记载自南宋高宗绍兴年起,就不断调发士卒开濬浙东运河河身、夹塘,撤除或改造运河与自然河流交汇处的原有堰坝,以改善通航条件。^[77]使浙东运河犹如北宋之汴河“舳舻相衔”,“物货丰衍”,“越商海贾,朝盈夕充”。随着浙东运河人员往来和物资

交易繁夥,也给沿岸城市带来了发展的机会。

唐宋时期,浙东运河沿线最主要的城市是:绍兴、萧山和上虞,它们都是萧绍平原起源最早、历史最久的城市。按照一些学者研究历史时期萧绍平原城市聚落形成与发展按地域类型而划分的演进序列,这三座城市都起源于第三阶段:“孤丘聚落类型”⁽⁷⁸⁾,即早期城都址选择依托一座高约百米的山丘,周围是沼泽平原,如:绍兴与种山、萧山与萧山、上虞与龙山。这个推论对大部分浙东平原上的城市聚落是适用的。不过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一旦孤丘类型城市的选址固定,其后的城市发展除与周围农田水利的建设、土地的开发、人口集聚的程度有密切的关系,还受到历史时期交通运输方式和区位的制约,具体讲,就是浙东运河的选线和盛衰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事例是上虞县城址的转移和绍兴城市内部的功能分化。

上虞县城自秦代开始置县至唐朝中叶,历时千载(其间曾一度省入会稽),城址一直在今曹娥江东岸的百官镇。此城址的起源,除符合浙东地区定居农业由山麓冲积扇地带向北部沼泽平原发展时要以孤丘为立足点而建立聚落的选址理论外,可能还和古越人的原始盐场及历史上横渡曹娥江东去的古渡口有关。即由百官镇向东,沿龙山山脉北麓,经五夫驿至余姚县顺姚江东下,曾是一条古驿道,秦汉时期在浙东地区最早设置的上虞、余姚、句章三县皆沿此道一字排开。但是当连接曹娥江与余姚江的浙东运河东段修成并承担浙东地区大部分人员、物资的运输以后,上虞县原有的交通区位优势因这段运河的西端不以百官镇为起点而动摇。百官镇以南二十余华里,龙山南麓是曹娥、余姚二条天然河流之间最为接近、而且又恰好是四明山尾丘陵的下伏地段,高差起伏不大,便于开凿连通两条天然河流的运河,并能借助两侧丘陵集汇山间溪水,以保持运河水量。当然,这里的地势终究要比曹娥、余姚江水面高一些,运河只有依靠修筑堰坝来保持水量,借牛盘挽,船只方能越堰而入运河。这东西二端堰坝的位置,一个在今丰惠镇东通明乡,另一个在百官镇南梁湖乡。案:此通明、梁湖二堰名最早见于北宋人的记载,而筑堰当早于宋代。为了疏浚运河、管理堰坝、控制人员物资的往来,就需要在靠近运河的适当地点选建一座城市作为行政职能中心。显然,今天的丰惠镇所在地最为适宜。其地东距通明堰 1.5 公里,西北至梁湖堰 10 公里;南北两面是丘陵,溪水丰富,便于汇集;中间是宽 5 公里的低洼平原,与余姚江水面的相对高差仅及 3

米。所以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复置一度废并的上虞县时,就不再选择原来的县址百官镇,而迁治于今天的丰惠镇所在地。考其时代刚好在越州观察使孟简修治浙东运道塘之前不久,故能反推这段运河的始凿年代。^[79]上虞县以丰惠镇为治所大约经历了1100多年,至1954年,上虞县治才从丰惠镇又迁回曹娥江边的故址——百官镇。这次县治转移的原因是由于浙东运河历元、明、清三代,部分河段已经淤塞变狭,运力大减,而随着萧甬铁路的修通,其与宁(波)杭(州)公路同在百官镇跨过曹娥江经五夫驿、余姚县古驿道线路往来,铁路和公路的运力大大超过浙东运河水运的承载力,使丰惠镇的交通区位较之百官镇又已大为失色,故只好让位。上虞县治在百官、丰惠二城镇之间的迁徙和复归,正反映了浙东运河沿线城市的选址、盛衰与历史时期浙东地区的交通运输方式和区位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相类似的情况还见于浙东运河西段萧山县、西兴镇以及渔浦镇的盛衰史,所不同的是:在那里,钱塘江与浦阳江河道的历史变迁是影响交通区位、运河及其城镇演化的主要机制。

两宋时期浙东运河的繁忙激发了沿河城镇的物资交流和人口的集聚,从而影响了运河沿线城市功能分区和城市形态的发展演化。以绍兴城市为例,其城市雏形早在越王勾践建都时已奠定,有“小城”和“大城”之别。小城在种山(今绍兴府山)东南麓,后世一向沿用作州府衙署的治所,或称子城;大城实即外廓,其范围大致在今绍兴市府山与五云门、东门之间,投醪河以北,月池坊以南的地段内。^[80]宋代以前,越州城的主要建筑,如会稽、山阴两县治所,州、县学、寺庙及大部分官绅宅邸都集中在种山东南的外部(又称罗城)之内,仅有的一座市场也位于罗城东南隅:“古废市在都亭桥南礼逊坊”,即今东部门内都昌坊路西口。^[81]因为那个时期经过越州的船只只需要穿行城内,由东郭门水门进出;加之城南飞来山(今塔山)附近地势高燥,适于安置官绅阶层的私人宅院,故整个城市偏于府山东南。入宋以来,浙东运河对绍兴城市的影响是使城市建筑的分布扩展到府山东北方向,并沿运河向西北方延伸,导致城市形态出现城南半部以集中官衙、官学、官绅宅舍和部分寺观为主,城北半部以分布仓场、库务、馆驿、客邸、市场为主的功能分异。这是由于绍兴城南的鉴湖渐渐堙废放垦,湖内外原有水位差消失,位于城市东北隅的都赐堰已无存在必要而被撤除,致使大多数运河舟船不必再绕行城内而由城北运河直驶。于是很大一部分仓场库务集中在城北便于搬转的运河两岸。如支盐仓在府衙东

二里,运河长桥东侧;加坻仓在府衙东北一里;受纳糯米仓、场在西门外;激赏库在府衙东二里许;都税务在府衙东一里;回易库、醋库、造袋局、抽解竹木场等亦尽在府衙东北。随着城北运河沿线往来驻停人员的增多,许多便于使臣行旅居处的馆驿客邸也纷纷选择城北合适的地点兴建起来。《嘉泰会稽志》记载:“府城蓬莱馆,卧龙山左,东向津亭,北通川亭,皆临府东大河,舟车既届,必次舍。……城西迎恩门,东五云门皆有亭。”卧龙山即今府山。又“斜桥,在城东北,其下多客邸,四明舟楫往来所集”。旧时会稽东南诸州县来绍兴府参加贡举考试向无定处,南宋中叶于府治西北、卧龙山之阴的锦鳞坊修建贡院(明清改作养济院、豫仓,即近世大通学堂旧址),前后临河,也是困贡生往来之便。在这种情势下,作为物资交易买卖的场所——市场若仍然偏处城南都亭桥畔则甚显不便,宋代遂废弃自汉唐以来一直在都亭桥南的越州大市,将市场移向城北半区,数目亦从一个增加到七个。^[82]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日僧成寻由杭州去天台国清寺参拜而途次越州,其日记记载由迎恩门入城,自都泗门出城,未经行城南,而运河两岸皆有市场交易^[83],说明绍兴城内市场的新辟与商业中心的转移在北宋前期就开始了。绍兴城商业中心的定型,大致完成于南宋中叶,是以府河上的清道桥南、北市为核心,沿府河东西两侧形成最为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在其东侧的开元寺竟演变成灯市,繁华程度可与成都药市相配。^[84]这条商业街北与运河两岸的市场相接,向南则直指南门,从而框定了后世绍兴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明清以降,府县衙门、官僚士绅的台门院落仍愿择府山以南、塔山一带的高燥地区,形成官绅住宅功能区;而城北商肆酒楼棋布,多锡箔手工业作坊及平民住宅,成为商贸经济功能区;二者对比强烈。

至于萧山、上虞二县,城市功能以监控运河闸堰、转输及收取商税为主,较为单一,所以城市简陋,各自城垣周长仅1里许。建筑区段狭长,县衙、仓、场、监、税、务等职能机构与寺观、民舍基本上沿运河一字排列,纵深很短,市场集中在运河桥畔,形成一街一河的城市形态。只是到了明清时期,由于萧山向南经临浦去浙南金华的驿路逐渐成为常途,萧山县城市建筑区段才逐渐向运河以南的驿路两侧扩张,使城市轮廓有所改变。而丰惠镇没有交通区位的变化,所以上虞县的城市形态直到本世纪初仍无多大改观。

结 语

通过上述若干城市选址与形态的分析,可以对唐宋运河城市归纳出如下几点看法:

1. 唐宋运河城市的选址一般受两种因素的影响。(1) 区位因素,即城址与运河桥、渡、闸、堰的位置关系甚密;(2) 距离因素,即城镇的分布受运河船只每日航程的制约。这将导致运河城市在区域中的等级分化。

2. 唐宋时期运河交通的发达对周围地区城市极富吸引力,往往导致原有城市发生向运河岸侧的城址转移。

3. 北宋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的改道和泛滥不但破坏了该地区原有的运河系统,也打断了这个地区运河城市正常的发展进程。

4. 唐宋运河城市受交通和物资集散功能的刺激,最先突破封闭的市坊制度的束缚,所以宋代城垣长度多超过唐代。其形态可分为二类:(1) 以旧州县城为依托,城市形态多呈不规则形状或纺锤形,曾受市坊制约的旧城街区与自然发展未受规划的新街区对比强烈。(2) 随运河开通而新兴的城市,多为以运河为长轴的狭长带状形态。

5. 唐宋运河城市多以运河桥市为中心,形成沿河商业街。

6. 明清运河城市形态和内部结构的功能分区很大程度上受到唐宋运河城市格局的制约。但城市建筑面积不如前者,城垣往往内缩。

7. 由于运河城市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商业和运输功能,因此城市形态所反映的在城市规划上习惯采用的象征主义传统并不浓厚。

8. 近半个世纪以来被国内外许多学者逐渐认同的一个推论——九至十三世纪是中华帝国史上的“城市革命期”,似乎还不能仅仅用运河城市来验证,宋代城市发展的普遍性模式还需要不同地域之间的分析比较。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斯波义信先生曾经指出:关于中国城市史的研究,通常总是以长安、洛阳或北京之类都城的模式,千篇一律地概括中国的城市,因此很难作出一般的和正规的城市论、城市形态论或城市生态论之类的研究。只有通过诸多个别城市的研究和比较,找出普遍性与特殊性,才能提炼出有关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正确论述。本篇拙文正是受到这一思想为启迪而有所发。如果对于中国城市发展史的研究和当前运河城市的规划建设有几分补益,于愿足矣。

(原载《环境变迁研究》1993年第4辑,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

注 释

- [1] 永济渠(御河)流经线路,参见严耕望:《隋唐永济渠考》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北区,1986年;黄盛璋《永济渠考》,刊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编辑《地理集刊》第18号,科学出版社,1987年。
- [2] 《通典》卷一八〇州郡典:魏州,《旧唐书·玄宗纪》、《新唐书·地理志》、《太平寰宇记》略异,参严耕望先生考核酌定。
- [3] 《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德宗建中三年六月辛巳条考异。
- [4] 《全唐文》卷五一四,殷亮撰颜鲁公行状所记李粤语;又见《资治通鉴》217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三月壬午条。
- [5] 《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
- [6] (宋)王瓚《北道刊误志》,收《守山阁丛书》本《续谈助》卷二。参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明镐讨贝州条云“贝州城南临御河。”
- [7] 《资治通鉴》卷二五八昭宗大顺二年春正月丙辰条。
- [8] 《资治通鉴》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十二月壬申条。
- [9] 《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兴元元年正月丁丑条。
- [10] 《元和郡县志》卷一六贝州永济县,《太平寰宇记》卷五四魏州永济县。
- [11] 《元和郡县志》卷一六贝州临清县。参《资治通鉴》卷二六九梁贞明元年(915年)七月刘邵语。严耕望先生《河北平原南北交通两道》已作考证,可惜将唐宋临清县址误指为“今县南八里”。今临清县城实为明洪武二年(1369年)所建,县南八里之旧城系金、元临清县址,原北宋曹仁镇旧治。
- [12] 《太平寰宇记》卷五八贝州武城县及《资治通鉴》卷二二九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正月丙戌条。
- [13] 《嘉靖武城县志》(天一阁本)。沈括《梦溪笔谈》21异事曾记载熙宁九年(1076年)武城县因遭龙卷风摧毁而迁移,城址俟考。北宋大观(1107—1110年)以后城址一直未动,即今旧城关镇,1973年因拓宽卫河,始东迁今县址。今县城为唐宋历亭县故址。
- [14] 《元和郡志》卷一七德州长河县,《旧唐书·地理志》德州长河县。《元和志》所记应指移就白桥前之故长河县地,已移就白桥,必邻近永济渠,何言“去县十里”?
- [15] 《五代会要》卷二十德州:“晋天福五年十一月移就长河县为理所。”《宋史·地理志》永静军将陵县:“景祐元年,移治于长河镇。”
- [16] 《旧唐书·地理志》景州安陵县,“柏社”作“白社”;《太平寰宇记》64德州安陵县。

- [17] 《太平寰宇记》卷六八定远军东光县。事见《资治通鉴》240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三月戊寅条；卷二六八后梁乾化三年五月壬子条。
- [18] 《旧唐书·乐彦祯传》：“(彦祯)板筑罗城，约河门旧堤，周八十里。”“约”屈曲状，即以河堤为城垣外壕，“八十里”似不确。
- [19] 康熙十七年卢士杰纂修《清河县志》卷五：“旧有土城，周九里，高二丈，阔二丈，壕泥平浅。宋元祐六年监官赵荐之修，岁久崩圯。明正德七年同知何公宗伊、知县张公一鹏奉命改建，今城仍旧城东南隅，周三里……”。
- [20] (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虹县，“有大桥，即出船”。
 灵璧镇，“大桥下宿”。案：原书作“史头县”，从前后行程推考，当指灵璧，时尚未升县。
 柳子镇，“有大桥”。
 永城县，“从大船[桥]下拽船，桥无柱，以大材木交上，以铁结留。宿州以后皆如是”。案：成寻描述的这种汴河桥就是张泽端《清明上河图》所绘的大跨度拱桥，便于行船，照此记载，宿州至开封之间的汴河桥皆为高跨度拱桥。
 鄆阳镇，“有大石桥，鄆阳市桥。过三百步又有大桥”。
 南京会亭镇，“停船，有大桥”，案：原书作“南京迎应亭”，疑即会亭镇。
 宋州谷熟县，“从大桥下过行”。
 南京应天府，“至南京大桥南停船宿……大桥上并店家灯炉火千万也，伎乐之声遥闻之”。“辰时拽船从桥下过店家，买卖不可记尽。经二里至次大桥外停船”。
 宁陵县，“有大桥，河边有宁陵县驿”。
 襄邑县，“有大桥，广大县也，卖买店家繁昌”。
 雍丘县，“至东京汴州雍丘县停船，有大桥”。
 陈留县，“至东京陈留县宿，有大桥”。以下东京开封府诸桥从略，此材料载《大日本佛教全书》第 115 册游方传。
- [21] 《元和郡县志》卷九宿州。
- [22]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九年十月壬申条。
- [23] 《苏东坡全集》卷三五元祐七年乞罢宿州修城状。
- [24] 楼钥《北行日记》上，见四库本《攻媿集》。
- [25] 据嘉靖《宿州志》、万历二十四年《宿州志》和康熙《宿州志》，州治及扶下亭位于城西北隅，迄今未改。楼钥所记“驿舍邻郡治”，即在州治东侧，明清仍为馆驿。
- [26] 《史记·项羽本纪》。
- [27] 今灵璧县城北仍有一片基岩出露的山岗，当地人称馍馍山，县工业局开设了一个大理石厂。
- [28] 《宋会要辑稿》方域十二之 18：宋哲宗元祐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前婺州司户参军靳琮等状。并参《苏东坡全集·奏议》卷十二：乞罢宿州修城状；《宋会要辑稿》

食货十七熙宁十年商税条。

- [29] 《析津志辑佚》天下站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26页。
- [30] 《宋史·李显忠传》。
- [31] 《宋史·毕再遇传》。
- [32] 《元和郡县志》卷七亳州永城县:“隋大业六年,于马甫城东北三里,割彭城睢阳置县,遂名永城,属谯郡。武德五年,移于马甫城,属谯州,即今理是也。”据1981年永城县文管会编写的《永城县文物简介》,故城位置在今县东北35里陈集乡刘寨,隋城系依汉芒县旧址,今地面尚存东北城角,高于地表0.5米。《元和志》所记“三里”似脱“十”字之误。今县城东北隅保存着一座北宋绍圣年间(1095—1099年)始建的崇法寺砖塔,其铭文云建于唐永城县东北隅唐寺旧基,故推断永城县自从唐初移来,迄今未改。
- [33] 参《元和郡县志》卷九宿州虹县;光绪十四年(1888年)方瑞兰等纂《泗虹合志》。1980年,泗县县委翻修旧屋,于墙内发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泗州知州张佩芳撰写的《移泗州治记》石碑一通,详述泗州移治虹县之原委经过。
- [34] 《元和郡县志》卷九,参《新·旧唐书·齐瀚传》。
- [35] 《宋史·河渠志》汴河。当年日僧成寻自泗州溯汴而上,也提到泗州至青阳驿(今泗洪县)之间“河极驶流,黄浊难饮……终日牵船”。盖因泗县与泗洪之间砂砾缓岗所致。宋金隔淮分治以后,金人一度于灵璧县潼郡镇(俟考)设仓官,开长直沟,由万安湖(今泗县南天井湖)舟运入汴至泗。可能也是为了避开泗县东南的岗地。
- [36] 《泗虹合志》,方瑞兰纂修,光绪十四年(1888年)刊刻本。
- [37] 《新唐书·食货志》及李吉甫传。平津堰的位置大约在今高邮县南部伯湖东岸,系淮南运河筑堤之始。
- [38] 北宋景德中(1004—1007年)江淮发运使李溥因高邮军新开湖水散漫多风涛,遂令漕船东下还过泗州时,载石输湖中,积为长堤,自是舟行无患。继之,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又于高邮北筑漕河堤二百里,旁偃巨石为十碇,以泄横流。以上据《宋史》李溥、张纶传。高邮至淮安水程,参唐宋诸行记所述,刚好200里,当是全部筑堤。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陈损之自扬州江都县至楚州淮阴县360里,更筑“绍熙堰”,是建石碇斗门,堤外开新河行船,从此湖、河分离。又,北宋初,淮南运河有堰坝5座,牵挽过舟,粮载烦于剥御,船损民疲。天禧二年(1018年)遂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近堰凿渠而通船。天圣年间(1026—1029年),真州、北神、邵伯诸埭堰相继改为复式船闸,依时启闭,提高了运河的通过能力。以上事例俱见《宋史·河渠志》六与《梦溪笔谈》卷12。
- [39]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建临江宫于扬子津,大宴百僚,故知其时江岸应在今扬子桥一带。所年扬州市的考古工作者发现城内唐代文化堆积层底部有六朝

青瓷压在黄沙生土面上,扬州城内亦有谢安故宅、法云寺等六朝古迹传说,从而推断东晋南朝时已有有人在蜀岗下的平地上活动。参见罗宗真:《扬州唐代古河道等的发现和有关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80年第三期。

- [40] 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楚州引《宋书·郡国志》并《山川记》云:“安帝义熙元年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三县,为山阳郡,属南徐州,宋因之。”案:《山川记》即《永初郡国志》,又名《永初山川古今记》,为南朝刘宋之行政区划,时,山阳郡实际辖山阳、东城、盐城和左乡四县。另据《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条云:“明帝太宁三年,郗鉴为兖,镇广陵,后还京口、是后兖州或治盱眙,或治山阳,……义熙二年,诸葛长民为青州,徙山阳。时鲜卑接境,长民表云:‘此蕃十载衅故相袭,城池崩毁,荒旧散伏……。乃还镇京口。’显然,东晋初年山阳已筑城。安帝即位之初,城已崩毁,义熙元年不应有设郡之举。《晋书·地理志》山阳郡之置作“九年”,是。《寰宇记》引书作“元年”悉“九”之误。
- [41]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楚州山阳县:“故仓城,东南接州城。隋文帝初将伐陈,因旧城修筑储[粮],盖军粮有逾百万。迄于大业末年,恒有积谷,隋乱荒废。”案:旧城即北神堰之山阳城,在今淮安城北5里。
- [42] 《旧唐书》卷一九〇文苑·齐瀚传,事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年),伊娄河长25里,由瓜洲长江北岸直达扬子津,又名新河。
- [43] 《宋史·河渠志》六东南诸水上,又见乔维岳传,事在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沙河自楚州北末口至淮阴磨盘口,凡40里,在淮河南岸开凿,避开长淮山阳湾水急湍悍之险。
- [44] 据罗宗真先生研究,蜀岗上的六朝城址分东西两部分,原为一整体。西城建筑最早,六朝及隋唐衙署均在西城,东城为南朝刘宋时增筑,隋唐二城变为一体。南宋筑宝祐城仅利用西城,二城才又分开。《江苏六朝城市的考古探索》,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文物出版社,第107—109页。
- [45] 1975年在扬州西门外双桥附近考古发掘出炉灶、熔铸坩锅、碾轮、石磨等生产工具,推测是手工业作坊遗址,偏于罗城西南隅。
- [46] 《旧唐书·杜亚传》。
- [47] 唐扬州有“东市”,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卷4物革条:“东市塔影勿倒”。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日僧园仁入唐求法,其书中亦提到在扬州市市头买香药事,见《入唐求法巡礼》卷1:“为买香药等,下船到市。”也已不是定时定点了。书中更提到“街店之内,百种饭食异常弥漫”,“街里男女不憚深夜,入寺看事”过立春灯节之事,更可为证。
- [48] 《旧唐书·王播传》。
- [49] 《资治通鉴》卷二〇三则天后光宅元年(684年)九月丁酉条。
- [50] 《资治通鉴》卷二五一懿宗咸通九年(868年)九月条。

- [51] 1984年夏,唐宋运河考察队途次宝应,县水利局杨学年同志见告,并赠《宝应县文史资料选辑》二本,内收杨学年同志大作:《宝应沧桑变迁》、《宝应县内的水系形成与发展》,对宝应县城河道及城址变迁说之甚详。不敢掠美,特注于此,并向杨学年同志致谢。《水经·淮水注》:“……至永和中,患湖多风,陈敏因穿樊良湖北口,下注津湖径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学界对这段记载颇多争论。一种意见认为“永和”应作“永宁”;另一种意见认为“陈敏”系为“陈登”之误,无从是正。然,自魏晋以降中渎水道(古邗沟)不再绕行射阳湖,而直穿行于樊良、津湖、白马诸湖之间,已被发生于这一时期的许多事件和诗文所证实。
- [52] 《高邮州志》,乾隆四十八年刊刻本。案:高邮自汉代已成县,城垣当不会迟至北宋始筑,明、清规模始于两宋矣。“新城”在北澄子河以北,随着城市发展,已变成县城整体的一部分。
- [53]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高邮军:“运河在县郭,下通邵伯堰入扬州。”[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子时,过六十里至高邮县,广大县也。……十五天日晴,卯二点开水门扇,入县。……至县官舍前止船。”
- [54] 顾祖禹《读史方輿记要》卷23高邮州:“旧时漕河出城西,筑堤以卫之,曰东堤。又有西堤,滨湖以捍水。复筑堤以卫民田,曰中堤。其后东堤圯,故漕河废,漕出西堤、中堤间,仍称东堤运河。”
- [55] 《宋史》卷四〇三贾涉传:“宝应择令,堂差涉至邑,请城之,役兴,以忧去。金人犯光州,起涉竟前役。”案:参日僧园仁、成寻二人撰写行记,各述其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和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分别途次宝应县,停船歇息,未言及城门。当时是否已有城垣,尚待考。
- [56]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宝应县志》,徐羽连重修,乔莱汇编,北京大学藏抄本。
- [57] 《越绝书·吴地传》:“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参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案:“平门”即苏州北门,“梅亭”所在地是吴的前期都城,自吴太伯以下至王僚三十三君皆都于此,又名“太伯城。”
- [58] 《輿地纪胜》卷七镇江府条引顾野王《輿地志》云:“晋元帝子衷镇广陵,运粮出京口,为水溜,奏请立埭,丁卯制可,因以为名。”今镇江东南郊有地名“丁卯桥”,当即立埭之地。
- [59] 据《宋书·州郡志》: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立毗陵郡,治丹徒,即今镇江市东丹徒镇;后郡治复还毗陵,系今常州;怀帝永嘉五年(311年)改称晋陵,郡治迁回丹徒;东晋元帝太兴初(318—321年)晋陵郡及丹徒县悉移治京口,查今镇江市北固山南岗阜一带。晋陵郡城遗址的发掘见《考古》1986年第5期,镇江博

物馆:《镇江市东晋晋陵罗城的调即和试掘》和刘建国:《晋陵罗城初探》二文。晋陵罗城建于京岷山向西延伸的余脉,利用山体,再夯筑并加砌砖护墙,周长约十里。其西北隅与子城——始建于三国孙吴时代的“京城”连为一体。二城之间有一古河道,北入长江,南接运河,刘文视为“润浦”。根据晋陵罗城“夯土内的墓葬,最早见于唐代晚期”,推测罗城之废弃大约在唐代中期运河出江口改在北固山西侧之际。宋元时期的《镇江志》称晋陵罗城为“东夹城”。

- [60] 北宋神宗时期,日僧成寻两过京口,皆需停船候潮越堰,见《参天台五台山记》卷三:“熙宁五年(1072年)九月十日辰时至京口堰驻船。……依(湖)[潮]乾不越堰宿。……堰下河船驻宿。”“熙宁六年(1073年)五月七日,即出船渡扬子江,堰兵士七人来加。已一点入润州河毕。已三点京口堰止船。……依潮乾不越堰宿。八日天晴,……午时越堰。左右辘轳牛合十六头,依潮生也。”长江每天的潮汛如今仍能在镇江市江边观察到。
- [61] (元)《至顺镇江志》卷二:“子城吴大帝所筑……东西夹城则唐时所筑也,“郡城周回二十六里十七步,宋嘉定甲戌郡守史弥坚作新门七……咸淳中已废其五”。案:镇江府城子城及东西夹城系唐代城市的范围,仍未脱离北固山东南丘岗;宋代才在岗丘与运河间低地建成新城,并于嘉定间完筑新城垣和新城门。此规模一直保持到清朝中叶长江主泓道北偏,镇江江岸由侵蚀冲刷转变为淤积为主,才在宋代城址与江岸之间形成新的港埠区。南宋偏安东南一隅,西北、西南诸路贡赋皆仰仗江船运至镇江府,再转运河船至都城临安,镇江的运输职能远胜过前代,遂能刺激城市的发展。
- [62] 《中国自然地理》,第四章历史自然地理,第145—149页。
- [63] (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三:常州府城郭。(北京大学藏嘉庆刊刻本)案:宋常州府内子城周实测2100米,约合4里余,与志文不合。另据《资治通鉴》卷259唐纪昭宗景福元年(892年)六月丁酉条考异引《十国纪年》云:“杨行密攻占常州,尝谓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张训以一剑下之。”则唐代常州城周当不会仅仅2里多长,详见下文注。
- [64] 常州外子城南城壕西段的走向基本与城外江南运河一致,而宋代的江南运河在常州城内向南绕了一个大弧形。这个弧形运道的出现,显然是为了让开外子城,外子城当是利用了一段江南运河旧道作为南城壕。从这段弧形运河上几座桥梁始筑的年代分析:天禧桥(原名“驿桥”)唐如意二年(693年)、“乌衣桥”(原名“减桥”)唐永徽三年(652年)、新坊桥大同元年(?)、元丰桥(原名“飞凤”、“殷桥”)唐如意元年(692年),这段运河的改线不会晚于唐代;进而推测五代常州城的第一次展拓,即外子城可能仍然利用唐代州城的旧基而略有改更。
- [65] 范蠡城:《太平寰宇记》卷九二:“古历山上有春申君祠,山西有范蠡城。”《无锡县志》卷三下:范蠡城在州西十里。”(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本)黄城,“去县十

- 三里……今历山下春申君祠去城三里，古道通此黄城。”案：范蠡，春申君是否真有筑城之举，俟考，然唐宋之际古城遗迹犹在。
- [66] 《越绝书》卷二：“吴古故陆道，出胥门……奏太湖，随北顾以西，度阳下溪，过历山阳，龙尾西大决，通安湖。”“无锡西龙尾陵道者……属于无锡县。以奏吴北野胥主畴”。案：此古道线路的选择是出苏州西门，沿太湖边缘丘陵地带相对亢干燥的自然条件，逶迤而行，经阖闾城而西去。阖闾城在无锡西南闾江口，残垣尚存。这条古道很可能西经中江（胥溪）与“鄂君启节”提到的吴楚水陆途程相衔。
- [67] 诸桥皆见《咸淳毗陵志》卷三、《无锡县志》卷一（不著撰人，四库全书本）。案这两部书是目前所能见到记录无锡城街巷市坊桥道最早的文字资料，后者虽然成于元末明初，但书中所录皆宋元之际的情况，当可为据。
- [68] 清朝曾析无锡县置金匮县，以城内有金匮山而取名。“金匮山”在今崇宁路北野园里省原子研究所院内，旧传金匮藏书于山下。四库本《无锡县志》云：“此山负土所成。”其实此山实为挖掘江南运河之土堆成，抑或唐代运河改线时所为，故唐以前诸书不载。
- [69] 参《无锡县志》（四库本）卷4载宋人聂厚载《常州无锡县记》，《毗陵志》作“六年”，案：宋真宗乾兴号仅用一年，“六”实“元”字之讹。
- [70] 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三。
- [71] 《宋会要辑稿》方域十六之35，嘉定六年（1213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
- [72] 《吴越春秋》卷八。
- [73] 《嘉泰会稽志》卷10，四库全书本。参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1962年第3期。
- [74] 《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孟简传》。
- [75] （宋）罗瀾《宝庆四明志》卷六市舶条（四库全书本）
“光宗皇帝嗣服之初，禁贾舶至澈浦，则杭务废；宁宗皇帝更化之后，禁贾舶泊江阴及温、秀州，则三郡之务又废；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
- [76] 姚宽：《西溪丛语》卷上。
- [77] 《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越州水条。
- [78] 见陈桥驿：《历史时期绍兴地区聚落的形成与发展》，《地理学报》35卷第1期，1980年3月。
- [79] 《元和郡县志》卷二六：“上虞县故城西枕上虞江。隋平陈废，贞元元年刺史王密复奏置”。案：上虞江即曹娥江，故城西临江，当指百官镇。王密奏置则移治今丰惠镇了。
- [80] 《越绝书》卷八“地传”第十：“勾践小城，山阴城也。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陆门

四,水门一。今仓库是其官台处也。……大城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不筑北面。”
“山阴大城者,范蠡所筑治也,今传谓之蠡城。陆门三,水门三。”参林华东《越
国郡城探研》,刊《中国古都研究》第四辑,页360—371。

[81] 《嘉泰会稽志》卷四,都亭桥的位置据乾隆五十七年刊本《绍兴府志》附图推定。

[82] 据《嘉泰会稽志》记载:

“照水坊市,城东南二百步;”“清道桥市,城西一里;”案:清道桥在今解放北路
轩亭口南,“西”似“南”之误,宋代又称“南市”桥北又称“北市”。

“大云桥东市,城南二里;”案:大云桥在清道桥南,二桥之间的“通市桥”亦因临
市场而得名。

“梅市,城西十五里;”“古废市,在都亭桥南礼逊坊;”案:似已废。

“大云桥西市,城北;”“龙兴寺前市,城北二里,旁有市门桥,其北街曰市北街,
寺今废;”“驿地市,城北二里;”“江桥市,城北五里;”案:以今绍兴城人民路作
为南、北半区分界,以上诸市多在城北。

[83] 《参天台五台山记》第一:“戌时至府迎恩门止。水门闭了,宿下。……七日晴,
卯时以杭州令见官人,令开门入船。河东有大伽蓝,河左右有市。以钱四百文
买米五斗……过五里有都泗门。”案:成寻未出越州东郭门水门,故其舟当不会
绕行城南都亭桥。

[84] 《嘉泰会稽志》卷七:“开元寺,在府东南二百七十步,岁正月几望为灯市,傍十
数郡及海外商贾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组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
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案:
唐宣宗大中八年(854年)日僧园珍参拜天台国清寺以后途径越州领取过所,其
撰《行历抄》言及越州开元寺尚无灯市之说,时间相隔仅仅百年。

参 考 论 著

1. 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与城市兴衰》,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
会编《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2. 李孝聪:《论唐代华北三个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3. 王振忠:《明清时期两淮盐业盛衰与苏北城镇变迁》,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
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12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4. 韩光辉:《12—14世纪中国城市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 史念海:《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人
文杂志》1958年2期;收入氏著《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韩光辉

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地理研究

本文在考察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的基础上,探讨了人口增减的情况及原因,并对这一时期北京城市人口的迁移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提出了新的见解。本文认为,北京地区人口的增减是伴随着其政治地位的升降而出现的。北京城市的中心地位是其城市人口与区域人口增长以致膨胀的决定因素。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周期性升降导致了周期性的人口内聚迁移和离散迁移,从而造成北京城市人口与区域人口的周期性增减。北京地区人口的分布存在不平衡及圈层状况,向人口分布稀疏圈层的离散迁移能起到减少城市人口基数,稳定和控制北京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

韩光辉,1947年生,山东泗水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

北京为举世闻名的古都。近年来它正经受着人口急剧膨胀的困扰。选择解决目前北京人口压力的最佳方案离不开对历史上北京地区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同时,由于对北京历史人口的认识出现了若干不应该出现的严重失误。因此,有必要系统地研究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历史人口的发展过程和规律。

本文的研究,上自辽建陪都,导致北京的地位开始上升的时期起,下至明末止。为取得成果的可比性,研究区域以今北京地区为限,为叙述方便,特约定北京地区在辽、金、元、明时期各以当时的都城名称命名(即辽南京地区、金中都地区、元大都地区、明北京地区)。研究过程中,为确定州县户口数据,依据文献资料,主要采用了(1)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分布法,(2)原户口统计区州县户口平均密度法,(3)参考了原户口统计区每县户口算术平均法。

古代作为基层行政建制的州县也是以一定量的人口为基础的。因此区域州县建置的增减、多寡与分布不仅是区域经济开发程度的反映,而且是区域人口增减和分布的重要标志。研究表明,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州县行政建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在时间尺度上呈周期性增减升降,即每当政权更替之初,某些州县因人口稀少省并或降州为县;而在经济恢复人口增长之后,则复置省并州县或析置新州县。二、在空间尺度上分布合理,并相对稳定。这一时期几乎全部州县都建置在平原与山间盆地中,与人口主要分布区相一致。这两个特点有力地反映了北京地区区域人口变迁的过程与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辽中后期至元代城市警巡院的设置、增加及其行政地位的确立不仅使城市户口的管理与检括专门化,而且指示了随城市职能与地位的提高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事实。

一 各时期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户口

1. 辽代 首先,由考察户籍制度与户口统计方法发现,辽代州县户丁与宫卫户丁分属于不同系统;而在佞佛之风大炽的辽代,僧尼人口是一个特殊社会阶层,不入州县户丁统计。故辽南京地区总人口应由这三部分人口组成。南京城市人口则由民户、军人及僧尼人口组成。其次,确定《辽史·地理志》所载州县户数的系年为天庆三年(1113年)。根据有二:

一、一般规律,州县建置在前、其户口统计在后。《辽史》附有户数的州县有迟至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年)建置的。据此可知,《辽史·地理志》州县户数应是该年之后检括数。二、辽代没有定期统计户口的制度,每逢检括即临时诏令。按辽代检括户口的诏令先后共十次,重熙十七年之后有六次,唯天庆三年是“籍诸道户”。其余无论括军籍、兵籍,还是脱户均与五京州县全面阅实户口不相干。辽代户量,无论宫卫户还是州县民户,每户均二丁,同时辽代汉、契丹、奚人三世以上同居者均稀少,故推测以二代家庭为主;并参考《辽代中国社会史》(英文版),定每户5口。

据《辽史·地理志》,辽天庆三年南京地区州县共9.3万户,46.5万人,其中南京城市1.56万户,7.8万人。当时南京民户属宛平、析津二附郭县。根据两县户数,并在考察古代中原城市坊的大小、坊内建筑形式,人口规模的基础上,以南京城市与若干不同城市类比,从而确定出南京城市每坊约600户,26坊共1.56万户。

宫卫户,据《辽史》有关资料推算,每宫卫提辖司领宫卫户约1500户。至辽天庆初南京共置11提辖司,共计宫卫户1.65万户,兵丁3.3万人。其中驻扎南京地区者1.2万户、2.4万丁,又其中驻南京城市宫卫兵1.8万人,驻牛栏山0.6万人,连同散处族帐的宫卫家属共约6万人;驻扎南京城市的汉兵1.8万人,共7.8万人。僧尼人口,按辽代僧尼人口总数占总人口(据《辽代中国社会史》估计数)的比重推算,南京地区在辽代后期约有僧尼4万人;根据南京城市僧寺记录及某些僧寺僧尼数,推算南京城市有僧尼约1.5万人。

因此,辽天庆三年(1113年)南京地区共计10.5万户、58.3万口;其中南京城市1.56万户,12.9万人。

2. 金代 金代户口本来主要由州县民户与猛安谋克户两大系统组成,在中都地区还有为帝王役使的宫监户等。但至章宗时期(1190—1208年)对户籍制度与统计方法进行了重要改革,即将不同系统的户口一并进行统计。《金史·食货志》关于“户口计帐,三年一籍”,女真与汉人统一验实户口的过程和验实方法,及府州为验实户口所置司吏的民族成分均可说明这一点。在中都城市中则由警巡院所置警巡使及其所属司吏“通括户籍”,也证明章宗时期户籍统计与管理是统一的。故章宗时期的户口统计就包括了各方面的人口。其次,《金史·地理志》的户数系年,前辈学者定在金末,甚或有人定在金朝灭亡的一年。但笔者在分析了若干史料之

后认定是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数。

泰和七年中都地区总计25万余户,161万余口;其中中都城市约6万余户,40万人。

金代中都城市所置警巡院已上升为与宛平、大兴二县平行隶于中都路的独立行政单位。中都城市户口专由警巡院管理统计,含于大兴府户口中。《金史·百官志》,中都警巡院置司吏18人。其中女真3人,汉人15人。按金代京府州县胥吏视户口与课赋多寡增减的原则,城市人口增加,警巡院增置为二,其所属司吏亦应相应增加。而《金史·百官志》仅载其一,显属失误。按二院共有司吏36人和职掌与警巡院完全相同的诸府节镇录事司每万户以上置司吏6人的规定推算,中都城市极盛时期当共有6万余户。以极盛时期户量6.5计之,总人口约40万。

3. 元代 元世祖之前户口管理相当混乱,世祖即位之后逐渐归并为主要三类:军(站)、民、匠户,分属于不同系统。在大都地区还有一部分贵族所属驱口。《元史·地理志》所载,至元七年(1270年)大都(时称中都)户口,仅是城乡民间户口。此外还需注意:(1)其可信程度高,依据首先是当时的中都地区社会基本安定,逃移复业,经济与人口均在恢复与增长中;其次是该年前后统计北方户数增长率的明显变化:至元六年(1269年)前的六年中为10.8%,六年至七年为153.6%,此后四年为3.6%。这种现象唯有以至元七年检括彻底来解释。(2)户量低,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元初在这一地区大量签取民间中上户为军站户;其二,该年的户口检括将大量协济合并户、析户统统检括入籍。

据此,按当时户口统计资料和州县等级变化及军站户资料推算,至元七年中都地区总计18.4万户,62.8万人。其中城市约11.9万户,42万人。

根据檀州、顺州、昌平县、龙庆州怀来县及大都城市户数增长率,以至元七年州县户口为基数,推算出泰定四年(1327年)大都地区州县总计26.4万户,118.8万余人。因到元世祖至元后期,散布州县的军、站户均已由地方兼管,故这一数字包括驻军之外的各类户口。

泰定四年京畿驻军有檀州贵赤卫、昌平阿速卫与隆镇卫,共约2.25万丁(户),约9.1万人。

城市户口,根据元代京师内外、州县城乡设防盗弓手每百户置一名和“以民多寡定立额数”的原则及大都历年所设弓手数额推定,中统五年

(1264年)中都城市有4万户,至元七年约11.95万户、十八年(1281年)大都城市共21.95万户,其中新城7.95万户,南城14万户,至正九年(1349年)共20万户,南北二城均10万户,又关厢0.85万户。依此推算泰定四年约计21.2万户。各年代户口中包括各投下,军站人匠、打捕鹰坊、窑冶等诸色人户,即城市中的全部户口。按大都城市各时期人口成分及军人与匠户签发妻孥及其俸粮供帐情形推测,至元七年城市居民平均户量为3.5人。至元中期约4人,元代中后期约计4.4人,后期约4人。故至元七年城市人口约42万人。十八年约88万人。泰定四年约93万余人。至正九年约80万人,又关厢人口约4.25万人。

因此,泰定四年大都地区总计49.8万户,221万人;其中大都城区约21.2万户,93万人。

4. 明代 根据明代户籍制度及户口管理系统和统计方法,明北京地区总人口应包括州县人口,京卫及驻扎近畿的军卫人口,直接为帝王服务的苑户等人口,以及北京城市居民人口。须着重指出的是,明代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管理,形式上是实行五城与二京县双重制,但事实上属于五城。根据城市户口构成,参照近畿州县户量,明代中后期城市居民包括铺户、工匠、官吏等平均户量为5口。按明代军户制和军人供帐及部分已知卫所军人户量,明初每军人2.5口,中后期平均每军人4口,屯居者可达5口。

州县户口 据永乐《顺天府志》,洪武八年(1375年)包括北平城市民户北平地区共4.5万户,18万人。据万历《顺天府志》及《天府广记》记载,万历初北京地区州县民户共5.4万户,29.1万余人。

卫所军人户口 洪武八年,北平城市与密云、通州、居庸关共11卫1所,除屯居在北京地区之外者,实际驻扎北京地区者约56182人,其中北平城市28854人;连同军属共约14万口,其中北平城市7.2万口。明中后期驻扎与屯居北京地区州县的卫所军人共约12万余户(丁),60万人。

上林苑四署苑户与南苑海户共计12116户(丁),65012人。

城市人口 洪武八年民户约1.8万户,7.1万人。永乐迁都后京师五城,每城划坊,坊下分牌,牌下设铺。即城内各坊,随居民多少,分为若干铺,而统之以总甲。铺是按每坊居民多少划分的。明嘉靖末京师五城共设106牌,670铺,其中内城423铺,外城247铺,又关厢50铺。每铺编户110家,共计铺户7.37万户,人口37万。营居军人12万户(丁),48万口。

又当时直接服务宫中的宫女、太监约1万余人。故城市共计86万人。又关厢1万户,约5万人。

因此,洪武八年北平地区总计10.1万户(丁),32万口,其中北平城市4.68万户(丁),14.3万口;明代中后期区域总计38.98万户(丁),186.6万人,其中城市19.37万户(丁),86万人;至明末清初约计12万户,55万人,其中城市近4万户,15万余人。

二 人口的增减及其原因

1. 人口增减的一般过程

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是随着北京城市职能的改变与地位的升降而变化的。总的来看,无论城市人口还是区域人口随着北京国都地位的确立成倍增长。辽建陪都,南京地区人口较唐代极盛期幽州地区人口增长了1.3倍;金建国都,中都地区人口大增,至泰和七年区域人口较辽代增长了1.8倍。其中城市人口增加了2.1倍。元建一统帝国都城,至泰定四年大都地区人口和城市人口较辽天庆中分别增加了2.8倍与6.1倍。明代中后期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较辽天庆中分别增加了2.2倍与5.5倍。金、元、明建都北京后,其区域人口较中原王朝北方军事重镇的幽州地区增加了5.4倍至7.8倍。很明显,各朝代的前期,城市人口增长均快于州县人口增长。从而显示了城市国都地位与政治中心职能对人口的巨大内聚力。

除各时期之间的增长趋势之外,每一个时期或朝代的前期人口均不断增长,因而到中后期区域与城市人口一般均能达于极盛。而且每一时期区域人口的增长率一般在10%以上(如辽代约11%,金代约14.7%,元代至元七年至泰定四年高达22.2%,明代为8.7%)。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一般地区是少见的。其实元代大都地区某些州县增长率甚至高达29.7%(龙庆州)与25.1%(檀州、顺州、昌平)。

但另一方面,每当政权更替,国都地位丧失,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便锐减。辽末金初、金贞祐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均如此。金贞祐初中都地区人口即由泰和末的161万人迅速减少到大约不足30万人,减少了约130万人。城市人口减少幅度更大,如大都城市人口由泰定末的93万人,至明初减少到不足2万人,年递减率高达87.4%。事实上人口减少

过程主要集中在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1368年)至明初。

综上所述,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的人口过程以人口增长迅速,减少更迅速,人口规模波动大为特点。其中城市人口波动更显著。

2. 人口增长的原因

(1) 人口内聚迁移 人口内聚迁移是造成各时期北京地区人口短期膨胀的首要因素。如辽代迁入南京地区的人口累计达2万户,约计10万人。金代,仅贞元迁都前后迁入中都地区的猛安即有8个,2.4万户,20万口。其中迁入中都城市者占半数以上。为充实中都所迁四方之民更多。元代,自至元元年(1264年)中都城市4万户至十八年大都城市增加到21.95万户,其中内聚迁移人户包括军人、工匠等累计可达16万户,迁移增长率达85%。同时,蒙古诸部流民迁入大都地区州县者也相当多。明初,除洪武间移民实北平外,永乐迁都前后迁入北京地区的人口更多(见迁移部分)。由此可见,各时期内聚迁移的人口已成为北京及周围地区人口的主要部分。人口内聚迁移是区域人口与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且后者快于前者的根本原因。作为人口基数,对后来区域人口的自然增长作用深远。

(2) 自然增殖 自然增殖是造成人口长期增长的根本原因。辽、金、元、明历代统治者在取得对北京地区的统治权、尤其确立其政治中心地位之后,在移民屯垦、充实京师的同时,实行政治改革,澄清吏治,整顿社会,客观上为人口增殖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其次,招抚流移、督劝农功,减轻赋役负担,推广农技、推动农业的恢复与发展,增加粮食生产等。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结果为人口增殖提供了物质基础。因而每一朝代的中期便出现了人民康乐,户口丰殖,或生齿浩繁,家给人足的景象。再次,组织南粮北调,保证京师粮食供给。漕粮输北京(中都)始自金大定中。当时京师人口增加,用粮甚大。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漕中原粮达170万石。元世祖至元中除漕运百万石之外,二十年始行海运,逐年递增,至天历二年(1329年)已增加到334万余石,直到至正初海运还在300万石上下。明代自永乐元年(1403年)海运粮济北京,后改河漕,至成化中达500多万石。八年(1472年)始以400万石为额。历代大量漕粮与海运除保证官员、军人及工匠的俸米之外,还用以赈济城市贫民。从而保证了京师众多人口的生计,稳定了人口,安定了社会,为城市人口增殖提供了物

质条件。第四是政策因素。辽、金、元、明各代某些政策法令对区域人口增长均具有积极影响。其一,婚嫁政策:辽代许契丹人为汉官者与汉人通婚;并曾以俘掠中原妇女实行赐婚,这虽有其落后的一面,但为宫卫户丁提供了更多婚媾机遇。金代鼓励族间通婚是一贯的政策法令,从女真生于中原者不像女真人来看,女真与汉人通婚较为普遍。同时放松奴婢婚嫁限制,鼓励良奴通婚,禁同姓婚与掠夺婚等不良婚姻形式;并确定民庶婚聘财礼限额等。元世祖实行了“口增则赏”的鼓励人口增殖政策,禁质典子女妻妾,禁有妻妾复娶;严禁溺女婴;规定婚聘礼币贵贱有差等。明初太祖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中原之急务。故除发展生产外,规定鬻子女官为收赎,严禁弃婴,给粮以收弃婴;凡庶人娶妇,男十六、女十四以上,并听婚娶;鼓励民间婚娶资助,轮流调给;禁宫刑,限度僧道等。其二,恤鳏寡、礼高年:辽、金、元、明时期均实行了祖父母、父母在不得析财(别籍)异居的政策。尤其元代,从法律高度规定了士民养赡老弱长幼的义务,使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并积极发展医药,培养医学生等。因而至大四年(1311年)在大都地区,有8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10662人。其三,赎放奴婢:辽代圣宗时始部分放免部曲,令仍籍州县;并规定饥民质男女,佣工折价,遣还其家。金代,自金太宗始赎放奴婢,经熙宗、世宗,至章宗放免范围不断扩大,如放免二税户,禁止抑良为奴等。元世祖后期严隐匿之罪,广泛实行了放驱为良的政策。所有这些政策法令的实行或者是部分实行的结果,不仅有利于人口的增殖,提高了自然增长率,延长了人口寿命,而且直接增加了州县人口。

(3) 户籍管理与户口统计因素 辽代没有定期进行户口统计的制度,大大减少了繁扰以及吏胥的作弊,因而漏籍者少。金代至章宗时期改革户籍制度与户口统计方法,不仅建立了完整的户口编审系统和户口三年一籍的制度,而且规定了明确的编审对象、方法和统一的时间,具有一时性和普遍性两大特点。故章宗时期的户口统计一般是真实可信的。元代,忽必烈即位后除归并户类,令州县军、站户由州县兼管外,同时招抚无籍民户命之耕田。成宗时又命缙山县为势家所蔽民户悉还县定籍。此后屡有将招抚户、未籍户隶诸有司发还民籍之命。这些诏命的实行是元代大都地区诸州县户数增长率均高达20%以上的重要原因。明初同样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及户口管理与统计的方法。就全国讲正统之后渐成具文,但在北京地区尚未至此地步。明代北京地区各府州县户口统计的变化

与当时直接影响人口盈缩的政治形势、社会治乱、兵燹发生完全一致的事实说明,明代北京地区户口统计并非无效。总之,辽、金、元、明时期各自不同的户籍制度和户口管理与统计方法从不同方面减少了户口隐漏,加强了北京地区户口统计的可信度,有利于这一地区户口总数的增加。

3. 人口迅速减少的原因

(1) 人口离散迁移 辽、金、元、明各代的后期由于社会积弊的加深,政治、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转嫁危机京畿首当之。因而京师内外民间役重差繁,官府横征暴敛,官吏敲诈勒索是其通病。人不堪命,必然流离。况且先前政府大量内聚移民的强制性就埋下了这些人口流徙的种子;一旦上述问题发生与发展,兼以战乱迭起,灾疫频仍,五方杂处的人口便大量回流,使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地减少。而且有移民越多逃亡越众的趋势,因而形成了几乎是封闭的恶性循环。这种循环正是政权更替时期北京地区人口大量且迅速减少的直接原因,又是新政权再行移民实京师的动力。

(2) 战争杀掠 战争骚乱除驱迫人口迁徙流亡之外,还直接造成人口杀掠。辽末屡次征发燕人东征和女真人对燕京民口的俘掠,金贞祐初与蒙古骑兵的战争、元代后期京畿的历次战争均曾给京畿人口的生命财产带来严重危害。明代正统末也先犯京畿杀掠洗劫,仅明朝官兵夺回人口即达万人。隆庆州与永宁县原编户共 22 里,经此战乱死徙残余仅 500 余户。嘉靖中俺答入掠京畿,使隆庆州永宁县共损失 1938 户,9953 口,分别占原来户口的 57.3% 与 47.1%。昌平州被杀虏 5000 名口。甚至有人记载,俺答入塞杀戮京畿男妇六万,掠去四万。明代顺天府与延庆州及永宁县户口统计均明显地反映了这些战祸对人口数量的严重影响。明末满族贵族入关杀掠不亚于上述。战争不断打破明代北京地区人口连续发展的过程,成为明代北京地区极盛时期人口总数较元代还少的主要原因。

(3) 自然灾害 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自然灾害一直比较严重。但每个政权上升时期,社会升平、经济实力雄厚,灾赈以时,少殍死流徙。到后期,不仅灾害有加重趋势,而且国家政治腐败,吏治日汗,民生日瘁,国库日虚,无论国家还是民众,抗灾能力均已极度脆弱,人口只有流亡。如金大安至贞祐初,中都地区严重旱灾使农业歉收,粮食奇缺,加以蒙古骑兵反复攻掠围困,因乏粮,中都人口饥冻而死者很多。元代,据《元史·五行志》统计,自中统元年(1260年)到至治三年(1323年)63年间共发生

水、旱、蝗、雹、饥、震等危及人口生计的灾害 48 次,平均每三年发生 2 次稍强,自泰定元年(1324 年)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44 年间发生上述灾害 64 次,平均每三年约 4.4 次,元代后期不仅自然灾害频率提高了,而且,强度及其造成的影响大大增强了。如裂度达 8 级的地震使京师死伤人民甚众;京畿蝗虫发生,食禾稼草木俱尽;水灾使京畿饥民达 40 万等。因连年水旱,使民众失业,饥民相食,殍死沟壑。显而易见,元末政治的腐败极大地强化了大都地区自然灾害对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对人口的残害。明末北京地区自然灾害及其危害亦不亚于元末情形。

(4) 粮食短缺 金大安至贞祐初,中都乏粮,军民饿冻而死者十四五,成为宣宗迁都的重要原因。元末,由于京畿连年水旱,粮食歉收,不仅饥民遍地、饿殍枕藉,而且也直接影响到大都城市的粮食供应。同时,至正十二年(1352 年)海运不通,每年 300 余万石的南粮断绝,不仅使数十万人的官俸军饷变成了难题,而且先前对城市贫民频繁且大量的赈济也匿迹了。故到至正十四年(1354 年)京师大饥,加以疫病,民有父子相食者。十八年(1358 年)京师大饥疫,到至正二十年(1360 年)四月大都城市前后埋葬死者达 20 万。迨至明崇祯间(1628—1644 年)京师大饥疫频繁发生,人口的死亡逃徙亦相当众多。

凡此四端,不仅驱迫了京师人口的离散迁移,而且直接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大大降低了自然增长率,停滞了人口的增殖,是当时北京地区与北京城市人口锐减的根本且直接的原因。

三 人口迁移

为了直观地反映区域人口迁移的地理含义,凡人口从北京地区迁出即表述为人口离散迁移,反之则表述为人口内聚迁移。

1. 辽代 自唐末五代至辽初是南京地区人口大量离散迁移的时期,首先是战争的俘掠。据《辽史》记载,仅阿保机俘掠燕蓟地区人口即达 8 次之多。阿保机将大量燕蓟地区的人口驱至契丹内地,建州县于襟要之地,且多以汉人旧居州县之名名之。明确记载以燕蓟人口创置的州县将近 20 个。其实以“俘掠汉民”创置的州县就未必没有燕蓟人口。因而在辽之上京、东京、中京各地燕蓟人口很多。其次是人口逃移。一方面五代战乱中原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契丹实行了安抚与吸引人口的政策,因而燕涿之民亡入契

丹颇多。据上述州县设置情况推测,当时燕蓟地区被俘掠与流徙北去的人口不下2万户,其中属燕京地区者约半数左右。辽代中期南京地区人口的离散迁移主要是罪徙及辽政府割燕民数百户置州军于西京。辽末因政治腐朽,经济凋弊,南京地区出现了人口离乡南徙的现象。

在契丹统治者占有燕京地区后,为加强军事防卫,改变因人口离散迁徙造成的区域人口稀少,旷土待辟的状况,便开始了向这一地区的内聚移民。据文献记载,自辽初始内聚迁移人口累计达2万户左右,其中宫卫户1.2万户。其余包括俘掠的中原人口,宋国降军与附民以及官僚绅士,同时还有自契丹内地逃回的被俘人口。在内聚迁移的人口包括契丹、奚人、渤海人、室韦人与汉人等。

总之,契丹贵族以军事手段强制人口迁移的结果,形成了南京地区人口离散迁移与内聚迁移交错进行的复杂局面。总的看先以人口离散迁移为主,使区域人口减少,后以内聚迁移为主,使区域人口得到补偿,并且有所增加,为南京地区人口的空前增长奠定了基础;并在这一地区形成了各民族杂居共处共同开发区域经济的新形势,推动了民族融合的过程,揭开了创建多民族统一国家并奠都燕京的历史序幕。

2. 金代 第一阶段,金初,女真贵族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即会宁府。下辽南京则驱掠南京地区3万户迁往金源内地,因而有宋人接受燕京空城之说。在女真人再取燕京并灭北宋之后,又将战争俘掠的宋汴京人口北迁,其中包括徽、钦二帝、后妃、大臣、官吏、工匠等,时人估计有20万人。其中留居燕京者仅宗室、大臣即达1800余人。这次人口内聚迁移使燕京地区人口大约可以恢复到接近辽代后期水平,即10万户,50余万人。因而为后来迁都燕京及燕京地区人口较快增长初步奠定了基础。在这一人口迁移的周期中始终以军事暴力为支柱,故具有规模大、迁徙远的特点。

第二阶段,在金人灭北宋,废刘齐之后,开始将大批猛安谋克户徙居汉地。当时仅金主及将相亲属、卫兵之家得留。熙宗初,创屯田军,再次将猛安谋克军户徙入中原,授以田宅,与汉人杂处。其中燕京地区为重要的人口内聚迁移区。贞元迁都,改燕京为中都,除将三千余员名官吏迁入中都外,还迁入中都城市四猛安又二族。同时诏令四方之民移居中都者,给复十年,以实京师。世宗即位又徙二猛安于中都近郊,以二万军入屯京师。从而补充了海陵南伐迁出两猛安造成的人口减损。至此,中都地

区共有 8 猛安二族,依猛安正常编制,中都地区共猛安谋克户达 24100 户,约 20 万人。其中居中都城市者 4 猛安二族,计 12100 户,10 万人。在 8 猛安中迁都之后迁入的计 6 猛安二族,占 75.6%;计 18100 户,15 万人。加以内聚迁移的官吏及四方民户,迁都之后迁入中都地区的人口约 4 万户,30 万人。因此金人迁都填实中都形成了人口内聚迁移的高潮。随着中都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中都警巡院由贞元初的一个到大定八年不到二十年增设为左、右两个。章宗即位之后又移西北纥军居中都近郊,约计 5000 户。由迁移过程看内聚迁移人口包括汉人、女真人、契丹人及奚人等。

第三阶段,迫于蒙古军事压力,及中都乏粮问题,金宣宗于贞祐二年(1214年)五月迁都南京(汴京)。宣宗南迁,官眷、监户、三卫近侍、护驾军将、百官宗室及其家属皆偕行。据一顿饭需二千舆计,约 10 万人口。结果釜辮一动,北路皆不守。翌年五月,中都陷落。这时宣宗确立了褒兵徒,徙豪民、以实南京的政策。招抚、保护、鼓励军民南迁。数年之内,仅河北军户徙河南者几百万口;而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者不可胜计。经此离散迁移与蒙古骑兵的俘掠,兼以蒙古军围困乏粮,中都军民饥冻而死者众多,中都城市与中都地区人口已很稀少了。

3. 元代 第一阶段,在蒙古贵族进入中都地区而无意建都于此的时期,蒙古骑兵曾三番攻掠,尤以成吉思汗九年(金贞祐二年,1214年)冬至次年四月围困中都的时间最长,达六个月之久,此间即曾大批驱掠人口北迁,致使当时河北(包括中都地区)户口亡匿,田畴荒芜。

第二阶段,元世祖即位后,在恢复经济、鼓励人口增殖的同时调集大批军队于燕京及其近郊。迁都中都并建成新城、改中都为大都的过程中,大迁居民以实之。其中不仅有中央政府的众多官吏,还有大量军队、工匠以及商人等。其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均是空前的。据记载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元世祖时期迁入大都地区的各类人户累计近 13 万丁(户)。按当时城市规模扩大的情况推算,自至元元年(1264年)至十八年(1281年)的 18 年间内聚迁移达 16 万丁(户),迁移增长率达 85%。因此,元世祖至元初迁都并建都大都时期是北京历史上人口内聚迁移的高潮时期。内聚迁移人口的职业,主要有侍卫、屯田、工匠、职官、奴婢等。显然是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封建帝王的各种人口需要。移民的族属:主要有汉人、蒙古人、色目人、女真人、回回人、阿速人等。中期又有大批蒙古部民自草原迁移到大都地区、附籍京郊州县,成为州县民户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人口

的内聚迁移为后来区域人口的迅速增长奠定了基数,以致在短短数十年间使大都地区总人口增加到了221万余人。从元世祖至元后期至武宗至大初,大都城市人口极盛的时候曾离散迁出约1.5万人(户),约6万口。主要用于围宿和屯垦,在客观上减缓了人口的迅速膨胀。

第三阶段 元代后期各项社会积弊、尤其沉重的赋役负担,频仍的自然灾害不仅使大都地区众多的人口死于饥谨灾疫,而且有众多的人口流离逃窜。以坝河漕户为例,至元十六年(1279年)开坝河设坝夫户、车船户共计14397户,到至正初逃亡所余仅5438户,逃亡占63%。元顺帝北逃之后,京畿州县蒙古等人户甚至裹携汉人追随元顺帝北去。同时,逃避明军北伐战争的流徙者亦不在少数。故元末大都地区人口的离散流迁是当时区域人口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4. 明代 第一阶段,洪武建文时期是人口内聚迁移与离散迁移交互进行的时期。朱明王朝建都南京,降元大都为北平府治,并派驻燕山六卫守御之;计33600人,连同军人眷属共计约8.4万人;同时招抚北逃军民等。并有计划地迁散元大都城市人口,其中包括:(1)北平府应有南方之人愿归乡里者听;(2)征元故官送南京;(3)徙北平在城兵民于开封;(4)纵降人北还等。元末明初区域人口大量离散迁移的结果,至洪武二年(1369年)整个北平府、包括北平城市在内总人口已不足五万人。为恢复残破经济、发展生产、加强边备,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内聚迁移沿边和山后之民及沙漠遗民于北平府等地推行屯田。据不完全统计,前后达8万余户。其中散处北平地区州县者达3万户,16万人以上。同时增设五卫一所,计军人29120丁,总人口约72800人。洪武建文中总计迁入北平地区军民共92700余丁(户),31.6万人。因而形成了明代北平地区人口内聚迁移的第一次高潮。但靖难之役又使北平地区出现了人口离散过程。

第二阶段,永乐元年(1403年)为恢复残破的经济、增加人口,开始内聚迁移各地人口于北京。据不完全统计,永乐宣德间(1403—1435年)迁入北京及附近地区的民人匠户、降民等达68500余户。永乐初移山西行都司属卫于北京,并将大宁都司属卫内徙、置于北京地区者共计7卫。永乐迁都调入北京的军队达41卫1所。故永乐共移入北京地区48卫1所,仅军人即达25.5万余人。宣德中又组建与调入京师9卫,仅军人即达5万余人。因此永乐迁都北京前后成为北京历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移民的时期。这不仅填实了京师,增加了各项特定服务人口,而且极大地加强

了北京地区的军事防卫力量。与前代一样,京师人口迅速膨胀,居民五方杂处;与前代不同的是,明代的内聚移民除少部分蒙古人口和少数回族人口外,基本上都是汉人。

值得注意的是,京师人口的迅速膨胀使明政府已预感到对国家财政经济的巨大压力,萌芽了调节人口迁移增长、控制城市消费人口的思想,并开始了初步的实践。如拨京军三万下屯,议简京卫冗滥武职补天下都司卫所缺官,改变对京师流民的政策等等。

明代中期京郊州县人口因也先、俺答两次劫掠,及京畿役重差繁的祸害已开始破产流离。乡村经济的破产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发迁居京师的人口增加起来,致使京师生齿滋繁,比庐溢郭。正统末土木兵败当属京师人口的一次较大的离散迁移,但至景泰初调集外卫军人充实京卫、部分地弥补了京卫军人损失。此后京卫军人逃死者接踵,至嘉靖中在籍京卫军人仅有 14 万余人。因此到明代中后期北京城市居民的职业构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三阶段,自万历初年之后,北京地区,无论城市与州县人口的流离因赋役繁重,加派风行,而日趋严重起来。至万历二十年(1592年)在宛平界内城各坊中编户仅 121 铺,较嘉靖末减少了 52 铺,即减少了 10400 户。大兴界内各坊亦不会例外。至明末因城市人口减少,连城市的坊也归并掉了两个。在州县中,顺天府户口由万历六年(1578年)的 101134 户、706861 口到万历二十年减少到 88942 户、622044 口,减少了 12192 户、84817 口。同时期北京地区户口亦分别减少了 2270 户、29750 口。因而明末京畿州县流移日众、弃地渐多。

5. 人口迁移的特点与原因

综上所述,辽、金、元、明时期,北京地区的人口迁移具有周期性和范围广、规模大两个特点;并由此派生了区域人口民族构成的复杂性特点。

人口迁移作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现象,主要受到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两个方面的影响。在北京地区人口迁移过程中,政治因素始终是主导影响因素。这是因为自辽代以来每逢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发展为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时,因北京政治中心地位与地理位置关系,战乱总在此发生,破坏人口的正常生活,造成人口流移、死亡与被俘掠,使人口锐减。新统治者为了满足对军队、工匠等服务人口的需要,开始实行移民“实京师”的政策。历代如此。但“实京师”具有不同表现形式。在北京尚未获得政治中

心地位之前或暂时丧失政治中心地位之后,“实京师”就意味着俘掠燕京地区人口去填实战胜者的都畿。辽初、金初、蒙古初以至明初均发生过这种事实。因此造成区域人口的严重损失。而一旦建都或迁都于此,为弥补人口损失,新的移民开始。所以人口离散迁移越多,内聚迁移必然也越多;反之内聚迁移的人口越多,每遇灾伤战争人口离散迁移亦愈众。所以是一个恶性循环过程,也是北京地区人口迁移所以出现周期性、与规模大、范围广特点的根源。

四 人口分布

1. 人口空间分布的规律

自辽代至明代北京地区的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其表现是:

(1) 自密云(檀州)盆地东北端点至涑水(拒马河)出山口为轴线,形成了一条中间宽阔而两端窄狭的人口分布密集的条带。在平面形态上犹如纺锤形。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城虽均稍微偏离轴线,但并不影响对这一分布的观察效果。这一分布形态在辽、金、元、明人口分布图中均未发生什么明显变化。在其右侧的西山、军都山地则形成了一条平行轴线而人口分布稀少的条带;在其左侧的泊淀低地分布区则形成了一条基本平行轴线的人口分布稀疏的条带,但比前两条短促。这后两条人口分布带在辽、金、元时期也未发生明显变化,而至明代,其人口分布有增密趋势。此外,在缙山(龙庆、隆庆、延庆)盆地与洵河盆地中人口分布也一直比较密。而燕山山地人口分布稀少。若将缙山与洵河盆地及燕山西部视为三块,则形成了北京地区人口分布的三带三块形式。

(2) 以中心城市(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为人口分布密集的核心,在周围地区形成了若干人口分布由密变疏、规则或不规则、封闭或不封闭的圈层。这一人口分布形式自辽代至金、元、明代亦未发生明显的变化,缙山盆地人口分布成独立一块。人口分布圈层同样反映了当时区域人口分布的极端不平衡。如元泰定四年(1327年)大都城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 13099 人;环绕城区的大兴、宛平、良乡、顺州、潞县人口密度平均在每平方公里 100 至 200 人之间,而外部圈层中的房山、昌平、密云、平谷、三河(部分地区)等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 50 至 100 人之

间。其他时期亦相类似。其实在近郊,包括关厢与园艺区在内形成了一个人口密度仅次于城区而高于外部圈层的人口密集圈。只因人口统计资料关系,在人口密度图面上不易反映出来。

但人口无论轴线分布还是圈层分布,均存在一个平原密(包括山间盆地)、山区疏、城区密、郊区疏的基本事实。在平原和盆地中人口分布一般密集,在泊淀分布的低洼平原区人口稀疏;在山区人口则沿河流阶地及山间盆地分布;在缺乏耕地与水源的山地中无人居住。

2. 北京地区人口分布的这种状况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首先,自然地理环境是影响人口轴线分布的经常性因素。其中包括气候、地形地貌、水体、土壤、资源等因子。在北京地区,无论古代还是今天,这些因子的最佳组合恰恰集中在平原地区的 20 米至 200 米等高线之间,即上述轴线贯穿的地区及部分山间盆地中。自然地理诸要素的最佳组合提供给人口的是最佳生存环境,利于人口的生聚与增殖是毫无疑问的。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城就位于这条轴线的左近,属最佳位置之一。北京地区古代人口分布密集区始终与此重合,充分表现了人口对自然环境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而在并不具备诸因子最佳组合的广大山区或因缺乏水体,或因缺乏可耕地,或因断块山地切割强烈、山高谷深、环境恶劣,或因资源贫乏而排斥了人口的生聚。在低洼平原区则因水体过多、土地不宜或不利耕垦也不利于人口生聚。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因子组合在历史时期的滞变决定了人口对这一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依赖的经常性与长期性。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尤其如此。因而也就形成了人口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历史继承性。

其次,社会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圈层分布的最终决定因素。人口分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它必然受到社会生产方式与生产地域分布的制约。这在北京地区尤为明显。辽、金、元、明时期,北京(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不仅是北京地区的中心城市,而且是辽之陪都,金、元、明之国都。作为帝王之都,除封建帝王及其家族外,集中了大批政府官僚和保卫帝王安全的大量军队以及文人学者,而且更多地集中了直接为其服务的工匠、商人、奴仆。这些人口的大量存在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人口集团、构成了人口众多的庞大城市。其人口密集,平均人口密度辽天庆中,金泰和中,元泰定中,明万历初每平方公里分别为 14659、18604、13099、13548 人。因而形成了不同时期区域人口分布的密集中心。

城市近郊,首先是关厢集中了直接为城市服务的商业服务业,人口较集中。如元代中后期大都各关厢已集聚了 8500 户铺舍居民;明中后期达 1 万户。此外,适应城市客观需求的郊区农业园艺就位于这一圈层中。元上林署的蔬果及苜蓿园就集中在郊区内。民间蔬菜的生产规模更大。大都郊区出产的家园种莴蔬菜达 28 种,引种和菌属及园圃所产者达 56 种。明代由于城市生活消费要求及中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有力刺激了园艺产品的商品化,北京近郊商品化蔬果花卉的栽培生产获得了空前发展。在外城西南部,在京师九门外皆有蔬菜栽培。时京郊蔬菜达数十种。金代当亦类似。园艺生产具有集约化程度高、劳动密集、经济效益高的特点。因而环绕城市出现了人口分布密集的环状地带。兼以历代部分驻军及其家属的驻扎或屯居使其人口分布更密集,但其生产的农业性质决定其人口分布不可能与城区相比拟。此圈之外的旱地农业区,因生产条件限制,生产粗放,单位面积土地的产出量及其供养额的差异,决定这里人口分布较园艺区稀疏,较山区稠密。而山区除河流阶地与山间盆地宜农外,基本属林牧区,生产的产出量更低,可能维持的人口数量更有限。东南部低洼地区经元末开拓与明初屯垦,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变,故其人口分布较前密集了。城市、关厢、园艺区、旱作农业区均位于平原区,其自然地理条件没有什么明显差异,但由于经济类型和生产分布不同,才造成了人口的圈层分布。

同时,中原经古北口达东北的交通线对区域人口的轴线分布与圈层分布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再次,社会政治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主要指人口内聚迁移因素的影响。辽代移民中的民户主要集中在檀州境内,故檀州盆地人口分布较缙山盆地与洵河盆地密。而宫卫兵集中南京城市,家属集中近郊,部分军队驻牛栏山,因而使城区与近郊人口分布密集。金代对中都地区的内聚移民主要集中在中都与近郊,所以城市人口更密集、郊区亦相当密集。但由于移民屯垦主要分布在平原与盆地中,所以人口轴线分布有所加强。元代移民主要集中在大都新、旧二城,使城市人口总数大增。在檀州,昌平驻军结果,其人口分布变密了。明代在边墙沿线设置军事卫所、关镇城堡,屯驻军人及其家属的结果,使山区人口分布状况有所改变,凡驻扎军卫的地方、北京城市、近郊、通州、昌平、密云、平谷、延庆等人口均有增加,人口密度扩大。尤其明初推行的军屯与民屯及上林苑苑户的广泛存在,

使北京地区的村落分布与人口分布趋于均匀,并形成了后来这一地区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但是,由于政治因素与移民因素的影响,在北京城区本身人口分布却与上述相反。以明代为例,帝王后妃所居的皇城区人口分布极稀疏,集中了宫廷仓厂,大部分官署及皇亲国戚居第的中城各坊人口分布较密集,而商业、手工作坊、社会服务及城市贫民集中的东西南北城人口分布最密集,其中南北居贤坊、日中坊、崇教坊、明时坊、正西坊、崇北坊人口密度均在每平方公里2万人以上。

五 结 论

1. 城市职能决定城市人口的规模。历辽、金、元、明,北京由历史中中原封建王朝的北方军事重镇和经济都会终于上升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国都城市。伴随这一过程,北京城市与北京地区人口迅速增长。但在国家政权更替,北京政治中心地位暂时丧失时,其人口又激剧减少,造成了人口规模的周期性变化。可见封建时代北京城市的政治中心地位是其城市人口与区域人口增长以致膨胀的决定因素。因此,国都城市在其稳定发展的时期人口激剧膨胀带有历史的必然性。



2. 北京政治中心地位的周期性升降导致了周期性的人口内聚迁移与离散迁移;进而造成了北京城市人口与区域人口的周期性增减。内聚迁移与离散迁移是一一对立统一的矛盾,构成了封建时代后期北京城市与北京地区人口增长过程的恶性循环。显然积极调节这一矛盾是稳定和控制北京城市人口规模的关键。在这方面明代即已萌芽了调节人口迁移增长、控制北京城市人口的思想,并进行了初步实践。清代在控制北京八旗人口增长方面更取得了良好效果。因此,正确处理北京城市人口的内聚迁移与离散迁移的矛盾,着眼于减少城市人口基数,不仅理论上有据,实践上可行,而且效果亦显著。这是历史的结论。

3. 北京地区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及圈层状况,人口分布稀疏各圈层在客观上为接收和容纳来自高密度区的人口提供了广大的地域空间,造成了城市人口离散迁移的可能性。因此明、清两代的中期均有一部分城市人口迁移到近畿地区,起到了减少城市人口基数,稳定和控制北京城市人口增长的作用。这可以作为一种历史借鉴。

(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主要参考文献

- 《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契丹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金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大金国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 《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 《元典章》，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1976年刊本。
- 《元文类》，明嘉靖十六年刻本。
- 《通制条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 《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 《明实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
- 《明会典》，弘治敕纂，正德四年重校刊本；万历十五年刻本。
- 《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
- 永乐《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 万历《顺天府志》，明万历二十一年刻本。
- 《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宛署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
- 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
- 张博泉：《金史论稿》，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 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年。
- 许大龄：《明代北京的经济生活》，《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
-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5年。
- 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研究》，待版。
- 韩光辉：《〈金史·地理志〉户数系年正误》，《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韩光辉：《建都以来北京历代城市人口规模蠡测》，《人口与经济》，1988年第1期。
- 韩光辉：《北京历史上的警巡院》，《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3期。
- 韩光辉：《北京人口变迁资料辨证》，《人口与经济》，1986年第1期。
- 韩光辉：《清代京师八旗人丁的增长与地理迁移》，《历史地理》第六辑，1988年。


参 考 论 著


1. 张国雄、梅莉:《明清江汉——洞庭平原的人口变化与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1989年第4期。
2. 葛剑雄《秦汉时期的人口迁移与文化传播》,《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3. 韩光辉:《历史上北京地区人口周期性锐减的原因探析》,《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4. 张伟然:《湖北历史时期的感觉文化区》,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六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5. 韩茂莉:《金代南京路人口与农业》,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七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韩茂莉

农业人口的迁入与辽塞外 本土农耕区的形成

辽代迁入塞外的农业人口以中原和渤海人为主, 本文从二者迁移阶段与迁入位置的分析入手, 探讨了辽代本土农耕区形成阶段与分布状况。本文认为, 辽太祖、太宗与圣宗时期分别是农业民族进入辽本土的两个重要阶段。其中以第一阶段农业人口进入辽本土的数量最大。在此阶段内, 中原人口主要被迁入西拉木伦河流域, 即上京附近; 渤海人口分别被迁往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辽东各地。在第二个阶段内, 中原人口主要被迁往燕云十六州, 渤海人口大部分迁至辽东。至会同二年, 以上京及附近地区为迁入地的大规模农业人口的移民活动基本停止。农业民族的迁入直接关系到辽本土农耕区的形成, 农业人口的集中迁入时期, 就是辽本土农耕区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 农业移民集中之地即成为辽境内的主要农耕区。

韩茂莉, 1955年生, 北京人。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和文化地理研究。

农耕与游牧是植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自然条件下的两种生产方式,两者之间虽然在生产地域上没有截然分明的界线,但双方的相互渗透与扩散却往往需要借助外来因素推动。作为强有力的外来因素,民族间的争战及人口流移,在农牧生产方式转移的过程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

辽建国前,契丹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在燕山以北,这里可以称之为辽国的本土。契丹人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样,基本都属于非农业民族。这些民族虽然也存在着少量的农业活动,但大多处于原始阶段,土地开垦量极为有限,因此还没有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辽本土内大规模农耕区的出现是在辽建国以后,大量农业人口迁居塞外则是产生这一转变的重要契机。辽代迁入塞外的农业人口以中原和渤海人为主,本文即试图通过对于这两个地区农业人口的迁移阶段与迁入地位置的分析,来展现塞外农耕区的形成过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有一些学者已不同程度地研究过辽代的人口迁移问题,但或许是由于着眼点不同的缘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具体论述外来农业人口迁居辽塞外本土的时段变化过程和空间分布特征,从而也就无法揭示塞外农耕区的形成过程。

一 中原农业人口的迁入

中原人口大量迁居塞外对于辽本土内大规模稳定农耕区的出现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扩散有许多方式。辽建国以前,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以递进形式,通过边地向契丹社会中进行渗透,这种传播方式进展十分缓慢,以致在从雅里到述澜的一百多年内,契丹境内还一直处于“教民耕织”的农业生产萌生阶段。自阿保机执掌契丹政权后,中原农耕人口开始大规模移居塞外,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由移民造成的农业生产技术迁移式扩散,明显具有扩散速度快、传播内容准确的特点。与中原人口北迁相伴随,中原地区最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直接传入辽本土。在这些中原移民聚居的地方自然很快就形成了新的农耕区。

迁入辽本土的中原人口,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移民。一种属强制性移民,即战争俘虏;另一种为自发性移民,这类移民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在中原地区继续生活下去而主动进入草原的。从移民数量和对塞外地区的影响程度两方面来看,前者的意义都要远远大于后者。

中原人口以战俘形式被迁入辽本土,主要集中在辽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圣宗六朝,前后持续约一百年。这一百年既是契丹人从原始部族向封建化社会转化的重要阶段,也是辽与中原王朝军事冲突最激烈的时期。在这一百年内,随着战事的起落与军事对峙区域的变化,中原人口在辽国境内的迁入地也有所变动,而中原农耕人口迁入地的变化,又直接影响到塞外农耕区的分布与发展特征。

按照人口流动的特点,可以把中原移民过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辽太祖至太宗会同元年。

从唐末阿保机执掌契丹迭剌部政权至太宗会同元年,这三十二年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唐末至五代前期。契丹人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对抗主要发生在代北、河朔一带。代北历来是草原民族出入河东的重要途径,契丹人将这里视为军事攻击的重点,也就不稀奇了。河朔一带能够在军事上给契丹人可乘之机,则与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陈述先生曾经指出,自唐后期起,这里在政治上早已不听从朝廷的号令,世袭诸镇,不再向朝廷输纳贡赋,不受朝廷征发调遣,俨然独立王国。河朔不但成为长安失意文人的避难所,也融汇了相当数量的草原人口,如契丹、奚等都有一定数量人口居住在这里,政治、文化上都显现出明显的“胡风”。故朝廷对这里只能采取“因而抚之”的态度。^[1]进入五代以后,军阀混战,政权迭变,寻找异族为援成为各种势力争夺权利的重要手段。这一切都给契丹人在中原地区的军事进取创造了条件。

唐天复二年秋,阿保机“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俘生口九万五千”^[2],由此拉开了进攻中原的序幕。继之在唐天复三年、五年和辽太祖神册元年又连续多次对河东云州、朔州、蔚州等地发动大规模进攻,至神册元年时止,已“自代北至河曲,逾阴山,尽有其地”,^[3]基本上控制了这一地区。在这一阶段中,辽人的主要进攻目标集中在代北,此后辽虽然也对云州、天德军等叛服不定的州军采取过军事行动,^[4]但主攻方向已转入河朔地带。

神册二年,“晋新州裨将庐文进杀节度使李存矩来降”,三月契丹合新州降将攻幽州,后唐“节度使周德威以幽、并、镇、定、魏五州之兵拒于居庸关之西,合战于新州东”。契丹军大破唐军,斩首三万余级,以此役为转折,辽人兵锋明显东移。

神册六年,辽大军出古北口,围攻檀、顺、安远、满城、三河、良乡、望

都、潞、遂城、长芦、涿州等十余城；天赞年间又继续以幽蓟为主要进攻对象，多次攻略蓟北、燕南一带。^[5]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代北、河朔名义上虽然仍属中原王朝所有，实际上大多数地区已被辽人控制。辽军不但经常出入于此，而且还将主要州城的百姓俘掠过半。至会同元年十一月，后晋石敬瑭“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6]，将燕云十六州割让于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只不过是既成事实的一种认可而已。

辽军在对代北、河朔地区进行军事打击，攻城略地的同时，亦将大量人口迁往塞北。如唐天复五年，击刘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辽太祖神册六年，攻略檀、顺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天赞三年“遣兵略地燕南”，亦“徙蓟州民实辽州地”^[7]，等等。在《辽史·地理志》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因安置中原移民而设置的36个州县当中，就有24个是在太祖、太宗时期建立的，约占总数的67%。可见这一期间是辽本土获得中原人口的主要时期。

第二阶段：太宗会同二年至圣宗统和二十二年。

这六十五年间，先有后晋、后汉、后周，后有北宋与辽对峙。太宗会同元年至世宗时期，辽军继续保持着进攻的势头，不断向中原发动进攻，但规模已有所减弱。穆宗、景宗时期，虽然双方也有过多次战争，但大多是中原王朝以收复燕云十六州为目标，对辽发起的进攻。辽穆宗应历九年，亦即周世宗显德六年四月，后周伐辽，“拔益津、瓦桥、淤口”，五月“陷瀛、莫二州”^[8]，对辽进攻取得成功。继之宋太宗也连续对辽发动进攻，并曾一度包围辽南京，占据着作战的优势。^[9]至辽圣宗统和四年，亦即宋太宗雍熙三年三月，宋遣曹彬、田重进、潘美、杨业分别统兵出雄州、飞狐、雁门三路，对辽发动进攻。这次战役虽然是由宋方发动，但在战役的进行过程中，宋军逐渐丧失优势，致使辽军反守为攻步步进逼，不但挫败了宋军的进攻，并且最终生擒宋骁将杨业。^[10]圣宗一朝是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盛时期，以这场战役为转机，辽方转守为攻。此后几年，不断主动对宋出击。统和六年进攻河北涿州、满城、易州等地；统和十七年进攻宋遂城、瀛州等地；统和二十二年进攻遂城、瀛州、祁州、洺州、德清军，进而屯军澶渊，迫使宋朝与之签订了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城下之盟。^[11]统和四年曹彬等对辽进攻失败，宣告了宋人收复燕云十六州梦想的彻底破灭；而“澶渊之盟”签订以后，辽国力也逐渐由盛转衰，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对宋

战争,因而此后辽宋之间再无大的军事冲突。

分析辽与中原王朝之间的战争状况,是想说明中原人口被俘北迁的阶段性与迁入地的位置。从以上分析可知,太宗会同二年以后至世宗时期,战事规模相对较小,辽方俘获人口的记载并不多见;穆宗、景宗两朝的战事是以中原进攻为主,因此辽方俘获人口的数量有限。圣宗时期是继太祖、太宗以后,被俘中原人口北迁的第二个高潮期。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人口的迁入地与第一阶段明显不同。太祖、太宗时期燕山以北是契丹人的势力范围,他们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作为其政治、经济核心地带,因此这一时期中原人口的迁入地主要集中在燕云十六州。世宗至圣宗时期,辽与中原王朝之间境界变化最大之处在于燕云十六州的割属。由于燕云十六州由中原领土变为辽内地,多数被俘人口就直接被安置在燕云故地,只有一部分被迁入辽本土地区。如《辽史·圣宗纪》记载:统和六年,辽军进攻长城口,一路“杀获殆尽”,被俘获者“分隶燕军”;随后辽军又攻破莫州,所俘人员亦“使隶燕京”。统和七年,辽军再次进攻河北,“宋鸡壁砦守将郭荣率众来降,诏屯南京”。辽军攻破易州,“迁易州军民于燕京”,又令“鸡壁砦民二百户徙居檀、顺、蓟三州”。以上事例足以说明,向燕云十六州移民是圣宗时期移置中原人口的重要流向。

移民阶段性特征与迁入地位置的分析,是探讨辽代农耕区形成阶段与分布状况的前提。契丹本是以狩猎、畜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非农业民族,农耕生产向辽本土传播主要依靠中原移民。如前所述,太祖、太宗两朝是中原移民进入草原的主要时期,因此大多数以汉人为主要居民的州县都设置在这一时期。太宗以后各朝由于燕云十六州已割属于辽,有相当一部分被俘掠的中原人口就被直接迁到这里,进入辽本土的中原人口则相应减少。统计《辽史·地理志》有关记载,可知这一时期因中原移民而设置的州县仅占总数的33%,远远低于前一个时期。而这33%中,又有一大部分属于由上京迁往中京地区的二次移民,纯粹的中原移民比例更低。由此可以推论辽本土内的农耕区应主要形成于辽初,即太宗会同二年之前。

二 渤海农业人口的迁移

除了中原农业人口之外,渤海人的迁移同样对辽本土农业发展起过

重大推动作用。

在讨论渤海人迁移问题之前,必须首先了解渤海人的经济生活与生产形式,而这一切又与渤海人的历史有直接关系。

渤海国是公元七世纪后期,以靺鞨人为主体的建立的具有封建化特征的地方政权。据《隋书·东夷传》所载,靺鞨共分为粟末、伯咄、安车古、拂涅、号室、黑水、白山七部。其分布地域大致在黑龙江下游至长白山一带,以牡丹江、第二松花江流域为腹心。创立渤海国的是粟末靺鞨,早期靺鞨人的生产结构与同时代东北地区其它山地林区的民族一样为半农半猎。公元六世纪末,隋炀帝攻打高丽,靺鞨首领度地稽率其部众归附隋朝,被安置在柳城,即大凌河谷地的营州一带。从秦汉时期起,大凌河谷地就在中原农业文明向东北地区传播扩散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靺鞨人居此地,自然也会直接接受到农业文明的影响。靺鞨旧地气候湿润,土壤肥沃,农业本来就有一定地位,西迁以后更容易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入唐以后这部分靺鞨又因协助朝廷平定刘黑闥叛乱,并击败突厥对幽州的进攻,首领度地稽被唐朝封为蕃国公,历迁至营州都督。^[12]由此进一步加深了对于大凌河谷地以及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了解和认识。唐初平灭高丽后,又有一部分由首领大祚荣统领的内附靺鞨被安置在营州附近,于是有更多的靺鞨人直接接触到中原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水平与农业在生产结构中的比重,自然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营州一带的内附契丹首领李尽忠率众反叛,居住在这里的粟末靺鞨也附从契丹反唐。唐朝派兵平定叛乱,粟末首领大祚荣率其余众,东迁至今吉林省敦化县南的东牟山一带,筑城居之。此后大祚荣一支势力渐大,自立为振国王。这一切引起唐王朝的重视,睿宗时唐朝遣使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其后子孙世袭,至贞元十一年又晋封为渤海国王。大祚荣一支汉化靺鞨的回迁对于渤海国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渤海国境内民族构成复杂,仅作为主体民族的靺鞨人本身,就有土著居民与汉化回迁者的区别,境内各地生产结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学术界一般认为,渤海国封建制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地域基础,主要依托于原来高句丽、扶余故地和靺鞨腹心地带的西部及五京地区。^[13]支持这种封建制度存在的经济基础则是具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农耕生产。渤海国建立之前靺鞨人的生产中虽然也存在着简单农业,但生

产水平还很低下,其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规模的扩大,都是汉化靺鞨人回迁以后的事情。从考古调查掌握的资料来看,在渤海上京及东牟山一带,都发现过铁犁、铁镰等农业生产工具,这与《新唐书·北狄传》中渤海国有稻、豉、李、梨、布、绵、绌等物产的记载相印证,说明渤海的农业生产早已脱离原始阶段,具备较高的生产水平。

渤海人大举迁入辽本土是在辽太祖攻占渤海国全境之后。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大举兴兵,灭掉渤海国,是在天赞四年,而在此之前,契丹攻夺渤海领土的战事,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其进攻的首要目标是辽东。随着战事的进展,已有许多渤海人被陆续迁入辽本土。据金毓黻先生研究,辽东地区归属渤海大约在九世纪中叶。^[14]此后,渤海国西界与契丹活动区域直接相连,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契丹势力开始东向发展,辽东自然成为辽军进攻的首选目标。

辽军最初占领的是辽阳附近地区^[15],前后“力战二十余年”,于天赞初年攻占整个辽东。^[16]获取辽东后,辽太祖又于天赞四年对渤海国本土发动全面进攻,迅速攻占渤海全境。为了便于对渤海故地进行统治,太祖攻下渤海国都忽汗城之后,便当即在天显元年(926年),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封太子耶律倍为东丹王,并命耶律羽之为中台省右次相辅佐。针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与故渤海国的民情,身为朝中重臣的耶律羽之上表皇帝说:“渤海昔畏南朝,阻险自卫,居忽汗城。今去上京辽邈,既不为用,又不罢戍,果何为哉?先帝因彼离心,乘衅而动,故不战而克。天授人与,彼一时也。遗种浸以蕃息,今居远境,恐为后患。”以往渤海人自立国家,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辽建国后,他们不但在政治上不称臣纳土,军事上也没有放松戒备。太祖虽然收复了渤海,但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民族脱离辽国腹地而雄踞一方,不能不是国家的心腹大患。出于这样的原因,耶律羽之献策云:“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乘其微弱,徙还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鱼盐之饶,必安居乐业。”此策当即获得批准,并于同年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计划,“徙东丹国民于梁”。^[17]

梁水即今太子河,《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下有如下记载:“辽河出东北山口为范河,西南流为大口,入于海;东梁河自东山西流,与浑河合为小口,会辽河入于海,又名太子河,亦名大梁水。”辽河平原东部的太子河两岸,就是耶律羽之所说的“地衍土沃,有木铁鱼盐之利”的“梁水之地”。

事实上辽实施这一移民计划时,渤海移民的迁入地不仅限于辽东,上京、中京地区也分别迁入大量渤海人。

按照所在地区的不同,可以把辽境内以渤海人为主体的州县或渤海人占据一定成分的州县,区分为如下两种情况:

1. 上京、中京地区以渤海移民为主要人口成分而设置的州县。

见于《辽史·地理志》记载,属于这类的州县有:

上京道临潢府:

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湮谿,先得是邑,迁其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居。

定霸县:本扶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其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

保和县: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

潞县:太祖破蓟州,布于京东,与渤海人杂处。

易俗县: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围守经年乃降,尽徙于京北,置县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属居焉。

迁辽县:本辽东诸渤海人,大延琳叛,后以城降,徙其家属于京东北。

渤海县:本东京人,因叛,徙置。

宣化县: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绿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

祖州:

长霸县: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

咸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

怀州:本唐归诚州,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

扶余县: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

显理县:本显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湮谿,迁民于此。

庆州:

富义县: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

永州:

长宁县:太祖平渤海,迁其民于此。

义丰县:本铁利府义州,辽兵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

仪坤州:应天皇后建州。太祖平渤海……俘有技艺者,多归(后)帐下。

龙化州:(唐天复三年)太祖伐女真,俘数百户实焉。

降圣州:

永安县:太祖平渤海,破怀州之永安,迁其人置寨于此。

饶州:

长乐县: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

临河县:本丰永县人,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

安民县:太宗以渤海诸邑所俘杂置。

中京道恩州:太宗建州,开泰中以渤海户实之。

恩化县:开泰中以渤海人户置。

黔州: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

盛吉县: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

迁州:圣宗平大延琳,迁归州民置。

润州:圣宗平大延琳,迁宁州之民居此。

海阳县:本东京城内渤海民户,因叛移于此。

从文献记载来看,迁入辽上京、中京地区的渤海人,具有如下时空分布特点:(一)时间:大规模的渤海移民主要集中在太祖、太宗及圣宗两个时期。太祖、太宗两朝,辽平灭了渤海国,移渤海旧民实辽内地,以此来巩固军事胜利成果。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上述各州县渤海移民可达四十万上下。^[18]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渤海人迁往上京、中京等处的移民活动,大约持续到太宗即位后不太长时间。从《辽史》的记载来看,太祖去世于天显二年,同年太宗即位,次年即天显三年,辽将故渤海即东丹国民迁至辽东地区。太祖时期渤海故土与辽统治核心地带相距甚远,渤海俘户自然不能留居故土,随着战事的起落,他们被分批送至上京等地安置;太宗时期情况则不同了,天显三年东丹国举国南迁,在大部分移民被安置在辽东的同时,一部分渤海人也同时被迁至上京等地。随着东丹人的整体南迁结束,上京一带的渤海移民活动也应停止。太宗之后,圣宗时期虽也曾将渤海人迁往上京、中京两道,但这次移民的数额比太祖、太宗时期少得多,若以州县而论,上引各州县中,仅上京临潢府易俗县、迁辽县,中京恩州恩化县以及迁州、润州的渤海移民是在这一时期迁入的,在全部迁入上京、中京地区的渤海人中仅占16%左右。圣宗时期迁往上京、中京等地的渤海人基本是不宜继续在辽东地区居住的渤海叛户,而圣宗多次征伐高丽获得的俘户,则就近安置在辽东一带。这种情况与太宗会同初年以

后,中原俘户被直接安置在故燕云之地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二)空间:渤海人的主要迁入地集中在上京道所辖各州县,特别是临潢府下辖各县移民人口尤为集中。依《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统计,上京道各州县中明确说明人口来源的共47个,其中含有渤海移民的有22个,约占总数的47%。上京道既是契丹人的发祥地,也是辽的政治与经济核心,大量渤海人的迁入对这里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2. 东京地区在渤海移民基础上设置的州县。

东京所在的辽东地区,是渤海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属于这一类型的又可分三种情况,一种为东丹移民,一种为渤海遗民,一种为渤海、高丽俘户。

(1) 东丹移民。

在《辽史·地理志》的记载中,东京道内含有东丹移民的主要有下列州府:东京辽阳府、开州、辰州、庐州、铁州、兴州、汤州、崇州、海州、慕州、显州、涿州、乾州、贵德州、沈州、严州、集州、广州、辽州、祺州、遂州、通州、韩州、双州、银州、同州、咸州、信州、龙州、湖州、渤海州、郢州、铜州、涿州。

对于以上各州县《辽史·地理志》的记载方式基本相同,下面以耀州条为例子以说明:

耀州,本渤海椒州,故县五,椒山、貂岭、浙泉、尖山、岩渊,皆废,户七百,隶海州。

从字面看,辽耀州与渤海椒州似乎是不同时代,在同一地域内先后设置,具有相承关系的地方行政建置,实际情况与字面印象差距很大。天显元年辽灭渤海后,当即改渤海国为东丹国。天显三年“辽东丹民以实东平”^[19],将都城由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县)移至东平郡,即辽东京辽阳府,这次东丹国的南迁,不仅仅是都城的迁移,更确切地说,是举国之迁,原设在东丹境内的州县随之俱徙。据金毓黻先生研究,东丹国原设州县,除鸭绿府所属诸州外,余皆南徙。上京、中京之民多迁辽阳;东京之民迁于开州,即今凤城;南京之民迁于海州,即今海城。^[20]东丹国各州县徙置后,或仍具旧名,或易新名。如前引耀州条,“耀州”应为东丹南迁后所改之名,东丹国号去后,这一地名仍被辽所沿用。而文中“渤海椒州”,似应为东丹未迁时之旧名。渤海灭亡,改建东丹国为天显元年,东丹南迁为天显三年,中间时隔仅三年,对于这段历史留下的文献记载甚少,存在纰漏

是难免的。元人修《辽史》时，审之不详，把“东丹椒州”误记为“渤海椒州”。与耀州条文字略有不同，《辽史·地理志》东京辽阳府辽阳县条下为：“本渤海金德县地……渤海为常乐县”。文中称辽阳县为“渤海国金德县地”，是指渤海国时期设县名称。下面再次提到“渤海为常乐县”，此处所称“渤海”，与“渤海国金德县地”中所用“渤海”在政权归属上完全不同，而与耀州条下“本渤海椒州”文字含义完全一样，应为“东丹”之误，“渤海常乐县”，本应写作“东丹常乐县”。对此金毓黻先生早已有所揣测，在其所著《渤海国志长编》中曾提出：“余尝疑辽志所称某州为渤海某府、某州、某县，多指东丹之府州而言。”

由以上论述可知，前文所引辽东京道内各州县，大多与渤海故州县没有地域上的继承关系，这些州县基本都是东丹国南移后所徙置，州县内人口也均系东丹移民。这次东丹移民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涉及州县近 50 个，其中明确有户额记载的仅 22 个，有户 1 万 7 千余户，依每户五口计，约 8 万 5 千余口。若将未注明户额的其余 28 个州县人口按比例进行推算，约有人口 10 万 8 千余口，共计人口 20 万左右。南迁的渤海人基本是保持较高生产技术的农民与手工业者，因此他们与中原移民一样，对于改变契丹民族的社会经济结构，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 渤海遗民。

前文已经提及，辽东地区早在唐中后期已归入渤海辖境，因此境内也应有一定数量的渤海遗民。文献中对这部分遗民的记载很少，这是因为：（一）东丹移民数量之大，使这部分渤海遗民轻易不为人注意，自然归入新置州县的管辖中。（二）辽东归入渤海后，大多处于羁縻状态，生活在这里的渤海人很有限。即使如此，文献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仍透露出这部分遗民的信息。《辽史·地理志》东京条下有如下记载：

归州：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后废。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所俘渤海户复置。

尚州：以渤海户置。

东州：以渤海户置。

以上归、尚、东三州的记载方式，与上述各州县不一样，都没有“渤海某某州”的说法，说明这三州不属于迁徙而来的东丹故州，人口构成主要为当地的渤海人。

(3) 渤海高丽俘户。

渤海高丽俘户是指辽中期征伐高丽战争中的战俘,他们进入辽领土的时间比前面两类晚得多。前两类渤海人最迟在辽太宗天显三年即进入辽统治区,其中除唐后期辽东地区的渤海遗民,以天显三年的东丹移民数量最大。辽中期圣宗曾发动征伐高丽的战争,作为战俘,一部分留居在原渤海故地的渤海人以及高丽人又一次被迁至辽东地区,归州、宁州都属于这样的州县。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辽统辖区内,无论是政治、经济核心上京一带,还是中京与东京所辖地区,渤海人都占相当比例,成为当地人口构成中的主要部分,他们的出现必然对辽本土内农耕区的扩展产生很大影响。

通过以上对于中原与渤海人口迁移过程与迁入地的分析可知,辽太祖、太宗与圣宗时期分别是农业民族进入辽本土的两个重要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内,无论中原人口还是渤海人口,都以第一阶段进入辽本土的数量最大。在第一阶段内,中原人口主要被迁入西拉木伦河流域,即上京附近;渤海人口则分别被迁往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辽东各地。在第二个阶段内,中原人口主要被迁往燕云十六州,渤海人口大部分迁至辽东,被迁往上京等地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从时间阶段来看,至会同二年,以上京及附近地区为迁入地的大规模农业人口的移民活动基本停止。

农业民族的迁入与辽本土农耕区的形成有直接关系,农业人口的集中迁入时期,就是辽本土内农耕区形成的最重要时期;农业移民集中的地方,也就是辽境内的主要农耕区。辽本土内的农耕区主要形成于太祖、太宗时期,至太宗会同二年西拉木伦河流域人口大规模迁入基本停止,人口进入自然增长阶段,与古代草原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特点吻合,耕地面积的扩展也基本处于稳定状态。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外的辽本土其它地区,如东京、中京等地,虽然在太宗会同初年以后,也有不同数量的农业人口迁入,但由于数量很少,尚不能构成推动农耕区大幅度扩展的动力。通过以上研究,可以认为辽本土地区主要农耕区都形成于太宗会同年前后,此后由于大规模的农业人口迁移基本停止,农耕区的大幅度空间扩展过程也告结束,农耕区土地的增长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同步,呈稳定发展形势。

(原载《文史》总第47期,1993年)

注 释

- [1] 陈述《契丹政治史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 [2][3]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
- [4][5] 《辽史》卷二《太祖纪》下，卷三《太宗纪》上。
- [6] 《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 [7]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卷二《太祖纪》下。
- [8] 《辽史》卷六《穆宗纪》上。
- [9] 《辽史》卷九《景宗纪》下。
- [10] 《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 [11] 《辽史》卷一二《圣宗纪》三。
- [12] 《旧唐书》卷一九九《北狄传》下。
- [13] 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 [14] 金毓麒：《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6月翻印。
- [15] 《辽史》卷一《太祖纪》上，卷二《太祖纪》下。
- [16]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十《天祚皇帝》。
- [17] 《辽史》卷七五《耶律羽之传》。
- [18] 魏国忠：《渤海人口考略》，载《求实学刊》，1983年3月。
- [19] 《辽史》卷三《太宗纪》上。
- [20] 金毓麒：《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4月翻印。



参 考 论 著



1. 王毓瑚：《我国历史上农耕区的向北发展》，载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
2. 郭声波：《论四川历史农业地理的若干特点与规律》，《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3. 王建革：《农牧交错与结构变迁：清代内蒙古地区的农业与社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
4. 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2004年第4期。

辛德勇

巨鹿之战地理新解

巨鹿之战是决定秦王朝灭亡的重大历史战役。本文通过对史料的详尽梳理,对巨鹿之战中的几个地理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文章首先叙述了巨鹿之战的战前形势,然后对围城秦军的来路与定陶战役胜负的根本原因、项羽北上救赵路线、战役进程等进行了考证,最后补论王离所部内调的路线和时间。此外,文章还取得了关于“安阳”、“汗水”、“棘原”等古地名的考证成果。

辛德勇,1959年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中心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献和历史军事地理研究。

秦朝末年,项羽等反秦义军与章邯、王离率领的秦王朝军队在巨鹿(今河北平乡附近)进行总决战,结果义军大获全胜,秦军全军覆没,史称“巨鹿之战”。在这场战役中,双方都投入了全部主力,因而义军的胜利,事实上也就宣告了秦朝的灭亡。对于这一重大战役的地理形势,以往有过一些叙说,但是都还值得商榷。为此,本文试图重新解释有关巨鹿之战的几个基本地理问题。

一 战前形势述略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率领九百名“闾左”戍卒在蕲县(今安徽蕲县)大泽乡起义^[1],揭开了反秦战争的序幕。陈胜起义后,很快向西攻取陈郡,建立张楚政权。张楚政权建立后,派兵四出进击,同时各地义军蜂起,纷纷响应,结果很快就控制函谷关以东除今山西省以外的大部分地区,秦朝在关东仅仅剩有黄河岸边一线之地。由周文统领的一支义军,一度攻入函谷关,直逼秦始皇陵东侧,威胁秦都咸阳;另外由宋留所统领的一支义军,也已攻下南阳,兵锋直指武关,同样逼向咸阳。秦王朝危在旦夕,形势对于反秦义军极为有利。

就在这时,形势急剧逆转。秦二世派遣章邯统领郿山始皇陵刑徒,击退周文。章邯乘胜追击,于秦二世二年十一月,在滹池歼灭周文所部,并直接威胁黄河两岸的各路义军。与此同时,义军内部出现叛乱,黄河北岸赵国旧地的“赵王”武臣,被部将李良杀害。李良占领赵王都邯郸后,武臣属下的大将军陈余、丞相张耳,北逃至信都(今河北邢台),随后又挟立赵歇为赵王,与李良相抗衡。李良进击陈余失败,举兵降附秦将章邯。

李良的投降,使章邯减缓了对黄河北岸的顾虑,得以集中兵力,与黄河南岸的陈胜等人较量。秦二世二年十二月,陈胜战败,被手下的叛逆杀害。同年六月,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怀王^[2],立都盱台(今江苏盱台东北),以此号令各路义军,继续与秦军作战。与此同时,秦军攻克临济(今河南封丘西南)，“魏王”魏咎自杀,章邯转而向齐地进军。项梁率项羽、刘邦等北上救齐。项梁等北上后,在七、八月间连续得胜,章邯不支,转取守势。但就在这时,秦二世又增派军队,支援章邯,使秦军兵力大振,反攻楚军。结果同年九月在定陶城下全歼项梁所统楚军主力,这就是著

名的定陶战役。

定陶战役失利之后，楚怀王从盱台迁至彭城，同时全线收缩兵力，把吕臣、项羽和刘邦各自统领的三支部队，分别屯驻在彭城东、西两侧和彭城东南相邻的碭郡，以防止章邯进剿。章邯在消灭项梁所部楚军劲旅之后，则认为黄河南岸剩存的楚军残余已不足顾虑，于是转而北渡黄河，先去翦除由张耳、陈余等统领的赵军。

秦二世二年后九月，章邯渡河北进，张耳等挟赵歇望风而走，逃入巨鹿城。章邯派王离率军包围巨鹿。巨鹿之战由此展开。

除了被围在巨鹿城中的张耳、赵歇和巨鹿城北的一部分赵军之外，这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是楚怀王命项羽等镇守彭城、碭郡一线，控制着彭城东南地区的局势；田荣挟田市为“齐王”，控制着齐鲁地区；韩广号称燕王，控制着秦广阳郡以北的燕国旧地。另外，还有号称魏王的魏豹据有河东平阳一带；彭越率领千余人活动在齐地西侧的巨野泽周围；韩成、张良等也率领一千多人，活动在颍川郡一带，往来游击。除此之外，其余大部分地区都在秦军的掌握之下。楚、齐、赵、燕等是反秦的同盟军，这四方势力递相毗邻，互为犄角，只要同心协力，实力应当足以与秦军相抗衡。但除了楚怀王一方积极主动外，其余各方往往心怀私计，观望时机，并不出力配合作战。

巨鹿被围，秦人灭赵在即，迫使各路诸侯不能不在保存自己实力与同心合力抗秦之间做出最后的抉择。因为章邯一旦消灭赵军，随之必定攻取燕地，然后以黄河以北地区为依托，就可以稳固地进军齐、楚，从而各个击破各方反秦力量。结果是燕、齐、楚几方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这场决战。

二 围城秦军的来路与定陶战役胜负的根本原因

章邯率军渡过黄河以后，并没有亲临第一线对赵作战，而是委派王离、涉间率领所部包围巨鹿城，自己统领 20 多万部队先进驻邯郸城，把城中居民全部迁往河内（今河南武陟西南），然后夷平邯郸城郭，率军屯驻棘原，为围城秦军提供粮草馈运的保障。^[3]显然，围城秦军的数量也相当庞大，一是兵力之盛，足以攻陷巨鹿，无需章邯助阵；二是兵员之多，需要大量粮草供给。不然不会做出这样的部署。那么王离这支部队又是在什么

时候、从哪里调来参战的呢？对此，史籍中缺乏明确的记载，今人虽有所推测，但也语焉不详。王离所部的来路不仅与巨鹿之战的军事部署直接相关，而且也是决定此前的定陶战役成败的关键，所以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王离、涉间是围城秦军的统帅。涉间仅见于此役，无从多事考究，但他系于王离名下，应是王离的裨将。王离是秦将王翦的孙子，为秦北方边防军统帅蒙恬的裨将，协同蒙恬统领30多万大军，驻扎在上郡（治所在今陕西延安），防御秦朝在北方的劲敌匈奴。蒙恬被秦二世逼迫自杀之后，由王离接任蒙恬的主帅位置，事见《史记·李斯列传》。因此王离所部应即秦北部边境上的边防军，当无疑义。这一点以往的研究者一般也都看到。但王离的军队是何时以及怎样从北边调往内地参战，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论述。对此，《史记》卷七三《白起王翦列传》记载说：

陈胜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孙王离击赵，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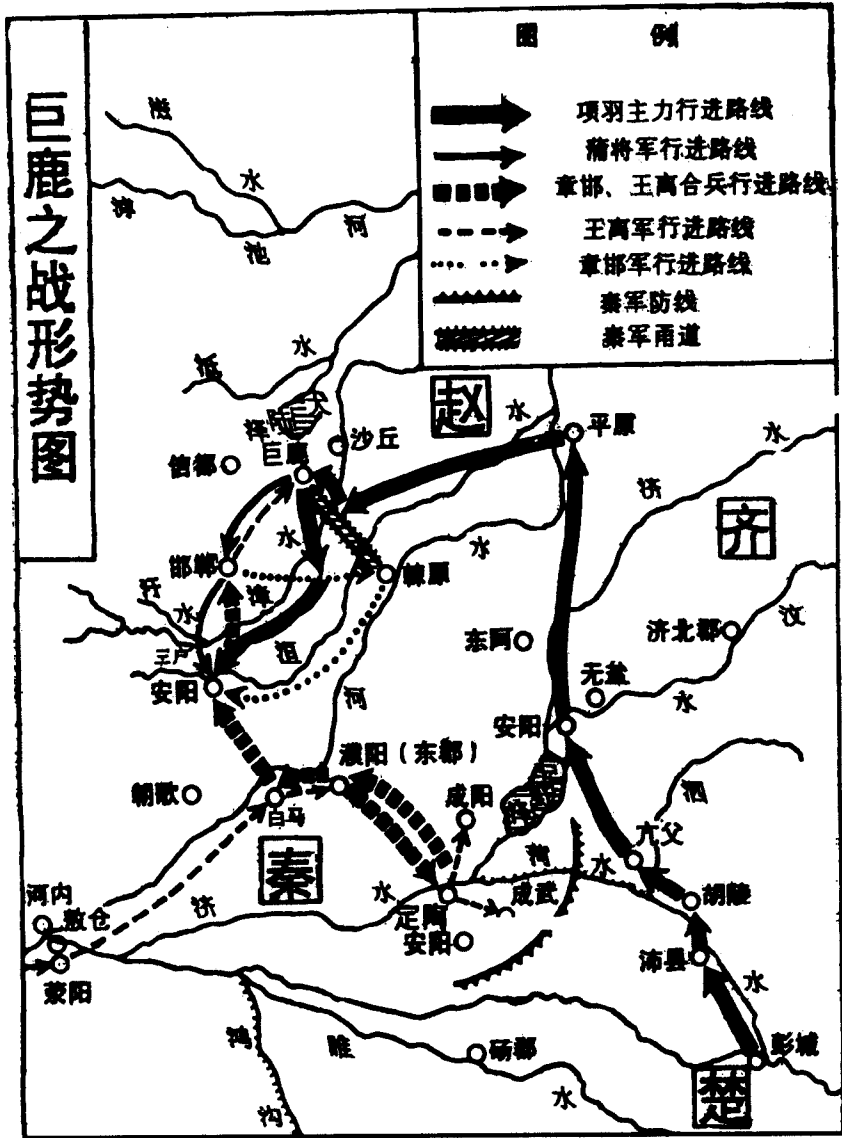
从行文上看，很容易使人得出王离一军应当是为进剿赵歇而调动的结论，其军事目标也首先是进击赵国。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论巨鹿之战的形势说：“如果秦军灭赵，则章邯和王离两军就会合并，反动的力量就会加强。”显然是认为在此役之前，章邯、王离两军尚未会合。——这很可能就是根据《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的记载而推导出的结论。可是《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说明在围城之前王离、涉间的部队就已经从属于章邯麾下。可见需要重新探讨王离所部东调的过程。

从历史记载来看，在陈胜起事之后，秦朝廷由关西向关东大规模发兵共有三次。一次是前述章邯率郿山刑徒出关进击周文、陈胜等；一次是在剿灭周文之后、击杀陈胜之前，派遣司马欣、董翳率军增援章邯；另一次是在定陶战役前再度派遣大量兵力增援章邯。最后这次增兵，直接决定了定陶战役的胜负。

定陶战役前的形势是章邯在消灭陈胜大部兵力后，转而进攻东阿齐军；项梁率项羽、刘邦等北上救齐，在东阿大破章邯，秦兵退守濮阳。这时项梁分出部分兵力，派遣项羽、刘邦率领向西进击。途经定陶，攻城未下，项羽、刘邦绕过定陶，继续西进，一直打到雍丘，而把定陶留给项梁来解决。项梁“比至定陶，再破秦军”，顺利取得胜利。这样楚军攻占雍丘、定

陶、东阿一线，与据守荥阳、濮阳一线的秦军相对峙，形势有利于楚军。如果楚军继续进击秦军，很有可能全歼章邯所部，这样就要动摇秦朝的根本实力，朝廷当然不会坐视不救。于是秦二世“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4]。既然所有可调动的军队都在征调之列，王离所部就应在这时调往关东。王离所部边防军应有30余万，又是久经战阵的劲旅；而当时项羽、刘邦，特别是楚方最善于冲锋陷阵的黥布的部队，又都远离定陶，与项梁不在一处，这样王离与章邯合兵进击项梁所部，恰如泰山压顶，项梁当然根本无力抵御，结果全军覆没。由此看来，项梁兵败定陶，固然有其骄傲轻敌和齐军不配合作战等原因起作用，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秦朝廷调来了王离的部队，使得双方实力相差过于悬殊。

定陶战役失利之后，楚军全线退缩至彭城、碭郡一线。此线以北，又重为秦军占据。《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载项羽北上救赵时，刘邦同时分兵向西北进击，曾在定陶附近的成武攻破“王离军”，《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亦云刘邦在定陶附近的咸阳、杠里一带“出兵击王离，大破之”^[5]。当时王离正率军围攻黄河北岸的巨鹿，黄河南岸怎么会有王离？看来驻守在黄河南岸的只能是王离属下的一部分军队。由于这支边防军与郡县地方武装有明显的区别，所以《秦楚之际月表》记云“攻破东郡尉及王离军于成武南”，说明“王离军”与“东郡尉”所统领的部队具有不同性质。又《史记》卷九五《樊酈滕灌列传》记樊哙随从刘邦西征时“出亳南，河间守军于杠里，破之”。西汉有“河间”地名，远在黄河北岸，与此无涉；而且从行文上看，这里的“河间”也不应该是地名。与王离一同围攻巨鹿的裨将名为“涉间”，“涉”、“河”字形略近，“河间”应是“涉间”的讹误。尽管这句话一定还有讹夺，但把“河间”订正为“涉间”，已经基本可以讲通。杠里位于成阳附近，见《史记正义》。既然此时涉间与王离同在巨鹿城下，那么留在这里的“涉间守军”也只能是涉间属下的一部分军队。王离与涉间能把一部分军队留驻在定陶附近，完全可以证明王离、涉间所统领的边防军肯定参与了定陶战役。定陶战役之后，王离、涉间留下一部分军队驻守在黄河南岸，以防止楚军北上；同时亲率大部主力随同章邯渡河北上，围攻巨鹿，这就是巨鹿城下秦军的来路。



巨鹿之战形势图

三 项羽北上救赵路线

秦二世二年后九月，巨鹿被围困之后，大将军陈余逃出城外，寻找救兵。^[6]陈余收编数万常山郡赵军，屯驻在巨鹿北侧；张耳的儿子张敖也收编一万多名代郡的赵军，同驻在巨鹿以北。同时，赵国向楚、齐、燕等国告急，燕、楚立即发兵救赵，而齐相田荣因赵国容留政敌田角、田间，不肯出兵相助。^[7]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记楚怀王发兵救赵经过云：

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

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虬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乃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

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所有关于项羽北上救赵路线的复原研究，都是以上述记载为基础。因为除此之外，别无其它直接记述。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宋义、项羽等北上途经的地点有：（一）安阳；（二）宋义离军送子入齐至无盐；（三）河。其中无盐并不是行军直接经过的地方，所以它只能对确定其它地点起参照作用，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安阳”和所谓“河”就成了论证项羽北上路线的关键，而这两个地点又相互关联，需要联系到一起进行分析。

麻烦的是“安阳”是个十分常见的地名，见于当时史籍和古钱币、铜器铭文记载的就有好多处^[8]。关于项羽经过的“安阳”，很早以来就有两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说法认为，“安阳”在黄河北岸，即今河南安阳西南。此说最早由唐朝人颜师古提出，见于所注《汉书·项籍传》。现在沿袭这一说法的有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之《秦末农民起义图》等。按照《项羽本纪》，屯驻安阳是在渡“河”之前，所以要是把“安阳”定在黄河北岸的今安阳附近，那么项羽等破釜沉舟所渡过的“河”就不会是指黄河，相应地就只能把它解释为漳河。

第二种说法认为“安阳”在黄河南岸的今山东曹县东侧。此说最早由唐朝人司马贞提出，见于所著《史记索隐》。现在沿袭这一说法的有漆侠等著《秦汉农民战争史》、朱大昫主编《中国农民战争史》秦汉卷以及台湾三军大学编《中国历代战争史》等。司马贞之所以要在颜师古之后对“安阳”的位置提出不同的解释，主要是由于项羽驻扎“安阳”是在渡“河”之前，他认为“河”应当是指“黄河”，因此“安阳”只能在黄河南岸求之。

上述两种说法虽然出入很大，但是各自所复原的项羽北上救赵路线，却基本大同小异，差别很小：都是由彭城向西北，经定陶和黄河南岸的“安阳”附近，至白马津渡过黄河，再经黄河北岸的“安阳”，渡过漳河，抵达巨鹿城下。这是因为根据彭城至巨鹿间的地理方位，这两个“安阳”不管是确定了其中的哪一个，都只能这样选择行军路线。可是，事实上上述两个“安阳”都无法确认，从而也就不能不重新分析项羽北上救赵所走的路线。

“安阳”的位置所在，首先必需能够完满地解释渡“河”和宋义送子至无盐两个问题。而把“安阳”定在黄河北岸的今河南安阳，则很难解释这

两个问题。

一、渡“河”问题。唐代以前,文献中单称“河”字,都是用作今黄河的专名,而不是河流的通称。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最早引述了项羽破釜沉舟所渡之“河”为漳河的说法,而谓“河”为北方河流的通称,似首先由岑仲勉先生提出,说见所著《黄河变迁史》。

可是岑仲勉先生并未能举出实例来证明他的说法,而谭其骧先生则认为北方河流通称为“河”,这“只能适用于唐宋以后。唐宋以前,‘河’是黄河的专称、正称”。谭其骧先生并且明确指出:“那时‘河’既然是一条水道的专称,当然不可能又用作通称。”^[9]这一见解,极为精辟,应当作为讨论项羽渡“河”问题的基础。

又有人认为漳河曾是黄河流经的河道,所以也可以用“河”字相称。谭其骧先生在《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一文中指出,曾是黄河流过的古河道在秦汉时也可以称之为“河”,他还认为项羽这次进军巨鹿,是破釜沉舟于漳河。但除了项羽渡“河”一事本身之外,所举其它例证称“河”时指的都是这些河流下游为黄河所直接流过的地方,其上游作为黄河支流的河段,则绝无这种用法。^[10]假若可以用“河”来指称黄河的支流,那么事实上也就等于说可以用“河”来作为北方大多数河流的通称了。因为黄河支流众多,覆盖了北方相当大一部分地区。这样一来,人们在使用“河”这一水名时,含义势必极为混乱,根本无法令人确知它指的到底是哪一条河流,在实际生活中绝不可能出现如此混乱的用法。可见“河”字仍旧是专指黄河干流,只不过它不仅可以指正在行用的干流河道,也可以指过去曾经行用过的干流河道。这是因为当时的黄河下游河道刚刚结束自然状态下的多分支散流形态,旧有的一些河道,还保存着比较完整的河形,甚至有可能在汛期仍旧分流一部分河水,所以用“河”来指称这些旧日的黄河干流河道是很自然的事情。换句话说,也就是在黄河干流河道改徙到其它地方之后,“河”这一专名仍在一些废弃了的河道上延续了一段时期,那些从未成为过黄河干流、未被人称过“河”的黄河支流河段,当然不可能有“河”的名称延续下来。今河南安阳附近的漳河从未成为过黄河干流河道,所以也就不能援依称旧黄河河道为“河”的通例。^[11]故谭文所论也不能作为凭据。由此可见,把《项羽本纪》中的“河”字解作漳河不符合“河”字在秦汉时的含义。

另外《项羽本纪》载项羽不满宋义在安阳滞留不前,谓“军无见粮,

……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显然“安阳”不属“赵”境之内，“赵”是在“河”的对岸。战国前期赵国大致以漳河为界，南与魏国接壤，今河南安阳西南的古“安阳”属魏，但战国后期此“安阳”为赵将廉颇所拔，洹水两岸从此归入赵国版图。^[12]况且项羽在“安阳”所讲到的“赵”指的还不是战国的赵国，而是由张耳、陈余等所建立起来的、正等待他们前去救援的赵国。赵国的设立，起因于张耳、陈余等为陈胜收取“河北”之地，渡过黄河后“下赵数十城，独介居河北”；赵国建立以后，张耳、陈余对赵王武臣说“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13]；章邯在定陶歼灭项梁所部楚军之后，“乃渡河击赵”，过黄河后直接接触赵军，并未与其他诸侯的军队譬如魏军遭遇^[14]；在李良杀掉武臣之前，赵将司马卬就已“徇朝歌”，进入安阳以南、白马津以北地区，灭秦后因其“定河内，数有功，而被立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15]凡此种种，均可以说明当时的赵国南界就是黄河。若把“安阳”定在黄河北岸的今河南安阳，那么这里本来就已经在赵国境内（按战国后期的情况而论，同样也是在赵国境内），不存在“渡河因赵食”的问题。赵国既南以黄河为界，“渡河因赵食”只能是指渡黄河，而决不可能是指漳河。依此，“安阳”只能在黄河南岸。

二、宋义自安阳送子入齐至无盐问题。《项羽本纪》记宋义在滞留安阳期间，弃置大军，送儿子宋襄入齐为相，至无盐“饮酒高会”。按无盐在今山东东平东南，由黄河北岸的“安阳”入齐都临淄，不应经过此地。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早已指出了这一点。另外当时军事形势紧张，宋义又心蓄异志，更不能不注意控制军队，他不应为送儿子出行而离开驻地过远。从黄河北岸的“安阳”到白马津黄河渡口的直线距离有120里左右；从白马津到无盐要有350多里；两段路程合在一起共有470多里，往返要耗费许多时日。恐怕任何一个人处在宋义的位置上都不会如此疏忽大意，更何况宋义本来就是一个满腹心计的权谋之士。

根据以上两点，把“安阳”定在黄河北岸，显然不可能成立。

“安阳”虽然不在黄河北岸，但也并不是黄河南岸今山东曹县东侧的古安阳。因为把“安阳”定在此地，同样有一些问题无法解释。

一、定陶战役之后，这一带为秦军所控制。如前所述，除了郡县地方武装之外，章邯还把王离、涉间属下的边防军留下一部分驻守在这一带，显然具有防备楚军北进的意图。项羽若果然经过这一带，不可避免地要与秦军发生战斗。可是如前引《项羽本纪》所记，楚军北上后直至破釜沉

舟渡河以前，一路上简直是如人无人之境，没有发生过任何战斗，这显然不合乎正常的情理。特别是白马津为战略要地，稍后刘邦西进时还在这里与秦将杨熊激战，未能取胜，说明必有重兵把守，项羽何以能兵不血刃地从容渡河？白马战后，杨熊又与刘邦在曲遇之东会战，结果失利后撤，被秦二世斩杀傲众。假如在这之前他就已经失守咽喉要津白马，放纵项羽劲兵渡河北上，影响巨鹿大战，秦二世岂不应早已把他处死？

二、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和《汉书·高帝纪》，刘邦与项羽同在秦二世二年后九月率军出发，项羽北上救赵，刘邦西向关中并一路收拢被打散的项梁残卒。史籍中绝无两军相互发生关系的记载，说明他们是各行其路，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十一月，项羽在安阳杀掉宋义。如《史记·项羽本纪》所记，在项羽杀宋义之前，这支军队已在安阳滞留46天。从十一月末向前推延46天，为十月中旬；从十一月初推算，则为九月中旬。按照前者，项羽驻军安阳是从十月中旬到十一月末；按照后者，则整个十月项羽都驻在安阳。总之，在十月前后，项羽一支部队正在安阳驻扎不动；而这时刘邦率领的西征军正在今曹县东之古安阳附近的成武、成阳、杠里一带与王离旧部及秦地方武装激战，《史记》卷九八《傅宽传》还明确提到当时的战斗地点也包括今曹县东侧的“安阳”，所以宋义、项羽驻军的安阳也决不可能是曹县安阳。

宋义、项羽驻军的安阳既不在前人所说的两个地方，那么又应该定在哪里呢？根据前文所做论述，我认为它必需满足如下四个条件：（一）在黄河的南岸。因为项羽等人是先驻安阳，后渡黄河。（二）在无盐的南侧或西侧。因为无盐是从安阳到齐都临淄所必经的地方。（三）距离无盐较近。因为当时的客观形势不容许宋义离开军营过远、过久。（四）在巨野泽以东。因为巨野泽以西是刘邦所率西征军经过的地方，项羽与刘邦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他也没有与巨野泽以西的秦朝守军发生过任何战斗。当项羽等在安阳滞留不进的时候，刘邦的西征军正在巨野泽以西地区与秦军激战。

根据这几项条件，可以把项羽驻军的“安阳”拟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南侧或西南侧的某一地点。今山东东平以西有地名安山，正在本文所推定的“安阳”稍北。^[16]按古地命名习惯，山南为阳，本文所定“安阳”很可能就位于此山之南而得名（参见文末补记）。

虽然目前还无法在史籍中找到材料来具体落实这一地名，但如前所

述，“安阳”这一地名极为常见，即使再多出一个失去位置记载的“安阳”也丝毫不足为怪。其实即使是其它极生僻的地名，见于秦汉以前史籍而后世失于记载的也比比皆是，不一定非强指为哪一具体地点不可。

项羽驻军的安阳目前固然还无法确指，但也并不是根本没有文字记载可以追寻。根据上文的推测，安阳应位于无盐附近，这里在战国属于齐地。齐国也有地名叫做安阳，常见的齐国刀币“安阳之法化”，就应是齐邑安阳的产品。关于这个安阳的所在，诸说纷纭，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信的结论。

第一种说法谓即前述曹县安阳，并且说《史记·六国年表》所载齐宣公四十四年“伐鲁、莒，及安阳”一事^[17]，指的就是这个安阳；又云这个“安阳”从此归入齐国，所以后来齐人会在这里大量铸造货币。这种说法在史学界较为流行，如杨宽先生即主此说，见所著《战国史》。但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等记载，当时齐人的西境虽曾一度延至今曹县西南的贯丘，有可能也侵及今曹县东侧的安阳一带，然而为时甚短，很短就又丢弃，齐西境大部分时间是稳定在巨野泽以北、以东。所以不可能长期稳定地在今曹县东侧的古安阳大量铸造齐币。

事实上齐宣公“伐鲁、莒，及安阳”，只是说至安阳而返，并未取得安阳。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宣公四十九年占取贯丘一事即作“伐卫，取贯丘”，义例分明，“取”与“及”不容相混。当时今曹县一带正处于宋、卫之间，这个“安阳”是否为鲁国属邑并不能得到证明。齐宣公四十四年这次南征，是并伐鲁、莒两国，当时莒国别有安阳。《后汉书》卷八二《方术列传》下云莒有“五阳之地”，李贤注云：“谓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并近莒。”所以宣公南征所至之安阳应是莒国安阳，与今山东曹县之安阳无涉。这进一步证明齐人造币的安阳不可能是在今山东曹县。

第二种说法谓安阳是指“鞞”之阳。“鞞”即著名的鞞之战战场，在今济南市西北。但论证“鞞”与“安”相通还要有其它证据，何况“安阳”与“鞞”距离更远，不能随意想像。

第三种说法谓即莒国之安阳。但齐人何以会造币于莒境？莒地在战国中后期虽然被齐国吞并，但这里与以临淄为中心的齐国旧地以及中原经济、商业发达区悬隔较远，相互往来必须穿越鲁中山地，运输不便，所以齐国也不大可能在这里大量铸造货币。

第四种说法谓安阳是指安陵，在今山东胶南附近。但“陵”与“阳”并

不相通,此说更毫无根据。^[18]

齐人造币的安阳既然无确地可指,那么它完全有可能与项羽驻军的安阳是同一个地方。战国时齐国在巨野泽东侧沿今运河一线向南拓展,直至彭城以北的滕、薛等地,无盐附近早已成为齐人内地;这里又邻近主要水陆交通线,隔巨野泽与当时的著名经济都会“陶”彼此相望,在这里铸造钱币,也便于商业交换使用。这种假设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论证,但毕竟可以说明上文所拟定的项羽驻军的安阳,并不是绝对没有可以印证的文字。

如果把项羽驻军的安阳定在无盐附近,那么宋义、项羽等北上救赵的路线就应是从彭城出发后经沛县、胡陵、亢父等地北上至无盐以南。当初项梁北上东阿救齐,走的大致就是这条路线。当时这里处于秦、齐之间的夹缝地带,从中通过应当比较容易。况且齐国虽然挟怨不愿出兵救赵,但毕竟与楚、赵还是反秦的盟友,宋义又心怀叵测,与齐人暗相联结,所以绝对不会阻止楚军北上。这就是宋义、项羽一路畅行无阻的真正原因。

如前所述,当时白马津渡口附近有秦军控制,而项羽在渡河时又没有与秦军发生过战斗,这说明他并没有从那里渡河。项羽破釜沉舟率全军渡河时只带三日口粮,前人早已指出,如果从白马津渡河,三天赶不到巨鹿城下^[19],所以楚军不可能由此渡河。

当时在白马津以下最著名的黄河渡口为平原津,在今山东平原附近。平原津西面直对着巨鹿城,秦始皇从之罘西返咸阳,中途患病,不治而死,患病的地点在平原津,而死去的地方就在巨鹿附近的沙丘平台^[20]。楚汉相争时韩信破赵入齐,也是由平原津渡河^[21]。可见这一渡口在当时极为重要,与巨鹿又具有直接联系。从平原津到巨鹿城的距离,与今河南安阳到巨鹿城的距离大致相当,项羽持三日军粮,完全可以应付这段行程。从整个行程来看,从无盐附近的安阳出发,过平原津到巨鹿也要比取白马津一路稍近一些,起码不比它迂远。所以项羽从安阳出发后应是一直向北,至平原津后始渡河东进,直抵巨鹿城下。

上面所推定的项羽北上路线,还可以找到两条旁证。一是《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秦二世三年十月,正当宋义、项羽等屯驻在安阳时,“齐将田都叛(田)荣,往助项羽救赵”;一是同年十一月项羽杀掉宋义后,故齐王建孙田安又“下济北,从项羽救赵”。《史记》卷七《项羽本纪》和卷九四《田儵列传》也记载齐将田都因“从共救赵”有功,而被项羽立为齐王,田安也

由于“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为项羽顺利赶赴巨鹿作战而出过大力，“项羽立田安为济北王”。田都、田安显然都是直接跟随项羽北上救赵的，项羽若不是像上面所讲的那样经齐境西边由平原津渡河，他们又怎么会附入项羽的麾下？当时田都军队的驻地必定距无盐附近的安阳不远，所以才会被项羽裹从北上；而田安控制的“济北数城”，是指秦济北郡的属邑，正是项羽过平原津所要经过的地方，平原津所在的平原县就隶属于济北郡。很明显，田安完全是因项羽经过而降从楚军的，他总不至于放着眼前的平原津不走，偏偏舍近求远，绕个大圈子，转到白马津一带去追随项羽。

四 战役进程

前文已经讲过，投入巨鹿之战的秦军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王离、涉间统领的边防军，布置在巨鹿城四周，担负围城和攻城的任务。另一部分是由章邯统领的军队（已由以刑徒为主改变为以从关中征集来的兵员为主），驻扎在巨鹿城南面，负责围城部队的给养。王离、涉间的围城部队，数目不详，但这支边防军原有 30 多万人，应全部调入内地，除去定陶战役后留在黄河南岸的一部分兵力之外，总还应有 20 万人上下。章邯的部队在经过了几次战斗之后，最后向项羽投降时仍有 20 多万。这样秦军投入战斗的总兵力应有 40 多万。秦军的总帅是章邯。

反秦义军方面，张耳、陈余在信都时还有数万军队，进入巨鹿城时未见有多大损失，大致还保持着原有的兵员。此外驻在巨鹿城北的常山、代郡两地赵军也有几万人，分别由陈余、张敖等人统领。燕国派来的援军数目不详，与陈余等一同驻在城北。这几部分人加在一起，最多也不过十万人上下。由于兵力对比悬殊，城北援军只能坚壁固守，不敢出击秦军。后来经不住张耳在城中一再催促，陈余不得不拨出五千人马试一试能否破围，结果如同以卵击石，无一生还。从此城北援军再也不敢出战，只能做壁上观。

项羽的援军数量也不会很多，因为定陶战役时楚军的相当一大部分兵力已被章邯消灭，余下的项羽、刘邦、吕臣、黥布等几支部队合在一起也决不会超过十万，其中刘邦还带走一小部分西征，怀王身边也不能不留一部分军队守卫，所以宋义、项羽所率援军也不过几万人上下。幸好田都、

田安率部沿途加入,壮大了几分声势。这支援军虽然数量不多,但基本上都是久经战阵的劲旅,特别是黥布的军队,最敢于冲锋陷阵,几乎所向无敌。古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实际上主要是这类善征惯战的劲兵,乌合之众凑集再多也只能起到增壮军威的作用,实际上未必顶事。这样,估计楚、赵、燕、齐几方军队加在一起也不到20万,比秦军要少一半多。

王离围城时章邯所部的驻扎地点,《史记·项羽本纪》只说是在巨鹿的南面,很不具体,《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则对此有明确记述,云:“章邯军巨鹿南棘原,筑甬道属河,饷王离。”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三国时人张晏语曰棘原“在漳南”,这是对于棘原所在位置最早、也是最明确的记述。《史记集解》又引述西晋人晋灼的注释,谓棘原为“地名,在巨鹿南”,这实际上只是解释出棘原是一个地名,至于其位置所在,晋灼并不清楚。所谓“在巨鹿南”,不过是转述《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的原文,等于什么也没说。^[22]明清一些地理书如《大清一统志》记述棘原在清平乡县(今平乡县西南)亦即秦巨鹿县南,完全是由于把晋灼漫无依据的“巨鹿南”坐实为紧邻巨鹿城下而推衍出来的错误结论。还有人搞错巨鹿故城的位置,把棘原比附为清巨鹿县(即今巨鹿县)南七里的棘城(一名棘阳寨),已在秦巨鹿县北很远,更为荒诞不经。今人论及巨鹿之战的地理形势,则几乎无不踵袭《大清一统志》等明清志书的说法,对此不能不加以辨正。

第一,张晏去秦汉还不算很远,他明确地说棘原位于漳水以南,自应有所依据。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能随意否定这一说法。

第二,如前所述,王离围攻巨鹿城时章邯驻军棘原;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歼灭围城的王离、涉间部队以后,由巨鹿挥师南下,渡过漳河,驻军漳河南岸,与驻军棘原的章邯相对峙。歼灭王离所部之后,楚军已完全占据上风,棘原若紧邻巨鹿城下,项羽何不一鼓作气,聚而歼之,他反而与章邯脱离接触、绕到漳河南岸去干什么?这样做岂不是放虎归山?

第三,棘原若紧邻巨鹿城下,那么一直驻在这里的章邯部队,实际上与王离的围城部队已合为一军,为什么能坐视王离被歼而不救?

若是不能合理而又有根据地解释上述三点,就不能不维持张晏的旧注。

张晏只说棘原在漳河以南,但没有讲明更具体的位置。章邯驻军棘原,职在保障围城部队的粮食馈运,当时是“筑甬道属河,饷王离”。甬道是指在道路两旁夯筑土墙,以防止运输物资被劫扰。“河”过去往往都解

作漳河。如前所述,当时单称“河”字都是专指黄河;通观《史记》,可知司马迁行文更不至于如此含混不辨。况且解作漳河无法解释粮饷的来路,一是漳河上游深入太行山区,无粮外运;二是漳河下游距巨鹿已经很近,即使在两岸能够弄到一些粮草,也没有必要采用水运,再说40多万大军的粮饷并不是在漳河两岸就可以解决的事情。章邯之所以“筑甬道属河”,只能是由于当时的粮饷来自黄河漕运。

当时秦朝廷设在荥阳(今河南荥阳)以北黄河岸边的敖仓,是秦朝在关东的第一大粮运集存地,屯积有巨额粮食。陈胜在起义之初,即派遣一同起事的亲信吴广率主力进攻荥阳,夺取军粮的意图十分明显。陈胜等始终未能攻下荥阳,而且除周文一度通过函谷关一线以外,在巨鹿战役之前,白马津以上的黄河水上运输线一直控制在秦军手中,敖仓的粮食可以随时从黄河运出,补充两岸秦军的给养。章邯在歼灭项梁之后不再急于进剿远遁至彭城的楚军余部,却转而北进,去对付距离黄河运输线较近的赵军,也显然与便于解决给养馈运有关。《史记》卷九七《酈生陆贾列传》载楚汉相争时,酈食其对刘邦说:“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则天下知所归矣!”足见直到秦朝灭亡之后,敖仓仍旧存储有大量粮食。^[23]周文入关以后,秦王朝已意识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章邯、王离等是维系秦朝命运的主力部队,兵员又高达40多万,它不能不动用敖仓的储备。

要想把敖仓的粮食运到巨鹿,当然利用黄河水道顺流而下最为便捷。所以章邯“筑甬道属河”,应是从巨鹿城下修筑甬道,连通黄河岸边的粮船下卸码头。这与后来楚汉相争时刘邦驻军荥阳,“筑甬道属之河,以取敖仓之粟”^[24],是同样的道理。按照正常的情理,粮船下卸的地点,应选择在此既比较安全又离巨鹿城较近的地方,今河北馆陶、大名附近,条件最为适宜。

军粮从敖仓运来卸船后在码头附近要有一个存放的地点,这个地点应该就是棘原。章邯驻军棘原是为了保障军粮供应,所以他驻扎的地点必定在这条运输线上。这条运输线的终点是巨鹿城下的王离、涉间部队,用不着他去守护;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地点也就莫过于粮船码头和它附近存放粮食的仓库了。所以所谓“棘原”与这个码头和仓储必定同在一个地

方。换句话说，也就是粮船码头和仓储都设在棘原。

根据《史记·项羽本纪》的记载，章邯最后在棘原准备向项羽投降时，项羽之所以能够接受，其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楚军粮少。假如秦军同样缺少粮饷，项羽似乎大可不必为自己军中乏粮而过分顾虑，因为对方同样无力支撑下去；而且增加 20 多万人后将会给楚军造成更大的给养困难。项羽愿意接受章邯投降，应与章邯在棘原的仓储中还控制着大量军粮有关。

《史记》卷九八《傅靳蒯成列传》载靳歙在楚汉战争时从朝歌转进“安阳以东，至棘浦，下七县”。又《史记》卷四三《赵世家》载赵敬侯六年借楚兵伐魏，“取棘浦”。唐张守节《正义》谓后一棘浦为唐赵州平棘县，即今河北赵县。这里是赵国腹地，魏国境域何至于此？张守节的说法显然有误。《史记·赵世家》下文紧接着记述赵敬侯八年，又拔魏黄城。黄城在今河南内黄以西、安阳以东，这两次伐魏前后相继，棘浦与黄城当相距不远。靳歙所至棘浦在安阳以东，正与黄城相近，所以赵国所取棘浦当即此地。这一棘浦与上文所定棘原地望一致，二者之间很可能有所关联。

这样拟定的棘原，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以南，符合张晏所讲的位置。

只有搞清棘原的位置，才能合理地解释巨鹿之战的地理进程。按照上文所定棘原的位置，可以对巨鹿之战的进程解说如下。

战役的第一阶段是项羽派遣楚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黥布等部共二万人先行渡河，试与秦军交锋。这是因为章邯、王离的部队先此曾全歼楚军主帅项梁所部，不仅兵员众多，战斗力也不可轻视，项羽不能不小心从事。黥布等渡过黄河以后，连续几次袭击章邯运粮的甬道，都取得胜利。当时王离的军队在围城，章邯的主力在棘原驻守，从平原津到巨鹿城下并没有设防，所以黥布得以从容渡河。章邯虽率大部分兵力驻守棘原仓储，但既然筑甬道护粮，当然也要有部分兵力守卫整个粮道。黥布等渡河后与之交战的就应是这部分护粮的隊伍。

黥布渡河后进展顺利，促使项羽下定决心率全部人马渡河。史称项羽渡河时破釜沉舟，烧毁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渡河后如不设法迅速解决军粮，实在无法生存下去。所以项羽全军过河后，在围攻王离军队的同时，迅速彻底切断了章邯的运粮通道。这样做既可以断绝王离的给养，又能够从中截获许多粮饷，解决楚军的食物。《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项羽渡河后的动向，与《项羽本纪》文句略有出入，谓“项

羽兵数绝章邯甬道，王离军乏食。项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诸侯军乃敢击围巨鹿秦军，遂虏王离”。给人以项羽渡河后曾先与章邯会战的假象。但《项羽本纪》云项羽“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并没有提到直接与章邯交锋。两相对照，可以看出，《张耳陈余列传》讲的仍是护卫甬道的这一部分章邯军队，而不是主帅章邯所亲随的核心部队。所谓“章邯引兵解”，是指章邯为固守棘原仓储，撤回了护卫甬道的部队。不然就无法解释章邯怎么会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竟能轻易撤去屏蔽巨鹿的军队，放任项羽歼击王离所部。因为即使项羽渡河后曾给章邯所部造成一定损伤，但到后来投降时章邯仍拥有20多万兵马，绝对没有伤动他的筋骨，他还不至于惊恐失措，落荒逃走。^[25]章邯收缩兵力于棘原，是因为他首先要保住这里存储的粮食。这些粮食万一落入项羽手中，必将大大增强楚军的实力，后果不堪设想。在另一方面，王离所部本为北边边防军，是朝廷的精锐之师，又刚刚在定陶全歼了项梁属下的楚军主力，所以章邯大概认为项羽这一支楚军的败残之余，并不能构成对王离的致命威胁；只要他守住粮饷不丢，王离完全能够对付项羽及其它诸侯的援军。面对王离大军而龟缩在城北一动也不敢动的陈余等援军，足以证明章邯有理由同样轻视楚军。

在这种形势下，战役进入第二阶段，项羽全力进击王离，结果王离战败被俘，涉间自杀，所部全被歼灭。持续了三四个月之久的巨鹿之围被完全打破，楚军的勇猛气势也慑服了诸侯援军，结果各路诸侯无不听从项羽的号令，歼灭王离后很可能还有一部分秦军被项羽等收编过来，这样又进一步增强了反秦义军的作战能力。这时项羽麾下的总兵员应当与章邯不相上下，都在20万左右。^[26]

战役的第三阶段是收降章邯。项羽打破巨鹿之围是在秦二世三年十二月至一月之间。《史记·项羽本纪》记载王离被歼后，“章邯军棘原，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载项羽在二月发动进攻，“攻破章邯，章邯军却”，《项羽本纪》也在章、项相持未战事下紧接着记述说“秦军数却”，为此秦二世派人斥责章邯。章邯得不到朝廷的信任，陈余等人又从中劝降，于是在六月派出使者，开始谋求与项羽媾和。虽然章邯已有意归降，但他粮饷充足，兵力雄厚，实力还很强大。项羽可能考虑需要先镇慑住他的气势，免得以后不听号令。于是在与章邯的使者谈判的同时，调遣原来留在漳河北岸的蒲将军率部由今河北磁县西南的三户津渡

过漳水,袭击秦军,获得成功。接着项羽又率全军出击秦军,《项羽本纪》称“击秦军汙水上,大破之”。章邯失利,再次派人谈判,项羽终因自己军粮不足,急于取得章邯手中的粮食,最后在洹水南岸的殷墟上接受章邯率部加入楚军。至此,巨鹿之战始告全部结束,时为秦二世三年七月。

在收降章邯的过程中,对于章邯军队的布防情况和秦、楚双方的战斗形势还需要稍事说明。

王离在巨鹿城下失利以后,驻守在棘原的章邯肯定要马上布置军队设防,以阻止楚军的进攻。从当地的地理形势来看,显然漳河和洹水是两道最有利的天然防线,漳河大于洹水,更为重要。所以章邯一定会沿漳河一线设防。不过章邯并没有把主力布置上去,项羽的军队在解决王离以后能顺利进军漳河南岸,就说明楚军没有受到强大阻击。《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等记“秦军数却”,都应指这部分阻击楚军的秦军向棘原方向退缩,而不是撤离棘原。从后来在安阳受降的情况来看,项羽直接率领的这支部队很可能是在安阳以北的邺县附近渡过漳河的。当时漳河防线上的秦军并没有全部撤走,邺县上游的三户津附近就还驻有一支秦军。这里地据上游,俯临楚军,东面又有章邯的主力,两相策应,对项羽具有一定威胁。所以项羽才会一面谈判,一面令蒲将军抢渡三户津,击溃这股秦军,解决后顾之忧。在全面控制漳河南岸沿河一线之后,项羽又发动全面进攻,在“汙水”上大破秦军。从《史记·项羽本纪》“大破”的用语来看,这次交战,双方一定都投入了主力部队。秦军失利,但却并不一定非有太多人被杀死不可,失利的一方,也可以把大部分部队撤走。

麻烦的是“汙水”这个地名。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章邯主力的驻扎地点本来就是在洹水南岸、同时更在漳河以南的棘原,项羽所率楚军是由巨鹿城向南推进,项羽率主力渡过漳河后,又调遣蒲将军率偏师由三户津渡过漳河,已经完全控制了漳河一线,所以继此之后对秦军的全面进攻,只能发生在漳河以南,而绝不可能是在漳河以北。可是谁知偏偏很凑巧,漳河北岸有一条从太行山地流下的漳河支流就叫汙水,所以从北魏郦道元撰写《水经注》时起,人们就把它比附为项羽击破章邯的“汙水”。为迁就这一附会,今人在研究巨鹿之战的地理形势时,都把这次交战的地点定在漳河以北的“汙水”之上。这个“汙水”入漳口就在太行山前,是条很小的河流,现已断绝水流^[27],整个水道都经行于山间谷地。章邯是一个很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怎么能把20多万兵马带到这种根本没有退路的

“死地”？假如章邯当时是在汗水谷地，那么已驻守漳河南岸的项羽本应让蒲将军在漳河北岸直接向章邯发动进攻，这样他自己可以同时从南面夹击秦军。这用不着多深的军事谋略，按照正常的情理，必然要这样布置。项羽却为什么要先费力把蒲将军调到漳河南岸，然后自己再率军北渡漳河，进击“汗水”上的秦军？这样徒劳往返，究竟如何解释？最后章邯投降楚军，地点是在洹水南岸的殷墟，一般两军举行受降仪式，都要在双方之间的交接地带上进行，这是通行古今的做法。例如刘邦进军关中至霸上时秦王子婴素车白马出降于轵道，当时出降一方在灞河西岸，受降一方已占据灞河以东，轵道就在灞河西岸上。然而若把项羽击破章邯的地点定在漳河北岸的汗水，章邯最后就要深入楚军所控制的安阳殷墟投降，这实在不符合一般情理。总之，从当时的战争形势来看，项羽击破章邯的“汗水”决不可能是漳河北岸的支流。

章邯的大本营设在黄河岸边的棘原，在漳河防线失守之后，他理应扼守洹水一线。这已是棘原的最后一道屏障，他不能不全力防守。从项羽一方来看，在控制了漳河南岸之后，他再向前进击，也只有洹水一道障碍，渡过安阳以北的洹水，就可以切断秦军南撤的退路。所以我认为“汗水”应是“洹水”的讹误。“汗”本作“污”，与“洹”字形略近，存在着致讹的可能。项羽在洹水击破章邯布置的防线，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战争形势。由于楚军进占洹水一线，洹水南岸的殷墟自然成了两军之间的前沿地带，所以受降仪式才会在这里举行。

五 补论王离所部内调的路线和时间

由于我的疏陋，在本文完稿之后，始拜读朱绍侯先生《关于秦末三十万戍守北边国防军的下落问题》和张传玺先生《关于“章邯军”与“王离军”的关系问题》两篇文章^[28]，了解到这两位先生早已专门探讨过王离所部北方边防军内调的路线和时间问题，为自己在前文中妄自断言“王离的军队是何时以及怎样从北边调往内地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论述”而汗颜。通读这两篇文章之后，知朱、张两位先生的观点都与拙见不同。为此，我重新审核了本文第二部分内容，最后认为目前在这一问题上还应坚持自己的看法。下面就针对朱、张两文所提问题，对此再作补充论述。

朱绍侯先生认为王离所部内调的时间是在陈胜“农民军起义不久”，

并且认为章邯之所以能迅速击败周文、攻占张楚都城陈、乃至在定陶战役中打垮项梁,并继而围攻巨鹿,都是由于王离所部三十万边防军投入战斗的结果。这一看法,似乎缺乏可信的依据。

朱氏的论据为如下两点:(一)由“郾山徒”和“人奴产子”所组成的章邯军,不可能具有多大战斗力,“这些由囚犯和奴隶组织起来的军队是不会给将要灭亡的政权卖命的”。(二)巨鹿之战时在章邯率领下降附项羽的20万军队,后来受到项羽等诸侯军队的虐待,原因是“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所以要对其进行报复。由此推导出章邯所率领的20万军队就是“由北方国防军组成”的结论。上述两点论据其实都很值得推敲。

第一,由刑徒和奴隶一类人组成的军队未必就没有战斗力。按照秦朝的制度,王离属下的北方边防军中就包含有相当大一部分囚犯有过失而被“谪发”的士卒,《史记·匈奴列传》谓蒙恬北击胡人,“因河为塞”,“徙谪戍以充之”,指的就是这类人。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并不比郾山刑徒或“人奴产子”高出多少。朱文既然承认王离军有很强的战斗力,承认王离军曾为秦朝积极作战,就没有理由凭空设想章邯属下的刑徒、奴隶士卒不具备战斗力或不出力作战。退一步讲,即使这些仓促改编的士卒确实缺乏战斗力,也不一定非补充北方的边防军不可。如同张传玺先生已经指出的那样,当时关中并不是没有兵员可以征发,而是仓促之中来不及调遣。周文被逐出关中以后,朝廷自然得以从容安排,所以紧接着就派遣司马欣、董翳率军去增援章邯,这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明文记载。

第二,如《史记·项羽本纪》所记,过去欺凌过项羽等诸侯军中士卒的是“秦中吏卒”,而所谓“秦中”是指关中^[29],并不包括蒙恬、王离所率北方边防军驻扎的今陕北及内蒙河套地区,所以蒙恬、王离属下的边防军不可能成为项羽等诸侯军士卒报复的对象。如前所述,蒙恬、王离属下的士卒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全国各地“谪发”而来的,其地域来源与郾山刑徒完全一样。可是《项羽本纪》却记载章邯投降项羽后,部下的吏卒私下议论:假使“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这说明章邯属下的20万士卒基本上来自函谷关以西的秦国旧地,这与北方边防军人的来源很不相同。秦国旧境内只有关中也就是所谓“秦中”地区人口比较稠密,因此这些士卒应大多来自关中地区,这样他们才会有机会欺凌关东徭卒,并受到对方的报复。

为了证成“章邯军即王离军”一说，朱文又举出了一个偶然巧合的数字：即章邯降楚时统属有 20 万人，加上此前他在追剿起义军过程中所丧失的十几万兵员，共计有 30 多万人，这与北方边防军的总数正好吻合。前已述及，巨鹿之战时王离虽然听从章邯的号令，但在作战时仍旧各统其部，不相混淆。王离所部在第一线上攻城，章邯所部驻在棘原负责护送军粮。项羽渡河后首先击溃护粮的一部分章邯军队，接着就向巨鹿城下的王离所部发动进攻，结果全歼王离所部，连主帅王离都被生擒，副将涉间被迫自杀。这些在《史记》中都有清楚的记载，怎么可以把章邯属下的 20 多万军队说成是王离旧部？

尽管跟随章邯降楚的 20 万士卒绝不是王离旧部，但估计在巨鹿城下被歼的王离所部大致也是在 20 万人上下（张传玺先生估计的数字是十几万到二十万人之间，大体相同）。然而这并不像张传玺先生所认为的那样，谓王离属下的 30 万边防军没有全部内调，而是因为有一部分王离的部属在定陶战役后留在了黄河南岸地区，用以防范楚、齐进攻。关于这一点，我在前文已经做过交代。

从《史记·项羽本纪》关于章邯部下多来自“秦中”、父母妻子都还留在关内的记载来看，跟随章邯降楚的士卒确实大部分已不是最初出关的郿山刑徒，但说它是王离旧部，同样不符合这些士卒来自“秦中”的情况。前面已经谈到，《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章邯率郿山刑徒击退周文以后，“二世益遣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盗”。司马欣、董翳当然不会空身入阵，随他们增援章邯的士卒，应当来自关中各地（这一点张传玺先生已有明确论述）。就是这些“秦中”士卒，后来成了章邯队伍的骨干成份。而那些郿山刑徒，很可能或战死，或逃亡，或留驻朝廷收复的各个地点，已基本上不再随从章邯的队伍行动。章邯降楚后，项羽委任司马欣和董翳为上将；灭秦后分封诸侯时，又令司马欣、董翳与章邯三分秦地，并立为王；都显示出司马欣、董翳在章邯军中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这种地位，应当与他们对这支部队具有很强的控制力有关。这一点可以从侧面说明由司马欣、董翳统领出关的“秦中”士卒，后来已成为章邯军的主体成份。

综上所述，朱绍侯先生对于王离军内调过程的推论，基本上不能成立。但是朱氏的看法也不是没有合理的成份。他虽然没有明确叙述，但是根据他的推论，王离所部应是从今陕北、河套地区的边防线上先调入秦

都咸阳所在的关中平原,然后再沿渭河、黄河河谷,东出函谷关。我认为这样的内调路线是合乎实际情况的,但朱绍侯先生没有指明这条路线,也没有能提出有力的证据,在王离军内调的时间上更大有问题。

张传玺先生对于王离所部内调路线的看法则与此截然不同。他认为王离军是直接由陕北东渡黄河,经太原,出井陘关,东抵巨鹿城下。张文就此共提出了五点论据,现一一剖析如下。

第一,章邯与王离两军相互平行,没有隶属关系。又谓章邯军因主要活动在黄河以南,所以叫做“河南之军”;王离军主要活动在黄河以北,所以叫做“河北之军”。案王离与章邯虽然各统其部,但却不可能在战场上各自“直接听命于中央”,两军协同作战,必然要有主有次,这是古今不易的通则。《史记·项羽本纪》明确记载“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章邯等将其卒围巨鹿”,不提实际围城的王离;都说明王离所部是听从章邯的号令。如果没有确凿有力的证据,不能轻易否定这一记载。至于所谓“河南之军”,史籍中并没有这样的叫法。“河北之军”是指聚集在巨鹿城内外的所有秦及赵国军队,并非独指王离一军,这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述,其原文如下: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当此时,赵歇为王,陈余为将,张耳为相,皆走入巨鹿城。章邯令王离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为将,将卒数万人军巨鹿之北。——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由于秦楚争战时项羽是楚方主帅,刘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支偏师,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是在《项羽本纪》里详细记述秦楚之间史事,在《高祖本纪》里只是简略带过:

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北击赵,大破之。当是之时,赵歇为王,秦将王离围之巨鹿城。——此所谓河北之军也。

两相比照,显然是有意在《高祖本纪》中略去了章邯筑甬道和陈余军巨鹿北等事,而张传玺先生反据《高祖本纪》来指斥《项羽本纪》非是,这恐怕有违《史记》详略互见之通例。

第二,张传玺先生认为赵、燕两诸侯同样是矛头指向关中,威胁秦人社稷,“在这种情况下,上郡秦兵是有可能调向东南战场的”。案赵、燕

等虽然也是反秦的力量,但在对秦作战的积极性和战略意图上却与以陈胜和项梁、项羽叔侄为代表的楚国一方大不相同。陈胜起兵后即派遣几支队伍,直指关中秦都;项梁、项羽等也始终是积极谋求打通进入函谷关的道路,志在灭秦。然而赵、燕两诸侯却无不为拓地自广而盘算,并不出力灭秦。当陈胜令赵王武臣发兵西入关中时,张耳、陈余却让武臣“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30]。对秦王朝威胁最大的显然是陈胜、项梁诸军。赵王虽然派人四出略地,但始终未能逾越太行山而西(北部的代郡除外),秦人居高临下,赵军很难取得进展。只有司马卬一支军队向西南进入河内地区,但仍然是要“渡河入关”^[31],对秦人的威胁依然是在黄河南岸。所以在杀掉陈胜、项梁之前,秦朝廷必然要把主攻的方向放在黄河以南、特别是黄河沿岸地区,调王离军投入这一地区完全合乎当时的军事形势。章邯、王离等在歼灭项梁所部之后,随即转进河北,解决赵国,说明朝廷并没有忽视黄河以北的反秦武装,只是事有轻重缓急,不能不有个先后的伦次。

张氏认为王离军直接东渡的另一项证据是《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云秦使王离“围赵王及张耳巨鹿城”。案《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末尾附记王离围巨鹿之事,旨在说明王翦身为秦朝宿将而不能“辅秦建德”,所以三世为将之后必然要招致败亡,并不是为王离附传,故仅叙述其巨鹿败亡之事而不及其它,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能把它作为王离由上郡直接东渡的证据。假若王离未曾出函谷关至黄河沿岸地区,那么又将如何解释王离围攻巨鹿时驻守在黄河南岸的“王离军”?

第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赵王武臣派遣李良略地太原,至井陘关前为秦兵所阻,秦军守将伪造二世致李良书而不加封赏,信中许诺李良,若能反赵归秦,将赦免其罪过。张氏认为只有像王离这样爵位很高的人才可能伪造此信,并由此推断“王离的进军路线是由上郡直接东渡,经太原至井陘。在井陘击退了李良之赵军后,而继续东进恒山、邯郸、巨鹿等地,又乘赵内讧之机而南下攻赵”。案自古兵不厌诈,秦将造此伪信而不加封赏,本意不过是“欲其泄漏,君臣相疑”而已^[32],用不着负什么重大责任。王离若是可以伪造此书,其它秦将也没有理由不能伪造。况且《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李良反赵后为陈余所败,“李良走归章邯”,看到李良降秦后是直属于章邯麾下,看不出与王离发生关系的迹象。所以不能以此来证明王离所部的内调路线。

第四,张氏认为王离早于章邯一个月而抵达赵国。案《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章邯、王离进入赵境后的行动云:

章邯引兵至邯郸,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王离围之。

从叙事先后次序来看,章邯至邯郸不仅不是在王离围攻巨鹿之后,而恰恰是在此之前。《史记·秦楚之际月表》虽然列“章邯破邯郸”于“秦军围歇巨鹿”之后,但却是前后相衔接的两个月份,这两件事完全有可能发生在上月末与下月初之间,这样并没有多长间隔。况且“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说明王离所部为全军前锋,即使稍早几天进入赵境也完全正常,不能用以证明两军互不统属。

第五,张氏认为王离的爵位可能高于章邯,“因之不可能使有三十万士卒的统帅王离隶于章邯之下”。案章邯率军东出时身为少府,位在九卿;王离虽爵至列侯,但秦汉人以爵赏功,得到侯爵者也并不一定要授予高于九卿的职位。因为九卿之上只有丞相、三公和御史大夫,职位有限,而以军功取侯爵者动辄数十人^[33],能取得九卿实职的也只是少数一部分人。如西汉时陈遵以校尉击贼有功,封嘉威侯,后来也只被任用为河南太守。^[34]所以即使章邯的爵位真的低于王离,也并不是没有号令王离的可能。况且史缺有间,王离身为武城侯,也是因随从秦始皇东巡琅邪,偶然被琅邪石刻所著录。再说石刻列王离题名于其父王贲之上,很不合乎情理,早有人怀疑石刻中“王离”本作“王翳”。^[35]如果是这样,王离是否得到过列侯爵位已很成问题。《史记》未为章邯立传,又焉知章邯的爵位就一定会低于王离?秦人素称“首功之国”,以军功取爵位。章邯率军出关后,一路上连破周文、田臧、李归、伍徐、张贺诸军,剿灭首发秦难的陈胜,即使原来没有侯爵,也完全有可能在定陶战役前后被升赏为列侯。《史记·项羽本纪》既然明确记载“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在没有其它确切依据的情况下,就不能否定章邯统一指挥自己所属旧部和王离所部这两支大军的事实。

总之,王离所部既不是像朱绍侯先生所讲的那样,从章邯出关时起就投入了关东的战争;也不是像张传玺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北边直接调往赵境;而是在定陶战役前夕才进入关东战场,并直接参与了定陶战役。至于这支军队从边防线上内撤的时间,当然比这要早一些,很可能是在周

文人关以后,秦二世意识到朝廷危在旦夕,所以不顾匈奴南犯的威胁,把上郡以北的30万边防军全部调到了都城咸阳周围,用以拱卫京师。后来项梁、项羽等北上救齐,连败章邯,东部形势再度吃紧,朝廷不得不“悉起兵益章邯”,这才把王离所部投入战场。这样的推测,应该合乎当时的形势。从上郡以北的北部边防线内调至咸阳周围,再东出函谷关到濮阳、定陶一带,并在这一地区留下了一部分军队,然后又随同章邯渡河北上,围攻巨鹿。——这就是王离军在秦末战争中的行动路线。

补记:这个“安山”古称“安民山”。《水经》济水篇记载汶水入济口北岸有安民亭,酈道元《水经注》云:“济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对安民山,东临济水,水东即无盐界也。”把“安阳”定在“安山”或“安民山”之南,正符合当时的地理形势。

(原载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

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收入氏著

《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注 释

- [1] “闾左”应指流徙他乡的贫苦民众,说详拙著《闾左臆解》,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4期。
- [2] 案“怀”本谥号,这是用祖父的谥号来做孙子的尊号。古人祖孙同号,往往有之,说详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
- [3] 章邯初入河北赵地时直接统属的部队数目不详,但在围城秦军被全歼后,他最后向项羽投降时仍有20多万军队,可见至少也应有20万人以上。
- [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 [5] 《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等处均有同样记载。
- [6]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
- [7]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谓“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不确。《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载“齐将田都叛荣,往助项羽救赵”,又载“故齐王建孙田安下济北,从项羽救赵”,都是背叛齐王,擅自跟随项羽行动,说明齐相田荣并未发兵救赵。故《史记》卷九四《田儋列传》载项羽灭秦后分封诸王,有意把齐王田市改封为胶东王,并以“不肯出兵助楚、赵攻秦”为由,不封田荣;与此形成鲜明对

照的则是厚封跟随他救赵的田都为齐王、田安为济北王。

- [8] 如燕安阳,见于战国钱币,地在今辽宁建平境内;赵安阳,见于战国钱币,在今河北阳原东南;秦安阳,见于《史记·秦本纪》、《史记·廉颇列传》、《括地志》及先秦钱币,在今河南安阳西南;韩安阳,见于战国矛铭,在今河南陕县以东,即《水经·河水注》之安阳城;魏安阳,见于战国钱币,在今河南扶沟东南;宋、卫之间的安阳,见于《史记·傅宽传》、《魏书·地形志》及战国钱币,在今山东曹县以东;齐安阳,见于战国钱币,说详下文;莒安阳,见于《史记·六国年表》、《后汉书·方术列传》李贤注,在今山东莒县与济南之间一带地方。又如汉有西安阳县,见于《汉书·地理志》,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以东;安阳县,见于《汉书·地理志》,在今陕西洋县以北;安阳侯国,见于《汉书·地理志》,在今河南正阳以南;安阳里,属南阳郡武当县,见于居延汉简,在今湖北十堰东北。上述情况足以证明“安阳”是当时极为常见的地名,所以不能不顾其它事实,一见“安阳”就指认为项羽所经过的地方。
- [9]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载《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10] 谭文本谓,“当时流经巨鹿之东的漳水,原是《禹贡》、《山经》时代的河水,当地人自然还会沿用着‘河’的旧称”。所以他认为项羽破釜沉舟于漳河,指的也是巨鹿之东曾作为黄河干流河道的漳水下游河段。但项羽若果真已经兵至今河南安阳西南的古安阳,则已在《禹贡》、《山经》“河水”西岸,他无需再去渡过“巨鹿之东的漳水”,只会渡过安阳之北亦即巨鹿之南的漳水,而这段漳水却从未成为过黄河河道,当然没有理由以“河”相称。
- [11] 漳水上游河段称“漳”,下游曾是黄河故道的河段始可称“河”,这在古文献中有明确的区别。如《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三经“发鸠之山”下记云:“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所注入之“河”,即所谓《山经》“河水”,后来成为漳河下游河道的一部分。
- [12] 《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 [13]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 [1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 [15] 《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卷七《项羽本纪》。
- [16] 《嘉庆重修一统志》秦安府山川。
- [17] 《史记》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载此事作“伐鲁、葛及安陵”。鲁如作城邑解,与葛、安陵均远离齐境,非齐国力所及;若谓鲁指鲁国,则鲁国与葛、安陵并称又不合《史记》行文通例,当误。
- [18] 上述关于齐造币安阳的各种旧说,均参见毛公强《齐刀“安阳”地望考》一文,载《管子学刊》1994年第3期。

- [19]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正义。
- [20]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 [21] 《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 [22] 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集解。
- [23] 《史记》卷一二六褚少孙补《滑稽列传》谓武帝因洛阳有武库、敖仓,称其为“天下咽喉”,足见敖仓粮储的重要性。
- [24] 《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 [25] 《汉书》卷三二《张耳陈余列传》记此役经过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大体相同,唯没有“章邯引兵解”一句。
- [26] 《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载项羽接受 20 万章邯军投降后,“将诸侯兵四十余万”。除去降附的秦军,诸侯军队正为 20 万左右。
- [27] 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潭水篇。
- [28] 朱文载《史学月刊》1958 年第 4 期。张文原载《史学月刊》1958 年第 11 期,后来又收入原著论文集《秦汉问题研究》(1985 年 11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
- [29]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集解引如淳语。
- [30]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 [31]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 [32]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集解引张晏语。
- [33] 《史记》卷一〇〇《李将军列传》。
- [34] 《汉书》卷九二《游侠传》。
- [35] 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年 4 月。郭沫若:《十批判书》之《吕不韦与秦王政批判》,见《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 2 册,第 457 页。杨宽:《战国史》,第 2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7 月,第 251 页。

参 考 论 著

1. 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氏著《河山集》,北京:三联书店,1963 年。
2. 陈可畏:《城濮之战地理考释》,《中国历史地理理论丛》1989 年第 1 期。
3. 辛德勇:《楚汉彭城之战地理考述》,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 8,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4. 辛德勇:《韩信平齐之役地理新考》,唐晓峰、李零主编《九州》创刊号,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 年。

秦汉时代滨海地区的方士文化

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探讨了方士文化在燕齐滨海地区的历史渊源、崛起背景与兴盛过程,阐述了东汉以后方士文化的退潮区域存留状况。本文认为,方士文化崛起于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齐威王、宣王时代的燕齐滨海地区,其源头包括原始巫术中的周地方术、原始崇拜、外来神话传说以及滨海地区兴盛的阴阳五行学、黄老学与儒学等学术文化。燕齐方士文化兴起后,到秦始皇和汉武帝时代,在其源区达到鼎盛并向四周传播。东汉时期,方士文化逐渐为早期道教所取代,主要在燕齐吴越滨海地区和荆楚地区留存下来,并演化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卢云,1957年生,原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师,现居日本。

我国漫长的海岸地带的北部,即大致相当于先秦燕、齐、吴、越与九夷旧域。《汉书·地理志》中幽、青、徐三州,兖州之泰山、城阳二郡,豫州之鲁国,以及扬州宁绍平原以北诸地,在古代曾是一块宗教文化相当发达的狭长地带。独特的滨海景观与环境条件,浓重的东方传统,土著的夷、越文化,加之阴阳五行等学术思想,光怪陆离的神话传闻,造就了极为肥沃的宗教土壤^[1]。战国中期,燕齐滨海地区成长起一种新的强大的宗教文化——燕齐方士之学,并由此导致了秦汉时期一场由滨海地带风卷全国的巨大宗教浪潮。

滨海方士文化是各类方术、方说的综合体,其初大抵以海上神山仙人之说为主旨,饰以阴阳五行之学,泛海求仙、寻找不死之药是燕齐方士的主要活动。其后由于传播渐广,内容日益杂芜,奇异、荒诞的方术层出不穷,其中以炼丹化金、断谷导引、房中之术等最为流行,但各类方术方说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秦汉时代,方士文化相当兴盛,曾在全国大多数地区与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影响,成为纪元前后四个多世纪中,与正统学术文化并立的另一显学,对秦汉宗教、学术、社会面貌、政治变迁发挥了巨大作用。至东汉末,才逐渐为早期道教所取代。本文拟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探讨方士文化在燕齐滨海地区的历史渊源、崛起背景与兴盛过程,阐述东汉以后方士文化的退潮与区域存留状况。

一 燕齐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渊源与崛起

方士文化是在燕齐滨海地带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崛起于前四世纪下半叶的齐威王、宣王时代。《史记·封禅书》云:

自齐威、宣之时,骀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葵门高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骀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滨海方士文化虽起于此时此地,但其渊源却要久远得多,并且也不限于滨海之地。究其大端,主要有三大系统。一是脱胎于原始巫术的周地方术;二是在滨海地带故有的原始崇拜的基础上,结合外来神话与传说而形成

的滨海神仙说；三是滨海地区兴盛的阴阳五行学、黄老学与儒学等学术文化。这三支文化源流在前四世纪的燕齐滨海地带并汇、融合，逐渐发展成滨海方士文化。现逐一考论之。

首先，脱胎于古代巫术的周地方术，是滨海方士文化的先声。

《周礼·职官》已有方士之名，系周代掌握讼狱的职官。先秦诸子中也屡屡论及“方”、“方术”，指的是道艺学说，这些均与燕齐方士文化无涉。春秋末，周地兴起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方术，《史记·封禅书》云：

、是时苾弘以方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周力少，苾弘乃明鬼神事，设射《狸首》。《狸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诸侯不从，而晋人执杀苾弘。周人之言方怪者目苾弘。

苾弘为周大夫，活动于鲁襄公至鲁哀公时期，善预言，明天道，为周地方士所尊。苾弘以方招致诸侯，采用的是一种传统的黑巫术^[2]。据王先谦《汉书郊祀志》补注，苾弘所设的《狸首》是古乐诗名，用于大射仪。郑康成云：“狸之言不来也，其诗有射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苾弘所行，乃是古礼。”《御览》卷七三七引《六韬》载西周初行这种黑巫术：“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著头箭，丙丁日拔著口箭，戊己日拔著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各以来贡。”古人认为，伤害某人的偶像与肖像，如同伤害其本人一样。按照弗雷泽(Frazer)的观点，这是一种典型的模拟巫术，是根据相似律，即“相同的事物影响相同的事物”这一准则进行的。这种巫术在当时相当普遍，如春秋初郑伯诘射颖考叔，战国时宋王作木人，书秦王名而射其面，西汉时公孙敬声当驰道埋偶人以祝诅汉武帝，江充在太子宫掘地得桐木人等。匈奴人也有类似的黑巫术，汉景帝时郅都为雁门太守，“匈奴至为偶人象都，令骑驰射”^[3]。由此可见，春秋时周地方术是从古代巫术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术后来又多为滨海方士文化所继承。如苾弘“明鬼神事”，滨海方士也“依于鬼神之事”，周方士“言方怪”，滨海方士系“怪迂阿谀苟合之徒”。最为明显的是关于“致”的方术，苾弘主要的方术活动是“依物怪欲致诸侯”，滨海方士李少君祭灶致物、少翁以方致王夫人之魂与灶神、公孙卿在太室山致神等等。周地方术比滨海方士文化早两个多世纪，其间势必会东传至滨海地区，并在那里被加工、改造，发展成滨海方士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次,战国中期滨海地区在自身传统与外来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神仙说,是方士文化的主要源头。

春秋晚期与战国时代,中原、楚地均有许多关于神山仙人的传说,《山海经》、《庄子》、《楚辞》中都有记载。顾颉刚先生曾把古代神话分成西方的昆仑系统与东方的蓬莱系统,诚为卓识。但当时的神话还远不止这两大系统,如《山海经》中就会集了东南西北许多地区的神话传说。随着齐威、宣之时大批士人会聚于燕齐地区,各地纷杂的文化以空前的规模流传进来,这些神话与传说自然也八方辐凑,纷至沓来,涌进这块开放的地带。

与其同时,滨海地带自身的宗教与神话也在发展,顾先生认为蓬莱系统神话源于昆仑系统神话,“东方的仙岛本由西方的神国脱化而出”^[4],这未免过分低估了东方的宗教与神话传统。滨海地带的华夏族与东夷吴越各族本即盛行着各类原始崇拜,在滨海的地理环境下,仙人思想也起源很早。《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齐景公问晏子:“古而无死,其乐如何?”这反映了早期的长生观念。早于《庄子》的《齐谐》一书今已见不到了,但从《庄子》所援引它的海洋、神岛等部分内容以及它的“志怪”性质看,该书与滨海神话以至方士们的“怪迂”之说肯定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晏子春秋·外篇第八》载齐景公言,“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食”。这段记载就可能是齐地早期的传说。秦汉齐地方士所宣扬的安期生居海上,食巨枣,大如瓜^[5],当与这一传说同源。

这样,自前四世纪下半叶始,外来神话传说与燕齐自身的宗教神话在滨海地带大规模地混杂、交织起来,并在滨海环境下继续加以发展,融合成一种相当流行的学说——神仙家言。《楚辞·远游》就很集中地反映了神仙家言的内容。燕齐方士文化直接来源于这种神仙家言。燕齐方士曾大力宣扬渤海外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其上有黄金、白银砌成的宫殿和纯白色的禽兽,仙人就居住在那里,他们有不死之药,因而可以永远逍遥自在。又,司马迁论燕齐方士,言其为“怪迂阿谀苟合之徒”^[6],《汉书·艺文志》论神仙家言,言其多“诞欺怪迂之文”,可见神仙家言实为早期燕齐方士文化的主要内容。方士们在齐威王、宣王、燕昭王以及秦始皇、汉武帝时多次大规模入海求仙,则神仙说下的泛海求仙可说是燕齐方士的主要活动。

再次,滨海地区发达的学术文化,如阴阳五行学、黄老学、儒学等,对滨海方士文化的最终形成,也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如果仅仅在滨海神仙说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还不足以形成兴盛的方士文化。齐威、宣之际稷下学宫的兴盛,致使阴阳五行学、黄老学等在齐地迅速发展,并北传至燕地,加之齐鲁地区固有的儒学传统,构成了发达的滨海学术文化。方士们从这些学术文化中大量吸取养分,给原始的粗陋的方术方说涂上一层混杂的理论色彩,从而促使了滨海方士文化的崛起。

燕齐方士文化与驺衍学说关系最为密切。驺衍学说主要为阴阳五行说与大九州说。阴阳与五行的观念起源甚早,春秋时已屡见史载,并广泛用于天象解释、宗教祭祀与社会生活。驺衍的贡献是把五行说发展成五德说,即“终始五德之运”与“阴阳主运”。^[7]大九州说是滨海地理环境下的产物,是驺衍据各类海外传说加以创造的。驺衍齐人,曾为齐稷下学宫大师,又曾北仕于燕,受燕王尊崇,因此其说在燕齐一带最为流行。驺衍学说宏大不经,又有《迂怪之变》等篇,极易为方士所接受。按《史记·封禅书》的说法,方士文化简直就是驺衍学说之末流,系怪迂阿谀苟合之徒传其术不能通而为之。其实不仅驺衍学说,驺衍论述事物的方法也为方士们所承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事迹云:

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此后方士也多由小推大,宣扬其说。如齐方士栾大谒见汉武帝,先验斗棋小方,博得汉武帝信任后,方大谈神山仙人。方士们引述符应,以成己说,史籍中更是屡见不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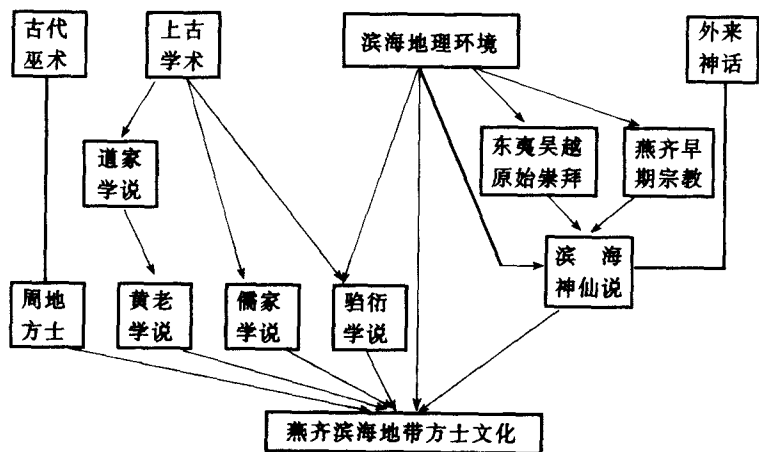
黄老学对方士文化也有很大影响。黄老学源于道家学说,在老子《道德经》中,已有“谷神不死”、“长生久视之道”的论述,《庄子》一书更是多言真人、神仙与呼吸吐纳之术。黄老学者托名黄帝,吸取了道家学说的许多哲学思想,多言静泊无为、养生之道。黄老学在齐地相当兴盛,田骈、接子、慎到、环渊都是齐地稷下学宫的黄老学大师,方士们很自然会从黄老学中吸取某些具有神秘意味的内容。安期生是早期滨海地带的方士,后又被尊为长生不死的仙人,但安期生又是黄老学流传系统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学黄老于河上丈人,又传授于毛萼公,三传至于胶东盖公,从而使

黄老学在齐地流传下来。道家《关尹子》一书,也被齐地方士持为方书,刘向《关尹子书录》云:“盖公授曹相国参,曹相国薨,书葬。至孝武帝时,有方士来,以七篇上,上以仙处之。”到了东汉末,黄老学与方士文化同为早期道教的两个重要来源。

方士文化还杂糅了许多儒家文化的成份。儒家兴起于鲁地,很快传至齐地,战国之世,以齐鲁最为发达。《史记·儒林列传》曰:“天下并争于战国,儒学即绌焉,而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整个西汉时代,齐鲁地区仍是儒家文化发展的重心之地。儒家文化作为“显学”,对滨海方士文化同样影响巨大。方士们喜以儒学为饰,秦始皇时,“悉召文学方士甚众”⁽⁸⁾,其中多是方士化的儒生,或曰儒生化方士。他们一方面寻仙求药,以博重禄,另一方面又“皆法孔子”,以儒学为诸生、博士。后终因屡次出海无所收获,逃亡诽谤事发,为秦始皇所坑。所以“焚书坑儒”,实际上是“杀术士,燔诗书”。⁽⁹⁾汉武帝以后,儒学与方士文化进一步结合起来,曾导致了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巨大变化。

方士文化内容杂芜,在以后的流传中,还吸取了其他诸子学说内容。但在其早期,主要接受的是滨海地区最为盛行的阴阳五行学、黄老学与儒学,这也反映了方士文化形成过程中区域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作用。

作为本段的小结,燕齐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渊源示意如下图。



二 燕齐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发展与兴盛

滨海方士文化兴起之后,迅速发展,秦始皇与汉武帝时代,方士文化在其源区——燕齐滨海地区达到了它的鼎盛。

滨海方士文化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在秦帝国统一之后,对此《史记·封禅书》论道: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更为具体。秦始皇时燕齐方士的出海求仙活动,规模较大的共有两次:第一次在二十八年,始皇东巡至齐,听信齐方士徐市等人的三神山之说,令其率数千童男女出海寻求。另一次是在三十二年,始皇东巡至燕地碣石山下,东临大海,令燕地方士卢生、韩终、侯公、石生分别泛海求仙人及不死之药。在燕齐滨海地区,秦皇所至之处,方士无不闻风而动,云起雾合,秦始皇笃信方术,反过来又刺激了方士之学的发展。所以此时滨海方士之众,的确有些难以胜数了。

秦帝国时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兴盛,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战国之世,兼并剧烈,国君权贵最需要的,是各种周急救世、富国强民的法术,或审时度利,纵横变诈的计谋,甚至鸡鸣狗盗之徒,只要间或有用,皆可延为上宾。而方士们的神山仙人之说虚无缥缈,一无实用,因此其发展也很有限。但秦统一后,社会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纵横之士走了下坡路,他们在统一局面下既无用武之地,又受到秦王朝的猜忌。而方士之学却大受统治者欢迎,在游说这块天地里,独步天下,尽擅其利,滨海地带下层士人纷纷走进方士行列,致使方士文化迅速发展。此外,秦始皇在滨海地带的多次巡游及其对方土方说的笃信,也促进了滨海方士文化的繁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四次巡游至燕齐滨海地带。其最初是出自政治的考虑,但一接触滨海地带浓重的方士文化气氛,便立即沉迷于此。他率着庞大的侍从队伍,在海畔查寻仙人之迹,并亲自射杀妨碍求仙的大鲛鱼。这种封建帝王直接参与的求仙活动,在滨海地区的影响自然非同一般。秦始皇还重金优待并亲近宠信滨海方士,如徐市出海,前后所费以“巨万计”,燕方士卢生所进谏言方说,始皇一一言听计从。这更使滨海士民对方术方说趋之若鹜,滨海方士之风越演越炽,蔚为高潮。至秦始皇三十五年,秦始皇大坑方术士,史称“坑儒”,燕齐方士受到一次沉重打击。

秦末大乱,天下残破,汉初以清静无为为本,除文帝一度听信方士新垣平外,诸帝对方士之学都相当冷淡。但汉初大行分封,关东诸侯王力量强大。燕齐方士转而依附滨海地区及其周围的诸侯王,是这一时期滨海地区方士文化的发展特点。如齐地方士李少君,“其游以方遍诸侯”,他做过深泽侯舍人,又为武安侯坐上客。齐方士栾大,曾为胶东王尚方,又与齐康王、乐成侯有着密切关系,而方士卫庆为衡山王谒者,淮南王刘安身边聚集的方术士数以千计,广川王刘去、燕王刘旦也都笃信方术,国内也云集着一批方士。

汉武帝时,燕齐滨海地带的方士文化再度掀起高潮。同秦始皇相似,汉武帝作为封建帝王,他的个人欲望大为膨胀,为了长生仙道,汉武帝对燕齐方士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位期间,先后十一次巡游燕齐滨海地带,冀遇仙人,多次大规模派遣方士出海,寻求神山与长生之药。在汉武帝的提倡与需求下,燕齐滨海地区的方士显得异常活跃,汉武帝时以方术进身、显赫一时的方士很多,前后见于记载的有李少君、宽舒、谬忌、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公玉带等。这些方士除李少君、谬忌外,都是齐人。李少君籍贯无载,但他谙熟齐地史实,往来海上,也极可能是齐人。谬忌亳人,地亦近齐。滨海地带的普通方士更多,动辄千计,甚至万数。如仅在元封元年与二年,汉武帝派出的寻仙求药的方士,每年都达数千人。可以说,汉武帝时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兴盛,已臻至鼎盛。

随着方士文化的兴盛,燕齐滨海地带各类祠祀也有很大发展。齐地祠庙数量已相当可观,与关中平原同为两个密集分布区^[10],这与滨海方士的祠祀活动有密切关系。一方面,方士们把齐地许多旧有的祠祀纳入方士文化的范围。如齐地的八神祠,起源远在方士文化之前,但自战国中期以后,就逐渐与方士文化结合起来,秦皇汉武巡游至齐,总要祭祀八神。另一方面,方士们还兴起更多的祠庙,如规模很大的“明年”祠,即是在方士们直接设计下在海滨建造的。它与八神、凡山等祠享有同样礼遇,皇帝“行过则祠,去则已”^[11]。再如琅邪郡不其县的太一、仙人祠九所,也完全是方士文化下的产物。方士兴建的祠庙大致分两种类型:一种由祀官所领,规模较大。汉武帝以前没有统计数字,但成帝时“长安厨官县给祠郡国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12]。这些祠庙仅有部分被记载下来,大部分今已无考。还有一种是方士自主的祠庙。汉武帝时,“方士所兴祠,各自主,其人终则已,祠官不主”^[13],这类祠庙规模小,存在时间

短,随人设置,兴废无常。燕齐方士动辄万人,这类祠庙的数量在燕齐地区必相当可观,不过今天大都无法证实了。

从秦统一至汉武帝时代,可说是燕齐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方士文化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方士文化的繁荣区域,主要集中在它的源区——燕齐滨海地带。虽然南部的淮南、吴越地区与西部的关中、巴蜀地区方士文化也已有所发展,但主要为燕齐方士集聚影响所致。这一时期著名方士基本出自燕齐,大规模的方术方说热潮也屡屡发生于这一地带。第二,这一时期的方士文化,是以宣扬海中神山、仙人、长生之药以及这种神话下的泛海求仙活动为其主要内容的,带有明显的滨海色彩。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术,如炼丹术、辟谷、导引,使鬼致神等也逐渐流行。炼丹术与泛海求仙都是以求仙药为目的的,由于泛海求仙无法验效,方士们便另辟蹊径,力图用自己的力量求得仙药。秦始皇时,已有不少方士从事炼丹活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至汉武帝时,方士们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方士李少君论述过一套始于祭灶、终于封禅、由益寿而长生的完整修炼步骤:“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辟谷、导引战国时已出现,《庄子》一书有导引的记载,鲁国方士单豹曾行辟谷之术。^[14]汉初张良也“辟谷,道引轻身”^[15],他的方术很可能学于黄石公,黄石公的记载非常怪诞不经,后世又为道教所尊,其实剥去这些记载的神秘外衣,他不过是秦汉之际齐地济北郡的一个方士,以方术与兵法传授张良。此外,方士们还根据统治者的欲望与某些时代需求,随时臆造出一些新的方士文化的内容。如秦时匈奴族构成北方的威胁,方士卢生就造出“亡秦者胡也”的谶言。汉武帝时河决严重,方士栾大即声称“黄金可成,而河决可塞”^[16],汉武帝“尤敬鬼神之事”^[17],方士们就造出从泰一、三一到封禅长生一整套祭祀体系。武帝以后,随着方士文化在其它地区的传播,这些形形色色的方术大大发展,而滨海地带特有的泛海求仙活动则逐渐漫漶。

汉武帝时代是燕齐滨海地带方士文化的鼎盛,同时也是其衰落的起点。汉宣帝时,还依方士之说,在齐地兴建许多新的祠庙,到了成帝时,对方士兴建的各地祠庙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理,有三分之二以上被罢除,其中很大部分是燕齐地区的祠庙,包括汉宣帝所新建者。自成帝末至王莽时,又连续掀起三次方士活动高潮。成帝无子,于是各地“多上书言祭祀方术者”^[18],汉哀帝时,因久病,又“博征方术士”,并基本恢复了被成帝罢废的

各地方士祠庙。至王莽篡位,以神学襄佐政治,大兴方术,方士上书者达万余人,各地方士兴建祠庙达一千七百所。但在西汉末的三次方士文化热潮中,燕齐滨海地带已失去秦皇汉武时的那种重要地位,虽然燕齐方士绵绵未绝,但其它地区的方士也已相当繁多,与之平分秋色了。很显然,这是方士文化从燕齐滨海地带向外广泛传播的结果。

三 方士文化的衰退与区域遗存

汉武帝以后,随着方士文化的广泛传播,其内容日渐杂芜,与早期燕齐方士文化相去越来越远。西汉晚期,谶纬神学兴起,并逐渐脱离方士文化而独立发展,方士文化中预言、符瑞等内容转而依附谶纬神学而存留,并随着谶纬的衰亡而衰亡。东汉顺帝以后,道教兴起,许多方术如炼丹、导引、服饵、劾鬼等,为道教所吸收、发展,成为道教文化的一部分。虽然许多方术如占卜、相术等仍冠以方术之名,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流传下来,但实际上与燕齐方士文化已完全不同,不过沿袭了这一旧名而已。因此可以说,自战国以来起于燕齐滨海地带的方士文化浪潮,在东汉以后就基本消失了。但是,早期燕齐方士文化的许多内容,仍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遗迹,在某些地区存留下来,演化为俗民文化的一部分。主要的存留地区,是由燕齐滨海地区经淮南吴越地区至荆楚地区,这一月牙形地带。

燕齐吴越滨海地区:燕齐滨海地区是方士文化的起源地区与发达地区,淮南、吴越一带也最早接受方士文化传播并曾一度成为方士文化兴盛之地。这一狭长的地带又有着亘古以来的滨海环境,因此,方士文化的遗迹最为显著。在燕地北部的滨海地域及其邻近地区,后世有着很普遍的仙人传说。如在涿郡一带,有仙人琴高的传说,相传他人居涿水之中,常乘赤鲤出没。在宁县(今万全县)一带,曾长期流传着仙人班邱仲的传说,百姓称他为谪仙。道人县一带(今阳原境内),也相传有仙人游于其地,故有道人一名。广昌(今来源县境)东南郎山上有燕王仙台,“台有三峰,甚为崇峻”,相传为燕昭王求仙处。无终山(今蓟县境)相传为仙人帛仲理合神药、炼黄金处,又有所谓的仙人玉田。在象县大碣石山(今昌黎境),也流传着秦始皇与海神相会的故事。燕地如此众多的仙人、海神、金丹、玉田的传说与遗迹,是方士文化在人们心理上与信念上的传承,说明方士文化在这里长期保持着较大的影响。齐地、淮南、吴越一带的滨海地区在东汉以后

同样也有许多类似的方士遗迹与仙人传说。如东海郡胸县东有郁州岛,其上有仙人石室,东汉末崔琰曾实地经历过,酈道元《水经·淮水注》还有记载。左思《吴都赋》中描写吴地,“增罔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对溜,石室相距……江斐于是往来,海童于是宴语”。刘渊林注曰:“玉堂石室,仙人居也。海童,海神童也,吴歌曲曰:‘仙人斋,持何等,前谒海童’”^[19]。西晋时,临淮一带还保留着方士们津津乐道的古仙人赤松子庙,而直到南北朝时,寿春八公山上还有淮南王刘安庙与淮南方士八公的隐室、石井与“遗物”,以及关于淮南方士的许多传说。这些遗迹与传说也反映了方士文化的久远影响。

荆楚地区:如前所述,在两汉时代,方士文化在荆楚地区并不发达,历史记载中很少见到这一地区的方士活动。但这一地区后世却保留着方士文化的明显遗存,这一事实可从《荆楚岁时记》关于荆楚正旦民俗的记载中反映出来。正月一日,楚民“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这一连串饮食大多与方士文化有关。如椒柏酒,注曰:“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身轻能走,柏是仙药。”这种身轻能走的仙药,正是方士们所竭力宣扬的。再如五辛盘与鸡子,晋吴兴人周处《风土记》曰:“元旦造五辛盘,正月元旦五熏炼形。”又曰:“正月,当生吞鸡子一枚,谓之炼形。”所谓炼形,即通五藏之气,系方术之一种。再如却鬼丸,出自《天医方·序》,这是方士文化在楚地的发展,楚地尚鬼,方士善服药,两者结合便出现了可以避邪防恶的却鬼丸。敷于散,出于葛洪《炼化篇》。葛洪是早期道教的重要人物,对古代方术很熟悉,多所记载,食敷于散实际也是方士文化的产物。《炼化篇》还讲到食赤豆可避瘟气,所以元旦食大豆也成为荆楚习俗。

方士文化之所以在荆楚地区得以存留,一方面由于这一地区地处偏远,交通闭塞,一种文化常常作为“边缘遗存”保留在这里;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有着浓重的宗教传统,巫风盛行,各类原始崇拜与祭祀活动广泛存在,因此人们在心理上与信仰上极易长期保持着方士文化,并将其部分内容转变成世代相传的民间习俗。

(原载《复旦学报》[社科版]1988年第6期)

注 释

[1] 见笔者博士论文稿本《汉晋文化地理研究》第二章第一节。

- [2] 接弘事迹主要见于《左传》昭公十一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定公元年、四年，哀公三年。又见《国语·周语下》、《汉书五行志》等。
- [3] 《汉书·酷吏·郅都传》。
- [4]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期。肖兵：《〈山海经〉：四方民俗文化的交汇——兼论〈山海经〉由东方早期方士整理而成》，载《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
- [5][6] 《史记·封禅书》。《楚辞·远游》自王逸以来一直认为是屈原作品，今人游国恩、姜亮夫仍持此说。（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第七讲）但近世以来也有许多学者从艺术水平与主题思想上加以分析，认为非屈原所作。顾颉刚先生以其神话内容推断，该诗应成于楚国都城东迁之后，此论甚是。但顾先生又以该诗中曾出现秦方士韩终的名字，认为还可能更晚至秦代以后，此说则不足取，秦汉方士素喜大言，托名先人、同名方士屡见史载，不足为确定时代的证据。
- [7] 见齐思和：《五行说之起源》，载《师大月刊》第22期；吕思勉：《辩梁任公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卷二十号。
- [8] 《史记·秦始皇本纪》。
- [9]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 [10] 周振鹤：《秦汉宗教地理略说》，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三辑。
- [11][12][13] 《汉书·郊祀志》。
- [14] 《吕氏春秋·必己》、《庄子·达生篇》。
- [15] 《史记·留侯世家》。
- [16][17] 《史记·封禅书》。
- [18] 《汉书·郊祀志》。
- [19] 《文选》卷四引。

参 考 论 著

1. 陈寅恪：《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 周振鹤：《从“九州异俗”到“六合同风”——两汉风俗区域的变迁》，收入氏著《周振鹤自选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3. 周振鹤：《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历史背景》，收入氏著《学膳一十九》，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

[日]斯波义信

胡德芬 译

宋都杭州的城市生态^{*}

本文根据经济区、官绅区和宗教文化区等功能讨论了宋代杭州的城市生态区划。首先分析了杭州的经济区与官绅区的分布,认为它们沿着南北轴成自西向东的条带状纵长排列。其次分析了杭州学术机构、国家与民间祭祀场所的分布特点;最后将杭州的经济区、官绅区和宗教文化区等生态区划,与按行政与治安职能划分的厢界作了比较。认为杭州的城市生态,既具有都城特殊性,又体现了宋代城市的常态。文章指出,对城市论的讨论,必须放在当时城市结构的整体之中进行相互比较,找出普遍性和特殊性,才能掌握事实的真相。

斯波义信,1930年生于东京。曾为大阪大学文学部教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东洋文库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史、城市史。

* 本文是译者在访日期间译成的,翻译过程中,曾与本文作者、国立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商讨,承斯波教授亲自指正,特表谢忱。——译者

一 引 言

城市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各个时代的城市,当然都出现在对当时起作用的种种复合因素相互影响的交错点上。即使从所谓中心地学说的观点来看^[1],分类排列于城市系统的各层次的城市,必然也都占据着与该排列相当的、作为种种组织的、有机的枢纽位置。并且还可以认为,在这类组织中包括着经济方面的、社会方面的以及文化的、象征性的和宗教上的组织等等。

例如旧中华帝国,在传统的王朝统治长期持续的、独特的社会综合体之中,关于城市的形成、发展、形态以及行政区划等等,事实上都色彩浓厚地反映了来自上面的行政意图或传统的象征规范的职能。而且,由于残存下来的有限资料,大多数又都是以官尊民卑的偏见编写而成的,这就使得这种印象有愈益扩大的倾向。在中国城市史的研究方面,通常总是以长安、洛阳或北京之类的模式,千篇一律地概括中国的城市,而且满足于这种研究的思想非常根深蒂固,因此很难作出,诸如一般的和正规的城市论、城市形态论或城市生态论之类的研究。在城市的整体之中,将普遍情况与特殊情况相互对比,以便从事区别和比较,这种工作之所以难以进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上述第一种印象的影响以及资料存在状况的制约。

要打开这种隘路,只有在能够洞察整体现象的某些个别城市的素材上集中观察力,然后去提炼出并积累有助于对今后的比较分析的城市结构要素。^[2]本论文所注目的是南宋(1138—1276年)的帝都杭州临安府(称为行在)。9—13世纪是中华帝国史上的“城市革命期”^[3],杭州与北宋的京都开封以及其他各城市,一齐显示出不同于历来传统的新时代现象,而可喜的是当时的记载也丰富,尤其是世俗社会经济活动的活跃程度,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平民阶层活力的抬头。包括这些在内的这个文化黄金期的时代背景,究竟使城市的形态发生了多少变化?另外,从整体上看,普遍性与特殊性在这种变化中所处的位置如何?这些都是当前研究的重点。

二 经济区与官绅区

笔者在近著《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中^[4],就比较城市社会学和比较城市地理学的领域中所提及的城市社会生态分化与城市空间划分的相关性问题,以杭州为素材进行了研究。一般说来,在城市的空间划分方面,自然而然地表明了功能的分化,必然会形成中心区与边缘区、富民区与贫民区、住宅区与工商区等这种有机的功能分化。就中国城市而言,曾经发生过过大或过小的衡量标准,例如,是去区别确定它们为官僚城市、城塞城市和消费城市呢?抑或是强调它们的开放性一面,把它们作为工商城市或经济城市之类。这种意见,往往容易各执一端。

但是,如上述《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所阐明,根据杭州的具体例子,中国城市与其用两者择一的方法去判定,还不如用设想“官绅区”与“工商区”这种两个中心兼具的椭圆结构灵活地加以考虑。这样似乎较易更好地掌握它们的真实情况。详细的论证在上述论文中已经有所叙述。不过,就经济职能,杭州城市的地理位置选择以及市内的空间划分来看,大运河起点和终点的这种交通上的职能和伴随而来作为物资集散的商业中心的状况,可以说自始至终是促使杭州城市化的基本条件。

自华北南下的大运河,在其终点杭州以南为山岳所阻,通过杭州湾和明州(宁波)沟通了海洋交通,或通过钱塘江联接内陆河流的航运。这样,杭州城外西北郊的江涨桥和湖州市(明清期的湖墅)周围大片低湿的郊区及城的东南部、候潮门外、浑水闸一带的杭州湾沿岸沙地,就作为来自南北的货物的两大集积地被首先定下了位置。不用说,杭州城市就在这两大集积地间形成了纵长的矩形,而经济职能上的干线无疑必然是南北轴。这个南北轴实际上就是大河(盐桥运河,图 1:N),把直接辅助它的市河(图 1:O)和御街(陆路)以及间接辅助它的菜市河、外沙河合并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水系。^[5]不过,这条大河以含泥率 50% 的钱塘江水(江潮)为水源,它的支流市河也和它一样,如果怠于疏浚,那末城内北半部就会被淤泥堵塞。因此,在清波门外(图 1:I)从西湖引水的东西向的供水渠道清湖河之类,就使整个水系发挥了它的机能。

这样,当经济活动沿着这条南北干线轴集中起来发挥功能之际,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中心区。如前述《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所示^[6],这个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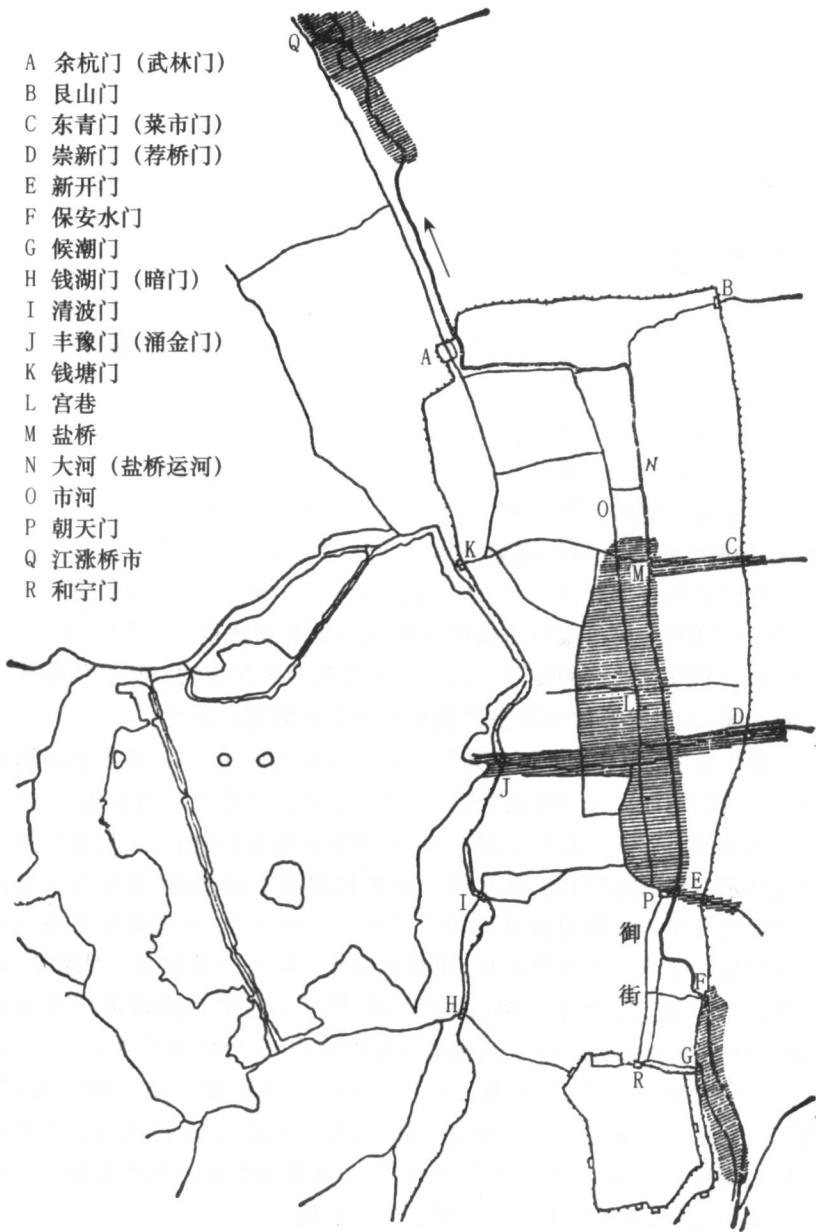


图1 杭州经济中心区

心区位于矩形城市的中央,在干线西侧的娱乐场所之一大瓦子一带(附图 3A:24)。中心区的标志是交引铺、金银铺之类的资本和金融店铺的集中点。这里向东贯通 D 崇新门,向西贯通 J 涌金门(丰豫门),而且在中央大河上的荐桥附近扼卍字形陆路交错点的重要地理位置。次于它的第二个经济中心,是稍稍往北的 L 官巷(芳润桥、丰乐桥)一带,稍稍往南的中瓦子、南瓦子一带以及官巷稍北的 M 盐桥和下瓦子一带(图 3A:16)。这些都是与东西向的陆路相交错的地点。如此,在南北轴上就很明显地出现了纵贯的、北起盐桥南至清冷桥的、细长形的经济中心区。如《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所述,形成杭州经济腹地的一次、二次、三次市场圈所带来的物资,是聚集在杭州城市北郊、东郊和南郊的装卸地的,在那里进行分选,通过大小批发组织,流入上述经济中心区。(参照附图 6)

现在来看看杭州城市的官绅区,它们的地理位置是如何选择确定的,其功能又是如何发挥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可以着眼于两个重要的因素:其一是定居地选择的优劣要素,其二是行政和军事上的城市化要素。

图 2 是从各种记载中收集的与宋代杭州城市内外的官署、官宅房舍、御园、军营和教练场等有关的资料,在经过比较分析以后,配置于各自原来的位置上。应该注意的是,杭州城市的这种状况,其雏形出现于五代吴越国。⁽⁷⁾当唐朝的官吏李泌和白居易为了利用西湖提供饮水而整治西湖中的一些土木工程和西湖沿岸的六井(图 2:52 一带)时,当时的杭州州治和钱塘县治大概是在图 2:38 以北。上溯到秦汉时代,当时的钱唐县是在西湖以西的深山中的灵隐寺一带。这是因为,西湖原来是个咸湖,它是图 2:135 和 88 的连结线,一直向东延伸,在海边开口的。从后汉到六朝期间,才在盐桥运河沿线修筑海堤,使之成陆并截断湾口。

当五代吴越国定都杭州时,市区划分还是很粗放的。在图 2:119 设子城,在凤凰山外围设罗城,北郊以图 2:4、5、6 一线为北限,西面设沿盐桥运河的北罗城,南面设包括凤凰山、玉皇山在内的罗城。当时,杭州城市的实体大小,与宋朝相差不大,但是官厅区的中心是在图 2:23、24 附近的钱江县(宋的仁和县)和 18 附近的钱塘县。⁽⁸⁾钱塘县以南,西湖沿岸的“六井”一带向东,即先秦时代的西湖湾口低地,大概仍是咸水出没的不宜居住之地。这一带和 107 抱剑营一带,是吴越王的骑兵驻屯地。宋初,59 附近的俞家园一带,除了“六井”以外,也扩展了水田、水塘、花圃、果园和

桑田等,东北角的艮山门内,东城的菜市门(东青门)郊外,也是蔬菜园和水塘相连的地方。然而,自从北宋中期以来,至少在城内的西半部,住房已稠密起来,挖掘了无数俗称九十九井的甘泉和甘井,还整治了清湖河等引西湖水的淡水渠道,使饮水和交通趋于方便。

到了南宋,1138年迁都杭州以后,情况就更迅速发展。皇族、官吏、富民、军队都随同宋高宗一齐移居而来,占据了一等的地方;提供服务的工商业者、手艺人 and 雇佣劳动者,就挤入次等和下等地方。当时,杭州城市中的一等地方,就是吴山之麓、“六井”周围和钱塘门一带。还有就是西湖沿岸地方,但交通不便。上述一等地方,在安全性、饮用水、交通便利和风景等方面,都是极佳的,其中尤其是吴山山麓和“六井”一带,这是特等地,它们兼有接近闹市区的优点。

首先是宫城(子城),遵照吴越的传统,设置在防卫和风景最适宜的凤凰山(子城一带)山麓,此山又名“客山”,传说系天下富民建筑宅室于山麓之下。^[9]由于地形的限制,三省六部以及重要的官署,建筑于吴山山麓到图2:68—2的府治周围,但内藏库(内币库)是特殊的,它占据在吴山的很深的地方。供应官、军的补给、给养和财务管理等的官署,则沿南北轴的经济和交通干线,分别占据在各自的适当地点上,这说明了当时的实用主义政策。其例如图2:12、13、15、16、19、23、26、31、44、45、46、47、56、64、65、97—2、109、110、112、118之类的官署。而且这好像未必仅仅是宋代杭州的特例。

另外,皇室、将军、大臣和高官的宅第,当然都是征用了市内的一等地建筑的。诸如38(旧岳飞住宅)、42、53、54、68、59、60、62、63、71、75、77、78、80、81、82、83、84、85、86—1、86—2、88、89、94、98、116、117、127(旧秦桧住宅)和128(旧韩侂胄住宅)等,都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这种一等地群中,大概有三个住宅集中区。第一个是55的以宗学(皇族学校)为中心的区域,这里的中心性很强,并具有双重意义。其一是文化和礼教的中心,29、39、40、41、45这类教学设施和18、37、38、32这种礼仪设施,都具有文化中心的特色。其二是55,它靠近书籍市场和市内最大的娱乐场所北瓦子。自从五代的钱江、钱塘县署以来,这一带都是政府机关的近傍之地,而且也面临市内的经济中心地区的北端。

第二个住宅集中区位于上述同一经济中心区的南半部稍偏西,尤其是77诸皇后、皇太子的住宅,它们面临后市街,西北部是卍字形的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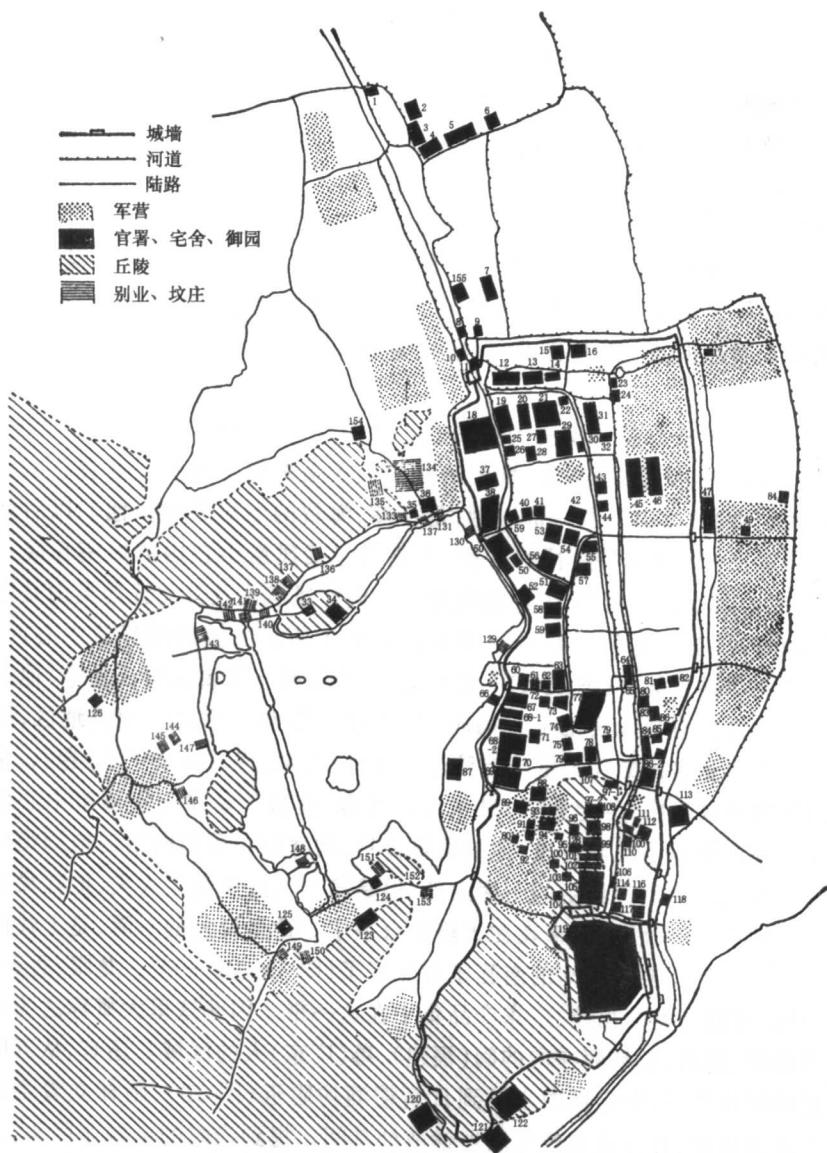


图2 杭州的官绅区与军营区(据《咸淳临安志》及《梦粱录》)

心,北部是金融商之类集中的经济功能中心地区,东部和东南部是香药铺、珠子铺、酒楼、妓院等林立的繁华场所(图 3B)。这个住宅区有靠近御街的地理优势,上流阶层所选择的建宅位置,与极其繁华的市中心的重要部分异常邻近,这一点也许不是宋朝杭州的特色。第三个住宅集中区 81—86、127,情况基本相同。与南面的繁华区 77 一样,这个地区也靠近卍字形的市中心。但是,因为背后是由崇新门(图 1D)到新开门(图 1E)的长长的城垣,所以在交通和经济方面都不便。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安全性却很好。这个上流住宅区,大概是对一个地势较高的粗放地区,再次征用而发展起来的。顺便提及,后来元朝是将这个区域转作鞑鞑城(Mongol quarter)用了。

现在再来看看从富民到贫民的一般民众的集中住宅区的分布情况。据吴自牧的《梦粱录》所载,杭州的富民很多是来自外地的寄寓者。凤凰山的别称为“客山”,这一带山侧,是江商、海贾的卜居之地。他们以后就成为富民。^[10]这个“客山”的名称,若是指包括凤凰山在内的城南丘陵一带,那大致就是不错的,下面还将述及。假使凤凰山及其北丘的吴山是民间的特等定居地,则其次的一等地就是图 1 所示的城内的经济中心区。在其北端靠近盐桥(图 1:M)一带的北面,有杭州土著富民蒋氏住宅,他由于慈善行为而受人祭祀于广福庙。^[11]上述皇族和将军仍征用的地区,原来大概也是富民的住宅区或寺院址。此外,在洪迈的《夷坚丁志》卷六,泉州杨客的故事中,曾记载说,泉州海商杨客,投宿于紧靠卍字形市中心南面的柴垛桥以西的旅店里,他的贵重货物,则寄放在稍稍向南的抱剑街的收货批发站唐翁香药店的土库内外,但是第二天这里发生火灾,他在吴山上看到了商货烧毁,后来就在火烧场自杀了。这里说及的一隅,是上述两个皇后集中住宅区中间的南瓦子和北瓦子(图 3A、3B)一带。龙眼、香药、珍珠、蔗糖之类的福建、广东产品集中在这一带。因此这里大概称之为包括旅店、商店、贸易商在内的闽(福建)、粤(广东)人的区域。还有,从五间楼酒楼往北,过卍字形中心地到日新楼酒坊附近(图 3B),则林立着金融业者的店铺,并有温州产的漆器铺散处其间。提到当时的金融业巨头,就会联想到山西、旧开封、四川、徽州和苏州的金融业者。在这个日新楼和官巷一带,有许多金银工艺、刺绣和高级丝织品的名店,这当然是富民区。从这北面到北瓦子和宗学附近,则是药店、书籍印刷、发售店和艺人住宅区。然后跨过众安桥,就是上述土著蒋氏住宅。按照这样的观察,这个经

济中心一望而知是民间的一等地(参照附图 3A、3B^[12])。

可是,在图 1 从东青门 C 到崇新门 D 的城垣与前述中心区的东边和盐桥运河之间的地区为哪些人所居住,却是不得而知。按笔者推测,在这片很大的、地势低湿而饮用水和交通都不方便的地区内,或许是些工商业的雇佣者、军人和低级公务员之类的住宅区。在这种过密的居住条件下,而作为消防的坊隅,就只有一个中隅(有兵一百零二人和瞭望楼)。^[13]全区只有几个坊巷名(街名)见诸记载^[14],为此,按照文献所获得的印象,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散漫杂乱的粗放区域。在这样一片广大的地区只有一个消防坊隅,这种骤然看来是矛盾的事,其实是可以解释的。因为从官方的观点来说,治安和福利,说到底是以以上流人士的威信和财富为服务对象的。当那些木结构的中国式房屋起火时,消防的目标,只是为了防止趁火打劫和火势蔓延而已。

最后来看看在上述观察中未曾提及的城内东北角、城外的东郊、南郊、北郊和西郊等。这些地方按其功能是军营地、补给地和别墅等,从防卫的角度来看,杭州城市的西郊有西湖和与西湖相连的丘陵,南郊和东郊有海洋、河口之险,最薄弱的方面毕竟是北郊。在北宋初期,拆掉了吴越时代的北部罗城,城北的泛洋湖及其以北的临平湖一带,已经湮废成为大片沼泽地。北部城墙上没有开门,以防备北来的进攻。从余杭门到江涨桥的水路是城市补给的生命线,因此在半道红(南北向的陆路)西面的东、西马廐的低地,驻扎了马、步大军。在东北角艮山门内外的低湿地,也同样部署着马、步大军和教练场。东青门以南及崇新门一带,除水军寨外,还并排建造了驻扎禁军的兵营。对高宗有戎马功劳的将官们的士兵,大概是选择了北部和东部作为适宜的营地。这里的居住条件虽然很差,但却可密集扎营。其他士兵则部署在凤凰山、吴山一带和西郊,以巩固后卫(图 2)。东郊、北郊和南郊居住着菜农、批发商和雇佣劳动者,也居住着厢军。

西郊,即西湖沿岸一带,是众所周知的风景胜区,饮用水的利用和日常补给,估计也都不虞匮乏。可是在经济和交通方面却是属于二等地,这就说明了,在风景区中,唯有上层阶级的别墅、花园、坟庄、墓地和寺院等点缀其间。

把以上的观察进行综合,按照杭州城市内外的居住空间的利用,就描绘出大致的生态区划。它是沿交通南北轴成自西向东的条带状纵长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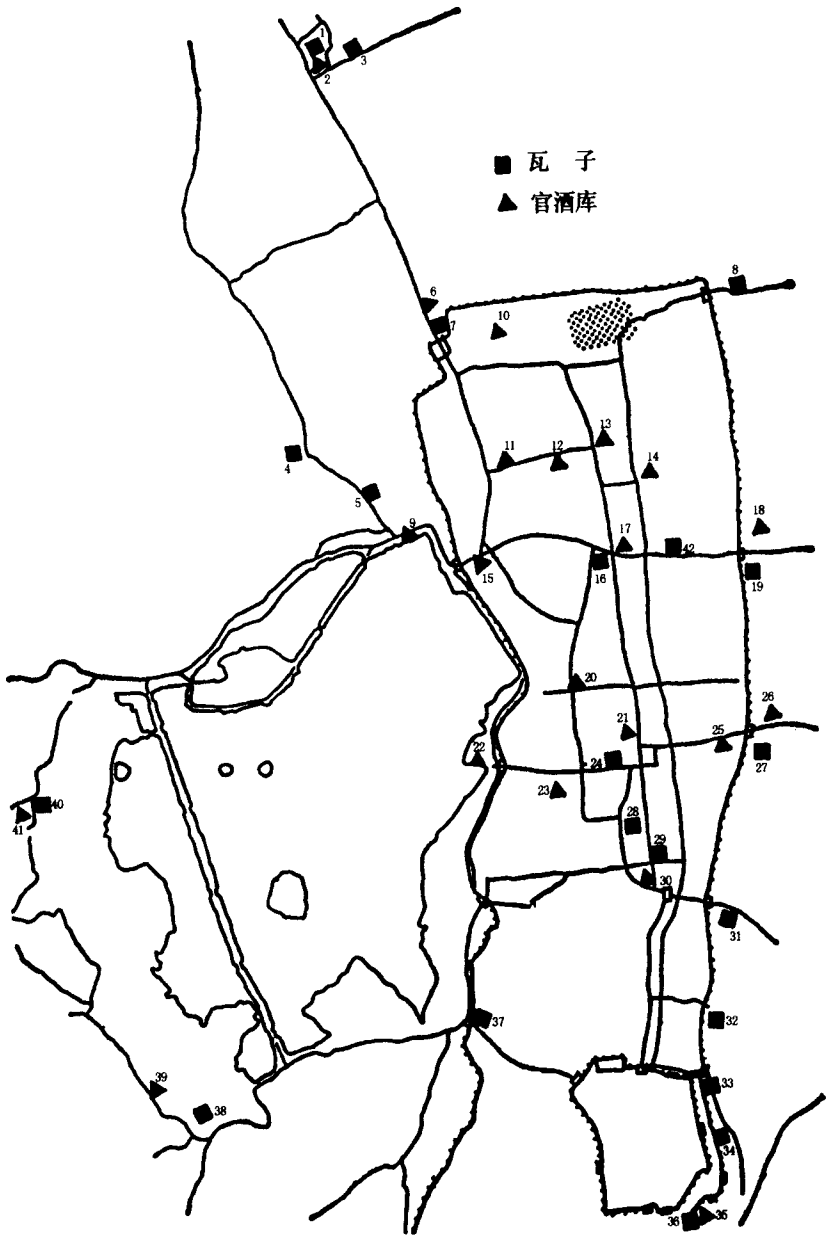


图 3A 杭州城内外的娱乐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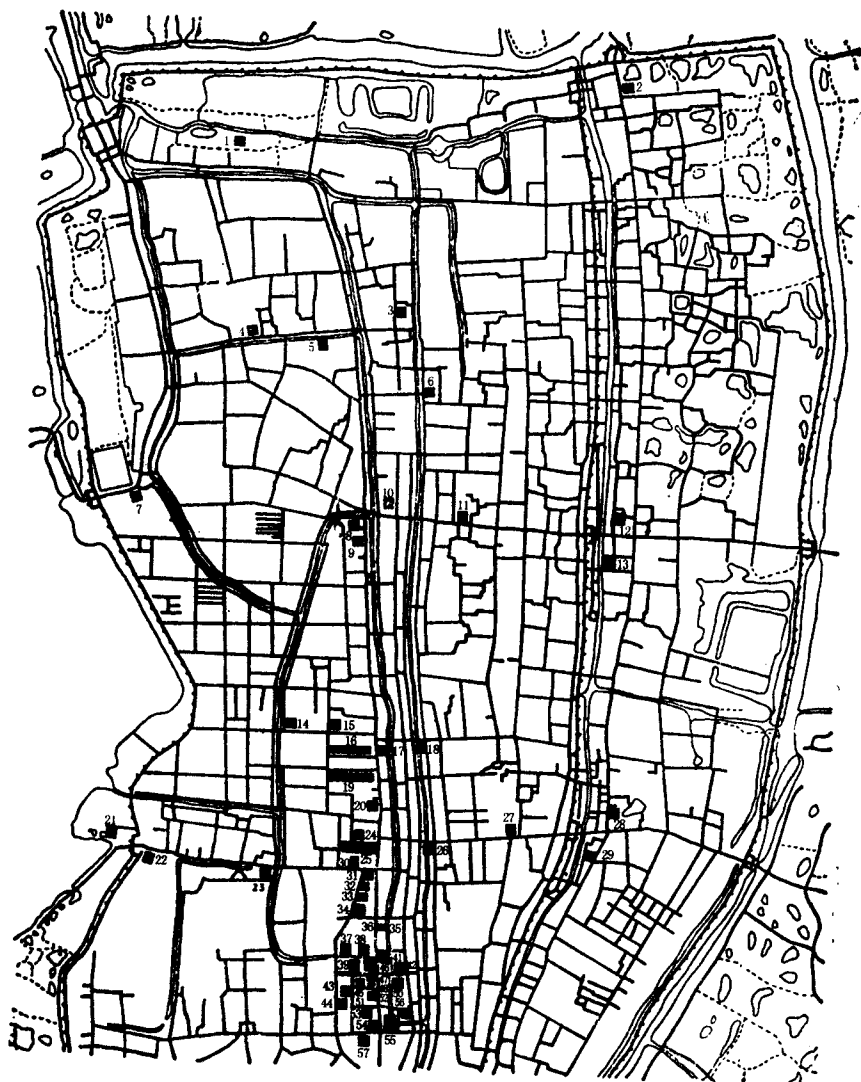


图 3B

的。在西部城墙以外,有西湖沿岸的别墅地、风景区和与它相毗连的军营。其次是西部城墙以内,有纵长的官绅区。而且,在盐桥运河西侧中部,经济中心区明显地楔入这个官绅区。另外,在盐桥运河东侧的城墙内,北部是仓库和军营,中部是中产以下的民众住宅区,南部是官绅区,结构很复杂。然后是东部城墙外的东郊,这里是装卸区和从城内搬移出来的人们的住宅区,只有它的南端是繁华的商业区(图6)。

三 文化、宗教区

按照文化功能的角度观察杭州城市,其中枢性表现在城市空间的什么地方呢?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高度文化与民众文化两者而言。因为高度文化当然也包括官僚的组织及其设施等,而且杭州又是全国的首都,所以宫城、各政府机关、礼仪设备、城墙、城门、大路和御街等的威容与壮丽等等,其本身即是象征中华文化的中枢性的设施,这是毋须赘述的。不过,除了标榜这种综合性的整体文化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具体反映首都杭州文化中心的独特的地方。

其一,如前已提及的,以城内北半部的礼部贡院(图2:29)为中心的学术机构集中区,这是国子监(图2:29)、太学(40)、武学(41)和宗学(55)等所占据的一角,是当时全国的官僚及其后备军所憧憬的文教中心。还有,在宗学的南面,林立着著名的书店和出售上流人士的衣冠和服饰的商店。

其次,从礼仪象征来看,例如图4的太庙(74)、景灵宫(39)、万寿宫(7)之类的宋朝皇帝、皇后的祭坛、郊坛(90)、社稷坛(104、45),相当于先贤祠的旌德观(100)、道教礼仪的太乙宫(38)、东太乙宫(38)、西太乙宫(24)、四圣观(23)、天庆观(73)等等,都是枢要的设施。它们在空间上的配置反映了地形的特殊性和分布狭窄的程度。从传统的格局来看,可以认为是相当突出的;但从常识的角度来看,这种配置都绝非超越常规。

与这种国家祭祀不同的,是以各等市民的信仰为对象的宗教设施,其中有些设施是伴随移民传入的,有些则是本地原有的信仰。例如图4中的54、66、69、70,原是东京开封府的宗教设施,在迁都时同时移来的。^[15]这些设施之所以主要集中在凤凰山和吴山一带,那是因为有新来的官署和官吏的定居中心。同样的情况,图4:72梓潼圣君庙,大概是由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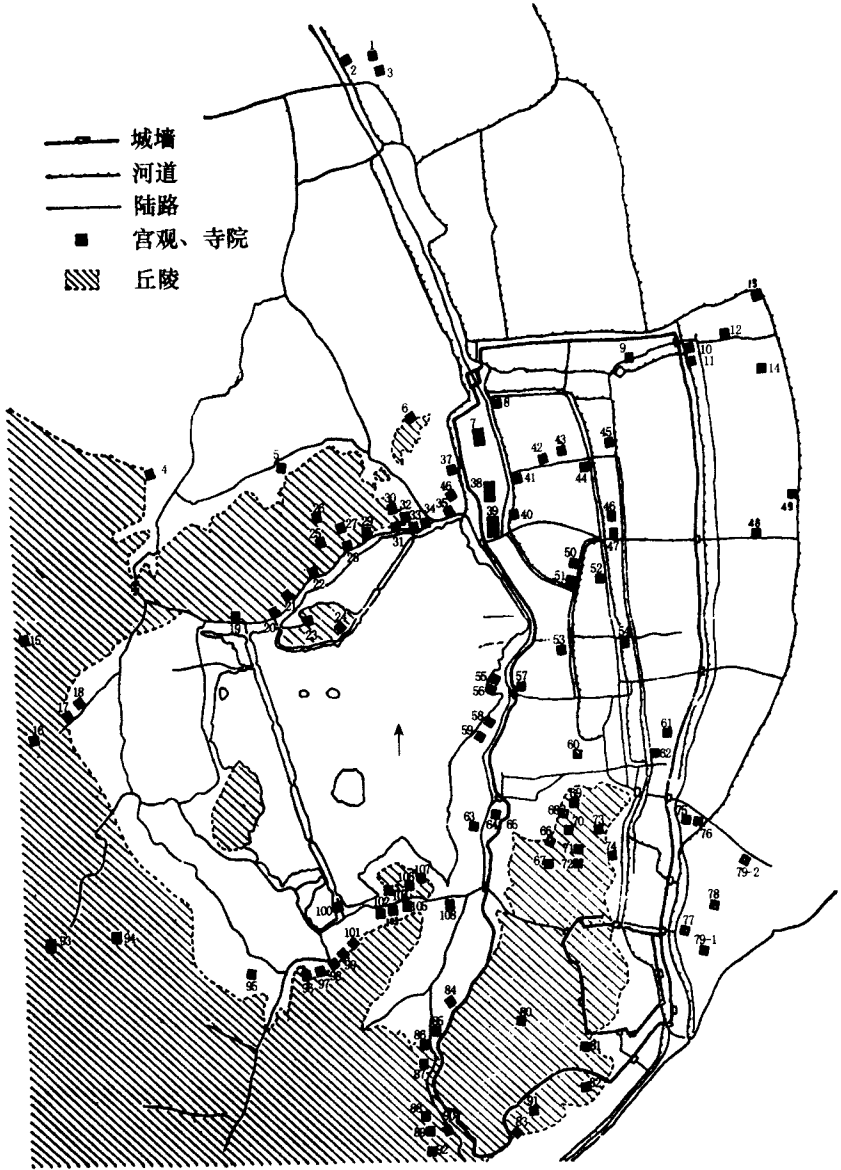


图4 杭州主要宫观寺院

这里是从四川来的官吏平民的定居中心。天妃庙所在地 12、77、79—2, 则暗示了是福建、广东或东南沿海海商们的定居地。霍山行祠(广德军)6、显佑庙(常州)41、仰山祠(袁州)44、东岳行祠(山东泰山)68 之类的“外郡行祠”^[16], 看来也都与收容来自各地的移民有关。尤其是 14、15、37、39、79—1、94 的五显祠(五圣祠)^[17], 大概与以徽州婺源为中心的商人活动有联系。虽然不清楚五显神、五通神和五圣是否同一内容, 但是这种信仰在经营木材之类的山货买卖的安徽南部和江西方面的商人之中, 是广泛流行的。在安徽婺源县, 每年四月八日有佛事, 集中天下商人举行祭祀。^[18] 杭州在四月八日也有大祭, 九月二十九日有“五王诞辰”的祭祀。^[19] 在苏州吴县, 也有婺源人祭神的五通庙。^[20] 所以我认为随着新安帮商人向长江三角洲的迁移和经营, 他们的祭祀据点也有了扩大。此外, 祭祀北极佑圣真君 61 的佑圣观, 也是广为士民所信仰的宫观。^[21]

另一方面, 佛教系统的寺院虽然在城内外都有分布, 但如前所述, 为数众多的寺院在迁都时也有被接收、合并或转作他用的。主要的分布地集中在西湖畔, 西湖的北岸和南岸, 有许多吴越王或南宋皇室、功将和功臣的坟庄、墓地等, 西湖西岸的灵隐寺或上、中、下三天竺一带, 则分布着来历很古老的宏伟寺院。这样, 在西湖的四周, 出色的景致加上星罗棋布的寺院、庭园、别墅和墓地的点缀, 就作为精神生活上的休养地而形成了独特的另一天地。

假使要探究与生活于此的市民的日常消费和娱乐有关的文化区, 那就得考虑其消费和嗜好等的性质。图 3A、3B^[22] 指出了杭州城市内外的娱乐设施的分布。若用图 1、图 2 的工商区和官绅区的位置关系的概念, 去观察图 3A、图 3B 的瓦子(娱乐场)和官酒库的配置, 则可以发现, 在通常称为瓦子的繁华地区, 按照消费和嗜好的性质, 大致有两种类型: 一类是位于城内经济中心的规模很大和内容分得很细的瓦子, 另一类则是位于城外的军营或集镇的小规模瓦子。

城外的瓦子, 虽然江涨桥市(图 3A:1、3)、新开门外和候潮门外^[33] 稍有特殊, 但其规模大体上也不过是军营附设的酒保之类。与此相比, 城内的 16、24、28、29, 在雇佣人员的密度、购买力、消费和爱好等各类细节方面, 规模和性质当然也都不同。尤其是 16 北瓦子, 内有勾栏十三所, 近处是称为上百戏巷和下百戏巷的艺人区, 附近的官巷街一带有高级店铺、酒楼、书店和药铺等, 是杭州最大而丰富多采的娱乐场所。另外, 24 大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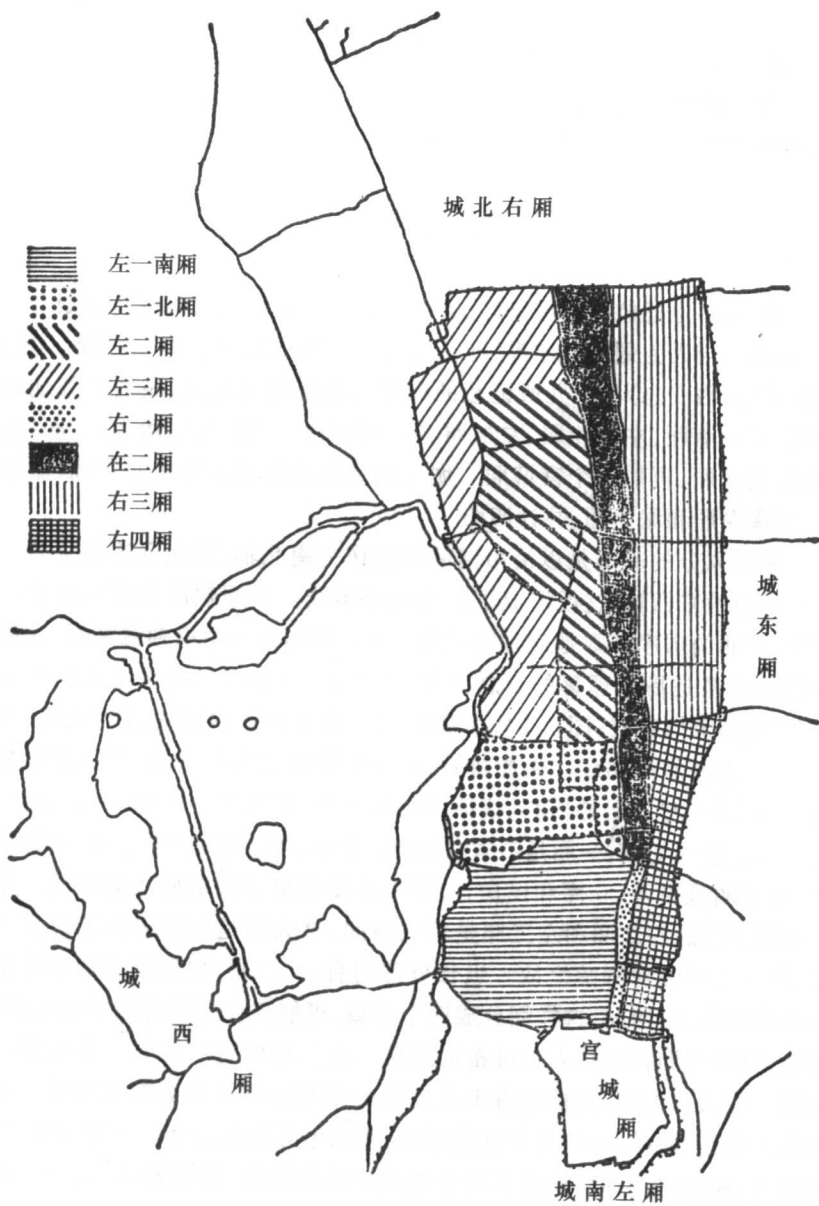


图5 杭州的厢界区划

子、28 中瓦子、29 南瓦子这三个瓦子的密集地区,酒楼、茶肆、分茶酒店、著名厨坊、各种饮食店和金融业、商业店铺等等鳞次栉比,官、私妓馆林立,也是“缙绅同年会”和“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之处”集中的地方。^[23]因此,城内的这四个瓦子,确实是日常的娱乐中心。

四 结束语

最后,将上述杭州的经济区、官绅区和宗教文化区这类按功能划分的生态区划,与人为划分的厢界,即行政上和治安上的区划作一比较。图 5 是按咸淳《临安志》卷十九所记载的厢界坊巷绘制而成的,城内详细地划分成:左一南厢、左一北厢、左二厢、左三厢和右一厢、右二厢、右三厢、右四厢,共八厢,再加一个宫城厢。城外则是粗放地划分为城北右厢、城东厢、城南左厢和城西厢,共计四厢。

城内划分的基准是以沿市河的御街作为南北轴,再加上连接崇新门和丰豫门的東西轴,这就形成了区划的基本线。右厢顺序号是顺时针排列的,左厢的顺序号则是逆时针排列。从以御街作为中枢轴线来看,这种排列的关系是易于理解的。总而言之,天子、皇后们出宫城之北的和宁门,穿过朝天门鼓楼(图 1:P),由御街北上至景灵宫的路线,从“圣视”看来,是一条基本的路线。由此排列,左一南厢是三省六部街,左一北厢是临安府署街,左三厢是仁和、钱塘两县县署街,左二厢是礼部、贡院、诸学校、皇族、皇后宅,右一厢是三省六部的门前街,右二厢是“中心岛”的繁华街,右三厢是军营、仓库和民房,右四厢主要由皇后和皇族住宅构成。左一南厢、北厢、左二厢和左三厢是粗放空间,这大概是由于包括了许多官署,所以人口相对稀疏之故。纵长分部的右一、二厢,加上按地形条件左右对称的右三、四厢,这样划分成四个区域,可能仅仅是凑合数字的考虑。不过,这两个厢肯定是人口过密的地区。右三厢的宽度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在人口方面,大概是由于北半部的相对过疏与南半部的相对过密而相互抵销,此外,由于北半部是军营,所以不必勉强细分。不管怎样,这种划分,在思想上都反映出不甚考虑到居民的性质、密度和内容,是一种机械的空间划分方法。

图 6 是综合过去的研究成果而绘制的杭州城内外按功能划分的生态区划图,分别表示了官绅区、军营区、补给区和经济中心区的分类。官绅

区和军营区是民事、军事、内务、财务行政的官署和官绅、皇族的住宅以及他们的别墅、庭园和宗教设施等等为主的区域。一般平民的主要活动区，是经济中心区和补给区以及与这些地区相连接的区域。一望而知，南北轴以西主要是官绅的活跃场所，而这中间还夹杂着外来的和土著的富民住宅或宗教建筑，情况如前所叙。南北轴以东的部分空白地区，居住着平民或零杂职业的从事者。在城外，他们就定居在军营或补给区的四周。因为南北轴以东，一般是池塘棋布的低湿地，饮水、交通、消费和治安方面都不佳，所以可以作出这种估计。

那么，在中国的城市中，像杭州这样的城市生态区划，是中国城市的常态呢，抑是一种特殊的例子？对于这个问题，正如我在《宋都杭州的商业中心》一文中已经述及的，假使把图6作九十度的右转，这样，杭州的城市规划和生态区划的情况，就成为稍呈横长的矩形，看起来虽然很奇异，但是与中国一般城市的规划却并无多大差异，即补给和交通干线是位于城市的东西方及南方，经济中心区的位置在城市中央，而且礼教和文化中心的配置也靠近中心区。这样，北面城内是官绅区，北面城外是墓地、别墅和军营所在。

杭州城市的生态区划不同于一般城市之处，即是宫城位于城市的极端一隅（在这里是西隅），还有就是皇族和皇后住宅围绕市中心的繁华区而分布。回过头来看看江南的其他中小城市的规模，它们也有类似杭州那样的在地形和城市空间的划分方面的独特情况，虽然不符合常规，但也不足为怪。例如明州^[24]、苏州、扬州、袁州^[25]和湖州^[26]之类，它们或是形态不整齐，或是中心地区因受到交通干线和地形的制约而显出位置上的偏离，这种情况多得出乎意料。因此，在河流交通发达，加上地形起伏复杂的华中、华南地区，在城市规划和空间划分方面，通过因地制宜的方式修正传统的规范，这种情况还算是正常的。问题是作为首都象征的杭州，这个城市所显示出来的现实主义的城市规划，是否为当时人士的心理所理解。处于宋代这种中世纪革命期，尤其是处在城市革命时期，北宋首都开封的本身，从传统观念来看，已经是“新奇的”，容许现实主义的城市了。从功能本位的观点来看，杭州的官绅区和工商区的结构状况，也不能说是特别“异样”。但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城市，而是整个南宋一百四十年的首都，其公开的正式称谓是“行在”，其实就是临时的京城。饶有兴趣的是，明、清的首都南京和北京，不论形式上或是在规划上，都极其明显地向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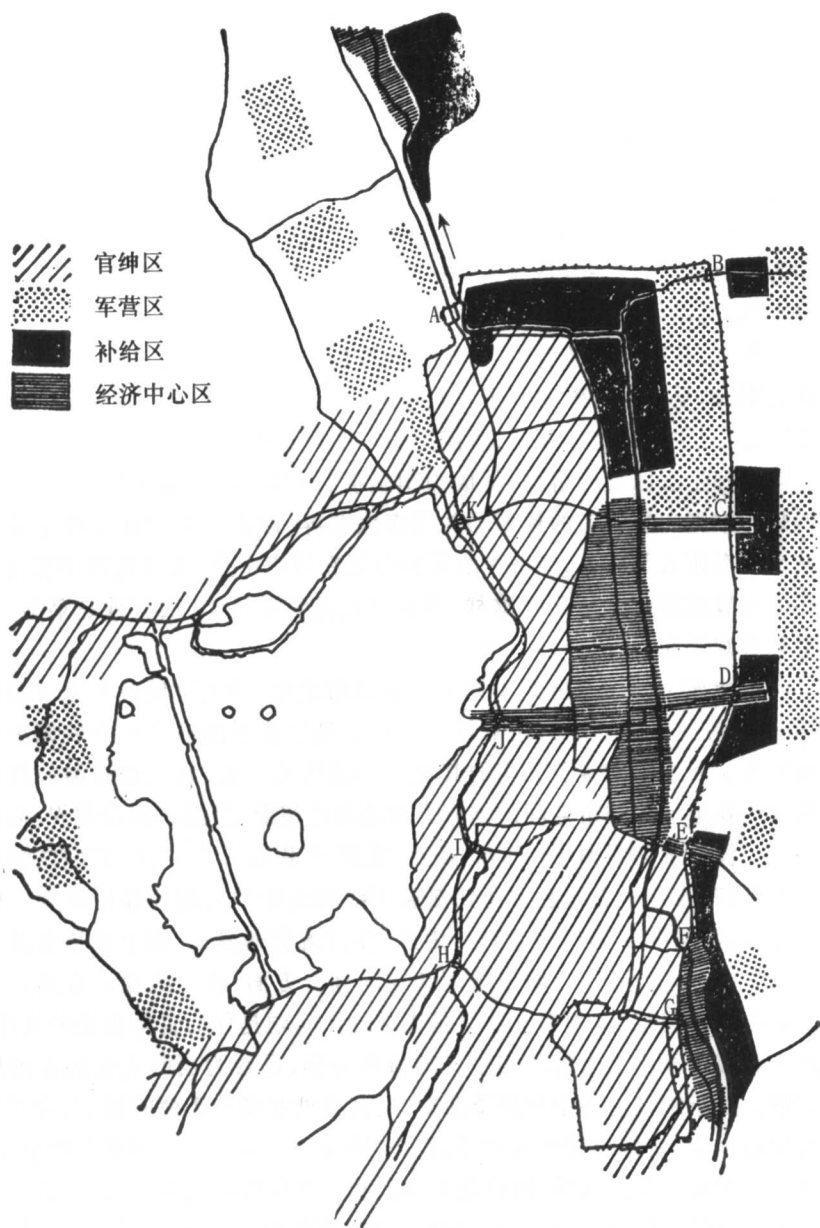


图6 杭州城内外的生态区划

统观念倒退。在清朝的北京,这种倾向进一步发展,把工商区排出在前门外,极其强烈地复活了礼仪象征的准则。北宋和南宋是在大传统和小传统方面全都形成了文化黄金期的时代,相反,明、清时期却发展了世俗化,对于宋代所完成的文化来说,出现了一个渐渐扩散的时期。所以,中华帝国的文化黄金期,未必一定同时带来城市规划上的传统观念的发扬。由此看来,单凭形式和高度文化以及有关这类记载的文献等等,去研究中国城市史,这样的方法,或许是存在问题的。正如本文一开头就提到的,对于城市论的讨论,必须就当时的整体之中,进行相互的对比,找出普遍性与特殊性,这样的工作,才能掌握事实的真相。

(原载《都市史をめぐる诸问题》,1984年,
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二辑)

注 释

- [1] Walter Christaller 著,江泽让尔译:《城市的地理环境与发展》。
- [2] 斯波义信:《宋代明州的城市化与地域开发》,载《待兼山论丛》第三号,1969年;《宁波及其腹地》,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第391—439页,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7年;《宋代的城市城郭》,载《中岛先生古稀纪念论集》下卷第289—318页,汲古书院,1981年。
- [3] 斯波:《中国中世的商业》,载《中世史讲座3中世的城市》第201—216页,学生社,1982年;D. 崔维泽:《唐朝的市场制度》,载《亚洲专论》15卷2期,1968年;斯波:《宋代商业史研究》第306—316页,风潮书房,1979年再版。
- [4] 梅原郁编:《中国近世的城市与文化》,同朋社,1984年;斯波:《宋都杭州的商业核》。
- [5][6] 斯波:《宋都杭州的商业核》,附图4。
- [7][8] 魏嵩山:《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载《历史地理》创刊号,1981年。
- [9][10] 《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
- [11] 嘉靖《仁和县志》卷七所引,元胡长孺《广福庙传》。
- [12] 按附图2方法绘制。
- [13] 咸淳《临安志》卷五七,防虞。
- [14] 咸淳《临安志》卷十九,坊巷。
- [15] 咸淳《临安志》卷七三,东京旧祠;《梦粱录》卷十四,东都随朝祠。
- [16] 咸淳《临安志》卷七三,外郡行祠;《梦粱录》卷十四,外郡行祠。
- [17] 同上,又咸淳《临安志》之《浙江图》、《西湖图》。

- [18][19] 斯波:《宋代商业史研究》,第380页;《宋代徽州的地域开发》,载《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第229页,山川出版社,1972年。
- [20][21] 《梦粱录》卷十九,社会。
- [22] 《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武林旧事》卷六、《梦粱录》卷十九、咸淳《临安志》卷十九等。
- [23] 《梦粱录》卷二十,妓乐,又卷十六,茶肆。
- [24] 斯波:《宋代明州的城市化和地域开发》,载《待兼山论丛》第三号;《宁波及其腹地》。
- [25] 斯波:《关于江西宜春的李渠(809—1871)》,载《东洋史研究》36卷3期,1977年。
- [26] 斯波:《浙江湖州定居的沿革》,载《木村英一博士颂寿纪念中国哲学史的展望与探索》,创文社,1976年。

参 考 论 著

1. 龚胜生:《两湖平原城镇发展的空间过程》,《地理学报》1996年第6期。
2. 高松凡:《明代北京城市市场演变及其分布》,《环境变迁研究》1996年第5辑。
3. 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期。
4. 鲁西奇:《唐代长江中游政治经济地域结构的演变——以襄阳为中心的讨论》,载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5. 斯波义信:《宁波及其腹地》,载〔美〕施坚雅著、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第3版。

编后记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获蓬勃发展,人才涌现,研究范围大幅拓宽,学科影响力、知名度都大幅提升。过去有人以为历史地理学就是历史加地理,我们常要费力解释一番。现在用不着了,学界人都已明白历史地理是做什么的。更由于教育部正式将历史地理学设定为历史科学的一门二级学科(在中国地理学会亦设立历史地理学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学遂正立于学术之林。大学中,凡欲认真发展历史系的单位,都在积极启建这门学科,招聘历史地理学的人才。因为历史地理的课程越开越多,需要了解历史地理学的同学也越来越多,所以给大学生们选编一组历史地理研究文选,实在是很有必要的。

这套书叫做“大学历史学论文读本”,主要的读者是大学生、研究生。书中大多选文考虑学术深度,也考虑可读性。不过,为求研究主题的代表性,也不免收录了几篇读起来稍难的文章。因体例关系,在作者文章的选定上,除了侯仁之、谭其骧、史念海这三位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导夫先路的先生外,其余作者仅收录一篇文章。又因篇幅所限,不得不割舍不少其他学者的好文章,好在每篇文章后面列有一些补充阅读的目录。另外,近年有不少十分可贵的探索,但一来因篇幅所限,二来这些新探索仍需时间去走向成熟,故本文选未急于选登这类作品。在所列补充阅读选目中,也多是优秀之作,劝读者找来一读,说不定更有所爱。

文选工作得到过周振鹤、辛德勇等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唐晓峰 黄义军

2005年6月